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冷战的起源

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

沈志华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历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寻求真相


ISBN 978-7-5108-1501-0

定价：68.00元

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冷战的起源

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

沈志华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的起源 / 沈志华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7

（沈志华冷战史文集）

ISBN 978-7-5108-1501-0

Ⅰ. ①冷… Ⅱ. ①沈… Ⅲ. ①冷战—国际关系史—文集 Ⅳ. ①D8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7000号

冷战的起源

作　　者	沈志华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7.5
字　　数	478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501-0
定　　价	68.00元

目 录

附录

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

1943年5月，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突然宣布解散，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组织形式而言，第三国际是一个共产党世界性的统一机构，各国党只是它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都独立了。虽然到中苏分裂之前，国际共运还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继续存在，但是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共产党情报局只是欧洲九国共产党的协调和指挥机构，而苏共二十大以后各国共产党都是通过召开会议来统一他们的政策和行动。就斗争任务而言，共产国际在理论和逻辑上始终以发动世界革命为己任，而在共产党情报局那里，所谓世界革命战略充其量只是莫斯科动员各国人民支持和援助苏联的口号，苏共二十大则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①]

然而，由于缺乏档案材料，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纳入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俄国档案的解密为人们提供了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考察的契

① 笔者对上述问题的论述详见《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机，研究论著也相继出现。① 目前俄国学者的研究，比较详细地考察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历史过程，但对这一事件的原因和意义的探讨却显得不够深入。斯大林为什么要在1943年5月迫不及待地解散共产国际，这个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4年的庞大机构是怎样解散的，共产国际的解散对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乃至世界革命意味着什么？这些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一、共产国际的解散势在必行

最初，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② 共产国际正是为了推行世界革命这一战略任务而诞生的。

十月革命取得成果以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在期盼和准备世界革命。由于红军在国内战争中的胜利，1920年7月1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发动世界革命的决议。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支持这个路线，在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中强调："国际无产阶级将时刻准备战斗，直到苏维埃俄国的版图扩展到了全世界。" 1921年春革命陷入低潮后，尽管列宁试图修正世界革命的概念，并对"左"倾冒险主义展开批判，但俄共（布）和多数共产国际领导人仍然坚持在欧洲各国全面发动进攻。③

① 苏联解体后，随着档案的解密，有关研究论著便在俄国开始出现，如 *Лебедева Н., Наринский М.*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1943 году.//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1994，№5；*Ширина К.К.*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стратеги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5；*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1943-1944 г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7，№7；*Адибеков Г.М., Шахназарова Э.Н., Ширина К.К.*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оминтерна，1919-1943，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7，这些论著分别讲述了共产国际解散前后的情况。至于涉及共产国际解散的历史文件，主要收集在俄国出版的三本档案集中：*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 II，после 22 июня 1941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1998；*Чубарьян А.О. (от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1919-1943，Докум. Очерки，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2；*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ст.)*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и Коминтерн：1919-1943гг.，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4。此外，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日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来源：*Дим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9 марта 1933 - 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1997，中译本参见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③ *Ширина*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c.46-48. 有关的详细档案文件，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6卷的相关专题文件。

1923—1924 年，革命的风暴已经过去，而资本主义世界在美国的带动下开始趋向繁荣。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多数领导人在把革命推向东方的同时，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斯大林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在本质上和逻辑上是对“世界革命”战略的反动，因而受到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联盟的尖锐批判。反对派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在苏联党内斗争中运用的政治策略不敌斯大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理论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斯大林的主张更具现实性和实用性，并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① 随着对世界革命路线的偏离以及斯大林在党内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共产国际开始逐步从一个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世界性组织机构沦落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

1929 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再次唤起革命希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大会提出的战略是：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论是在法西斯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实行议会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总体上，共产国际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和民主的组织，能给资本主义以打击，至少能加剧革命局势”，而社会民主主义则是更危险的敌人。于是，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要经常揭露和打击社会民主主义，在实践中不懈地争取无产者的大多数。②

1933 年希特勒崛起，法西斯成为对苏联安全的更大威胁。1935 年 7—8 月共产国际在七大期间提出，法西斯主义剥夺了民主，摧毁了人类赢得的巨大社会权利及精神成果。季米特洛夫在会议上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广大群众所面临的，“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民主之间，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因此，配合苏联与英法建立集体安全的外交路线，各国共产党必须转向拥护民主，动员群众，建立起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③

然而，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能的警惕以及与英法谈判陷入僵局的结果，使斯大林

---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 6、8、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954 年，特别是下列内容：《论列宁主义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报告和结论等。关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争论还可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6 卷（特别是第 81–124 页）和第 9、10 卷刊载的相关专题文件。

②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495，оп.18，д.767，л.76，*Шириня*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с.52-53.

③ *Шириня*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с.54-55. 马细谱：《季米特洛夫关于人民民主思想的转变》，《世界历史》1997 年第 4 期。共产国际组织的国际纵队对西班牙内战的干预成为这一方针的实践。

再次改变了策略。为了保障苏联的安全，苏联决定与德国联手。[①]1939 年 8 月苏德秘密条约签订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斯大林要求共产国际淡化反法西斯的宣传，取消人民阵线和民族团结的口号，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必须坚定地宣布反对本国政府，反对战争”。于是，几年来依靠人民阵线与本国政府合作并得到空前发展的欧洲各国共产党，被迫对各自政府的反法西斯战争采取了不合作立场。因为“对待苏联的态度便成为衡量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意图的真假试金石”。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党：“凡与此看法抵触的，都要立即修正自己的政治路线。”[②]其结果，不仅各国共产党再次受到政权当局压迫，共产国际本身也成为众矢之的。在欧洲以外，1941 年初，皖南事变引起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分歧，美国共产党也退出了共产国际。[③]

面对艰难的处境，1941 年 4 月在苏联领导层便出现了有关共产国际是否还要存在的议论。[④]4 月 20 日，斯大林对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说，现在，“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由于出现了新的情况，“各国共产党作为从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已经成为障碍”，这种形式使各国党更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第二天，季米特洛夫便向最有影响的两个西欧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和多列士传达了斯大林的意向：在近期停止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的活动，使各国共产党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并成为真正本国的政党。[⑤]5 月 12 日，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与共产国际两巨头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讨论了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决议的起草问题。在讨论中，他们担心这样突然的变化会在共产党内引起沮丧和混乱，同时被敌人攻击为“一种手腕”或说共产党人放弃了世界革命。因此认为，在提出这一问题时，应该强调：“在现阶段，各国共产党必须作为独立的本国的政党来发展。在今后的阶段中，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国内的蓬勃发展将使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更牢固、更广泛的基础上获得新生。”此外，还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匆忙行事。”他们还为解散共产国际找到了很好的理由，即（1）使反共产国际公约失去其

---

① 关于苏德秘密接触和谈判的过程，以及签订的秘密协定等文本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6 卷刊载的相关专题文件。

②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c.181-185；*Шириня*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c.56-57. 另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5 卷，第 56、5–6 页。

③ 详见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c.209-213，202，227。

④ *Чубарьян А.О.*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русскому изданию.//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1947/1948/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1998，c. Ⅷ.

⑤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c.227-228.

基础；(2) 打掉资产阶级手中的重要王牌：共产党都是服从于某国外中心的本国的“叛徒”；(3) 各国共产党将发展成为真正的本国人民的政党；(4) 吸引更多的工人积极分子入党。①

由此看来，使斯大林感到共产国际应该解散的最初动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各国共产党的宣传口径和方针、政策围绕莫斯科的意图左右摇摆，其结果不仅使共产国际的威信和作用受到极大损伤，成为各国政府攻击的目标，而且把各国共产党搞得晕头转向，失去信心，而这种组织形式最终带给他们的只能是伤害。第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使人们根本看不到世界革命的前途，无论是与英法结盟，还是与德国联手，苏联都必须借助于一种资本主义的力量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共产国际因此很难再喊出世界革命的口号。作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共产国际存在的逻辑基础已经动摇。至于苏德秘密条约的签订，虽然给莫斯科带来了眼前利益和脱身于战争的短暂时机，但是，却在道义、信仰以及国际力量的聚合等方面从根本上打击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这样的情势下，斯大林不得不考虑脱掉这件无用的外衣。尽管6月21日希特勒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共产国际的工作部署，但是，这场以保卫苏联为中心的战争开始以后，一方面共产国际的重心已经完全转向民族国家利益，世界革命自然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苏联与英美在反法西斯基础上建立的联盟，随着战争的进程有不断加强和长期化的趋向，共产国际已经成为莫斯科推行其对外政策的严重障碍，于是，斯大林决心踢开这块绊脚石。

二、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双重考虑

在希特勒启动巴巴罗莎计划的第二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紧急召见了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据季米特洛夫的观察，与以往人们的传言不同，斯大林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坚定和信心”。谈到共产国际的工作，斯大林指出，各国党应就地开展保卫苏联的运动，而不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目前，共产国际不应公开出面。季米特洛夫按照这个精神向各国党发出指示，要求动员全部力量保卫苏联。书记处还决定“立即调整共产国际机关的所有工作，竭尽全力帮助联共（布）和苏维埃各级机关”。②6月24—26日，共产国际电示瑞典、英国、法国和美国共产党，

①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233-234.

②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235-236；РЦХИДНИ，ф.495，оп.18，д.1335，л.1-3，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 II，с.91-92.

严厉批评把苏德战争说成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的错误认识，强调指出：苏联进行的是卫国战争，而“并不想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任何人”；关于世界革命的说法只会“妨碍所有反希特勒力量的国际团结”；英共必须放弃一切对丘吉尔政府的攻击，而法共则应该与戴高乐抵抗力量合作。[①]7月初，共产国际再次提出了在各被占领国家建立民族统一阵线的问题，而且强调“共产党人在民族阵线中不要提领导权的问题”。[②]

显然，一切有关革命的提法都与共产国际的基本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却同战时与西方结成联盟的政策背道而驰，并且随着战事发展，越发显得不协调。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的参战，更加推动了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于是，对那些实力日渐强大而使本国政府感到威胁的共产党，共产国际也更加发挥了约束作用。对于中国，1941年底共产国际确定的任务是：“促成和调解中共和蒋介石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保中国军队能够对日本人发动大反攻。”1942年6月6日，季米特洛夫指示毛泽东，面对国民党的挑拨，中共应以“宽容的胸怀”，“作出应有的让步”，还指责周恩来在重庆与反蒋力量秘密接触的做法。后来，共产国际又多次建议中共领导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以解决合作问题，应当接受蒋介石的领导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③]对于各国共产党借助民族解放战争实现革命转变的意图，共产国际予以坚决制止。季米特洛夫在1942年8月8日给南共领导人铁托和卡德尔的电文中指出：“你们领导的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者力量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不是无产阶级斗争，这一点应该牢记”；在1943年2月6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在中国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同盟“不应只是日本共产党的组织，而应是日本反法西斯人士的组织”，其纲领提出的“在日本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口号是根本错误的；在3月2日给波兰共产党的电报中强调，他们的目的应当是“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而不是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对一系列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下达了类似的指示。[④]

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是共产国际最困难的时期，在对各国共产党的方针表

---

①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236-237；РЦХИДНИ，Ф.495，оп.18，д.1335，л.16，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 II，с.110-102.

②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238-239.

③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 II，с.169-170, 233-234；*Ширимя*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с.58.

④ *Ширимя*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с.58；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 II，с.316-317；*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57-358.

示不满的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本身也处于涣散和萎靡不振的状态。1941 年 10 月，由于战火蔓延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机关被迫迁移到乌法，而季米特洛夫则与苏联政府一同转到古比雪夫。季米特洛夫不仅把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人员精简至 150 人，还建议“没有必要公开强调共产国际”，一切工作和公开活动“表面上都应以其他名义（如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来进行”。[①] 此时斯大林忙于战事，已经顾不上共产国际了。在乌法的工作人员也是情绪低落，无所事事。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马努伊尔斯基 1942 年秋在一份《关于书记处工作》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国际书记处不再召集会议，日常工作无人负责；哥特瓦尔德整日喝酒，多列士非常自负，伊巴露丽·多洛雷斯经常拖延文件的办理；机关工作人员纪律松懈，往往自行其是，经常出现不服从上级指挥的情形；不少意大利人对工作敷衍了事，经常有无知和不礼貌的举动，等等。[②]

看来共产国际确实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甚至西方盟国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1942 年底，罗斯福派人到苏联驻美使馆，明确建议莫斯科解散共产国际。[③] 而最后促使斯大林下决心解散共产国际的，正是出于莫斯科对战时同盟关系可能破裂的担心，以及对战后同盟关系得以继续的期盼。这表现在战后世界安排和开辟第二战场两个问题上。

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英勇抵抗逐步赢得了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丘吉尔这位当年呐喊着要通过武装干涉消灭布尔什维克的著名反共高手，则率先表现出“不计前嫌”的政治家风度。然而，随着战事不断向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苏联与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之间的矛盾却不断暴露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在战后世界安排方面出现的分歧。尽管苏联声明接受《大西洋宪章》的条款，并保证给予各民族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利，[④] 但该文件签署时没有事先征求莫斯科意见的做法，无疑是对斯大林的刺激。于是，在 1942 年 1 月罗斯福设计联合国方案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则讨论了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决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外交材料准备委员会”，研究有关

①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259-260；РЦХИДНИ，ф.495，оп.73，д.112，л.24，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 II，с.164-167；*Адибеков* 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с.28.

② РЦХИДНИ，ф.495，оп.10а，д.433，л.1-3，*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0.

③ *Судоплатов П. А.* Разведка и Кремль，Записки нежелательного свидетеля，Москва: Гея，1996，с.255.

④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 年）·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 年）》，叶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年，第 69 页。

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种种问题。[①]

不过，在一些直接涉及苏联安全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斯大林此前已经有所考虑。早在 1941 年 12 月红军第一次转入反攻之后，斯大林便向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明确阐述了战后在欧洲重构边界，与英国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计划。苏联不仅要求恢复苏德战争前的边界，而且希望以寇松线为界得到波兰东部的领土（以德国领土为其补偿），把芬兰和罗马尼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承认把比利时、荷兰，可能还有挪威和丹麦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对于苏联在战后干涉、控制东欧和巴尔干事务的明显意图，艾登始终坚持毫不退让的立场，认为这一切需要等待和平条约的签订。[②] 在 1942 年 5 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期间，英国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经过艰苦的谈判，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在双方的同盟条约中删去苏联关于战后领土要求的条款，而得到的回报是在条约中写明英国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③]

希特勒进攻苏联不到一个月，斯大林便提出了要求英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这不仅是与苏联存亡攸关的问题，也是苏联与西方实现军事同盟的重要标志。主要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丘吉尔对苏联的要求一直采取拖延和逃避的态度，直到美国参战，情况才有了转机。在美国人的推动甚至逼迫下，1942 年 4 月英国接受了准备于 1943 年在法国海岸发动一次主要攻势的计划。于是在 5 月英苏同盟条约谈判中，英国承诺将开辟第二战场。然而，两个月后英军在北非战场的惨败，使丘吉尔完全打消了在欧洲对德国发动进攻的念头，甚至美国军人也开始考虑把军事力量调往太平洋战场。在罗斯福的坚持下，8 月美英军事领导人决定发动对北非的进攻，以替代在欧洲登陆的计划。[④] 斯大林对此似乎并不满意，10 月 5 日，斯大林通过答美联社记者问的方式告知天下，在苏联对当前局势的评价中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占据首要地位”，并要求“盟友要不折不扣地、及时地履行自己的

①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3，д.237，л.1-3，4-8；《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6 卷，第 665–667、668–671 页。另参见 *Данилов А.А., Пыжиков А.В.* Рождение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СССР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1，с.15-16。

② *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Европа：проблемы границ и сфер влияния，1939-1947.//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1，с.85- 86.

③ 尽管莫洛托夫和迈斯基认为英国的条约“是空洞的宣言”，苏联不能接受，但斯大林在 5 月 24 日的回电中指出“它是重要的文件”，至于涉及苏联安全的边界重新划分问题，可等待将来“以武力解决”。详见 *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Встречи，Беседы，Дискуссии，Документы，комментарии（1941-1945），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4，с.153-157；*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 Визит В.М. Молотова в Лондон в мае 1942 г.：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У. Черчиллем，А. Иденом и переписка с И.В. Сталины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1，с.164-189。

④ 参见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 年）》，第 273–274、278–279、297–306 页。

职责”。[①] 从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开始，中经1943年2月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再到英美联军在阿拉曼战役中迫使北非德意军队于5月13日全线投降，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战局的好转有助于盟军的进一步合作。2月9日丘吉尔通告斯大林，盟军准备在8月或9月开始横渡海峡的战役，但具体何时进攻还要看德军的防御情况。16日斯大林回电说“目前的局势要求把这个期限大大地缩短”，并提出“最好是在春季或初夏，这是很重要的”。3月11日丘吉尔勉强答复，如果敌人得以削弱，那么可以在8月前发动横渡海峡的战役。[②] 为了协商与苏联的战略协作问题，丘吉尔应罗斯福邀请前往华盛顿。在5月6日的通信中罗斯福向斯大林通报了这一情况。[③] 在得到这个消息后，斯大林显然需要做出某种友好的姿态，以促进第二战场的及早开辟和盟国之间的更大合作。

正值此时，苏波关系因“卡廷森林事件”引发的危机，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在安抚英美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1943年4月德国人宣布在波兰的卡廷发现了一处万人冢，葬有数千具遭俄国人屠杀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在伦敦的波兰人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对此进行调查，莫斯科则立即指责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与法西斯德国勾结，使得本来已经紧张的苏波关系陡然进入危机状态。丘吉尔得到斯大林的通知后，一方面表示不赞成波兰人的做法，并愿意说服他们放弃调查的主张，另一方面劝告苏联不要与波兰断绝关系，更不要公布这一决定。但是在英国还未及采取行动时，苏联已经宣布与波兰决裂。这使丘吉尔愤怒不已，他在4月30日给斯大林的密信中表示对此非常失望，并借戈培尔散布的言论暗示，莫斯科如此急促地采取断然措施，是企图在苏联组建一个自己控制的波兰政府。斯大林5月4日的回信虽然口气很硬，但实际上表示出一种和解的态度。斯大林信誓旦旦地保证苏联没有另外组建波兰政府的打算，并表示只是对西科尔斯基政府不信任，如果政府改组，苏波关系是有回旋余地的。[④] 这次危机所涉及的实质上还是战后安排的问题。或许可以说，对

①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32.

② 苏联外交部编：《1940–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一卷：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的通信》，潘益柯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89–90、91、98–99页。参见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第424–427页。

③ 苏联外交部编：《1940–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二卷：斯大林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宗伊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63页。参见*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6。

④ 苏联外交部编：《1940–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一卷：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的通信》，第117–128页；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第428–429页；*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5-86。

于波兰问题的处理是战后苏联周边国家安排中最重要的一环。[①] 西方盟国在这次危机中的克制态度显然使斯大林受到鼓舞，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苏联如果作出令人注目的和解姿态，就能够赢得西方在这个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

无论如何，到 1943 年 5 月初，为了促使英美军队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接受莫斯科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构想，斯大林必须作出能够让西方盟国感到放心的明显举动。[②] 这个举动就是解散共产国际。

三、斯大林突然决定解散共产国际

1943 年初，随着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转入反攻，共产国际的工作明显地活跃起来。为了在数万名轴心国战俘中组织反法西斯力量，配合红军打出国境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共产国际迁回莫斯科后，成立了许多委员会，工作人员也猛增了几百人，还不断召开会议，下达各种指示。[③]5 月 6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第 822 次会议，讨论改进民族广播电台的工作，还成立了专门委员会，限令 5 月 15 日投入工作。[④] 这样热火朝天的场面，很难使人想到这个机构的命运即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然而，就在 5 月 8 日深夜，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被召进克里姆林宫。在那里，莫洛托夫向他们通报了斯大林的意见："作为各国共产党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在目前形势下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独立发展和执行其独特任务的障碍，"因此应该解散，并且现在就开始制定解散共产国际的相关文件。[⑤] 根据这一指示，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很快便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并于 5 月 11 日提交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当晚，斯大林召见了他们（莫洛托夫在场），并对决议草案表示满意。

---

① 斯大林后来与丘吉尔争论时说，波兰对英国只是荣誉问题，对苏联则是国家安全问题。*Ржеше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c.499-505；编译组：《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139–140 页。

② 1943 年 5 月 9 日塔斯社发布一则公报，宣布苏联已批准成立一个以波兰爱国者科希丘什科（Костюшко）命名的波兰师，并将开往前线与苏军并肩作战（参见阿·托因比、维·托因比合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劳景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年，第 240–241 页；*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c.86）。这又是一个容易引起西方猜疑的举动。

③ *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c.80；РЦХИДНИ，ф.495，оп.65，д.131，*Адибеков* 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c.28，30；*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c.371-372.

④ РЦХИДНИ，ф.495，оп.18，д.1340，л.75-76，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 II，c.350-352.

⑤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c.372；*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c.81.

接着斯大林与他们讨论了解散这个机构的程序：首先在主席团会议上审核决议草案，并作为向各支部的建议予以通过；然后通知各支部并取得他们的同意；最后在征得各支部同意后予以公布。至于这个机构的哪些职能以及以何种形式继续存在的问题，交由马林科夫和季米特洛夫去讨论并提出具体建议。斯大林最后说：经验表明，不应有一个领导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这个问题在马克思时期、列宁时期和现在都已显示出来。也许应该过渡到地域性的联合，如南美，美国和加拿大，某些欧洲国家等，但这也不要急于行事。①

5 月 12 日，季米特洛夫将决议草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和各书记作了传达，大家认为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原则上和政治上是正确的”，决定第二天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最后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还决定向各大党领导人通报决议草案：波立特（英国）、毛泽东（中国）、铁托（南斯拉夫）、芬德尔（波兰）、杜克洛（法国）、白劳德（美国）、林德罗特（瑞典）。② 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有给波立特的电报，其中说道，“该文件暂不可在任何地方对外宣扬。”③ 其他通报很可能当时没有发出，因为斯大林在主席团开会前又指示季米特洛夫：(1) 这件事你们不要急。你们把草案提出来讨论，请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两三天时间进行考虑并作出修改。我也有几点修改意见。(2) 草案暂时不要送往国外。至于何时发送，我们以后会作出决定。(3) 不要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只是简单地把这些外国领导同志赶走了。这些人将在一些报社继续工作。应该开办 4 种报纸（德文、罗马尼亚文、意大利文和匈牙利文），还要建立若干反法西斯委员会。④ 事情确实有些急迫，对问题的处理也显得有些慌乱。5 月 15 日《消息报》在第四版刊登的一则报道，或许有助于理解斯大林的心情。该报道指出：5 月 14 日丘吉尔到达华盛顿，与在那里的捷克总统贝奈斯、澳大利亚外长埃瓦特进行了会晤，并将会晤罗斯福总统，英美是否于 1943 年开辟第二战场与此次会议的结果密切相关。⑤ 看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一事，对外急需让西方盟国得知消息，对内又担心引起各国党的涣散，斯大林的复杂心情可想而知。

---

①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2；*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п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1；*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ст.)*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и Коминтерн，с.812，草案文本见 РЦХИДНИ，ф.495，оп.73，д.174，л.1。

②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2-373；*Лебедева, 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1.

③ РЦХИДНИ，ф.495，оп.74，д.56，л.92，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 II，с.352.

④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3.

⑤ Известия，15 мая 1992г..

在5月13日有共产国际下属各国党代表参加的主席团会议上，季米特洛夫首先强调，解散共产国际并不是走形式，而是要真正地解散这一机构，这是符合当前政治形势的及时举措。多数与会者在发言中对解散共产国际持完全赞成态度，认为此举有助于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组成统一民族阵线。多列士指出："我完全同意这一草案。我们共产党人既没有成功地粉碎社会民主党派别，阻止一些国家建立法西斯政权，也没能制止法西斯分子将这些国家拉入这场强盗式的战争。（事实证明）旧的工人国际联合组织已经过时。"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老的委员之一，科拉罗夫说，他对解散共产国际没有任何怜惜之情，"其实，共产国际早就不能发挥领导机构的职能了。原因在于，国内外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共产国际是在急风暴雨的革命高潮中建立起来的。随着迅速革命论的破产和苏联作为一种新兴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共产国际已成为过去时代的残余。"多洛雷斯则认为，"没有必要保留任何残余组织。因为毫无疑问的是，国际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如果我们希望让这些党成长壮大，就必须培养他们的独立性和责任感。"那些在本国影响较小的共产党代表对解散共产国际有些惋惜，皮克担心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尚未成熟到能够独立地解决本国问题。他认为，就德国共产党而言，目前在思想方面正急切需要经验更为丰富的苏联朋友的帮助。拉科西建议在文件中增加关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条款，"以便使我们在国外的同志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捷克共产党人施维尔玛的发言代表了与会者很多人的复杂情感，他说："当我了解了决议草案的内容之后，心情难以言表。我是在共产国际中成长起来的，我的全部生活都与国际息息相关。但情感归情感，（我最终还是认为）草案中关于解散国际的政治决定是正确和英明的。"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将草案作为未来决议的基础，并确定草案修改的最终期限为6月17日。[①]

5月17日，共产国际主席团再次召开会议，逐条讨论了解散国际的决议草案，并提交专门成立的编辑委员会进行整理、校订。会议还讨论并决定了该决议付诸实施的方式，即在决议内容最后确定之后，由主席团向共产国际各支部发出通报，各支部则以登报方式予以确认。各支部所发表的声明即意味着接受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②]第二天，由季米特洛夫、马努伊尔斯基、皮克、多列士、多洛雷斯组成的编

① РЦХИДНИ，ф.495，оп.18，д.1340，л.78-84，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 II，с.353-357.

② РЦХИДНИ，ф.495，оп.18，д.1340，л.89-97，*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ст.)*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и Коминтерн，с.813；*Лебедева, 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2-83， 参见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3-374。

辑委员会整理和校订了主席团修改的决议草案，然后呈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时呈送的还有主席团会议记录和编委会讨论记录。季米特洛夫还报告说，该决议已通过电台发给了陶里亚蒂、哥特瓦尔德和库西宁，他们表示完全同意决议的内容。①

5 月 19 日夜，斯大林召集苏联领导人开会。显然是想推卸责任，斯大林在对决议草案提出修改意见时特意指出：需要说明，解散国际的问题是一些支部在战争期间提出来的。会议商定：要预先告诉各支部，将要公布这样一个决议；决议应在 10 天后公布；公布的决议要由联共（布）中央主席团成员日丹诺夫和马努伊尔斯基签名；收到各支部中央批准该决议的决定后，发布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彻底解散的公报。② 大概感到 10 天后公布决议太迟，20 日上午，斯大林即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难道不能今天就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登报公布？应当尽量加快此事的进程。" 季米特洛夫解释说，密码无线电台只能够在白天、夜晚和深夜的固定时间向各党领导人电传决议内容，而他们要破译电报和了解具体内容，最快也得到 5 月 21 日。在此之前，我们不宜将决议内容公开。已定 21 日晚将决议全文交付印刷，这样 22 日晨可以见报。③ 当天，季米特洛夫就即将公布的关于解散国际的决议内容，分别用密码电报发给各国党领导人。电报称：作为国际联合的集中管理的组织模式，共产国际已不能适应以民族工人党面目出现的各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甚至成为其发展的阻碍。因而，共产国际主席团要求各共产党支部中央迅速研究本建议，并将讨论结果上报。④

5 月 21 日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召开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莫洛托夫宣读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后，斯大林对此做了一番详细的解说：实践证明，即使马克思和列宁，在目前情形之下也无法用一个国际中心来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实施领导。尤其是在战争条件下，情况如此复杂——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的任务是推翻自己的政府和在战争中采取失败主义策略，而苏联、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共产党则相反，他们的目标是全力支持自己的政府，以便尽快地消灭敌人。当共产国际建立之时，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我们有能力领导所有国家的运动。这是我们的一个失误。如果让国际继续存在下去，将会对国际的声誉造成损害。而这种情形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解散共产国际还有一个原因，这在

①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c.374；*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c.83.

②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c.374.

③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c.374-375；*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c.86.

④ РЦХИДНИ，ф.495，оп.74，д.56，л.94，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 II，c.370.

决议中没有明确提及。那就是，作为共产国际分支机构的各国共产党均受到了无端的指责——似乎他们是别的国家的代理人。这对他们在本国群众中广泛开展工作造成了消极影响。而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敌人也就丧失了借此指责共产党的口实。国际的解散无疑会巩固以民族工人党面目出现的各国共产党的地位，并加强各族人民的国际主义意识，而后者则是苏联赖以维系的根基。斯大林讲话后，会议一致通过了决议，并就有关国际解散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①

尽管季米特洛夫向共产国际各处领导人说“解散工作将会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尚未等到各国共产党支部回复意见，5月22日《真理报》便公布了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对此所做的解释是，由于战争环境，无法召开会议，只得通过报纸将这一建议提交各国支部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报上标明的决议通过的日期是5月15日，而不是最后定稿的5月19日。②这显然是希望引起英美盟友注意的一个细节。第二天，斯大林又迫不及待地举行了答记者问。斯大林解释说，解散共产国际是为了驳斥纳粹分子和工人运动中其他敌人的谣言，即莫斯科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布尔什维克化”，以及各国共产党都服从外国的命令。③当然，斯大林这些话主要也是说给正在华盛顿会晤的英美领导人听的，以此进一步证明苏联愿意与西方保持长久合作的诚意。5月28日，斯大林在书面答复英国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的问题时，再次解释说：解散共产国际的目的在于揭穿希特勒分子关于“莫斯科企图干预别国生活，并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的谎言；粉碎共产主义敌人关于各国共产党不顾本国人民利益而只是遵照外来命令行事的诬蔑；便于动员各国进步势力，不分党派和宗教信仰，联合成统一的民族解放阵营，以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便于把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联合成统一的国际阵营，为各国人民将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联合扫清道路。④

5月31日前，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已经回电，表示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议。它们是：英国、法国、中国、瑞典、南斯拉夫、叙利亚和黎巴嫩、澳大利亚、阿根廷、智利、古巴、哥伦比亚、瑞士。另外，还收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和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支持

---

①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5.

② Правда，22 мая 1945г.，决议的英文本见 Lane Degras(ed.)，*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Vol.3，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 477-479。

③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46 год，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2，с.104-105.

④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6-377.

解散国际的政治决议，这些党的领导人就在莫斯科。5 月 31 日季米特洛夫通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近日内在收到波兰工人党，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和希腊等国共产党组织的回电之后，即可发布公报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国际的建议，已得到绝大多数共产党组织的认可。[①] 接到报告后，斯大林似乎有些等得不耐烦了，于 6 月 2 日夜间给季米特洛夫打电话问："需要收到所有共产党通知之后才发表公报吗？" 季米特洛夫回答说，因有些党将于 6 月 7—8 日召开代表会议，应该再等几天。斯大林只好作罢。[②]

6 月 5 日季米特洛夫向莫洛托夫报告，在共产国际 41 个支部中，已有 29 个表示赞同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还未递交报告的共产党支部包括：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卢森堡、希腊、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印度、日本、巴西、新西兰。季米特洛夫决定，即使不再收到此类报告，仍打算在 6 月 8 日召集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并在会议上审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批准公报。此前，公报草案将发给斯大林审阅。公报的见报日期拟定在 6 月 10 日，即英国工党会议开幕（6 月 13 日）前夕。季米特洛夫还报告说：在此次大会上除了要确认关于解散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书记处和国际监督委员会等机构的决议外，还打算成立由季米特洛夫（任主席）、马努伊尔斯基、皮克、埃尔科利以及经济活动管理局局长苏哈列夫（任秘书）等人组成的委员会，具体负责清理共产国际原有机构及其财产的工作。整个工作结束日期限定于 1943 年 8 月 1 日前。[③]

经斯大林同意后，6 月 8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了最后一次（第 826 次）会议。会议确定，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一致批准关于解散国际的建议，没有任何支部对此提出异议。余下的程序完全是按照季米特洛夫事先报告的计划进行的。[④]6 月 10 日，《真理报》刊登了 31 个赞成解散国际的共产党支部的名单，以及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议，宣布共产国际从即日起正式解散。[⑤]

---

① РЦХИДНИ，ф.495，оп.73，д.174，л.49-50；оп.18，д.1340，л.123-144，*Лебедева, 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7.

②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9.

③ РЦХИДНИ，ф.495，оп.73，д.174，л.52-53，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 II，с.377-378.

④ РЦХИДНИ，ф.495，оп.18，д.1340，л.106-107，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 II，с.378-379；*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80.

⑤ Правда，10 июня 1943г.；*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80.

四、解散共产国际并非一场骗局

俄国学者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共产国际只是“名义上”或“形式上”被解散了，而实际上其机构大多经更改名称后保留下来（如第99、100、205研究所及通讯社等），其骨干成员都被充实到这些机构中，并统一由新成立的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领导，这个部的实际负责人仍然是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因此，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斯大林炮制的一个弥天大谎”。[①] 那么，事实到底如何？这关系到一个重要问题：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究竟只是一种策略或权宜之计，还是某种带有战略性质的选择？或者说，解散共产国际的举动是否意味着苏联在战后对外政策方针上会重新定位？

从共产国际解散的过程及善后工作安排来看，执委会机关及其下属机构的某些职能确实以其他的形式保留下来。共产国际的职能部门在组织革命运动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通过共产国际第一部（通讯部）负责人莫罗佐夫1943年5月给马林科夫的报告可以得知，该机构的任务包括：与苏联境外的各共产党组织和各联络站保持秘密无线电联系，并为其培养无线电技术骨干；培训各国党务工作人员如何开展地下工作，如制作身份证件、使用密码和专业设备、书写密信等；向各联络站点派送搜集军事情报的人员；组织对各国播放当地语言的节目；从事无线电侦听业务等。与第一部长期保持联络的境外无线电联络站有：波兰5个，荷兰（同时负责德国境内业务）5个，中国3个，比利时2个，法国2个，丹麦、瑞典、奥地利、蒙古、伊朗、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南斯拉夫游击区、英国和美国各1个。尚在筹建的联络站还有：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和德国，计划设立的联络站有：匈牙利、叙利亚、保加利亚和印度。通过该部，1942年共产国际共收到各联络站发来的电报5300份，仅1943年1—4月就有3586份。[②] 即使在准备解散共产国际的过程中，第一部的日常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直到6月下旬，还不断有共产党员、地下工作人员和物资被派送到各欧洲被占领国或游击区。[③]

---

①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1947-1956гг.，Москва：Россия молодая，1994，с.226；*Адибеков* 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с.30.

② РЦХИДНИ，ф.495，оп.73，д.182，л.16-25，28，*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3.

③ РЦХИДНИ，ф.495，оп.73，д.195，л.108-119，*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3-84.

从开始筹备解散共产国际之日起，共产国际机构和人员的命运便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5 月 19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了与共产国际解散有关的一些组织机构问题。关于对各国的无线电广播，所有与会者均表示应继续发挥各民族广播电台的职能，因为该电台正在为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提供真实信息、政治指导和心理支持。关于各国党的国外局，季米特洛夫列举了苏联境内的兄弟党国外机关及成员后，多数与会者赞同：有必要利用现有技术装备维持境外机关与本国党组织的联系，否则，敌人便会在当地建立类似的虚假机构来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关于"苏普列斯"通讯社、外文出版社、共产国际和各党的档案资料以及图书馆，与会者均主张保留，但其归属问题由联共（布）中央决定。负责培养各党干部的党校在本期培训结束后关闭，《共产国际》杂志也在本期出版后停办，以后是否继续，交由联共（布）中央考虑。至于云集在共产国际的各国干部的去留问题，也由联共（布）中央决定。季米特洛夫最后总结说，共产国际的这些职能均应以某种形式予以保留，而在新的形势下按联共（布）中央的系统予以安排。①5 月 22 日，季米特洛夫将会议记录发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②5 月 31 日，季米特洛夫等人与马林科夫商定：保留对各国的广播，对有关国家的广播交由相应的共产党国外局负责；保留"苏普列斯"通讯社，由联共（布）中央监管；保留联络服务处（电台联系、护照技术等），归属和管理问题待定；图书馆改为马恩列研究所分支机构；档案移交联共（布）中央；外文出版社继续工作，作为联共（布）中央的一个单独出版社；各国共产党干部的工作由联共（布）中央负责安排；其他经济实体移交联共（布）中央秘书局处理。③到 7 月中旬，有些机构的归属又有所改变：所有经济实体，其中包括位于罗斯托基诺的两幢大楼，均移交联共（布）中央事务管理局，"苏普列斯"通讯社转交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特殊技术部门移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党校和无线电学校解散。④

1943 年 6 月 13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设立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Отде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按照季米特洛夫的解释，为了不让

---

① РЦХИДНИ，ф.495，оп.73，д.174，л.51-55，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 II，с.366-369；*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4.

②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ст.)*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ВКП (б) и Коминтерн，с.814-817.

③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8.

④ РЦХИДНИ，ф.495，оп.73，д.174，л.70，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 II，с.392-393. 该文件编者加有注释称："专门培训外国共产党干部的党校最后不仅没有解散，而且还扩大了招生规模，并开设了一些与游击斗争有关的新课程。"另参见*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87。

敌人利用该部是由季米特洛夫领导的这一事实，任命联共（布）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为部长，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为副部长；本决议不予公布，而该部的工作将按内部工作制度予以组织和实施。[①]12月27日又作出进一步决议，组建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Иностранный отдел），任命季米特洛夫为部长，马努伊尔斯基为副部长；将原共产国际的所有对外联系工作均集中到国际部统一管理；委托莫洛托夫负责国际部的领导工作。[②]

1943年7—8月，相继成立了隶属于国际情报部（国际部）的205研究所和100研究所，分别接管了共产国际原机构的业务。205研究所负责广播和宣传工作，每天出版数十种小册子，并使用28种语言对47个国家进行广播（1947年），前共产国际报刊和广播部负责人格明杰尔任该所领导人。100研究所是在共产国际第一部的基础上组建的，领导人仍是莫洛佐夫，该所负责同各国共产党进行特殊联系，并向境外输送武器装备、医疗器械、药品、宣传品和其他秘密材料，同时负责为各党培训干部。此前还组建了99研究所，主要负责在战俘中开展工作。[③]由于季米特洛夫有病在身，国际部的机构设置和工作安排直到1944年6月才最终确定下来。根据呈送给莫洛托夫的报告，该部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对境外的宣传和反宣传工作；同各国反法西斯活动家和组织保持联络，并对他们给予支持；帮助苏联的工会组织、文化组织和科学研究机构发展和巩固与盟国、中立国相应机构的关系；向联共（布）中央提供国外反法西斯组织和活动家的情报；培训和监督在苏联或国外工作的国际主义者。[④]

的确，正如俄国学者所说："共产国际1943年5月前的工作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拥有了更大的规模。"[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认为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或国际部就是共产国际的继续。从国际部所担负的任务看，基本上都是与战争期间反法西斯斗争相关的事务，而与作为共产国际宗旨的革命主张已经没有关系。至于说共产国际的机构和功能，早在战前已经沦落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国际部在

---

①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81；*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ст.)*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и Коминтерн，с.817.

② РЦХИДНИ，ф.17，оп.162，д.37，л.112，*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ст.)*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и Коминтерн，с.817.

③ *Адибеков* 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с.33-38；*Чубарьян*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с.252；*Поляков Ю.А.* После роспуска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3，№1，с.108-109.

④ *Адибеков* 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с.39-40.

⑤ *Чубарьян*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с.257.

某些职能上取代了共产国际，也只是承认了一个现实而已。如前所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几次谈到解散共产国际是一次认真的行动，应尽量避免人们再想起这个机构。这说明，从本意上讲，斯大林决不想让西方看到共产国际组织在苏联的复活。为了在苏联抹去共产国际的一切痕迹，斯大林甚至注意到许多细节：1920年得名的"共产国际路"，现在已改名为加里宁路；一直作为苏联国歌的《国际歌》，现在也被取消，而仅留作党歌了。[①]

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表面形式，从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动机可以看出，这一决定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从战略的角度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主张，而这一主张恰恰是建立共产国际的初衷。从国家层面看，斯大林在其掌握权力后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保障苏联的安全和发展，输出革命和鼓动造反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方式，但是在战争期间特别是战后，这种方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即使提到革命，也不过是顾及意识形态延续性和鼓舞人民士气的一句口号。斯大林已经考虑并正在准备让苏联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国际社会，加入一个既有约束力又能提供机会的体制，而加入这个体制的方式和前提是放弃革命的传统。1944年10月斯大林在与丘吉尔的著名对话中一语道破天机——丘吉尔坦诚地对斯大林说，"在1919—1920年时，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吓得发抖。"斯大林毫不迟疑地回答说："现在世界不会再吓得发抖了，"因为"苏联无意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②]

第二，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失去了从组织上指挥各国共产党的合理依据，虽然在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国外局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两年左右），但是随着战争结束，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返回国内领导本国的重建工作，国外局和国际部陆续被取消，而让位给对外联络部。通过这个机构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根本无法与共产国际相提并论。否则，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斯大林也不会想方设法去组建共产党情报局了。至于共产党情报局的功能和效用，以及在此基础上斯大林所设定的苏联冷战战略的本质，则是笔者准备继续讨论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2期

① *Поляков* После роспуска Коминтерна，c.108；罗伊·麦德维杰夫、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剖面》，王桂香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74页。

② АПРФ，ф.45，оп.1，д.283，л.18-21，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717-720页。

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4—1947）

关于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国际学术界大体上形成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受到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主导，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侵略性和进攻性，美国的传统学派和新修正学派都持这种看法。[①] 另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关注的主要是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战后苏联国力的衰弱使其对外政策表现出保守性和防御性。[②] 笔者对战后苏联外交史的研究结论，总体来说，与后者相同。不过，如何分析和认定这种防御性的外交政策及其发展趋势，研究者之间就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了。笔者认为，从战争结束到1947年初，斯大林对外战略的总体构想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合作，并通过建立和维持势力范围来保证苏联的安全，通过与西方的经济和贸易往来保证苏联的发展。[③] 而为了实现这一

---

① 在这方面，除了过去大量的传统学派著作，约翰·加迪斯的一部名著很有代表性。在这部显然是回归传统的书中，作者强调，斯大林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从来不会放弃世界革命”，因此，只要斯大林统治苏联，“冷战就不可避免”。见 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7，pp.290-293, p.295。

② 详见：David 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56)*，New Haven，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168；V. O. 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13，1995；Aleksei M. Filitov，Problems of Post-War Construction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Conceptions during World War II，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1943-1953*，New York：Fondazione Istituto Gramsci，1996，pp.3-22；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ev*，Cambridge and La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75-276；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2, p.15, p.21.

③ 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第55–66页；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构想，斯大林通过对共产党的指挥，在苏联的周边国家及其力量所及的地区，推行了一种“联合政府”政策。

其实，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曾努力推行“联合政府”政策，主张各国通向社会主义应有自己的方式和道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问题在于，这项政策的实施究竟是一种长期的战略构想，还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1947 年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标志着苏联开始实行冷战政策，并彻底放弃了“联合政府”政策，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问题在于，这里的因果关系究竟是斯大林为了推行冷战而抛弃了“联合政府”政策，还是因为这项政策的破产导致苏联走上了冷战道路？这是冷战史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判断战后苏联对外政策性质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需要对“联合政府”政策提出及实施的过程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梳理。

一、“联合政府”政策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早在 1942 年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便做出了《关于东欧、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各国战后国家体制安排方案委员会》的决议，要求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这个委员会从政治、外交、经济、民族、领土等各方面研究各国状况，并写出有关战后世界安排的综合报告。①1943 年 9 月又决定，在外交部下面分别成立以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为主席的和约与战后安排问题委员会、以国防委员会委员伏罗希洛夫为主席的停战问题委员会。②

1944 年 1 月 10 日，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报告指出，战后苏联外交的目标是“安全得以保障而和平得以维持”。为此，就必须保持同西方伙伴，首先是同美国和英国的友好的关系。报告特别提到，“如果战后初期在欧洲爆发无产阶级革命”，那么苏联与美英的关系“必然会紧张起来”。③作为一个以对西方持强硬立场著称的“莫洛托夫派”的年轻

①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3，д.237，л.4–8// Вестник，1995，№4，с.116-118，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6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668–671 页。

② АПРФ，ф.3，оп.63，д.237，л.49// Вестник，1995，№4，с.118-119，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6 卷，第 672–673 页。

③ АПРФ，ф.3，оп.63，д.237，л.52-93// Вестник，1995，№4，с.124-143，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6 卷，第 684–713 页。该报告还认为，在战后不久的将来，亚洲的危险来自“美国和中国结成一个矛头指向苏联的联盟”（第 712–713 页），这个见解对日后的苏联对华政策不无影响。

外交官，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的看法更具代表性。在7月14日《关于苏美关系问题》的报告中，葛罗米柯在列举了未来苏美关系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后，很严肃地总结说"尽管可能存在一些困难"，但苏美"两国在战后继续保持合作的必要性也清楚地摆在眼前。在很大程度上，将来的关系是由其本质决定的，而它早已成形，或在战争期间正在成形"。[①]11月15日，李维诺夫委员会又提交了一份有关《苏英合作的前景及可能性的基础》的备忘录。同迈斯基的想法一样，李维诺夫认为，英美的对抗是战后世界的基本特点并将因此为苏美合作提供好的机会。同时，对于必然出现的苏英在欧洲的利益冲突，可能会"迫使英国和我们达成一种协议，而双方只有根据相对接近的原则严格地划分出欧洲安全范围的界线，才能在这一基础上达成协议"。[②]

人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意识形态，不是世界革命，而只有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为此苏联必须与西方合作。正如俄国学者佩恰特诺夫所言：这三位苏联外交官"都希望一种真正的战时联盟的延续——的确，他们认为这是战后苏联维护其利益的先决条件"。他们都认为，美国、英国和苏联可以将世界划分成一些不同的势力范围，而苏联的势力范围"主要是从传统的地缘政治上来考虑的"，并不是那个"很难被西方盟国所接受的苏维埃化模式"。[③]

这些建议和报告，或者迎合了斯大林的意愿，或者为斯大林所接受。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苏联军队准备大举反攻向欧洲推进之际，1943年5月，斯大林迫不及待地提出立即解散共产国际，目的就是要排除苏联与西方合作的这个"障碍"，"为各国人民将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联合扫清道路"。[④]那年秋天，斯大林甚至作出了改换苏联国歌的决定。人们早已经熟悉的《国际歌》现在不再是国歌

---

① AVPRF，f.6，op.6，d.603，p.45，l.34，转引自 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p.8。

②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6，оп.6，п.14，д.143，л.31-89，转引自 *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Европа：проблемы границ и сфер влияния，1939-1947.//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1，с.90。另参见 И.В.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з，1944-1947гг.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с.19。

③ 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pp.16-18.

④ *Дим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9 марта 1933 - 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1997，с.372，374-375，377-378；*Адибеков*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1947-1956гг.，Москва：Россия молодая，1994，с.6，21. 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见：《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国际观察》2008年第1期。另参见 *Лебедева Н., Наринскпй М.*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1943 году.//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1994，№5。

而只能作为党歌了。斯大林亲自挑选和修改的歌词，突出了“伟大的罗斯”。[①] 这些无疑说明，在表现出一种与西方合作的强烈愿望的同时，战后的斯大林更加偏离了一个世界革命领袖的形象。

葛罗米柯后来回忆说，1944 年 9 月斯大林在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橡树园会议期间，给他下达过明确的指示：苏联赞同把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而不是欧洲，目的就是促使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当时给葛罗米柯的强烈感觉是：“斯大林确确实实期望在战后与西方，特别是美国进行长期的合作。”此外，从与斯大林的多次会谈中，英国外务大臣艾登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也得出了同样的印象。[②]1945 年 1 月 28 日，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代表团会谈时强调指出，“资本主义世界被划分成了敌对的两块——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而对于苏联来说，最危险的国家是德国。“资本主义危机主要是由于腐朽和两个敌对阵营的相互削弱，这有助于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我们必须放弃只能通过苏联制度才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观念。它也可以体现在其他的政治制度里，例如民主制和议会共和制，甚至君主立宪制。”[③] 负责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则在一次会议上谈到了战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④] 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莫斯科必须减缓在国外宣传和推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⑤]

上述情况说明，斯大林在战争后期集中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继续维持和巩固与西方的同盟关系，其目的不仅是要尽快消灭法西斯，也不仅是考虑到战后苏联国力衰落的现实，而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避免再次使苏联陷入战争的泥沼，保障国

---

① 罗伊·麦德维杰夫、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剖面》，王桂香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年，第 274 页。

② *Корниенко Г.М.*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её участника，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с.18；艾·哈里曼、伊·艾贝尔：《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1946）》，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北京：三联书店，第 275–276、279–280 页。

③ CDA（保加利亚国家档案中心），Find 147 B，op.2，ae.1025，l.1-6，该文件复印自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收藏的英译本保加利亚档案，下同。

④ РГАСП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ф.77，оп.3с，д.174，л.3，转引自 *Марьина В. В. (отв. ред.)*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интермеццо” с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финалом，1944-1948，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2，с.94。

⑤ 当然，莫斯科并非否定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在 1944 年 1 月 17 日苏联情报局的会议上，联共（布）中央书记谢尔巴耶夫认为，目前宣传部门最主要的任务是“以各种可以接受的方式宣传苏联的制度”，但强调这种宣传要避免“公开”和“直接”的形式，而应该“朴实”地进行。РГАСПИ，ф.88，оп.1，д.998，л.1-2，转引自 *Марьина (отв. ред.)*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с.94。

家的安全和经济发展。[①]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思想的指导下，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所谓“联合政府”的政策，即在那些将要打败和已经打败法西斯的国家应该建立起民主制度，共产党必须与其他各党派实现联合，共同组建政府。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这一政策的内容是有所区别的。

二、“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实施

战争期间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欧洲 8 个小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奥地利、芬兰、比利时），共产党员总数由战前的 10 万多人增至战后初期的 70 万人。甚至连历来很小的英国党，其党员人数也从 1939 年的 1.8 万人扩展到 1944 年的 5 万人。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势力最大。到 1946 年法共已发展到近 100 万人，意共则达到 200 万人。[②]不仅如此，很多共产党还掌握着武装力量。在法国解放前已成立的 71 个省解放委员会中，共产党领导的就占半数以上。1944 年 2 月 1 日，根据法共的倡议，抵抗运动各种武装力量统一为“法国内地军”，人数达 50 万人，其中法共掌握的义勇军游击队就有 25 万人。到 6 月，法共还建立并领导了人数众多的爱国民兵。[③]1943 年底，意共开始组织武装斗争，到 1944 年 6 月，北部各游击队合组为“自由义勇军”，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下设立统一的总指挥部，人数据称有 40 万，其中意共直接领导的“加里波的游击队”也有 25 万之众。民族解放委员会还在各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初步实行了各项民主改革措施。[④]在大战期间，希腊共产党发展到 72500 人，并已成为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

① 斯大林在 1944 年 11 月 6 日的公开讲话中说：“苏英美联盟的基础不是一些偶然的和暂时的动机，而是非常重大的和长远的利益，”其目的之一就是“新的战争不可能发生，如果不是永久不发生，至少也要在一个长时期内不发生”。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选（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 398–399 页。

② 费南德·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二卷，方光明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3、146 页。

③ Ronald Tiersky, *French Communism, 1920-1972*, 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18,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第一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305 页。

④ 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第 324–325 页。

军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①] 然而，既然是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苏联坚持主张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应该放下武器，以合法身份进入政府。

1944 年 10 月 23 日，苏联与英、美国政府同时正式承认了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法国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 26% 的选票，社会党与其附属党派获得了 25% 的选票。[②]11 月 19 日，长期侨居国外的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回国前，斯大林接见了他。谈到党的任务时，斯大林指出，必须与社会党建立起左翼联盟，以便开展政治斗争。至于手中的武器，斯大林说：“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已有了为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斯大林强调，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这个政治组织的纲领，“首先应当包括恢复国家经济和巩固民主”。[③] 回到巴黎后，多列士提出了“团结、战斗、劳动”的口号，并以法共中央的名义“一再重申：‘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一支共和国军队和警察’”。在多列士的指使下，法共随即下令内地军服从政府命令，分散编入法国陆军。同时，许多领导解放委员会的法共党员，则把权力交给了戴高乐委派的地方官员。[④]

1943 年底到 1944 年初，莫斯科对意大利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但 3 月 3—4 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即将回国的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时，确定了同法国一样的合作方针。[⑤] 为争取国内反法西斯民主主义改革更加深入，意共领导人曾要求维克多－艾曼努尔三世国王立即退位，还要求彼·巴多利奥元帅的政府必须辞职。斯大林在谈话时建议彻底修改意共的政治方针：（1）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2）共产党人可以进入巴多利奥政府；（3）主要致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实现和巩固统一。[⑥] 陶里

①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二卷，第 3 页。关于战时希腊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情况，详见 David H. Close (ed.), *The Greek Civil War, 1943-1950, Studies of Polar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97-155；R. Craig Nation, A Balkan Union? Southeastern Europe in Soviet Security Policy, 1944-8, Gori and Pons(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p.125-143。

② 塞顿·华特生：《从列宁到马林可夫》，邵国律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4 年，第 402 页。

③ АПРФ, ф.45, оп.1, д.390, л.85-93// Источник, 1995, №4, с.152-158，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6 卷，第 727–737 页。

④ 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第 313–315 页。

⑤ Silvio Pons, “Stalin, Togliatti,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3”, Yale University, 23-26 September 1999, pp.1-3.

⑥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495, оп.74, д.259, л.8，转引自 *Наринский* И.В. Сталин и М. Торез, с.19-20；*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410-411，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80–282 页。

亚蒂离开莫斯科后，3 月 14 日，苏联政府便宣布与巴多利奥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于是，陶里亚蒂一回到意大利就提出：墨索里尼垮台后，意大利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建立“以巴多利奥为首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民主政府”。陶里亚蒂还一再向盟国咨询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墨菲表示，“共产党的目标”是“要消灭法西斯主义，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①] 正因为如此，在 10 月 9 日苏英领导人会谈中，当丘吉尔表示担心盟国军队撤离意大利后意共会发动内战时，斯大林一方面表示不反对英国在意大利的政策，一方面轻松地保证说，“埃尔科利是聪明人，他不会去冒险的”。[②]

1944 年 5 月苏英达成协议，为了报答英国对苏联在罗马尼亚政策的认可，作为交换，莫斯科决定不插手希腊事务。应艾登的要求，7 月 26 日莫洛托夫派代表到希腊解放区，劝说民族解放阵线参加流亡在开罗的帕潘德里欧政府。9 月初，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自行宣布解散，交出了在解放区已经掌握的政权。[③]9 月 22 日英国政府通知莫斯科，准备近期向希腊派遣军队，以帮助希腊政府。第二天维辛斯基回信说，苏联将继续遵守五月协议，不反对英国向希腊派兵，自己也不打算派遣武装部队到那里。[④]9 月 26 日，就在希腊政府即将迁回雅典时，希腊人民解放军和民主联盟领导人与希腊流亡政府代表在英国的策划下签订了卡塞塔协定，按照协定，“所有在希腊活动的游击队一律服从希腊民族团结政府的命令”，而“希腊政府把这些部队交由盟军最高司令所任命的斯科比将军指挥”。[⑤] 所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 10 月与丘吉尔炮制的那个著名的划分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的“百分比

① 《意大利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年，第 90 页；马契拉·弗拉拉、毛里齐奥·弗拉拉：《陶里亚蒂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年，第 258 页。转引自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第 326–328 页。

② *Стрижов Ю. И.* Англия должна иметь право решающего голоса в Греции.// Источник，2003，№2，c.51-52. 埃尔科利是陶里亚蒂流亡时的曾用名。

③ 参见哈里曼、艾贝尔：《特使》，第 368 页；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第二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第 234、245–248 页。对于莫洛托夫派遣的波波夫小组的任务，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见 *Смирнова Н.Д.* “Греческий вопрос” на парижской мир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Москва: ИВИ РАН，1998，c.8-9。

④ АПРФ，ф.3，оп.64，д.99а，л.40，沈志华编：《苏联历史：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 6 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2004 年，第 251 页。

⑤ 阿·托因比、维·托因比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劳景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年，第 622 页；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第 247–248 页。

协议"，对于希腊而言，不过是确认了既成事实而已。[①]

在北欧几个国家，情况也大体相同。比利时共产党的力量虽然远远不能与法共和意共相比，但到战争结束时，通过抵抗运动，也控制着 10 万名武装人员，而当时国内的警察只有 1 万人左右。由于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的影响，经过改组的皮埃洛临时政府在比利时历史上第一次吸收了两名共产党员入阁。当 1944 年 10 月政府宣布将抵抗运动武装力量有条件地纳入正规军时，尽管比共在具体做法上有不同意见，甚至以退出内阁相威胁，但在盟军驻比部队的压力下，最终还是交出了全部武装。因此，在 1945 年 2 月组成的以社会党人范阿克尔为首的"全国团结"政府中，共产党继续保留了两名阁员的位置。在战后的选举和政府组成中，荷兰、丹麦、挪威共产党也都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其原因主要不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拥有相对强大的实力，而是执政者需要向莫斯科做出友好的姿态。[②]

中国的情况与上述欧洲国家不同，这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亚洲大国。在战争期间，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③] 为实现在远东的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核心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在 1945 年 4—5 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

① 有关"百分比协议"的俄国档案已经全部解密，这包括 1944 年 10 月 9 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和 1953 年 6 月 3 日马立克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Источник，2003，№2，с.45-56），1944 年 10 月 10 日莫洛托夫与艾登的会谈记录和 10 月 17 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Встречи，Беседы，Дискуссии，Документы，комментарии（1941-1945），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4，с.429-438，476-480］。以上档案参见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3 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第 261–278 页；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6 卷，第 721–726 页。

② 阿·托因比、维·托因比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 881–882、884–886、891、920、933、951–952 页。

③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 年第 5 期。另参见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年。

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①] 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对此并不了解，尽管早在6月份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②]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毛泽东本来以为此乃中共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10月10日中共中央就要求所属部队在日本投降之际，迅速占领所有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点，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③]11日，延安总部又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④] 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却心如火燎，作为缓兵之计，他接连两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毛泽东对此全然不睬，一面命令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华北、山西各大中城市，一面批准了华中局在上海发动起义的方针，并要求其他城市如有条件也“照此办理”。[⑤]

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中国半壁河山的关键时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 *FURS*），1945，Vol.7，Washington：GPO，1969，pp.338-340；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备忘录，1945年5月10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120-125，*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IV，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37-1945гг.，Книга 2，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0，с.37-40.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1–393页；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备忘录，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ом IV，Книга 2，с.68-71。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15、213–214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13页。

⑤ 毛泽东给程耿贺林的指示，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8–9页。

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①] 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无论国共冲突的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中共盼望的“国际援助”没有出现，却等来了一道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取消上海起义计划，把兵力集中于夺取小城及广大乡村，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革命”转向和谈。[②]8 月 25 日，毛泽东决定亲自赴渝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③]

三、“联合政府”政策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实施

在苏联的周边国家，情况有些不同。根据“百分比协议”和多次会议的谈判，西方承认了苏联在其所占领的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范围。不过，雅尔塔会议通过的《被解放的欧洲国家宣言》规定，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问题。[④] 为了保证与西方的合作，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即在这一地区推行选举制和“联合政府”政策，尽管具体做法在各国大相径庭。

保加利亚是战后欧洲共产党控制政府的第一个国家。1944 年 9 月 5 日苏联突然向保加利亚宣战以及三天后的顺利进军，导致保政府迅速瘫痪，以季米特洛夫和

① 关于莫斯科的这封电报，首先是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的，内容如上述（《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286 页）。据胡乔木回忆，在 1960 年 7 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说，电报已经不存在了，可能烧了，时间是 22 日或 23 日，内容同前。刘少奇又补充了一句：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回忆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年，第 401 页）。有关这个问题的俄国档案目前尚未解密，但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证明，确有这样一封电报。根据日记，8 月 18 日季米特洛夫与卸任不久的驻华大使潘友新共同起草了致毛泽东的电报，意思是“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第二天，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这个电文（*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c.493.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 351 页）。至于收到电报的日期，《周恩来年谱（1898–1976）》（第 615 页）注明为“22 日前后”。考虑到该电报应在 19 日以后发出，而中共的战略 20 日如故，21 日开始改变，故笔者断定中共收到电报的时间应该在 20–21 日之间。按照师哲的回忆，斯大林先后发来两封电报（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308 页），此事目前尚无法查证。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 9 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第 243–244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615–616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 4 卷，第 1–3、15–17 页。

④ 编译组：《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216 页。

科拉罗夫遥控的工人党为首的爱国阵线借此机会成功地发动了不流血政变，并成立了以格奥尔吉为总理的祖国阵线政府。[①]通过对军队及政府各部门的清洗，工人党迅速控制了权力。接近1944年底时，工人党在爱国阵线委员中的比例已达54%，在84个城市中有63个市长，在1165个村庄中有879个村长，是由工人党员担任的。[②]然而，工人党的做法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12月13日季米特洛夫请求斯大林接见即将返回索非亚的科拉罗夫，并商谈保加利亚问题。斯大林以工作繁忙拒绝了，但却对保加利亚出现的紧张局势提出了严厉批评："共产党人的调子太高"，科拉罗夫现在回国只能加剧局势恶化——"他们完全会发疯的"。季米特洛夫随即给工人党中央发去密电，指示他们对同盟者"要表现出最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不要唱进攻性的高调，不要摆出共产党人在政府和祖国阵线中起领导作用的架势"。电报强调，"必须避免政府危机，更不能去促成这种危机"，"在当前局势下只有对国家事务实施集体领导才是可行的，这就要求我们实行某些自我约束"。[③]不久，斯大林直接告诉保加利亚人："当我们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时，这也许是错误的。也许其他方式——成立民主共和国或在一定情况下建立立宪君主政体——也能实现社会主义。""你们已经建立起爱国阵线政府，这是一件好事。它应该得到加强，可能的话还要扩大一些。不要拒绝任何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能够利用的人。"[④]到1945年夏天，为抗议工人党企图垄断权力的做法，反对派提出推迟选举，并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季米特洛夫对此愤怒不已，莫斯科则表示必须做出让步。此前，斯大林已经否定了季米特洛夫准备把农民领袖佩特科夫赶出政府的主张。面对可能出现的国际政治危机，斯大林又建议工人党同意推迟选举，并允许反对派合法化，以便能够掌握和利用他们："反对派的存在关系到你们的切身利益，如果你们能够做好工作，那么你们就能够控制住佩特科夫的反对派并在许多

---

① 详见 Vesselin Dimitrov, "Revolution Released: Stalin, the Bulgari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inform", Gori and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p.273-275;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в конц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4, № 6, с.152-153; *Валева Е.Л.*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Болгарии, 1944-1948 годов.//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 1999, №4, с.24。

② Dimitrov, "Revolution Released", Gori and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p.275-276.

③ CDA, CMF 434, k.77-78;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452.

④ Dimitrov, "Revolution Released", Gori and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p.276-277.

场合利用他们。"[①] 正是由于这次让步，波茨坦会议才在保加利亚和巴尔干问题上做出了令莫洛托夫感到满意的决议："实际上承认了这个地区是我们（苏联）的势力范围。"[②] 推迟选举以后，10月30日斯大林接见了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斯大林再次告诫说："你们应该提出这样的观点，没有反对派任何一种政府都不可能是民主的。"至于国家的发展方向，斯大林指出："不要忘记，在你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通过议会。这条道路很漫长，但实现的目标是一样的。"[③] 后来，季米特洛夫的游说使斯大林相信保加利亚的反对派已经执行了反苏路线，从而导致莫斯科决心在那里开始采取强硬立场——对反对派不予理睬，也不再进行任何谈判，而用巧妙的行动加以摧毁；拒绝佩特科夫进入政府，而挑选其他党作为反对派取代之。[④] 即便如此，斯大林仍然没有从总体上改变其基本方针。1946年9月2日斯大林再次当面向季米特洛夫指出：因为"所处时代的形势完全不同"，保加利亚将"经由一条特殊的道路——不用无产阶级专政而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要模仿俄国共产党人"。[⑤]

由于战前受到西方绥靖政策的伤害，捷克斯洛伐克人普遍对苏联具有好感，强烈的"慕尼黑情结"使得流亡西方的政府首脑贝奈斯几乎是自动地倒入了斯大林的怀抱。[⑥] 以至1943年深秋贝奈斯向莫斯科提议："我们两国的外交政策是协调一致的。我们应该知道你们对德国的政策，以便我们针对美国和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实行共同的路线。因为此时布拉格应该实行同莫斯科相同的政策。军事上也进行密切合作，使我们的计划适合你们在军事科学上的成果，统一武器装备，建立空

① CDA，f.1B，op.7，ae.398，l.1；*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c.487，494-495；*Вале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Болгарии，c.27-30；Dimitrov，"Revolution Released"，Gori and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pp.280-281.

②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c. 492.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350页。

③ CDA，Fond 146B，op.4，ae.639，l.20-28.

④ CDA，New Declassified Record，№5032，T.II，p.10；АПРФ，ф.45，оп.1，д.252，л.28-39，*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1944-1948гг.，Москва：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1997，c.355-361，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第86–93页；Dimitrov，"Revolution Released"，Gori and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pp.282-283；*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c.518；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370–371页。

⑤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c.534-535；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385–387页。

⑥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详见 *Серапионова Е.П.* Эдуард Бенеш：планы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Марьина(отв. ред.)*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c.115-116。

中直接联系。"① 在 1943 年访问莫斯科期间，贝奈斯与苏联领导人详细讨论了边界问题、移民问题、对外政策问题，以及战后双方的经济和军事合作问题。12 月 12 日，《捷苏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在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顺利签订。贝奈斯对此十分满意。接着，贝奈斯还会晤了捷共国外局的代表，进一步讨论与红军进行军事合作，以及战后的国家制度问题。后来担任总书记的哥特瓦尔德向贝奈斯转达了共产党关于领导国内民族解放斗争和战后政策基本原则的建议。共产党人认为战后组建民族阵线是适宜的，希望解放后的共和国对内以"真正"的民主为基础，对外同苏联建立稳固的友谊。共产党人还声明，将努力通过"民主方式，在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下"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② 在苏联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中，捷克斯洛伐克的确扮演了特殊的角色。由于贝奈斯明显而真诚的友好立场，莫斯科非常满意，并以此作为典范。1944 年 1 月 11 日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论证说：由于亲苏情绪和苏捷条约的存在，"组建一个强大的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是有益的"，"应该把它视为我们在中欧和东南欧扩大影响的前哨"。③

波兰对于苏联来说"生死攸关"，正如斯大林与丘吉尔争论时所说，是否能够控制波兰，对英国只是国家荣誉问题，对苏联则是国家安全问题。④ 所以，斯大林才亲自张罗成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并以此作为未来国家政权的基础。⑤ 但是，这丝毫不表明莫斯科要在波兰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在 1943 年 4 月 2 日给波兰共产党国内领导人芬德尔的密电中，身为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就指示：在波兰现阶段，"确立工人和农民政权"的提法"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斗争的基本口号应该是"确立人民民主政权"。⑥ 在翌年 4 月 28 日与美籍波兰人奥尔列

① *Поп И.И., Россовская М.И.* Тяжелая тень восточного соседа：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Чехословак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отв. ред.)* У истоко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СССР и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страны в 1944-1949 гг.，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5，с.92.

② *Серапионова* Эдуард Бенеш.// *Марьина(отв. ред.)*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с.116-117.

③ АПРФ，ф.3，оп.63，д.237，л.52-93// Вестник，1995，№4，с.130，138，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6 卷，第 693、706 页。

④ *Ржеше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с.499-505；编译组：《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 139–140 页。

⑤ АВПРФ，ф.06，оп.6，п.42，д.551，л.3-6，*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52-55，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3 卷，第 31–33 页。参见 *Гибианский*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4，№ 6，с.152；*Яжборовская И.С.* Вовлечение Польши в сталинскую блоковую политику：проблемы и методы давления на поль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40-е годы.// *ИВ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с.90。该委员会设在波兰卢布林，亦称卢布林委员会或卢布林政府。

⑥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64.

曼斯基谈话时，斯大林也说，“苏联政府丝毫无意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波兰将存在什么样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宗教制度，这是波兰人自己的事”。苏联人只是希望未来的波兰政府“能理解并且珍惜与它东边邻国的良好关系”。[①] 尽管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围绕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斯大林与丘吉尔进行了激烈争论，但最后还是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吸收流亡伦敦的米科拉伊奇克参加政府。会议公报称，应在广泛的基础上对卢布林临时政府实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的民主领袖。[②]

此后，共产党和社会党始终掌握着政权，但是作为反对派，米科拉伊奇克及其农民党的影响也很大，并在英国的支持下，与执政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此，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感到一种政治危机，共产党甚至主张把米科拉伊奇克从政府中排除出去。面对波兰紧张的政治形势，1946 年 5 月 23 日，斯大林与波兰总统贝鲁特（共产党）、总理奥苏布卡 – 莫拉夫斯基（社会党）举行了会谈。在详细听取汇报后，斯大林回答了波兰人提出的问题。关于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斯大林虽然认为波兰的安全机关还很薄弱，但明确指出：“波兰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里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目前波兰，以及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民主制度，“可以使你们不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而接近社会主义”，因此“这一制度是值得保留的”。至于如何对待米科拉伊奇克，斯大林指出，农民党代表的是“反政府的反动派阵线”，而“波兰的民主阵营没有反对派也不行，这个阵营需要合法的、听话的反对派，也就是以合法的手段批评政府但不从事推翻政府活动的那种反对派，这样的反对派对波兰的民主阵营是有利的”。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同反对派“达成协议”。“在未来的议会中，应该提出给米科拉伊奇克的党 25% 的席位，给科瓦利斯基的党 15% 的席位”。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拒绝合作，“当然有必要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从肉体上消灭他的党的成员，因为这个党是合法的”，而“应该从政治上孤立”他们。斯大林最后指出，“不能不认真对待这些事情。让米科拉伊奇克进入政府是签订过协议的。如果把他除名，反动派就有了反对

① АВПРФ，ф.6，оп.6，п.42，д.548，л.9-15，*Волокитина*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36-42，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3 卷，第 14–20 页。

② *Ржеше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с.499-505；编译组：《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 166–185、218–219 页。

波兰民主的新理由”。[①]

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匈牙利共产党是最弱的。到1944年底，加上从莫斯科回国的200名党员，匈共党员总数不过2500人。[②]因此，当苏联红军推进到匈牙利境内时，11月13日莫洛托夫向来到莫斯科的匈牙利（非共产党）代表团指出，“苏联政府准备支持成立匈牙利中央机构的想法，其首脑由在座的匈牙利代表团成员和将军提名。”代表团成员对苏联极其友好和尊重的态度，令莫洛托夫感到满意，但为了让弱小的匈共在未来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他还是一再强调，匈牙利政府“应当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并吸收所有政党、所有政治派别的代表参加”，又小心谨慎地提出：“在莫斯科有一些匈牙利人，也许他们参加组建的机构是有益的。”[③]可见，在匈牙利不是共产党如何掌权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共产党的代表进入政府的问题。在苏联的建议和监督下，12月21日，匈牙利临时国会在德布勒森市召开，成立了由小农党、社会民主党、全国农民党和匈牙利共产党组成的临时联合政府。[④]第二天，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向斯大林报告说：“匈牙利政府的组成和政府宣言完全符合我们制定的计划。”[⑤]1945年7月，在苏联的干预和压力下，实现了内阁改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新内阁13名成员中占有6个席位，莫斯科对此结果感到满意。[⑥]

以拉科西为首的匈牙利共产党对此并不满足，他们进而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政策，以至引起莫斯科的强烈不满。是年秋天，苏联驻匈牙利公使普希金批评说，匈共脱离了苏联制定的“建立经选举产生的民主力量联盟”的“共同路线”，并指出，“共产党不仅要同社会民主党，而且必须同民族农民党结成联盟，还必须同国

① АПРФ，ф.45，оп.1，д.355，л.33-62，*Волокитина*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443-463，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114–136页。米科拉伊奇克与科瓦利斯基原同属一个农民党，后该党分裂。

② Charles Gati，*Hungary and the Soviet Bloc,*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82.

③ АВПРФ，ф.06，оп.6，п.34，д.416，л.9-13，*Волокитина*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94-98，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0–14页。

④ АВПРФ，ф.07，оп.5，п.43，д.93，л.7-8，Т2157，с.111-112，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8–20页。另参见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第138页。

⑤ АВПРФ，ф.07，оп.5，п.43，д.93，л.14，*Волокитина*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113，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21–22页。

⑥ АВПРФ，ф06，оп.7，п.28，д.372，л.6-8；АВПРФ，ф.077，оп.25，п.115，д.37，л.44-45，*Волокитина*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234-236，242-243，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23–25、26–27页。

内最有影响的政党小农党结成联盟。”[①] 盟国驻匈牙利管制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共产党的“‘左’倾情绪十分强烈”，“拉科西缺乏领导群众性大党的经验和国家工作的经验”，对小农党采取了“过火行为”。[②] 但为时已晚，匈共由于其自负和过激行为，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遭到失败。在议会中的席位，共产党占 17.4%，而小农党占到 57%。[③] 苏联不得不再次干预新政府的组成。莫斯科要求，“确保为苏联政府所能接受的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人中的一些人被任命为新的匈牙利政府成员”，同时努力争取由共产党担任内务部长的职务。总之，“新政府的行动纲领必须无条件地保证对苏联的友好关系”。[④] 结果在苏联的压力下，各党联席会议达成协议，在以小农党蒂尔迪为首的 18 名内阁成员中，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各有 4 名（包括内务部长）。[⑤]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为了保证苏联与西方的合作基础，为了确立在俄罗斯周边建立起稳定的安全带，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全面推行的确是一项“联合政府”政策。不过，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这一政策表现为劝告共产党放下武器，加入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则是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进入由共产党掌控的联合政府——在当时称新民主或人民民主制度。莫斯科唯一的要求就是：无论什么政府，都应确保其实行对苏友好政策。

四、斯大林“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及其原因

“联合政府”政策最初的失败发生在中国。斯大林为了保证苏联在中国东北的

① АВПРФ，ф.077，оп.27，п.11，д.121，л.25，转引自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5-1949.//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с.79-80.

② АВПРФ，ф.06，оп.7，п.28，д.371，л.60-64，*Волокитина*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271-274，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6 卷，第 34–38 页。

③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в 1944-1948гг.，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3，с.186-189；哈里曼、艾贝尔：《特使》，第 461–462 页。

④ АВПРФ，ф.06，оп.7，п.29，д.377，л.4，14-15，18-19，*Волокитина*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290-291，293-294，299-301，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6 卷，第 41–42、43–44、45–47 页。

⑤ АВПРФ，ф.06，оп.7，п.29，д.377，л.22-24，*Волокитина*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303-305，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6 卷，第 48–50 页。

权益，一方面声称要把东北的行政权交给国民政府，另一方面又利用中共军事力量的存在制约国民党，其政策左右逢源，目的就在于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斯大林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苏军撤离之前斯大林感到，国民党的反苏情绪以及美国的介入已经威胁到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便再次鼓动中共接管东北政权，而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也对中共占领区开展了肆无忌惮的大举进攻，于是形成了国共在东北乃至全国的激战局面。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① 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他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当然，莫斯科关注的中心在欧洲，就全局而言，1946 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② 但是，中共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并非没有影响，从这个角度观察，“联合政府”政策在中国的失败，似乎已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

在西欧，对斯大林“联合政府”政策的挑战，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首先出现在法国，而是在比利时。在 1946 年 3 月范阿克尔再次受命组成的内阁中，比共的成员由原来的 2 名增加到 4 名。8 月政府改组后，情况依旧。是年秋天，作为议会的第一大党，代表右翼的天主教党改变了以往试图单独执政的方针，宣称准备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恰在此时，共产党无意中犯的一个错误，为天主教党提供了机会。1947 年 3 月，因抗议政府停发煤矿补贴和提高煤价的政策，内阁中的 4 名共产党人同时提出辞职，并导致首相辞职。再次组成的天主教党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排除了共产党。这两个执政党在众议院共拥有 162 个议席，而反对党只有 40 席。③

不过，真正引起莫斯科震动和恐慌的挑战确实出现在法国。不同的是，比利时共产党在形式上是主动退出政府的，而法国共产党却是被右派蓄意赶出政府的。在 1946 年 11 月的大选中，法共获得占总数 28.2%的选票，在议会总共 619 个席位中

① 关于苏联对中国内战爆发的影响，参见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10 期。

② 关于冷战爆发的时间，学者中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杜鲁门主义的出现虽然表明美国已经决心与苏联分手，但斯大林却想尽量拖延与西方破裂的时间，直到 1947 年年中，苏联的冷战政策才最终形成。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第 172–187 页。

③ 阿·托因比、维·托因比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 894–895、899–900 页。

夺得182席，再次成为第一大党。法共自恃在议会中席位居首的优势，要求由党的总书记多列士担任总理并组织政府，但遭到中右派人民共和党的坚决反对，以致引起内阁危机。最后，只得请出德高望重的社会党“教皇”、74岁高龄的雷昂·布吕姆组阁。1947年1月22日，以社会党人保罗·拉马迪埃为总理的第四共和国首届内阁组成。社会党占有9个部长职位，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党各占5个。多列士出任副总理，弗朗索瓦·皮佑（共产党）任国防部长。[①]但是，表面上阵容强大的三党联合政府，实际上内部矛盾重重。

冲突主要反映在战后的殖民地政策和工资政策两个方面。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戴高乐支持的人民共和党，以及总理拉马迪埃和海外事务部部长马里尤斯代表的社会党右翼，决心对胡志明所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军事镇压，以此来恢复法国对那里的殖民统治，遂于1946年11月23日炮轰海防市，并对越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而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人则主张结束战争，通过与胡志明谈判解决问题。1947年3月20日，共产党发言人雅克·杜克洛发表讲演警告说，战争政策“将会耗尽法国的资源，导致法国依赖其他大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从而丧失法国的民族独立性”。不过，法共并不想因此失去在政府中的地位。3月22日，当政府就对战争拨款问题要求议会进行信任投票时，法共议员投了弃权票，而法共部长们却投了赞成票。[②]但是在紧接着出现的另一个殖民地问题上，法共则表现出强硬的立场。3月29日马达加斯加岛人民发动武装起义，法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军事镇压，并要求取消4名马达加斯加议员的豁免权。在4月16日的内阁会议上，法共部长严厉谴责法军在马达加斯加的大屠杀，同时谴责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并中途退出会议以示抗议。[③]三党联合政府的内部关系日趋紧张，在美国的支持下，右翼党派决心把共产党踢出政府。

早在3月间，奥里奥尔总统就认为“如果目前这种政府形式维持不下去，不如分裂”，并指责拉马迪埃“行动迟缓”。改组内阁的密谋和计划由此紧锣密鼓地开始了。4月下旬，拉马迪埃与布吕姆商议此事，一致认为“解除共产党人的职务对法

① 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200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3–39页；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30页。

② 详见 Mark Atwood Lawrence，Transnational Coalition-Building and the Making of the Cold War in Indochina，1947-1949，*Diplomatic History*，Vol.26，No.3，Summer 2002，pp.453-480；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第32页；阿·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1944–1984）》，陆伯源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48–49页。

③ 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第40–41页；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第32页。

国及共和国是生死攸关的”。刚从莫斯科参加四国外长议会归来的人民共和党领袖乔治·比多也向拉马迪埃施加压力，要求他采取行动。4月25日晚，拉马迪埃向其密友、国民教育部长马塞尔－埃德蒙·纳日朗透露：“我已下定决心，要将共产党人赶出政府。”4月30日，拉马迪埃悄悄地征求了法共部长以外所有内阁成员的意见，并取得了一致赞同。与此同时，社会党领导机构——指导委员会在社会党议员的压力下经过激烈辩论，以10票对9票通过决议，敦促拉马迪埃改组内阁。拉马迪埃还召见了三军参谋长勒韦尔将军，命令他增调部队，加强对巴黎安全保卫的部署，以防不测，法国各军区司令也奉命让军队处于戒备状态。①

拉马迪埃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即在工资政策上的争论。1947年初，法国经济每况愈下。煤炭产量持续下降，粮食供应不断减少，面粉和黄油储备已经用光，肉类来源几乎断绝。面对通货膨胀和工资冻结的严重局面，4月25日，雷诺汽车制造厂基层工会自发地组织了工人罢工。法共和法国总工会都先后表态，支持雷诺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在5月1日晚奥里奥尔总统出面召开的紧急内阁会议上，多列士声明法共反对政府冻结工资的政策，其他法共部长也都表示支持正在扩大的罢工运动，狄戎还补充说，三个月来法共在所有问题上都同政府有分歧。结果，内阁会议不欢而散。此后，法共部长们既不出席内阁会议，也不辞职，试图以此逼迫政府改变政策或集体辞职。5月4日，拉马迪埃在国民议会要求就此问题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所有法共议员及内阁成员都投票反对政府。第二天，拉马迪埃便在《政府公报》上发表公告，终止5名共产党内阁成员的职务，并于5月9日成立了没有法共参加的新政府。②

意大利的情况与法国类似，只是排挤共产党的手法有些不同。1947年1月，意大利总理加斯贝利在对美国进行非正式访问中，了解到美国对意大利寻求经济援助的要求反应冷淡，主要原因是担心共产党在意大利政府中发挥作用。5月1日，美国新任国务卿马歇尔更直接暗示加斯贝利，只有将极左翼从他的政府中赶出去，才有可能谈到美国的援助问题。美国驻意大使邓恩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于是，5月13日加斯贝利以政府内出现众多意见分歧为由提出辞职。当5月31日组成新政

① 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第43–44页；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第30–31页。

② 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1944–1984）》，第48页；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第41、44、46页；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第30页。

府时，共产党和社会党都已经被排除在外。①

在法国和意大利接连发生的事件表明，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已经破产，这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极为不安和恼怒。6月3日，莫洛托夫给驻巴黎的苏联大使馆发出指示，要求约见多列士并向他传达所附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的信。多列士可以抄写信件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原件要立即销毁。日丹诺夫在信中说：“联共（布）中央对近日法国发生的将共产党人排挤出政府的政治事件非常担忧。苏联工人多次请求我们向他们解释法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对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法国的力量对比已不利于共产党感到很担心，这一变化造成的政治后果也令他们不安。但是由于缺乏信息，我们很难给予他们明确的答复。……许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是与联共（布）中央协商过的。你们自己清楚，这是不正确的，对于你们采取的这些步骤，联共（布）中央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后，日丹诺夫强烈要求法共向莫斯科通报信息。②显然，斯大林担心的不仅是“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已经无法继续，更令他不安的是那里的共产党擅自行动，有脱离莫斯科指挥棒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日丹诺夫这封信的内容也通知了所有东欧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因为受莫斯科主张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影响，东欧党各行其是的现象亦有所抬头。

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联合政府”政策的命运同样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如果说在西欧这一政策的破产表现为共产党被排挤出政府，那么在东欧则表现为共产党（多数情况下与社会党联合）把其他政党排挤出政府。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那里的权力已经完全被共产党垄断，其他东欧各国共产党都有其要对付的政敌。为了把农民党、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右翼社会党人驱逐出政府，甚至取消他们作为真正的反对派的资格，各国执政党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技术手段”和“非常措施”。

所谓技术手段，就是直接修改或伪造选举结果。捷共领导人对待作为体现国内政治民主生活的选举制度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哥特瓦尔德在1946年4月直截了当地表示，“工人阶级、我们的党和劳动人民手中掌握着足够的手段、工具和方法，来纠正这种机械式的投票……以便获得对工人政党有利的结果。”已经公布的俄国

① 史志钦：《意共的转型与意大利政治变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10–113页；Melvyn P. Leffle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ategic Dimensions of the Marshall Plan，*Diplomatic History*，1988，Vol.12，No.3，p.281；华特生：《从列宁到马林可夫》，第408–409页。

② АПРФ，ф.45，оп.1，д.392，л.33-34，*Наринский* И.В. 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з, с.24-25.

档案证实，至少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 1946—1947 年的选举中就发生过这种现象。[①] 以罗马尼亚为例。1945 年 3 月 6 日，在共产党的压力下，罗马尼亚国王批准成立了以格罗查为首的人民民主阵线政府。在 12 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斯大林与西方达成妥协，吸收民族自由党和全国农民党的领导成员入阁，并准备在全民、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的议会选举。然而，对于姗姗来迟的 1946 年 11 月的选举结果，当时所有的西方观察家和罗马尼亚反对党的政治活动家都一致认为是伪造的，美英两国也公开指责选举没有代表民意。[②] 现在档案材料披露的罗共领导人的言论，可以证明这些指责不是没有根据的。选举前，乔治乌－德治信心充足地对莫洛托夫说，为了确保取得选举的胜利，"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波德纳拉希在苏联使馆的谈话更加明确："我们希望在投票时得到的实际选票可以达到 55%—65%，但是我们需要得到的是 90% 的选票，而做到这一点，将要借助于选举法所提供的一些可能性和某种'技术手段'。"[③]

所谓非常措施，就是制造政治案件，利用掌握中的权力机关打击反对派。这是比较容易也更为普遍使用的手段。在匈牙利，由于共产党的力量较弱，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④] 在 1945 年 11 月的普选中，小农党取得巨大胜利，在议会中占有近 60% 的席位。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为了履行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小农党同意增加共产党在内阁中的席位，而共产党以退出政府相威胁，取得了内务部长的职位。到 1946 年 4 月，利用小农党的分裂，共产党不仅控制了最高经济委员会、国防部等关键部门，而且还让更为好斗的拉伊克·拉斯洛接替过于书生气的纳吉·伊姆雷担任了内务部长。到了 10 月，作为小农党的领袖，纳吉·费伦茨总理实际已被架空。两个月后，国防部和内务部在既未通知总理又不同他商量的情况下开始了

---

①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901，л.33，参见 *Мурашко, Носк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с.94-95。

② *Ерещенко М.Д.* История，которую остановили за кулисами дипломатии (Советское влияние ка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фактор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 Румынин)// *Гибианский (отв. ред.)* У истоко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с.91；阿·托因比、维·托因比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 476–477 页。

③ АВПРФ，ф.06，оп.8，п.44，д.733，л.19-20；АВПРФ，ф.0125，оп.34，п.131，д.16，л.104-111，*Волокитина*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535-536，541-546，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3 卷，第 548、554 页。

④ 苏联驻匈使馆在 1946 年度的政治总结报告中就抱怨，共产党应对"警察局里的过火行为"负责。АВПРФ，ф.077，оп.27，п.121，д.11，л.24-29，*Волокитина*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609-613，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6 卷，第 105–108 页。

大规模逮捕。在随后几个月对这起“反共和国阴谋”案件的审讯中，大批小农党核心或骨干人物受到牵连，纳吉·费伦茨的密友、小农党总书记科瓦奇·贝拉也遭到指控，并被苏联人神秘地逮捕。[①]1947年1月在与苏联大使普希金的谈话中，费伦茨承认小农党议会党团中确实混有反动分子，但是“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地夸大阴谋，试图利用自己在侦察机关的优势败坏小农党领导人的名声并引起该党的分裂。”“共产党正在没有任何根据地中伤和迫害独立小农党的某些成员。”费伦茨还向苏联人提出，为了给“联合政府的工作创造一个健康的基础”，“希望共产党也做出让步，准许我们小农党的成员进入警察系统和地方政权机关”。[②]费伦茨哪里知道，匈共的矛头最后就是指向他本人的。在4月29日对莫洛托夫的汇报中，拉科西指出，不仅纳吉·费伦茨总理是阴谋集团的领导人之一，很可能共和国总统蒂尔迪·佐尔坦也与该阴谋有牵连。拉科西还坦言：“很遗憾，在阴谋分子那里没有发现武器仓库，否则我们就可以更加彻底地揭露他们了。我们需要某种紧张的局面。至少，我们希望把关于叛国阴谋的问题再次提到首要地位。”[③]一个月后，拉科西便利用费伦茨出访瑞士之机，在突然召开的部长会议上提出对他的叛国指控，费伦茨被迫辞职，流亡国外。[④]

在波兰选举前的几个星期，掌握政府权力的工人党和社会党对米科拉伊奇克及其支持者也使用了非常措施：“采取了2000多次行动”，逮捕了几千名农民党领袖和党员，并举行了几次审判，旨在证明农民党与波兰流亡分子、地下集团和美英使馆等都有勾结；取消那些支持米科拉伊奇克的选区内农民党候选人资格，禁止波兰

① 阿·托因比、维·托因比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509–512、518–520、523–525页；АВПРФ，ф.077，оп.27，п.121，д.11，л.47-49，*Волокитина*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608-609，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03–104页。

② АВПРФ，ф.077，оп.27，п.120，д.7，л.20-23，*Волокитина*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561-562，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90–91页。

③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19，л.7-21，*Волокитина*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613-623，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09–121页。

④ 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14，л.129-135，*Волокитина*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641-647，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22–128页。

农民党组织在22个县里开展活动。[①]结果，农民党在1947年1月的选举中“大大地受到了削弱和损伤”。工人党向莫斯科报告说，鉴于米科拉伊奇克还有很大影响，“今后仍然必须对农民党施加压力，对它采取攻势”，除了继续实施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攻外，更重要的是“从国家机关，首先是行政－政治机关中清除波兰农民党成员”。[②]其目的正如社会党领导人贝尔曼所说，就是要“建立一个在对待政府态度上能够循规蹈矩的反对派”。[③]

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也先后发生了清洗和排挤反对党的类似情况。[④]总之，到1947年春天，东欧各国联合政府的社会政治基础大大缩小了，即使保留在政府内的非共产党部长，也只能是俯首帖耳。作为一项政策，“联合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如前所述，东欧各国共产党接受来自莫斯科的这种“宽容”政策，或多或少都带有被迫性，而党的生存及其利益所在，又必然要求他们在政府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此，破坏“联合政府”的行为最初大多是东欧各国共产党主动采取的。与此同时，苏联也开始渐渐对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这种要求采取了支持的立场，因为在莫斯科看来，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各党基本上是持反苏立场的，只有共产党牢牢掌握政府的方针和方向，才能保证对苏友好政策的实行。在莫斯科认定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的目的之一在于诱使东欧国家脱离苏联控制以后，特别是当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借口共产党无法替代政府做出决定，而试图违背苏联的旨意

①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80，л.1-5，*Волокитина*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551-555，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9卷，第575页；*Бордюгов Г., Матвеев Г., Косеский А., Пачковский А.* СССР-Польша: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дчинения，1944-1949гг.，Москва：АИРО-XX，1995，с.193-198；阿·托因比、维·托因比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332–334页。

②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284，л.19-25，*Волокитина*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587-591，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180–181页。

③ АВПРФ，ф.0122，оп.29，п.208，д.7，л.81-84，*Волокитина*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592-594，中译文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185页。

④ 详见阿·托因比、维·托因比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494–501页。*Ерещенко* История，которую остановили за кулисами дипломатии.// *Гибианский(отв. ред.)* У истоков“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с.91；*Мурашко, Носк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с.97；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徐先麟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3页。

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时候，斯大林终于决心放弃“联合政府”政策了。[①] 此后，随着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斯大林一方面不断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另一方面督促和逼迫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从而为共产党一党执政打开了通道。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变”之后，所谓联合政府在东欧已经不复存在。

总体说来，苏联战后初期的对外政策，对于东欧确有扩张性，但对于西方却不具进攻性。“联合政府”政策是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保持与西方的友好、同盟关系。同时，作为一种制度，斯大林也确曾设想以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政治模式逐步把各国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因此可以认为，正如斯大林本人向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反复解释的，这一政策推出伊始并非一时之计，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陷入了一种难以调和的自我矛盾。首先，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充满矛盾的。其次，莫斯科既要东欧各国共产党吸纳内心对苏联持有敌意的资产阶级政党参与政府，又要各国政府保证与苏联政策的一致性，而在选举过程中，每个国家的各个政党则都要为自身的生存和利益互相争斗。因此，“联合政府”政策必然是短命的。对于冷战的起源而言，“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一方面源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另一方面又成为冷战爆发的导火索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倡导的各国以不同政治形式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向了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模式。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共产党情报局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标志着苏联冷战政策的最终形成，但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战略的根本复活。至于斯大林冷战战略的本质和特性，笔者将另文论述。

发表于《俄罗斯研究》2007 年第 5、6 期

---

① 关于对待马歇尔计划的立场上苏联与波、捷的分歧及其解决，参见 *Наринский М.М.*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Чехов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 (отв. ред.)*，Февраль 1948，Москва и Прага，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полвека，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ния и балканистики РАН，1998，с.67-83；Mikhail M. Narinsk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CWIHP Working Paper*，№9，1994.3；Anderson，Sheldon，Poland and the Marshall Plan，1947-1949，*Diplomatic History*，1990，V.15，№4，pp.473-494。

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

——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20世纪历史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可以说，1945—1947年这几年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所谓历史转折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就是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就是各主要国家发展战略的重新定位。而这种组合和定位也就确定了未来世界历史的格局，确定了各主要国家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是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因此，对当时斯大林对外政策及其战略目标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主要方面认识和理解战后世界冷战格局形成的原因以及整个冷战时期苏联对外战略和发展战略的基础。

一、导言：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

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对于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已经进行过广泛的探讨，总的来说，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或者认为斯大林具有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追求控制和扩大其势力范围；或者认为斯大林所采取的只是温和的、谨慎的和防御性的政治对策。然而，在苏联解体以前，上述两种观点的代表——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修正学派，都很少能接触到苏联的档案材料，其结论主要是依据对苏联领导人公开言论及其行为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推断。90年代以来，随着俄国档案逐步对外开放，研究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行为是古怪的和反复无常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是无所作为的；斯大林的远东政策与欧洲政策一样，都是“盲目的”，“毫无内

在联系的”。[①]也有人认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的政治目标是保护其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他并不想煽动世界革命，不愿直接与西方对抗，而且一度相信依靠雅尔塔和波茨坦原则，苏联的安全目标就可以与西方协调起来。面对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的状态，斯大林甚至不知所措。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斯大林产生了重大影响，与中国的联盟才真正导致了对抗。[②]还有人认为，战后初年，苏联对外战略的基础是建立在新的世界大战可能重新爆发的估计上的，总体上是一种积极防御战略，冷战开始后才迅速转变为阵营对抗战略。[③]我们认为，这些说法都不能全面或准确地反映出1945—1947年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特别是没有勾勒出这一时期斯大林对外政策变化的轨迹，从而难以正确地理解苏联对外政策的实质，也无法说明冷战的起源这一引起广泛争论的热点问题。

在我们看来，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有三个层次，即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国家安全利益。首先是和平共处。斯大林在战后说过，“苏联政府认为，尽管经济制度和思想体制不同，但是这些制度的共处，以及美苏分歧的和平解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为了普遍和平的利益也是必要的。”[④]正如许多学者看到的，斯大林对于战争后期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是满意的，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内容来说，这一体系的构筑都符合俄罗斯传统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从芬兰经波罗的海三国到东欧，从近东经蒙古、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到日本北方四岛，苏联通过战争和雅尔塔体系获得的政治权益，实现了俄国长期以来追求的建立广阔的环俄罗斯安全缓冲带这一战略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与西方盟国建立合作和协调关系的结果。因此，斯大林首先需要保持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实现和平共处，唯有如此，才能以最小的代价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

然而，对于世界革命这一苏联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来讲，和平共处只是一种手段，或者说是暂时的、短期的目标。斯大林自信，社会主义的苏联最终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世界的，这是苏联和人类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方式

---

① 参见 Robert Conquest, *Stalin: Breaker of Natio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p.271; R. C. Raack, *Stalin's Drive to the West, 1938-1945: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66; 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18。

② Vladislav M. Zubok, "Stalin's Goals in the Far East: From Yalta to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1950",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 January 1996, Hong Kong.

③ 郑羽:《阵营对抗：冷战开始后斯大林的对外战略》,《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2期，第66页。

④ 《斯大林文选》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3页。

只能是暴力革命。斯大林在战前就说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①]战后，斯大林更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平稳地和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人民革命形势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②]危机导致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世界，这就是斯大林总危机理论的核心。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对外政策的制定便应纳入于世界革命的目标体系，至于外部世界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状态并不重要。所以，在斯大林看来，和平共处要服从于世界革命，它只是世界革命总目标当中的局部和暂时目标。

然而，对于国家安全利益这一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来讲，世界革命又成为一种手段，或者是对外战略中一种局部的和临时的目标。把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置于其对外政策战略中的最高地位，这是斯大林的一贯方针。这一方针的理论基础就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斯大林在战前就认为，在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的时候，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不仅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斯大林才心安理得地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并建立起“东方阵线”，强词夺理地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并通过一纸命令解散了“共产国际”。既然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就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所以世界革命的利益便应当服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应该起来革命，什么时候起来革命，对于民族解放运动是否给以支持和援助，完全要看这种革命行动是否有利于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这是斯大林心目中毫不含糊的逻辑。

总之，在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的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实际过程中，斯大林有时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有时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暂时的、易变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从苏联对外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15–223页。

② 《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41–442页；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4–45页。

政策的这一终极目标。从这一基点出发，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大国合作出发，逐步趋向有限扩张，最后导致集团对抗。当然，这并不是说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可以截然分为这样三个阶段，但总体说来，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方针是逐步从温和走向强硬的，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交替使用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使用和平共处和世界革命外交手段，其根本目标是维护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

二、大国合作：对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消极态度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斯大林坚持这一外交方针的基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然而，由于战争的极大破坏和损失，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却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这自然就需要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以求得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就苏联的经济实力而言，当时也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抗衡。第二，斯大林认为战后一段时期没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苏联确立外交合作方针的前提。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新的战争有两层含义，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战争。斯大林认为，爆发前一种战争的可能性要大于后一种战争，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战争的目的是要取得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而与苏联的战争则涉及资本主义自身的存亡问题。但是，苏联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①] 所以，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苏联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有基础的。第三，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与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之上。

总的说来，只有采取合作的方针才能维持雅尔塔体系的存在，而维持雅尔塔体系存在就能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在这方面，斯大林原则上是遵守与西方划定的势力范围界限的，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对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消极态度。

---

① 《斯大林文选》下册，第 623–624 页。

在西方的史学研究中，谈到杜鲁门主义的产生时，往往把希腊问题与土耳其和伊朗事件相提并论。其实，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来看，这两者在实质上有很大区别。如果说苏联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表现出一种积极姿态，那么对于希腊问题则明显采取了保守和消极的方针。从地理位置上讲，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突出于地中海之上，当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过对于苏联的安全利益而言，希腊的重要性却远逊于与苏联接壤或近邻的东欧各国。因此，尽管战争末期希腊共产党的势力已经十分强大，而希腊的内战曾震动了整个巴尔干半岛，但是 1944 年 10 月斯大林与丘吉尔达成划分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时，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还是把希腊让给了英国。[①] 对于斯大林来说，正是希腊之“失”，才有东欧之“得”。这个交易充分说明，在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的序列中，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是摆在第一位的，至于革命，如果无助于保证苏联的根本利益，是不会纳入苏联对外政策考虑之中的。结果，正值 1945 年 2 月 12 日要求希腊解放军予以遣散的瓦尔基扎协定签订时，斯大林在雅尔塔三大国首脑的聚会上表示，他“对英国在希腊的政策是完全信任的，无意进行干预”。[②] 尽管后来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已经处于紧张状态，但斯大林始终不愿明显地破坏经过协议确定的势力范围界限。1947 年 12 月，当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临时民主政府成立后，莫斯科对此仍持消极态度。斯大林在 1948 年 2 月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对希腊民主军能否在军事上取得成功表示怀疑，并赞成放弃武装斗争和停止对希腊民主军的援助。他还指示，希腊的邻国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应当最后承认以马科斯将军为首的希腊临时政府，而让距希腊远些的国家先予以承认，以免处于被动局面。[③] 虽然从美国的角度看，希腊问题与土耳其和伊朗事件都是杜鲁门主义产生的重要背景，但在希腊问题上，美国表现出来的是对于共产主义活动的本能恐惧，而苏联的对策则反映出斯大林维护雅尔塔体系的主旨。

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战后的远东战略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满洲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的这一要求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

---

① 过去有人对斯大林与丘吉尔的这个协定持怀疑态度，但苏联档案中的新证据说明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协议。见 АПРФ（俄罗斯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283，л.3-16，转引自 *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И.В.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з，1944-1947гг.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с.19。

② 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 2 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第 265 页。

③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1947-1948гг.，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с.159-160.

约》得到了保证，而斯大林对美国的回报是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和劝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①] 虽然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也是苏联不支持中国革命的原因之一，但是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斯大林要通过制止中国的革命来保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政治权益，维护雅尔塔体系的存在。近年来，中国方面已经有大量文献资料和回忆录证实了这一分析。诸如在二战结束之初苏联不支持中共争取对日受降权，反对中共进行武装斗争，敦促毛泽东与国民党谈判建立联合政府，不允许中共进入东北的大城市和在苏占区公开活动，甚至扬言要用武力迫使中共军队撤出沈阳等等。[②] 目前披露出来的能够证实这些问题的俄国档案材料还不多见，但根据我们看到的仅有的一些文献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1945 年 9 月初，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和山东第三分局满洲委员会分别致函苏共有关领导人，抱怨苏军在东北军纪不严，行为不轨；要求苏军不要解除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的武装，并要求为他们提供武器，以及印刷机、纸张等。这些要求显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能够看到的一份材料证实，苏联驻军正式拒绝向中共提供印刷机和纸张，还禁止中共在苏占区活动，并提醒说这个问题将由中央政府即蒋介石政府来决定。[③] 为了实现自己对雅尔塔协定的承诺，苏联军队进入东北之后显然更倾向于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而尽量避免对中共提供帮助。1945 年 11 月，为了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共同开发东北的经济，苏联答应对于将国民党军队运往沈阳和长春机场的空中运输线给予援助。在苏联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长春进行经济合作谈判的同时，蒋介石还派他的儿子蒋经国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私人高级会谈。[④]1945 年 12 月初，莫洛托夫命令苏联驻旅顺海军基地的指挥官梅列茨科夫执行他的指示：不要让中国军队——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军队，进入苏联基地。莫洛托夫特别强调，“我们必须绝对反对共产党人像在他们自己的根据地所做的那样在海军基地内重建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一切企图。”[⑤] 斯大林一相情愿地认为，苏联采取的这种合作的姿态就能够保证莫斯科在远东的既得利益。正如莫洛托夫后来评

---

① 关于这个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 年第 5 期。

② 关于斯大林劝阻中国革命的最新材料可参见 Michael M. Sheng，“Mao，Stalin，and the Struggle in Manchuria，1945-46：Nationalism or Internationalism?”，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January 1996，Hong Kong。

③ Brian Murray，“Stalin，the Cold War，and the Division of China：A Multi-Archival Mystery”，Working Paper，*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No.12，1995，pp.3-4.

④ Murray，“Stalin，the Cold War，and the Division of China”，p.4.

⑤ Murray，“Stalin，the Cold War，and the Division of China”，p.5.

论的，斯大林遵守对其权利的严格限制，同时也反对美国试图从罗斯福的许诺倒退。他认为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出现，是作为在解除日本武装后30年内保证其安全的政策的需要。[①] 斯大林在战后初年执行与西方合作而反对或不支持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外交方针，这一点绝不是仅仅体现在希腊和中国的问题上。已经熟稔大国外交游戏的斯大林不愿让民族解放运动束缚苏联外交的手脚，妨碍与西方大国的合作关系。苏联政府无视许多弱小国家要求独立的强烈呼声，却对殖民地托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认为这种传统的管理方式给殖民地国家提供了“争取社会进步的具体可能性”。[②] 在1945年的伦敦外长会议上，苏联就曾提议对意大利的殖民地实行托管。在同年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苏联又在与美国议定以三八线为界将朝鲜半岛划为两部分的基础上，表示赞同对朝鲜进行托管。此后，苏联还表示欢迎以承认法国殖民利益为前提的《越法初步协定》。至于非洲各国，苏联则认为当时不具备独立的条件，而只能逐步建立起自治政府。显然，所有这些策略都是基于苏联与西方大国合作的外交方针而提出的。甚至对于美国企图单独占领和管制日本的作法，斯大林虽然表面上表示反对，但实际上没有做任何努力来打破这一局面。有材料说，从1946年到1949年，苏共与日共没有任何公开的联系，所有党的工作都是通过野坂参三与苏联情报部门秘密进行的，这表明苏联承认美国对日本的独占以及在那里进行的西方式民主改革。[③] 出于敦促中国成立联合政府的同样动机，斯大林不仅对以朴宪永为首的南朝鲜共产党表现出漠不关心，甚至在1945年9月20日对占领北朝鲜的政策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准在北朝鲜领土上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其他苏维埃权力机关；在所有抗日民主党派和组织的广泛联合的基础上，帮助北朝鲜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权。[④]

纵观斯大林在战后初年的所有外交举措，对于苏联奉行的与西方大国合作的对外政策方针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然而，这种合作中已经隐含着分裂的因素。除了在国家利益上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以外，还有以下的原因。首先，由于不同的意

① Sergei N. Goncharov，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3.

② Carol R. Saivetz and Sylvia Wood by，*Soviet-Third World Relations*，Colorado：Westview Press，1985，p.24.

③ Haruki Wada，“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1945-1953：In the Light of New Russian Archival Documents”，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January 1996，Hong Kong.

④ *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 (*отв. ред.*) Отнош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народной Кореей 1945-1980，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1，c.113.

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苏联与西方大国本来就是敌对的。战争期间结成的同盟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战争结束、共同的敌人消失后，这种同盟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其次，虽然罗斯福与斯大林同样主张战后实行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但罗斯福看到了凡尔赛体系的弊病，他的本意是通过几个大国掌管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性组织，在协调大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安排国际事务，以求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至于美国的利益，罗斯福相信凭借美国的经济实力和门户开放政策就可以得到保证。但其他西方大国首脑（譬如丘吉尔）却没有罗斯福那样的政治实力和新的思维，罗斯福可以对斯大林容忍和忽略的事情，他的继任者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却一定要针锋相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罗斯福的去世已经预示了大国合作的暗淡前景。再次，与罗斯福合作政策的内涵不同，斯大林主张的大国合作，本质上是因循历史上由主要战胜国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传统作法，试图以雅尔塔体系取代凡尔赛体系而重建以美苏两国为主宰的世界新秩序。几十年来苏联一直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在国际事务上受到压抑和歧视的“孤岛”心态以及大俄罗斯主义的复仇心理，使战后的斯大林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苏联从此可以参与主宰世界命运了。因此，尽管奉行大国合作的政策，但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尚未顾及的地方，苏联还是不时地表现出一种跃跃欲试的扩张行迹。

三、有限扩张：在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中的进攻态势

从理论上讲，如果苏联与西方恪守和平共处的原则，虽然双方不会再有战时那样的同盟关系，至少也可以维持一般的合作关系。但是，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在如何安排战后世界新秩序方面，苏联与西方大国的立场观点大相径庭，所以双方都把对方视作竞争的对手，在行动中都竭力遏制和损伤对方，力图增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按照各自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改造世界。于是，分歧和冲突的升级也就在所难免了。

苏联与西方大国的争端首先出现在东欧问题上。从地理位置上看，东欧紧靠着苏联的欧洲领土，也即苏联的中心地区，并且在历史上经常成为外敌入侵俄国的通道和入口。所以，东欧便成为斯大林建立战后苏联安全带和势力范围的必争之地。斯大林对东欧政策的核心就是要通过苏联红军越境在东欧作战的有利时机，支持和帮助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建立起苏联模式的政权组织，一举而完成苏联对外政策中保

证国家安全和实现世界革命两大战略目标。唯其如此，苏联在东欧问题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寸步不让。早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就明确表示了在东欧的权力问题上不容挑战的决心。当美国提出解散波兰卢布林临时政府，而在国务委员会的基础上另建临时政府时，斯大林断然予以拒绝。当美国在1945年9月要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改组或辞职时，苏联同样表示坚决反对。与此同时，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基本考虑就是要使苏占区成为保证苏联西部安全的前沿，在巩固苏占区的基础上，增强苏联在全德国的地位，并防止西占区成为依附于西方的独立国家。1946年3月，斯大林在评论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时，甚至不屑于理会丘吉尔把东欧国家说成是苏联势力范围的观点，而只强调在东欧建立对苏联抱有善意态度的政府，“这是和平的愿望”，并非“扩张倾向”。[①]研究者在这方面的论著已经很多，而且对于我们所要论述的问题，东欧并不是重点。尽管西方大国对斯大林在东欧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表示出不满和猜疑，但在雅尔塔体系中，东欧毕竟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方即使对此做出反应，也显得底气不足。而真正在苏联与西方之间引起冲突并导致双方政策转变的问题，发生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这突出地体现在土耳其和伊朗。

在历史上，近东地区是沙皇俄国与欧洲列强进行角逐的场所。从19世纪以来，控制土耳其两海峡以及南下波斯湾取得一个重要的不冻港，就是沙俄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二战后，土耳其和伊朗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苏联一旦在这两个国家取得政治和经济权益，不仅能够确保苏联南部的安全，而且还能为苏联提供南下地中海和印度洋发展的基地。然而，在雅尔塔体系中，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斯大林在土耳其和伊朗的举动也就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强烈反响。

在土耳其问题上，斯大林试图以实力为基础，通过恫吓和讹诈手段，实现苏联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和政治权益。根据1936年《蒙特勒公约》的规定，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可以不受限制地通过海峡，而非黑海沿岸国家军舰通过海峡时，在吨位、等级和停留时间上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显然，这种一般通航权不能满足苏联控制海峡的要求。早在1940年11月，苏联在与德国的会谈中就提出了要在海峡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②]到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又表示，修改公

① 《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99页。

② Raymond J. Sontag and James S. Beddie, *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 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1976, p.259.

约时“应该考虑到俄国人的利益”，不能让土耳其人扼住苏联的咽喉。[①] 斯大林这一要求的确切含义很快就由莫洛托夫明白地昭示出来了。莫洛托夫于 3 月 19 日便向土耳其大使递交了一份声明，宣布废止 1925 年缔结的《苏土友好中立条约》，理由是该条约已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须做重大修改。[②]

苏联在土耳其的举动迅速引起了美国的重视和反应。4 月 19 日，刚刚继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便接见了土耳其驻美国大使。接着在 4 月 23 日的白宫会议上，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对总统说，波兰的事情不是孤立的，它是苏联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希腊采取单方面行动的一部分。当时，美国在东欧问题上已经处于被动地位，福莱斯特尔把土耳其问题与东欧问题联系起来，其意图正如他本人告诫总统的那样：“如果俄国人不改变他们的僵硬态度，美国对他们早摊牌比晚摊牌要好。” 4 月 25 日，美国驻土耳其大使也告诉总统说，因为东欧已经丢给了苏联，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将迫使美国支持土耳其。[③]

苏联没有估计到美国会对此做出强烈反应，仍然一味蛮横行事。同年 6 月 7 日，苏联向土耳其提出了三项关于缔结苏土新条约的极为无理的要求：将土耳其东部卡尔斯 – 阿尔达汗地区划归苏联；同意苏联在海峡拥有基地；苏土两国在多边协定达成以前先行修改《蒙特勒公约》。莫洛托夫在提出上述要求的同时，曾闪烁其词地暗示，如果土耳其与英国决裂或改变其外交政策，这些要求就是不必要的了。[④] 苏联对土耳其要求的实质无非是要把土耳其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苏联甚至以武力相威胁。斯大林把在伊朗的 200 辆坦克的三分之一部署在伊土边界，并在其邻国保加利亚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以迫使土耳其就范。苏联的报刊和电台也同时掀起了针对土耳其的宣传活动。[⑤] 随后，苏联又于 1946 年 7 月 7 日和 8 月 8 日两次照会土耳其政府要求修改《蒙特勒公约》，并由苏土共管黑海海峡。

苏联对土耳其的要求已经超出了雅尔塔体制的范围，甚至威胁到西方国家的安全利益，因此遭到英美等国的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和军方经过仔细研究后，于 8

① 编译组：《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203–204 页。

② Bruce Robellet Kuniholm，*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Great Power 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Iran，Turkey，and Gree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255.

③ Kuniholm，*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p.257.

④ Kuniholm，*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p.258. 卡尔斯 – 阿尔达汗地区在历史上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地，俄国曾于 1806 年、1828 年、1855 年和 1877 年四次入侵该地区，并最终将这一地区据为己有。1921 年的苏土条约规定将该地区归还土耳其。

⑤ Kuniholm，*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p.356.

月 15 日向杜鲁门提交一项备忘录。该备忘录认为，苏联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控制土耳其，一旦苏联的要求得逞，美国就难以阻止苏联控制整个中近东地区。由于美国在该地区有着资源和交通利益，不让苏联通过武力或以武力威胁实现其对海峡和土耳其的计划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备忘录还强调，唯一能够阻止俄国的方法就是要明确表示，如果需要的话，美国准备以武力来对付侵略。几天后，美国便照会苏联，表示不同意苏联的要求。照会指出，海峡制度不仅与海峡沿岸国家，也与其他国家有关；土耳其应是继续成为防卫海峡的主要责任者。美国还警告苏联，对海峡的进攻必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问题。[①] 以后，苏联虽然还不断向土耳其提出类似的要求，但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强硬态度面前悄然退却了。

伊朗所在的波斯湾地区，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历史上一直是大国的主要争夺对象。战争期间，为了消除德国在伊朗的破坏活动，确保盟国援助苏联的物资经伊朗顺利地运往苏联，1941 年 8 月苏联和英国分别出兵占领了伊朗北部和南部。1942 年 1 月，苏、英、伊三国签订的盟约规定，战争结束后 6 个月之内，苏军和英军从伊朗领土上撤出。同年底，美军进入伊朗，接管和承担了原英军负责的铁路和港口业务。1945 年 5 月德国投降，伊朗向苏、美、英三国提出撤军的要求，但苏联却以各种借口拖延撤军，从而引发了“伊朗危机”。

伊朗与苏联有着 2500 公里的边界，伊朗北部地区在历史上属于沙俄的势力范围。苏军进入伊朗后不久，1941 年 10 月伊朗成立了以前共产党人为骨干的人民党(其政治局委员和积极分子在 30 年代曾受训于苏联党校)。战争结束后，伊朗成为苏联实现其对外政策中“安全”与“革命”双重目标在近东的主要对象。具体来说，就是由联共（布）中央指导伊朗人民党和阿塞拜疆民主党实施革命；由苏联外交部对伊朗政府施加压力，试图获得伊朗北部的石油租让权。1944 年 8 月 8 日美英两国达成了双方在石油政策方面共同行动的专门协定，这刺激了苏联要在伊朗石油问题上取得与美英对等权力的欲望。

8 月 16 日，贝利亚向斯大林提交的一份有关石油开采权问题的报告指出，英美在争夺伊朗石油资源中存在着矛盾，但同时要警惕他们试图对“第三国”采取共同行动。贝利亚希望苏联参加英美的石油谈判，“以便在国际石油领域捍卫苏联的

① Kuniholm，*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pp.361-362.

利益”，并建议“同伊朗进行强硬的谈判以获得伊朗北部的（石油）租让权”。[①] 随后，苏联副外长卡夫塔拉泽于9—10月率团与伊朗进行了有关石油租让权的谈判。10月11日伊朗政府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宣布将所有关于石油租让权的谈判推迟到战争结束以后。12月2日，伊朗议会通过法令，禁止政府与外国进行石油租让权的谈判。这一决定同样适用于英美，因此也遭到英美的反对。但苏联却认定伊朗的决定是英美反苏政策的结果。1945年2月，苏联情报人员报告说，伊朗议会是英国的驯服工具，对苏联扩大经济利益的建议“进行强烈抵制”，苏联在伊朗的经济利益受到“英国的威胁”。该报告建议，作为一种对抗手段，可利用即将举行的伊朗议会选举，使亲苏分子夺取伊朗北部地区的所有54个席位。[②] 这表明苏联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手段干涉伊朗内部事务。

1945年5月，卡夫塔拉泽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提出了反对从伊朗撤军的理由。他认为，“苏军撤出伊朗无疑将导致该国反动势力的加强和民主组织不可避免的崩溃……反动的亲英分子将竭尽全力并使用一切手段，以消除我们在伊朗的影响和我们在伊朗的工作成果。所以，可以认为，拖延我们军队撤出伊朗的时间并尽可能地保证我们撤军后的利益是正确的（主要方法是取得石油租让权，必要时建立由我们占支配地位的股份公司）。”[③] 于是，在同年7—8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针对英国分三阶段撤军的建议，提出撤军期限应从对日作战结束后算起。[④] 然而，对日战争结束之快出乎斯大林的意料。由于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1946年3月2日便成为约定的撤军日期了。

随着撤军日期的临近，苏联加强了对伊朗的干涉和控制。在苏联的指导和支持下，刚成立不久的阿塞拜疆民主党要求在伊朗境内实行民族自治。1945年12月，民主党领导人比雪华里在大不里士组建了民族政府。与此同时，苏联还大力支持伊朗库尔德斯坦人的民族自治运动。伊朗政府认为阿塞拜疆的民族自治运动是破坏伊朗统一的叛乱，于是向大不里士紧急增派政府军，但为苏军所阻。苏联的理由是，伊朗政府增派军队将加剧北部地区的混乱并“可能导致流血”，这将迫使苏联政府

---

①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6，оп.6，п.37，д.461，л.16-18，转引自 *Егорова Н.И.* Иранский кризис，1945-1946гг.，По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м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3，с.27-28。

②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17，оп.128，д.817，л.129，132об，转引自 *Егорова Н.И.* Иранский кризис，с.28-29。

③ АВПРФ，ф.06，оп.7，п.33，д.466，л.11，转引自 *Егорова Н.И.* Иранский кризис，с.31。

④ Kuniholm，*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p.272.

向伊朗增派军队以维护秩序和保障苏联边界的安全。[1]尽管伊朗政府一再提出抗议，美英政府也多次表示反对，但苏联坚持不能如期从伊朗撤军。直到伊朗把这一问题诉诸联合国，苏联军队才于1946年5月9日全部撤出伊朗。此后，伊朗的自治运动遭到镇压，苏伊石油合营公司也没有建立起来，斯大林对伊政策的目标化为泡影。

土耳其问题和伊朗危机对于战后苏联与西方的国家关系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这两次近东事件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斯大林在近东的行为就其本身来讲，虽然有扩大苏联在近东势力范围的动机，但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政策，所以面对美英的强硬态度，苏联采取了退却和调和的方针。苏联从伊朗的撤军，同它从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的撤军一样，表明斯大林的扩张企图是有限的，他仍然希望避免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产生直接的对立和冲突。[2]显然，苏联在近东超越雅尔塔协定的行为对西方产生的后果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第二，苏联的外交举措加强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协调与认同。战后美国地位的上升与英法势力的衰落使西方国家内部的矛盾有扩大化的趋势（美英之间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就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而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外交行为使西方国家共同感受到威胁，这即在客观上促成了西方国家的联合。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战后苏联在其周边地区广泛追逐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外交行为加强了西方国家的集团意识，加快了西方国家反苏联盟的形成。第三，苏联的外交举措加速了西方国家对苏政策的调整。这两次近东事件终于导致苏联与西方本来就不牢固的合作关系开始破裂，加深了双方的猜疑、敌视和对立。如果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没有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共鸣的话，那么凯南“遏制理论”和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则表明苏联在近东的行为已经使西方大国感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侵犯，并由此引起了他们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的调整。因此，可以认为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为苏联与西方大国之间形成集团对抗的局面敞开了大门。

---

① АВПРФ，ф.06，оп.7，п.33，д.467，л.15；д.466，л.12，转引自 *Егорова Н.И.* Иранский кризис，с.35。

② 关于苏联撤军的理由，斯大林在给比雪华里的信中说得很明白，尽管其中不少冠冕堂皇之词，但本质上是希望以此换得美国也从世界各地撤军，从而保持苏美均势与合作的基础。参见 АВПРФ，ф.06，оп.7，п.34，д.544，л.8-9，转引自 *Егорова Н.И.* Иранский кризис，с.40-42。

四、集团对抗：马歇尔计划及苏联的反应

苏联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遭受的挫折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国际事务中不能总是单枪匹马地采取行动，而有必要在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抗衡中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把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力量联合起来。就在苏联从伊朗撤军后不久，1946 年 5 月底 6 月初，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设想。在铁托访问莫斯科后所写的记事手稿中也记载了有关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事项。1947 年春天，斯大林在同波兰党领导人哥穆尔卡谈话时，又建议创办一份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刊物，并提出为此应召开一次有各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①] 这说明，在斯大林的头脑中，这时已经出现了在对外政策中以集团对抗为指导方针的理论雏形。

同时，美国及西方大国外交政策趋向强硬的态势也引起了苏联的注意。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 1946 年 9 月对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的长篇报告，充分说明了苏联对美国政策变化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斯大林调整对美政策的基础。[②] 诺维科夫报告开宗明义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倾向，其特点就是在战后谋求世界霸权。"报告认为，美国鼓吹的"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的政策，是目前通往大国合作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这一障碍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美国在战后不再奉行加强三大国（或四大国）合作的政策，而是竭力破坏这些国家的团结。其目的是要把别国的意志强加给苏联"。如果说凯南的八千字电文成为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那么诺维科夫的报告同样对于苏联采取对美强硬反击政策起了重要的论证和导向作用。

然而，真正促使斯大林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 1947 年 6 月出台的马歇尔计划。尽管此前不久美国宣布了杜鲁门主义，但在斯大林看来，杜鲁门的演

---

①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По новейшим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4，с.134-138.

② 诺维科夫的报告是按照莫洛托夫的旨意和指示写的。诺维科夫承认，"这篇报告只能有条件地被看作是我写的"，而莫洛托夫应是报告不署名的共同作者。见 *Новиков Н.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ипломата，Записки 1938-1947，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89，с.353。该报告的英文全文见 *Diplomatic History*，Vol.15，№4，1991，pp.527-558。莫洛托夫在报告上划了许多着重号，并作了大量批注。《外交史》杂志称其为电文，但诺维科夫本人回忆录说这是一篇报告。

讲不过是在口头上公开宣布了美国将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①]而马歇尔计划则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建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占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

俄国档案材料表明，马歇尔演讲中那种模棱两可的措辞使苏联领导人难以确认美国援助的目的。虽然诺维科夫和瓦尔加都分析到美国的意图可能是“阻止欧洲国家废除军备，增强反苏势力，为巩固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地位而创造条件”，但包括莫洛托夫在内，没有人反对参加马歇尔计划。他们最初希望美国的援助会使深受战争创伤的苏联得到经济利益，并通过参与这个计划的制订阻止美国控制欧洲以及建立反苏集团计划的实现。此外，因为德国资源在任何欧洲复兴计划中都起着巨大作用，所以对美国计划的讨论，可以被当做是一次重提德国赔偿问题的良机。[②]苏联不仅同意出席定于6月26日召开的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而且还鼓励它的东欧盟国参加马歇尔计划。莫洛托夫于6月22日电告苏联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大使馆，命令他们通知驻在国政府：苏联政府认为，他们“有必要在准备参与制定这样一个经济计划方面表现出主动，并宣布他们愿意参加会谈”。[③]当莫洛托夫抵达巴黎时，苏联代表团的人数达100人以上，如果他仅仅是为了拖延进程或在仪式上宣布拒绝参加，那么根本不需要来这么多人。代表团的规模本身就说明苏联有意参与这场重要的谈判。但是，苏联与英法的意见根本无法协调。主要分歧有两点：(1) 马歇尔所设想的是一个单一的、联合的欧洲计划，而苏联认为计划必须建立在各国只是松散合作，而援助则建立在各国分别提出要求的基础上。苏联担心一个联合计划会促使东欧经济与西欧的结合，并将继续使东欧各国处于原料供应国的从属地位。(2) 在德国问题上，莫洛托夫希望得到保证，无论德国如何加入援助计划也不能损害支付合理的赔偿或者导致德国工业实力的增长。英法拒绝同

---

① 苏联新闻界对杜鲁门宣言的反应是比较温和的。《新时代》批评这个演讲以及对“法西斯主义”的希腊和土耳其政权的援助，指责美国谋求世界霸权，但同时又指出，在美国，“具有长远目光和谨慎的人”是不会赞同这个新政策的。苏联驻纽约领事 Я. 罗迈进（洛马金）也向莫斯科汇报说，杜鲁门主义“在公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对浪潮”，“70–80% 的美国人反对为了杜鲁门所说的理由而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因为这些人担心杜鲁门计划“会导致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战争”。见 Scott D. Parrish, “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The Soviet Reaction to the Marshall Plan, 1947”, *Working Paper*, CWIHP, №9, March 1994。

② АПРФ, ф.3, оп.63, д.270, л.12, 转引自 *Наринский М.* СССР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2, с.12-13。参见 Parrish, “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③ АВПРФ, ф.06, оп.9, п.18, д.214, л.19, 转引自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92, №5, с.125。

意苏联提出的条件。当英法明确表示不能同意苏联的提议之后，莫洛托夫激烈地斥责西方国家，继而退出会议，扬长而去。实质上，西方国家试图强加的那些条件，正是苏联领导人在会谈前的分析中已经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条件。莫洛托夫在7月3日的最后演说中指责这个计划“将会导致英国、法国以及追随他们的国家把自己与其他欧洲国家分离开来，这会把欧洲分裂成两大阵营，并在他们的关系中制造新的障碍”。[①] 斯大林明显地看到，一旦苏联接受了英法方案就意味着允许西方势力渗入东欧经济，自从1945年以来通过一系列的双边协定确定下来的有利于苏联的东欧贸易方式就会按照一项全欧洲计划改变方向。同时，这种与西欧的重新结合还会加强东欧国家中一直希望摆脱苏联控制的反抗势力，进而把东欧重新融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特别是德国的复兴更是对苏联安全的直接威胁。所以，马歇尔计划的根本目的就是利用美国的经济力量来破坏苏联战后在东欧建立起来的安全带，而把这一安全带上的缓冲国变成向苏联扩张和进攻的前线。说到底，马歇尔计划替代了以前西方大国的无组织行动，企图使欧洲国家在经济、政治上依附于美国资本并建立一个反苏集团。这表明美国的对苏政策已经呈现出企图颠覆苏联国家安全的进攻态势。对于如此涉及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苏联立即采取了强硬的集团对抗措施。

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是对外政策的全面改变。为了确保东欧国家能够与苏联组成强大的对抗西方的利益集团，斯大林首先需要统一和规范东欧各党和各国的行动。当苏联决定对马歇尔进行抵制后，立即于7月8日和9日向东欧各党领导人发出急电，“建议”他们拒绝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不得向会议派出代表团”。对热衷于参与马歇尔计划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斯大林则把这两个国家党的领导人召到莫斯科，严厉训斥并迫使他们屈从于苏联的主张。[②] 同年7月底，当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宣布将研究和协商两国间的友好互助条约时，斯大林又严词斥责这一行动是“匆忙”的和“错误”的，并强调它“没有同苏联政府协商”。[③]

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加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和控制，苏联政府在7月10日至8月26日分别与保加利亚等六个东欧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即所谓的“莫洛托夫计划”。莫洛托夫计划巩固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把这些国家的

---

① АВПРФ，ф.06，оп.9，п.18，д.215，л.96，转引自 Parrish，“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② 详见 *Наринский М.* СССР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Parrish，“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③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с.142.

经济纳入了苏联模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圈，奠定了苏联－东欧集团的经济基础。

苏联对外战略改变在组织上的表现就是成立了一个新的欧洲共产党协调中心，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不过，与共产国际不同的是，共产党情报局完全局限在欧洲地理范围之内，因此它的组成显然是对马歇尔计划构成的明显威胁的反应，而不是在新阶段发动世界革命的前奏。斯大林的目的还是要通过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加强对东欧各国以及欧洲各党的控制。所以，尽管苏联在邀请各党参加会议的通知上只说是交流情况和创办一个刊物，但会议筹办人日丹诺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却明确提出，苏联将在会议上提出“以情报局形式建立与会各党的协调中心的想法”。[①] 会议形成的政策性结果有两条，即在东欧各国取消各党的民主联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党仍然固守的合法斗争策略，而主张通过罢工等革命行动与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特别是苏联在会议上提出的“两个阵营”的理论，表明在马歇尔计划之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大国合作的轨道，而走上了与西方进行集团对抗的新路。[②]

正是马歇尔计划的结果使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以前的利益冲突呈现出以冷战为特征的战争态势。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以及苏联对此的反应大大加速了双方集团形成的进程，欧洲终于出现了两个相互隔绝和平行的经济市场和根本对立的政治集团，并为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至于说到冷战的起源，应该把它理解为一个互动的双向过程，是双方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根本利益以及为这一利益服务的对外战略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结果，是双方相互遏制和相互对抗的产物。不过，对于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而言，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则是苏联外交战略乃至总体发展战略的转折点。此后，随着美苏在欧洲对抗的加剧，苏联核武器试验的成功，中国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进展，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变得更具进攻性和挑战性，并奠定了其后40年苏联冷战战略的基础。

发表于《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本文第二作者张盛发）

① 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0，л.11，转引自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с.139。

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丹诺夫报告的初稿中本来没有“两个阵营”的提法，这一概念是在请示了斯大林之后加进去的。这显然说明苏联领导人是在马歇尔计划提出后，下定了与过去的合作政策决裂的决心。参见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Parrish，“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

——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

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与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冷战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之一。然而，由于有关的档案文献很少公布于众[①]，从1947年9月成立至1956年4月解散，情报局短短9年的历史却长期处于隐秘状态之中，专门的研究著作也是寥寥无几[②]。直到90年代初俄国档案开放后，有关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才陆续披露出来[③]。在此基础上，俄国、东欧和西方学者展开了对

---

① 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当年曾经刊登过情报局会议的部分文件，在此基础上苏联在1948年和1949年分别编印、出版了单行本：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некоторых компартий в Польше в конце сентября 1947 года 和 Совещани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 бюр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в Венгр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ровине ноября 1949 года。这两本文集都有中译本，即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文献》和195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然而，作为史料，这些文集有两个不容忽视的缺陷：所公布的文件选择性极强（例如缺少许多与会者的发言记录），并且经过了双重修改（文件作者本身和苏联编者）。苏南分裂以后，南斯拉夫方面通过报纸，特别是回忆录、传记的形式披露了一些上述文件中没有的材料，但所增加的内容极为有限，而且同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在此基础上，1975年英国出版了斯蒂芬·克利索德编辑的《南苏关系（1939–1972）：文件与评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②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是西方学者开始的，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乌拉姆的著作（Ulam，*Titoism and the Cominform*，Cambridge，1952）。此后比较深入的研究当属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克劳丁1970年出版西班牙文专著《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③ 新的档案文献首先在一些俄国学者发表的论文中不断得到引证。1994年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与意大利费尔特里内利基金会（米兰）合作，编辑出版了 *The Cominform: 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1947/1948/1949*，首次用英文公布了共产党情报局三次会议的几乎全部文件。1998年俄国单独出版的该书俄文版（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1948/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不仅补充了对于研究来讲非常重要的注释和经过修订的研究论文，而且作为附录，新公布了许多苏共领导人之间关于这几次会议的往来电报。

共产党情报局历史的颇具价值的研究[①]，从而把有关冷战形成的讨论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令人感兴趣的是，学者们看到和使用了大体相同的史料，却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关于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目的，一般都认为是莫斯科想找到一种对欧洲共产党施加影响和监督的工具，但研究者之间也存在一些明显不同的判断。有人强调苏联领导人力图加强自己对东欧占领区的控制[②]，有人则更看重与莫斯科对西欧战略政策的关系[③]。有人认为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恐惧导致了共产党统一指挥机构的成立[④]，也有人指出斯大林提出召集情报会议的问题是在马歇尔发表援助欧洲的演说之前，因而不可能是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⑤]。有人指出情报局的建立是为了使苏联情报系统的工作更加有效[⑥]，还有人认为情报局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共产国际[⑦]。

那么，共产党情报局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其目的何在，与欧洲冷战格局的形成又有什么关系呢?

本文拟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其出发点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新的档案文献表明，共产党情报局的产生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而非莫斯科对一时一事的

① 除上述文件集中选编的重要论文外，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论著还有俄国学者阿季别科夫的专著（*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Москва，1994）和论文（Попытка коминтернизации Коминформа в 1950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4-5；Начало конца Коминформа.//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Москва，1998；Молотов и попытки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оминформа в 1950-1951 годах.//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7），吉比扬斯基的论文（*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рия，1993，№4；*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1947-1948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2）。英文著作中作为重要章节涉及这一问题的有祖伯克、普列沙科夫（V. Zubok, C.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Cambridge, London,1996）和马斯特尼（V.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New York, 1996）的专著，还有一些颇值得参考的论文（N.I.Egorova，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minform,1947-1953；Anna Di Biagio，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Cominform, June-September 1947，F.Gori, S.Pons ed.，*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1953*，London-New York，1996）等等。至于中国学者，严格地说，对于共产党情报局的深入研究还没有展开。笔者只见到几年前的一篇论文（孙耀文：《论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

② V. Zubok, C.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p.125.

③ V.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pp.32-33.

④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с.24-26，226-227；V. Zubok, C.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pp. 130-131；V.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p.30.

⑤ *Гибианский* Долгий путь к тайнам: историграф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c.XLII；Biagio，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Cominform, pp.208-209.

⑥ *Бьяджо А.Ди.*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c.22.

⑦ V.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p.26.

反应；斯大林对于是否建立这种国际机构，特别是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机构的考虑，是随着欧洲事态的发展而变化的；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过程与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演变以及冷战格局的形成是同步的，其最终结果导致了冷战的开始。

一、解散共产国际和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确立

从斯大林掌管苏联政权起，特别是在“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以后，列宁所创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逐渐改变了其功能，即从共产党组织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降格为莫斯科推行其外交政策的附属品和二等工具（对比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而言）。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①]。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利于苏联开展外交的副作用——莫斯科因领导共产国际而成为各国政府集中攻击的对象。此外，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状态，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指示随苏联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地位和策略的变化而显得反复无常，杂乱无章。正是这种状况，迫使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就考虑到应解散已经成为苏联负担的共产国际了。1941 年 5 月 12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苏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终止共产国际活动的问题，并得出结论：“在现阶段，最重要的不是把各国的运动引向一个国际中心，而是把重点放在每个国家中的运动及其领导，竭力使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得到发展，使这些党善于由他们自己来领导本国的工人运动，善于由他们自己来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和组织，在完全和充分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才能的同时为本国的工人运动担负全部责任。”这种考虑的实际目的在于摧毁“所有反共产国际公约”的基础，打掉资产阶级因本国共产党反对战争而指责其为“叛徒”这张王牌。不过，“这项工作并不十分紧急，不应匆忙，而应加以认真的讨论和准备”。[②]

当苏德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当苏联确定必须建立巩固和长期的反纳粹德国同盟，并感到需要同英、美盟国建立新型的相互关系时，解散共产国际已经成为当务之急[③]。1943 年 5 月 23 日斯大林在答记者问时说明：解散共产国际是因为必

① 近年公布的俄国档案文献反映了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见 РАН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 I, до 22 июня 1941г., Москва, 1994；Часть II, после 22 июня 1941г., Москва, 1998。

② *Димитров Георги* Дневник（9 марта 1933 - 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1997，233-234.

③ 1943 年 5 月 20 日斯大林在电话中要求尽快公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4-375.

须驳斥共产主义敌人所制造的“谣言”，即莫斯科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布尔什维克化”，以及各国共产党都服从于外国的命令[①]。斯大林这一说法并非完全虚言，为了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和推动西方盟国开辟第二战场，莫斯科必须对国际舆论有所交代。不过，解散共产国际的举动没有发生在对于苏联来说是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1941年和1942年，而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苏联战场局势以后的1943年，这说明莫斯科的考虑绝不是仅仅着眼于战争的胜负，其中还蕴含着斯大林为战后国际安排和苏联外交政策奠定基础的长远打算。也许应该更确切地说，问题的实质在于，战争引起的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为苏联放弃孤立主义外交思维提供了契机，而斯大林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与西方大国合作这一历史机遇。

从1943年初，苏联驻英、美使馆就开始通过电报与莫斯科讨论战后世界的格局问题。1944年1月，驻英全权代表马伊斯基在给莫洛托夫（后转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长信中，分析了战后国际形势和苏联的主要目标，坚持认为“应该创造出这样的局势，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证苏联的安全并最低限度地保持欧洲和亚洲的和平”，以使苏联能够强大起来。而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导致苏联与两个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是对抗。除非在德国爆发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否则，苏联还是应当与同盟国进行合作而不是与之进行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因此，苏联“可能的和可行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应当是“加强同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友谊”。[②]几个月后驻美大使葛罗米柯也做出了判断：美国会对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苏联的合作感兴趣，双方的目标将会大体一致。[③]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同年7月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更强烈地主张双方合作。对于战后苏联应当“同盟国合作还是断绝所有联系”的问题，他回答说：“我们必须寻求某种形式的合作，以得到至少是几十年的和平。”[④]莫洛托夫后来也承认，当时认为继续

---

① *Бьяджо*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c.21.

② 马伊斯基致莫洛托夫电，1944年1月11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 оп.63, д.237, л.52-93// Источник，1995，№4，c.124-144。凡直接引注的档案文献，笔者存有复印件。

③ 葛罗米柯：“关于苏美关系问题”，1944年7月14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6，оп.6，п.45，д.603，л.1-34. 转引自 Vladimir 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 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Working Paper，No.13，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95），p.6。

④ АВПРФ，ф.06，оп.6，п.14，д.141，л.23-24.35. 转引自 V. Zubok, C.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p.30。

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苏联是有利的，是很重要的。[①] 正如葛罗米柯在一次秘密谈话中回忆的，1944 年 9 月参加顿巴敦橡树园会议时，斯大林“确实期望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战后进行长期合作”。[②]

基于这种战略考虑，当丘吉尔于 10 月 9 日提出英苏两国在东南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方案时，斯大林态度十分积极。经过艾登和莫洛托夫的详细讨论，最后双方达成一致：英国承认苏联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而苏联领导人也承认英国在希腊的势力范围，至于南斯拉夫，双方各占一半。[③] 显然在并不知道这一交易的情况下，李维诺夫于 11 月 15 日在题为《苏英合作的前景及其可能的基础》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避免战后与英国在欧洲的冲突，应该事先划定双方的“利益范围”。他向莫洛托夫描述了苏联在战后所应要求的“最大利益范围”，这包括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土耳其。英国的利益范围可包括：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而挪威、丹麦、奥地利和意大利则作为缓冲地带。[④]

为了实现这种外交构想，苏联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的战略方针中，就不能再提世界革命，也不需要各国建立共产党单独政权。在其势力范围内，苏联努力促成匈、保、捷、波，甚至南斯拉夫建立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⑤] 例如，1945 年 1 月初斯大林向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建议：目前不要提国有化问题，尽量不要吓着和排斥包括塔塔列斯库集团在内的资产阶级阶层，应建立全国民主阵线政府。[⑥] 莫斯科还指示芬兰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牢固的政府”。[⑦] 即使对那些已经出现了革命迹象的亚洲国家，如中国、朝鲜和伊

---

① 菲·丘耶夫：《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 140 次谈话》，刘存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66 页。

② V. Zubok, C.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p. 27.

③ 过去学术界曾对此质疑，俄国学者引用档案文献证实了这个著名的百分比协定的存在，见 *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И.В.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з, 1944-1947гг.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рия, 1996, №1, с.19。

④ АВПРФ，ф.06，оп.6，п.14，д.144，л.22，28，44. 转引自 V. Zubok, C.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p. 30。另见 Сталин и Торез，с.19。

⑤ 有关这方面的俄国档案文献已经大量公布，笔者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3、24 和 26 卷收入了这些文件。

⑥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458.

⑦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77，оп. 3с，д.60，л.7，40；д.63, л.33。转引自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Новое рочмение，Москва，1995，с.89-90。

朗，苏联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①] 至于在西方势力范围或中立地带，克里姆林宫给共产党的指示仍然是从这种地缘政治构想出发的。斯大林在 1944 年 3 月 3 日夜里接见即将回国的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时，建议彻底修改意共的政治方针：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共产党人可以进入巴多利奥政府；主要应致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季米特洛夫还委托陶里亚蒂将这一精神传达给法共。[②] 同年 11 月 19 日，即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出访莫斯科前夕，斯大林同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了会谈。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既没有谈到世界革命，也没有提出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共产党人掌握政权的问题。莫斯科关心的是使法国尽可能快地成为英国和美国在欧洲大陆势力的平衡力量，成为苏联潜在的同盟者。因此，斯大林强调指出，法共不要保留武装力量，不要挑起同现政府的冲突，而应该尽量与激进派，尤其是社会党建立左派联盟，积极参加"复兴强大的法兰西和加深民主制运动"，及正规军队的恢复工作，以促使法国政府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甚至共产主义青年团最好也不要恢复，可以建立人民青年联盟。[③] 为了保证英国对希腊的控制权，莫斯科还要求希共接受苏联关于在希腊建立统一临时政府的建议，并迫使他们在 1945 年初自行解除了武装。[④]

当然，莫斯科解散共产国际并非要放弃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而只是改变了领导形式。一方面，斯大林在 1946 年 5 月 11 日对联共（布）领导人解释说："经验表明，不能有一个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马克思、列宁生前是这样，现在也是如此。也许，应该过渡到地区性的联合，如南美；美国和加拿大；某些欧洲国家，等等，但对此不能着急。"[⑤] 斯大林后来曾多次谈到欧洲的区域联邦问题，恐怕都是源于这一思想。另一方面，莫斯科于 6 月 12 日在共产国际组织机构和干部队伍的

---

① 此期苏联对中共和朝共的政策，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二章（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 年）。关于斯大林劝伊朗人民党放弃革命的情况，见 *Егорова Н.И.* Ира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5-1946гг., По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м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рия, 1994，№3，c.41。

② РЦХИДНИ，ф.495，оп.74，д.259，л.8. 转引自 Сталин и Торез，c.19-21。

③ 斯大林与多列士谈话记录，1944 年 11 月 19 日，АПРФ，ф，45，оп.1，д.390，л.85-93// Источник，1995，№4，c.152-158。另见 Сталин и Торез，c.21-23；*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c.448。

④ P.J. Stavrakis，*Moscow and Greek Communism*，*1944-1949*，Ithaca，N.Y.，1989，p.32；J.O.Iztrides，*Revolt in Athens: The Greek Commuist "Second Roound"*，*1944-1945*，Princeton，N.J.，1972，pp.156-7. 转引自 R. Craig Nation，A Balkan Union? Southeastern Europe in Soviet Security Policy, 1944-8，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p.131. 根据这一精神，1944 年 12 月 9 日季米特洛夫通知一向积极支持希腊革命斗争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当前形势下，希腊同志不能指望从这里会有积极的干预和帮助"。见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c.451。

⑤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c.372；*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c.6；*Адибеков* Как готовилось перв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c.3.

基础上成立了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负责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贯彻苏共的意图，季米特洛夫仍然是实际领导者[①]。这样，既能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与西方全面合作的环境，又能保证莫斯科对各国共产党行动的指挥。不过需要指明的是，这同构建一个集团性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有根本的区别，否则就没有必要解散共产国际了。

二、重建国际组织的设想和国际关系背景

在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组建政府时，莫斯科逐步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②]季米特洛夫回国组织保加利亚政府后不久，国际情报部即改组为对外政策部[③]就是一例，这意味着对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将在苏联外交中起更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提出了恢复某种共产党国际机构的问题。

目前看到的史料，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南斯拉夫。据苏南分裂后南斯拉夫的官方说法，1945年4月铁托访问莫斯科时，向斯大林建议重建一个协商性的国际组织，目的在于交换意见和交流经验。斯大林对此表示“大为赞许”。[④]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任何文献资料及当事人的证实，所以，铁托究竟提出了什么建议，以及斯大林“赞许”的是什么性质的“国际组织”，不得而知。

根据档案文献的记载，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在1946年4月20日布达佩斯党组织书记代表会议上谈到了建立新国际的问题[⑤]，在5月17日的中央会议上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拉科西首先肯定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必要性，接着指出：“不能把新的国际等同于以前的国际。新的国际不是一个组织性的机构；它的任务将是进行调解，在遇到挫折时提供帮助和把一国共产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传递给别国共产党，使它们能够学习其他党的经验和吸取其他党失败的教训。这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不仅仅是我们，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开始感到，如果不就经验和错误进行交流的

---

① 关于国际情报部的成立，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记载：“为使敌人不能利用该部是由季米特洛夫领导这一事实，决定任命什切尔巴科夫为部长，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为副部长。本决定不予公布，而该部的工作将按内部工作制度予以组织和实施。”*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81.

② 有关档案文献见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 Том. I，1944-1948гг.，Москва，1997。有关部分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2-26卷。

③ 对外政策部1948年7月改名为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1949年3月改名为对外政策委员会。

④ 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铁托传》下册，叶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第88页。

⑤ *Гибианский* Долгий путь//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с.XXXV.

话，它们就无法制定有关国际问题的正确的方针。我们现在想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国际，这种国际将有益而不是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①] 拉科西的说法很可能事先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甚至就是斯大林的授意。这样说，不仅是考虑到拉科西刚刚见过斯大林[②]，更因为不久后斯大林本人就以同样的口气直接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6月8日斯大林与铁托的会谈及会谈后举行的招待南、保领导人的晚宴上，根据铁托回国后整理的札记和南斯拉夫的官方著作，斯大林问铁托是否还认为有建立一个具有情报性质的新国际的必要。铁托表示同意后斯大林建议说：“最好由你们南斯拉夫人发起。”斯大林还指出，不应以任何形式恢复共产国际，但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情报机构，以便经常开会，交流经验，“协调一般性工作”，以及“调解个别党之间的各种分歧”。在讨论由谁倡议成立这一新组织时，斯大林问季米特洛夫，谁可担当此任——是季米特洛夫、铁托，还是法国共产党；季米特洛夫说让铁托担任，而铁托认为法国人比较合适。札记里特别指出，新机构“不能发号施令”，不能对持不同意见的党采取“压制性措施”，应“认真考虑一些国家的特点”。[③] 十几天后在与保加利亚领导人会谈时，根据（可能是科斯托夫所做的）记载，斯大林说：“我们任何时候也不恢复旧形式的共产国际。旧的共产国际是按照马克思的示例建立的，它认为，在所有的国家同时出现革命。这与我们今天的思想体系是不相符的。”[④] 这些说法至少表明了一种情况：鉴于共产国际在共产党内部也很不得人心，关于新国际的最初构想并不是要重建共产国际。

新的档案文献进一步反映了苏共对这一问题的态度。1946年9月20日，捷共一名“表现一贯积极和忠诚”的普通党员赖赫里直接给斯大林写信，提出了恢复共产国际的问题，并建议把未来的共产国际“建立成国际政治机构”，或类似梵蒂冈一样拥有自己领地的权力机构。[⑤]1947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对

---

① 这份来自匈牙利的档案文件是布达佩斯历史研究所贝克什提供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的，见 Csaba Békés, Soviet Plans to Establish the Cominform in Early 1946: New Evidence from the Hungar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10, March 1998, pp.135-138。

② 据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访问者登记簿记载，4月1日22时30分至24时50分，斯大林与拉科西进行了交谈。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6, №4, с.121.

③ 德迪耶尔：《铁托传》，下册，第88–89页；*Гибианский*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перио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в 40-е годы.//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1995, с.113-114.

④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策档案馆，全宗1，目录5，А.е.3，第138页。转引自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 №2, с.33-34。

⑤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903, л.75.

此提出了结论性意见，并报告给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报告否定了赖赫里来信的建议，认为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已经失去现实意义”的断言毫无根据，而提出“恢复共产国际”这一形式的问题，是“忘记了此类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具体的国际形势，不能不考虑到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报告还分析说，“这一问题的提出，无疑是反映了国外某些共产党人寻求对有关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前景问题的答案的愿望，因为这些问题使他们感到焦虑和不安。另一方面，国外共产党人提出类似问题，也同近期以来在各式各样的政党（首先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以及在它们的报刊上展开的关于革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陈旧过时’等等的争论有一定联系，并部分地是由这些争论而引起的。”鉴于一些新党员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报告认为，“对上边提到的一些问题进行批判性的认真分析，并阐明我们党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从帮助国外共产党的角度来说将具有重要意义。”[①]

如此可以断定，到 1946 年 4—6 月，苏联和一些欧洲共产党已经在考虑组建新的国际机构了，但同样应该肯定，这并不表明斯大林有意恢复共产国际这种组织形式。在战后欧洲各国新政府建立的过程中，苏联的确需要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需要有某种机构来实现这种控制，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之间出现了大量涉及领土、民族问题的矛盾，例如匈牙利与罗马尼亚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争端频频，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在特欣西里西亚问题上吵闹不休，匈捷在处理捷克境内匈牙利居民问题上冲突不断，捷克与斯洛伐克在民族问题上也是矛盾重重。所有这些麻烦都反映到莫斯科，甚至要斯大林本人出面解决，令人颇感烦琐。况且有些问题还涉及苏联的利益，由莫斯科的某个机构出面进行调解也有谋私之嫌。第二，在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需要的一些问题上，苏联本身与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这些政权都控制在共产党手中——也存在许多矛盾，如在喀尔巴阡乌克兰及战利品问题上与捷共的分歧，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与南共的冲突，在拆迁工业设备问题上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不满情绪，等等，解决这些矛盾也要求在各党之上有一个公共机构。第三，与战争期间不同，战后东欧各国受到苏联的影响和控制，其发展道路已趋向一致。在建立亲苏政府、排挤右翼政党、扩大共产党的势力、解决与社会党的矛盾等众多问题上，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方针大体同步，因此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协商中心。而从国际舆论以及各国党能否接受的角

①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903，л.89-95.

度考虑，由苏共下属部门出面当然不如建立一个至少在表面上超然的共产党国际组织。[①]

然而，这与恢复共产国际或建立类似的机构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有学者认为，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同国外共产党进行联系和实行监督方面的作用加强了，甚至超过了共产国际，因而完全有理由被看成是共产国际的继承者。[②]这种看法忽略了苏共党内机构与国际组织在性质上的区别。尽管对外政策部扩大了编制、职能和权力[③]，其指挥各党的作用与共产国际也确有相同之处，但从对外关系的角度讲，这还只是一种双边关系的问题，而与构成国际集团在性质上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还有学者认为，提出建立协商性机构只是一种“策略手段”，其本意在于使各共产党领导人容易接受建立新国际的设想。[④]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当时欧洲各共产党的实际状况——东欧各党诚然与苏共有密切关系，但也必须顾及政府其他党派的反应，而法共、意共和南共则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也没有考虑到当时苏联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如果莫斯科此时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指挥各国共产党，如果斯大林此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与西方国家合作的外交战略，那么可以认定苏联确实要重建国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看来，正确理解斯大林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协商性国际机构的意图，首先需要对当时国际关系的背景和苏联对外方针的基调有一个合乎实际的判断。很多学者认为，从1946年初苏联就改变了与盟国合作的方针，此后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冷战已经形成。[⑤]显然，这是断定此时苏联已经有意建立新国际及其性质的理论前提。这里有一个对冷战格局形成的界定问题。冷战的形成固然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人们完全可以用冷战起源的概念来描述这一量变的过程[⑥]，但冷战格局的形成则表明矛盾的本质已经改变，其标志至少有两个方面，即矛盾的双方（而不是任一单方）已经制定出较完整的冷战政策；在这一政策的基础上各自在一定势力范围内

① 上述问题在俄国档案文献中均有详细的反映，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1、22、23、24和26卷。

② *Бьяджо*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с.22.

③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с.14-15.

④ *Гибианский*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с.113-114.

⑤ Scott D. Parrish，“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The Soviet Reaction to the Marshall Plan”，Working Paper CWIHP，No.9，1994，pp.5-6.

⑥ 只是在这一概念的范围内，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把冷战根源追溯到20世纪初。

组建了国际集团。[①] 而这些现象到 1947 年初尚未出现。

仔细分析斯大林 1946 年 2 月的演说[②]就不难发现，这完全是从传统的理论出发对战争进行总结，宣传苏共政策的成就和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是对内统治的需要而不是在解释对外政策。此后丘吉尔在富尔顿的“铁幕”演说[③]不过是借题发挥，斯大林对此看得非常清楚。日丹诺夫在与季米特洛夫讨论国际形势时（9 月 4 日）传达了斯大林的看法：“近期不会发生新的战争，事态发展非常平稳，”如果“根据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内容而不是外表”分析当前局势，苏联的看法是：“一切正常。”“英美掀起的喧闹和以新战争相威胁，那不过是恫吓而已。”[④] 基于这种分析，斯大林在 9 月 17 日答英国记者问时说，苏联和外部世界“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减少，甚至能够增加”。他还说，在一国，特别是像苏联这样的国家，不仅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甚至可能建立共产主义。[⑤] 这显然是在向西方保证共产主义运动将限制在苏联国内[⑥]。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最初采取的强硬立场，只能说明莫斯科打算在经济利益（伊朗北部油田）和安全保障（土耳其海峡）方面获取雅尔塔协定尚未规定的额外收益，而非有意侵害或对抗西方国家，何况还在英美干预的情况下迅速地转入了退却。至于希腊危机，与苏联并无关系，本来就是西方国家的错误判断。对于冷战史研究中经常提到的诺维科夫电报[⑦]，学者们较多注意到诺维科夫对美国反苏政策的分析，对美国把苏联作为未来战争对手的判断——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往往忽略了一点，诺维科夫和莫洛托夫依然相信，站在传统的马列主义立场上，对这种战略威胁的正确反应是发现并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他们期待美英之间冲突的最终爆发。这就是说，苏联虽然意识到美国的威胁，但其

---

① 关于冷战的概念，冷战形成的主要因素和标志，冷战历史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笔者拟专文论述。

② 全文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选（1943–1952）》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 441–454 页。

③ 关于丘吉尔 1946 年 3 月 5 日演说的最新研究见 *Злобин Н.В.* Неизвестные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выступлении У.Черчилля 5 марта 194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рия, 2000, №2。

④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535.

⑤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选》，第 478 页。

⑥ 是年夏天，苏联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代表都努力制止共产党的左倾激进主义（АВПРФ, ф.0125, оп.34, п.11, д.130, л.38；ф.074, оп.34, п.10, д.115, л.13-14）。在与捷共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斯大林也要他们相信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见 *Мурашко*，*Носк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с.90。

⑦ 1946 年 9 月 27 日，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在莫洛托夫的授意下提交了一份分析苏美关系的长篇报告，美国《外交史》很早就公布了这个文件，并展开讨论。见 *Diplomatic History*，1991，V.15，No.4。

对策并非立即转入与之抗衡，而是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的立场。所以，杜鲁门主义可以被看做是美国政策发生转变的冷战宣言[①]，但斯大林并没有从中看到明显的威胁[②]，除了口头谴责外也没有做出其他激烈的反应。[③]

当杜鲁门发表演说的时候，莫斯科正在召开五国外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会议初期，苏联报纸的报道是全面的，而且避免使用尖刻的语调评论西方。莫洛托夫在讨论议程时也表现得异常宽容，并接受了马歇尔和贝文的建议。[④] 即使在会议遭到挫折以后，斯大林也没有放弃继续协商解决问题的努力。4 月 9 日他对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史塔生指出，“两种制度当然能够彼此合作”，美苏之间“不应醉心于批评彼此的制度”，“应该尊重人民所赞同的制度。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合作”。[⑤] 在 4 月 15 日会见马歇尔时，斯大林对美苏合作的前景仍表现出一种乐观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不过是第一次小小的争论以及双方带有试探性的交锋。在其他问题上分歧早已出现了，通常当人们自己厌倦争论的时候，就会感到有必要进行妥协。这次会谈可能不会有什么成果，但这不应使任何人感到失望。”斯大林又补充说：“在诸如废除军备、德国政体、赔款及经济一体化等主要问题上，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需要的是耐心而不应是悲观。”[⑥]5 月 16 日《新时代》又发表重要社论说：“莫斯科会议的价值在于各国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都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倘若各国都有良好的愿望，这就为必不可少的——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协调不同观点并达成一致协议的工作扫清了道路。”[⑦] 由此可以说，直到 1947 年春天，尽管分歧和矛盾不断发生，

① 这里应插一句，霍罗维茨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所谓苏联扩张的压力只能是（美国）采用遏制政策的一个借口而不是决定这种政策的原因。”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上海市“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9 页。

② 斯大林得到的信息是多数美国人反对杜鲁门宣言。苏联驻纽约领事罗迈进在向莫斯科报告：杜鲁门主义“在公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对浪潮”，“毫不夸张地说，70%–80% 的美国人反对为了杜鲁门所说的理由而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这些人担心杜鲁门计划“会导致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战争”。罗迈进致苏联外交部，1947 年 4 月 19 日，АВПРФ，ф.0129，оп.31，п.192，д.12，л.19。转引自 Parrish，“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pp.11-12。

③ 盖迪斯对杜鲁门主义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就其对苏联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它并不像后来所渲染的那样起到了转折点的作用。”John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 *Foreign Affairs 52*（1973–1974），pp.386-402。转引自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p.26。

④ 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第 52 页。

⑤ 《斯大林文选》下册，第 492–493 页。

⑥ 马歇尔与斯大林会谈备忘录，1947 年 4 月 15 日。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 *FRUS*），1947，Vol.2，pp.343-344。

⑦ 转引自 Parrish，“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pp.10-11。据帕里什考察，《新时代》杂志表面上是由一个苏联工会组织出版，实际上出自莫洛托夫的办公室，这位外交部长常常亲自编写重要社论。

但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尚未最后破裂，即使杜鲁门宣言标志着美国政策的根本转变，苏联方面也还没有制定出相应的基本方针。既然冷战没有发生，斯大林也就没有必要重建共产国际。

这一点不难理解，由于在力量对比中苏联处于软弱地位，无论其长远意图如何，也不会主动采取冒险的进攻行动；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决策者在战略上有可供选择的回旋余地，而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采取公开决裂的立场的。正是鉴于这种考虑，斯大林不可能主动恢复共产国际，因为这一举动无疑表明苏联已决心再次运用意识形态的武器与西方对抗到底；或许正是为了避免引起西方的猜疑，即使对于建立协商性机构的主张，莫斯科也拖延了整整一年而没有付诸实施。

三、召开情报会议的初衷和苏共构想的变化

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苏联真正实施建立共产党国际协商组织的步骤开始于1947年6月4日，也就是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援助欧洲演说的前一天。6月2日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抵达莫斯科，目的是休假和治病。6月4日深夜，斯大林会见了哥穆尔卡。[①]据哥穆尔卡后来回忆，斯大林建议他以波兰工人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为组建共产党国际出版机构召开一次会议的倡议。这是在一年后重提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的思想，但这次斯大林要求立即实施。哥穆尔卡通过信件向波兰党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6月8日波兰工人党政治局召开会议，宣读了哥穆尔卡的来信，最后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并委托公安部长拉德凯维奇选择会址。7月2日回国前几小时，哥穆尔卡再次见到斯大林，并通报了有关未来会议的安排情况。[②]从时间上看，无论斯大林这次提议的真实目的如何——是仅仅召开一次协商会议，建立出版机构，还是表面上以此为由召集各国共产党开会，实际目的则是像3个月后确实发生的那样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有一点却是很清楚的：它不是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而是另有原因。那么，在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4月24日）和马歇尔计划提出（6月5日）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斯大林必须重提建立国际组织的问题呢？

---

① 参加会见的还有莫洛托夫以下十几位苏联领导人，可见此次谈话之重要。见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6, №5-6, с.14。

② *Гибианский* Долгий путь//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XXXIX-XLI;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с.114-115.

事情发生在西欧两个影响最大的共产党身上。法国共产党因其在战后大选中得票率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而声名卓著，舆论甚至认为只有共产党参加的内阁才能治理法国。但法共在与拉马迪埃政府合作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相继在印度支那战争、马达加斯加叛乱和冻结工资等问题上向政府发难并摊牌，导致法国总统于5月4日免去了5名共产党部长的内阁职务，共产党被赶出政府。意大利共产党是在人数上仅次于苏共而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大党，在欧洲历史上颇具影响。在1947年2月组成的加斯贝利第四届政府中，共产党与南尼领导的社会党人结成联盟，经常制造难题，导致加斯贝利5月13日辞职。而5月31日重新组建的天主教民主党和无党派联合政府则完全排斥了共产党。大体同时，比利时政府中的共产党阁员辞职，卢森堡新政府也没有再吸收共产党人参加。[①] 这种状况对苏联战后奉行的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的政策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西欧共产党采取的步骤根本没有同苏共商议，甚至没有进行通报，莫斯科事前对此一无所知。作为各国共产党的领头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克里姆林宫竟然失去了与西欧大党的联系，并因此处于被动和尴尬的地位。这一连串事件使斯大林颇为恼火。于是，通过建立某种机构和加强协商以避免各国共产党摆脱莫斯科控制的问题，便刻不容缓地提上了斯大林的议事日程。

6月2日，日丹诺夫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给多列士发出一封加急信，信中说，苏联领导人不能理解"在法国发生了什么"以及"是什么动机引导了共产党"；"对联共（布）中央来说，法国国内形势和力量对比朝着不利于共产党人的方向发展是完全没有意料到的"；"许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人是在同联共（布）中央协商后采取行动的。你们自己知道，这是不正确的，对于联共（布）中央来说，你们所采取的行动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②] 两天后，斯大林便接见了哥穆尔卡并提出要召开几国共产党会议。6月6日，莫洛托夫将给法共加急信的副本寄给了苏联驻美大使。6月底莫洛托夫在巴黎和会期间与南共领导人吉拉斯会谈时讨论了下述问题：由于"西欧和东欧各共产党之间缺少协调"，所以"必须出版一份有统一编辑部和统一观点的理论杂志"。7月7日（哥穆尔卡汇报了会议的准备情况后），这封加急信的副

---

① 以上参见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徐先麟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130–131、156–157、499–501页；Abraham Boxhorn, *The Cold War and the Rift in the Governments of National Unity: Belgium, France and Italy in the Spring of 1947, A Comparison*, Amsterdam, 1993, pp. 248-49。

② 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89，л.1-13. 参见 Сталин и Торез，с.25；*Мурашко*，*Носк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с.91-92。

本又寄到了苏联驻保、匈、罗、捷、南的大使馆，其内容被转告给各国共产党领导人。[①] 由此可以判断：第一，莫斯科要召集的共产党会议绝不是简单地为了创办一个杂志或出版社，而是想通过某种方式协调和统一各国共产党的行动；第二，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设想首先不是针对西方国家的压力和紧逼，而是源于共产党队伍内部的分散和独立倾向。不过，这一结论丝毫没有贬低马歇尔计划及苏联的反应在冷战起源中的地位，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表明，马歇尔计划固然不是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的最初源泉，但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估计和反应却无疑坚定了斯大林建立共产党情报局这类机构的决心，特别是明确了情报局的行动方针和目标。

对于马歇尔含糊其辞的演说，莫洛托夫和他的专家们进行了仔细研究[②]，他们似乎都把这个计划的动机看成是主要出于经济的需要，尽管怀疑这个计划是针对苏联而提出的，但仍认为如果处理得当，它可能会转过来对苏联有利——从美国获得一些急需的重建贷款。因此，当英、法发出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讨论马歇尔计划的虚情假意的邀请[③]时，苏联不仅欣然接受，而且派出了一百多人的庞大代表团[④]。不过，莫斯科还是非常谨慎的。6 月 21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并批准了对英、法政府照会的肯定性答复[⑤]。6 月 25 日经斯大林批准的给出席巴黎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表明，莫斯科的担心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接受美国援助可能会在欧洲形成一个反苏联盟，特别是造成东欧国家从苏联势力范围中分离出去，所以指示苏联代表团呼吁制定单一国家的经济复兴计划，而不是一项全欧洲的计划，其理由是“这会阻碍东欧工业的发展并会增强欧洲各国之间战前的那种经济关系”。其二，援助计划可能会导致德国的复兴——其结果无疑将再次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因此要求苏联代表团采取不妥协的立场反对讨论向德国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反对一切利用德国资源的企图，其对策是德国问题必须限制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苏联

① *Бьяджо*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с.23.

② 莫洛托夫对演说文本所做的圈点和批注见 АВПРФ, ф.06, оп.9, п.18, д.209；诺维科夫 6 月 9 日和 24 日致莫洛托夫电见 АВПРФ, ф.059, оп.18, п.39, д.250；瓦尔加关于“马歇尔计划与美国经济形势”的备忘录（6 月 24 日）见 АВПРФ, ф.06, оп.9, п.18, д.213。参见 Parrish，“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pp.13-15；M. M.Narinsk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Working Paper，CWIHP，№9，1994，p.43。

③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法国外长皮杜尔表面上宣称欢迎苏联参与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暗地里却分别向美国驻巴黎大使卡弗里保证，“他们希望苏联拒绝合作，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准备‘全力以赴，即使遭到苏联的拒绝’”。见卡弗里致国务卿，1947 年 6 月 18 日，*FRUS*，1947，Vol.3，pp.343-344。

④ 1947 年 7 月 4 日道格拉斯给马歇尔的信提到了莫洛托夫代表团的人数，*FRUS,* 1947，Vol.3，p.310。

⑤ 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12. Narinsk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p.42.

在这个委员会中拥有否决权）之内。[①]

在6月27日至7月4日的巴黎会议上，英、法与苏联之间的讨论恰恰在这两个问题上陷入了僵局[②]。莫洛托夫在7月1日对会议的结果失去了信心，他致电斯大林说："我们的观点与英法的观点有本质的不同，我们不指望在有争议的实质性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③]这时，莫斯科没有考虑到东欧国家对美国援助的迫切需要，更没有想到会有人对苏联的立场持抵制态度。

有研究表明，接受美国的贷款，在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治纲领中已成为广泛共识，并得到普遍支持。不同派别的政治家，从自由党、民主党到社会党和共产党，都把自己的活动纲领同获得美援联系在一起。在相当一部分居民中流传着关于美国的生活水平和民主标准的说法。在经历了法西斯占领和军事独裁之后的东欧地区，这种说法显然是对美国有利的政治心理因素。而由于历史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对苏联的不信任和反感情绪在东欧地区，特别是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④]此时马歇尔计划的出现，自然会对东欧国家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表现得更为热心[⑤]。还在巴黎会议之前，波兰驻美大使维涅维奇就告诉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他的政府对马歇尔计划抱有"极大兴趣"。贝文对此的估计是：鉴于"促使欧洲复兴这一实际性援助的诱惑，苏联是控制不住其卫星国的"。[⑥]

苏联领导人最初的想法的确有些简单。7月4日，英法邀请22个欧洲国家参加定于7月12日召开的第二轮会议，以尽快制定出一项欧洲复兴计划。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立即决定接受邀请[⑦]，季米特洛夫在与苏联大使基尔萨诺夫谈话时也认为

① АВПРФ，ф.06，оп.9，п.18，д.214，л.1-13. 参见 Parrish，"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pp.22-24；Narinsk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pp.44-46。

② 依据新的档案对会议情况所做的描述，见 Parrish，"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pp.24-25；Geoffrey Roberts，Moscow and the Marshall Plan: Politics, Ideology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1947，Europe-Asia Studies，1994，V.46，No.8，pp.1375-1376；Narinsk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p.46；Zubok，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p. 105。

③ АПРФ，ф.03，оп.63，д.270，л.70-71. 转引自 Narinsk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p.46。

④ *Мурашко, Носк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л71–72.

⑤ 在1945年波兰的外贸中，苏联占出口额的93%，进口额的91%，1946年则分别降为50%和70%。在捷克斯洛伐克，从1946年第三季度到1947年第一季度，从苏联的进口额减少一半，对苏出口额下跌了三分之一，而同期从美国的进口额增加了两倍，对美国的出口额增加了50%。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二卷，178–179页。

⑥ *FRUS*，1947，Vol.3，p.261, p.268.

⑦ Parrish，"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p.27；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二卷，第178–179页。

东欧国家应该参加巴黎会议，以借此宣扬苏联关于重建欧洲的观点。季米特洛夫还特意指出，"像保加利亚这些国家拒绝参加会议将使别人有理由指责他们缺乏政治上的独立。"[①] 或许是考虑到这种状况，莫斯科第二天给所有驻东欧国家的使馆发出了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指示他们对苏联在巴黎会议上的立场做出解释，第二封电报是转给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建议东欧各国应当接受英法的邀请，出席第二轮会议，目的是"在会议上阐明英法的计划是不可接受的，使该计划不能获得一致通过。然后同尽可能多的国家代表团一起退出会议"。[②]7 月 6 日莫洛托夫又转告贝鲁特和铁托，希望他们派使节来莫斯科进行非正式访问，"以求商量关于巴黎会议的协调性意见，以免在会议期间出现不必要的困难"。[③]

不过，苏联领导人重新考虑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后，很快就意识到东欧国家参加 7 月 12 日会议，即使只是出于破坏的目的，也是十分危险的。7 月 6 日夜间莫斯科通知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在 7 月 10 日以前不要对英、法做出任何回答"。[④] 仅隔一天，又明确通知各国，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撤销了 7 月 5 日的函电，并建议拒绝参加巴黎会议。[⑤] 但麻烦已经出现。7 月 7 日，捷政府宣布正式接受英法的邀请，并任命驻法大使诺塞克为会议代表。[⑥] 在布拉格的美国大使向国内报告说，捷克斯洛伐克似乎"急于要加入马歇尔计划"。同一天，波兰外长莫泽莱夫斯基也告诉美国新任大使格里菲斯，尽管"还未做出最后决定"，但他认为"波兰政府一定会接受英、法邀请并出席巴黎会议"。[⑦] 当苏联驻布拉格临时代办彼得罗夫于 7

① 基尔萨诺夫致莫斯科电，1947 年 7 月 6 日，АПРФ, ф.03, оп.63, д.270, л.118。转引自 Narinsk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 p.48。

② 莫洛托夫致彼得罗夫转哥特瓦尔德电，1947 年 7 月 5 日，АВПРФ, ф.059, оп.18, п.22, д.151, л.87；莫洛托夫致苏联驻华沙大使电，1947 年 7 月 5 日，АПРФ, ф.03, оп.63, д.270, л.93-94。莫洛托夫致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电，1947 年 7 月 5 日，АПРФ, ф.03, оп.63, д.270, л.96。参见 Roberts, "Moscow and the Marshall plan", p.1377；Parrish, "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p.26；Narinsk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 p.48。

③ 莫洛托夫致列别杰夫电，1947 年 7 月 6 日，АПРФ, ф.03, оп.63, д.270, л.135。转引自 Narinsk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 pp.48-49。

④ 莫洛托夫致列别杰夫电，1947 年 7 月 6 日，АПРФ, ф.03, оп.63, д.270, л.135。转引自 Narinsk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 pp.48-49。

⑤ 莫洛托夫致列别杰夫电，1947 年 7 月 8 日，АПРФ, ф.03, оп.63, д.270, л.158。转引自 Narinsk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 pp.49-50。

⑥ Parrish, "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p.26。苏联驻法国大使博戈莫洛夫认为：诺塞克在国内政策上以保守、在对外政策上以倡导亲西方而著称。博戈莫洛夫致莫斯科电，1947 年 7 月 10 日，АПРФ, ф.03, оп.63, д.270, л.201。转引自 Narinsk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 p.50。

⑦ 斯坦哈特致国务卿，1947 年 7 月 7 日，基思致国务卿，1947 年 7 月 7 日，*FRUS*, 1947, Vol.3, pp. 13-14, p.313。

月 8 日拜见哥特瓦尔德，并转交莫斯科的电报时，哥特瓦尔德说，现在已经不可能改变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了，因为“政府不会支持我们（共产党）”。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秘书克莱门季斯（共产党员）也告诉彼得罗夫，“现在什么也不能改变了，因为他们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英、法已经得知他们的决定，况且新闻界也已公布了。在巴黎的诺塞克已经得到了指示，大意是授权他出席这次会议。”① 这不啻给了莫斯科当头一棒——对东欧失去控制的迹象已经出现，斯大林要求捷共领导人立即赶到莫斯科来。在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斥责和耐心说服后，哥特瓦尔德屈服了。② 可资利用的证据表明，波兰政府也同样是在莫斯科的压力下拒绝了马歇尔计划。因为 7 月 9 日上午美国大使格里菲斯在与贝鲁特总统谈话时得到的答复是波兰政府还未最后决定是否去巴黎，而晚饭后波兰外交部就当面通知他，波兰不参加巴黎会议了，其理由与斯大林会见捷共代表团时讲的如出一辙。③ 斯大林对问题严重性的提法——如果你们出席巴黎会议，就是加入了孤立苏联的活动——说明，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的核心是担心东欧国家的分离，而能够防止出现这种后果的措施就是必须加强和扩大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联系。

看来，与其说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消极反应是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直接原因，还不如更进一步地指出，对于欧洲各国共产党摆脱苏联控制及东欧国家摆脱苏联势力范围的防范心理，使莫斯科感到必须建立一个具有制约功能的共产党国际机构。在苏联为马歇尔计划奔忙的同时所发生的另一个事件，更使莫斯科感受到这种必要性。南斯拉夫一直倾向于组建一个巴尔干联邦，首先是同保加利亚的联邦，这一设想几经周折，终于在 1947 年夏天有了初步结果。④ 根据档案文献，7 月初，季米特洛夫和铁托在互通信件中认为，实现联邦计划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签订南保同盟条约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分别向莫斯科作了报告。斯大林担心英国出来反对，

---

① 彼得罗夫致莫洛托夫电，1947 年 7 月 9 日，АПРФ, ф.03, оп.63, д.270, л.183-184。转引自 Narinsk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p.50。

② 斯大林与哥特瓦尔德谈话记录，1947 年 7 月 9 日，АПРФ，ф.45，оп.1，д.393，л.101-105。更为详细的情况可参见 Parrish，“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pp.27-31；Narinsk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p.50。

③ 格里菲斯致国务卿，1947 年 7 月 10 日，*FRUS*，1947，Vol.3，pp.320-322。尽管有当事人回忆说，波兰不是被强迫拒绝马歇尔计划的（Sheldon Anderson，Poland and the Marshall Plan, 1947-1949，*Diplomatic History*，1990，V.15，No.4，p.476），但目前尚无相关的波兰档案文献可以证实。

④ 有关巴尔干联盟的最新研究见 *Смирнова Н.Д.* Сталин и Балканы в 1948г., Проблем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Гайдук И.В., Егорова Н.И., Чубарьн А.О.*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факты и гипотезы，Москва，1999，с.36-44；R.C. Nation，A Balkan Union? Southeastern Europe in Soviet Security Policy, 1944-8，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p.125-143。

于7月5日答复，同盟条约的签订应等到对保加利亚和平条约批准后实施。但保、南领导人没有完全听从莫斯科的指示，在他们看来，对保和约已于2月签订，得到批准只是时间和程序问题。7月底铁托和季米特洛夫举行了会谈，并于8月1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已就同盟条约进行协商（实际上已经草签），并将在对保和约生效后签署。①8月2日，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代表还在布莱德缔结了一项协定，保证"提供炮兵、空军和步兵来组织希腊民主军的后方防御"，会议成立了一个旨在组织支援希腊游击队的"巴尔干联合参谋部"。②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震怒。在8月12日给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同一信件里，斯大林强烈谴责他们的"草率行事"给"英美反动分子提供了多余的借口"，使其得以"加强对希腊和土耳其事务的军事干涉"。他还特别强调，南共和保共这样做"没有同苏联政府商量"。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共领导人感到召集共产党会议的事情不能再耽搁，而且为了实现会议的真正目的，也绝不能仅仅依靠波兰党进行筹备工作。在波兰工人党中央7月16日的通知中，只说打算在会上就欧洲各兄弟党所面临的问题交换看法和情况；为成立研究"各国工人运动问题"的新杂志做准备。④波兰党在7月底发出的正式邀请信中又特意指出，"我们不追求建立某种国际工人运动机关的目的，不想创办仅阐明某些国家工人运动问题的杂志"。⑤这显然已经不能满足莫斯科的要求了。

四、情报局的建立和苏联冷战政策的形成

就在哥穆尔卡发出邀请信的时候，日丹诺夫在给斯大林关于苏联方面组织会议的具体行动的报告中提出，联共（布）代表团在会议上应直接建议把邀请信完全没提到的两个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和各国共产党行动协调问题列入会议日程。报告规定，第一个问题由联共（布）派人作报告，研究和讨论国际形势的重点是提出各

---

① *Гибианский*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с.106-107; Гибианский,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1947-1948гг., 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рия, 1996, №1, с.168.

② 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2）：文件与评注》，第109–110页。

③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556;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с.106-107;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с.168.

④ Как готовилось, с.4-5; *Бьяджо*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23.

⑤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с.115.

国共产党当前的主要任务；第二个问题由波兰人作报告，而苏联将在会议上提出成立一个“与会各党协调中心”的建议。报告强调，一方面，实行这种协调“只能依照各党自愿协商的办法”，但另一方面，“在涉及联共（布）利益的所有问题上，有关党必须同联共（布）协商”，“在涉及其他党的问题上，它也必须同其他党协商”。[①]这就是说，各国共产党行动的基本方针要由联共（布）提出，而且在具体问题上也必须同莫斯科“协商”。

显然，波兰党是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除了负责提出各党行动协调的问题外——这不便由联共（布）直接提出，其他一切只能靠苏联人自己了。为此，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副主任巴拉诺夫在8月15日向日丹诺夫提交的报告中建议："联共（布）的代表应当拥有关于会议日程所有主要问题的详细材料，这些材料必须由联共（布）中央认真准备并经其批准”；在各党代表互相交换信息和听取国际形势报告后，可以就下述一些非常迫切的问题交换意见，即关于马歇尔计划、德国的国家制度和经济制度、各国共产党对苏联和联共（布）的态度、共产党行动的协调和相互提供情报的形式等问题；在上述讨论的总结阶段，联共（布）代表“可以支持成立协调委员会的想法”，当然，这个建议最好“是由其他党的代表提出的”；联共（布）代表对关于成立出版情报刊物的机构也应持这样的立场；“会议应当秘密进行”，只在结束后发表一个简短的公报。[②]在对这个报告进行修改和补充的基础上，8月27日，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提交给斯大林一份新的报告。在会议需要讨论的问题中，报告删去了德国问题——可能是考虑到德国问题属苏联的专利，无须其他党过问，而加入了新的内容：“批评一些党所犯的错误，首先是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所犯的错误”[③]，以及“加强斗争，反对新的战争威胁，号召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和反法西斯力量以对抗美帝国主义从政治和经济上奴役欧洲的计划”。“对苏联态度”和“对联共（布）态度”的提法改为“作为各国劳动群众在争取和平、社会主义和真正民主的斗争中最强大力量和可靠支柱的苏联的决定性意义”。关于“协调委员会”，报告进一步明确：在出席会议的各党代表“自愿同意”的条件下，以

---

① 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0，л.10-11；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с.115-117.；*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с.141-142.

② 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3，л.1-13.

③ 报告初稿的写法是：“对于某些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所犯的错误进行批评，其中包括各党之间缺乏相互联系以及行动协调一致方面的错误。”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0，л.10.

“总部设在华沙的情报局”的形式建立之。①

至此，即到 8 月 27 日，莫斯科最后明确了建立新的国际机构——情报局的构想，其使命是重建共产国际时存在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利益必须绝对服从联共（布）利益的那种隶属关系。但这次的重点是在欧洲，特别是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各国共产党身上。9 月初，对外政策部遵照日丹诺夫的指示，作为苏共代表在会议上发言的素材，准备了一份长达 8 页的分析材料《关于联共（布）的国际联系》，其主要内容是强调建立国际共产主义机构的必要性。文件讲述了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的状况，认为这有力地促进了“各兄弟党”争取民主和工人运动团结的斗争，巩固了苏联的国际影响，“帮助解决了苏联对外政策的任务”。但是各共产党之间现有的联系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不是正规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的困难在于“没有一个交换情报及对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主要问题统一观点所必需的中心”。没有统一的中心，“还妨碍各民主组织的协调行动，妨碍在同反动派和新的世界大战的战争贩子的斗争中制定统一的策略”。文件最后指出，“建立国际协调中心，或至少建立情报出版机构”是“完全现实的任务”；“这一机构在争取和平和发展民主的斗争中，在制定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组织共同路线和策略方面，将扮演积极角色”；在今天“国际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无论大小，没有苏联参与是解决不了的”。②

以上论述可以归纳为两点：成立情报局的主要目的就是对欧洲共产党内部进行整肃③，以协调行动，制定共同的路线和策略；在莫斯科的统一号令下，开展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战争贩子和奴役欧洲计划的斗争。众所周知，日丹诺夫在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表述了苏联领导人确定的基本纲领，而这一纲领的中心命题就是两个对抗阵营的形成④。值得注意的是，从档案材料可以看出，这样提出问题是克里姆林宫在开会前几天才决定的。在头几份反复修改的报告草案里，都没有出现关于两个阵营或类似的命题，只是在最后定稿前的一份报告文本上，日丹诺夫做了批注：“新的阵营”和“新的民主”。于是，全文都作了相应的变动，其中关于苏联在

---

① РЦХИДНИ, ф.77, оп.3, д.90, л.1-15. 转引自 *Бьяджо*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с.27–28；Как готовилось，с.9-10。

②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3, л.17-24。转引自 Как готовилось，с.10-12；*Бьяджо*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с.29。

③ 在此期间，对外政策部准备了有关欧洲主要共产党的详细材料，并对所有这些党（包括南共）提出了批评意见（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3）。详见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с.167-168；*Бьяджо*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с.30-33。

④ 报告全文见 РЦХИДНИ, ф.77, оп.3, д.94, л.1-49。

国际舞台上的立场和作用这一提法，在多数情况下都改成了“苏联和民主国家”，“民主国家阵营”，“反帝国主义阵营国家”。报告第二部分的标题“苏联——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支柱”，随着内容的变化也换成了一个反映两个阵营形成的标题：“战后政治力量的新格局——以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为一方和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为一方的两个阵营的建立”。这种变动，很可能不是由于日丹诺夫本人思想转变主动提出的，而是斯大林在看了准备好的报告后做出的决定。总之，直到9月19日，即在会议召开的前3天，政治局才正式决定委托日丹诺夫作这个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①] 这说明，共产党情报局最后确定的纲领是仓促的、应急的，而且是对马歇尔计划重新认识后的被动反应[②]。

就这样，在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的直接操纵和斯大林的幕后指挥下，9月22日华沙会议正式开幕。然而，除苏联外，包括倡议人波兰党和最激进的南共在内的所有与会代表，都不清楚会议的真实目的和具体日程。[③] 因此，当马林科夫在其发言的结论部分提出必须采取“明确的措施”，“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和建立经常接触”，“以便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④] 的时候，波兰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9月24日，哥穆尔卡和明兹请求会晤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并阐述了以下观点：波兰不希望在华沙建立任何一种情报局的机构，如果一定需要这样的机构，最好选择贝尔格莱德或布拉格。在波兰建立情报局将会被看做是共产国际的复活，而这会给波兰在对外关系领域造成不良影响。尽管与苏联人约定，在关于协调的问题明朗化以后再行讨论，但半个小时后哥穆尔卡又再次强调，波兰人原则上反对建立情报局，并认为应该像他们通知中所说，仅限于出版一本杂志，同时可以赋予杂志编辑部以必要的协调权力。鉴于波兰人的这种立场，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认为，在波兰代表作报告之前，必须同其他各国代表团私下谈话，让他们表明立场，并坚持认为：必须建立情报局，其驻地就设在华沙。[⑤] 得此消息后，在25日的电话中，莫洛托夫指示：一定要让会议通过建立情报局的决议，即使没有协调的职能。但随后斯大林表示了更强硬的态度：必须赋予情报局以协调职能，新的机构应该能够控制每个欧

---

① *Гибианский*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с.118-119；*Бьяджо*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с.38.

② 帕里什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见 Parrish，“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pp.36-37。

③ *Бьяджо*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с.39-41.

④ 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1，л.54-55；又见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с.155-156。

⑤ 谢尔盖耶夫（日丹诺夫）、鲍里索夫（马林科夫）致菲利波夫（斯大林）电，1947年9月24日。РЦХИДНИ, ф.77, оп.4, д.57, л.37-38。

洲的，尤其是东欧的共产党。①

令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感到欣慰的是，在与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交谈时，二者都认为必须建立这样的具有协调职能的机构。卡德尔声明，情报局可以设在贝尔格莱德，这一点无须同铁托商量了。斯兰斯基表示布拉格也可以作为情报局的驻地，但须回国与哥特瓦尔德商议。②经过苏联代表的努力，其他各代表团都表示接受具有协调职能的情报局，波兰代表回国商议后也撤销了原来的意见。③屈服了的哥穆尔卡在9月27日的简短报告中，以个人名义建议成立情报局，其职能不仅是交换经验，“在必要的时候”，还应“按照自愿的原则”协调各共产党的活动。④9月28日，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交流经验和协调行动”的决议，决议规定成立具有协调职能的共产党情报局，由各国共产党的代表（每党两名）组成，其驻地设在贝尔格莱德。同时，情报局将创办自己的机关刊物。⑤

波兰会议终于完成了莫斯科匆忙设定的任务——通过建立情报局这一机构恢复对欧洲各主要共产党的直接控制和指挥；在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的旗帜下开始实施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集团对抗⑥的战略。至此，美苏双方不仅发表了冷战宣言，而且确定了冷战政策，冷战格局终于在欧洲形成。不过，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就其职能而言，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附属物，尽管情报局在组织形式上有别于以往的三个“国际”，仍可被看做是共产国际的替代品，但就其目标而言，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说共产国际的纲领是推动世界革命，领导各国共产党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情报局则只是要求放弃与美国的合作，在

① Zubok，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p.133；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c.120-121.

② 谢尔盖耶夫、鲍里索夫致菲利波夫电，1947年9月25日，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2，л.54。

③ 谢尔盖耶夫、鲍里索夫致菲利波夫电，1947年9月27日，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6，л.2。

④ 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1，л.276-279. 这个“自愿原则”，在定稿时被日丹诺夫换成了一种模糊的提法——“按照相互协商的原则”。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6，л.14; ф.575，оп.1，д.1，л.304. 转引自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c.122-123。

⑤ 谢尔盖耶夫、鲍里索夫致菲利波夫电，1947年9月28日，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6，л.10-11。

⑥ 笔者提出“集团对抗”的概念（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1947年开始的斗争仅局限于以美苏为首并有部分欧洲国家参加的两个集团之间，直到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尤其是朝鲜战争的进展，才真正形成了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阵营”。

欧洲的范围内组织共产党抵制和防御西方的进攻（至少在莫斯科看来，马歇尔计划是美国进攻战略的开端），而且只能按照苏联认可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对于拉科西提出的分别召开多瑙河流域和北欧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被斯大林以“不合时宜”为由而否定，铁托关于邀请希腊共产党出席波兰会议的提议同样遭到斯大林婉言拒绝，[①]甚至对于方兴未艾的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日丹诺夫在洋洋万言的报告中也只是顺便提到，而对于这两个革命的影响和意义则只字未提。[②]这些都体现了莫斯科的目标和行为的界限。

因此，日丹诺夫的报告可以被认为是莫斯科的冷战宣言，但其所反映的苏联冷战政策的实质是对抗和抵制，斯大林只是想通过采取强硬的路线，迫使西方承认苏联已经取得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的安全和利益，而并非要对资本主义世界发动全面进攻——这与美国的“遏制”理论确有异曲同工之处。对于莫斯科的目标，不仅“自由世界”的政客们当时做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产生了种种误解。铁托正是因为擅自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措施，而成为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一个牺牲品。[③]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

① Как готовилось，c.5-6，3.

② 见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c.152-170。

③ 详见拙文：《对 1948 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

对 1948 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

——来自俄国及东欧国家解密档案的新证据

1948 年上半年爆发的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冲突，在刚刚组建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了巨大震动。随着南斯拉夫共产党被作为社会主义的叛徒开除出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便出现了继苏联 30 年代大清洗之后以清除“铁托分子”为名的第二次大清洗运动，而这次清洗已经远远超出了苏联的国界，在东欧各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被撤职、被逮捕、被枪毙。从此，各国社会主义便纳入了统一的斯大林模式。

苏南冲突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后社会主义同盟的第一次大分裂，其结果对以后几十年苏联、东欧乃至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都具有重大的影响。然而，这场冲突究竟从何而起，隐藏在意识形态方面舌枪唇战背后的真实原因何在？争论双方囿于当时的立场和历史条件，所发表的文件和回忆录往往是片面的、零碎的，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随着档案文献的不断披露，历史需要重新认识和阐释。90 年代初，《苏联外交部通报》、《历史问题》、《历史档案》等俄文刊物陆续公布了一批关于苏南冲突的档案文献。后来，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公布的档案中，也有不少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献。此外，还有一些俄国和美国学者在其论著中引用了他们自己在档案馆发现的有关文献。这就使得人们可以通过梳理比较完整的原始材料来看清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

本文拟利用近年解密的俄国和东欧国家的历史档案，对 1948 年苏南冲突这一

重大历史事件的真正起因进行考察。[①]

一、联盟：冷战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转变

当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布加勒斯特会议宣布将南共开除的时候，不仅在南斯拉夫引起了震动，而且也使西方国家感到“大为惊奇”。[②]事情的确来得突然。1948年1月共产党情报局还在其总部所在地贝尔格莱德召开编辑部会议，半年之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竟然被作为异教徒逐出教门，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对此项举措的始因苏南双方有不同解释。日丹诺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指责“近来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国内外政策的主要问题上执行的是一条错误路线，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路线”，“南共领导正在实行一条对苏联和联共（布）不友好的政策”。[③]出席会议的欧洲各国共产党对此一致表示赞成。[④]以后，这种看法便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统观点，以至在60年代中苏论战时，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战后不久南共就“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使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政权逐步地蜕化变质”。[⑤]另一方面，南斯拉夫人的说法则是，苏南冲突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而冲突的原因在于斯大林对南共执行的与莫斯科方针相抵触的特殊政策不满。[⑥]具有各式不同说法的这种解释在以后几十年中为许多西方学者所接受。[⑦]

无论是突出意识形态（苏联），还是侧重国家关系（南斯拉夫），上述两种说法

---

① 本文使用的俄国档案，除引自笔者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收集的档案复印件外，还转引自俄文刊物、专集和国外学者的论著。至于东欧国家的档案，则全部转引自俄文或英文材料。

② 斯蒂芬·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1939–1972）：文件与评注》，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翻译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77–386、123页。

③ 日丹诺夫：《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报告》，1948年6月21日，*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1947/1948/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8，с.407-417。

④ 东欧各国及法、意各党代表在情报局会议上的发言，见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с.418-447。

⑤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载《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62页。

⑥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见爱德华·卡德尔的《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米洛凡·吉拉斯的《同斯大林的谈话》（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兹冯科·施陶布林格的《铁托的独立道路》（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特别是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的《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和《铁托传》（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等著作。

⑦ 比较典型的论述可见克利索德《南苏关系》一书的概论。

都片面地、过分地强调了苏南之间的分歧，都认定南斯拉夫在战后就走上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独立道路，似乎 1948 年的冲突就是这种长期以来分歧的延续和总爆发。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历史文献表明，直到 1948 年初，南斯拉夫一直是苏联最忠实的盟友，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贝尔格莱德无论在革命性，还是在社会主义化的程度方面，都紧步莫斯科的后尘。而斯大林对铁托的信任和期望，也超过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如南共领导人后来所说，在与逃亡的南斯拉夫国王联合作战、与德国军队交换战俘、承认南斯拉夫解放委员会以及接受国王回国等问题上，铁托与斯大林之间有不同意见，甚至互有不满情绪，但是就总体而言，南共与苏联的关系是友好的和密切的。南共始终与莫斯科保持着通讯联系，接受苏联政府的指导和帮助。南共党人“把对苏联领导的忠诚看成是它的建设和发展的因素”，在他们看来，“斯大林不仅是不可争辩的和天才的领袖，而且是对新社会的理想和希望的化身”。无论发生什么问题，他们总是“想办法说服自己”，并“把这一切不愉快的事实从自己的记忆中排挤出去”。[①] 同样，早在 1943 年共产国际就认为，从军事和政治意义上说，南共都“应当成为巴尔干国家的核心”。[②] 战争即将结束时，斯大林已经看出他在东欧国家中所能依靠的首先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国家政权的南斯拉夫共产党，而铁托也知道南斯拉夫的安全和发展必须依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此期，苏南领导人频繁接触，讨论战后政治、经济和苏南关系问题。1944 年 4 月，莫洛托夫向来访的南共中央书记吉拉斯保证，苏联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支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问题只是要选择对双方都有利的时机。[③]1944 年 11 月，即欧洲战事结束前半年，访问莫斯科的南共中央书记卡德尔就建议和苏联共同成立联合股份公司，以便开采南斯拉夫的矿产——铜、汞、铝矾土。[④] 南共政治局委员赫布朗 1945 年 1 月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答应战后向南提供经济援助，特别是派出军事顾问和提供技术装备，帮助南改编和建立现代化的军队。斯大林甚至原则上同意了南斯拉夫战后对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希腊等周边国家的领土要求，只是建议由当地居民自己提出并入南斯拉夫的请求，并希望南在做出重大决

① 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 1、4–5 页。

② 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第 218 页。

③ 莫洛托夫与吉拉斯谈话记录，1944 年 4 月 24 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6，оп.6，п.58，д.794，л.1-9。

④ 卡德尔与佐林会谈记录，1944 年 11 月 23 日，АВПРФ，ф.144，оп.28，п.114，д.4，л.220-221//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с.16。

定之前最好征求一下苏联的意见。①1945年4月，南政府副总理舒巴希奇赴苏与莫洛托夫讨论了苏南友好条约问题，并就外交、经济和政治问题交换了意见。②4月11日，双方签署了《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这是当时苏联与东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条约。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主导思想和战略目标是保持大国合作态势，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为此目的，在雅尔塔体系划定给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进入资产阶级议会，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③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斯大林在保证各国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反对他们按苏联模式建立垄断政权的企图，而是劝告共产党与自由党人、社会党人和农民党结成联盟，建立联合政府。还在战争期间，当1944年9月苏联红军攻占罗马尼亚以后，留守后方的内务部部队接到命令说“不得破坏罗马尼亚的国家制度”，不得废除地主所有制，“在我们的占领区绝对禁止实行苏维埃化”等等。1945年3月28日，日丹诺夫针对芬兰共产党人在告选民书中表露的实行一党政府，以及“把芬兰归并于苏联”的愿望，批评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想使自己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的话，你们就不能孤立于议会中的其他党团之外，”并指出，芬兰“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牢固的政府”。1945年秋天，苏联驻匈牙利公使普希金批评匈牙利共产党“脱离了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芬兰都采取的共同路线”，并指示他们说，“共产党不仅要同社会民主党，而且必须同民族农民党结成联盟，还必须同国内最有影响的政党小农党结成联盟”。④甚至到1946年9月底，斯大林还明确地向季米特洛夫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保加利亚不要急于推进社会革命进程，而要根据大局的要求考虑社会革命进程的发展。斯大林解释说：“我们曾认为苏维埃的形式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事实表明，苏维埃的形式是最

---

① 斯大林与赫布朗会谈记录，1945年1月9日，АВПРФ，ф.6，оп.7，п.53，д.872，л.8-28。

② 莫洛托夫与舒巴希奇谈话记录，1945年4月6日，АВПРФ，ф.6，оп.7，п.53，д.872，л.29-30。

③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问题》1996年第6期。

④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77，оп.3с，д.60，л.7，40；д.63，л.33；АВПРФ，ф.77，оп.27，п.121，д.11，л.2，转引自 *Мурашко Г.П.*，*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5-1949.//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с.76-77，89-90，79。

好的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①] 与东欧其他各党不同，苏联虽然也曾表示反对在南斯拉夫实现苏维埃化，反对由共产党单独成立临时政府，[②] 但实际上，对于南共领导人在国内政策方面逐步实施的比较激进的措施，莫斯科很快就采取了默许，甚至赞赏的态度。

南斯拉夫于战后采取了更加紧密地向莫斯科靠拢的方针。尽管铁托在 1945 年 8 月 10 日答外国记者问时，否认实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措施，但后来还是承认在南斯拉夫建立了与苏联相类似的政权形式。[③] 在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南斯拉夫便使国内农业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1945 年 8 月临时国民议会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当年底又通过一项法律，取消了农民的一切债务。1946 年 7 月，国民议会通过了合作社基本法，开始向集体经济过渡。1946 年 12 月通过了全面国有化法令，它在许多方面只不过是把现状正式肯定了下来。从理论上说，在少数几个未列入国有化的工商业部门中，仍然允许私有制存在，但是，实际上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④] 对此，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 1947 年的一份报告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南斯拉夫在东欧国家中率先为新制度奠定了基础，其政权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他国家具有榜样作用”。[⑤] 在政治方面，南共虽然同意组成各党联合政府，但并没有采取保证各党权力平等的实际措施。1945 年 11 月南斯拉夫人民农民党领袖向苏联大使萨德奇科夫抱怨南共在制宪会议选举中没有遵守与他们达成的精诚合作的诺言，希望莫斯科出面干预。苏联大使以不干涉内政为由采取了回避态度。[⑥] 同年 12 月 14 日南斯拉夫通过了新宪法，萨德奇科夫在向莫斯科汇报时满意地指出，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依据苏联宪法制定的。尽管该宪法保留了部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的内容，“但是草案的其他各条均体现出对未来阶级分化政策

---

① 内·甘乔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吴锡俊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06–107 页。

② 莫洛托夫与吉拉斯谈话记录，1944 年 4 月 24 日，АВПРФ，ф.6，оп.6，п.58，д.794，л.1-9；斯大林与赫布朗会谈记录，1945 年 1 月 9 日，АВПРФ，ф.6，оп.7，п.53，д.872，л.8-28。

③ 铁托答外国记者问，1945 年 8 月 10 日；铁托在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7 年 9 月 27 日，见《铁托言论选》，北京：三联书店，1963 年，第 22-23、54 页。在苏南分裂以后出版的文本中删去了这句话。

④ 详见查尔斯·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106–108、18–19 页。

⑤ 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41，л.1-22，转引自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1947-1948гг.，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с.164。

⑥ 萨德奇科夫与约万诺维奇和日夫科维奇谈话记录，1945 年 11 月 12 日，АВПРФ，ф.6，оп.7，п.53，д.868，л.16-18。

的基本路线”。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卡德尔在回答苏联大使关于社会主义提法的问题时说，南共将在该宪法的基础上“收拾资产阶级”，并且“势必要走上用暴力镇压他们反抗的道路”。至于南共针对反对党所采取的措施，苏联大使也表示满意，认为“成效已经显现出来”。苏联大使还指出，南共“正确地认为举行制宪会议选举和宣告共和国成立是在确立新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他们把这一胜利与苏联积极支持新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相联系”。[①]

在此期间，苏南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政治合作。1946 年 1 月，铁托向苏联大使提出，根据以前的协商，打算派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讨论培训和装备 35—40 万人的南斯拉夫军队，并表示可以利用建立苏南联合公司的形式使苏联能给予南斯拉夫的军事工业以更广泛的援助。[②]1946 年 6 月 8 日米高扬和南贸易部长彼得罗维奇签署了经济合作的协定书。规定在南斯拉夫建立 8 个合营股份公司——开采和加工石油，开采铝土矿及生产铝，开采和生产铅，勘探和开采煤、有色金属，民用航空，多瑙河航运公司，南苏银行；并拟定审议建立林业和造纸工业公司的建议。协定书还规定了苏联在电气化、食品、纺织、化学、机械工业、建筑材料生产和农业领域向南斯拉夫提供援助。[③] 苏南之间的政治合作主要体现在对马歇尔计划的立场和建立共产党协调组织的问题上。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使莫斯科面临一种两难选择：要么冒险让西方的影响渗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要么就使东欧与西方脱离接触，从而违背自己的意愿迅速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④] 斯大林选择了后者。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标志着斯大林战后对外战略的根本转变，即由大国合作政策转向集团对抗政策，而为实现这一转变的首要措施就是建立了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⑤] 与其他所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不同，在这两个问题上，南共都是积极和主动向莫斯科靠拢

① 萨德奇科夫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5 年 12 月 17 日，АВПРФ，ф.144，оп.29б，п.154，д.3，л.22-28；萨德奇科夫给莫洛托夫的信，1945 年 12 月 18 日，АВПРФ，ф.144，оп.29，п.117，д.28，л.139-146。

② 关于在南斯拉夫建立弹药生产基地的备忘录，1946 年 5 月 27 日，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0，л.19-20//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с.29。

③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с.30. 由于在谈判中出现矛盾，这些公司后来只建成了两个。

④ 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7.

⑤ 笔者对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问题》1996 年第 6 期。关于苏联对马歇尔计划反应的最新档案材料可见 Scott D. Parrish，“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The Soviet Reaction to the Marshall Plan，1947”；Mikhail M. Narinsk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CWIHP Working Paper*，No.9，March 1994。

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参与了谋划。

如果说其他东欧国家都是在苏联的压力下被迫拒绝马歇尔计划的，那么南斯拉夫则是在事前即主动与苏联进行了协商，并采取了共同立场。早在 1947 年 6 月吉拉斯作为南斯拉夫代表出席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法共代表大会时，就与当时在巴黎同西方国家代表讨论马歇尔计划的莫洛托夫达成了协议：抵制马歇尔计划。[①]7 月 7 日夜晚，莫斯科向东欧各党领导人发出急电，禁止他们的国家派代表出席将在巴黎召开的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而在此之前 3 天，即 7 月 4 日，卡德尔就打电话告诉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说，"鉴于各方面的新闻记者和外交官纷纷询问南斯拉夫在详细拟定美国向西欧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措施方面今后的立场，南斯拉夫政府打算发表一项声明：南斯拉夫不能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参加拟定这样的计划，因为英国和法国政府的建议是试图形成一种允许某些大国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局面，并使小国的经济依附于这些大国，进而使小国丧失民族独立。"[②] 无疑，南斯拉夫与西方尖锐的对立状态[③] 使莫斯科感到，抵制马歇尔计划首先可以得到贝尔格莱德的赞成。而铁托也认为莫斯科将对西方采取的强硬立场，恰恰是与南共以前的激进主张相吻合的。这里，与其说是铁托要追随斯大林，毋宁说是莫斯科需要贝尔格莱德的支持。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组建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上。

"建立新国际"的问题最早是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 1946 年 5 月 17 日在匈共中央会议上提出来的。斯大林在 6 月 8 日夜晚与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也讲到要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并建议由南斯拉夫人发起。虽然就新国际的作用而言，拉科西和斯大林都严厉指责了第三国际，而强调新的国际组织只是交流情报和经验，并不是要约束各国共产党的行动。[④] 但是当 1947 年 8 月建立情报局的任务真正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斯大林却感到他所需要的国际机构恰恰是要用来规范欧洲各国共产党行为的。这一点，从 1947 年 9 月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东欧各国取消各党的民主联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

---

① 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 98–99 页。

② 拉夫连季耶夫与卡德尔的电话记录，1947 年 7 月 4 日，АВПРФ，ф.6，оп.9，п.82，д.1285，л.62。

③ 驻贝尔格莱德的美国外交官斯蒂芬回忆说，"在外交领域，南斯拉夫是所有苏联卫星国中最坚定，最好战的一个"。见 Charles G. Stefan，" The Emergence of the Soviet-Yugoslav Break：A Personal View from the Belgrade Embassy"，*Diplomatic History*，1982，Vol.6，No.4，p.387。

④ Csaba Békés，"Soviet Plans to Establish the Cominform in Early 1946：New Evidence from the Hungarian Archives"，*CWIHP 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p.135-138；德迪耶尔：《铁托传》，第 88–89 页；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第 49–50 页。

政权；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党仍然固守的合法斗争策略，而主张通过罢工等革命行动与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特别是苏联在会议上提出了“两个阵营”的理论，更加表明了莫斯科要求各国共产党行动一致的决心。[①]

斯大林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通过对东欧各党情况的分析，确定以南斯拉夫作为会议上的合作伙伴。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会前编写了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状况的报告，其中赞扬最多、评价最高的就是南共。在对其个别对外政策提出批评意见——与对其他各党的批评相比要轻微得多——的同时，报告高度评价了南共在战争年代武装斗争中的作用和成就，以及在建立和巩固共产党政权、建立相应的社会经济模式中取得的成绩。报告特别赞赏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尤其是贝尔格莱德反对西方的坚定立场，称其是“巴尔干和平和民主的堡垒”。报告也没有忘记肯定南斯拉夫的亲苏政策：“新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发表的所有言论”，“证明了与苏联的亲密友谊，充满了对苏联深深的感激之情”；南斯拉夫在国际舞台上“始终不渝地支持苏联代表提出的所有建议，并且坚持苏联代表的观点”。[②]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上述报告之后，对外政策部还为日丹诺夫在会上的发言准备了几份材料，其中对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提出了批评意见。与不久前的报告相比，在名为《南斯拉夫的经济和政治现状》的备忘录中，虽然也列举了南共所取得的成绩，但是没有更多的赞美之词，反而对南共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指责：如南共领导人“某些过高评价自己成就的倾向和把南斯拉夫共产党摆在巴尔干地区某种‘领导’党地位的意向”；“不顾及其他国家和兄弟党的利益，表现出民族的狭隘性”；“长期以来一直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采取错误的立场，而无视民主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同英美两国进行斗争的共同利益”，以及“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活动及其领导人陶里亚蒂同志的令人不能容忍的尖刻批评”；带有干涉内政倾向的对保加利亚宪法草案的尖锐批评；对阿尔巴尼亚渴求同苏联建立直接联系十分妒忌，认为阿尔巴尼亚只能通过南斯拉夫政府同苏联保持联系，等等。[③]不清楚到底是对外政策部里对南共存在不同认识，还是政治局要求下面提供两种可供选择的材料，但无论如何，苏联领导人最终确定把南共作为会议中的依靠

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丹诺夫报告的初稿中本来没有“两个阵营”的提法，这一概念是在请示了斯大林之后加进去的（参见 Parrish，“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这显然说明苏联领导人在马歇尔计划提出后，下决心放弃过去与西方的合作政策。

② 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41，л.1-22.//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с.164. 这样的记录总共有 37 份。关于东欧其他共产党的报告见 ф.575，оп.1，д.9，11，14，32，33，39，41。

③ 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41，л.18-24.

力量而不是批判对象。斯大林不仅于会前就有关事宜与铁托交换了意见，而且还删去了会议报告草稿中对南斯拉夫批评的段落。1947 年 9 月上半旬，日丹诺夫为情报局成立大会撰写报告草案时，似乎是为了形式上的"平衡"，在使用很多篇幅批评法共和意共的同时，也顺便提了一下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的错误。然而，在会议的正式报告中，连这一点小小的批评也不见了。[①]

于是，在 1947 年 9 月 22—28 日召开的会议上，南斯拉夫人便成为联共（布）代表团最积极的支持者。卡德尔在发言中做出了这样的论断："莫斯科－贝尔格莱德联盟——这是我们取得独立的主要支柱。"不仅如此，南共代表还接受了日丹诺夫交付的任务：在会议上对法共和意共公开提出批评。[②] 日丹诺夫在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对南共代表的立场和发言给予了充分的肯定。[③] 会议决定将情报局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这一点也反映出南斯拉夫对苏联的支持和斯大林对铁托的欣赏。[④] 此后，情报局编辑部又提出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一个无线电中心，以便"与所有的情报局成员国共产党及联共（布）中央"进行秘密的双向无线电联系。对此，南共欣然同意，并责成内务部长兰科维奇负责，于一个月内与苏联合作完成这项任务。[⑤]

或许是对斯大林青睐的回报，或许是对莫斯科转变政策表示支持，情报局会议后南共表现得更加积极。1948 年 1 月 28 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情报局会议后南斯拉夫反应的调查报告指出："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的决议受到南斯拉夫人民的热烈欢迎。所有的南斯拉夫报纸和杂志，以及南斯拉夫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们，都发表文章和演说，高度评价决议是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重要文献。……现在这些决议是南斯拉夫主要的外交政策。"其结果"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南斯拉夫人民一致欢迎和赞同苏联代表在国际会议上的工作"。

---

① 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1，л.46-47；д.98，л.2-3，转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с.15，17-18。在公布的报告文稿中，对法共和意共的责难被省略了。

② 卡德尔和吉拉斯的发言见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с.123-142。

③ 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2，л.46-51，转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с.322-323。

④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在 9 月 25 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捷共和南共都要求把情报局这种具有协调职能的机构设在他们那里。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2，л.54，转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с.326。

⑤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36，л.1-3，转引自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с.162。比较 1958 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同样要求的态度，就可以想象出当时苏南关系的亲密状态。

“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完全符合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宣言的原则”。[①] 这一评价充分表明，此时苏联对南共的表现仍然十分满意。

然而，在此时亲密的苏南关系当中，正隐藏着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斯大林转向冷战政策的实质，以及铁托对这一实质的误解。与当时“自由世界”政客们所持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铁托所持的就是这种看法——刚好相反，斯大林进行冷战的目的并不是要发动世界范围内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②] 他的战略目标依然是保证苏联在雅尔塔体系中划分的势力范围，只不过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已有所改变，即对内发动进攻，对外实行防御。如果说以前斯大林希望通过放松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以取得美国的合作，那么现在斯大林则想通过采取强硬路线，迫使华盛顿承认苏联在东欧的绝对地位。至于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斯大林并不想让那里的革命斗争影响其在冷战初期的战略安排和步骤。铁托过高估计了莫斯科强硬路线的革命性，他没有想到南斯拉夫在情报局会议后所推行的革命战略，恰恰打乱了斯大林的安排和步骤。而斯大林则低估了铁托的独立性和倔强性格，他没有想到南共会在苏联提出反对意见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激进的外交政策。这样，一场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二、冲突：巴尔干联邦与希腊革命

苏南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巴尔干地区。1948 年 1 月，莫斯科得到的两个消息使斯大林大为震怒：一个是南斯拉夫试图派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理由是希腊反动派可能对阿发动进攻；一个是季米特洛夫在罗马尼亚对记者发表谈话时宣称，一旦条件成熟，在巴尔干和多瑙河一些国家之间将决定成立联邦或关税同盟，这些国家是罗、保、南、阿、捷、波、匈，其中还特别提到了希腊。这两件事情的要害是事先都没有向莫斯科通报，更没有得到批准，而其结果则可能在敏感的希腊问题上引起

①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情报局会议后南斯拉夫反应的调查报告，1948 年 1 月 28 日，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53，л.296-299。尽管情报局会议之后，苏联驻南使馆不断向莫斯科寄发有关批评南领导人的情报，但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司长拉夫利谢夫于 10 月 8 日给莫洛托夫写了一个报告，坚决反对大使馆带有偏见的描述，АВПРФ，ф.144，оп.31，п.124，д.29，л.7-9，转引自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с.169-170。

②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苏联没有邀请中国和希腊共产党参加波兰会议，而当时这两党正在领导着各自国家的显然是追随苏联道路的革命斗争。也许正是由于美国人直接参与了这两个国家的冲突，日丹诺夫在情报局会议上洋洋万言的报告中，只有区区四行文字谈到美国对中国和希腊的干涉，而对于这两个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则只字未提。参见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с.152-181。

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武装干涉，导致美苏直接对抗。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仅仅几个月后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斯大林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于是，苏联下令要南、保领导人到莫斯科进行紧急会谈。苏、南、保三国领导人 1948 年 2 月 10 日举行的著名会谈是苏南冲突的起点，不过，要了解他们在会谈中的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以及会后所采取的相互抵触的措施，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会谈所涉及的南保关系、南阿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希腊问题的复杂背景。

关于建立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联邦的主张，是 1944 年秋天铁托与斯大林初次见面时，斯大林亲自向铁托提出的。11 月 22 日会见卡德尔、西米奇和舒巴希奇时，斯大林又催促南斯拉夫人尽快进行此事。当时，苏联显然是想借助与在盟国中享有盛誉的南斯拉夫实行联合，使处于战败国地位的保加利亚得以摆脱英美的控制和监督。于是，南保双方于 12 月底和翌年 1 月初进行了商谈。但是南斯拉夫对此态度消极，保加利亚内部对是否成立联邦也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关于联邦应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保加利亚人希望两国以平等地位进入这一联邦，而南斯拉夫人则要求保加利亚必须作为南斯拉夫现有六个联邦共和国之外的第七个共和国加入联邦，所以会谈没有结果。1 月底，莫洛托夫又把南、保代表团召到莫斯科，与苏联代表共同做进一步的讨论。尽管会谈各方一致同意建立联邦是需要的，但在如何组建联邦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最后，鉴于时机尚未成熟，决定先不签署建立联邦的条约，而起草一个合作互助的条约。后来因英国提出抗议，合作互助条约的签署也推迟了。[①] 新的档案文献表明，在建立联邦的原则上，苏联是站在保加利亚一边的。斯大林 1945 年 1 月 9 日接见赫布朗时说，南斯拉夫关于联邦的条约草案不合适，“这个联邦的前景是在二元制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全联合这两个国家”。斯大林强调，必须逐步走向联合，但只能“是自由结成联邦的两个国家的有机联盟。不能造成想吞并保加利亚人的印象”。苏联之所以急于促成联合，是担心“如果形势急剧转变，保加利亚人可能会倒向美国和英国，甚至倒向土耳其”。[②]

由于得到苏联的支持，保加利亚还是希望尽快建立起这个联邦。1945 年 10 月，保加利亚驻南公使托多罗夫两次与萨德奇科夫谈话，表示保加利亚方面对未能及时建立联邦感到遗憾。[③]1946 年初，保加利亚政府又一再向南斯拉夫领导人和苏联领

① 详见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第 110–114 页；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第 106–108 页。

② 斯大林与赫布朗会谈记录，1945 年 1 月 9 日，АВПРФ，ф.6，оп.7，п.53，д.872，л.8-28。

③ 萨德奇科夫与托多罗夫谈话记录，1945 年 10 月 23 日，АВПРФ，ф.6，оп.7，п.53，д.868，л.3-4。

导人提出继续进行一年以前中断的谈判。对此，南斯拉夫持明确的反对态度。铁托在与苏联大使会谈时，“以异常坚决的口气声明，他现在不能支持与保加利亚结成联邦这种思想”，因为保加利亚仍然是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国家，特别是因为，共产党在保加利亚的影响与在南斯拉夫是无法相比的。同时，鉴于保加利亚人可能会重新提出这个问题，铁托请求苏联大使明确一下莫斯科对这一问题的意见。[①] 此后不久，在与苏联大使商议铁托访苏的议事日程时，铁托再次提出要讨论同保加利亚的关系问题。[②]

作为给斯大林准备的与铁托会谈的背景材料，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司长拉夫利谢夫起草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尽管使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结成联邦符合两国的利益”，但是，在缔结与保加利亚的和平条约以及解决两个国家内部的复杂的政治问题之前，无论是结成联邦，还是缔结南保之间友好互助条约，都为时尚早。[③] 这份报告使斯大林稍微改变了一下策略。在5月27日苏南领导人的会谈中，当斯大林提到南保联邦时，铁托说，“搞联邦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并重复了对拉夫连季耶夫讲过的理由。斯大林立即反驳说，“这件事应该做”，“开始可以限制在友好互助条约问题上，但实质上应该做得更多一些”。铁托只得表示同意。[④] 随后，南斯拉夫代表团与同时赶来莫斯科的保加利亚领导人举行了会晤。6月7日，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与南、保代表团举行了三方会晤，商妥两国实行最紧密的合作，但同盟条约要等到和约签字后再行缔结。[⑤]

显然，苏联当时主张南保以某种形式联合起来，索非亚对此表现积极，而贝尔格莱德尚在犹豫。但是，一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南斯拉夫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和强大起来，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足以使铁托加强了成为巴尔干地区主宰的欲望和信心；另一方面，南保关系日益密切，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私人交往已经不同寻常。1947年2月10日对保和约在巴黎签字以后，南保两国加快了实现同盟和联邦的步伐，以至铁托在6月可以雄心勃勃地对保加利亚报界人士

① 铁托与拉夫连季耶夫会谈记录，1946年4月22日，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5，л.39-41，47-48//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с.31。

② 铁托与拉夫连季耶夫会谈记录，1946年5月20日，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5，л.100//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с.31。

③ 关于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1946年5月27日，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0，л.13-17。

④ 斯大林与铁托的会谈记录，1946年5月27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97，л.107-110。

⑤ 甘乔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68页。

宣称："自由的巴尔干各国人民"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坚如磐石的统一体"。7月底铁托邀请季米特洛夫前来谈判，并顺利地排除了阻碍南保关系发展的马其顿问题——同意将原属保加利亚的皮林马其顿并入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8月1日，南保领导人在布莱德签署了4项涉及双边关系的条约，并且发表了公开声明。[①] 但此时斯大林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了。对马歇尔计划的猜疑，对德国局势的忧虑，特别是正在考虑之中的对西方政策的调整，使莫斯科感到必须统一安排和妥善处理所有欧洲事务。因此，当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向苏联通报即将签订条约一事时，斯大林于7月5日答复说，南保条约应当延期到和平条约生效后再签订。使斯大林感到意外和气愤的是，铁托和季米特洛夫都认为无须等到和平条约的正式批准，可以先草签南保条约，并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他们在没有得到莫斯科首肯的情况下，竟然擅自付诸行动了。8月12日斯大林在给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内容相同的信函中严厉斥责了他们的行为。[②]

这两位领导人虽然接受了莫斯科的批评，但只是放慢却没有停止他们的工作。1947年秋天，铁托成功地访问了索非亚、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这无疑使他感到自豪和荣耀。在11月访问保加利亚时，铁托发表讲话说："很多人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联邦。但我们正在创立的是一个关系更密切，范围更广泛的联盟，至于联邦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是苏联的"忠实朋友"，并说"永远也不可能有任何力量会把我们同我们的伟大兄弟、同苏联人民分开"。11月28日，南保领导人签署了为期20年的合作和共同防御条约。[③] 两周后，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斯托夫谈到，最近的事态发展正在导致"在不久的将来成立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联盟并建立一个共同的南部斯拉夫国家"。[④] 正是在这种乐观的气氛中，季米特洛夫在与罗马尼亚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后发表前述关于东欧国家联邦的讲话。

1948年1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对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发出警告，声称西欧

---

①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等编：《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234页。

② 以上材料出自保加利亚国家中央档案馆和铁托档案馆，转引自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с.168-169。有的学者认为斯大林对此事并没有强烈反应，见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p.34。

③ Stefan，"The Emergence of the Soviet-Yugoslav Break"，p.390；甘乔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186–188页。条约原是无限期的，在报请莫斯科批准时，期限被改为20年。

④ 卡尔沃科雷西等编：《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第235页。

将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东欧的苏联化。[①]或许是缺乏政治敏感，或许是出于职业惯例，1月23日的《真理报》未加评论地转载了季米特洛夫讲话的大部分内容。但斯大林对此事则十分敏感。第二天，索菲亚便收到了莫斯科发来的一封含有严厉斥责内容的密电，批评季米特洛夫的行为“对新的民主制国家有害无益，使英美更容易反对这些国家”。1月28日，《真理报》又发表了编辑部述评，表示绝不赞同季米特洛夫在联邦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并认为这种联邦是“不可靠的和凭空虚构的”。季米特洛夫对苏联领导人的激烈谴责立即做出了顺从的反应，首先以保通社1月29日声明的形式，然后又在2月2日祖国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公开表示接受批评。他还把保通社的声明寄给了苏斯洛夫，让他转告斯大林，相信他与苏联立场将保持完全一致。但这根本没能使莫斯科感到满意，1月30日苏斯洛夫在回电中对保通社声明试图进行解释和修正的说法再次提出了批评，并责令保共领导人立即前往莫斯科。[②]显然，斯大林认为事态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的行动性质相同，而且还在于时间吻合——莫斯科正在为铁托对阿尔巴尼亚的擅自行动大伤脑筋。

南阿关系的背景更为复杂，在斯大林看来，也更为敏感。还在战争当中，南共就成为阿尔巴尼亚游击队的支持者和庇护者，而且两者都是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建立起新政权的，所以关系密切。按照赫布朗的话说，“阿尔巴尼亚人是南斯拉夫最好的朋友”。但是在盟国关于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中尚未确定阿尔巴尼亚的地位时，斯大林对南阿关系的发展持谨慎态度。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斯大林叮嘱赫布朗说，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应当慎重”，“必须等一等，斟酌一番”，应当避免在那里与英国人发生冲突。[③]

战后一段时期，苏联不想因为与阿关系密切而引起西方盟国的猜疑，且鉴于南阿关系的历史状况和对南共的信任，所以同意让阿共接受南共的领导，有关阿共的事务也交由贝尔格莱德处理。莫斯科与地拉那的联系是通过南斯拉夫人进行的，包括苏联提供的武器也是经由南斯拉夫转交的。[④]随着南阿关系的日益发展，南共便提出了阿尔巴尼亚加入南斯拉夫联邦的问题。对于阿党内反对这一方针的政治局委

①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p.37.

② 以上电报存保加利亚国家中央档案馆，转引自*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c.160-161；№2，c.159。关于季米特洛夫的反应，参见甘乔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219–220页。

③ 斯大林与赫布朗会谈记录，1945年1月9日，АВПРФ，ф.6，оп.7，п.53，д.872，л.8-28。

④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c.166.

员谢伊富拉·马列绍瓦，南共认为有必要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施加影响，以清除这种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的人物。1946 年 2 月，阿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于谴责“机会主义”之后，将马列绍瓦开除出了领导集团，同时把发展与南斯拉夫“更加紧密而又具体的兄弟情谊”列为党的任务之一。①1946 年 3 月 27 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邀请阿共总书记霍查正式访南，以订立南阿友好条约。同时，签订关于密切经济合作、简化（在颇大程度上废除）两国之间边界制度的各项协定，以及关于共同防御的秘密军事协定。4 月初，南阿分别通报莫斯科征求意见。②南阿谈判的前景引起了莫斯科的严重关注。当铁托在 4 月 22 日与苏联大使谈话时透露出“阿尔巴尼亚早晚应当加入南斯拉夫联邦”口风后，拉夫连季耶夫接到了紧急指示，应向南斯拉夫领导方面查明情况，同阿尔巴尼亚拟议中的条约可能是针对谁的。4 月 23 日，卡德尔做出了说明：条约是针对意大利的，既然在条约中规定了在保卫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完整和独立方面互相帮助的条款，那么间接地也是针对希腊的，因为后者曾经妄想得到阿尔巴尼亚南方的一些地区（北埃皮尔）。③铁托本来已确定就南苏经济合作以及请苏联帮助援建“军工生产基地”的问题，亲自前往莫斯科参加与苏联政府的谈判。拉夫连季耶夫根据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通知铁托说，同意他在巴黎和会以后进行访问。但 5 月 7 日，苏联大使通知铁托说，访问将安排在巴黎和会之前，即 5 月下半旬进行。同时，苏联政府将要同他讨论南阿条约的问题。④显然，关于南阿条约谈判的消息促使苏联方面突然把访问的日期提前了。

在铁托到达莫斯科之前，拉夫利谢夫起草了“关于南阿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称，签署南阿友好互助条约是“有益和重要的事情”，但建议在条约中不要直接提及意大利。至于“讨论阿尔巴尼亚归入南斯拉夫联邦的问题”，报告建议这件事应推迟进行，“以防止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国际地位复杂化”。报告还建议不签订南阿秘密军事协定，不签订专门订有简化边界条款的协定，以免引起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注意。⑤于是，在 1946 年 5 月 27 日与铁托的会谈中，斯大林主张推

① 铁托档案馆，ф.КМЈ，I-3-b/19//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с.17-18。

② 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0，л.1-2；д.15，л.24-25，56//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с.18.

③ 卡德尔与拉夫连季耶夫的会谈记录，1946 年 4 月 23 日，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5，л.45//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с.18。

④ 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5，л.31，62，76，100//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с.17-18.

⑤ 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0，л.1-3//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с.31.

迟南阿联合的事情，但同意南阿首先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和经济合作协定，并表示赞成阿尔巴尼亚接近南斯拉夫的方针。[①]铁托顺从了斯大林的意见。7月初霍查访问南斯拉夫，在莫斯科同意的范围内与铁托签署了条约和协定。不久，阿政府便得到通知，为了“加强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的联系”，苏联政府支持签订这些文件。[②]

此后，看似顺利发展的南阿关系渐渐露出了危机的苗头。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冷战的出现。南阿友好互助条约的签订在西方和巴尔干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各大报纸纷纷进行指责，而特别感到愤怒的是希腊人。雅典《论坛报》的一篇社论直截了当地指出：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条约是对希腊和联合国的挑衅。这一条约可能成为巴尔干火灾的起因！[③]西方世界对南阿条约的强烈反应，使斯大林感到必须限制南斯拉夫在希腊内战中的行动。另一方面，当斯大林有心在东欧共产党中进行整肃，以便于采取统一行动时，南阿之间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将阿尔巴尼亚纳入南斯拉夫的道路，在莫斯科已经行不通了。斯大林开始关注地拉那了。1947年7月，斯大林邀请霍查和组织书记、内务部长科奇·佐泽访问了莫斯科，此后苏联与阿尔巴尼亚逐渐建立了直接联系。莫斯科不仅派遣苏联专家到阿尔巴尼亚勘探石油，而且向地拉那派出了公使。为了安抚铁托，苏联公使丘瓦金通知南斯拉夫人说，斯大林向霍查表示，苏联在南阿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并将一如既往地尊重贝尔格莱德在阿的特殊地位。但是，斯大林在会见霍查时曾声明，阿尔巴尼亚是独立的国家，应该独立自主地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实际上暗示了苏联对南斯拉夫对阿政策的不满。[④]

在这种背景下，阿党内以政治局委员、经济部长纳科·斯皮洛为首的反南势力悄悄崛起，并且越来越赢得霍查的信任，而以佐治为主要代表的亲南派则遭到冷遇。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的合作消极起来，斯皮洛与丘瓦金的交往却日趋密切，阿电台和报纸也不断出现对苏联的赞扬和吹捧。[⑤]铁托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忧虑和不满，在致函霍查提出警告未能奏效以后，于1947年8月直接向苏联提出了要求，他向拉夫连季耶夫明言：“在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以后，某些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对南斯拉夫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并且错误地评价南斯拉夫对阿奉

① 斯大林与铁托的会谈记录，1946年5月27日，АПРФ，ф.45，оп.1，д.397，л.107-110。

② 拉夫连季耶夫与霍查会谈记录，1946年7月24日，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5，л.167-168//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с.31。

③ 佩罗·兹拉塔尔：《霍查政治传记》，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24–125页。

④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с.166.

⑤ 兹拉塔尔：《霍查政治传记》，第132–134页。

行的友好政策。”铁托指责斯皮洛“奉行使阿尔巴尼亚疏远南斯拉夫的政策”，对南共扶植起来的霍查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也表示不满，同时赞赏佐泽是“最坚定的和始终如一的领导人”。铁托要求苏联同意他非正式地邀请霍查和佐泽访问南斯拉夫，并认为应当向霍查和佐泽指出，“不能把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看成是苏联希望阿尔巴尼亚疏远南斯拉夫的表现，而是恰恰相反，应当将其视为对两个邻国之间亲密关系的促进。”同时，南共还打算向阿尔巴尼亚人建议解除斯皮洛的职务。[①]自然，铁托的要求没有得到回音。至 11 月，当南共认为阿党内部反南派的行为已超出限度时，铁托又发出了一封措词更加激烈的信件，要求阿共中央政治局弄清事实，做出解释。鉴于铁托和南共的威望和影响，霍查只得召开中央全会，讨论铁托的信件和斯皮洛事件。看到霍查再次与佐泽接近以后，斯皮洛感到失望而开枪自杀。关于斯皮洛的死，霍查含糊其辞地向莫斯科解释说，斯皮洛有反苏情绪，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对此，丘瓦金呈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份长篇报告，认为这种说法没有证据。据说，斯皮洛是斯大林看中的人，因此，这一事件震动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大发雷霆，指责苏驻阿使馆，怎么能够允许斯皮洛自杀？怎么可能对这么重大事件毫无防范？然而，铁托并不知道莫斯科已另有打算。南共于 12 月初致函苏联领导人，提出对斯皮洛的指控，并要求莫斯科同意召回苏联驻阿专家和采取措施加强南在阿的支配作用。作为答复，斯大林建议派吉拉斯或其他“非常熟悉阿尔巴尼亚情况”的“负责同志”到莫斯科来。[②]

1948 年 1 月 15 日，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会见了吉拉斯。会谈中，斯大林虽然表示斯皮洛自杀一事不应发生，但是当吉拉斯试图进行解释时，斯大林却打断他的话说：“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没有什么特殊利益可言。我们同意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在不到十分钟就结束的谈话中，斯大林做出结论：苏南在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上没有分歧，甚至委托吉拉斯替苏联政府起草一封给铁托的电报，通报这一结论。[③]斯大林这番话的真实用意引起了研究者的疑问，[④]目前尚没有发现新的档案证据可供参考。不过，从事态的发展以及谈话时的语气和用词可以判断，斯大林说的

① 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谈话记录，1947 年 8 月 14-15 日，АВПРФ，ф.6，оп.9，п.82，д.1285，л.110-112。

② 兹拉塔尔：《霍查政治传记》，第 135–138 页；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 104–106 页；*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с.158。苏南往来信件见 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9，л.1-5，8。

③ 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 111–115 页。

④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с.158.

是反话。况且，此事直接涉及斯皮洛与苏联的关系，斯大林显然也有难言之隐。莫斯科在等待彻底解决问题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了。根据南斯拉夫档案材料，在得到吉拉斯发自莫斯科的关于苏联立场的报告后，1 月 19 日，铁托建议霍查在阿南部提供一个基地，供南斯拉夫的一个师进入，理由是有消息说，存在着希腊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支持下侵阿的危险。[①]或许是斯大林关于维持南在阿优势地位的表示鼓励了铁托，抑或是斯大林关于南阿不得急于合并的警告刺激了铁托，无论如何，铁托做出这样的决定时没有同苏联商量，也没有向苏联通报。莫斯科从霍查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激烈地谴责了南领导人的这类行动，并指出在理解南阿两国关系时，苏联同南斯拉夫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拉夫连季耶夫紧急约见铁托，要求对方确认是否存在南军队将进入阿的决定。铁托对此予以承认，但申辩说是征得霍查同意的，并强调发生对阿入侵的可能性。铁托还提出，他不同意莫斯科关于在南军队进入阿的情况下，美英除进行舆论攻击外还会出兵干涉的说法。但同时也表示，既然苏联反对此举，南政府将不会派出军队。斯大林对铁托的答复仍不满意，要求派“南斯拉夫政府的重要代表”来莫斯科讨论“分歧”。[②]

在南向阿派驻军队的问题上，斯大林除了担心南阿关系进一步发展可能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形成威胁以外，更多考虑的则是与阿尔巴尼亚密切相关的希腊局势。如果说苏联对南保关系和南阿关系的政策在冷战政策确定前后有所变化的话，那么斯大林对希腊革命的态度则始终是谨慎和保守的。因为希腊与阿尔巴尼亚在北埃皮尔地区有领土争端，根据南阿条约，一旦希腊使用武力，南斯拉夫就有义务向希腊宣战。但是早在 1944 年 10 月与丘吉尔划分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

① 有学者认为是铁托误解了斯大林的真实意图，以为莫斯科仍然承认南斯拉夫在阿的特殊地位。吉拉斯后来披露，铁托出兵的真实意图是为使阿成为南斯拉夫联邦的第七个共和国做准备。见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p.37。

②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c.158-159. 吉拉斯关于苏南保代表秘密会晤的报告，1948 年 2 月 10 日，转引自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7，№4，c.102-103。按照南斯拉夫人过去的说法，是霍查主动要求南斯拉夫派遣两个师的部队赴阿尔巴尼亚的南部，南政府原则上同意了这一要求。见德迪耶尔：《铁托传》，第 111 页。但新材料表明，在阿党政治局讨论这一问题之前，霍查曾问过斯大林的意见，而莫斯科立即答复：没有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这种行动是完全不必要的。斯大林还解释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轻易激怒我们以前的盟友们。”见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p.38。

时，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斯大林就把希腊给了英国。[①] 希腊本来就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而美国对希腊革命的强烈反应也使得莫斯科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谨慎从事。从美国政策的角度看，希腊问题与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一样，都是杜鲁门主义产生的重要背景，是对苏联扩张野心和世界革命运动的本能恐惧，而苏联的对策则反映出斯大林维护雅尔塔体系的主旨，特别是 1947 年马歇尔计划引起苏美关系趋向紧张以后，斯大林更不想在巴尔干地区引火烧身。所以，莫斯科不得不“一再以国际形势微妙而须审慎从事为由”来敷衍希腊游击队。据希腊游击队领导人马科斯回忆，莫洛托夫一直为了外交上的原因拖延被编成“外籍军团”的志愿军进入希腊作战，后来答应如果成立“一个正式政府”，苏联“将立刻承认”。然而，当 1947 年底希腊临时民主政府宣布成立后，莫斯科又答复说，要等弄清英国人和美国人会做出什么反应，才能承认这个政府。[②] 在这种情况下，铁托试图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队，显然是斯大林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何况南共还是背着莫斯科做出这一决定的。

斯大林对希腊革命和民主政府的态度最突出地表现在 2 月 10 日苏南保三国领导人的会谈上，而正是这次会谈，成为苏南走向分裂的起点。

三、分裂：斯大林的压力和铁托的抵制

斯大林召集南保领导人谈话的目的是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南共和保共服从莫斯科的指挥，回到共产党情报局已经确定的统一路线上来。如果铁托像季米特洛夫一样表示顺从，苏南分裂局面本来是不会形成的。然而，南共对斯大林在 2 月 10 日会谈中做出的决定采取了抵制的立场，这是苏联绝对不能容忍的。

---

① 过去有人对斯大林与丘吉尔的这个协定持怀疑态度，但苏联档案中的新证据说明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协议。见 АПРФ，ф.45，оп.1，д.283，л.3-16，转引自 *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И.В.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з，1944-1947гг.，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с.19。

② 卡尔沃科雷西等编：《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第 243 页；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第 218–219 页。

在这次长达3小时的会谈[①]中，斯大林态度严厉，"怒容满面"，时常粗暴地打断南、保领导人的讲话，以至他们往往无法明确和连贯地陈述自己的看法。会谈的中心议题是指责南保两国在签订南保条约、发表于东欧国家联邦的声明以及向阿尔巴尼亚派驻军队这三个问题上所犯的原则性和政策性错误，其根本原因在于南保两国在采取这些行动前没有预先征得苏联政府的同意，从而违背了共产党情报局波兰会议所形成的互相协商、统一行动的决议。问题的性质在于南保两国的政策与苏联的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此，斯大林要求南保两国在会谈后分别与苏联签署一份关于在所有对外政策问题上必须经过双方协商的文件。

档案文献充分表明，斯大林所担心的，就是美国和西方对此做出强烈反应，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从而使莫斯科在国际舞台上和处理苏美关系时陷入被动局面。斯大林批评季米特洛夫的声明是在帮助美国的反动派，"当前美国正在进行大选前的斗争。对我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那里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如果美国反动财团在大选中重新进入政府，"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和我们的行动过错造成的"。在谈到阿尔巴尼亚问题时，斯大林说，"如果铁托向那里派去一个师或仅仅一个团"，美国和英国"就会大喊大叫说，阿尔巴尼亚被占领了"，"就会充当阿尔巴尼亚独立的保护者的角色"。莫洛托夫则举出战前国联因苏芬冲突宣布苏联为侵略者为例，担心美英"可能使联合国走到反对我们的地步"。总之，这些"共青团员式"的"左"派热情将为国际反动派提供借口，而给苏联造成不利。[②]

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斯大林指出：希腊问题是可能导致一场全面战争的"国际大问题"，因此，对于阿尔巴尼亚只能派出教官，提供武器装备，如果遭到侵犯，"让他们自己保卫自己的独立"，这样美国人就很难发动进攻了。对于希腊游击队，既然他们没有可能取得胜利，就需要收缩那里的游击运动。如果我们帮助游击队，

① 关于2月10日会谈的史料，过去有吉拉斯、卡德尔的回忆录和德迪耶尔在《铁托传》中的记述。目前新发现的有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外交部长科拉罗夫关于这次会谈的记录（保加利亚国家中央档案馆，ф.147，оп.2，д.62，л.5-35，转引自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7，№4，с.96-102）和吉拉斯关于这次会谈给南共中央的报告（铁托档案馆，ф.KMJ，I-3-b/651，转引自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7，№4，с.102-109，英译本见 *CWIHP 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p.128-134。由于政治原因，吉拉斯在写回忆录时未能使用这份档案）。此外还有当时苏方的记录（АПРФ，ф.45，оп.1，д.253，л.20-21），可惜笔者至今尚未得到这个档案文献。尽管在细节上有一些出入，但在所谈问题的提法和原则上，南斯拉夫人的回忆与档案文献还是比较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档案文献中的记载更加全面和细致，而回忆录中有不少场面和心理的描写。以下对会谈的记述综合参考了这些材料，除档案文献新增加的内容外，不再注明出处。

② 科拉罗夫关于苏南保代表会谈的记录，1948年2月10日，转引自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7，№4，с.98-99。

英美就会插手，英美想在希腊建立军事基地，不能为他们提供借口。至于马科斯政府，应该让与希腊相距较远的国家首先承认，而周边国家最后承认。

此次谈话中最令人费解的是斯大林关于巴尔干联邦的说法，虽然几个材料的用词不同，但都记录了斯大林如下的意见：只有三个联邦是可能的和自然的：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但所有这些国家成立一个联邦是不现实的。斯大林还反复强调，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立即实现联合，然后阿尔巴尼亚再加进去，而且条件已经成熟，不能拖延。如果愿意，明天成立也可以，首先可以从政治联合开始，这样别人进攻阿尔巴尼亚就困难了。就目前的材料看，还很难对斯大林这番话的真实用意做出肯定的判断：真是考虑到巴尔干的局势，还是迁就南斯拉夫的意愿，[①] 或者像南斯拉夫人后来断定的那样，莫斯科企图通过联邦这种形式，通过俯首听命的保加利亚人，加强对南斯拉夫的控制和影响？无论如何，斯大林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特别是会谈前后苏联在经济和军事援助方面采取的消极态度，使南共领导人产生了对立情绪，并对斯大林的意图做出了最坏的估计。他们决定实行抵制。

南斯拉夫领导人到莫斯科本来是准备商谈在军事工业和贸易方面经济合作问题的。吉拉斯来莫斯科特意率领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在 1 月 15 日与斯大林和 16 日与布尔加宁的会谈中，苏联对于吉拉斯提出的关于援助军事工业设备的要求满口答应下来，但却就是拖着不办。在吉拉斯之前来莫斯科商谈续签换货议定书的外贸部副部长茨尔诺布尔尼亚已经等了三个星期，当他和吉拉斯终于见到米高扬时，得到的还是一张空头支票。经济谈判毫无进展，显然，莫斯科首先要解决苏南对外政策的分歧。[②] 果然，2 月 10 日的会谈根本没有涉及经济问题。在会议结束后给铁托的电报中，南斯拉夫代表团失望地报告说：“我们没能提出任何一个我们的经济问题。为此，卡德尔想拜会莫洛托夫。我们将尽快回国。”[③] 卡德尔在 11 日夜晚非常不情愿地签署了苏南两国“有义务就涉及两国利益的所有重要国际问题进行相互协商”的议定书[④] 后，向莫洛托夫提出了“尽快解决军事供应问题，以及为南斯拉夫的军

① 据卡德尔的回忆，在谈到联邦形式时，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竟同意南共的主张，即只能是七个成员平等的联邦，而不是两个国家的联邦（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第 127 页），但在其他材料中没有这样的记述。

② 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 114–115 页；德迪耶尔：《铁托传》，第 107–108 页；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第 144–145 页。

③ 铁托档案馆，ф.KMJ，I-3-b/651，转引自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7，№4，с.111。

④ АПРФ，ф.3，оп.66，д.908，л.151，转引自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7，№4，с.109。另参见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第 133–134 页。

事工业提供设备的问题”，并抱怨说，“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已就这些问题工作了数个星期”，莫洛托夫推说不了解情况。对于卡德尔提出的6000万美元借款的要求，莫洛托夫也只是同意向政府通报。第二天莫洛托夫答复，军事供应的问题需要研究，至于借款则苏联无能为力。[①]2月26日，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克鲁季科夫通知茨尔诺布尔尼亚，他代表苏联政府宣布，现在不能签订1948年5月至年底的贸易议定书，南斯拉夫也没有必要派遣贸易代表团来莫斯科。[②]

不过，事情也并不完全是南斯拉夫人回忆录给人们留下的那种印象，似乎莫斯科只是靠高压手段迫使南共就范。斯大林在会谈中对季米特洛夫讥笑、讽刺、辱骂、挖苦，而对南共领导人则显得客气和宽容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与保共依靠莫斯科扶持的发展道路不同，南共的天下是自己打出来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有一定地位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斯大林确实不想过分刺激桀骜不驯的铁托，以免撕破脸皮，把南共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当卡德尔转告莫洛托夫铁托打算亲自来莫斯科作正式访问，“以便消除同苏联政府相互关系中的各种误会”后，莫洛托夫答复：“斯大林同志和其他同志都很高兴与铁托同志会面，时间按卡德尔讲的在3月或4月。”[③]此外，2月23日吉拉斯回国后曾向拉夫连季耶夫提出，为何苏联不发表铁托在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在收到拉夫连季耶夫关于吉拉斯所提问题的电文后，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征得副外长佐林的批准，于3月初建议国立政治书籍出版社立即把铁托的上述报告收录进铁托文选和演讲集里，该书那时已经译成俄文准备出版。[④]可见，莫斯科还是在力争使南斯拉夫服从自己的要求，然而，铁托对苏联压力的抗争和抵制终于使斯大林失去了耐心。

铁托对2月10日会谈的反应首先表现在他2月13日给吉拉斯和卡德尔的电报中，他对“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结果”表示不满，因为会谈的结论“束缚了我们的双手”，以至无法在“边境防御方面采取有效措施”。铁托通报了阿尔巴尼亚最近的困难局势，希望他们能以此为由继续谈判，以得到莫斯科对一

---

① АПРФ，ф.3，оп.66，д.908，л.149-150；АВПРФ，ф.6，оп.10，п.79，д.1106，л.1-2。另参见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第134页。

② 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谈话记录，1948年3月10日，АВПРФ，ф.6，оп.10，п.76，д.1106，л.57-61。铁托致莫洛托夫的信，1948年3月18日，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2，№4-5，с.124-125。参见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第144–145页。

③ АПРФ，ф.3，оп.66，д.908，л.149-150；АВПРФ，ф.6，оп.10，п.79，д.1106，л.1-2.

④ АВПРФ，ф.144，оп.32，п.128，д.8，л.107；д.18，л.7-8，转引自*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с.160。

旦“阿尔巴尼亚遭到进攻”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具体答复”。① 南斯拉夫代表团回国后，在 2 月 19 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莫斯科之行的详细情况，会议认为，由于苏联在保加利亚的特殊影响，建立联邦可能成为对南实行控制的手段，因此应当拒绝同保加利亚就联邦问题进行磋商。会议还确定了继续维持南在阿优势地位的方针，并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南关系问题。2 月底至 3 月初，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和推动下，不了解 2 月 10 日莫斯科会谈情况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再次向苏联提出了因存在着希腊威胁而让南军队进入阿的必要性，同时还提出了南阿统一的建议。②

最令克里姆林宫震惊的是贝尔格莱德传来的南共中央政治局 3 月 1 日扩大会议的情况。会议讨论了关于莫斯科会谈情况的报告、五年计划、军队和军事工业以及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问题。铁托在会上指出，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走进了死胡同，并且特别强调，苏联推迟签订贸易协定是对南施加经济压力，其目的是使南斯拉夫处于从属地位。至于南保联邦，南共领导人指出，由于保加利亚在政治上党内派别纷争，在经济上贫穷落后，目前联合的条件尚未成熟，而苏联极力主张立即实现联邦，是在使用“特洛伊木马”的计策。铁托最后强调，这场争论关系到“南斯拉夫的独立问题”。会议一致通过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只有政治局委员、财政部长茹约维奇默不作声，会后，他把一切情况向苏联大使馆作了汇报。③

3 月 11 日拉夫连季耶夫奉召紧急回国，④ 此后苏南两国便开始在推迟签订贸易协定、调整卢布和第纳尔的汇率、拒绝海军和军火工业的援建等具体问题上互相指责。⑤3 月 18 日莫斯科通知铁托，鉴于南斯拉夫经济委员会违背协议，拒绝向苏联贸易代表列别杰夫提供他所需要的经济资料，苏联决定撤回全部在南苏联专家和工

① 铁托给吉拉斯和卡德尔的电报，1948 年 2 月 13 日，铁托档案馆，ф.KMJ，I-3-b/651，转引自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7，№4，с.113。

② 见南斯拉夫档案文献及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472，л.78-79，84-86，转引自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с.160。

③ 德迪耶尔：《铁托传》，第 122–125、137–140 页；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第 273 页。现在的档案材料证实了南共领导人当时的猜测，茹约维奇确是拉夫连季耶夫的情报员，他以前不止一次地把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特别是南共领导人在小范围内表露出来的对苏联的不满情绪透露给苏联大使。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5，л.112-113；д.16，л.75-76，转引自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с.160。

④ АВПРФ，ф.202，оп.5，п.110，д.1，л.17//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2，№4-5，с.130.

⑤ 莫洛托夫给铁托电报，1948 年 3 月 13 日；铁托给莫洛托夫的信，1948 年 3 月 18 日，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2，№4-5，с.124-125。

作人员。[①]与此同时，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向苏斯洛夫提交了关于南斯拉夫所犯错误的长篇报告。报告首先指出，“南斯拉夫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接着从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忽视苏联作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决定性力量、过高地估计南斯拉夫在发展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成就、过低地估计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富农的危险、对共产党在人民民主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采取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态度等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南共的错误表现及理论根源。[②]正是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3月27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派专使向铁托递交一封对南共进行全面指责的信。斯大林把苏南关系恶化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南共所采取的反苏政策的立场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③]

铁托收到这封引起苏南全面论战的来信后的最初感受，用他自己的话说，好像遭到雷击一样，但他很快镇静下来，并召集卡德尔、吉拉斯等人商议对策。他们一致下决心接受莫斯科的挑战，并决定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如何回复斯大林的指责。在4月12日秘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代表们慷慨陈词，异常激动，纷纷表示拥护南共领导人抵制苏联压力和指责的立场。会议严厉指责了茹约维奇的亲苏态度，还对他是否向苏联使馆提供情报的事情提出质问。第二天继续召开的会议通过了给莫斯科的复函，并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反党案件。[④]在4月13日发出的回函和关于南共中央全会决定的通报中，铁托首先把苏南争论的起因归结为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向苏联提供的虚假情报，然后逐一驳斥了苏联的严厉指责。[⑤]南斯拉夫不肯屈服的行为激怒了斯大林，他不再像同志和兄弟那样参与争论了。5月4日和22日，以联共（布）中央名义发出的信措词更加激烈，态度更加严厉，表明了斯大林与铁托彻底分手的决心。[⑥]

斯大林决心整治南共，除恼怒于铁托的反抗态度和顽固立场外，更担心以铁托的威望和影响力，东欧各党会纷纷仿效，打出独立的旗帜，从而引起社会主义阵营

① 莫洛托夫给铁托或卡德尔的电报，1948年3月18日，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2，№4-5，с.125。

②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南斯拉夫意识形态问题给苏斯洛夫的报告，1948年3月18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63，л.9-24。

③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铁托的信，1948年3月27日，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2，№4-5，с.127-129。

④ 德迪耶尔：《铁托传》，第127–130、132–140页。赫布朗因党内矛盾于1946年6月已被贬职。

⑤ 铁托、卡德尔给斯大林、莫洛托夫的信；南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的通报，1948年4月13日，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2，№6-7，с.158-164，164-165。

⑥ 联共（布）中央给南共中央的信，1948年5月4日、22日，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2，№10，с.141-151，154-155。

分崩离析，破坏苏联的战略部署。莫斯科已经看到了这种危险的信号。2 月 19 日匈共总书记拉科西访问苏联时提出，经与南共和捷共领导人磋商，他建议召开情报局会议，讨论承认希腊临时民主政府的问题，并表示匈共已经接受了马科斯和铁托的代表的要求，同意“把支援希腊民主军的工作部门移到匈牙利”，为此将每月从预算中拨出 200 万福林。① 还在 2 月中旬的时候，日丹诺夫和苏斯洛夫就在与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得知，南共建议奥地利共产党人分裂奥地利，即在苏占区建立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单独政府。3 月 22 日拉科西又来信说，在 3 月 15 日同奥共领导人谈话时，匈共主张，现在要让“邻近的人民民主国家”帮助“奥地利的同志在共同行动计划的基础上改变奥地利的局势”。拉科西还说，匈共和南共领导人都支持意共领导人正在讨论的计划：如果美国干预将于 4 月份举行的选举的话，意共打算在意大利北部发动武装起义，并夺取政权。② 在莫斯科看来，这些都是冒险主义的行为。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 3—4 月间提供的关于东欧各党独自行动的一批材料，更使斯大林感到不安。这些材料批评大多数匈共领导人可能担心被指责为是“莫斯科的代理人”，因而对苏联冷漠。“这表现在共产党领导人在匈牙利不仅不宣传也没有兴趣宣传苏联和苏联文化，而且容忍许多粗暴歪曲苏联现实和包含有赤裸裸反苏内容的书籍和出版物进入匈牙利”。材料还指责波兰领导人试图“证明自己道路特殊性”，“对苏联不友好，特别是对苏联在社会主义中的经验和成就视而不见”，没有同波兰民族主义的各种倾向进行斗争，害怕被人指责为“使波兰苏维埃化”。至于捷共领导人，材料说他们“以民主改造捷克斯洛伐克的共同纲领把自己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系在一起”，使民族政策“服从于同资产阶级实行民族统一的利益”。“他们笃信同资产阶级政党‘密切’合作的可能性，实际上滑向了对反动的资产阶级一味让步和妥协的道路”。③

显然，如果不采取措施迅速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一旦铁托的分裂行动在东欧各党当中产生连锁反应，其后果不堪设想。斯大林决定发挥共产党情报局这一机构的组织力量，在打击南斯拉夫的同时，震慑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党。为此，斯大

① 苏斯洛夫与拉科西会谈纪要，1948 年 2 月 19 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65，л.59-62。

② 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100，л.6；ф.17，оп.128，д.1165，л.69-79，转引自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с.164；*Мурашко Г.П.*，*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с.102。

③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65，л.64-65；д.1161，л.2-5；д.1162，л.61，45-46，转引自 *Мурашко*、*Носк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с.103-104。

林把 3 月 27 日斥责南共的信件抄送东欧各党，并针对南共在复信中提出的邀请联共（布）代表到贝尔格莱德解决分歧的建议，在 5 月 4 日的信中提出将召开情报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最初，只有匈共在 4 月 8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激烈谴责南斯拉夫人的决议，并且将决议寄给了联共(布)中央，大多数东欧情报局成员党的领导人在接到苏联 3 月 27 日给南信件的复本后，并没有立即对此做出苏联所希望的那种反应。保共政治局于 4 月 6 日通过了与苏联立场保持一致的决议，但并不认为有必要将决议寄送莫斯科，而波、罗、捷各党则认为没有必要就苏联的信件通过一个专门的决议。哥穆尔卡在开始时甚至表示对南斯拉夫人的指责不可信，并认为莫斯科所采取的行动是过分的。但是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东欧各党纷纷开始效法匈牙利的做法。4 月 18 日和 19 日，季米特洛夫和哥穆尔卡分别把他们通过的决议寄给了联共(布)中央。4 月 22 日，莫斯科收到了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同意苏联指责南领导人的决议。4 月 23 日，又收到捷共中央主席团在 4 月 19 日通过的决议。随后，联共（布）中央便将这些表示支持苏联立场的决议全部转寄给南共中央。在 4 月底和 5 月上旬，法共中央政治局和意共中央书记处也分别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不知道是莫斯科的授意，还是出自对南共的同情，或许二者兼而有之，东欧各党领导人纷纷对铁托进行说服。5 月 6 日，保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让季米特洛夫“给铁托写了一封私人信函，向他指出南共所走道路的危险性”。5 月 16 日乔治乌－德治在同南驻罗大使谈话时说，如果南斯拉夫人不参加会议，将使南共与其他党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这只能“对敌人有利”。他劝告南斯拉夫领导人承认哪怕是部分承认“错误”，派铁托为首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联共(布)中央进行直接的谈判以调整两国关系和停止冲突。[①]

在这种气氛中，5 月 18 日苏斯洛夫致函铁托，正式通知他：联共(布)中央建议 6 月 8—10 日召开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以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现状问题。但莫斯科很快就接到了铁托的回函，南共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②]5 月 22 日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署名的致南共中央的信告知，会议改在 6 月下旬，信中还强调，“无论南共中央的代表是否出席”，会议都应当举行，而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意味着南共中央走上了“脱离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的道

①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с.165-167.

② 苏斯洛夫给铁托的信，1948 年 5 月 18 日；铁托给苏斯洛夫的信，1948 年 5 月 20 日，铁托档案馆，ф.KMJ，I-3-b/651//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2，№10，с.152-153。

路”。[①] 或许真是要做最后的努力，哥穆尔卡 5 月 25 日致函南共中央进行劝说，希望南共相信苏联所说的话，即不参加会议“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脱离世界革命运动的后果”，并表示准备于 6 月 5—10 日同波党政治局委员贝尔曼一起来贝尔格莱德。但铁托拒绝波兰人来访，对于 6 月 8 日德共主席皮克提出的 6 月 17—18 日在索菲亚与他会晤的请求，也没有应承。根据南斯拉夫从驻苏使馆和派驻联共（布）中央的南共中央代表那里收到的各种报告来看，在 5 月底到 6 月初的时候，苏联方面曾经暗示，只要南斯拉夫哪怕部分地承认“错误”，冲突就有可能解决。[②] 但同时也有证据表明，苏联此时早已做好了在情报局会议上批判南共的准备。从 4 月下旬至 5 月，根据苏联领导人的指示，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开始查阅 30 年代与铁托及南共活动有关的共产国际文件。日丹诺夫利用这些材料起草了会议报告和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6 月初提交给斯大林的第一份草稿后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作了修改。6 月 7 日日丹诺夫把新的草稿递交斯大林。但在斯大林审阅后这份草稿又做了很大的修改，主要是加重了对南领导人的指责。[③]

无论如何，在铁托看来，如果出席情报局会议就意味着投降、无条件的投降，而南共中央则意识到铁托若出席会议，其人身安全没有保障。[④]1948 年 6 月 20 日，南共中央发表了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的声明。[⑤] 实际上，苏联人已经估计到这种结局，他们甚至不需要对会议的报告和决议做任何修改，因为在编写这些材料时，“已经考虑到了南斯拉夫人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这种情况”。[⑥] 于是，很自然的结果就是本文开始所说到的，铁托被斯大林逐出了教门。

可以做出的简短结论是：斯大林和铁托都不想、也没有想到苏南两党会分道扬镳，彻底决裂；苏南冲突的背景在于苏联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因冷战乍起而发生了重大变化；斯大林要求社会主义阵营绝对服从莫斯科统一指挥和铁托坚持要保证南共在巴尔干的特殊地位使苏南冲突成为必然结果；斯大林坚决制裁铁托在很大程度

---

① 联共（布）中央给南共中央的信，1948 年 5 月 22 日，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2，№10，с.154-155。

②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с.166-167.

③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63，л.52-68；ф.575，оп.1，д.411，л.1-146；ф.77，оп.3，д.105，л.49-50；ф.494，оп.277，д.21，л.329а-329，330-337；ф.77，оп.3，д.104，л.1-26，转引自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с.168。

④ 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第 176–177 页；德迪耶尔：《铁托传》，第 105–152 页。

⑤ 声明全文见克利索德：《苏南关系》，第 375–377 页。

⑥ 茹拉夫廖夫（日丹诺夫）、马克西莫夫（马林科夫）、索罗金（苏斯洛夫）致菲利波夫（斯大林），1948 年 6 月 21 日，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106，л.21，转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с.488。

上是为了统一东欧各党政策，节制对西方过分和过早的挑战，但苏联－东欧集团的强化反过来恰恰加剧了对抗，凝固了冷战格局。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一句名言对苏南冲突做出了形象的总结："马克思是共产党人的上帝，列宁是共产党人的耶稣·基督，斯大林是共产党人的第一任教皇，铁托是共产党人的第一个马丁·路德。"[①] 不过应当指出，所谓铁托的独立道路是苏南冲突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

发表于《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略有修改

① 引自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第279页。

论 1948 年苏南冲突的结果

——南斯拉夫是如何走上独立道路的?

对于 1948 年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的考察，无疑在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从某种角度讲，铁托在南斯拉夫所开创的事业对于 20 世纪后半期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地位，如何选择自己的民族发展道路，都具有启迪意义。如果探究 20 世纪 70—80 年代冷战格局中，南斯拉夫所奉行的不结盟政策为何在第三世界享有如此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人们大多都要回顾和分析战后不久铁托与斯大林之间的那场令世人瞩目的冲突。本文拟通过对苏南冲突结果的历史考察，回答南斯拉夫究竟是怎样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这样一个问题。①

(一)

这里所谓的南斯拉夫独立道路，包含两个概念：一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南斯拉夫游离于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之外，不仅从地理角度，而且从政治角度，都在东西方冲突之中占据了稳固的中间地位；一是在对内政策方面，南斯拉夫经过自身的试验，最终走出绝境，抛弃斯大林模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然而，就其结果而言，无论是不结盟运动，还是工人自治制度，在南斯拉夫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说，这是铁托一生之中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摸索，最痛苦的选择。

苏南分裂以后，南斯拉夫面临的处境极为艰难。为了彻底孤立南斯拉夫，斯

---

① 笔者对苏南冲突起源的考察，见《对 1948 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俄国及东欧国家解密档案的新证据》一文，载《历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

大林首先决定切断南斯拉夫与所有东欧共产党的联系。为此，联共（布）一方面在 1948 年 6 月的情报局会议上组织了对南共的批判，一方面准备揭露东欧各党中存在的亲南倾向和民族主义情绪，以此威慑各党领导人，消除南斯拉夫的影响。在情报局会议的筹备过程中，联共（布）对外政策部就起草了东欧各党要从南共“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情报分析报告。收集的材料涉及波、捷、匈、保、罗各党，甚至已经对波兰工人党和哥穆尔卡本人准备好了“组织结论”。[①] 一旦发现东欧共产党内出现铁托主义的苗头，这些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就会立即抛出来。后来苏联在东欧挑起的大清洗运动，给这些材料找到了用场。

此外，情报局还采取了许多没有公布的组织手段，如将情报局总部和刊物编辑部从贝尔格莱德迁往布加勒斯特，[②] 废除南斯拉夫人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的两个巴尔干地区组织：巴尔干国家工会公约理事会和巴尔干青年理事会，理由是它们妨碍了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内部统一。[③] 特别是通过了从组织上防止出现南共式“异端”、加强情报局各党统一行动的决议。决议不仅提出必须制定一个共产党情报局的章程，而且根据苏斯洛夫的建议确定建立共产党情报局常设机构——书记处，其基本任务是保障各党之间的联系和监督情报局刊物的编辑工作。[④] 随着苏南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也开始恶化。1948 年 7 月 6 日，南斯拉夫驻苏联临时代办费依奇会见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代理司长基尔萨诺夫，通知他南斯拉夫政府决定召所有在苏联的南斯拉夫公民回国。基尔萨诺夫则转达了苏联外交部的指示：苏联的战争残疾人组织决定不参加南斯拉夫战争残疾人协会即将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战争残疾人代表大会。[⑤]7 月 10 日和 15 日，南斯拉夫两次照会苏联外交部，请求“苏联提供可能，让所有在苏联学习和在各个机关工作的南斯拉夫公民”回国。经请示斯大林，莫洛托夫给予了坚决的批示：“不予答复。”[⑥]

南斯拉夫提出这样的要求和苏联拒绝给予答复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莫斯科开始

---

① 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РЦХИДНИ,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 ф.17, оп.128, д.1161, л.20-22. См.: Л.Я.Гибианский: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1947-1948гг., 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2, с.170-171.

② РЦХИДНИ, ф.77, оп.3, д.108, л.23-24. С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1948/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1998, с.493-494.

③ РЦХИДНИ, ф.77, оп.3, д.106, л.5-7. С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482-483, 449, 480.

④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449-451.

⑤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ВПРФ,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ф.06, оп.10, п.78, д.1102, л.1-2.

⑥ 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78, д.1102, л.3-6, 7, 9.

在南斯拉夫党内和国内组织所谓“健康力量”。苏联最早看中的是南共领导层里的亲苏派人物赫布朗和茹约维奇。[①] 当联共（布）中央“获悉南斯拉夫政府已宣布赫布朗和茹约维奇为叛徒和卖国贼”后，担心他们遭到不测，于 1948 年 6 月 9 日致函南共，声明：如果南共“决心从肉体上消灭他们”，“那么联共（布）中央将认为南共中央政治局是刑事杀人犯”。苏联还要求派代表参加对赫布朗和茹约维奇一案的调查。[②] 自然，南共中央拒绝了苏联的要求。[③] 此后，情报局便在 6 月 28 日的决议中公开号召南共党内的“健康分子”站出来，他们的任务是：“迫使现在的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并公开地、诚恳地加以纠正；迫使他们与民族主义决裂，回到国际主义上来，千方百计地巩固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④]

由于铁托和兰科维奇的严密控制，国内“健康力量”没有发展起来，莫斯科便开始着手组织南斯拉夫“流亡政府”。8 月 11 日夜晚，在苏联的策动下，南斯拉夫高级将领约万诺维奇、佩特里切维奇和达普切维奇等人试图逃往罗马尼亚，但他们在越境时被打死或捕获。叛逃现象在驻外官员中更为普遍，很多外交官宣布站在苏联一边。8 月 7 日，《真理报》发表了南斯拉夫前驻罗马尼亚大使拉多万·戈卢博维奇致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主席团的一封信，在这封完全是根据情报局决议精神写的信中，戈卢博维奇宣布辞去他在布加勒斯特所担任的职务。不久，在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的政府官员中也出现了分裂，大使馆代办布兰科夫连同他的九个同事叛逃，剩下的人员则被驱逐出境。[⑤] 与此同时，南斯拉夫边界也处于紧张状态。据卡德尔在联合国发言中列举的事实，仅从 1948 年 7 月 1 日至 1949 年 9 月 1 日这段时间，在南斯拉夫东部边界就发生了 219 起武装冲突事件。[⑥]

最令铁托头痛的是莫斯科实行的经济封锁。战争结束后，南斯拉夫立即集中全力于经济恢复工作，到 1947 年，已经达到战前水平。随后，铁托便开始仿照苏联模式在南斯拉夫推行了雄心勃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然而，这一计划的实现完全倚

---

① 关于赫布朗和茹约维奇与苏联的关系，参见拙文《对 1948 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

②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 №10, с.156. 据说，莫斯科已经内定茹约维奇为南共总书记，赫布朗为政府总理，苏联情报机关甚至曾考虑过组织力量把他们从南斯拉夫营救出来。见斯蒂芬·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1939–1972）：文件与评注》，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翻译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125 页。

③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 №10, с.156-157.

④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455-461.

⑤ 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北京：三联书店，1977 年，第 222–223 页；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第 125 页；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3.

⑥ 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 374 页。

赖于从苏联、东欧各国输入大量的生产资料，特别是采矿设备和工业设备。当时南斯拉夫的进口物资大约有 50% 来自于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方集团国家，而某些主要商品的依赖性还要大得多，如全部煤和焦炭，80% 的生铁和肥料，60% 的石油产品，以及实际上全部的特种机械、钢管、铁路车辆和机车，都需要从苏联及其卫星国进口。①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导演的经济封锁对南斯拉夫来说就意味着灾难。情报局会议以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撕毁合同、压缩贸易，对于已经签订合同，甚至已经付了款的极为需要的制造品、工业品和原料也拒不交货。当年，莫斯科就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的主要商品协定，并宣布把苏联同南斯拉夫的贸易削减八分之七。1949 年 1 月苏联建立了欧洲经济互助委员会，其宗旨除了对抗马歇尔计划，就是对南斯拉夫实行禁运。以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答应的投资贷款只实现了 6.3%，与苏联商定的 67.5 亿旧第纳尔的贷款只实现了 0.6%。到 1949 年 4 月，南斯拉夫与苏联、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的全部贸易已处于停顿状态，与波兰的贸易量则减少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在米高扬访问布拉格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也于 6 月 11 日宣布停止向南运送货物。如此，南斯拉夫被迫宣布延期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封锁给南斯拉夫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4.29 亿美元。②

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南斯拉夫的国防开支迅速增加。1946 年和 1947 年的军费开支平均每年为 3.1 亿美元，1948 年增加到 4.38 亿，1949 年增加到 5.28 亿，以后几年平均为 6.65 亿美元。国防费用在国民收入中占的百分比，1949 年为 10.2%，1952 年即增长到 21.5%。居民生活水平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至 1952 年，南斯拉夫个人消费比 1948 年降低了 14%，已经下降到战后的最低水平。③看起来铁托的统治的确面临险恶，前途未卜。情报局的决议公布以后，西方媒体纷纷预测，在苏联的压力下，铁托政权无法支撑下去。④然而，铁托不仅坚持了下来，而且带领南共开辟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的独立道路。不过，他们是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摸索过程才走上这条新路的。

---

① 乔治·霍夫曼、弗雷德·华纳·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年，上卷，第 177–178 页；下卷，第 178 页。

② 查尔斯·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30 页；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 年》，王希荣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年，第 344 页；爱德华·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李代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 年，第 234 页；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第 177–178 页；下卷，第 178 页。

③ 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 235–236 页。

④ 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 193–196 页。

(二)

不仅苏联的影响和斯大林的威信在南斯拉夫党员和群众当中具有深厚的基础，就是在铁托和南共多数领导人的头脑中，共产主义的传统理念和斯大林主义的思维框架也是根深蒂固的。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对于铁托来说十分尴尬的局面：情报局关于开除南共的决议发表后，南共却要在公开场合为斯大林唱赞歌。在为庆祝南共五大召开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通过了这样一封给斯大林的致敬电："斯大林同志，我们深信，你将竭尽一切努力排除对我们全国，对我们党和我们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没有根据的指责。我们对你，对苏联全国，对你们为全人类所做的一切的爱戴是无限的，诚如我们相信你将竭尽一切使真相不久就大白一样。"电报的结束语是：苏南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万岁！教导我们热爱苏联的铁托同志万岁！我们的伟大朋友斯大林万岁！[①]

在 7 月 21 日召开的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铁托在对情报局的指控提出反驳后，强调了与苏联的团结，并表示希望与苏共消除分歧。铁托在发言中说："我们认为，决议里最使人感到痛苦的，就是指控我们背离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指控我们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指控我们已经抛弃了马列主义科学。""我们的对外政策和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苏联的对外政策过去和现在都符合我国的利益，符合和平的利益。"铁托最后表示："我愿强调指出，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改善南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他赢得了会议代表的支持，大会在"铁托！斯大林！"的热情欢呼声中闭幕。[②]尽管铁托后来向他的同事解释说，这样做是出于策略的考虑，[③]但实际上更大的可能是铁托的革命理想和激情使他在苏南冲突之初并没有想到要与斯大林彻底决裂，因为他们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途径都是一致的。按照南共中央组织书记兰科维奇的说法，南共五大制定的党章，尽管已在共产党情报局决议公布之后，但还是"照抄了苏联共产党的党章"。[④]

在南共被开除出情报局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南斯拉夫在对外政策方面仍然寻求与苏联东欧集团保持一致。南共五大闭幕的第二天，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一次讨

① 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 211–213 页。
② 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1939–1972）：文件与评注》，第 396–397、124–125 页。
③ 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 212 页。
④ 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 29 页。

论多瑙河航运管理条约的国际会议，东西方国家在会上发生了公开冲突。西方国家代表强调“既得权利”，而东方国家代表则力主维护沿岸国家利益的原则。会上，南斯拉夫代表团坚持支持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立场，对于苏联的建议一概毫无保留地表示赞成，甚至对于会议的官方语言只用俄语和法语而不包括英语这样的建议也不例外。[①]以至给南斯拉夫驻外官员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五大以后，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变得十分亲近了。”[②]此外，在《真理报》发表了情报局决议之后，驻莫斯科的美国记者找到南斯拉夫使馆的文化参赞，试探南斯拉夫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可能性。兰科维奇得到消息后立即指示驻莫斯科的代办费伊奇，必须提醒使馆全体同志注意，对于任何人的任何挑衅都不要上当。[③]直到9月26日，铁托还公开表示在欧洲地区南斯拉夫是站在苏联一边的，他甚至很自信地认为，斯大林迟早是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寻求同南斯拉夫的妥协的。[④]尽管莫洛托夫在11月7日苏联国庆时再一次号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举行反铁托的起义，但是南共中央机关报《战斗报》在12月21日斯大林69岁生日那一天，还发表了题为《伟大斯大林的六十九年》的长篇社论，并且用三栏版面刊登了斯大林的照片。而在1949年1月20日列宁逝世纪念日，《战斗报》则发表文章宣称，南共遵循“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与此同时，《斯大林选集》被纳入了出版计划。[⑤]

1949年初经互会成立时，尽管铁托估计到南斯拉夫将被排除在这一组织之外，但为了表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倾向社会主义阵营，铁托还是提出了要求加入经互会的申请。[⑥]在南斯拉夫的请求遭到拒绝以后，铁托依旧努力在外交政策上与苏联集团保持同一条阵线，这特别反映在对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立场上。在1949年3月北约成立时，南斯拉夫对其所进行的强烈抨击，同莫斯科的做法如出一辙，以至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坎农汇报说，南斯拉夫对待大西洋联盟的立场是“完全克里姆林宫式的”。[⑦]

据1949年上半年在南斯拉夫进行采访的美籍南斯拉夫作家阿达米克描述，他与铁托、卡德尔、皮雅杰、兰科维奇、吉拉斯等高级领导人会见后留下的印象是，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8, vol.4, Washington D.C., 1974, pp.634–637.

② 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216–217页。

③ 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289页。

④ RG-59, 86OH.00/9-2748, NA. See Mastny, p.53.

⑤ 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298–299页。

⑥ 详见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29–30页。

⑦ RG-59, 860H.00/3-3149. NA. See Henry W. Brands, JR., “Redefining the Cold War: American Policy toward Yugoslavia, 1948-1960”, *Diplomatic History*, 1987, Vol.11, No.1, p.47.

一直到 6 月底，他们仍然保留着一线希望，"幻想会有可能发生某种事情，促成同莫斯科的和解"。[①]

最令人不解的是，南共在经济领域开始加紧推行一种完全仿照苏联全盘集体化方式制定的农业政策。这被认为是南斯拉夫"战后政治生活中斯大林主义气味最浓的一项措施"。[②] 1949 年 1 月底，南共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在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促进农业生产方面的基本任务的决议，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重新掀起了大规模的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宣传工作和群众运动。虽然南斯拉夫在 1946 年就通过了合作社基本法，开始向集体经济过渡，但当时没有采取强迫措施，特别是对富农也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政策。正是在这一点上，莫斯科指责南共"没有在农村中进行阶级斗争"。[③] 现在情况不同了。在对个体农民进行猛烈宣传的同时，还使用了许多行政手段迫使他们加入合作社。凡是抗拒的人，不论贫富，处处受到阻难和恫吓。国家征购剩余农产品的定额和税率都定得高到无法缴纳的程度，目的就是要迫使所有抗拒集体化的农民破产。在法律规定的四种农业合作社的形式中，国家政策特别导向个体农民加入第四种合作社——最接近苏联集体农庄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大规模群众运动中，这种高级形式的合作社有了迅猛发展：1948 年底还只有 1318 个，到 1950 年底已增加到 6964 个，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的数目也从 60156 户增加到 323849 户，合作社的土地从 323984 公顷增加到 1782614 公顷。[④] 只是由于苏联集体农庄的名称在欧洲极易引起人们的反感，[⑤] 所以南共在合作社名称这一点上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特点，除此之外，南斯拉夫开展的新集体化运动在实质上与苏联模式并没有多大区别，正如 1953 年联合国的欧洲经济调查报告所做的结论：当时南斯拉夫的农业法律，"除了细节以外，同东欧各国制定的农业法律差不多。"

① Louis Adamic, *The Eagle and the Roots*, New York, 1952, p.76, 130, 250。转引自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 29–30 页。另见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第 174–175 页。

② 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 299 页。

③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 №10, с.141-151.

④ 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 111–112 页；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 141–145 页；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 430 页。

⑤ 在情报局会议筹备时，匈共总书记拉科西和波兰工人党政治局委员贝尔曼就指出，他们国家的农民害怕集体农庄，建议以"合作化"取代"集体化"的术语，但遭到日丹诺夫的否定。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48, л.102-103. См.: Л.Я.Гибианский: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2, с.171；波兰工人党甚至决定不搞集体农庄，而提出了自己的合作社计划，同样也受到了苏联的严厉批判。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161, л.15-18. См.: Г.П.Мурашко и А.Ф.Носк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5-1948)"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М.1995, с.105.

然而，绝大多数农民都强烈反对这种苏联方式的农业集体化运动，高额的税收和征购也遇到农民的顽强抵制。因此，集体化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即使在其高潮的 1950 年，集体化土地的面积仍然只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25% 左右（其中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集体化农民在农户总数中只占 17%。在牧场、草原、果园、葡萄园地区，集体化的比例还要低得多。[①] 到 1951 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下降，已经达到某些观察家认为的“一次全国规模的减产罢工”的地步。由于农民的消极抵抗，农业产量出现了灾难性滑坡，而 1950 年夏季的旱灾更是雪上加霜，以致 1951 年的谷物生产只达到战前产量的 41%。[②] 面对事实，铁托后来承认：尽管知道集体农庄在苏联“经过二十多年，情况仍然不妙，而我们却还是走俄国人的路，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③]

在政治方面，南斯拉夫受到的压力也出乎南共的想象。尽管铁托做出了一些缓和关系的表示，但斯大林毫不领情，社会主义阵营对南共的围攻愈演愈烈。这场运动首先是在东欧各国批判以前信奉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道路”，继而开始处理倾向南共观点或同情铁托的各国领导人，最后发展成一场以揪出“铁托分子”为名的令人胆战心寒的大清洗运动。

1948 年夏天，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还可以自豪地告诉他的英国客人说，他们正走在一条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但是不久之后，莫斯科就清楚地声明说，除了苏联的道路外，没有其他什么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日丹诺夫的秘书尤金对此解释说：“人民民主”已经不再是一个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漫长的过渡阶段，而是一种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目的上，都同正在苏联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丝毫差别的制度。[④] 似乎是为了证明像铁托那样偏离莫斯科路线的人没有好下场，在 1948 年 8—9 月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上，曾经反对建立情报局、并对处理南共问题持怀疑和保留态度的总书记哥穆尔卡被撤职，其罪名是“不懂得联共（布）的领导作用”，“不信任苏共和苏联”，否定“苏联的建设道路”；在苏南争论中，对南共采取“调和和妥协的态度”，对情报局处理南共的决议持“否定态度”。[⑤] 1949 年 1 月，哥穆尔卡被开除出党。

---

① 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 111–112 页。

② 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第 178 页。

③ 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 433 页。

④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p.54.

⑤ 刘邦义：《试析 1948 年波兰的转折——苏联模式在波兰的实施及其破产》，载阚思静、刘邦义主编：《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 年，第 80–85 页。

然而，这还只是莫斯科准备清理“铁托分子”的信号，真正的清洗是从 1949 年夏季开始的，首当其冲的便是昔日南斯拉夫“最好的朋友”——阿尔巴尼亚。1949 年 5 月阿共亲南派领导人佐泽被捕，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秘密审讯，便以“铁托主义者”的罪名被处决。9 月 10 日匈牙利政府公布了对三个月前已被开除党籍的外交部长拉伊克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起诉，经审判后，包括拉伊克在内的四个人被送上了绞架。起诉人的发言清楚地说明了这场审讯的动机和政治目的：“匈牙利人民法庭宣判拉斯洛·拉伊克这一帮阴谋分子有罪，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也宣判了南斯拉夫的叛徒铁托、兰科维奇、卡德尔和吉拉斯这个犯罪集团。这次审讯的国际意义就在于此。”① 如果说哥穆尔卡、佐泽、拉伊克多少还有些同情铁托或抵制莫斯科的话，那么保共前任总书记、政府副总理科斯托夫则是一向对南共政策表示不满的人，但他也没有逃过厄运。11 月 30 日，科斯托夫被送上了被告席，随后亦遭枪决。其关键性的罪状竟是 1934—1935 年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曾建议让铁托担任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② 在所有这些审讯中，都把最荒诞不经的阴谋诡计归罪于铁托、兰科维奇以及其他南共领导人，按照审讯的结果，这些人在战前、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时期，一直就是卖国贼、叛徒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代理人。这样，就为第三次情报局会议对南共进行更加骇人听闻的指控做好了舆论准备。

1949 年 11 月 19 日，情报局在匈牙利召开的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凶手和间谍手中”的决议。决议认为，从情报局 1948 年召开的上一次会议到今天，“铁托匪帮”终于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向法西斯主义的过渡”。“南斯拉夫政府完全处于外国帝国主义集团的控制之下，并变成了他们侵略政策的工具”。决议指出，对拉伊克–布兰科夫审判的结果充分证明，“铁托集团已经将贝尔格莱德变成了美国人进行特务活动和反共宣传的中心”。情报局最后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和工人党员“同铁托集团——被雇佣的特务和杀人犯进行斗争”，帮助南斯拉夫“回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③

最后，在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问题上，南斯拉夫人也感受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威胁。1948 年 8 月 18 日，莫斯科在照会中抗议南斯拉夫逮捕并虐待苏联公民，进而威胁说，苏联政府“将不会容忍这样的情况，……并将被迫采取其他更为有效的

① 费德南·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二卷：斯大林主义的顶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234–235 页。

②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二卷：斯大林主义的顶峰》，第 238 页。

③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701-704.

措施”。[1] 于是，南斯拉夫边境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在北面，根据南斯拉夫掌握的情报，至少有七个苏联摩托化师部署在匈－罗边界。还有材料说，一支干涉部队曾经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境内集结过，其中还包括 6000 名西欧国家反铁托的志愿军，甚至在保加利亚的布拉戈耶夫格勒市还建立了一支空降部队。[2] 在南面，阿尔巴尼亚在科索沃问题上又埋下了新的钉子。1949 年 9 月 24 日，根据霍查的旨意，阿劳动党书记雅科瓦在发罗那的群众集会上公然号召生活在南斯拉夫境内的几十万阿尔巴尼亚族人分离出来，加入“主体国”，他说:“科索沃人的道路是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及国际主义共产党人一道，起来反对铁托集团，唾弃铁托，争取自由。那时科索沃的问题就会得到公正解决。根据自决原则，科索沃的未来是科索沃并入阿尔巴尼亚！”[3] 由于担心西方国家介入对南斯拉夫的武装进攻，从而使苏联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与西方形成直接对抗，莫斯科始终没有下达开始军事行动的命令。尽管如此，南斯拉夫依然是内外交困、四面楚歌。

铁托在苏南分裂以后做出的接近苏联并与斯大林和好的表示，无非是要向各国共产党证明南共仍然在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无非是要稳固南共在南斯拉夫的领导地位。然而，严酷的事实终于使铁托和南共领导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斯大林主义并不等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模式并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而恰恰是因为坚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使得铁托在国内难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在国外难以求得回旋余地，摆脱孤立状态。铁托被迫去寻找一条适合南斯拉夫国情的独立的发展道路。

（三）

南斯拉夫的独立发展道路首先是在对外政策方面突破的。在斯大林确定了与帝国主义阵营实行对抗的冷战政策以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直接与西方发生关系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行径，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正是出于这种无形的压力，铁托在苏南分裂之初，对待与西方接触的问题特别谨慎。但是，国内的经济萧条，国际上的政治孤立，迫使南斯拉夫开始考虑与西方的关系问题。

---

① 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1939–1972）：文件与评注》，第 218 页。

② 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年，第 93 页；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1939–1972）：文件与评注》，第 218 页；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p.54.

③ 佩罗·兹拉塔尔:《霍查政治传记》，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年，第 184–185 页。

苏南在国际舞台的公开对抗是从 1949 年 5—6 月巴黎外长会议讨论对奥地利缔结和约开始的。战后，南斯拉夫要求奥地利赔款并割让卡林西亚和施蒂利亚部分领土，这些要求过去一直是得到苏联支持的，甚至到 1949 年 2 月，莫斯科还在与美、英、法的争执中站在贝尔格莱德一边。但在巴黎会议期间，苏联完全撤销了这种支持，6 月 20 日发表的会议公报排除了南斯拉夫对领土的最低要求。此后，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便通过声明和照会不断地进行公开指责和攻击。9 月 28 日，苏联宣布废除苏南友好条约。随即，南斯拉夫指控莫斯科在南煽动叛乱，而苏联则宣布南斯拉夫驻苏大使姆拉佐维克是间谍，双方先后召回了本国的外交人员。9 月 30 日至 10 月 4 日，匈、波、保、罗、捷纷纷步莫斯科后尘，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的友好条约。[①] 至此，南斯拉夫与苏联东欧集团的外交关系已经名存实亡。

如卡德尔所说，当他在 1949 年 9 月第四届联大上发言抨击莫斯科时，南斯拉夫“已经制定了自己的对外政策主张”。卡德尔在发言中批评“把世界划分为集团和势力范围”，主张各国之间应和平共处、积极合作，主张各国人民的独立以及政治和经济的自由，主张各国人民有权自己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反对一个国家干涉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等等。“实际上，这已经是不结盟政策的基本原则了。”[②] 根据这一原则，贝尔格莱德开始寻求与西方的和解。

针对 1949 年 4 月 4 日希腊外交部长察尔达里斯关于希南可能和好的说法，铁托 7 月 11 日在波拉的讲话宣布将逐渐关闭与希腊的边界，暗示着南斯拉夫不再支持希腊境内的反政府斗争。8 月 17 日，南斯拉夫驻雅典代办拜访了希腊外交部——这是自 1946 年以来贝尔格莱德主动采取的第一次外交行动。南斯拉夫与意大利在 1949 年初已经小有接触，开通了边境贸易渠道，调整了在亚得里亚海的捕鱼范围。7 月 30 日铁托接见意大利大使，进一步推进了和解进程。8 月 4 日双方签署了为期一年的贸易条约，8 月 6 日的双边协定则解决了意大利的战争赔款和归还财产问题。尽管在的里亚斯特问题上，南意之间的分歧仍然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此时两国外交关系上的冰冻总算化解了。[③]

铁托摆脱双重压力的主要出路是缓解与美国的关系，打破莫斯科经济封锁的关键因素也在于取得美国的经济援助。因此，美国对南斯拉夫态度的转变以及要求贝

---

① 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 年》，第 346–353 页。关于解决对奥领土问题的争论，详见第 375–382 页。

② 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 155–156 页。

③ 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 年》，第 358–361 页。关于的里亚斯特问题的争论详见第 361–367 页。

尔格莱德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决定南斯拉夫是否能够顶住苏联的压力生存下来，并在两大集团对抗中保持超然立场的重要环节。

鉴于南斯拉夫一贯的激进宣传和革命行动，美国政界对铁托的敌视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美国对苏南冲突发展结果的最初反应体现在6月8日坎农大使给国务院的一份电报中。该电在分析苏南冲突的种种现象后得出结论说，在南斯拉夫的新形势下，美国制定的对南政策应尽量与我们的现行政策保持一致，“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动”。[①] 有些人甚至认为整个苏联与南斯拉夫的争执也许只是个骗局，艾森豪威尔在1949年2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次会议上就提醒说，这是“一个极其巧妙的圈套，以促使美国为东欧的复苏提供资金”。[②]

然而，多数意见则认为在对抗莫斯科的斗争中应该利用苏联与其卫星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马歇尔早在1948年7月10日给伦敦的信中就表示了国务院对苏南冲突事件的考虑：“我们不应该打击铁托想密切与西方关系的任何举动，应该等待他的接近。”1949年2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文件则阐述了美国政策的基本目标，即确保铁托的处境“不因为我方的任何举动而更为困难”。[③] 两个月后，凯南关于“要不惜一切代价加深克里姆林宫与其国外代理人之间的猜疑”的说法，更明确地表明了美国利用支持铁托主义来削弱苏联对东欧控制的政策。[④] 到1949年8月，多数美国官员已经认识到，如果要削弱并最终消灭苏联势力对西方的威胁，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培植异端，鼓励建立一些非共产党政权，即使他们在本质上说是共产主义的”。[⑤]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49年初杜鲁门政府为扩大对南斯拉夫的出口，改变了办理出口许可证的程序。[⑥]

铁托对此做出了反应，他在4月9日人民阵线代表大会上发言说，南斯拉夫没有理由拒绝与西方做生意。但他在抨击了情报局企图推翻南斯拉夫政权的阴谋后重申，南斯拉夫必须准备单独对付来自各方面的进攻，决不会加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7月11日铁托明确承认南斯拉夫正在谋求从西方得到贷款。8月29

---

① *FRUS*, 1948, Vol.4, Washington D.C., 1974, pp.1070-1072.

② Box220, Harry Truman Papers, Truman Library. See Henry Brands, “Redefining the Cold War: American Policy toward Yugoslavia, 1948-1960”, p.43.

③ RG-59, 860H.00/7-1048, NA; Box205, Harry Truman Papers, Truman Library. See Henry Brands, “Redefining the Cold War: American Policy toward Yugoslavia, 1948-1960”, pp.42-43、

④ *FRUS*, 1949, Vol.5, p.12. See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p.72.

⑤ *FRUS*, 1949, Vol.5, pp.21-26, at p.25. See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p.72.

⑥ Henry Brands, “Redefining the Cold War: American Policy toward Yugoslavia, 1948-1960”, p.43.

日，贝尔格莱德正式宣布已经吁请美国为南斯拉夫购买工业设备提供贷款。1949年 8 月，美国政府决定允许南斯拉夫在美国购买价值 300 万美元的一套精密轧钢设备，9 月 8 日，美国进出口银行同意给予贝尔格莱德一笔 2000 万美元的贷款，其中 1200 万美元用于购买采矿设备。12 月 27 日卡德尔向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承认这 2000 万美元贷款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 900 万美元贷款后，世界银行也已原则上同意借贷 2500 万美元。卡德尔还报告说，南斯拉夫已经同 24 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与 46 个国家有商务关系，并且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关系正在改善。但他也同时指出，这种改善并没有影响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1950 年 3 月 1 日，进出口银行宣布再向南斯拉夫提供 2000 万美元的贷款。而铁托 5 月 31 日在普罗库普列的演说中，一方面公开表示欢迎这些贷款，一方面继续强调借款并不损害南斯拉夫的主权，南斯拉夫并没有把自己出卖给美国。[①]

1950 年夏季，南斯拉夫遭受严重旱灾，边界地区又受到敌对武装力量的威胁，迫使贝尔格莱德向美国提出了更大规模援助的要求。杜鲁门在决定动用 1600 万美元共同防御基金作为救济南斯拉夫旱灾之用后，又于 10 月底向国会提出了 3800 万美元粮食援助的议案。然而，国会拖延了一个月才举行了讨论这一议案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面对众议员们的质询和抱怨，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帕金斯解释说，“南斯拉夫在保持其独立的同时，已经成为维护欧洲和平的力量。它的人民决心保卫他们的独立，这有助于其他国家人民的独立和安全。”至于南斯拉夫的军事潜力，帕金斯坚信，那“是对冒险政策和侵略的威慑力量，无论是在巴尔干或是在欧洲其他地区”。杜鲁门在 11 月 29 日致国会的信件中也劝告议员们：“南斯拉夫持续不断的独立行动，对于美国的安全十分重要。一个正在反抗苏联帝国主义野蛮的威胁并把苏联势力排除在一个欧洲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之外的国家，我们是可以协助维持它的独立的。这显然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正在此时，朝鲜战争局势的变化促使美国国会下决心解决援助南斯拉夫这一棘手问题。数十万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的顺利推进，打破了麦克阿瑟关于美国兵可以回家过圣诞节的诺言和自信。面对这种局面，在国会里，甚至最顽固的反对共产主义者也愿意相信在欧洲利用铁托或许有助于减轻美国在亚洲的压力。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所说，铁托与莫斯科的决裂给美国在中欧带来了一些有利的机会，只要可以把南斯拉夫从敌方阵营中争取过来而保持中立，这就是一个进步。于是，国会参众两院分别

① 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 年》，第 368–370 页。

投票通过了白宫的议案。[①] 显然，南斯拉夫采取的中立立场已经为西方所接受。

通过与苏联分裂后一年多的国际交往，南斯拉夫对于自己能够同西方打交道而不致损及独立这一点的信心大为提高，进而希望利用西方的军事援助加强对抗莫斯科的实力地位。在美国方面来说，从 1950 年的经济援助到随后一年的军事援助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尽管仍然有人对此持批评态度。迟至 1951 年初，南斯拉夫还拒绝寻求美国的武器装备。1950 年 10 月外交部长卡德尔告诉艾奇逊，这样的要求只会给苏联正在妄图使其侵略合法化提供借口。次年春季，南斯拉夫人对于莫斯科发出的含有战争威胁的叫嚷变得越来越紧张，开始倾向于利用西方的军事援助来保护自己了。1951 年 5 月，第一批军火从英国运抵南斯拉夫。6 月 18 日，访问华盛顿的南斯拉夫总参谋长告诉艾奇逊，苏联一心想破坏南斯拉夫的独立，现在的问题"不是他们会不会，而是何时会采取行动"。此后 10 天，南斯拉夫便正式向美国提出了军事援助的要求。[②]

1951 年 11 月美国与南斯拉夫签订的军事援助协定和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贝尔格莱德，把南斯拉夫与西方的关系推到了高潮。对于贝尔格莱德来说，"这项协定的政治意义在于顶住东方的军事压力和冲破东方的封锁"。而杜鲁门则满怀信心地向国会指出，南斯拉夫的武装力量现在已经构成"在东南欧地区防止侵略的重要屏障"，"为了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对铁托的军事援助是必要的。到 1952 年底，南斯拉夫从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获得的军事援助已达 2.4 亿美元。[③]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当然不免从否定的角度指责南斯拉夫已经投入帝国主义怀抱，而更多的西方观察家则从相反的角度评价贝尔格莱德对外政策的转轨，特别是在巴尔干条约签订的过程中，有人甚至预言南斯拉夫"正在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席位前进"。[④] 这实在是一种误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确实非常乐观地看待南斯拉夫与希腊和土耳其关系的改善，并因此而产生了缔结一项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巴尔干条约的想法，而且指望铁托能够同北大

① 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 年》，第 370–371 页；Henry Brands, "Redefining the Cold War: American Policy toward Yugoslavia, 1948-1960", pp.44-45；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第 182–183 页。

② Box65; Box66, Acheson Papers, Truman Liberary. See Henry Brands, "Redefining the Cold War: American Policy toward Yugoslavia, 1948-1960", pp.46-47. Cf.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p.117.

③ 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 240 页；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 318 页。

④ Henry Brands, "Redefining the Cold War: American Policy toward Yugoslavia, 1948-1960", p.47.

西洋公约组织有所往来。当然，不可否认南斯拉夫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有利用北约组织的愿望。1950 年 2 月铁托还把北约看成是一种"挑衅力量"，而到 1951 年秋美国军事代表团到达贝尔格莱德时，铁托却已将北约的建立称之为"苏联政策的必然结果"了。只要与南斯拉夫的原则不相违背，铁托保证愿意"在一切具有国际性质的问题上"与北约组织成员国合作。后来，南斯拉夫对西德参加北约组织的愿望也表示了欢迎的态度。①

作为共产党人而又被排除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明知不能与帝国主义联手但又需要得到西方的援助，铁托当时的处境的确十分尴尬，其言论和行为也往往自相矛盾。不过，总体说来，南斯拉夫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坚持了独立自主和"积极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当南斯拉夫受到西方将其拉入北约的直接或间接的压力越来越大时，确有少数人倾向加入北约组织，②但铁托仍然表示，南斯拉夫不希望缔结任何条约，甚至也不希望同希腊和土耳其缔结一项地区性条约。尽管出于对苏联及其卫星国威胁的担忧恐惧和对西方援助的依赖，1953 年 2 月 28 日南斯拉夫与希腊和土耳其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但是这一条约并不是那种合乎西方口味的巴尔干条约。事实上,其中一项条款还是专门用来排除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任何联系的。③以后的事实表明，随着南斯拉夫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加强，巴尔干条约的正式签署，与其说是北约组织已经"延伸到了克里姆林宫墙下"，④毋宁说南斯拉夫在北约和华约之间建立了一块同时与东西方进行周旋的基地。

（四）

如果说南斯拉夫国内政策的转变是美国加强对贝尔格莱德提供援助的前提条件之一，⑤那么对于铁托来说，改革经济和政治体制则是南斯拉夫迈出的通向独立发展道路的最重要的一步。南共对国内政策的改变是从 1950 年 6 月开始的。

面对广大农民的不满情绪和急剧恶化的农村状况，铁托在 1950 年 3 月的竞选演说中，保证今后对农产品的强制征购将比较公平地进行，过去执行这一政策不当

① 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 319–320 页。

② 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 158 页。

③ 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 319–320 页。

④ 出席布莱德签字仪式的一位英国外交官的用语。见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 324 页。

⑤ Henry Brands, "Redefining the Cold War: American Policy toward Yugoslavia, 1948-1960", p.46.

的地方干部将受到惩处。1950年6月9日，南斯拉夫公布了一项新的农业合作社基本法，代替了1946年的合作社法，更否定了1949年初制定的激进政策。合作社新法又重新强调了自愿原则，认为这是组织一切合作社所必需的，并坚持在综合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内部实行完全自治的原则。此外，为了进一步把南斯拉夫生产合作社与苏联式集体农庄区别开来，在合作社形式上，新法律强调要发展综合合作社——四种合作社中较低级的形式，其功能主要在流通和加工领域——使之成为整个合作化的主要形式。社员对他们带进合作社的土地保留了所有权，同时可以有最多达一公顷的土地留归自用。纵观南斯拉夫1950年的合作社法，其目的是在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传统感情与农业社会化的发展要求之间探索一条中间道路。①

然而，这项农业改革政策在实际运行中遇到了重重阻力。在南斯拉夫党和政府多数干部当中，传统的意识形态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们的头脑深处，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仍然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再加上1950年夏天出现的毁灭性旱灾，逼迫政府不得不继续从个体农民身上收取过多的农产品。农业改革因此而步履蹒跚。虽然合作化运动的步伐总体上是放慢了，但苏联集体农庄式的合作社却还有所发展，到1950年底比上年还增加了338个。而地方党组织对合作社的管理，仍然像以前一样独断专行。②

按照1949年初的规定，个体农民加入合作社三年以后，可以重新决定是否继续留在合作社内。于是，1951年便出现了大量农民提出退社的问题。当南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时，占上风的还是意识形态的传统派，他们主张对申请退社的农民进行压制。然而，面对普遍出现的农业危机——农民怠工、生产下降、牲畜减少，南共领导人被迫对整个合作化政策进行一次彻底检查。这次检查的重点是再次强调从生产合作社转到综合合作社上，以此作为未来农业政策的基础。1951年11月24日，南共中央给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未来方针”的指示，强调综合合作社应该作为“促进农业生产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的杠杆”；应该取消国家强制征购剩余农产品制度和废除工业品和农产品的配给制度；建议利用税收来打击“农村中的残余富农”；将在每一个生产合作社中建立起新的自治制度和会计制度；对生产合作社进行改组，并解散经营不善的合作社，等等。与这种农业政策的新措施相辅而行的是取消了肉类、牛奶、奶制品、土

① 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40、113页。

② 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40–41、114页；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145页。

豆、饲料和油脂的强制收购（但仍然坚持国家征购大量谷物）。[①]

此后，党内以巴卡里奇为首的改革派推出了合作社内部管理的会计方法和逐步增加自治成分的改革方案。到 1952 年春季，政府采纳了这些改革办法，随即取消了谷物的收购，个体农民获得了购买农业机器的有限度的贷款；按照土地的好坏、农作物和土地面积征收的纳税制度也建立起来了。不过，这些措施仍然不说明农业政策发生了根本改变。铁托在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演说表明了南共对农业政策的基本观念和倾向："没有农村中社会主义成分的胜利，在我们国家里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②]

1952 年南斯拉夫再次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农民也继续对合作化采取抵抗立场，其结果导致当年谷物产量已不及战前平均产量的 37%。对美国粮食进口的依赖性[③]，以及国际局势的严重性[④]，迫使南斯拉夫领导人更加彻底地重新估计农业政策——看来需要根本放弃农业合作化的方针了。1953 年 3 月 20 日，南斯拉夫政府公布了关于"财产关系和农民生产合作社的改组"的新法令。这一法令标志着南斯拉夫农业政策的根本性改变，其中心内容如卡德尔所说，"在加入或退出合作社方面认真地坚持自愿原则是十分必要的"。这项法令允许解散或者改组生产合作社，除了那些在政府公地上组织合作社的人以外，所有农民现在都可以自由退出合作社，取回他们的土地、房屋、存粮、牲畜以及他们原来参加合作社时交出的一切其他财产。执行这一法令的结果是，到 1953 年底农民生产合作社仅剩下 1152 个了，而综合合作社的数目则增加到 7114 个，社员人数已占全国农民的 85%。[⑤]

尽管在农业改革方面还有许多矛盾需要克服（如农产品收购、贫富差别等），还有许多新问题需要解决（如雇工、土地买卖等），但是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已经确定下来，即以农民个体经营为生产主体，再通过综合合作社的形式在流通领域把农民组织起来。而根据 1953 年 3 月法令改组后的综合合作社所遵循的新方针，与当时在工业部门实行的工人管理的办法更加接近了。这种农业社会化的原则与当时

---

① 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 112–114 页；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 146–147 页。

② 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 126 页；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 147 页。

③ 1953 年从美国进口粮食 54.8 万吨，占南斯拉夫粮食进口总量的 72%。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 146 页。

④ 仅 1952 年，就发生了 2390 起边界武装冲突事件。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第 405 页。

⑤ 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 147–148 页；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 116–118 页。

正在研究的对工业企业实行工人管理的制度，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同步的。

南斯拉夫对于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样不是一帆风顺的。实际上，从 1950 年 6 月宣布工人委员会法到 1953 年 1 月以宪法形式将工人管理制度和工人自治制度确定下来，其中经历了不断“试试改改”的过程，也出现过极其混乱和矛盾的局面。这是由于人们认识水平和管理能力上的差距，以及现有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影响造成的。改革措施变化无常，经济法令泛滥成灾，仅 1952 年夏天政府承认有效的经济法规、命令、条例、指示就有 3500 种之多，而各级政府官员在执行中又大多任意加以解释，甚至自行其是。[①] 不过，这种在改造旧制度中必然发生的无序状态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而且总体说来，改革还是沿着不断实现经济分权化的方向发展的。

所谓经济分权化，实质就是对所有制进行改造，其表现形式则是工人参加管理和工人自治。铁托在通过工人委员会法时宣告:“从今以后，(南斯拉夫) 对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就要逐步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所有制。国家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的最低形式,而不是像苏联领导者认为的那样是其最高形式。”[②] 工人委员会法是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具有革命意义的第一项措施，归根结底，也是此后在南斯拉夫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思想体系和政治结构的基石。该法规定把一切经济组织的经营和管理权移交给各个企业的工人。各个企业的工人委员会由该企业的全体工人和职员按照普遍、平等、直接的原则以秘密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工人委员会作为权力机构，决定企业的大政方针，选举和罢免企业的管理人员，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和质询，并定期审核账目和生产计划。作为企业的管理机构，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在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中选举产生，其中直接参加生产的人员必须达到四分之三。为了避免企业管理阶层的官僚化，规定管理委员会委员只有三分之一可以连任，而且任期不得连续两次以上。企业经理是管理委员会的当然委员，但不得担任主席。然而，由于各企业内部的党组织不肯轻易放弃其管理特权，直到 1951 年中，才采取了把全部企业转交给工人管理的实际行动。甚至在当时，工人委员会法所规定的新制度的实施仍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常需要规定各种规章条例来充实和改进这一制度。由中央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到由工人管理制度体现的间接控制的过渡大致上在 1954 年春天才顺利完成。到 1954 年底，工人参加经济和行政组织基层自治机构的已达 60 多万人，在工人管理的企业中，每七个人中间就

① 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 68–69 页。

② 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 68 页。

有一个人直接参加本企业的管理机构。[①]

工人自治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当然也带来不少问题。例如：按照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导致的通货膨胀，由于管理人员缺乏训练和经营能力给企业造成的巨大浪费，调整企业结构和追求经济效益带来的失业现象，以及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经济犯罪案件的猛增，等等。然而，与经济变革俱生的弊病无法抹杀改革的成就：生产组织得更加合理，劳动生产率和工人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工人委员会通过撤换不称职的管理人员而铲除了企业管理的无效率现象。与工人委员会法相配套，1951 年 12 月又通过了国民经济管理法、预算法，以及关于社会捐款和税收的基本法，1952 年底取消了五年计划制，1953 年初解散了权力最大的经济机构——联邦计划委员会，而代之以只起指导和检查作用的联邦经济计划研究所。所有这些标志改革正在不断深化的状况不仅为当时绝大部分西方观察家所承认，而且为南斯拉夫 1953 年以后工业生产的高速度增长奠定了基础。[②]

总之，不断扩大各种形式的工人管理是铁托进行经济改革的核心支柱，也是南斯拉夫摆脱苏联集中化、官僚化经济模式桎梏，开辟独立发展道路的第一步。用一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话来说，工人委员会法宣布以后，“已经在 1948 年割断了同苏联的政治联系的南斯拉夫，……现在也割断了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联系，并且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道路。”[③]1954 年秋天卡德尔在奥斯陆发表的演说，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做出了深刻的说明。他认为，南斯拉夫的经济民主自治体制是以两个根本前提为基础的：一是任何中央政府，不论它如何英明，都无法控制一个国家的全部经济和社会发展；二是个人能否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力和主动性，与其说取决于指示和控制，不如说取决于在自由中进行劳动和创造的工人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物质的利益。如果无视这两个根本前提，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官僚专制。[④] 这段精辟的论述，一方面肯定了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目的和根本出路在于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这种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是进行政治和行政改革。

南共主要理论家之一皮雅杰曾说过，分权化是“走向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第

① 参见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 68–75 页；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 104–113 页。

② 参见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 75–82 页；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 113–126、180–182 页。

③ 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 42 页。

④ 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 64 页。

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①]这无疑涉及了政治体制问题。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是从处于政权领导地位的南共自身开始的。1950年10月，南共中央号召取消作为南斯拉夫唯一政党——共产党党员的特权，宣布党员和非党员的法律地位是完全一样的，不允许任何人依靠党员身份而享受特殊待遇。为此，取消了发给党员的特别配给品和住房特权。尽管这一行动在国内外受到普遍赞许，但还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随着经济改革分权化的发展，高度集中的党的组织形式，极其庞大而专横的官僚机构显得越来越不相称。更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党的干部不理解新路线，不愿意放弃已经习惯了的权势。[②]显然，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前进，迫切需要对党的机体本身进行清理和整顿。1952年6月南共中央全会做出指示，根据在全党实行分权化的原则，限制党在地方政府和经济事务中的直接作用，禁止党的干部干预企业的工人管理。中央命令各级党的领导人立即放弃他们在政府机构中担任的领导职务，彻底改变那种象征着苏联“官僚等级制度”的状况。为了扩大“党内民主和消灭官僚主义”，6月指示赋予党的地方组织以更大的自决权，在遵守党的总路线的前提下，地方党组织可以自行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做。11月召开的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不仅将党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党的新理论。根据新的理论，党的领导作用不是体现在把自己的决定和意志强加于各级政府机构，而主要表现在“政治和思想教育”方面。按照卡德尔的说法，党要使自己的政策起到领导作用，就必须“依靠做好工作，认识社会规律，而不能依靠一纸法令，规定自己就是政治领导力量”。[③]

对政府行政体制的真正改革始于1952年4月1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委员会的一般法。人民委员会法彻底改组了整个地方自治系统，使它在情理上更加适合于经济分权化的改革。根据这一法律，在联邦和共和国的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特别市、区、市、乡的人民委员会都有相对独立的权力，他们可以制定自己的社会计划和预算，筹集自己的财政收入。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在特别市、区和市设立了作为人民委员会下院的生产者院。生产者院的代表是从基层生产部门选举出来的，体现了铁托主张的工人管理国家的原则。它与上院，即人民院在制定地方法规以及处理一切地方经济事务方面，具有同等的职责。1952年的法律还规定设立选民会议，以保证公民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地方事务，并使他们更易于直接监督和

① 转引自弗雷德·华纳·尼尔：《铁托主义的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4页。
② 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28页。
③ 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29–31页。

控制人民委员会。1953 年 1 月 13 日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改革法，全面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废除了 1946 年的宪法，而肯定了 1950 年以来各项改革的原则，这包括直接民主的原则，以议会治理实现权力统一的原则，把经济工作摆在政治工作之前的原则，等等。①

至此，南斯拉夫的国内外政策调整已经初步完成，虽然其中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也含有不少与现实相距甚远的理想化成分，但无论如何，到 1953 年初，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和国内经济政治体制都已经彻底背离莫斯科路线，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发表于《世界历史》1995 年第 5 期

① 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 139–148 页。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

1945年8月6日，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令世人震惊的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下午5时，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宣布8月9日苏联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几乎同时，[①] 苏联远东部队在中国东北边境分三个方面军全线出击，展开对日作战。8月9日拂晓，装载第二颗原子弹的美国轰炸机“布克之车”飞向日本长崎。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②] 由于同盟国军队的联合打击和震慑，日本外相东乡在8月10日便向同盟国递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电台宣布了无条件投降诏书。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世界大战到此结束。苏联对日宣战和出兵中国东北，是加速日本无条件投降、提前结束战争的决定性作用因素之一，这一点无可置疑。[③] 然而，还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苏联出兵东北在其远东战略中的地位，特别是在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作用，这一点在中苏史学界过去的研究中却较少受到重视。在中苏双方历来的政治文件和研究著作中，或者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或者由于后来的思想禁锢，人们都较多地或片面地强调了苏联出兵对于援助中国抗日和促进远东和平的政治意义，只是从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才开始提出一些异议。本文试图从苏联远东战略和对华政策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粗浅的分析。

---

① 莫斯科时间8月8日18时，即东京时间8月9日0时，此时，新京（长春）已遭苏军轰炸。

②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066页。

③ 尽管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根本原因一直存在争议，但至少人们都承认苏联出兵加快了战争结束的进程。

一、对日宣战——苏联远东战略的既定方针

战争带给人们的并不只是痛苦和灾难。20年代末结束新经济政策以后，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不适合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需要——这一点已为战后的历史所证实，但它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战时共产主义”相同，是非常适应于战争的战时体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斯大林模式多有指责而依靠这种体制苏联却赢得了战争。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注入了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随着大英帝国在战争中的衰落，苏联已经成为能够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与美国共同主宰欧洲和远东命运的超级大国之一。

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战后，苏联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当然是欧洲。通过战争，苏联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版图，[①] 而且直接控制了近半个欧洲的卫星国。与此同时，斯大林从来没有忘记远东。几个世纪以来，沙皇俄国一直在努力实现以建立和保护太平洋出海口为中心的远东战略。然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不仅使沙皇俄国丧失了除北满外在远东的几乎全部权益，而且成为俄国革命的导火索。令人费解的是，推翻旧俄帝国并一贯宣扬民族平等和国际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对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遭受的“耻辱”却一直刻骨铭心，而且渴望通过战争收回俄国在远东失去的一切。对于这一点，斯大林几乎是直言不讳的。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斯大林曾几次或明或暗地对美国提起沙俄在远东的权益，并表示苏联对远东是有“政治要求”的。与此同时，苏联国内的舆论工具也开始配合运作：一本回忆日俄战争的小说《旅顺口》在1944年10月，即雅尔塔会议前夕，成了苏联的畅销书。“所有读了这本大部头小说的人，都有身临其境参与了40多年前的事件之感。”[②] 随着战局的明朗化，在决定远东未来命运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在谈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时，便明确地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指出，这些曾是沙俄的权益。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甚至堂而皇之地写明：“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

---

① 据1947年3月7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的统计材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获得了约2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2234.4万人口。见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徐先麟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21页。

② 瓦·米·别列日科夫：《外交风云录（续篇）》，李文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第77页。斯切潘诺夫的《旅顺口》一书获得1945年度斯大林文学奖。

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益。”[①]尽管这个协定是一年以后才公布的，但对于苏联所提的政治要求的实质问题，人们在当时也不乏认识。捷克斯洛伐克驻英使馆的一位官员就曾指出：“苏联的愿望是要一雪日俄战争中所受的屈辱，收回被日本夺去的在满洲的一切权力和利益。”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和驻英大使顾维钧也都认识到苏联在雅尔塔要求的实质问题是“由苏俄恢复帝俄在满洲的权益”，“而这些权益都是由于1904年的日俄战争而丧失了的”。[②]日本投降以后，苏联更是理直气壮地把对日宣战和日俄战争联系在一起，不仅苏联报刊反复强调这一点，[③]而且斯大林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当天的演说中也特别提到日俄战争的问题。斯大林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的污点，而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④]斯大林演说之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还率领第一远东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一级空军元帅诺维科夫、空军元帅符加科夫、炮兵元帅切斯哈科夫等于9月6日特意前往旅顺，拜谒了日俄战争中在旅顺要塞战死的帝俄官兵公墓，在墓前敬礼并献花圈。[⑤]这次意味深长的举动进一步表明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真实目的。

以上情况显而易见地说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战略目标不是摧毁日本的军事力量，甚至也不仅仅是如日本研究者所说的报复心理，而是要恢复沙皇俄国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⑥]虽然这一目的只有在打败日本，而且必须通

---

① 雅尔塔协定全文见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一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04页。在这里略提一下苏联在此前关于日俄战争的说法不是毫无意义的。1924年苏联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的备忘录中说：“1904年，日本鱼雷艇在旅顺袭击俄罗斯舰队时，从技术上看，显然是攻击行为，但从政治上看，起于沙皇政府的对日侵略政策。”引自（日）林三郎编著：《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日本研究室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0页。

②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49、557页；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李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第149页。

③ 如《真理报》1945年8月9日和8月25日社论，见《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3辑，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520、530页。

④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38–439页。但斯大林在这里讲的根本不是实际情况。事实上，当时的“老一辈人”，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为沙皇的失败而受到鼓舞，对此感到受到屈辱和挫折的只是沙皇政权和欧洲资产阶级。见列宁：《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8卷。

⑤ 林三郎编著：《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第200页。

⑥ 有些苏联学者也不否认“消除1904–1905年俄日战争中俄国失败所造成的后果”是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目的。见N.A.基见林主编：《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89–390页。但别列日科夫在复述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的这一声明时，似乎有意漏掉了前面引号中的那句话。见别列日科夫：《外交风云录（续篇）》，第374页。

过苏联自身参战打败日本以后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可以被认为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既定方针。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过程和背景是很复杂的。苏联报纸强调，这是应美国和盟国的要求，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声明中也明确提到："鉴于日本拒绝投降，同盟国建议苏联政府加入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① 虽然这种说法无疑有助于使苏联出兵在外交和舆论方面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但这是不真实的，至少是不准确的。的确，中国政府自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直渴望苏联公开对日作战，甚至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还千方百计挑动苏日冲突。而美国政府自德黑兰会议以后，也确曾多次在私下交往中要求苏联做出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这是已为许多文件和史书证明了的事实，但是以下几个问题更值得引起注意，因为这些事实可以说明苏联出兵完全不在于是否受到外界的鼓动或压力，而是由苏联既定的远东战略目的使然。

其一，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与中国政府是否请求根本无关。从欧洲战争一开始，苏联就极力避免处于被迫进行两线作战的危险境地。1939 年 8 月 23 日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有这方面的考虑，1941 年 4 月 13 日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也是出于这一目的。因此，尽管蒋介石绞尽脑汁要把苏联拉入对日冲突，而斯大林却一再婉言拒绝，甚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建议中、美、苏同时对日宣战，斯大林在给蒋介石的复电中仍表示："我再一次真诚地希望阁下不要强求苏联立即对日宣战。" ② 然而到 1942 年底，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德国入侵使苏联与英美结盟；通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进展已经可以看到未来胜利的曙光。③ 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大林显然开始考虑远东的问题了。据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证实，早在 1942 年 8 月，斯大林就主动告诉他，苏联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加入远东战争。同年 11 月，斯大林会晤当时出任罗斯福特使的赫尔利时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④ 到 1943 年 10 月在莫斯科举行为德黑兰会议作准备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时，斯大林认为时机已经成熟。10 月 30 日，即会议结束当天的克里姆林宫宴会上，斯大林的译员别列日科夫向美国国务卿赫尔转达了斯大林要他"逐字逐句地翻译"的话："苏联政

---

① 见 1945 年 8 月 9 日《真理报》社论；F.C. 琼思、休·博顿和 B.R. 皮尔思：《1942–1946 年的远东》，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年，第 214 页。

② John W. Garver, *Chinese 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 Press, 1988, p.186.

③ 斯大林曾经提出这样的任务：要使 1942 年成为歼灭希特勒侵略者的一年。见德·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第 382 页。

④ Charles Mclane, *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1931-1946*, New W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58.

府研究了远东的局势，并通过了决议，一旦同盟国打败希特勒德国，欧洲战争一结束，苏联立即对日宣战。请赫尔把这一段话作为我们的正式立场转告罗斯福总统。”[①] 正是由于得到了斯大林主动传递的信息，远东问题才成为德黑兰会议期间三国首脑讨论的议题。而恰恰在这个时候，由于新疆问题激化和苏联全面中止对华援助，中苏关系已经陷入僵局。另一方面，美国加盟对日作战，也使蒋介石完全改变了对苏联加入远东作战的立场：中国不希望苏联参战，虽然他感觉到这种可能性正在日益增加，但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是使苏联在远东参战的计划“落空”。[②] 不过，斯大林是从来不考虑蒋介石的意愿如何的。

无论从苏联的远东战略要求，还是从苏联的军事力量来看，出兵对日作战在苏联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而盟国是否提出要求并不重要。德国投降后，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和主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决定是否参战的问题上，苏联政府不会理会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任何政治行动。”[③]

有的观点认为，在波茨坦会议之前苏联对于出兵问题还表示出“明显的踌躇和疑虑”。[④] 这种看法显然是由于对苏联的雄心和能力估计不足。事实上，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一开始便迫不及待地提出并比较详细地谈论了苏联在远东作战的问题。[⑤] 波茨坦会议之前一段时期，苏联在对日宣战问题上不急于公开表态，甚至还频繁与日本方面接触，无非有两点考虑：一方面利用美国需要苏联在远东助战的迫切心情，为谋求恢复其远东权益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另一方面利用与日本虚与委蛇的外交应酬遮人耳目，以便加紧军事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所以正如小查尔斯分析的，美国这时已经感到：“不管需要不需要，俄国总是要参战的，而且没有办法阻止他们这样做。”[⑥]

---

① 瓦·米·别列日科夫：《我是斯大林的译员——外交史的篇章》，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218页。据别列日科夫说，第二天拂晓，赫尔便向罗斯福发出了这一信息。根据斯大林“对此要保密”的要求，电报是用海军密码和陆军密码分两部分拍发的。至于说“立即对日宣战”，斯大林倒是有些言过其实了，事实证明，即使欧战结束，苏联出兵前也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作为军事和外交上的准备。不过，这种说法表达了苏联政府的急切心情。

② John W. Garver，*Chinese 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pp.191-192.

③ 赫伯特·费斯：《中国的纷乱》，转引自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75页。

④ 琼思、博顿和皮尔思：《1942–1946年的远东》，第208页。

⑤ 相反，对于在此时是否还要提出苏联参战问题表示犹豫的倒是美英两国了。见小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95页。另见别列日科夫：《外交风云录（续篇）》，第161–162页。

⑥ 小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第95页。

其二，美国在远东问题上对苏联的要求并不在于苏联是否参战，而在于是否能够尽早参战。减少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是美国希望苏联参战的根本动因。因此，斯大林刚一表示出参战的意愿，罗斯福立即抓住不放。美国当时所处的地位，正像两年前斯大林急切要求英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时苏联所处的地位一样。参战是迟早的事，问题在于何时参战。美国的要求在 1945 年 1 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表达得十分明确："我们希望俄国军队尽早地参加对日作战"，"俄国尽早地参战及全力投入进攻，是为我们太平洋地区作战提供最大支援所必需。"[①] 美国军方提出的这种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太平洋战争的过于悲观的估计。据丘吉尔回忆，英美曾认为在日本本土登陆作战，"很可能需要丧失 100 万美国人和 50 万英国人的生命。"[②] 美国对日作战的计划也比较保守，1945 年 6 月 18 日美国制定的"奥林匹克"战役作战计划和 7 月 24 日由英美参谋长提交波茨坦会议的对日战略目标报告都提出，实施对日本本岛最南端的九州的登陆作战要在 1945 年 11 月 1 日才开始，而占领日本主岛并迫使日本投降的日期估计是 1946 年 11 月 15 日。[③] 所以，如果苏联在美国实施登陆作战前参加对日宣战，既可以将日本关东军主力吸引在中国大陆，不使其增援日本本土，从而大大减少美国军队的伤亡，同时，又可以加快战争进程，尽早地结束战争。

如果说美国军方人士的出发点纯粹在于军事战略方面，[④] 那么美国总统和政府则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战略的考虑。罗斯福很明白，既然苏联参战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最好的结果是在军事上要求苏联尽早开始对日作战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必须与苏联达成某种协定，取得斯大林的承诺，从而限制战后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扩张。而且，这种承诺越早做出，美国在远东付出的政治代价就越小。这是美国急于同苏联达成远东问题的协议并多次要求苏联履行诺言的更为重要的政治原因。1951 年 5

---

① See Raymond L. Garthoff, "The Soviet Interven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6," in *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 ed. Raymond L. Garthoff, New York: Praeger, 1966, p.56；赫伯特·费斯：《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他们所进行的战争和所探求的和平》，转引自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 1 分册，第 62 页。

②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 5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年，第 930 页。另据赫尔利后来在国会的证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时估计，如果苏联不出兵对日作战，美国要付出伤亡 100 万人的代价。见斯伯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 73 页。

③ Garthoff, *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P.61；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 1 卷，第 353–354 页；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 6 卷，第 916 页。

④ 1945 年 6 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醒总统，"苏联参战将对日本投降产生决定性影响"（Garthoff, *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P.61），就是对此而言的。

月哈里曼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透露的罗斯福的“深层考虑”，很能说明当时美国的心态。哈里曼说：“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是否将参加太平洋战争，而在于是否能及时参战，有助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的实施。存在的巨大危险是苏联可能袖手旁观，而等我们牺牲了大批美国人生命，打败日本之后，红军长驱直入满洲和中国北部大片地区。那时苏联人就能轻而易举地以‘公众要求’为借口，建立满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了。罗斯福总统力图使斯大林先前所谈的一般保证变为俄国尽早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明确行动，限制苏联在东方的扩张和取得苏联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支持。”① 美国最担心的是苏联出兵的时机会选择在美军已经在日本登陆并付出重大牺牲之后，如果这样，苏联就会以最小的代价而取得在远东任意行动的实力地位。

其三，美国从未在外交上正式和公开向苏联提出参加对日作战的建议或要求。雅尔塔协议属美苏之间的秘密外交，而苏日当时还处于外交上中立状态，因此，苏联对日宣战必须师出有名。但局势的发展又使美国不愿承担为苏联寻找外交借口的责任。相反，由于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重大因素直接进入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制订过程，杜鲁门和丘吉尔甚至认为不需要苏联参战可能是更好的结果。② 尽管美国军方因无法预测使用原子弹的效果而认为苏联参战仍然是需要的，③ 同时鉴于外交和政治上的考虑，阻止苏联参战也是不现实的，但这个时候让美国对苏联参战提出正式的建议和要求，显然是不可能的。结果，波茨坦会议前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准备的一个拟在会议上提出的苏联对日宣战的方案，变成了美英单独做出的强迫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④ 到 1945 年 7 月下旬，已经不是美国急于要求苏联出兵，而是苏联在获知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急需找到一个对一直与苏联保持中立关系的日本宣战的理由和借口了。于是，在斯大林因病缺席的最后一次波茨坦会议上，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提出：苏联政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美苏和其他在远东作战的盟国，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参加对日作战的要求。而杜鲁门对此首先想到的是“其中的讽刺性的外交动向”：苏联终于要在最后关头来摘取胜利果实了。尽管杜鲁门很不情愿，但是鉴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他还是在 7 月 31

① 哈里曼的证词转引自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 1 分册，第 62–63 页。

② 参见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 1 卷，第 518 页；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 6 卷，第 931 页；别列日科夫：《外交风云录（续篇）》，第 158–159 页。

③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 1 卷，第 352–353 页。

④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257–258 页。中国在会后参加了该宣言的签字。

日给斯大林发出了一封充满圆滑的外交语言的信件。[①] 当然，斯大林很难利用，实际上也没有利用这封信件。不过，这根本不能妨碍苏联出兵，作为一位信奉实力外交原则的政治家，斯大林显然认为是否具有外交上合理的借口无关大局，凭借实力，苏联就可以收回沙皇俄国40年前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丧失的全部权益，或许收获还会更大些。

二、实力外交——苏联在中国谋取政治权益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在远东作战的对象是日本，但它在远东所要谋取的真正的和最大的权力和利益却是在中国。这同1904年的日俄战争一样：失败的是俄国，真正受到损害的是中国。问题很清楚，打败日本之后，在国际上对远东问题具有发言权的主要是美国和中国，而美国是强国，中国是弱国。所以，苏联欲置身远东，其外交策略必定是通过与美国的合作和争夺，在中国身上取得它所需要的权益。美国的外交思路也很明确：既然无法挡住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渗透，那么唯一的做法只能是一方面尽量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以便于遏制苏联；另一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适当地满足苏联的要求，从而将苏联在远东的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②] 于是，当战争接近尾声时，在美苏之间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秘密往来中，中国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筹码。既然斯大林可以与丘吉尔轻易地在一张纸条上划分各自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可以凭借实力与英美确定波兰、希腊、芬兰等许多欧洲国家战后的命运，那么显而易见，苏联在谋取远东权益时所依据的也必定是实力外交的原则。

由于条件还不成熟，或者说还不具备相当的实力，苏联虽然早在1942年就表示出对远东的兴趣，但是一直没提出参战的条件问题。据赫尔回忆，直到1943年10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斯大林主动提出参加对日作战时，苏联也没有提到任何

① 信件内容见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37–338页；小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第261页。

② 诚如1945年5月21日在回答国务卿的质询时美国陆军部长所言，苏联将为他们自己的目的参加对日作战，而美国所能希望的最多是在中国问题上的某些政治上的让步。Garthoff, *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 p.60。与中国相比，美国更重视对日本的控制。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在考虑苏联对远东的威胁时，首先想到的是“不容俄国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见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48–349页。

附加条件。[①] 不过，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非常明白斯大林让赫尔转达这一信息的目的：苏联出兵是不会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斯大林之所以要在 10 月 25 日，即刚刚确定一个月后在德黑兰举行的三国首脑会议的时机，透露这一信息，无非是让美国先行与盟国去磋商让步的条件而已。[②] 果然，斯大林因蒋介石参加而拒绝派代表出席 11 月 22 日召开的开罗会议，而罗斯福则在这一会议期间开始探询中国的态度。罗斯福在给蒋介石戴上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之后，便提出把大连作为国际自由港的建议，蒋介石得到中国将在战后收回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的保证后表示：当时机成熟，如果中国主权不被分割，他可以考虑这一建议。[③]

罗斯福在取得蒋介石同意出让中国东北的某些权利的允许后，第二天便赶往德黑兰会晤斯大林。在 11 月 30 日德黑兰会议的一次午餐会谈时，斯大林首先表示完全赞同将要发表的《开罗宣言》的全部内容。接着，当谈到苏联在波罗的海的入口问题时，斯大林问道，在远东能够为苏联做些什么。丘吉尔要斯大林谈谈对远东和那里的不冻港问题的看法，斯大林回答说，苏联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不过等到苏联参加远东战争时，再提这个问题或许更好一些。斯大林显然不愿过早地谈出他的全部考虑，但又不能放弃这样一次机会，所以紧接着又提示性地补充了一句：苏联在远东没有一个完全不冻的港口，因为海参崴只是一个部分不冻港，而且还被日本控制的海峡所包围。罗斯福就担心苏联不明确表示态度，因此抓住机会接过话题说，自由港的主张可以适用于远东，而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罗斯福还表示，中国人会喜欢在国际保证之下的自由港的主张。会议记录表明：斯大林对此表示满意。[④] 这里应该提醒一下，开罗会议宣言之所以要等到 12 月 1 日才正式发表，恐怕就是为

① Mclane, *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178；参见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年，第 158 页。

② 就连作为参加莫斯科会议的美国译员波伦，当时都对此表示怀疑：斯大林“没有提起任何条件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心目中没有条件”。见波伦：《历史的见证》，第 158 页。

③ 费斯：《中国的纷乱》，前引书第 10–11 页。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时还曾答应，美国可以和中国共同使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顾维钧回忆录》第 5 卷，第 560 页）。但没有看到其他材料证明这一点。

④ 这是参加会议的美国译员波伦记录的关于远东问题谈话的全部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 1971 年出版的德黑兰会议文件，恰恰将上述内容全部摘除了。见萨纳柯耶夫和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北京：三联书店，1978 年，第 97–98 页。此外，美国国务院在发表《德黑兰文件集》时，还附有 1944 年 1 月 12 日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委员会上的发言。罗斯福当时说：“俄国在西伯利亚没有不冻港，很希望能得到一个，斯大林元帅对大连成为世界的自由港表示赞成。……斯大林同意满洲铁路应成为中国政府的财产。他希望把整个库页岛都归还俄国，同时为了对通向西伯利亚的海峡实行控制，应把千岛群岛交给苏联。”《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集：1943 年开罗和德黑兰会议》，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 1 分册，第 37–38 页；Mclane, *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178。

了取得苏联的认同。[①]

事实表明，就苏联对远东的要求而言，德黑兰会议还只是序曲。因为这时斯大林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苏联出兵远东的政治条件，而只是对大连港国际化表示赞同。1944年的欧洲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苏军开始把战争推出国境，法西斯德国的崩溃已成定局。随着形势的发展，远东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了。与此同时，斯大林在远东的战略目标也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1944年10月15日，斯大林在同艾登、哈里曼谈到苏联对日作战准备工作时说：虽然还没有确定对日作战的最后日期，但计划工作应立即开始。又特别补充说："而且，还有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要加以考虑。"[②]这无疑是表明，苏联要正式谈谈在远东出兵的条件了。罗斯福接到哈里曼的报告后一方面在11月18日给蒋介石送去一封信暗示苏联将要出兵，另一方面指示哈里曼直接向斯大林探询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12月14日哈里曼拜访斯大林时，得到苏联明确而具体的答复。斯大林走到一张地图跟前说，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应归还苏联。同时强调，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海路现在完全由日本人控制着，苏联有权保护通往这一重要港口的通道，而该港口通向太平洋的一切出口现在均为敌人所封锁。这时，斯大林（指着地图）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画了个圈说，苏联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哈里曼向斯大林指出，德黑兰会议设想的是一个国际自由港，而不是由俄国人租借这个地区。斯大林在答应"这可以讨论"之后，又进一步提出苏联希望租借中东铁路和连接大连的南满铁路。在重申苏联无意干涉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后，斯大林又要求承认外蒙古的现状，即保持外蒙古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③]于是，以此为基础，斯大林和罗斯福便背着中国开始了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会谈，而会谈大部分内容都涉及中国的主权和利益问题。1945年2月8日罗斯福、哈里曼（译员波伦）与斯大林、莫洛托夫（译员巴甫洛夫）进行了私下会谈。在讨论了某些涉及远东的军事问题后，斯大林说他想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罗斯福说，他已收到斯大林与哈里曼谈话的报告。关于库页岛

---

① 开罗宣言全文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1册，第202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集：1945年马耳他和雅尔塔会议》，转引自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卷，第60–61页。

③ 参见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09页；《美国对外关系》，《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卷，第63–64页；别列日科夫：《我是斯大林的译员——外交史篇章》，第540页。以上所引资料，根据后来苏美双方当事人的回忆，基本相同，只是别列日科夫的回忆未提到蒙古问题，而哈里曼在回忆录中则认为斯大林这次谈话提出的要求与后来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是相同的，参见 Mclane，*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P.178。

南部和千岛群岛在战争结束时交给俄国的问题，罗斯福认为没有困难。关于远东不冻港问题，罗斯福提醒斯大林在德黑兰讨论时曾建议给苏联使用的是南满铁路终点的大连港，并说还未与蒋介石讨论此事，因此，不能代中国人说话。但罗斯福又表示苏联获得这个港口的使用权可以有两种办法：或者向中国租借，或者使大连成为国际共管的自由港，而他赞成后一种办法。罗斯福还说，希望香港也成为自由港。斯大林接着提出使用满洲铁路问题，并特别提到沙皇曾使用过满洲铁路。罗斯福表示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 通过租借，由苏联直接管理；(2) 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共同管理。谈到这里，斯大林说，显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如果这些政治条件能得到满足，人民就会理解这里涉及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向最高苏维埃解释这项决定。谈话快结束时，斯大林希望在雅尔塔会议结束时，能由三大国将这些条件写成书面文件。罗斯福表示同意。至于把这些条件告知中国的时机，斯大林认为，当苏联能够从西线调 25 个师到远东时，那就可能同蒋介石谈这些问题了。[1] 会谈后，苏联便很快准备出一份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政治条件建议的英文本，2 月 10 日哈里曼应莫洛托夫邀请到苏联代表团驻地，他看过这份文件后指出，他认为美国总统必将提出下列修正意见：旅顺口和大连应是自由港，满洲的铁路应由俄中联合委员会经营，而且所有协议应该得到中国人的赞同。当晚斯大林与罗斯福单独交谈时说道，他同意满洲铁路由联合委员会经营，也不反对要得到中国人对所达成的协议的确认。但他补充说，中国人还应该同时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斯大林也同意大连成为自由港，但仍坚持以租借原则使用旅顺口，而那里将成为苏联的海军基地。罗斯福接受了这一改变，并承担了责任：苏联一旦通知他时机成熟，他就立即与蒋介石磋商。[2] 于是，以上美苏双方达成协议的条件，便成为第二天签订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全部内容。[3] 剩下的就是在适当时机劝说中国接受这一协定的条件了。

为了保密，在雅尔塔会议的公告中没有涉及远东问题，同时苏联还扬言对远东

① 编译组：《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第 160–163 页。这里引用的是美国译员波伦的记录，因为十分明显的原因，苏联正式出版的德黑兰文件集没有收入这次谈话的记录。

② 别列日科夫：《外交风云录（续篇）》，第 113–114 页；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 210 页。

③ 雅尔塔协定全文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 1 册，第 204–205 页，《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文件集》，第 258 页。由于苏联的要求，在协定有关大连商港和东北铁路的条款中加上了“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一句，而这一句后来也成为苏联损害中国主权的借口。

问题不感兴趣。但蒋介石根本不相信，他在3月6日与回国述职的顾维钧谈话时表示对雅尔塔会议的内容“深为关切”，但顾维钧所能奉告的只是在伦敦听到的一鳞半爪的消息。于是，蒋介石命顾尽快去美国打探。[①] 不久，3月12日驻美大使魏道明发来电报说，他访问罗斯福时问及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关于远东问题的意见。罗斯福回答说：“斯大林提出三条：(1) 承认蒙古的现状；(2) 承认中国对中东铁路的主权，但必须要有一个托管制度；(3) 苏联要在旅顺港南面有一个不冻港如大连或其附近的港口。”对于以上三点，电报说罗斯福本人的看法是，由于中国仍保留对外蒙的主权，维持现状似乎不会有什么问题；中东铁路主权仍属中国，但可以由中、美、苏三国派代表实行托管；关于军事港口，旅顺港可以租借给苏联若干年，只要主权仍属中国。[②] 3月18日蒋介石与顾维钧密谈时出示了这份电报，顾的回忆称，魏道明还报告说，当时罗斯福曾向斯大林提出，此事需要与中国研究。“不过，总统的语气流露出他倾向于满足斯大林的愿望。”[③] 从电报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罗斯福为使中国能接受雅尔塔协议，确实用了一番脑筋。由于蒋介石以研究为由压住了对魏道明电报的答复，3月22日罗斯福又直接给蒋介石发电，再次谈到苏联对中国的要求，并希望早日示复。这使蒋介石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从心里不甘心把中国的权益出让给苏联，另一方面又很难拒绝罗斯福的建议。毕竟，在蒋介石看来，中国抗战的胜利是离不开美国帮助的。[④]

斯大林要求美国承担说服中国接受苏联条件的责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则中苏关系因新疆纠纷此时正处于紧张状态，二则蒋介石对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直深感疑虑。相反，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中美关系则日益密切。当然，斯大林也没有忘记及时向美国对华政策靠拢，并不断通过美国向蒋介石表示亲近和友好。早在1944年8月，莫洛托夫就向罗斯福的特使保证，苏联决定支持蒋介石而阻止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⑤] 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与赫尔利会晤时，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关系，苏联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而且也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嘉许蒋介石，并说他们会支持美国关于统一中国武装部队和

①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第474–478页，

② 梁敬：《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载《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24–225页。

③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第480页。

④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第561–562页。罗斯福的电报在3月15日就写好了，如果蒋介石对魏电及时回复，这封电报或许就不会发出了。

⑤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78–179页。

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民主政府的政策。总之，赫尔利在他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斯大林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无条件表示同意”。[①]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希望能说服美国尽量维护中国的利益。他在 4 月初指示宋子文转告罗斯福，任何把旅顺或大连租借给苏俄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罗斯福逝世后，蒋介石又嘱赫尔利致电杜鲁门，说中国一直在为保卫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而奋斗，并希望美国政府将此意转告斯大林，中国不会接受违背这一原则的任何要求。[②] 斯大林十分清楚蒋介石真正担心的是什么，于是在 5 月 28 日与霍普金斯和哈里曼会谈时再次明确地表示，他觉得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统一中国的人将是蒋介石。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有蒋介石那么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完成中国的统一。斯大林还许诺，凡是苏联军队开进的地方，中国的行政机构都将由蒋介石建立。霍普金斯立即将谈话内容电告杜鲁门，并说斯大林希望能在 7 月 1 日以前见到宋子文，同时盼望美国能与蒋介石商谈。[③] 杜鲁门 6 月 9 日便致电赫尔利，让他将雅尔塔协议的内容和斯大林 5 月 28 日的许诺正式转告中国政府。[④] 在此之前，蒋介石肯定还从正在旧金山开会的宋子文那里知道了另外一种情况，即一些最有影响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包括马歇尔在内的军方人士，都对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因与蒋介石有矛盾而被召回感到愤懑。而莫洛托夫对宋的态度反而越来越好。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开始退让。他在 6 月 10 日左右给宋子文发去几个电报，指示关于旅顺问题的谈判方针时态度已经不那么强硬了，只是强调不能让苏联单独占有或租借旅顺港并保留中国的主权和管辖权，并指示宋子文准备去苏联谈判。[⑤] 这样，在美苏双方的外交攻势下，除了对租借旅顺还有些不情愿以外，蒋介石在中苏之间的谈判开始以前，基本上默认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全部条款。

6 月 30 日，宋子文、蒋经国等一行携带蒋介石给斯大林的私人信件到达莫斯科。中苏之间开始了直接的正式的谈判。鉴于蒋介石已基本上同意了雅尔塔协议的条件，所以，宋子文在会谈前估计，谈判的困难主要在旅顺港的租借问题上。[⑥] 当

①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 1 卷，第 51 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 1 分册，第 373 页。

②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 5 卷，第 501、508 页。

③ 《美国对外关系》,《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 1 卷，第 379–380 页。

④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 1 卷，第 190–191 页。

⑤ 梁敬:《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载《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 225–226 页。

⑥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 1 卷，第 192 页。

中国代表团坐到谈判桌前时，宋子文才明白中国过于低估了斯大林的对远东的胃口和谈判的手段。会谈中，斯大林一改与英美会谈时彬彬有礼、镇静自若的风度。据蒋经国回忆，斯大林在会谈一开始便粗暴地把雅尔塔的秘密文件往宋子文面前一掷，盛气凌人地说："你看过这东西没有？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①] 而实际上苏联重新提出的条件与雅尔塔协议有很大差别：(1) 关于维持外蒙古的现状，苏联的理解是承认外蒙古独立，而中国的理解是外蒙古虽然当时实际上是独立的，而且那里只有苏联军队，而没有中国军队，但在法律上中国还是宗主国；(2) 关于旅顺和大连，不只是港口的问题，还加上了"陆地和邻近海域"的内容，旅顺、大连周围地区虽由中国的民政部门管理，但管理人员的挑选却要由苏联批准；(3) 大连城市由中苏共管，大连港口要成为中苏专用的海军基地，而且由苏联管理；(4) 旅顺港虽由中苏共同使用，但苏联想获得行政管辖权；(5) 中国必须同意建立一个为期 40 年的中苏联合委员会管理满洲铁路，而且委员会负责人、经理以及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必须是苏联人。[②]

中苏之间的谈判十分艰苦，虽然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中国代表团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得不做出让步，但在谈判因波茨坦会议召开而中断时，中苏之间仍有中蒙边界的划定、大连的管理、旅顺海军基地范围的划定及旅顺港的管理、东北铁路的使用和在东北的军事合作等 6 个问题尚未解决。[③]

然而，当 8 月 7 日中国代表团回到莫斯科的谈判桌前时，远东局势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8 月 6 日美国在日本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 月 8 日即重开谈判的当天，苏联对日宣战。本来苏联出兵是以中苏签约为先决条件的，斯大林曾多次强调这一点，甚至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军事代表安东诺夫上将仍然向英美盟国表示，苏联出兵的具体日期要视中苏谈判的结果而定。[④] 当然，苏联发出这种信号不过是督促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所以当美国投下原子弹而远东局势发展到苏联再不出兵就将失去它在远东谋取权益的有利地位时，虽然军事上尚未做好充分准备，苏联仍然仓

① 江南：《蒋经国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年，第 132 页。

② 梁敬錞：《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一文对谈判经过有详细描述，第 230–235 页。另参见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 254–255 页。

③ 梁敬錞：《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第 237 页。

④ 小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第 216–217 页；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 1 卷，第 314 页。

促地向中国东北大举进军了。[①] 这就是说，当中苏双方还在谈判桌上讨论关于苏联对日宣战的交换条件的时候，苏联大军已经发起进攻，并且日本也已经乞求投降了。于是因果倒置——苏联出兵本来是以中答应苏联的条件为前提的，现在却成了迫使中国接受苏联条件的动因。

三、城下之盟——以最小代价取得的最大成果

实际上，当苏联红军越过中苏边境向日本远东军大举进攻之前，日本的失败和投降就早已成为定局了。在太平洋战场，1945 年 6 月 23 日冲绳岛日本守军全军覆没；7 月 7 日美军攻陷塞班岛；在 8 月 1 日当天关岛的战斗中，据美军战果初步报告，击毁日机 114 架，击伤 101 架，击沉击伤日舰 41 艘。[②] 到 7 月底，由于盟军海军和空军的歼灭性打击，日本的海上运输船队已从每天的 40 支减少到零，日本除两三艘航空母舰和巡洋舰外，“连一艘还能作战的战列舰都没有了”，“除了日本海的小规模活动外，日本人已被迫停止海上一切活动”。正像丘吉尔说的，“日本海军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在东南亚，英国军界首脑在波茨坦会议报告说，英军正在缅甸和暹罗进行大扫荡，日本舰队只剩下一些残余力量，而英美空军则对日本空军拥有绝对优势。[③] 在中国战场，中国军队也开始进入全面反攻，华北、华中和华南广大敌后地区的日军已经基本上被逼退到铁路沿线和一些主要的公路线，5 月 18 日收复福州，5 月 27 日收复南宁，6 月 29 日收复柳州，7 月 28 日收复桂林。接替史迪威职务的魏德迈中将对六个省巡视了十天之后说：“迅速结束对日作战更为乐观了。”[④] 此时，苏联面对的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和骄横。据东京审判时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的证词，到 1944 年底，由于精锐师团调往前线或防卫日本本土而由一些战斗力弱、装备差的后备师团接替，关东军已没有一个受过高度训练的师团，坦克和飞机很少，军火和燃料储存也很有限。[⑤] 到

① 实际上，当 8 月 7 日苏联远东军接到于 8 月 9 日开始对日作战的命令时，苏军的高级指挥人员还没有完全到位，而运送士兵、飞机、车辆、燃料和其他重型武器的列车在战斗开始后好几天里仍源源不断地沿西伯利亚铁路开向远东。Garthoff, *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 p.6；林三郎编著：《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 177 页。

② 小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第 281 页。

③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 6 卷，第 934 页；小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第 217–218 页、281 页。

④ 小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第 281 页。

⑤ 琼思、博顿和皮尔思：《1942–1946 年的远东》，第 203–204 页。

1945年8月9日苏联进攻时，日本在满洲只有24个师和11个旅，在朝鲜有7个师，在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有3个师和1个旅。关东军总兵力787600人（加上满洲国军队和内蒙仆从军总共100万人），坦克1215辆，飞机1800架，大炮和迫击炮6700门，而且其中四分之三的部队，即33个师（旅）是7月1日以后才组建或调来的，在满洲的关东军中有15个师（旅）只是在苏联进攻前10天才拼凑起来的，而且连步枪等武器都尚未发下。总之，日本方面认为这时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关东军的7—8个师和朝鲜驻军的2个师。[①] 所以，日本大本营给关东军的作战计划是把防御重点放在南满和朝鲜边境沿线。[②]

处于进攻一方的苏联远东军在兵力、装备和武器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据1980年苏联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一书提供的资料，苏联进攻时拥有150万军队，29000多门大炮和迫击炮，5200多辆坦克和自行推进炮，近5200架作战飞机。[③] 兵力相差如此悬殊，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正像斯大林对哈里曼通报的：苏军在“各条战线都没有遇到重大的抵抗”。[④] 以下材料也可以说明双方交战的状态：1944年12月至1945年4月苏联从欧洲运到远东的炮弹有320万发，轻武器子弹41000万发，但在战斗中仅消耗炮弹36.1万发和子弹102.37万发。在很快结束的战斗中，苏联俘虏日军59.4万人，此外击毙的只有8.3万人（日本资料统计约2.1万人），而苏军阵亡则仅仅8219人。[⑤] 还有一个情况应该说明，上述资料是截止到8月底的统计结果，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8月14日夜便接到了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关于停战的电报。由于8月15日天皇宣读了投降诏书，关东军在16日午夜接到正式停战命令之前，已经决定“谨依圣旨，立即停战”，并于17日正式向苏联远东军提出停战交涉。[⑥]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停止战斗要晚

---

① Garthoff, *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 p.63。苏联材料对日军的估计较高，认为1945年春关东军有120万人。见沃尔科格诺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58页。

② 琼思、博顿和皮尔思：《1942–1946年的远东》，第204页；林三郎编著：《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第180页。

③ 转引自奥·鲍·鲍里索夫和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肖东川、谭实译，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1页。日本参谋总部当时对苏军的估计与此相差不多，只是飞机略多一些。见林三郎编著：《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167页。但也有苏联材料说远东军总兵力达174.7万人。见N．A．基见林主编：《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第441页。

④ 《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64–365页。

⑤ Garthoff, *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 p.69；并参见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第15页；沃尔科格诺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幕》，第379页。

⑥ 林三郎编著：《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第190页。

一些，但日本宣布投降对于战斗进程和结果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况且，苏军拖延停战还另有目的。

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对于日军提出的停战交涉的回答是，关东军应于8月20日12时以后停止战斗行为。这种没有要求日军立即停战投降的反常举动，显然表明苏军对当时战斗的推进和战果还不满意，[①] 而一旦宣布日军投降，就有可能招致中国和美国介入受降。苏联希望利用达成停战协议以前的时间，加速扩大在满洲的占领区。事实上，苏联正是在8月18日到20日之间短短的两三天里，依靠空运部队和地面快速先遣部队相继抢占了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长春、沈阳、承德、旅顺、大连和平壤。[②] 这样，苏军便以最小代价取得了辉煌战果并占领了整个东北。

苏联的胜利还不仅仅体现在战场上。苏军紧急出兵东北，迅速扩大战果，对于正在莫斯科进行的中苏谈判的结果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由于阿拉莫戈尔试验场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对苏态度开始强硬起来，不仅在保证满洲门户开放的问题上对苏联施加压力，而且也对中苏条约提出干涉，“反对把大连港划归苏联军事区或把它作为苏联海军基地”。[③] 有了美国的支持，蒋介石的腰杆也显得硬朗起来，他甚至在8月13日指示中国代表团停止谈判并坚持要在下列几点达成明确的一致意见：(1) 划定外蒙的边界；(2) 旅顺海军基地成立中苏军事委员会；(3) 为大连委派一名中国港务员。[④] 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甚至对中苏恢复谈判能否达成协议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了。[⑤] 但是，比起原子弹的威慑力量，苏联向东北迅速推进给予斯大林在谈判桌上的优势更为现实，而对于蒋介石来说，个人的权力比中国的主权更重要，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威胁比苏联在东北夺取的权益更使他痛心疾首。这时，中国代表团最担心的问题是，在苏军已经开始进军东北的情况下，如果不马上签约，以便在条约内对苏军的行动有所限制，那么一旦苏联占领整个东北，后果可能更坏。斯大林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他在8月10日不无威胁地

---

① 林三郎编著：《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一书详细描述了当时东北各战场的进展情况，并得出结论：“到8月15日为止，日本关东军的主力尚未同苏军交战，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见该书第190–191页。

② 林三郎编著：《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第192、195页。

③ 琼思、博顿和皮尔思：《1942–1946年的远东》，第159–160页；梁敬錞：《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第240页；《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62页。而在中苏谈判前，杜鲁门曾拒绝了蒋介石要求美国干预中苏谈判的建议。

④ 梁敬錞：《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第238–239页。

⑤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63页。

对宋子文说："中国最好快些达成协议，不然的话中国共产党将要进入满洲……"[①]面对苏联150万大军在东北的迅速推进，中国代表团在谈判桌上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8月14日，蒋介石无可奈何地批准签约了。正是这一天，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

战争已经结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基本上按照苏联的意愿签订了，但是斯大林对于条约所保证的在远东的权益还不满足。在条约即将签订前，斯大林曾提出了"战利品"问题。当宋子文询问这指的究竟是什么时，斯大林推诿过去了。[②]现在，当苏联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之后，苏军的实际行动回答了宋子文的询问——什么是"战利品"问题。据杜鲁门的私人代表鲍莱在"1946年6月关于日本在满洲财产致美国总统的报告"中说，"苏军抵达满洲的工业区后，就开始有系统地没收粮食与其他存储的物资，并且在9月初就开始有选择地搬运工业机器。"[③]显然，苏联没有忘记攫取更直接、更实惠的利益。在中苏条约的补充记录中，斯大林保证苏军在日本投降以后三个星期内开始撤退，并最多在三个月内撤退完毕。[④]然而撤军期限将至时，苏联又提出了新问题。1945年11月24日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的顾问斯莱考尔斯基向国民党接收东北的经济特派员张家正式提出一项建议，要求中苏联合经营东北80%的重工业。当张家答复说，中苏在东北的经济合作问题，只有在苏军完全撤退后才能开始讨论后，斯莱考夫斯基于12月7日通知国民党当局，所有东北的工业企业均为苏军的"战利品"。马利诺夫斯基则在稍晚一些时候声称如果留下这批设备，苏联要求得到这些企业的股票，并在重工业股份中占51%，在轻工业股份中占49%，甚至要挟说：经济合作方案未获协议前，不能预料苏军撤退的确切日期。[⑤]于是，中苏之间又展开了关于东北经济问题的拉锯式的谈判。东北地区的经济战略地位毋庸赘述，而苏联在1946年2月9日宣布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苏联此时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

① 琼思、博顿和皮尔思：《1942–1946年的远东》，第178页。

②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63页。

③ 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2分册，第347–348页；琼思、博顿和皮尔思：《1942–1946年的远东》，第310–311页。

④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第275页。谈判中莫洛托夫曾口头答应苏军将于1945年12月3日以前撤出满洲。见琼思、博顿和皮尔思：《1942–1946年的远东》，第300页。

⑤ Mclane, *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235；邹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转引自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2分册，325页；江南：《蒋经国传》，第139页。这不由得使人们想起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对解决芬兰问题的态度：如果芬兰人不付赔款，俄国就要占领芬兰的一部分地区，如果他们偿付，俄国人就会在当年以内撤走。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5卷，第609–610页。

题的目的所在。后来，虽然在国际干预和中国舆论的压力下，苏联军队于 1946 年 5 月撤出中国东北，但在此期间，苏联还是运走了大批的工业设备和其他资产。对于这批资产的估计，有很不相同的统计数字。据当时国民党接收官员尚传道回忆，1946 年 3 月国民党当局曾编制了一份统计材料交给联合国调查团，该材料估计苏军运走的全部资产总值约 100 亿美元。[①] 但 1947 年初苏联《消息报》声称，苏联从满洲运走的设备价值仅有 0.97 亿美元。统计数字相差如此之大，恐怕是双方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在设备估价、汇率计算、统计范围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别。比较可信的是联合国调查团 1946 年 12 月报告的估计：苏联占领期间满洲的经济损失达 8.58 亿美元，而恢复和重建这些企业的费用则达 20 亿美元。[②] 或许可以用一些更形象的材料说明问题。据蒋介石得到的报告，苏联运走的资产，占东北电力设备的 65% 和钢铁工业设备的 80%，而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的煤矿则“都被劫掠”。[③] 总之，苏联依靠军事占领，在东北攫取了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利益。

最成功的外交，莫过于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苏联通过出兵东北，实现了在远东的政治目标。就其结果而言，战后苏联在远东获取的势力和利益，不仅全部恢复了沙皇俄国 40 年前之所失，而且超出了雅尔塔秘密协定和中苏条约的规定。同时，苏联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比它在欧洲战场付出的要小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认为这一时期苏联在远东的举措，是自推翻旧政权以来一次最成功的外交。

发表于《历史研究》1994 年第 5 期

① 尚传道：《参加接收长春、吉林的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60 期，第 109 页。

② Mclane, *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235。日本方面的计算与联合国的调查相差不多，据东北日侨善后联络总处和东北工业会的详细调查计算，“苏军进驻期间东北产业设施损失”为 12.33 亿美元。见山本有造：《战后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16 辑，第 35–36 页。

③ 江南：《蒋经国传》，第 139–140 页。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

战后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的关系，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苏联史研究中令人关注的问题。中国学者起步较早，1992年出版的牛军和杨奎松的两部重要专著，都较多涉及这个问题，其史料特点是使用了大量当时难得一见的中共中央文电。[①]接着，挪威学者文安立出版了英文专著，更集中地讨论了美苏冷战与中国内战起源的关系。[②]此后，各国学者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问世。[③]本文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其一，出现了新的档案文献。2000年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中关系：文献与资料》的第4卷第2册，收集的是1945年的档案；2005年又出版了第5卷的两册，收集的是1946年至1950年初的档案。这三本档案集公布的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资料共815件，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

①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

② Odd Arne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中译本见文安立：《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③ 比较重要的有 Sheng Michael，*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Документы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1937-1952，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1999（中译本见列多夫斯基著：《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最近的研究成果见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张振江：《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1944-1946）》，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文件。[①] 就中国档案而言，最有价值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的《彭真年谱》，其中使用了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中共中央与东北局、重庆代表团之间的往来文电。[②] 这些有关中国内战时期的档案文献十分重要，对于这段中国历史，特别是苏联与中国内战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应该说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最后的结论如何，研究者都有必要依据这些新的档案文献，对过去讨论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③]

其二，需要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以往的研究多是把中国历史作为主线，重点在于论述中共对革命和内战的考虑及其战略、策略的变化，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作为国际背景的苏联对外政策及冷战格局的变化。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不是孤立的。战后初期和内战初起，中共的战略和策略受制于苏联的外交方针和美苏关系的现状；内战后期，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则反过来引起了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进而影响到整个冷战格局的改变。这些现象说明，苏联的战后对外政策及冷战战略和策略与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研究者需要考虑：在冷战缘起的过程中，苏联对外战略的构想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其对中国内战的方针；把中国内战的起源和结果作为一个案例，如何解读苏联对冷战的战略构想及其变化。[④]

本文主要考察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起源之间的复杂关系。

---

①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IV，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37-1945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0；*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V，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 1950，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

② 彭真年谱编写组：《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

③ 有些中国研究者对俄国档案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这从 1996 年对于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秘密出使中国（1949 年 1–2 月）》一文（*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3，中译文见《国外中共党史动态》1995 年第 5 期，《党的文献》1995 年第 6 期，1996 年第 1，3 期）的"围攻"便可感觉到。该文引用了米高扬 1960 年 9 月 22 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关于这次使命的报告全文，以及报告所附的详细引文。由于米高扬的结论及其所附文件与中共当时的实际做法以及中共在党内文件中表述的对待资产阶级党派的立场完全不同，有不少中国研究者撰文（至少四篇）对此提出质疑，甚至直接否认俄国档案的真实性。直到 2000 年俄国发表了米高扬所附档案的全文（*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Две телеграммы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Мао Цздуна с И.В. Сталины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6），这场争论才算了结。这件事给人的启示在于，研究者不应因档案内容不符合自己的观点就轻易否定档案的真实性；档案本身固然不是历史，但往往是解开历史谜团的钥匙。

④ 着重考察苏联对华政策的研究成果不多，可见张盛发：《从消极冷漠到积极支持——论 1945–1949 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世界历史》1999 年第 6 期；薛衔天、刘成元：《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提交"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学术讨论会论文，哈尔滨，2003 年 8 月。

一、斯大林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中国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①] 为实现这个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重要内容，同其他共产党活跃的欧洲国家一样，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②]

1945年6月，第11—12期《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③] 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④] 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此不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纲领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

---

①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另参见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有关章节。

②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论述见：《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实施（1945–1946）》，（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第71–77页；第6期，第77–85页。

③ 转引自 Chares Mclane，*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1931-194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p.182。

④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45，Vol.7，Washington D.C.：GPO，1969，pp.338-340；彼得罗夫与赫尔利的谈话备忘录，1945年5月10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33，д.14，п.244，л.120-12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Ⅳ，c.37-40。

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对此，莫斯科是十分了解的。[①] 然而，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中共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②] 所以，尽管早在 6 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③]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通过武力的较量立即实现中共的主张可能是最佳选择。8 月 9 日苏联兵分三路进入东北，中共中央立刻意识到这有可能导致日本投降，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历史突变之时，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同时要求华中局即日派部队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点，沿津浦、沪宁、沪杭线各中小城镇则由地方部队动员民兵占领，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中央还指出：“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11 日，延安总部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12 日，中共又调整了华中部署：在江南不再占领各大城市，只夺取广大乡村及县城，“准备内战战场”，若内战胜利，就原地继续扩展，若内战失利，则转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但决不退回江北；江北力量则全力“占领津浦路及长江

---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年，第 1004–1006 页；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的信，1945 年 2 月 3 日，АВПРФ，ф.0100，оп.35，д.11，п.237，л.34-38；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的会谈备忘录，1945 年 6 月 29 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Ⅳ，с.10-14，68-71。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391–393 页。关于苏联的援助，毛泽东在 1945 年 8 月 13 日讲话中称：在抗战期间，“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毫无外援”（《毛泽东选集》，第 1070 页）。但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通过共产国际，苏联在 1938 年 2 月、1940 年 2 月和 1941 年 7 月分三次向中共提供了 180 万美元的直接援助。见 *Дим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 (9 марта 1933-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1997，с.137，190，238-239。

③ 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备忘录，1945 年 6 月 29 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Ⅳ，с.68-71。

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并"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①] 显然，中共的战略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准备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

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面对突变的形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但周恩来一眼便看出，蒋介石"请毛往渝全系欺骗"。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中共仍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毛泽东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一方面针对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答复说：你们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②]

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关键时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③] 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军事实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终目标，但他知道一点：无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15、213–214、234–23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13页。

② 毛泽东给程耿贺林的指示，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8–9页。

③ 关于莫斯科的这封电报，首先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的，内容如上述（《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6页）。据胡乔木回忆，在1960年7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说，电报已经不存在了，可能烧了，时间是22日或23日，内容同前。刘少奇在会上又补充了一句：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回忆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401页）。有关这个问题的俄国档案目前尚未解密，但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证明，确有这样一封电报。根据日记，8月18日季米特洛夫与卸任不久的驻华大使潘友新共同起草了致毛泽东的电报，意思是"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第二天，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这个电文（*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493）。至于收到电报的日期，《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15页）注明为"22日前后"。考虑到该电报应在19日以后发出，而中共的战略方针20日如故，21日开始改变（见后），故笔者断定中共收到电报的时间应该在20–21日之间。另外，按照师哲的回忆，斯大林先后发来两封电报（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08页），此事目前尚无法查证。

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

对于来自莫斯科的"国际援助"，中共固然没有抱多大希望，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下一道"不许革命"的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21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取消上海起义计划。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指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同时，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选择"革命"方式转向选择和谈方式："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① 至于苏军管制下的东北，中共还是寄予很大希望，仍坚持"迅速争取东北"，只因不明苏联的立场，所以决定先派干部去那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是否派军队占领，还要视情况而定。同日，毛泽东给蒋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23日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再邀，毛泽东次日答复，周恩来先去，他本人"准备随即赴渝"。②

战略方针出现如此急转弯，是需要给全党和全军一个交代的，原因当然主要是苏联表明了态度。③ 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毛在分析了战后进入和平阶段的两种情况（可以占领或无法占领大城市）后指出，由于得不到苏联的帮助，"没有外援不能克敌"，"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至于苏联为什么不能帮助中共，毛泽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释说，美苏需要实现国际和平，"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毛还对比了希腊和中国的情况：苏联没有援助希腊，是因希腊为英国所必争，而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如果中共占领南京、上海等大城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9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244页。

②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19页；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75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2页；《毛泽东年谱》，第12页。

③ 斯大林在1945年12月与蒋经国会谈时提到，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当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建议，这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混乱"。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22，л.98-121，*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сына Чан Кайши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5-январь 194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11.

市，美国必然进行干涉。显然，毛泽东已经看出，中国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并断定苏联进军中国的区域大概会限定在东北三省。所以，中共在关内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不会得到苏联的援助。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而在中国，联合政府的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目前"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将来再"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看来，中共是不得不走这条"弯路"了。[①] 第二天毛泽东发出的一个指示当是对上述讲话的注释："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②]

8月25日，中共又接到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的邀请电，遂开会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去重庆谈判。在第二天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述了中共参加重庆谈判的原则和方针。既然谈判，就需做出让步，中共的原则是"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达到妥协。让步的限度："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但是，在陇海路以北直到外蒙的地区，"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毛说，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签字，并"准备坐班房"。"随便缴枪"是绝对不行的，延安也不会"轻易搬家"。[③]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讲的是走法国式的道路——这是对斯大林路线的准确理解，恐怕也是说给斯大林听的，但实际准备实行的谈判方针及其所确定的目标与斯大林的设想有重大区别：第一，斯大林主张的是共产党进入由资产阶级政党掌权的政府，而毛泽东设想的"联合政府"却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至少来个武装割据。第二，斯大林要求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而毛泽东却坚持无论如何不能放下枪杆子的原则。第三，斯大林设想的"联合政府"是长久之计，而毛泽东却把和平谈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总之，迫于形势，毛泽东不得不委曲求全，亲赴重庆与夙敌蒋介石谈判，而内心却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联合政府"实属一相情愿，最后解决问题还要靠武装斗争。

① 以上引言见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1945年8月23日；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3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5-24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15-61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3、15-17页。

在重庆谈判过程中，莫斯科对国共和谈的结果以及中共的实际立场已经逐步有所了解，但除了坚持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外，并没有再发表具体意见。[①]8月30日，在重庆的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报告说，周恩来在与他会谈时表示，“根据全部情况判断，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打算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但“我们不可能指望蒋介石会做出过多的让步”，其主张的实际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被消灭的结局”。周恩来强调，中共历来一直进行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如何“从武装斗争急剧地转向和平建设”，干部和群众都没有准备好。因此，需要莫斯科提供情报和意见。彼得罗夫的回答是：“周恩来同志在党政工作方面经验相当丰富”，“将能够正确地评价中国目前的局势并采取正确措施。”[②]

9月6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告诉彼得罗夫，在谈判中，“毛泽东要求将包括首都北平在内的5个省转交给共产党人，以便使他们能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养自己的军队”。赫尔利声称，英国人支持在中国“分而治之”，而斯大林则告诉哈里曼，“允许在中国建立两个政府”是“愚蠢”的。以此为出发点，赫尔利一再建议苏联和美国共同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的声明。彼得罗夫对此没有响应。[③]同一天，毛泽东也拜访了苏联大使。毛泽东介绍说，谈判表明，蒋介石极力要“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并用武力封锁共产党的地区和军队。所以，“联合政府”已经谈不上了，他们只同意让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代表加入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对于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将除特区以外的5个省——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热河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同意放弃华南和华中的解放区。”最后，毛泽东表示中共的让步是有限度的。为此，毛和周恩来、王若飞一再追问，苏联对此持有什么立场，“如果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苏联将会采取何种步骤。”彼得罗夫只是一味强调：“苏联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两党的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第二

---

① 关于重庆谈判的详细过程和国共双方的主张，中国学者已有深入研究，最值得参考的成果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第八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本文则重点考察苏联对重庆谈判的态度。

②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45年8月10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14，д.244，л.205-20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Ⅳ，с.214-216。

③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备忘录，1945年9月6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12，д.244，л.218-21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Ⅳ，с.229-230。

天，彼得罗夫又向东北特派员蒋经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①]

10月10日，就在谈判协定签字的当天，毛泽东再次拜会苏联大使。毛说，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表明中共取得了胜利，是将来“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但又强调，“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他会继续进行反共的军事准备”。因此，“中共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作应战的准备”。毛接着说，“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没有问题，中共唯一担心的是美国会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并问苏联人，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中共没有明说的愿望当然是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几天前周恩来就提出了同样问题，当时彼得罗夫未置可否，现在面对毛泽东的提问，彼得罗夫的答复也只是：“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与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②]

目前尚未发现有关重庆谈判更多的俄国档案，不过，苏联使馆的态度应该说是反映了莫斯科的立场。显然，斯大林此时坚持的原则仍然是建立以国民党为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为此，在中国必须避免内战。不过，彼得罗夫作为外交官的谨慎表态也说明，斯大林并不想强迫中共接受某种具体做法，他要为自己的实际行动留下充分的回旋余地。毕竟，提出“联合政府”政策只是一种手段，就目的而言，有一点莫斯科与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保证对中国东北的控制。[③]

二、斯大林左右逢源与中共独占东北的决心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日本关东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东北地区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东方安全屏障。作为签署中苏条约的对应条件，斯大林已经向美国人和蒋介石许诺，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政府，而苏军则在3个月内撤离中国，希望以此换取中国政府的对苏友好立场。但是，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斯大林对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既不放心，也不信

---

①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45年9月6日；彼得罗夫与蒋经国会谈备忘录，1945年9月7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3，л.220-240，226-22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Ⅳ，с.230-233，233-235。

② 彼得洛夫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45年10月10日；彼得洛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45年10月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39-44，120-123，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4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2004年，第851–856、840–843页。

③ 对于苏联来说，还有一个控制外蒙古的问题，不过中共暂时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任。[①] 所以，苏联不能把对东北的控制完全寄托在已经公开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自己手中。为此，莫斯科至少利用了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通过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东北地区营造对苏友好的氛围。在军事推进过程中，苏军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不断向中国居民发放各种宣传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仅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就用中文印制了 86 种、总数超过 470 万份的传单。在东北作战的前 4 天当中，苏联散发和张贴的中朝文标语、传单和宣传画就有 9000 万份。此外，苏军还在当地出版报纸和定期刊物，吸收和培养大批通晓汉语、朝语、日语的宣传骨干。仅第一方面军总部在 8 月份就举办了大约 200 场报告会、座谈会，组织音乐会或戏剧、电影演出 160 场。[②]

其次，充分利用隶属远东方面军侦察处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国和朝鲜干部。40 年代初，抗日联军在东北的大规模军事活动失败后，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等一批干部率残部陆续退往苏联，组建国际旅，继续坚持战斗。1942 年 7 月，经共产国际批准，这支部队在苏军统制下组成第 88 独立步兵旅，并在远东哈巴洛夫斯克营地接受训练。对日作战准备阶段，该旅的任务是提供情报和向导。苏联出兵的第二天，旅长周保中部署该旅准备反攻，与八路军会师，解放东北。8 月 11 日却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待命"。日本宣布投降后，周保中又致信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建议由第 88 旅接管长春，并为建立东北民主政府和人民军作准备。如果接受这个设想，周要求苏军将该旅骨干力量交给中共中央或八路军安排。这个建议也遭到拒绝，华西列夫斯基下达了另一个指示：为了扩大苏联的影响，安排这些干部分散随苏军行动，协助占领当局开展政治和行政工作。9 月 6—9 日，第 88 旅的中国干部受命分四批到东北各大城市苏军指挥部报到。10 月，该部队建制被取消。[③] 显然，斯大林一方面担心周保中的计划破坏他对蒋介石的承诺，

---

① 早在 1944 年 1 月 10 日，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的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中就指出，战后亚洲的危险来自"美国和中国结成一个矛头指向苏联的联盟"。АПРФ，ф.3，оп.63，д.237，л.52-93，中译文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6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 712–713 页。

② АМОР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档案馆），ф.32，оп.11312，д.196，л.140；ф.32，оп.11309，д.248，л.25，*Ачкасов В.И. (гла. ред.)*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Том. 11，поражение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Японии，Москва：ВИМО СССР，1980，с.322.

③ 详见 *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1950-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5，с.141-143；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年，第 473–475 页；张一波、袁鲁毅：《"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李鸿义、王景：《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历程》，《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15 辑（1985 年），第 128–172、173–188 页；彭施鲁：《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关系回顾》，《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56 辑（1996 年），第 32–49 页。

另一方面需要把这支由中朝战士组成的部队留给自己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来控制国民党行政当局对东北的接管进程和实际结果。应该说，前两个措施不过都是为了使苏军能在东北站住脚，并扩大苏联在那里的影响，而斯大林明白，苏联的军事力量迟早是要退出东北的。那么，到底把东北的直接控制权交到国共两党谁的手上，才能保证莫斯科的实际控制和势力范围，斯大林是有深远考虑的。就苏联对中国以及东北采取的政策而言，国民政府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可算是一语中的："苏联只要看见中国有联合政府，一切便好谈。"[①]最初，斯大林在国共之间所采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场，与中共逐步确立的独占东北的战略确实有些不合拍，以至一度引起毛泽东的失望和不满。不过，国际局势的变化最终还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由于得知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党，直到8月26日，中共中央还在犹豫是否派大部队去抢占东北。[②]不过如前所述，控制东北已是既定方针，需要考虑的只是方式。中共中央很快就想出了对策，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北方各分局的指示中说：尽管受中苏条约限制，苏联"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条约中也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且"派军队去尚有困难"，而"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于是，中共中央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内，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政权与地方武装"。对苏军只通报情况，既不要正式接洽，也不要请求帮助，总之不要使之为难。[③]高岗在9月3日一封电报中也称："对东北我党必须力争，中央已有充分准备及具体对策。"[④]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② 详见金冲及：《较量：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9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7–258页。

④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5年）》，未刊，第83页。

中共军队突然大量出现在东北，一时搞得苏军不知所措。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各地后的不同遭遇，说明了这种情况。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进攻山海关时，不仅与苏军联合发出最后通牒，还得到苏军炮火支援，到达沈阳时却受到苏联驻军百般阻拦，被围困在火车上整整一天；进驻沈阳的中共先头军队从苏军转交的日本军火库中获取了大量武器装备，而徒手赶来的后续部队却吃了闭门羹，什么也没有得到；还有些进入东北的部队，不仅得不到急需的通讯器材和印刷设备，甚至还被苏军缴械，并禁止他们在苏军占领区活动，等等。[①] 造成这种局面的具体原因很复杂，有的显然是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表现出对中国同志的支持，有的恐怕是由于对中共所属部队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会，有的大概是基层指挥员不了解外交方针而擅自采取的行动，还有的肯定是占领当局受制于国际舆论而有意采取的回避态度。总之，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于莫斯科有意采取的模糊政策，苏联军人和中共领导人最初都没有搞清楚，而他们之间又缺乏沟通和联系。

于是，9 月 14 日华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飞到延安，传达莫斯科的要求，并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协商。苏联代表在会谈中明确表示：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请朱德命令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区；苏军不久即行撤退，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的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而私下应允，已经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锦州、热河两省则可以完全交给中共接管。[②]16 日，苏蒙联军代表又转告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接收其所占领之内蒙古及东北各地，“确保北面及内蒙地区，以便同外蒙苏联经常保持联系”，苏军可接济部分武器。万不得已时，中共部队可进入外蒙，“但不可向南移”，“不要再让敌人隔断双方联系”。在重庆的苏联大使也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中共当前的战略重

---

① 李运昌：《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15 辑（1985 年），第 64–67 页；曾克林：《山海关 - 沈阳 - 延安：忆我与苏军的关系》，《中俄关系问题》1990 年第 28 期，第 1–7 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201–202 页；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17，оп.128，д.46，л.12-18，19-21，22-23；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 4 卷，第 792，806，811–812 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情况及与苏军代表谈判问题的通报，1945 年 9 月 14 日，转引自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2 期，第 183–184 页；李运昌：《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中共党史资料》1985 年总第 15 辑，第 71 页；金冲及：《较量：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9 页。

心，应当是集中兵力，“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防蒋进攻”。①

只派遣一名校级军官向中共领导人传话，表明莫斯科处事谨慎，仍要留有退路。彭真到沈阳后报告，苏军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监守，不准搬用，对火车、汽车、汽油、广播电台也“绝对全部控制”，还要求中共军队移至城外，均反映了这种情况。②尽管如此，苏联的意图却很明显：表面上国共军队都不得进入东北，但允许中共军队卡住进入东北的咽喉要道，一旦苏军撤退，中共便可抢先占领东北。这样，苏联既没有破坏中苏条约，又能保证内蒙、东北地区在自己掌控之中。机不可失，莫斯科的表态促使中共更加坚定了进军东北的决心。

经过 14 日下午和晚上的讨论，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心把全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东北，把原来准备南下的部队和干部转向挺进东北，并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前来延安的苏联军用飞机飞往沈阳，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③17 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报告：“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 12 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为此，刘少奇提出“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④18 日又建议紧急调重兵部署在热、察、冀东及东北沿海地区，阻止蒋军北进，控制东北。19 日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⑤到 10 月初，毛泽东的胃口更大了，中共中央设想的目标是：在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实行人民自治，中央军不得开入，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⑥

在控制东北的问题上，斯大林最大的担忧在于美国势力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不断接近和开进东北，莫斯科的担心越来越加重，态度也越来越明朗。蒋介石非常担心因国军不能及时到达东北，而共军乘苏军

① 中央给中共赴渝代表团的通报，1945 年 9 月 17 日，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 407 页；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31 页。

② 编写组：《彭真年谱》，第 289 页；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10–11 页。

③ 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记录，1945 年 9 月 14 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卷，第 523 页；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9 页。

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第 278–279 页。

⑤ 中央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5 年 9 月 18 日；中共赴渝代表团给中央的复电，1945 年 9 月 19 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卷，第 526 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 4 卷，第 57 页。

撤退之机夺取优势，故早在9月11日就让行政院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请求借船运兵。[①] 美国的态度也很积极，代理国务卿艾奇逊第二天便以备忘录形式将此事报告总统。9月18日杜鲁门总统答复："驻西太平洋陆军和海军司令已下达命令，将按照魏德迈将军所明确指出的日期和港口为运送前往满洲的中国军队提供船只"，"参谋长联席会议深信，在中国军队准备好登船前往满洲之日，将有足够的船只为其所用"。[②]9月24—27日，就有消息传开，美军将在天津、大连、烟台、威海、秦皇岛登陆，蒋军将由空运和海运至平津。[③]10月初，一方面是美国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另一方面是国民政府连连发出照会和通知：中国计划在满洲吸引外资，而美国有意投资；要求苏联开始考虑撤军问题；中国政府的第一批军队将在数日内乘坐美国军舰抵达大连。[④] 这如何不让斯大林心急？在与立法院长孙科的谈话中，彼得罗夫默认："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⑤] 而斯大林则向蒋经国坦言："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满洲"。[⑥] 既然认定国民党是美国人的傀儡，那么，要遏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只能依靠共产党。

尽管在重庆，苏联大使对周恩来寻求帮助的提问依然闪烁其词，[⑦] 但在东北的苏联军人却对共产党显得格外坦率和热情。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接待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时，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人，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他还认为，"满洲北部不成问题"，建议中共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山海关方面（15万人）和沈阳周围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16页。

② *FRUS*，1945，Vol.7，p.1028；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页。

③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9月24日；中共中央给林彪和山东局的指示，1945年9月27日。

④ *FRUS*，1945，Vol. 7，pp.973-974，979-980，981；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7-18，19-20；оп.33，п.244，д.12，л.50-51；оп.33，п.244，д.13，л.71-7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Ⅳ，с.245-255，252-257。

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86-8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Ⅳ，с.296-298.

⑥ АПРФ，ф.45，оп.1，д.322，л.98-121，*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19.

⑦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120-123，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4卷，第840–843页。

(10万人)，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第二天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①

10月上中旬，苏联一再拒绝国民政府关于国军在大连登陆的请求，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无济于事。同时，对设立在长春负责接收工作的东北行营，也是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蒋经国向苏联使馆通报长春之行的感受时抱怨说，苏军不允许他们建立警卫队，拒绝到除沈阳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还下令停止出版东北行营发行的《光复报》。② 与此同时，苏联却与中共紧密配合，加快了对东北的控制步伐。苏军指挥部下决心"打开前门"，拟把南满和锦州地区的行政权全部交付给中共，并应允在中共来不及接收的情况下，代为保存1个月。甚至在苏军完全控制的大连地区，占领当局也希望中共在那里建立起党政领导机关。③10月6日，中共得知蒋军在大连登陆已被拒绝后，估计可能转向营口、锦州和安东，于是请求苏军"一律拒绝，至少拖延一个月至一个半月"。10天后彭真便报告，蒋军"到营口、锦州两处海岸企图登陆，已被拒绝"，苏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陆地阻击。因中共军队一时无法到达，苏方还答应再设法拖延几天。而在蒋军准备登陆的安东，不但出现了"民主政府"，还举行集会，呼吁满洲独立，撤销东北行营，甚至断水断电。④10月19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决定按照苏方的要求，改变过去分散占领全东北的方针，而"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⑤21日又提出："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⑥

---

①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0月3日；刘少奇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5年10月4日；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0月8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33–234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卷，第531页；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3页。

②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26-27，28-30，128-132；оп.33，п.244，д.13，л.82-83；оп.40，п.248，д. Ки032，л.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Ⅳ，с.258-259，262-264，274-275，299-302.

③ 中共中央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5年10月5日；编写组：《彭真年谱》，第294页。

④ 毛泽东给彭真的指示，1945年10月6日；彭、陈给毛泽东的报告，1945年10月1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28-132，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Ⅳ，с.299-302。

⑤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64页。

⑥ 编写组：《彭真年谱》，第300页。

10月25日，苏联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军将使用美国舰队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①]于是，苏军再次催促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业，逐步接收政权，并建议中共把领导中心移至沈阳，还声称："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开些干。"如蒋军在11月15日前进攻，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给以打击。[②]接到东北局的报告后，毛泽东"甚为欣慰"，即刻指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苏方意见"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最重要的是请求苏方"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28日，东北局便拟定了东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专员名单，准备"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权"。[③]

因受制于外交，苏联无法满足毛泽东的要求，经反复交涉，只得应允蒋军"10月30日在葫芦岛、营口登陆，11月12日进至锦州、海城线，11月20日进至沈阳，苏军则于11月25日撤完"，还同意先头部队在苏军撤离前三天空运至长春和沈阳。不过，苏方也公开声明，苏军数量不多，无法保证登陆部队的安全，而且并不打算限制共产党部队，因为苏联"不会干涉中国内政"。[④]同时，苏方则通知中共，"同意我们在营口、葫芦岛作战，他们不加任何限制"，还同意中共前往沈阳和长春接收工厂、武器装备，并更换除市长外的长春各级政府。[⑤]为此，11月上旬毛泽东不断发出指示。针对国民党军队在山海关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毛泽东要求"务必要将（这一地区）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便在这场具有战略性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取得胜利"。同时，要求部队"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一俟苏军撤退，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⑥]在长春，据东北行营的通报，中共调动了大批军队集中在机场附近，约2000人已进出长春市，并示威性

---

①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7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Ⅳ，с.282-283.

②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11页；编写组：《彭真年谱》，第302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88–389页；编写组：《彭真年谱》，第305页。

④ Gillin and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pp.94-9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63–65页。

⑤ 编写组：《彭真年谱》，第310、312–313页。

⑥ 毛泽东致彭真电，1945年11月2日；中央军委关于11月作战部属及指示电，1945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63–65页。

地包围了行营驻地。[①]11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讲话："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总的来说，蒋一定攻，我坚决打。""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只有此战得胜，"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②]

然而，就在毛泽东准备利用苏联帮助的有利条件放手与蒋介石在东北一战的紧要关头，莫斯科的立场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斯大林从他的休养地索契给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指令他们"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国的国内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担心我们的敌人将来会指责我们留在这些地区的人是中国国内战争的组织者，虽然我们的人并没有控制任何东西"。[③]这一指令立即得到贯彻执行。第二天东北局报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陈云，已允许在苏军撤退前五天内让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我们在此期间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友方一再声明，这是"莫斯科的决定"，东北苏军任何人员无权变动。如果五天中出现冲突，苏方"只能缴我们的械"。友方还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④]17日马利诺夫斯基命令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沈阳和哈尔滨，并不得阻碍国民党军队在长春和沈阳着陆。20日又"郑重通知"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中共军队一律退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只要有苏军的地方，既不准与蒋军交战，也不许中共军队存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散；全东北境内，包括锦州至山海关段，均不准作战。[⑤]同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三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党政府，来哈接收。[⑥]在重庆，苏联使馆也告诫中共代表王若飞，"为了避免遭到美国和中国舆论的反对"，中共最好不

①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79-8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Ⅳ，с.294-295；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21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3–80页。

③ RGASPI（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f.558，op.11，d.98，l.81，Alexander Chubariyan and Vladimir Pechatnov，Molotov "the Liberal"：Stalin's 1945 Criticism of his Deputy，*Cold War History*，Aug. 2000，Vol.1，Issue 1，pp.131-132.

④ 编写组：《彭真年谱》，第315–316页。

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34-13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Ⅳ，с.306-307；编写组：《彭真年谱》，第318页；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1月20日。

⑥ 余建亭：《陈云与东北的解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0–32、40页。

要试图占领长春路，并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①]24日，苏联心安理得地照会中国政府，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了，苏军对东北中共军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并表示苏军可延期一两个月撤离，以利中方接收。[②]驻长春苏军指挥官还向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保证：“决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动，严格保护各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并禁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宣传。”[③]后经双方协商确定，为确保中国政府顺利接收，将苏联撤军完成日期改为1946年2月1日。[④]

苏联的态度为何突然改变？从斯大林密电和苏联参赞谈话的口气看，莫斯科的担心主要在于美国对东北事态发展的不满及其制造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早在10月19日他就有意向苏联大使建议：采纳美国的提议，召开第二次五国外长会议解决中国问题。[⑤]11月8日蒋介石又在内部讨论时提出“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同时声明不放弃东北，以使苏联违约之真相大白于天下”。[⑥]一个星期后，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发出照会：由于接收工作无法进行，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同时，中国又照会各国使领馆，告苏联阻碍接收工作。随后，蒋介石迅速将这一决定告诉华盛顿，并抱怨苏联人未能执行1945年中苏条约，希望与美国积极协调行动，防止局势继续恶化。[⑦]

莫斯科面临的压力还不只此，从10月下旬到11月初，在远东，苏联急于插手促成对日和约，反复就盟国对日管制机制问题与美国进行磋商。[⑧]在近东，伊朗危

---

①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34-13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Ⅳ，с.306-307.

②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53–155、168–171页；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16页；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27-12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Ⅳ，с.305-306。

③ Gillin and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pp.126-127.

④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57、168页；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99-10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Ⅳ，с.313-314。

⑤ АВПРФ，ф.0100，ozп.40，п.248，д.7，л.60-6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Ⅳ，с.277-278.

⑥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09–210页。

⑦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47、148–149、151–152页；*FRUS*, 1945，Vol.7，p.1044。

⑧ 详见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 (под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48，Россия. X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ФД，2004，с.67-68，87-89，92-98，104-112。

机趋向国际化，对苏联感到绝望和恐惧的德黑兰政府开始求助于美国和联合国。[①] 针对苏联关于修改《蒙特勒公约》的诉求，美国也开始关注土耳其海峡问题，并提出了国际监督的建议。[②] 于是，苏联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都需要继续与美国保持一致，并争取美国支持自己的主张，这里当然也包括中国问题。所以，当11月下旬美国倡议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解决这些国际问题时，苏联不仅积极响应，而且立即开始与美国进行紧密接触和协商。[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做出美苏同时从中国撤军的决议，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对斯大林履行中苏条约抱有乐观态度，就毫不奇怪了。[④]

于是，斯大林再次抛出了“联合政府”政策。在12月30日与蒋经国会谈时斯大林说：“苏联政府已经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苏联政府仍然“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斯大林还一再辩白，苏联政府对中共的情况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过任何建议，莫斯科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更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⑤] 而对中共，斯大林则希望他们放弃已经制定的目标。1946年1月，苏联使馆告诫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目前提出东北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央政府和来华调停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中共应该寻找和平解决所有军事和政治问题的道路”。苏联大使还警告周恩来：“在满洲发生战争，尤其是伤及美人，必致引起严重后果，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以至周恩来不得不向苏联人检讨说，“对中共来说，与美国人的关系是一个新问题”，中共领导人认为苏军应该把东北交给中共，是因为“不懂得整个国际形势的复杂性”。[⑥] 而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周恩来指出：看到

① 详见 *Егорова Н.И.* Ира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5-1946гг., По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м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4, №3, с.35; Fernande Scheid Raine, “Stal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zerbaijan Democratic Party”, *Cold War History*, Oct. 2001, Vol.2, Issue 1, pp.25-26。

② 详见 *Кочкин Н.В.* СССР, Англия, США и “Турецкий кризис”, 1945-1947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2, №3, с.68。

③ АВПРФ, ф.017а, оп.1, п.2, д.12, л.62-62об, *Кынин Г.П., Лауфер Й.*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1941-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Том 2,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0, с.47-48;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под 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18.

④ *FRUS*, 1945, Vol.7, pp.844-845; *FRUS*, 1946, Vol.9, Washington: GPO, 1972, p.18.

⑤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ф.45, оп.1, д.322, л.98-121, *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4, с.109-120.

⑥ 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2, л.20-21; д.20, л.5а-1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V, с.31, 41-45; 编写组:《彭真年谱》, 第362页。

中共能以军事力量抵抗国民党进攻以利谈判时，他们就欢呼，看到中共要独霸东北、华北时，他们就惊呼。[①]

毛泽东确实需要再次改变战略方针了。得知苏联态度改变后，中共中央最初决定，一方面"照顾友方信用"，"服从总的利益"；另一方面"仍须控制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准备一切条件于苏军撤走后歼灭顽军"。[②]11月19—20日，中共的方针仍然是"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希望苏军能把"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留给我们，并"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③]但是，11月22日，迫于形势的变化，刘少奇便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8日和29日，刘进一步明确："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须力争在东北的一定地位"，今后工作重心为控制长春铁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④]武力解决不行，只好再次转入和谈。12月7—8日，中共提出准备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并希望苏联"居间折冲"。30日，中共公开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的停止内战。"[⑤]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议公布后，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将部队高度分散"，迅速控制既无苏军驻扎又无国军开进的地区，特别是靠近苏联和蒙古的地区。[⑥]到2月，随着和平谈判的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毛泽东等人参加国府委员会，周恩来等人参加行政院，并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还批准了中共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名单。[⑦]

尽管很不情愿，但是在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以及美苏两国的共同压力下，中共不得不暂时放弃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计划，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将要出现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三、苏联从东北撤军与中国内战的开启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苏联在东北（还有蒙古）的独占地位，这就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1996年，第7页。

② 毛泽东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13日；编写组：《彭真年谱》，第316–317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29–430、431–432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30–531页；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2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7页。

⑤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466、474–475、528–529页。

⑥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0–21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43页。

是说，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决于形势是否对苏联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有利。因此，苏军在1945年底准备撤离东北，把政权交给国民党的时候，仍然与中共保持着联系并秘密给以帮助。12月2日，随苏军行动的周保中等人报告：苏联远东军指挥部"愿意知道我全满实力及对东北方针，苏军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内一定给我物资帮助，但是讲究方法，并尽量制造困难给顽"。[①] 看来，即使在压制中共时，苏联人还是留了一手。

果然，当东北局势的发展使莫斯科感到威胁时，苏联的态度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关于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副外长洛索夫斯基在蒋经国访苏前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做了全面论述：第一，中国政府必须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第二，中国必须保证长春铁路沿线的安全，在目前的混乱局面下，应提议苏联"铁路护卫队保留二至三年"；第三，"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满洲"，"我们不能允许满洲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第四，必须在苏联"积极参与满洲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实现与中国在东北的经济合作，为此就要控制一批合资公司，特别是船舶公司、航空公司和中长铁路。[②] 但恰恰在这些问题上，1946年初呈现出一种对苏联的危险局面。

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中，为了及早撤军，减缓国际舆论压力，苏联代表一再表示愿意让步，只要中国同意对所有重工业公司实现双方合资经营，苏方就会进一步采取行动，帮助国民政府尽快解决东北的接管问题。[③] 而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态度却愈益强硬。[④]1月26日他告诉中方谈判代表张嘉璈，对经济合作谈判采取"紧缩"态度。于是，尽管苏方代表斯特拉科夫斯基一再声称，莫斯科急于签署合作协议，并非要在东北"霸占利益"，而只是"不愿见有第三国再卷入"，但张嘉璈始终坚持强硬立场：战利品问题中方不予考虑，航空公司和轮船公司的问题也不讨论，一切非金属矿业不在合作之列，即使在合作企业，中方亦要求占51%的股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苏方坚持尽快签订经济合作协定，方能最后撤军，中方则强

①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第1卷，第4页。

② АПРФ，ф.3，оп.86，д.146，л.20-26，*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05-108.

③ 详见 Gillin and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p.126；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74页。

④ 马歇尔劝告国民党采取强硬态度的情况，详见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李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第87–88页。

调没有顺利交接行政权，故无法谈经济合作，以致经济谈判陷入僵局。[1] 此时，美国也不断向苏联施加压力。2 月 11 日美国同时照会苏联和中国，对中苏经济谈判感到“不安”，认为这“与门户开放原则会有矛盾”，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和威信“是一种明显的损害”，并表示美国有意参与谈判，在经济合作方面采取“共同行动”。[2] 这无疑更加刺激了斯大林敏感的神经。

不仅与政府的谈判步履维艰，中国民间的反苏情绪也突然高涨起来。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2 月 11 日，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了有关远东问题的秘密协议。苏联同意公布协议，大概是着眼于对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占领的合法性，而美英这样做显然是针对东北问题的。为了进一步逼迫苏联撤军，美英在报纸上公开指责莫斯科违背雅尔塔协议。这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舆论哗然，广大市民、学生纷纷涌上街头，张贴标语，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抗议苏联在中国东北、新疆和内蒙的行为，要求苏军立即退出东北。[3]3 月 5 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3 月 6 日，中国照会苏联，撤军期限已过，苏军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苏联政府饬令“即行撤退”。4 月 1 日，蒋介石在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公开推翻东北停战协定，宣称“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4] 东北的局面更加复杂，据苏联驻东北当局报告，国民党与土匪勾结，煽动反苏情绪，捣毁中苏友好协会甚至苏方的机构，苏联军人和侨民不断遭到骚扰、袭击和杀害，等等。马利诺夫斯基还认定，张莘夫被害一案，就是土匪“精心策划的，目的在于破坏苏中关系”。[5] 面对如此局势，莫斯科只得再次打出中共这张牌。

2 月 1 日彭真报告：“辽阳、鞍山、本溪三处苏军已正式将政权交与我当地民主

---

① 详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 421、423–424、425–426、429–434 页。

②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10，д.2520，л.3-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V，с. 58-60；“总统机要室”编：《领袖特交文电项目整理 · 俄帝阴谋部份编案纪要初稿及参考资料》（二、阻挠接收东北），一九七五年六月，台湾“国史馆”。

③ 关于国民反苏情绪的详细史料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 617–669 页；F.C. 琼斯、休 · 博顿、B.R. 皮尔恩：《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 年）·1942–1946 年的远东》下册，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年，第 311–313 页；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V，с.66-68。

④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 187 页；编写组：《彭真年谱》，第 402 页。

⑤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13，л.42-69，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 5 卷，第 996–1023 页。

政府，并由双方签字。该区以南（包括安东）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对外暂不公布。”除旅顺、金州完全归苏军长期驻兵外，大连的副市长、区长及公安局长也都由中共干部担任。原因在于，该地区的煤铁业及若干大工业，已由苏方接收并开始经营，大连的工业也完全在苏方掌握之中。[1]不仅如此，在2月22日与外蒙领导人乔巴山谈话中，斯大林甚至同意外蒙“可以悄悄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以准备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2]显然，斯大林现在还是希望把政权（无论在东北还是内蒙）交给共产党控制，以此来保证苏联的远东利益。

有史料证明，此时中共中央已经了解到情况的变化，并考虑了新的方针。3月3日周恩来作为军调处的中共代表，与马歇尔、张治中（国民党代表）来到太原视察。当晚，周召集当地高级将领开会，传达了“党中央对当前情况的估计和战略意图”。周“压低了声音，把手攥成拳头向下挥着：中央决定现在谈不了了，要锤！”[3]不过，这离采取实际行动还有一段时间。莫斯科显然有点迫不及待，看到中共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便提出了更加直接的建议。3月12日，东北局电告中央，苏军通知将于13日撤离沈阳，希望中共军队“迅速攻入沈阳”，而且“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然而，考虑到停战协定已经签字的背景以及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共中央决定，不仅不去进攻沈阳，沈阳至哈尔滨铁路沿线苏军撤退时亦不去占领，甚至准备让出已经到手的抚顺、本溪、鞍山、辽阳等地，以交换蒋军从热河撤军，并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4]看起来，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改变“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倚靠苏联、外蒙建立根据地，通过和谈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这种稳重的态度与此前莫斯科的立场变来变去大概不无关系。

苏联对于中共的犹豫不决、行动迟缓颇有不满，因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3月中旬东北局报告：苏军批评中共对美国人太客气了，更不应该同意让国民党的5个军开到东北来。又表示，凡苏军撤离之地，包括沈阳和四平，“我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为此，东北局要求在征得苏联同意后夺取四平街、哈尔滨，并进占其他大城市及长春路支线小城市，逼迫蒋介石谈判，甚至可以考虑夺

① 编写组：《彭真年谱》，第376页。

② 斯大林与乔巴山谈话记录，1946年2月22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俄文原档复印件。

③ 程光烈：《军事调处工作日记（1946.2–11）》，严平整理，载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4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405、422页。

④ 编写组：《彭真年谱》，第385–38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51页。

取长春。[1]与此同时，马歇尔给东北停战小组的指令规定，“小组只能随政府军前进，政府军有权进驻东北之主要地区，长春路两侧各30公里以内，政府军单独管理，苏军撤出地区中共军队不得开入占领等”，而对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既没有提及，也不愿讨论。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当即建议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承认政府军进驻沈阳至长春”，长春以北应为中共军队的驻扎地区。对此必须坚持，即使谈判“全面破裂”，“亦绝对不屈服”。[2]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方针开始发生重大转变。3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彭真和林彪：“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的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利将来谈判的条件，时间愈快愈好。”同日，毛泽东在批转周恩来关于商谈东北问题的报告上加了以下两段批示：“请东北局速与友方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东北协定即将签字，请彭、林速即布置一切，造成优势，以利谈判。”又在批转周恩来商谈东北问题三点意见的说明时指示：“请彭、林按照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与有理、有利、有节之方针，准备与执行小组进行谈判。”当天，东北民主联军一部即收复四平。[3]3月18日东北局再报：苏方“曾一再谈北满甚为重要，决不能允许国民党接收整个长春路与矿区”，故提议进占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中央当天回复表示同意。第二天，彭真又请周保中去长春直接与苏军交涉，“要求他们于最近期间缩小驻区，尽量将次要地点让我军驻防，特别如延吉、敦化、吉林、牡丹江、佳木斯等地”。3月20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已陷于僵局，中共中央又进了一步，通知东北局，“如果友人谅解，即可进占长春”。23日更要求林彪“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同时立刻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4]

一切准备就绪，苏军开始了撤退行动。此前，苏方曾以发生瘟疫、冬季交通不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51页；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14日；编写组：《彭真年谱》，第389页；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17日，转引自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0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92页；中共中央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6年3月16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7页；杨奎松：《一九四六年国共四平之战及其幕后》，《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32–152页，第138页。

③ 编写组：《彭真年谱》，第390–39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8页。

④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18日；编写组：《彭真年谱》，第391–392、394页。

便等种种借口延缓撤军，且迟迟不告知撤离时间，从而造成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和接收的困难。3 月 22 日，苏联使馆突然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 4 月底撤军完毕。[①] 莫斯科的目的，当然是尽可能将东北政权交给中共，为此，双方的配合日益紧密。3 月 24 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说明现在的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因此要求速与苏军交涉，在撤退时允许中共军队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及长春。苏方则通过周保中转告，一旦条件具备，立即通知中共接管长春，同时告诉东北行营接收人员，因要“防疫，不允许办理长春交接手续”。[②]25 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局，因停战小组将于近日到达东北，需即刻与苏方联系，请他们“速从哈、长、齐等市撤退”，中共军队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两日内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并以长春为首都。[③]

3 月底，苏联因重开经济谈判且似有进展而再次出现反复，以至中共在接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周折。[④] 但事情很快就过去了，莫斯科在撤军的最后时刻采取了两面手法。4 月 3 日，这边是苏联政府答复国民政府，可先行通知各地撤兵日期，并协助中国接防部队；那边是苏军代表接连通知东北局，苏军将于 15 日和 25 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就近占领。苏方代表还解释说，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来反苏，蒋介石利用美国来反苏反共，苏联目前因谈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但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⑤] 为了让中共顺利接收长春，苏联对国民党继续采取麻痹战术。4 月 13 日苏联使馆还信誓旦旦地向中国外交部重申，将通知具体撤离时间，并尽量协助中国政府完成接收任务。[⑥] 第二天，苏军就突然撤出长春，同时用事先约定的密码通

---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 188–189、230–234 页；АВПРФ, ф.06，оп.8，п.38，д.597，л.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V，с. 84-85。

②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 年 3 月 24 日；编写组：《彭真年谱》，第 395–396 页；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 191 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卷，第 102 页；编写组：《彭真年谱》，第 396–398 页。

④ 详见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 年 3 月 31 日；编写组：《彭真年谱》，第 399、401–402 页。彼得洛夫向外交部提交一经济合作方案，其中要求作为合办企业的数量较以前有极大减少（从过去的 60 多项改为 7 项）。外交部主张撤军后再谈，蒋介石主张可以先谈，撤军后签订协议。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5 册，第 292–293、302 页。

⑤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5 册，第 296 页；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 年 4 月 3 日，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 433 页。

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22，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V，с. 97.

知了周保中。[①]早已做好准备的中共军队随即发动总攻，当天便占领了机场两处、市区一部，并于 18 日控制了全市。[②]4 月 19 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应迁长春，并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同时，一方面向四平增兵，再打几个胜仗，另一方面“用全力夺取哈、齐二市”。[③]

苏军原计划 4 月 25 日撤出哈尔滨，但毛泽东考虑到马歇尔可能在此之前到达沈阳，故于 16 日电告东北局，速与苏方交涉，让其尽早撤离。18 日再次要求陈云和高岗，“速催友方从哈市立即撤去，以利我军马上占领。此事万急勿延。”20 日与苏军代表会面，高岗被告知，哈市苏军已定于 25 日撤离，无法再提前，但中共所需武器已经留下，进城后即可得到。此后，按照计划，东北民主联军 25 日攻占齐齐哈尔，28 日进驻哈尔滨。[④]一则占有了相当的地盘，二则得到苏军提供的武器援助，中共此时的决心是：“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⑤]4 月 26 日与苏联大使会谈时，周恩来告知，“以前共产党曾同意在满洲问题上对国民党作出一系列让步，但是国民党不愿意停止反对中共军队的军事行动。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不会再作出让步。”[⑥]

---

① 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 508–509 页。

② 编写组：《彭真年谱》，第 408、409 页；《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13–114 页。王世杰在 4 月 22 日的日记中写道，苏联近日没有再提经济合作问题，似乎是放弃了与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合作的政策，而以支持中共为其基础。长春的陷落和中共态度日益强硬，均与此有关。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5 册，第 309 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卷，第 134 页；编写组：《彭真年谱》，第 410 页。

④ 编写组：《彭真年谱》，第 408、413、416、418 页。中共进占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情况详见 *Борисов 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1977，с.160-166；余建亭：《陈云与东北的解放》，第 55–56 页。

⑤ 编写组：《彭真年谱》，第 414 页。据笔者考察，内战初期苏军的确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但具体数字不详。据华西列夫斯基回忆，仅苏联两个方面军向中共军队移交的缴获的日军武器就有：3700 门火炮、迫击炮和榴弹炮，600 辆坦克，861 架飞机，约 1200 挺机枪，近 680 座各类军火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军舰。稍后又转交了大批苏联武器。据驻旅顺海军基地的苏联第三十九集团军军事委员博伊科中将回忆，1946 年春天，肖劲光代表东北局与苏军司令部谈判，要求把缴获的日本武器（达 50 车厢）移交给中共军队。经呈报苏联滨海军区批准，于一周后在大孤山半岛（大连以北 15 公里处）开始移交。见博伊科：《解放的使命》，《苏联红军在旅大》，第 186、184 页。另见 *Борис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с.138，185。但中国学者引证东北军区司令部的资料说明，1946 年 5 月底，东北野战军的装备为：长枪 160881 支，轻机枪 4033 挺，重机枪 749 挺，各种炮 556 门。见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党的文献》2000 年第 4 期，第 80 页。双方的说法差距较大，实情究竟如何，尚缺乏完整的统计资料。不过，苏方的资料确有夸大之嫌（尤其是关于飞机、坦克、军舰的说法）。

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43-4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V，с.105-107.

然而，此时国共在东北的实力对比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由于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2月上旬和3月，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以及第七十一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九十四军一部，都相继投入东北战场。东北国民党军正规军的兵力，已由1月份的13.4万人增加到28.5万人。3月13日，国民党军队进占沈阳，随后兵分两路，向南进攻本溪，向北增援四平。[①] 此时，林彪的主力部队“已苦战三月，急需休整补充训练，并适当调剂武器”。四平中共守军虽作战英勇，但能够指望的增援部队只有一至两个团。所以，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出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雄壮口号，但私下里却与林彪商议，争取尽快停战和谈。[②]

正在春风得意的蒋介石当然不愿再给中共提供喘息的机会。就在5月3日苏军宣布全部撤离中国的这一天，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抵南京。两天后，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显然是对中共的前途没有把握，看到形势逆转的斯大林此时又回过头来向南京展开微笑。5月8日，斯大林命驻华使馆武官转告蒋经国，说去年蒋介石曾表示愿赴苏访问，现在斯大林欢迎蒋介石前往莫斯科或边境某地进行会晤。[③] 蒋介石现在想的是立即消灭共军，对此当然予以拒绝。5月14日，新六军攻占本溪后，大举北上增援四平。18日林彪下令四平守军撤出战斗，国民党军队进占四平后继续北进，23日不战而进入长春。虽然此后国民党军队因战线过长，力所不及，而止步于松花江，从而形成国共两军隔江对峙的局面，但是在关内，蒋介石却命令在河北、山东、山西和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中国的内战于1946年6月全面开启。[④]

简短的结论

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利用共产党，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在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所谓联合政府和停战

① 参见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9页。

② 编写组：《彭真年谱》，第417页。

③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317–318页；宋平：《蒋介石生平》，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0页。

④ 参见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21–22页，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91-9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Ⅴ，с.147-149。

谈判，都不过是为积蓄力量以利再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产党一方倾斜。笔者同意这样一种分析："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①] 不过，苏联关注的中心毕竟在欧洲，而就全局而言，1946 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②] 所以，莫斯科对于中国的内战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只要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能够保留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其他问题斯大林恐怕一时是顾不上，也不关心的。

从上述历史过程还可以看出，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确实是多变的，不确定的。有学者用"举棋不定"来形容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认为："1945 年秋天，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同他的欧洲政策一样，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缺乏内在的一致性。"[③] 笔者不能同意这个判断。表面看起来，苏联对东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复无常，但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贯作风：目标始终确定而手段经常变换。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当时在北满工作的陈云有很深刻的认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④]

至于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共美苏四方在东北问题上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他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应该说，如果战后美苏之间存在真诚的合作，那么他们是有能力制止中国内战爆发的。另一方面，中共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无疑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

---

① 牛军：《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2 期，第 185 页。不过，认为 1946 年是中共与苏联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恐有不妥。在笔者看来，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 1949 年初中共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时候。

② 关于冷战爆发的时间，学者中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杜鲁门主义的出现虽然表明美国已经决心与苏联分手，但斯大林却想尽量拖延与西方破裂的时间，直到 1947 年年中，苏联的冷战政策才最终形成。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第 172–187 页。

③ 文安立：《冷战与革命》，第 134–135 页。

④ 陈云：《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5 年 11 月 30 日，见《陈云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221 页。

战在亚洲的预演。不过，如同文安立所说，“就冷战观念的形成而言，中国的国共两党始终落在大国的后面。毛泽东和蒋介石直到1946年还相信，同两个大国中的一个结盟并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个对抗。”[①]从这种意义上讲，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争斗在亚洲打开了通向全球冷战的大门。

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略有修改

① 文安立：《冷战与革命》，第204页。

美国对中苏结盟的反应与亚洲冷战格局的形成

对华政策在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中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段时期，面对异常复杂的中国局势，杜鲁门政府不得不十分谨慎地考虑采取何种对华政策。对于是否干涉中国内战、阻止中共解放台湾，美国的政策摇摆不定，政府内部纷争不断，迟迟没有明确的决策出台。这种不稳定的特性与后来中美间的长期敌对有着直接的关系，引起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对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包括对台）政策的研究自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其间不乏诸多的辩论和争议。[①] 不过，此前

① 最早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美籍华人学者邹谠，见 Tsou Tang，*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后来美国学者孔华润和唐耐心提出了一种解释模式（Cohen-Tucker thesis）——为了分裂中苏，国务卿艾奇逊曾积极追求与中共的和解，以便将中国变成铁托式的中国。见 Warren Cohen，"Acheson，His Advisers，and China，1949-1950"，in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eds.），*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p.13-52。但孔华润-唐耐心解释模式后来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目前美国学术界主流意见认为美国军方以及政府内部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令中美关系不可能缓解，而中共领导人也对美国持敌对态度。见 Warren Cohen，Chen Jian，John Carver，Michael Sheng，and Odd Arne Westad，"Rethinking the Lost Chance in China"，*Diplomatic History*，Vol.21，No.1，Winter 1997，pp.71-115。中国学者对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也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中美两国曾经存在着和解的机会，但是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视使这种机会消失了；另一种意见认为在美国对中国新政权敌视的情况下，从来就不存在中美和解的机会。前者见资中筠：《追根溯源：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8页；高明振、林利民：《试评新中国成立前后艾奇逊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三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91–208页。后者见袁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观》，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13–226页；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参与讨论的美国和中国学者，虽然对新中国成立前后中美关系的表象及其实质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多是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单一角度出发的，而对于中共的立场和态度，特别是中苏关系的变化及其对美国决策的影响，似乎关注不够。

从 1949 年初到 1950 年初，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其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与苏联建立稳固的联盟，其目的不仅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赢得坚实的外交、政治和军事保障，更要为革命胜利后中共政权的稳固和发展获取充分的外部支持。由此，与苏联结盟便成为中共领导人指导其对外活动——尤其是处理对美关系——的基本方针。同样，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其对华政策也只是服务于其冷战大战略中重要一环——防止中苏结盟——中的一个具体部分，美国的对华政策乃至亚太政策，也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中苏结盟问题不仅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的主要因素，也是导致亚洲卷入冷战、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性因素。本文将系统考察 1949—1950 年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时中苏同盟这一因素的作用，从中、美、苏三者互动这一多维角度展示中美关系演变的机制及其诸多面相，并揭示这种互动与亚洲乃至全球冷战形成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新中国成立前：制约中共，阻挠中苏接近

战后初期美国对东亚格局的最初设想是，通过扶植服从美国领导的中国来牵制其他大国，同时消除日本作为可能的战争策源地，以此安排来维持亚洲的稳定。根据这一设想，在东亚诸国中美国给予了中国以最重要的地位。由于 1947 年夏冷战开始在欧洲形成，中国在美国亚洲冷战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显得更加重要。但美国的这一设想却有着致命的弱点，即这一设想是以对美友好的国民党政权在中国继续维持其统治为前提的。随着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内战中逐渐陷于被动，美国在亚洲的这一战略设想便面临着崩溃的命运。① 至 1949 年初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美国亟须根据中国内战的新形势全面调整其亚太政策、对华政策及对中共的政策，以应付极有可能出现的中苏结盟这一严重挑战。

随着中国内战的结局日渐明朗，如何防止中共以及不久将建立起来的中共新政权倒向苏联这一问题，逐步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在 1949 年的大部分时

① 美国学者梁思文对此曾有专门研究，见 Steven Levine，“A New Look at American Media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Marshall Mission in Manchuria”，*Diplomatic History*，Vol. 3，No.2，Fall 1979，pp.349-375。

间里，如同张曙光教授所言，美国政府自信能够阻止中国倒向苏联，其原因之一是它认为中国领导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会阻碍中国与有着各种帝国主义行为的苏联建立紧密关系，二是美国政府更相信由于历史上中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中共会由于巨大的国内经济压力而屈服于美国。[①]但是，美国人过于乐观了。

早在1948年下半年，美国决策圈就有人已经感到国民党很有可能在国共内战中失败。但很明显，中国局势转变之快超出了其想象，美国政府尚未认真考虑应对这一转变的具体措施。1948年9月7日，凯南主持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完成了后来成为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对华政策基调的《审查与定义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PPS39备忘录，系统阐发了该部门对中共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对策的看法。该文件承认中共有可能在未来彻底打败国民党政权，要求美国政府必须就未来中共与苏联关系的演变问题有所准备。该文件认为，苏联领导人对独立性与民族主义思想较强的毛泽东一直心存疑虑，这种猜忌为美国分化中共与苏联提供了可能，因此美国应通过经济、文化与政治等手段与苏联争夺中国人的思想。虽然强调美国在挑拨中苏关系方面尚有可运作的空间，但凯南同时感到，美国政府只能对未来的中苏关系发生间接作用，而无法直接影响中苏关系的演变。[②]可以这样说，PPS39备忘录和完全以此为蓝本形成的NSC34号、NSC34/1号文件，确定的是一种相对比较消极的对华政策——即美国政府应当通过各种否定性政策而非肯定性政策来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③]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中共取得全面胜利的前景日趋明朗。1949年2月28日，美国国务院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NSC34/2号文件，针对中苏结盟这一越来越大的可能性而提出了一些切实的应对措施。文件指出，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与中共控制整个中国的趋势已不可逆转，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美国所期望的那种中苏矛盾一直没有进一步发展。为此，国务院反思了政府此前的政策，认为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既刺激了中国人对共产党的支持，还推动了中国人关于中苏之间利益一致的看法，甚至质疑美国是否应当再继续支持任何反共的公众人物。但该文件并未提出任何改善美国与中共关系的积极建议，反而提出了要在中国培育另一场革命以挑战

①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79–80页。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48，Vol. 8，Washington D.C.：GPO，1973，pp. 146-155.

③ *FRUS*，1949，Vol. 9，Washington D.C.：GPO，1974，pp. 474-475.

中共。在这种基调上，国务院建议美国政府采取两手政策来防止中苏接近，一是避免自己的政策呈现出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外表，二是利用各种政治和经济手段挑拨中共与苏联、中共内外斯大林主义者与其他主义者之间的矛盾。该文件于3月3日被总统杜鲁门批准后成为指导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文件。[①]

就在2月28日提交NSC34/2号文件的同时，国务院还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题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NSC41文件，详细阐述了美国应当如何利用各种贸易手段防止"苏联控制中国"的问题。该文件提出美国有两种基本政策可以选择，其中最为可行的是通过恢复与中国的正常经济联系而培养各种能够使苏联与中共政权之间产生严重摩擦的力量。[②]国务院认为，苏联肯定会利用一切机会来从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捞取经济和政治上的好处，而中共政权却希望发展中国经济。此外，中国人对外国统治都十分痛恨，两者之间极易产生矛盾。该文件指出，美国在中苏之间产生矛盾这一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这只能决定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和行动。不过一旦中苏之间出现分歧，美国就可以通过积极的政治、经济和宣传手段对之加以利用。为此，美国应当恢复与中国的正常贸易联系。但是为了不让中共误认为这是美国软弱的表现，国务院提出美国政府应当同时准备硬的一手——如果中共政权采取了违背美国战略利益的政策，为了让中国"了解到美国的潜在实力"，该文件建议美国应当连同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严厉的贸易管制。3月3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一文件，使之成为政府处理对中共解放区贸易的指导原则。[③]至此，美国政府确定了对华政策的基本政策，那就是美国所有有关中国的政策都必须服从挑拨中苏关系的需要，而宣传和贸易则是挑拨中苏关系的主要手段。

美国利用宣传手段防止中苏接近的主要内容是利用苏联在中国东北、新疆和内蒙古享有的特权大做文章。在1949年4月4日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NSC34/2号文件执行情况的备忘录中，艾奇逊提到，为了挑拨中苏之间的矛盾，美国利用了美国新闻处各种计划和美国之音的广播来强调苏联对中国所怀有的帝国主义野心，以及苏联在东北、新疆与内蒙地区所进行的各种对中国有威胁的活动。此外，美国还准备根据NSC41号文件中对华贸易政策的相关规定来增加中共与苏联之间的摩擦。[④]

① *FRUS*, 1949, Vol.9, pp. 492-495.

② 另一个政策是动员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通过胁迫或施加直接压力来公开打击共产党政权。*FRUS*, 1949, Vol.9, pp. 826-834.

③ *FRUS*, 1949, Vol.9, pp. 826-834.

④ *FRUS*, 1949, Vol.9, pp. 507-509.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的认识和反应已经落后于中苏两党领导人在结盟道路上所取得的进展。从1949年初开始，中国问题开始进入苏联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不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次数陡然增多[①]，斯大林自己也开始亲自主持对华事务[②]。这时斯大林迫切需要了解的是中共政权的性质、政治倾向及其对苏联的立场，从而重新确定苏联的对华政策。同样，毛泽东也急需知道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和立场。从年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到年中刘少奇、高岗秘密访问莫斯科，这种高层互动大大促进了双方的了解和理解，推进了苏联与中共政权关系的发展。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中共必须向苏联靠拢的方针，而苏联也明显加快了向中共提供援助的步伐和力度。[③]

然而，此时美国试图阻止中苏接近的方针却继续沿着限制和敌视中共的消极方面发展。一方面，面对中苏之间经济联系加强这一事实，美国领导人不仅没有做出反应，反而否决了经济合作署署长霍夫曼关于继续对中国大陆提供经济援助的建议。[④]另一方面，美国又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采取了对中共施压的政策。在得知中共准备废除国民党政权签订的对外条约后，1949年2月3日艾奇逊授权美国驻北平前总领事柯乐布寻机向中共提出美国承认中国新政府的前提条件：中国新政府必须继承现存的中外条约义务。[⑤]为了与中共接触，4月12日和22日，国务院决定听取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建议，美国使馆不跟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而是留下来收集情报、保护侨民，并与中共当局建立联系。[⑥]中央情报局则更明确地表示了倾向性意见：观察几个月或一年后便应承认中国新政府。[⑦]不过，美国政府本

① 据笔者粗略统计，在1945–1948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每年数百个讨论的问题及做出的决议中，直接涉及中国或中共的议题仅有4–5个，最多时也没超过7个，而1949年便陡然增加到70个，1950年更多达132个（不算朝鲜战争）。*Адибеков Г.М., Андерсон К.М., Роговая Л.А.*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заседаний 1919-1952，Каталог，Том III，1940-1952，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1。

② 1949年初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在给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的电报中指出，“从现在起，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同志联系”。见 Sergei N. Goncharov，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0。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③ 详见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5–29页。

④ Paper of Mathew Connelly，Box 1，Harry S. Truman Library，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5页。

⑤ *FRUS*，1949，Vol. 9，p. 11.

⑥ *FRUS*，1949，Vol.8，Washington D.C.：GPO，1978，pp. 677-679，682-683.

⑦ ORE 45-49，Probable Developments in China，16 June 1949，*CIA Research Reports*，*China*，*1946-1976*，Washington，D.C.：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82，Reel-1-0277，pp. 27-48.

质上还是想利用承认中国新政府问题作为一张牌，来压服中共领导人。从4月底到5月初司徒雷登数次建议国务院不应主动承认中国新政府，以便借此挫败中共因内战迅速取胜而产生的傲慢情绪。基于这种考虑，根据司徒雷登的建议，艾奇逊于5月6日指示驻英、法、意、比、荷、葡、澳、加等西方八国驻美使馆立即向各国政府施加影响，要他们与美国一起组成对华"联合战线"，不要采取导致承认新中国的任何主动行动。不久国务院又向驻印、缅、泰、菲等国的使馆发出了类似的指示。[①]5月13日艾奇逊在给司徒雷登的电报中更提出了咄咄逼人的美国承认中共政府的三个先决条件：(1) 必须在事实上控制中国领土和行政组织；(2) 愿意并能够履行国际义务；(3) 得到了中国人民普遍接受。[②]

面对美国人伸出的触角，毛泽东并不感兴趣。毛泽东曾在党内和对苏共的多次讲话中，表示对美国是否承认中共政权既不抱希望，也不感兴趣。不过，从策略上讲，毛泽东并没有采取一种僵硬的立场。从处理华德事件的过程就可以看出，中共在对美关系上始终是灵活的和留有余地的。[③]在攻占上海前夕，毛泽东提出，如果美英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可以考虑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④]在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的第二天，5月2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发的一封电报指出，"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迹象"，故应"预筹对策"。[⑤]为了稳住美国人、不使其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毛泽东允许中美之间进行接触，以迷惑美国人，为革命的成功尽可能争取时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有了随后黄华与司徒雷登频繁接触的情节。不过，为了避免引起斯大林的疑心，中共在与司徒雷登交往的过程中，不时地向苏联方面汇报进展情况，而在得知刘少奇访苏的结果，即斯大林决心全面援助中共之后，毛泽东断然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⑥]同时毛泽东下令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活动，并对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人进行了公开审判。[⑦]毛泽东对此做出的解释是：没有国际力量的援助，任何

---

① *FRUS*, 1949, Vol. 9, pp. 13-17, 34, 40.

② *FRUS*, 1949, Vol. 9, p. 22.

③ 参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第104–118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83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10–511页。

⑥ 参见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29–33页。

⑦ 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第104–118页。

人民革命都无法取得胜利，即使取得胜利也不可能巩固。[①] 到8月14日刘少奇回国时，中苏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双方实质上已经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建立了十分紧密的合作关系。由此可以断言，到1949年夏天，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美国的消极对华政策不仅没有达到阻止中共与莫斯科接近的目的，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毛泽东倒向苏联的决心。

二、中苏条约签订前：挑拨离间，阻止中苏结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新中国彻底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这一可能性，如何防止中苏结成同盟就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和远东政策的唯一内容。不过此时美国政府的分歧仍未解决：美国军方的看法主要是从应对未来有可能爆发的世界大战角度出发，认为美国应当保卫台湾这一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不能让共产党政权占为己有；国务院则提出核心的问题是"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如果能以台湾换取中国新政权脱离莫斯科的控制，美国在亚洲岂非取得了比直接控制台湾更为明显的战略优势？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前，国务院的主张略占上风。但由于此时苏联的东方阵线必须依靠中国来加固，中共政权的稳定也急需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而美国则未能从根本上放弃对中共政权的打压政策，以至阻止中苏结盟的政策最终归于失败。

中国新政府宣布成立时，美国领导人的态度仍然十分消极。美国国务院的高层坚持认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愿与外国建交，但美国承认新中国这一问题并不具紧迫性，目前美国政府的重点仍然是迅速让美国前驻沈阳领事华德及其下属离境。[②]10月12日，艾奇逊通知各有关驻外使领馆，美国目前无意讨论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同时他公布了承认新中国的三项先决条件。[③]10月24日华德被拘捕后，美国政府反应强硬，曾考虑使用武力劫回华德等人和军事封锁华北煤炭进入上海，但因把握不大而放弃。[④] 美国政府最后采取的政策是对中国施加外交压力：11月18日艾奇逊致函30个国家的外长，要求一致对中国提出抗议。[⑤] 随着12月初华德等人被遣送出中国，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结束，此时承认新中国问题和中苏结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478页。

② *FRUS*, 1949, Vol. 9, pp. 96-159; *FRUS*, 1949, Vol. 8, p. 980.

③ *FRUS*, 1949, Vol. 9, pp. 122-123.

④ *FRUS*, 1949, Vol. 8, pp. 1008, 1011-1013, 1015-1016.

⑤ *FRUS*, 1949, Vol. 8, pp. 1009-1010.

盟问题成为美国政府急需解决的两个难题。

到1949年11月，英国、印度等国先后承认新中国，在此影响下，要求美国承认中国的国内外压力陡然增大。不久，毛泽东开始出访苏联，中苏两国结盟的前景已迫在眉睫。但此时美国政府仍然将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希望利用承认新中国问题对中国又拉又打，以便挑拨中苏关系，阻止中苏结盟。随着华德问题的解决，美国政府伸出了试探的触角。12月，美国驻上海副领事蔡斯通过民主人士史良的丈夫陆殿栋（时任中国外交部专门委员）传话，表示美国国务院远东政策研究室主任耶塞普“愿与新中国政府作非正式接触，地点在香港，如新中国政府有非正式代表在港，愿与见面”。蔡斯还介绍陆“至北京往见美领事”，又说美国“在华已经失败，迟早总要承认新中国。中美关系望不超过，但不次于中苏关系。首先望新华社不要天天骂美帝，可以送走美领，但不要拘留美领，以影响美国人民”。[①]

12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完成了题为《美国在亚洲的立场》的NSC48/2文件，提出美国应当采取合适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手段扩大中苏矛盾，但要谨慎从事。[②]此后，美国政府拉拢中共、挑拨中苏关系的宣传活动达到了高潮。就在英国承认新中国的前一天，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政府不会用军事手段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1月12日，艾奇逊又在发表演说，提出亚洲目前最强大的力量是民族主义，它与美国的利益和传统政策一致，而与共产主义根本抵触。艾奇逊还故意指出，苏联正在夺取中国的北方四区。[③]为了破坏中苏关系，1月2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甚至亲自出马，安排驻法国大使散布各种谣言和传言，诸如苏联要求控制秦皇岛、烟台、青岛等战略港口；毛泽东被排斥在条约谈判之外，甚至遭到软禁；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同时出现在莫斯科，国内一定发生了什么问题；中苏条约的不平等条款将出现在秘密协定中，等等。[④]

美国领导人的言行无疑刺激了斯大林。1月17日苏联驻华使馆报告说，根据可靠情报，“现在美帝国主义在对华政策中非常重视中苏关系问题。美国把希望寄托在当它承认人民政府之后，就可以借助贸易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它，然后再对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8–40页。

② *FRUS*，1949，Vol. 7，Washington D.C.：GPO，1975，pp. 1219。

③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0–14、19–34页。关于美国在对台政策方面争论的详细分析，见沈志华：《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第34–53页。

④ *FRUS*，1950，Vol. 6，Washington D.C.：GPO，1976，pp.294-296，308-311.

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美国害怕中国参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现在美国将通过英国承认中国的机会，试探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的前景，并通过英国人获得所需情报，"作为将来同人民政府建立关系的桥梁"。① 几天后，苏联使馆又传来了美国人在关岛建立美中间谍学校的秘密情报。②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美国是"斯大林与毛泽东交往中无形的第三者"。③ 在中苏条约谈判中，毛泽东坚持要苏联归还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的行政权，而答应这个要求，苏联就将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恰恰是战后苏联远东政策的基石。但是，如果斯大林拒绝毛泽东的要求，中苏不仅无法结盟，而且将会给苏联的东线安全造成巨大隐患。无论如何，斯大林都不会让美国的阴谋得逞。为了将中国拉入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只好让步，唯其如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才得以缔结。④

中苏同盟对于毛泽东同样重要，为了防止美国的挑拨活动引起苏联的猜忌，中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表明立场的行动。如 1949 年 12 月 6 日陈纳德建立的中国民用航空公司的一架从香港飞往越南海防的飞机因故障迫降广西博白县，中共中央即电令广西军政负责人在好好款待飞行员和乘客并宣传"美帝援蒋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之外，迅速安排这些人出境。⑤ 又如 1950 年 1 月 6 日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收回外国兵营地产》的文告，并在 7 天后征用其地面建筑。⑥ 此外，前述蔡斯通过陆殿栋向中共领导人提出的建议也遭到了拒绝。1 月 14 日中共中央最后确定的方针是"在目前的时期对于美国伸出的触角应当置之不理"。⑦ 北京军管会公布了征用命令后，美国国务院即宣布准备从中国大陆撤回所有官方人员，但实际的撤离行动却迟缓得多。⑧ 以柯乐布为首的一些官员认为，中美缓和还有希望，他们建议向中国外交部进行试探。⑨ 但 2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公开声明，中国"不独不会阻止任何美国官方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离开中国，相反，根据沈阳和迪化美国前领事从事间谍活动的经验，我们宁愿听到所有美国官方

---

①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43，п.315，д.142，л.53-54.

②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15，д.142，л.59.

③ Goncharov，Lewis and Xue，*Uncertain Partner*，p. 104.

④ 关于中苏条约谈判详细过程的论述，详见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39–55 页；《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史学月刊》2004 年第 8 期，第 57–68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第 644–645 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 323 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二册，第 38–40 页。

⑧ *FRUS*，1950，Vol. 6，pp. 270-277；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 449 页。

⑨ *FRUS*，1950，Vol. 6，pp. 287-289.

人员能够更快地离开中国”。[①]

三、朝鲜战争爆发前:“全面遏制”战略的出台

1950年2月14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公之于世。显然，美国政府希望能够在短期之内分裂中苏的政策已经失败，那么下一步政策是继续以挑拨中苏关系为中心，还是彻底地改弦更张。此期，在美国政府的内部争论中，以军方为代表的对华强硬派逐步占了上风，美国的对华政策及远东政策开始定型。

就在中苏条约公布的当天，国防部长约翰逊便向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应当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但艾奇逊仍然对分离中苏的策略情有独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军方的意见。[②] 国务院内部一直都有放弃国民党、交好共产党政权的呼声。在国民党对上海进行“二·六”大轰炸后，2月16日国务院中国事务处处长斯普劳斯向远东司司长麦钱特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美国目前的不干涉政策已难以为继，因为该政策不断受到了台湾的干扰。麦钱特十分赞同斯普劳斯的看法，他随后将这一备忘录转交给副国务卿帮办腊斯克，并提出美国应当放弃不干涉政策，从而在两个极端政策中做出选择：要么不承认国民党而尽早承认北京政权并放弃台湾，要么对台湾提供全面军事支持而不考虑直接介入的风险。麦钱特更倾向于前者，他提出美国应该重新掌握行动的自由而不受制于国民党，同时尽早让中国人认识到美国与国民党人毫无关系。[③]

艾奇逊的态度虽然不如麦钱特坚定，但仍对挑拨中苏关系抱有一定的希望。3月22日，艾奇逊指令美国驻北京总领事柯乐布，要其在撤离之前想办法与周恩来或中共高层其他官员进行非正式的会面，以便就中美之间一些重要的摩擦点进行磋商。艾奇逊指示柯乐布，要强调美国公众对中共不准美侨回国、不释放美国海军飞行员以及征收美国驻北平领事馆地产等事难以理解，而这不利于美国公众和政府对中国的看法。艾奇逊强调，柯乐布既要尽力传达美国的看法，也要搞清楚中共的态度，特别是在有机会时弄清楚中共对美国民主制的一般看法。[④]

---

①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45页。

② *FRUS*，1950，Vol.6，p. 339.

③ *FRUS*，1950，Vol.6，pp. 312-314.

④ *FRUS*，1950，Vol.6，pp. 321-322.

然而，中方的态度却令艾奇逊大失所望。柯乐布虽然通过英国领事馆渠道于4月11日与中方官员进行了非正式会谈，但毫无收获。中方官员提出，只要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中美双方就不可能改善彼此关系。以至柯乐布认为，已无可能再与中共进行会谈。[①] 其实，中苏同盟条约缔结后，中共便加快了切割与美国关系的步伐。中国政府不仅一再督促美方撤离在华美侨，而且于4月30日安排美国使领馆人员及侨眷经铁路至天津撤离中国。[②] 此外，还于5月10日将一年半前在山东解放区被俘的两名美国飞行员遣送出境。[③] 这些举动，无疑令艾奇逊一派在白宫的处境雪上加霜。

中苏结盟已是既成事实，国务院内部也开始出现分歧。1950年2月22日至26日，美国驻东亚各使馆宣传事务负责人在新加坡开会，一致建议美国政府应对中国采取“更加有力的、积极的和直截了当的反攻”，其理由之一就是中国已经确定无疑地成为苏联的忠实盟友，成为苏联向其他“脆弱地点”推进的基地。[④] 在美国决策圈对华政策强硬派的主张渐趋上风的情况下，面对中苏同盟，美国的整个冷战战略开始了大调整的过程，这就是NSC68号文件的出台。

尽管由于美国政府内部对4月7日完成的NSC68号文件最初文本存在分歧——主要在国防开支方面，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半年后国家安全委员会才通过NSC68/4号文件，但NSC68号文件提出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在其提出之初就已得到了总统、军方和国务院多数人的赞同，并且对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突出地表现为台湾问题）及远东政策（突出地表现为日本问题）产生了重要的、决定性的影响。[⑤] 与战后初期凯南提出的有选择、有重点地保卫美国利益的遏制理论不同，NSC68号文件提出了“全面、无差别遏制”的概念，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任何威胁到美国安全利益的地区进行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遏制，并以此作为美国长期的战略选

① *FRUS*，1950，Vol.6，pp. 327-329.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二册，第213–215页；《人民日报》1950年4月20日，第1版；5月4日第1版。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二册，第343–345页。

④ *FRUS*，1950，Vol.6，pp. 22-24.

⑤ *FRUS*，1950，Vol. 1，Washington D.C.：GPO，1977，pp. 234-313；NSC68/1：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September 21，1950，*DNSA*，Presidential Directives，PD00178、00179；NSC68/4：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December 14，1950，*DNSA*，Presidential Directives，PD00167.

择。[①]NSC68号文件提出的“全面遏制”这一基本原则和理念，构成了美国重新确定对台政策和对日政策的理论和思维基础。[②]随着美国的战略思维开始向“全面遏制”转变，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必然成为华盛顿关注的对象，特别是新中国统治势力从大陆向海上的扩展，更是美国无法容忍的。新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使共产主义的势力已经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其结果无疑令美国进一步感受到苏联的威胁，从而大大加强了NSC68号文件所主张的“全面遏制”战略的政治基础；反过来，美国新的冷战战略的形成，也必然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对中国的立场，并重新审定台湾地区和日本在其亚太军事部署及政治架构中的地位，从而令美国对台、对日政策发生了微妙而又重要的变化。

中苏正式结盟之后，美国政府内部普遍认为，以阻止中苏结盟为目的的对台政策已彻底失败。在1950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海南岛、5月占领舟山群岛后，美国国务院依旧按照原来的方针部署在台湾的工作，准备将美国外交人员及侨民撤离台湾。[③]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内部要求改变原定对台政策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军方。[④]

4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审定东南亚战略形势时强调了中国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地位，鼓吹美国应采取“果断的”、“持续的”措施以“减少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压力”，并且认为“有证据说明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有所振兴并增强了效能”。[⑤]美国远东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也于5月20日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台湾被中国共产党控制，就等于落入苏联之手，那么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周边的防线将面临崩溃。[⑥]

---

① *FRUS*, 1950, Vol. 1, pp.237-292. 有关NSC 68号文件的全面分析，见周桂银：《美国全球遏制战略：NSC68决策分析》，沈宗美主编：《理解与沟通：中美文化研究论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4–102页；Ernest R. May (e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terpreting NSC 68*, Boston, New York: Bedford Books of St. Martin's Press, 1993；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83–247页。

② 应当指出，以往对于NSC 68号文件的研究，也注意到美国的全球战略改变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只是并未深入探讨美国对台、对日政策变化与NSC68号文件之间的逻辑关系。见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69-70。

③ *FRUS*, 1950, Vol. 6, pp.340-345.

④ 见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p.74；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0–51页。

⑤ 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RG 59, 793.00/5-350，转引自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第45页。

⑥ MacArthur to Department of the Army, C 56410, May 20, 1950, Formosa folder, box 2, RG 6, MacArthur Papers; Bradley to Johnson, May 31, 1950, CCS 381, Formosa (11-8-48), JCS Records, RG 218, National Archives.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5 月 25 日约翰逊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重新审定对台政策，为此应当命令麦克阿瑟向台湾派出一个调查组，以掌握关于如何防止台湾落入“敌对国家”手中的第一手材料。[①]6 月 9 日，约翰逊甚至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出动美国军队阻止对台湾的进攻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②]6 月 14 日麦克阿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所谓的“保台意见书”，认为美国能否守住从阿留申群岛至菲律宾这条远东防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是否在友好或中立政权手中。为此他要求美国政府应重新考虑台湾的归属问题。这份“保台意见书”引起了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的重视，认为这一文件应呈交总统，并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建议美国应改变不插手台湾的政策，向国民党提供援助。[③]

军方的这些要求在国务院内部也找到了响应者。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极力主张支持台湾以免遭共产党进攻。4 月 17 日和 4 月 26 日，腊斯克先后向艾奇逊递交了两份备忘录，不仅指出国民党情况有所改善、有可能守住台湾，还指出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守住台湾对于减轻中共对东南亚的军事压力意义重大。[④]5 月 25 日腊斯克与助理国防部长詹姆斯·伯恩斯、国防部军事援助局局长莱曼·莱姆尼策共同举行了一次国务院－国防部联席会议，三人一致认为，美国应当在现有政策范围内采取一切措施向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⑤]5 月 31 日，腊斯克根据前一天他与国务院一些高级官员开会商讨的结果，拟定了一份关于东亚新政策的详细报告，认为中苏条约签订后美国应当采取新的对台政策，即先让蒋介石“退休”，然后美国对台湾实行托管，继而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腊斯克甚至拟写了一篇演讲稿以备总统发表，其内容与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 6 月 27 日的声明十分接近。[⑥]

刚出任国务院特别顾问的杜勒斯也提出要改变对台政策。5 月 18 日，杜勒斯

---

① 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廉怡之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 年，第 690 页。

②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es（eds.），*Uncertain Years*，p.89.

③ *FRUS*，1950，Vol.7，Washington D.C.：GPO，1976，pp.161-165；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第 687 页。

④ *FRUS*，1950，Vol.6，pp.330，333-335；Intelligence Memorandum No. 292，May 11，1950，*DDRS*，Document Number：CK3100429683。

⑤ *FRUS*，1950，Vol.6，pp. 346-347.

⑥ *FRUS*，1950，Vol.6，pp.347-351；Rusk's report of May 31，1950，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RG 59，National Archives.

向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和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司长尼采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使台湾和台湾海峡"中立化"的预案。杜勒斯认为，中苏结盟已令世界力量的天平倒向苏联，因此如果美国的行为看似允许那些未与美国结盟的国家落入苏联之手，那么美国将在诸多重要地区遭遇到一系列重大灾难，甚至中东石油地区也将处于危机之中。为了防止这种灾难发生，美国应该在台湾问题上迅速采取一种能够显示美国信心和决心的强硬立场。但与军方一再坚持的"武力保台"建议不同，杜勒斯主张台湾的地位应在对日和约中确定，此前美国"有义务"、"有必要"派遣海军舰队在台湾海峡巡弋，"如果美国宣布要使台湾保持中立，既不容许它被共产党占领，也不容许它被用作对抗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使这一决策坚持下去，除非苏联发动公开的战争"。[①]

总之，到6月初美国已经考虑改变对台政策。在各方压力下，艾奇逊也转变了立场。他于6月1日致函约翰逊，表示同意军方继续向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提供援助。约翰逊随后命令国防部有关部门，除喷气式飞机及中型和重型坦克外，在可使用的资金范围内满足台湾方面"以后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②]美国态度的松动很快被传达给国民党政府。6月12日杜勒斯告诉"驻美大使"顾维钧，美国政府有可能重新考虑对台军援问题。[③]而国防部长约翰逊甚至向蒋介石私人代表表示了向台湾提供军援的"恳切"态度和决心。[④]美国新闻媒体也觉察到这一点，传言"对台政策正在转变"。[⑤]6月25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则消息透露：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意见，如果美国对台湾问题采取坚决立场，"将有90%的把握阻止共产党对该岛的侵略，因为中国人自己并没有准备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发生冲突"。如果美国发表一个措辞强硬的公开声明，指出台湾的归属必须等待对日和约签订后才能确定，并向台湾派遣军事代表团，提供军事援助，"共产党人可能甚至不敢发动对台湾的攻击"。报道还说：有官员认为，只要出现一艘航空母舰，"就必然会使共产党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不敢发动对台湾的攻击"。[⑥]至此，一项新的对台政策和方针已然呼之欲出，等待的只是机会和条件。

---

① *FRUS*，1950，Vol. 1，pp.314-316；*FRUS*，Vol. 6，pp.349-351.

② *FRUS*，1950，Vol. 6，pp.351-352.

③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64–765页。

④ 蒋介石日记，1950年6月24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University of Stanford。

⑤ 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50年)》，台北："国史馆"，1994年，第876–877页。

⑥ 引自伍修权11月28日在联大安理会的演说，见人民出版社编：《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6–47页。

需要补充的是，美国政府此时未能注意到，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后苏联的远东政策也发生了非常微妙但却十分重大的变化。在斯大林不得不接受中方的主张而放弃在中国东北的一切特权后，为了在太平洋寻找另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以保证苏联战后的亚洲战略得以继续实施，斯大林把目光转向了朝鲜半岛。[①]就在1月28日苏方表示接受中方关于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港的协定方案之后两天，斯大林决定邀请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商谈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的军事计划。经过4月10日至25日的秘密会谈，斯大林与金日成确定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基本原则，并决定将苏联原定援助中国解放台湾的各种军事物资转给北朝鲜以进行备战。而被蒙在鼓里的毛泽东直到5月中旬才得知斯大林的这一决定。斯大林1月30日突然做出的这个重大决定，不仅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命运，也对中共进攻台湾的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②]无论如何，由于美国和苏联政策的改变，中共解放台湾的作战计划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已成泡影。

随着中苏结盟、中国正式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在战后初期设想的以扶持服从美国领导的中国来牵制其他大国、稳定地区和平的亚洲战略也彻底失败，美国急需在亚洲找到新的战略盟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将目光转向了身为战败国的日本，其对日政策也开始发生巨大转变。

早在1947年夏，即冷战格局在欧洲出现后，美国因为调停国共内战失败且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就开始考虑以美国占领之下且具备较强经济、军事潜力的日本取代分裂而动乱的中国，来扮演美国在远东对付苏联的帮手。[③]经过激烈争论，到1947年下半年，军方与国务院两大系统已经在对日政策的基本目标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即重新调整对日政策，把日本的身份从战败国转变为同盟国，使其成为遏制苏联在东亚扩张的重要据点。随着中共在军事上取得主动并于1948年9月发动辽沈战役，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进一步转变。1948年10月9日杜鲁门总统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确定了推动日本经济复兴、单独对日媾和、扶植日

① 早在1945年9月苏联外交部就建议，朝鲜半岛南方的几个港口具有战略价值，应该置于苏军的掌握之中。АВПРФ，ф.0431I，оп.1，п.52，д.8，л.40-43，44-45，转引自Kathryn 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 8，1993，pp.9-11。

②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北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9–158页；《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第34–53页。

③ Steven Levine，“A New Look at American Media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Marshall Mission in Manchuria”，*Diplomatic History*，Vol.3，No.2，Fall 1979，pp.349-375.

本对抗亚洲共产主义的新方针。[①]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进一步加快了对日媾和活动，希望能尽早结束日本战败国地位，将其扶植成服从美国领导的亚洲强国，以此作为美国在东亚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桥头堡。虽然在与日本媾和的具体方式和阶段上国务院与军方有不同意见——军方认为应当在进行全面媾和的逐项条件成熟之前推迟媾和进程，以免"减弱美国在日本的势力"，而国务院则希望早日媾和，以平息"日本人与日俱增的不满和反抗"，但双方在将日本转变成为美国东亚冷战战略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盟友这个总目标上却是一致的。[②]而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则推动了美国政府内部在对日媾和问题上走向一致。

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特别提到要将尚未形成的美日同盟看作中苏两国在远东的未来对手，而且中苏也同意在对日和约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③]这一点无疑刺激了美国政府，就在中苏条约公布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外交发言人宣布，"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与日本单独签订和约而无须俄国参加"。[④]3月23日，陆军部副部长沃里斯也向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备忘录，主张在媾和后恢复日本在外交、内政两方面的主权，但在军事上仍保留盟军总司令部，占领军亦留驻日本，保持半占领状态，以备不时之需。[⑤]在国务院高级顾问并负责对日媾和事务的杜勒斯和主政东京的麦克阿瑟的努力下，国务院与军方的意见逐步趋向一致，双方在几个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已经基本解决，特别是在占领期结束后允许日本恢复有限武装和少量武器生产，保持美国在日本的基地及驻军权利等方面，尽管在媾和的时机和具体条件等问题上还有分歧。[⑥]

4月7日，杜勒斯提出美国政府应当尽快对日媾和，以便将日本尽快纳入美国在亚太的防御体系之中。[⑦]受到杜勒斯的影响，腊斯克在5月31日关于东亚新政

① 崔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文件形成探微》，《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183–192页。

② Michael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165-213；崔丕：《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与千岛群岛归属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第197页；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06–107页。

③ 条约全文见《人民日报》1950年2月15日，第2版。

④ *Кошкин А.* Вступление СССР в войну с Японией и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2000，№12，с.57.

⑤ 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107页。

⑥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p.247-249.

⑦ *FRUS*，1950，Vol.6，pp.1161-1166.

策的报告中认为，如果美国要把日本作为未来的盟友，现在就必须立即表明态度。[1]到6月初，国务院关于对日和约的构想已经进一步深化，甚至提出了具体的日程和步骤。军方与其唯一的分歧在于担心对日和约的签订会削弱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前线指挥官麦克阿瑟的意见便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2]

麦克阿瑟此时对日本问题的态度也趋向强硬。过去他宣称任何保持基地的动作都将引发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现在则认为必须把日本同意"保留美军基地"作为结束占领的条件。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开始对日本共产党采取压制政策，6月6日命令吉田茂首相整肃日共执行委员会及《赤旗报》员工，利用原为镇压极右派军国主义制定的法律，禁止共产党领袖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为了争取这位将军的支持，杜勒斯在启程访问东京之前，经艾奇逊同意，决定与国防部和麦克阿瑟做一笔交易，即以美国对台湾的防御重新做出承诺，换取他们支持加快对日媾和的步伐。[3]

6月17日，杜勒斯率领的国务院代表团与由国防部长约翰逊、参联会主席布雷德利率领的国防部代表团同时到达东京。因受到华盛顿重视而颇为得意的麦克阿瑟当然知道双方的目的：一个为了日本，一个为了台湾。为此，麦克阿瑟准备了两个长篇备忘录，其核心是，如果美国要在东亚地区夺得主动，就必须缔结对日和约并保证台湾不受到侵犯，二者不可缺一并互为补充。[4]在访问的最后几天，两个代表团与麦克阿瑟数度会谈。最后经麦克阿瑟从中斡旋，双方达成妥协。麦克阿瑟6月23日的备忘录反映了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和约签订后，美军继续留驻日本，为防卫作战之需要，整个日本领域作为潜在的基地，给予美国以无限制行使防卫权力的自由。此外，承认日本虽然在宪法中规定放弃战争，但在"受到侵略攻击时"拥有自卫权。在签订和约的同时，缔结日美安全协定，日本给美国以驻军及保留军事基地的权利。[5]布雷德利后来回忆说：我们的会谈是富有成果的。麦克阿瑟的备忘录像一座桥梁，最终将政府各部门联结在一起，一致同意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和平条约。[6]

---

① Rusk's report of May 31, 1950,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 RG 59, National Archives.

② 详见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108页；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255。

③ *FRUS*, 1950, Vol. 6, pp.1205-1207、1221-1223；Haruki Wada, "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945-1953: In the Light of New Russian Archival Documents", Paper for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 (Hong Kong, January 1996).

④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274-276.

⑤ *FRUS*, 1950, Vol.6, pp.1227-1228.

⑥ 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第686页。

此外，日本的态度对于东京谈判的结果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吉田茂政府担心美国的内部争论延误媾和进程，反复表示在和约签订后日本仍将长期依赖美国的保护，并警告说，苏联有可能赶在美国之前提出令日本人感动的和约条件——放弃对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占领。日本政府6月1日发表白皮书，宣布愿意同任何承认其独立的国家签订和约。[①]

无论如何应该看到，在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由于受到中苏同盟条约的刺激，华盛顿决策层已经消除了在台湾问题和日本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尽管尚未形成决策，但美国对台政策及对日媾和方针的前景已经明朗化，所需要的只是实现这些新构想的机会和条件。[②]这种状况表明，东亚冷战的帷幕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已经拉开。

四、朝鲜战争爆发后：冷战格局在亚洲的形成

新的研究表明，在朝鲜战争前夕和爆发初期中苏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分歧。[③]但白宫对此毫不知情。恰恰相反，战争的突然爆发，令美国朝野普遍认为中苏是这次军事行动的幕后黑手，同时也证明中苏同盟非但难以分裂，而且共产主义势力已经开始以战争的形式来实现其野心的扩张。自NSC68号文件形成以来，"共产主义威胁"的看法已弥漫于美国政府内部，而且其所提出的冷战对抗中"任何一地的丢失都是对全线的一个重创"这一思维逻辑已被美国领导人所接受。[④]朝鲜战争的爆发正好印证了美国政府的这一冷战心理，这反过来更推动美国总体冷战战略向"全面遏制"这一原则转变：1950年9月21日，特委会完成了NSC68/1号文件，包括基本文件和附件在内长达138页。[⑤]以后又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最终在12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七十五次会议上，杜鲁门与国安会成员讨论并通过了NSC68/4

①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p.257-259.

② Michael Schaller的研究认为，约翰逊和布雷德利没有接受麦克阿瑟的意见，他们在离开东京时仍反对和约。见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274，p.278。笔者觉得这一结论有误。从东京谈判的结果看，军方的要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他们没有理由固执己见。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恐怕也只是对日媾和的具体程序和时机了。

③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40–179页；《朝鲜战争初期苏中朝三角同盟的形成》，《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1期（2009年5月），第165–198页。

④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244–245页。

⑤ NSC68/1：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September 21，1950，*DNSA*，Presidential Directives，PD00178、00179.

号文件。[1]在美国政府这一宏观冷战战略的转变过程中，台湾、日本这两个地区被赋予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们成为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桥头堡和重要基地。为此美国彻底修改了对台、对日政策，将这两个地区完全纳入其在东亚的遏制体系中，同时通过武力介入朝鲜战争的方式，也将南朝鲜再次划入其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防御圈。

朝鲜战争的爆发，首先导致美国公开宣布其对台政策的根本性变化。6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向杜鲁门提出："韩国、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和东南亚，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它们的地位"相互依赖"，美国"急需一个互相配合的全面的远东政策"。[2]关于台湾问题，6月27日杜鲁门一纸宣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则借机侵入台湾海峡。美国的军事举动彻底阻断了中共解放台湾的设想，尽管国务院的报告仍认为中共具有攻占台湾的能力，并且可能提前采取行动。[3]

与此同时，日本问题也凸现出来。朝鲜战争使日本在东亚的地位骤然上升，美国在远东军事力量不足的矛盾使得重新武装日本显得更加急迫。7月8日，麦克阿瑟授权日本政府组建7.5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并增加了8000名海上保安队成员。几天后，远东盟军总司令部的专门委员会又提出一个计划，要求把警察预备队尽快编成4个步兵师，并装备美制武器。[4]杜勒斯回国不久就催促国务院加紧和约的准备工作。他在7月19日建议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对日和约变得更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并主张从"更深远的角度"来考虑媾和问题。第二天，他又强调早日媾和与重新武装日本的不可分割性。[5]此时，美国军人同外交官的立场已经完全取得一致。8月22日，布雷德利通知约翰逊，目前的环境使得缔结对日和约有了正当理由，如果美国在日本的驻军和基地得以保留，并使日本承诺重建武装，军方不再反对批准对日和约。随后几个星期，国务院和国防部不断商谈，对和约的先决条件达成协议，随即签署了联合备忘录，并于9月7日递交总统。就程序而言，备忘录已经撇开苏联，只是通过外交途径与远东委员会中友好国家进行秘

① NSC68/4：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December 14，1950. *DNSA*，Presidential Directives，PD00167.

② Bradley to Johnson，May 31，1950，CCS 381，Formosa（11-8-48），JCS Records，RG 218，National Archives.

③ IM 312，July 26，1950，*DDRS*，CK3100047045-3100047062.

④ 刘同舜、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0–1951）》第六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页；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93页。

⑤ *FRUS*，1950，Vol. 6，pp. 1243，1247-1248.

密的预备性谈判。就内容来看，备忘录强调美国应享有外国军队在日本驻留的批准权和指挥权，不否定日本拥有自卫权和保持必要规模军队的权利。该备忘录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0/1号文件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只待朝鲜战场处于有利情况便可实施媾和。[①]

9月15日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此后随着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进展，美国提出了对日媾和问题。经过一番秘密的串联和准备，10月26日晚杜勒斯约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向他转交了被称为"对日和约七原则"的美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包括：缔约国为"任何或一切愿意在所建议的和可能获得协议的基础上媾和的对日作战国家"；日本承认朝鲜独立，同意联合国和美国托管琉球和小笠原群岛，接受英、苏、中、美四国将来所作关于台湾、澎湖列岛、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的地位的决定（在条约生效后一年内做出决定，否则由联合国大会决定）；日本有责任与占领军合作以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缔约各方在原则上放弃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②]在会谈中，杜勒斯强调了三点：如果苏联参加缔结对日和约，依据和约，日本将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割让给苏联；即使远东委员会成员国中某国不参加缔结对日和约，美国也要进行对日媾和谈判；台湾地位问题暂时冻结，建议由联合国重新加以考虑。马立克对美国的媾和方案本身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表示反对冻结台湾地位，更不同意将这一问题交付联合国，而是主张恪守有关的战时国际协议。马立克还强调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③]

美国这一基于全球和亚洲冷战的考虑而在对台、对朝、对日政策上的转变，都深深地刺激了中国。战争爆发伊始第七舰队便占据台湾海峡的做法彻底破坏了中共领导人实现统一的构想，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越过三八线的行动更威胁到中国东北的安全，而美国积极推行单方面对日媾和、重新武装日本的方针也引起了中国的深刻担心。在朝鲜战场上北朝鲜政权摇摇欲坠、苏联却又袖手旁观的危急时刻，中国挺身而出，不顾苏联一再违背提供空军支援的诺言而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将美国

---

① *FRUS*，1950，Vol. 6，pp. 1278-1282，1293-1296，1297-1304.

② *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 Россия-Япония，Обречены на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о，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ипломата и заметки историка，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1996，с.43. 另见《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6日第1版的报道。

③ *FRUS*，1950，Vol. 6，pp.1332-1336；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08；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2)》第七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6–77页。

人打回三八线。正是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做出的中国出兵与美国孤军作战这一决定，才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共和毛泽东的看法，并在事实上巩固和发展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此后，斯大林及时派出苏联空军参战，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在涉及战争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上支持了中国的主张。①这就是历史上时常出现的因果转换的典型实例：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中国被迫单独参战则反过来巩固和加强了中苏同盟。

中苏同盟的进一步强化不仅表现在朝鲜战场方面，也表现在两国在对日和约、朝鲜停战谈判问题上的紧密配合。苏联之所以对美国10月26日提出的对日媾和方案不发表意见，是因为中国军队已秘密入朝参战，朝鲜战局必将发生重大变化，斯大林的想法是等朝鲜战场出现有利于中朝的局面后再表态。中国方面也持同样的看法，希望能在战场有利的情况下提出的自己的条件，解决台湾问题和对日和约问题。随着1950年底中国志愿军打过三八线、攻占汉城，联合国关于停战谈判的呼声更加强烈，而且提出的条件也更加有利于中国。如果中国（得到苏联的同意后）接受1月13日联合国提案，进行停战谈判，不仅能够稳定住朝鲜战场的有利局面，也将对日本问题的处理产生极大影响。然而，在台前的中国和在幕后的苏联都没有抓住这次稍纵即逝的良机。当1月17日中国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不久，美军即发起全面反攻，已是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不得不败退三八线以北。②朝鲜战局再次出现逆转，对日媾和问题的解决自然也就朝着与中苏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

战场上的优势地位使美国在媾和问题上的态度强硬起来。在3月30日美国再次递交给苏联大使馆的照书中，不仅重复了有关托管日本几个岛屿及承认日本享有单独或集体自卫权等条款，而且强调，不参加本条约的国家，将不给予任何法律基础上的权力和利益。特别是关于领土问题的条款，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对《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的规定，只提日本放弃这些领土，但未提其归属。尽管对于雅尔塔协议所规定给予苏联的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表面上仍采取承认的立场，但条件是“这一规定只有在苏联签订和批

---

① 详见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苏中朝三角同盟的形成》，（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1期（2009年5月），第165–198页；《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1期，第53–66页；2001年第2期，第49–58页；《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59–208页。

② 有关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这次决策失误，详见沈志华：《试论1951年初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第125–146页。

准条约的情况下才会生效”。[①]

苏联确实不愿意在这种状况下签署对日和约，斯大林对朝鲜战局的变化颇感失望，随即对美国的对日媾和方案采取了反对和阻挠的明确立场。1951 年 5 月 6 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说明了苏联对媾和问题的立场：指责美国单独准备和约草案的做法，要求条约草案中应明确中国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反对把琉球群岛及日本其他岛屿交给美国托管，必须限制日本武装力量的规模。最后，苏联政府建议在 7—8 月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起草对日和约，其内容应规定：日本不得结盟以反对曾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和约签订后所有占领军均应在一年以内撤出日本领土；任何国家均不得在日本拥有军队和军事基地等。毛泽东当天回电表示完全赞同。[②]5 月 7 日，苏联外交部将“苏联关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意见书”交给美国驻苏大使柯克。5 月 22 日，周恩来正式向罗申递交了一份照会，表示中苏意见“完全符合”，中国政府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对日和约的具体建议。[③]5 月 24 日苏联全文发表了这个措辞强硬的文件。[④]6 月 10 日，苏联政府再次照会美国，指责美国和约草案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日本的军国主义，并重申必须于 1951 年 7 月或 8 月召开包括所有参加对日作战国家代表出席的和会。[⑤]6 月 25 日，朝鲜外务省也向苏联递交了照会，声称“无论是在准备条约的程序方面，还是在条约的目的和实质方面”，朝鲜“完全赞同和支持苏联政府对日和约的立场”。[⑥]

就在苏联明确表示抵制美国媾和方案的同时，朝鲜战场的形势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而陷入了僵局，双方都表现出和谈的意愿。[⑦]6 月 5 日，凯南与马立克讨论了停战谈判的可能性，苏联表示了急切进行停战谈判的意图。引起凯南注意的是，马立克在会面时根本没有提到诸如台湾和对日和约等远东国际事务问题。凯南

---

① *FRUS*，1951，Vol. 6，pp. 908，942-943；*Славинский Б.Н.* Сан-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1951г. По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с Япон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1，с.84. 参见《对日和约问题史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年，第 80–86 页。

②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以下简称《朝鲜战争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48），2003 年 7 月，第 755–756、757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274 页。

③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50–195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年，第 358、360、361 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19-03，第 86–87 页。

④ 《人民日报》，1951 年 5 月 25 日第 1 版。英文全文见 MF2527245-0990，Main Library，University of Hong Kong。

⑤ 参见《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 95、100、107 页；*Славинский* Сан-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с.87。

⑥ АВПРФ，ф.0102，оп.7，п.25，д.2，л.26-31.

⑦ 相关的俄国档案见沈志华编：《朝鲜战争文件》，第 777–786、804–811、835–840 页。

判断，这也许表明苏联政府渴望停火，即使不解决这些更为广泛的远东问题。① 美国人猜测得不错，苏联确实希望先实现朝鲜停战，再解决对日和约问题，这样会对中苏一方更为有利。美国的策略则是针锋相对，先实现对日媾和，再谈朝鲜停战问题。

美国利用1951年春季的军事优势，不仅迫使日本政府承诺不与新中国缔约，而且逼迫英国政府接受了“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参加多边和会”的立场，从而结束了英美围绕中国签约权的纷争。②7月3日美英制定出对日和约的共同草案，但在敦促尽快召开和会的同时，美国还必须采取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拖延停战谈判。显然，如果此时朝鲜停战达成协议，远东地区出现和平局面，而中国和苏联成为“和平功臣”，美国就很难拒绝中国参加对日媾和，也无法说服其盟国同意继续在日本驻军和重新武装日本。③ 于是，7月10日开城谈判开始不久，美方代表就不断为和谈制造难题。尽管中朝方面步步退让，在确定谈判程序和划分停火线等问题上都大体接受了对方提出的方案，但美国仍然不断制造事端，致使开城谈判不得不于23日中断。④ 这正是美国要达到的目的。如此，当美国以近乎最后通牒的方式把美英共同草案交给苏联代表时，莫斯科已经被逼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1951年7月6日，美国政府向苏联大使馆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及美英共同草案。备忘录以不容商量的口气指出，这个经过修改的草案已经“体现了参加签署对日和约的盟国基本上能够接受的条件”，并将于7月20日左右分发给所有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因此，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苏联政府的意见。更使苏联感到气恼的是新草案在领土条款中所做的重要修改：3月30日草案还提到日本应该向苏联归还南库页岛及其毗邻岛屿，移交千岛群岛，而在7月3日的草案中只谈日本放弃对这些领土的权利和要求，却丝毫没有提到其归属问题。不等苏联答复，7月20日，美英两国大使同时拜访苏联外交部，递交了美英联合照会、关于参加1951年9月4日旧金山对日和约国际代表会议的邀请函、和约草案正式文本及其他一切有关文件。照会指出，这次会议是在美英共同草案的基础上召开的，美英政府请求告

①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629–630页。

② 详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七分册，第78–81页；徐友珍：《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第32–35页。

③ 这一点，就连当时的美国报刊都看得十分清楚。见斯通：《朝鲜战争内幕》，南佐民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6页。

④ 参见沈志华编：《朝鲜战争文件》，第941–1007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44–155页。

知，苏联政府是否接受这个邀请。尽管在照会中建议对和约草案提出意见，但同时又声称，不管有何意见，最终文本都将在8月13日予以公布。柯克还在口头声明中强调，召开国际会议不是为了制订条约，而只是为了签署美英8月13日的草案。[①]

斯大林确实为难了：参加会议无疑意味着向美国低头，拒绝出席又将处于外交上的孤立境地。此时，苏联领导人显得有些不知所措。7月21日副外长葛罗米柯向斯大林建议苏联应该出席旧金山会议，显然因遭到拒绝，他在8月1日重新起草的照会中，说明了苏联不能参加这次会议的理由。但几天以后，苏联的想法又变了。8月10日，联共（布）中央专门讨论并通过了外交部准备的决议草案，苏联决定派代表出席旧金山国际代表会议，同时对美英草案提出批评和修改，特别是要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参加会议；如果这些意见不被接受，苏联就拒绝签署条约。8月12日苏联向中国通报了这一立场。[②]8月1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③]

然而，中苏的这种表态未能阻止对日和约按照美国的安排进行签订。在9月4日开幕的旧金山会议上，苏联有关必须有中国代表参加和修改和约草案的建议都被拒绝。于是，苏联、波兰、捷克等国代表只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④]中国外交部则于北京时间9月7日晚将拒绝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声明文本交给了苏联使馆。[⑤]

就在旧金山和约缔结5个小时后，艾奇逊和吉田茂在旧金山军人俱乐部签署了已经准备就绪的日美安全条约。12月24日，吉田茂又在杜勒斯的压力下致函蒋介石，建议缔结和约。此后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双方于1952年4月28日，即《旧金山和约》生效前7个半小时，签订了“日华和约”。[⑥]1952年4月23日，盟国对日

---

① *Славинский* Сан-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c.89-91.

② *Славинский* Сан-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c.91-93，95.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7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62–364、366–367页。

④ 详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68–386页；*Славинский* Сан-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c.98；*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процесс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и КНР с Японией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and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Beijing，October 1997）。

⑤ *Капица М.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Москва: 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1996，c.130.

⑥ 详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93–394页；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7）》，第105–110页。

管制委员会宣布停止活动。5 月 30 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苏联代表团，由于和约生效，苏联代表团已经丧失其合法地位。随后，苏联代表团不得不离开东京，苏联已经完全无法介入和影响日本事务。①

至此，美国人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其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的构想，而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则在朝鲜战场上愈演愈烈。②

结　论

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还有可能与中共建立起比较正常和密切的关系，那么到 1949 年这种机会已经不复存在。所谓"失去中国"，本质上是指中国新政权倒入了苏联的怀抱。由于冷战出现和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对抗，中共对苏联的态度和立场便成为影响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1949 年 1 月，当中共在国内战场已经取得明显优势时，苏联开始重视中国问题，调整对华政策，并考虑与未来新政权的关系问题。而在毛泽东看来，夺取政权的斗争越是接近胜利，苏联的作用就越是重要。斯大林最初试图对国共内战进行调停，以此介入中国问题，但因毛泽东的坚决反对而作罢。此后，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以全面了解毛泽东和中共的真实情况。在确信中共将追随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后，斯大林开始加强了对中共的援助和支持，中苏在各个方面的联系大大加强，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此时，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中苏接近，但毫无效果。从新中国成立到中苏同盟条约签订，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围绕东北问题的权益发生了严重分歧和争斗。美国政府此期的政策目标则是千方百计阻止中苏结成同盟关系，但结果适得其反，美国的压力反而成为促进中苏缔结同盟条约的重要因素。

在这场角力中，作为彼此对峙的美苏两个大国都力图争取的对象，当时正走向内战全面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掌握了相当的主动性。无论是华德事件，还是与司徒雷登接触，抑或是征收外国兵营和美国经合署物资，特别是中苏同盟条约谈

①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国际事务概览（1952 年）》，吴世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年，第 485–487 页；《人民日报》1952 年 4 月 30 日，第 4 版。

② 美国在对日媾和问题上占到了上风后，立即转而推动停战和谈，但再次遭到中苏的联手阻击。朝鲜停战谈判的僵局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开始解冻。详见沈志华：《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史学集刊》2006 年第 1 期，第 66–75 页；《1953 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世界史》2001 年第 2 期，第 2–18 页。

判，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中国共产党每次都掌握了主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尽管这种主动性多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但对于中共而言还是具有极强的指向性，即尽力稳固和发展与莫斯科的关系，以便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迅速实现和巩固统一中国的大业。一方面由于中共受其本身意识形态取向和国际经验缺乏的制约，一方面由于中共作为地方割据政权而长期未获美国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在走向胜利时，其政策指向在主观和客观方面的选择都十分有限。

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却在与中共的交往中表现得十分被动。就其为破坏中苏结盟而采取的政策而言，其演变有着较为清晰的轨迹：从一开始的以打压为主、接触为辅，逐步转变为以利诱为主、打压为辅。但无论怎样，美国在整个过程中极少占据主动，也未能阻止中苏双方坚定地迈向同盟。实力强大的美国之所以会在这场较量中失败，首先是因为极少接触中共，对共产主义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根本不了解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和目标；其次，美国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时，难以摆脱国内右翼反共势力和中国国民党人的干扰，因此无法做出有效的应对。

中苏结成同盟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对政权利益的考虑。对于莫斯科而言，拉拢中国这样一个亚洲大国加盟，其东方战线便有了可靠的屏障；而在北京看来，只有依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才能有所保障，漫长的海岸线也可以受到保护，从而使新生的政权得到巩固。然而，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还在客观上带来了两个后果。因为苏联即将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决心发动朝鲜战争，以挽回其亚洲战略利益的损失。美国则把中国加入苏联集团看做是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的扩张，从而酝酿和确定了“全面遏制”的新的冷战战略。这个结局，恐怕是毛泽东在“虎口夺食”时始料不及的。

另一方面，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以苏联盟国的角色加入冷战，其结果无疑是把美苏对抗的前沿阵地推到了太平洋的西海岸，远东地区的态势骤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不再是美苏冷战的中间地带，于是台湾地区和日本的战略地位便凸现出来，由此导致了美国对远东乃至整个亚洲政策的转向。朝鲜战争爆发和中国的参战，进一步使美国明确了在东亚的集体安全政策，并把两大阵营在亚洲的对抗推向了高潮。美国在决定介入朝鲜战争的同时，毫不迟疑地提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并迅速确定了对日和约的新方针——把日本作为反共同盟国及早实现单独媾和。朝鲜战局的变化决定着对日媾和的进程，而《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又反过来影响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面对远东地区的被动局面，斯大林和毛泽东决心在停

战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通过拖延战争的策略，把美国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远东。

于是，从中苏同盟条约开始，中经朝鲜战争爆发，到对日和约签订，冷战在远东形成的三部曲奏完了最后一个音符。苏联拉住中国和朝鲜，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而美国则把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纠集在一起，构筑了东亚地区的共同防御体系，远东冷战的格局由此定型。

发表于《北大史学》2012 年第 17 期（第二作者姚昱）

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领导权的转移

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集会，宣布成立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报告中提出了对国际局势已经出现两个对立的阵营的著名判断。日丹诺夫报告被认为是与杜鲁门主义相对应的苏联的冷战宣言，而共产党情报局则成为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对抗的大本营和司令部。随后，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便开始流传关于共产党东方情报局成立的消息。但一阵喧嚣过后，人们并没有看到东方情报局的影子。于是，这个神话就自然消失了。时至今日，很少有人再提起此事。在研究冷战起源（包括亚洲冷战起源）的诸多论著中，几乎没有学者关注是否存在一个东方情报局的问题。①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后中国、俄国档案的不断解密和公布，东方情报局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②其实，所谓的东方情报局最后并未成立，但中国共产党在1950—1960年代的确承担了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那么，东方情报局的问题是如何提出的？在斯大林的冷战战略中亚洲处于什么地位？毛泽东对领导亚洲革命有哪些考虑？中共对待东方情报局持什么态度？东方情报局为何最终没有建立？归根结底，亚洲革命的领导权是如何从莫斯科向北京转移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解开东方情报局这个历史之谜。

① 笔者所见，只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崔海智在其博士论文《共产党情报局：冷战与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2011年）中论及了这个问题。

② 讲到这一问题时，历史文献中出现的类似词汇有“东方情报局”、“东方共产党情报局”、“远东情报局”、“亚洲情报局”、“亚洲局”等。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在一般情况下使用“东方情报局”。

一、斯大林否认东方情报局的存在

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不久，关于东方情报局的传言便出现了。1947年11月19日香港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可靠的”消息：“11月20日，满洲、蒙古、朝鲜、印尼、马来亚和印度支那共产党将在哈尔滨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将要建立东南亚和远东情报局，共产国际在贝尔格莱德恢复行动非常明显地证明，苏联政府进行伪装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第二天，上海《东南日报》的报道又增加一些引人注意的细节：“今天，在哈尔滨召开了远东共产党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关于建立远东情报局的问题。中国、朝鲜、蒙古和暹罗将派代表出席会议，毛泽东已经派遣非常著名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参加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李立三现在正在满洲。”该报还评论说，建立远东情报局被看做是在贝尔格莱德建立欧洲情报局之后合乎逻辑的一步。这一消息瞬间就传遍了巴黎和伦敦的报纸，并引起了正在努力恢复对其原有亚洲殖民地控制的法国、英国的疑虑和恐慌。[①] 11月29日中国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继续报道关于“东方七国共产党会议的详细情况”：“这次会议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1）在远东地区成立共产党情报局；（2）远东地区各国在其争取自治的斗争中相互合作；（3）不断地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苏联情报人员认为，国民党分子借此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掀起了巨大的造谣攻击运动，把这次会议和情报局的建立描绘成“共产国际的复兴”，甚至是“共产国际从地下走了出来”。[②]

不过，这些传言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因为人们传说中的东方情报局根本就没有出现。的确，在斯大林的冷战战略中，原本就不存在关于在亚洲也建立一个共产党国际组织的设想。尽管冷战已经在欧洲爆发，斯大林构造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也会把亚洲革命运动看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斯大林最初的设想战略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及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此外，苏联的外交重点始终在欧洲，斯大林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过多地关注亚洲。这一特点，在

---

①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17，оп.128，д.51132，л.171，转引自*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1947-1956гг.，Москва：Россия молодая，1994，с.80-81。

② 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1948年1月23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73，л.9-10。关于共产国际的解散，参见沈志华：《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2期，第31-40页。

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时就显现出来。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情报局会议，日丹诺夫的报告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在巴尔干联盟及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①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从1947年夏天至1948年春天，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先后否决了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提出的关于在布达佩斯召开多瑙河流域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对于丹麦和挪威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北欧国家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想法持极大怀疑态度，严厉批评了联共（布）驻世界青年民主联盟代表切乔特金娜关于建立东南亚共产党联合组织的报告（报告人被撤职），拒绝了巴勒斯坦、土耳其和伊拉克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阿拉伯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② 不仅如此，大量的研究表明，1948年6月马来亚共产党发动的武装起义并未得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和帮助，斯大林甚至不愿关注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多年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的革命斗争。③ 实际情况正如俄国学者艾菲莫娃查阅了大量苏共中央档案后做出的结论：在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之后，如果说在苏联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传材料中的斗争性在增长，那么在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的秘密报告中则看不到这种斗争性。这些秘密报告既没有突出斗争性，也没有强调武装斗争，从中也不能发现苏联领导人号召亚洲共产党人起来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暗示。在1948年春季之前，苏联共产党同所有东南亚共产主义活动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尽力不卷入这些国家的国内斗争。尽管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特别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包括诸如输送武器的军事援助，莫斯科却没有这样做。由于不确信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能否取得胜利，苏联领导人甚至不愿同东南亚共产党保持正

---

① 详细论证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② 详见 *Адибеков*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c.80-81；Larisa Efimova，"Did the Soviet Union instruct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s to revolt? New Russian evidence on the Calcutta Youth Conference of February 1948"，*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 40，No. 3，October 2009，pp.455-463。

③ 详见 Igor Bukharin，"Moscow and Ho Chi Minh，1945-1969"，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January 1996，Hong Kong）；Leon Comber，"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ord in Southeast Asia：The Ca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1948-1960），A Special Branch Perspective"，*ISEAS Working Paper:Politics & Security Series*，No. 1，2009，pp.2-3；Karl Hack and Geoff Wade，"The Origins of the Southeast Asia Cold Word"，*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40，No.3，2009，pp.441-448；Mark A. Lawrence，"Transnational Coalition-Building and the Making of the Cold War in Indochina，1947-1949"，*Diplomatic History*，Vol. 26，No. 3，Summer 2002，pp.453-480.

常的关系。[①] 有研究表明，有关越南情况的最初文章一直到苏联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后，也就是在1950年才出现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②]

不过，莫斯科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人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会议非常重视，甚至有意在远东也建立一个类似的组织。一份提交联共（布）中央的有关中国局势的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给予了极大关注。在1947年10月12—16日期间，解放区所有的共产党报刊和民主报刊，尤其是在满洲地区的《哈尔滨日报》、《东北日报》、《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在香港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群众》杂志和《晨报》，都在塔斯社报道材料的基础上刊登了关于成立九国共产党情报局的消息、公告和宣言。10月14日，《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满洲地区其他出版物转载了《真理报》10月10日祝贺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社论。10月16日，解放区的所有广播站都对此做了报道，在所有民主刊物上发表了新华社有关这一消息的国际述评。10月20日，解放区各报刊发表了中共东北局宣传部编写的"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几个问题"的宣传材料。10月26日，满洲地区民主刊物又刊登中共东北局根据会议宣言和报告编写的关于"现代国际形势研究的提纲"。报告认为，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革命，并促使中共中央提出了"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国民党制度和把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国"的公开的政治目标。然而，该报告在结论中指出：中共没有对国民党关于"成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虚假宣传给以应有的打击。"显然，这是因为中共本身拥护成立这个东方情报机关，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中央会议上所阐述的那样。"[③]

报告所说仇恨共产党的国民党分子造谣惑众，英法政府对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感到恐慌，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认为毛泽东当时就想建立东方情报局这样的国际组织，未免言过其实。1947年底国共内战的局面刚刚开始向有利于共产党方面的转化，毛泽东的那个讲话不过是希望借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东风鼓舞士气而已。不过，一年以后，当国民党败局已定，共产党即将掌握政权的时候，毛泽东确

① Larisa Efimova, "Did the Soviet Union instruct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s to revolt?", pp.468-469.

② *Огнетов И.А.* 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е аспекты советско-вьетнам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1, №8, с.137.

③ 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1948年1月23日，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173, л.4-8, 37。报告关注的是毛泽东在讲话中的这段话："东方各国的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也应当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压迫，以东方十万万以上被压迫人民获得解放为奋斗目标。"见《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155-1156页。《真理报》1948年1月6日第3、4版刊登了这个讲话。

实想起了东方情报局。

二、毛泽东一心要建立东方情报局

1948 年 7 月毛泽东向苏共中央派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科瓦廖夫提出，他希望尽快访问莫斯科，以便向斯大林求教，并协调中苏两党的政策。在所列举的与斯大林会谈的几个问题中，就包括与东方革命力量联合，同东方各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建立关系的问题。① 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斯大林最后还是拒绝了毛泽东访苏的要求。到 1949 年初，斯大林已经改变了过去对中国问题的观望态度。然而，毛泽东严词拒绝由苏联政府单独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立场使斯大林感到，他对中共确实缺乏了解，如果莫斯科想要通过支持中共来达到与未来的中国政权建立友好关系的目的，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共的性质和政治主张。于是，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便被秘密派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②

在 1949 年 2 月 3 日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建立亚洲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当米高扬问到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行动时，毛泽东说，中共还没有明确的意见，但中共赞同与印度支那、暹罗、菲律宾、印尼、缅甸、印度、马来亚和朝鲜共产党建立联系。目前中共与印度支那和朝鲜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与其他共产党联系较少，主要是通过香港的联络员联系，而与日本共产党基本没有联系。毛泽东提出，应该成立像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那样的亚洲局。这个问题可以等到中国局势稳定以后再讨论。在介绍了日本共产党的情况后，毛泽东说，暹罗和印度支那共产党曾表示赞成建立这样的机构。中共主张可以先由几个亚洲国家，如中国、朝鲜、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的共产党代表建立起亚洲国家局。米高扬当即表示，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中央不必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而应该建立以中共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最初可以由三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党。这时毛泽东提问，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是否应该是直接的，是否可以就成立东亚国家局的问题与日本及朝鲜共产党进行联系。米高扬均

①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1948 年 7 月 28 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9，оп.1，д.31，л.41，*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V，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февраль 1950，Книга 1：1946-1948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с.451-452。

② 笔者关于 1947–1948 年苏联对华政策的研究，见《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第 1–13 页。

给予肯定的答复。[①] 虽然毛泽东最初的口气带有试探性，但听了米高扬的答复后就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了。

此后中共与亚洲各国共产党进行联系的情况，目前尚未发现史料记载。不过，是年 5 月初与朝鲜劳动党代表金一的会谈中，毛泽东再次提到情报局的问题。关于这次谈话，朝鲜和中共分别向苏联做了通报。朝鲜通报的内容是：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金日成 3 月访问莫斯科的情况，并特别想知道是否同斯大林谈起这个问题，朝鲜劳动党持何种意见。毛泽东说，中共已经收到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等四国共产党的来信，“他们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至于中共的意见，毛泽东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似乎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认为是建立军事同盟。[②] 中共通报的内容比较简单：毛泽东认为“成立东方情报局的问题还不成熟”，理由是在 12 个东方国家中，中共只与蒙古、泰国、印度支那、菲律宾和朝鲜的共产党保持着联系，而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了解甚少，同日本和印尼甚至没有联系。所以，应该先建立联系，研究情况，尔后再着手成立东方情报局。[③]

从这两个通报的细微差别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建立东方情报局的事情非常关切，但是他不想让斯大林看到他的急迫心情。所谓“为时过早”、“还不成熟”，不过是一种试探性的说法。毕竟，毛泽东那时还在担心斯大林把自己看做是东方的铁托。[④] 他不知道斯大林是不是真心同意成立共产党东方情报局，更不想让斯大林感到中共尚未夺取政权，就要“另起炉灶”。毛泽东的担心果然不错。在 5 月 26 日的回电中，斯大林提醒毛泽东：一旦人民解放军接近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在这些国家，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就会造成一种革命形势。对帝国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将有可能失去这些国家。因此帝国主义者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封锁或与人民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以便将华南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仅如此，

---

①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49 年 2 月 3 日，АПРФ，ф.39，оп.1，д.39，л.47-53。

②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 年 5 月 15 日，АПРФ，ф.3，оп.65，д.9，л.51-55。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 3 月 5 日的会谈情况，见 C.F. Ostermann et al.（eds.），*Stalin and the Cold War，1945-1953:A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Document Reader*，For the Conference “Stalin and the Cold War，1945-1953”，Yale University，23-26 September 1999，pp.434-439。其中没有谈到情报局问题，不过是否在其他秘密会见中谈过，不得而知。

③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49 年 5 月 18 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9-61。

④ 毛泽东后来多次提起斯大林对自己的猜疑，而斯大林也确实有此顾虑。1948 年 12 月，斯大林从中国召回科瓦廖夫。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直接提出了关于中共对“南斯拉夫事件”的立场问题，并要求知晓中国人站在哪一边。*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1-3，с.86.

英国和美国可能会在向南挺进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后方——青岛派部队登陆。这种危险性是相当严重的。可能，英国和美国还会利用其他港口，例如天津的塘沽港，在人民解放军的后方登陆。因此，斯大林建议：中共不要急于准备向南进军到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从南进的解放军主力中挑选两支优秀部队，调往天津和青岛，预防敌人部队登陆。随后斯大林明确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目前不宜建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意见。[①]

斯大林的答复显然令毛泽东感到失望。实际上，毛泽东是真想在中国组建起亚洲革命的大本营。所以，借着刘少奇秘密访苏的机会，毛泽东决定再次试探斯大林的态度。在7月27日两党代表团会谈时，斯大林主动谈到1945年他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失误，并对此表示歉意。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祝愿中共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斯大林还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一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苏联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革命中心现在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因此应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密切的联系。谈到这里，高岗突然言不由衷地问了一句：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加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回答说，这不太合适，因为中国的情况与欧洲完全不同。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但是时机也许还略为早了一些。斯大林又说，苏联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将来可以参加东亚共产党联盟。[②] 看来，斯大林嘴上说把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交付给中共，但实际上并不放心。至于东方情报局，斯大林仍坚持认为不宜过早建立。

不过，对于毛泽东来说，实质的问题已经解决。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对来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说，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首先感兴趣的是亚洲。1949年与斯大林取得共识，那就是中国要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亚洲问题上。[③] 斯大林主动提出要中国领导亚洲各国共产党，这已经够了，东方情报局只是一个形

①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1949年5月26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73-75。

②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9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0–41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51–652页；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12–415页；*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1-3，с.78-79。科瓦廖夫回忆说，情报局的问题是刘少奇提出的，应属记忆有误。

③ 阎明复：《1957年形势与伏罗希洛夫访华》，《百年潮》2009年第2期，第13–17页。

式的问题。有了斯大林的尚方宝剑，毛泽东立即展开了实际行动。

三、从第一学习组到马列学院分院

中共中央机关于1949年3月下旬从西柏坡迁入北平，其首先开展的工作之一就是与亚洲各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并对他们的革命活动给予指导。至少在7月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已经开始筹划组织亚洲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学习中共的革命经验。斯大林提出中苏两党分工合作的建议后，大约7月底，“第一学习组”便在中南海开班授课了，学期一年。统战部秘书长连贯任学习组组长，三室副主任许立和李启新分别出任支部书记和副书记。学习组按国家分为7个小组，即越共组6人（政治局委员黄文欢等），泰共组10人（总书记王斌等），菲共组6人（林青山等），印尼共组2人（中央委员吴英明等），缅共组2人（中央委员丁文等），马共组2人（政治局委员单汝洪等），印共组1人。学习资料以《毛泽东选集》为主，授课的都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及有关部门负责人，有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李涛、李维汉、彭真、张闻天、罗瑞卿、陈伯达、安子文、刘宁一、廖鲁言等。讲课的内容包括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群众运动等理论问题，以及中国革命的经验。[①]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在表面看来斯大林认可了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经验，中国作为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地位就更加突出，中共的积极性也更加高涨。1949年10月7日，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不仅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而且将影响东西方所有人民的命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殖民地及附属国人民的“忠实友人和可靠堡垒”。中国革命的胜利进一步“加速了世界劳动人民最后胜利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来临”。[②]尽管这是一篇祝贺性的社论，但其对中国革命意义的评价已足令中共感到兴奋。接着发生的亚澳工会会议事件，就更加凸显了中共领导革命的经验和地位。

1949年11月16日，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澳会议在北京开幕。作为第一次会议主席，刘少奇在开幕词中大力宣扬中国革命的经验，并总结说，开展武装斗争是中

① 阿成（单汝洪）：《我肩负的使命——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2007年，第11-37页。

② 《人民日报》1949年10月9日，第3版。

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也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不可避免的道路”。[①] 刘少奇的讲话引起了包括苏联代表团在内的很多国家代表团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工会的会议，不是政治会议，况且还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参加，在这个会议上不应该提出武装夺取政权这样的政治口号。经过商议，许多国家代表不同意公开发表刘少奇的讲话。刘少奇对此坚决反对，但还是表示服从这一决定。11 月 18 日中国代表刘宁一在大会的发言，没有再提武装夺取政权的口号。斯大林得知这种情况后，立即给苏联代表团团长索洛维约夫发出一封电报。斯大林指出：索洛维约夫反对发表刘少奇的讲话稿，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苏联领导人认为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是正确和及时的。斯大林命令索洛维约夫马上通知中国代表团，苏联同意中方发表刘少奇的讲话稿，并把莫斯科的这个立场通报给其他国家代表团。斯大林还特意写道：“你们应该立即让毛泽东同志了解我这封电报的全文。”几天后，11 月 21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在大会作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再次谈到争取广大人民的拥护、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工人阶级能够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报告，并在第 1 版全文刊登了刘少奇六天前的开幕词。然而，在会议结束时，分歧再次出现。刘少奇对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起草的决议表示坚决反对，因为该决议有意回避了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在执委会的建议下，刘少奇起草了另一份决议，其中指出工会的基本任务就是组织和支持对反动政府的武装斗争。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和执委会认为刘少奇起草的决议根本行不通，如果这一决议公布，所有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工联组织将无法开展活动，执委会也要从巴黎搬到莫斯科去。最后，中国代表还是对执委会的决议修改稿投了赞成票，尽管他们并不满意决议的内容。12 月 1 日会议闭幕。在关于各国工会报告的决议、告亚洲各国工人和一切劳动者书中，没有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间接地提到学习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民族统一战线、工农联盟、武装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人民武装等。中国代表还同意了在会议开始时曾表示反对的执委会的另一个建议——成立（世界工联）亚洲国家联络局，刘少奇后来解释说，同意这个建议，仅仅是因为执委会承认“联络局的领导角色属于最了解亚洲国家状况的中国同志”。12 月下旬，苏联要求刘少奇提供他在会议上的讲话和所起草的决议的审定译文。1950 年 1 月 4 日，《真理报》刊登了刘少奇在会议上的开幕

① 《人民日报》1949 年 11 月 17 日，第 1 版；11 月 22 日，第 1 版。

词。[1]

其实，这个故事并不表明斯大林认为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具有普遍意义，更不能说明他同意把武装斗争作为世界工联的工作路线。[2] 正如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所说，面对世界工联会议的冲突，斯大林非常为难。实际上，苏联工会代表团关于这次会议的一切原则路线在离开莫斯科之前都是得到了斯大林批准的。然而，毛泽东就要到苏联来访问，斯大林不想令他难堪。后来《真理报》突然刊登刘少奇的讲话，也是对毛泽东做出的一种政治姿态，因为苏联在远东需要一个可靠的盟友。[3] 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就在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 10 月 7 日社论发表前两天，《真理报》也发表了一篇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文章，而该文将中国革命的胜利归结为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列宁、斯大林思想的引导，强调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却没有突出毛泽东以及中共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4] 斯大林同意中国报纸刊登刘少奇的开幕词而对会议决议的争执不予表态，就反映出他的真实用意。至于《真理报》1 月 4 日刊登刘少奇讲话的目的，列多夫斯基所说固然不错，但斯大林这样做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为了让毛泽东心满意足，以争取苏联提出的关于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在下一轮谈判中得以通过。[5] 关于这一点，德国学者海茵茨希的考察很说明问题：那时《真理报》第 1 版有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报道的专门栏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3 个月里，总共只发表了 5 条关于新中国的消息。但是在斯大林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重新签订中苏同盟

---

① 谢巴耶夫与刘少奇的会谈备忘录，1949 年 12 月 25 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43，п.302，д.10，л.18-30；关于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索洛维约夫在北京行为的材料，1950 年 1 月，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7 卷，未刊，第 1615–1620 页；《人民日报》，1949 年 11 月 19 日第 3 版、11 月 22 日第 1–2 版、12 月 2 日第 1–2 版；Правда，4 января 1950 г.，3-й стр.。参见刘宁一：《历史回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 年，第 140–144、374–376 页。亚洲联络局于 1952 年初正式开始工作，其主要任务是：搜集亚洲、澳洲各国情况的资料；加强亚洲、澳洲各国工人运动与世界工会联合会的联系；给予亚洲、澳洲各国工人阶级各种可能的切实援助。1958 年 3 月，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撤销亚洲联络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 138–139 页。

② 1951 年 2 月斯大林对印度共产党代表说，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多大意义。中国的革命道路对中国人来说是一条好的道路，然而却不适合印度，因为印度共产党“没有像中国的游击队那样拥有苏联这样可以依靠的友好的邻国”。斯大林与印共领导人谈话记录，1951 年 2 月 9 日，РГАСПИ（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ф.558，оп.11，д.310，л.85，78-79。

③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82-83.

④ 见 Правда，5 октября 1949г.。

⑤ 有关历史背景，详见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39–55 页；《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史学月刊》2004 年第 8 期，第 57–68 页。

条约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自1950年1月5日起连续5天，该栏目每天都有中国的报道，而且其中4天被列为头条。此外，从1月1日起，《真理报》分18次连载了著名作家西蒙诺夫的长篇文章《战斗的中国》。[①] 斯大林可谓用心良苦。

不管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如何，世界工联会议事件和《真理报》的报道，无疑使中共感到鼓舞。为了加强对亚洲各国共产党的了解和领导，1950年2月，中共中央在统战部下设立了东方各国革命问题研究会，李维汉任书记，廖承志、连贯、李韧梨、刘宁一、廖鲁言、许立、王任叔等七人为委员。[②] 以后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答应苏联的要求，毅然派兵入朝作战，不仅赢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亚洲各国引起重大反响。毛泽东在决定出兵时所说"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显然是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③] 中国在一个亚洲国家的革命面临危机时挺身而出，在实际上承担起领导者的责任，这不能不令人敬佩，也就自然突出了北京的中心地位。毛泽东的想法确与其他中国领导人不同，他的眼光早已注意到中国以外的世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过一句话可谓一语中的：在未来"可能导致中苏分裂甚或走向战争的众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是不甘人下的毛泽东要成为亚洲的列宁"。[④] 此后，中国与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联系迅速扩展，工作也越来越繁重。

在中朝联军顺利推进到三八线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会见了斯大林派来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苏联著名哲学家尤金，详细介绍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及中共与他们的联系。在1950年12月31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告诉尤金，"现在所有亚洲国家的共产党都要求向他们提供建议和帮助"，"北京已经聚集了除印度共产党以外所有亚洲共产党的代表"。毛泽东说，中共应当研究亚洲各党的情况，并给予他们建议和各方面的援助。同时，希望苏共中央能派代表常驻中共中央，以便共同研究和解决亚洲各国共产党的问题。1951年1月3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向尤金详细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刘说，现在亚洲各国共产党在中共

---

① 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511–512页。关于这个统计数字，笔者核对了《真理报》，无误。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2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556页。

④ Nanking (Stuart) to Secretary of State，June 6，1949，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Decimal Files，Document 893.00B/6-649，Microfiche LM69，Reel 19，National Archives. 转引自 Thomas J. Christensen，"Worse Than a Monolith：Disorganization and Rivalry within Asian Communist Alliances and U.S. Containment Challenges，1949-69"，*Asian Security*，Vol. 1，No. 1，2005，p. 80。

中央都有常驻代表，有些党，如缅共和印尼共，互相敌视的两派都有人在中国，他们都是自己主动来的，没有经过中国事先的许可。最近，印共也要求对立的两派都派代表来中国。日本共产党也分裂成两派，有两位政治局委员和五位中央委员组织了新中央，反对以德田秋一和野坂参三为首的原中央。目前德田和野坂在北京，主要是组织与党内反对派的斗争。中共主张维护日共的统一，准备请日本党内反对派也派代表来北京，与德田和野坂共同协商，制定统一的活动方针。刘少奇着重谈了印度共产党目前分裂的严重情况，由于派别斗争，印共党员数量已从战后的 20 万人减少到不足 4 万人。中共认为有必要请印共各方代表来北京或莫斯科，详细讨论并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刘少奇还介绍了越共、缅共和印尼共的情况，并对马共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刘也提到希望苏共中央在北京设立常驻代表处，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共同帮助亚洲各国共产党。为此，中共正在组织一个有 400 多人参加的训练班，为亚洲国家各共产党培养骨干。1 月 4 日周恩来拜访尤金，重点谈了日本和印度的现状问题。①

随着对亚洲各国共产党工作量的增加，中共的机构建置也需要重新调整。考虑到东南亚华人华侨的问题，过去与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联系都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兼管。1950 年 8 月，统战部长李维汉就向中央建议，目前与东方各国兄弟党的关系逐渐增多，最好设立一个国际部来专门管理这方面的工作。② 1951 年 1 月 16 日，刘少奇通知正在莫斯科担任大使的王稼祥：中央已决定你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长，负责与各国兄弟党联络，但具体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与东方各国兄弟党联络并帮助他们。这些工作应是当前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主要工作，配合这些工作的机关，则有工会、妇女、青年团体的国际联络部及外交部。中共中央 1 月 24 日电报通知对外联络部正式成立。2 月 19 日，王稼祥致函刘少奇，提出对中联部组织机构编制的意见及主要干部名单，并建议设立干部学校为各兄弟党训练干部。2 月 22 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回复，同意来函所提人员编制等意见。关于干部学校，刘少奇指出：这个学校是秘密的，不要正式名称，也不要正式的校长，由中央委派专人负责办理，一切日常事务由联络部解决。③

① 尤金给斯大林的报告，1951 年 1 月 20 日，АРАН（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ф.1636，оп.1，д.194，л.9-13，转引自 *Бухерт В.Г.* П.Ф.Юдин о беседах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доклад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В. Сталину и Н.С.Хрущёву，1951-1957 г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2006，№4，с.15-18。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 25–27 页。

②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400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 25–27 页。

过去对各国共产党干部的培训，除中南海的高级干部学习组外，一般干部都是分送到各个学校学习。如1950年1月初在马列学院专门开设了一班，安排越南送来的21名干部学习。马列学院是中共中央1948年7月开办的一所高级党校，刘少奇任院长，陈伯达任副院长，该院的任务“比较有系统地培养具有理论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7月越南又送来280人，刘少奇则要统战部找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或人民大学商量暂时收容学习。[①] 到1952年初，来到中国接受培训的亚洲各党干部越来越多，中共中央便决定在马列学院设第一分院，专门为亚洲共产党培养理论干部，学制三年。第一分院同中南海学习组一样，按国家分为7个班。第一班有越南劳动党的200多人，学委主任是党中央宣传部长黄颂。第二班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共产党的20多人，学委主任是一位澳共政治局委员。第三班有印尼共的20多人，学委主任是政治局委员吴英明（马尤诺）。第四班有马共的20多人，学委主任阿成（陈瑞）。第五班有泰共的50多人，学委主任中央委员张元。第六班有缅共的70多人，学委主任是中央委员杨光。第七班有日共的700多人，学委主任也是一位中央委员。由于日本干部多，后来把一部分人转到了天津分院。第一批学员于1955年底结业。此外，还在其他省市设立了一些分院，学制两年。[②]

据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B.斯捷潘诺夫报告，1952年8月中共决定在原马列学院分院（很可能就是阿成所说的天津分院）的基础上，又建立一所日共特别学校，校长由中共任命的日共前中央委员高仓辉担任，学员约1500人，多数都是从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人中挑选出来的。苏共中央向这所学校派遣了4位教师，分别教授苏共历史、政治经济学和俄语。[③]

无论如何，到1951年初中联部成立的时候，北京已经成为亚洲各国共产党代表集中活动的中心。当时亚洲未执政的各国共产党都有代表常驻北京，他们大都携带家属居住和工作在马列学院第一分院（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所在地）大院内。1957年学习结束后，各党驻京的核心成员住在木樨地中联部东院的第一招待所，其他成员及家属则分散到北京市内中联部的其他招待所，如马共代表团先是集中到宣武区丞相胡同的五所，后转到东城区锣鼓巷的三所。其他各国代表团则分别住在二所、七所、十八所等地。这些代表主要是作为本党与中共的联络员，负责反映情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94–295页；第二册，第266–268页。

② 阿成（单汝洪）：《我肩负的使命》，第43–49、213–214页。

③ 斯捷潘诺夫致赫鲁晓夫函，1953年8月6日，РГАНИ，ф.5，оп.28，д.3，л.94-95。

况、听取指示、研究问题。有的还代表该党出席一些重要会议，如马共政治局委员阿成曾作为正式代表出席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初期还有些代表享有双重身份，直接参与中共的工作，如阿成就曾担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这些代表多是通过交通员与本党保持秘密联系，传递情报、运送经费、传达指示、接送干部，都是交通员的工作。常驻代表的子女，年龄小的在中南海幼儿园或马列一分院托儿所，稍大一些便被送进海淀区的育才学校，与中联部子弟在一起读书。[①] 整个情况，与20—40年代各国共产党派代表常驻共产国际非常相似，这或许就是中共感到困难而要向苏共中央请求帮助的原因。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中国出兵朝鲜以后，斯大林已经把亚洲革命的领导权完全交给了中共。1951年5月斯大林接见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时，主动提出了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主的亚洲社会主义联盟的设想。[②] 毛泽东的愿望终于成为了现实。

四、毛泽东成为亚洲革命的领袖

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共就主动担负起指导和帮助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责任，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尚未取得完全胜利，便已经成为亚洲革命的领袖。中共中央认为，援助亚洲革命，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自身安全的需要，正如刘少奇所说："我们在革命胜利以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所以，"必须给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的人员以热情的招待和兄弟般的帮助，鼓励他们，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细心地答复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不要在他们面前表示冷淡和骄傲。"[③]

最早要求中共提供帮助的是朝鲜劳动党。尽管在苏联的统治下，金日成已经在朝鲜北方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政权，但是为了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他完全依赖苏联和中国的支持，尤其是在采取武力方式解决统一的问题上，金日成迫切需要中国的人力支持。1949年5月和1950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中的朝鲜族官

---

① 李丹慧、沈志华采访阿成及其子女记录，2011年2月24日至3月6日于泰国合艾、勿洞。

②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第40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45页。

兵4万多人成建制地携带全副武装开赴朝鲜，客观上为金日成发动战争创造了先决条件。[①] 不过，斯大林虽然让毛泽东承担起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但朝鲜是一个例外。作为苏联在远东安全的门户，斯大林一直把朝鲜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例如，新中国建立后，朝鲜是否可以与中国建交，何时建交，都要经过斯大林的首肯。[②] 中朝之间是否需要签订一个同盟条约，何时签订，也要听从斯大林的旨意。[③]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几次要求出兵，帮助朝鲜迅速结束战争，而斯大林一直不肯答应，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愿意放弃对朝鲜的主导权。[④] 直到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斯大林才不得不请求中国出兵援朝，而经过几番周折，当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时，处理朝鲜问题的主动权实际上已经开始向中国转移。战争期间，中朝高层在军队指挥权、突破三八线后的战略安排、铁路管理权的归属、停战谈判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和争执，斯大林都支持了中方的主张，固然与毛泽东从社会主义阵营整体利益出发的立场有关，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在战场上中朝一方行动的主导因素实际上在于中国的意向。[⑤] 斯大林去世以后，特别是在1954—1956年，莫斯科进一步认可和尊重中国对朝鲜问题的发言权。苏联领导人不仅劝告朝鲜应多听取中国的意见，甚至在确定对朝政策和处理苏朝关系时，莫斯科也都要与北京进行协商。[⑥]

对于远在东南亚的越南革命，斯大林始终不感兴趣。1950年1月胡志明对莫斯科的访问以及苏越建交，在很大程度上是斯大林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应允的。[⑦]

---

①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三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金东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朝鲜问题新探》，《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03–114页。

②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10月3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58。

③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5月14日，ГР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56；维辛斯基致罗申电，1950年5月16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57。

④ 详见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第51–65页；《朝鲜战争初期苏中朝三角同盟的形成》，《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9年5月第31期，第165–198页；Shen Zhihua，"China and the Dispatch of the Soviet Air Force：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Soviet-Korean Alliance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Korean War"，*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 33，No. 2，April 2010，pp.211-230。

⑤ 详见沈志华：《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3年6月第40期，第55–98页；Shen Zhihua，*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14/15，Winter 2003/Spring 2004。pp.9-24。

⑥ 库兹涅佐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1月13日，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24-46；费德林、波诺马廖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4月，РГАНИ，ф.5，оп.28，д.314，л.33-6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年9月6日，RGANI，f.3，op.14，d.410，l.3，*CWIHP Bulletin*，Issue 16，Fall 2007/Winter 2008，pp.488-489；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记录，1956年9月19日。

⑦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421–426页。

因此，尽管越南很早就提出派阮良朋担任驻苏大使，但苏联方面迟迟没有回复，也没有任命苏联驻越大使。[①] 斯大林甚至批准了苏联外交部这样一个奇怪的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在苏联的利益由中国大使馆代表。[②] 于是，毛泽东欣然担负起领导越南革命的责任。如果不计抗美援朝战争，那么在亚洲各国共产党中，中国指导和帮助最多的应属越南劳动党。早在 1949 年 10 月印度支那共产党（文献中一般称越共）中央便派华侨工作委员会主任李碧山（李班）和阮德瑞来到北京，要求中共给予帮助。[③] 1950 年上半年，中共先后派出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韦国清、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代表和大批军事顾问，前往越南解放区工作，其任务第一步是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帮助解决军火、物资及其他援助问题，并组织交通运输，第二步是帮助越共建立正规军队、加强党和政权的建设，以最终战胜法国帝国主义。[④] 1 月 6 日刘少奇向接近中越边境的林彪部队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越南人民和武装部队必须尽可能地提供便利和帮助，准许他们在需要和困难时进入中国国境躲避或借道通行，他们所需武器、弹药和粮食也应尽力帮助。[⑤] 据不完全统计，至 1951 年 2 月，除广西、云南各提供 1 万支枪和弹药外，中国为越共装备了 9 个师、1 个主力团、2 个炮团及若干地方武装部队。同时派遣大量师、团、营各级指挥员到越共部队做顾问，协助作战指挥，并派遣炮手、爆破手帮助越共训练部队。[⑥] 此外，应越共请求，中国还在几个月内提供了数千吨粮食、几百辆汽车和大量服装、汽油等物资。同时，接受越共部队到中国境内进行培训。[⑦] 所有这些援助，为越共战胜法国军队奠定了基础。1950 年 9 月 16 日越共发动边界战役一举成功，歼灭侵越法军 9 个营共 8000 余人。此后至 1952 年底，越共军队又先后取得了红河中游战役、十八号公路战役、宁平战役、

---

① 参见 *Бухаркин И.В.* Кремль и Хо Ши Мин，1945-1969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3，с.129。

②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1950 年 3 月 17 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56。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 203–204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 356–357、589–590 页；第二册，第 256–257 页；第三册，第 762–769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 271 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 16–17 页；第三册，第 64–67、第 96 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 186–187、249–253 页；第三册，第 157–158、362–363、380–381 页。

西北战役、上宏战役等一系列胜利。[①] 直到1950年代中期，苏联始终把越南问题看做是中国权限范围内的事务。[②]

从目前笔者收集到的苏共中央历史文件看，中共中央联络部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与缅甸共产党的联系。这批俄国档案显示，在1953—1955年期间，缅共与中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中联部不仅掌握了缅共整体情况，负责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而且经常向苏共提供有关缅共的情报或报告。这里包括缅甸共产党的发展及党内教育状况、缅共内部两派的组织和斗争情况、缅共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情况、缅甸土地改革的进展、缅甸人民军的状况以及缅共对苏共处理一些重大问题的立场和态度，等等。[③]

从一些零星的俄国档案还可以看出，1953—1955年，对于日本共产党的问题主要也是通过中共来联系和处理的。如苏共与日共的联系，就需要通过北京中转。[④] 向日共提供的经费，也是由中共来处理的。1955年4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苏共中央："关于给日共经费援助问题的来电收到。我们同意由国际基金中给日共20万美元，给30万美元也可以，请你们决定。如该笔经费你们别无其他方法转递，可交我们设法送去日本。"所谓国际基金，即"罗马尼亚工会委员会帮助左翼工人组织国际工会基金"，其本金由苏联、中国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提供。4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做出决议并通知中共：从国际工会基金拨款25万美元援助日共，款项由中共中央转交。[⑤] 不过，至少从1958年开始，苏共就不再通过中共与日共联系，给日共的经费援助也是由莫斯科直接划拨了。[⑥]

与其他亚洲国家如印度、尼泊尔的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在俄国档案中也有所反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249–253页；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33页。

② 诺维科夫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54年7月29日，АВПРФ，ф.06，оп.13а，п.35，д.156，л.1-2；关于同越南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的指示，1955年4月17日，АВПРФ，ф.022，оп.8，п.117，д.30，л.12-21；苏联外交部致驻华大使电，1955年5月27日，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28；莫洛托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5月28日，АВПРФ，ф.06，оп.14，п.12，д.170，л.12；安东诺夫致佐林电，1955年6月10日，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32。

③ 详见РГАНИ，ф.5，оп.28，д.346，л.1-37；РГАНИ，ф.5，оп.28，д.91，л.1-2，224-289，608-709，720-772，802-806。

④ 格里戈良给赫鲁晓夫的报告，1953年4月7日，РГАНИ，ф.5，оп.28，д.3，л.5-8。

⑤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1955年4月1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116号记录，1955年4月18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⑥ 见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188、237、310号记录，1958年10月23日、1959年9月10日、1960年12月1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映。[①] 由于中共中央联络部的档案没有开放，研究者至今无法了解中共与亚洲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总体的和详细的情况。不过，从目前看到的史料可以判断，自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各国共产党基本都是与中共发生关系并接受其指导和帮助的。

尽管中国实际上领导、支持和援助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但是东方情报局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和苏联对外政策的相应改变。在 1954 年 3 月 2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确定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方针。[②]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在苏共的配合下，说服越南接受了以十七度线为界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建议。[③] 在 7 月 7 日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总结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④] 不仅如此，195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还联合给马来亚共产党提出书面意见，要求马共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⑤] 特别是在 1955 年 4 月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再次重申了一年前中印联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向与会各国首脑保证：愿意与各国建立正常国家关系，中国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也"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⑥]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的问题当然无从提起。

根据苏联情报部门的观察，1950 年代中期，中国对亚洲革命的支持，主要集中在对朝鲜和越南的经济技术援助方面，对于其他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支持有所减弱，而侧重与这些国家的政府接触，支持其反帝和反殖民主义的运动，帮助他们取得经济独立，以削弱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影响，使他们逐渐接近社会主义阵营。正如刘少奇对苏联大使所说，中国现在不宜以亚洲国家领导者的角色露面，以

---

① 如见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103-104；РГАНИ，ф.5，оп.28，д.97，л.7-8，20-25。

②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552–555 页。

③ 详见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曲星：《中越在印度支那战争中策略差异》，见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 年。

④ 毛泽东：《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954 年 7 月 7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34–335 页。

⑤ 参见万家安：《〈苏中与中共联合书面意见〉与马共路线》，《东方文荟》，2006 年 8 月 6 日；《华玲会谈前的〈苏中共联合书面意见〉》，《东方日报》2005 年 10 月 23 日。当时躲避在泰国勿洞的马共总书记并未看到这个文件，但通过来自中国的通讯员了解了文件的内容。见陈平：《我方的历史》，伊恩沃德等整理、翻译，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2004 年，第 318–320、331–332 页。

⑥ 《人民日报》1955 年 4 月 21 日，第 4 版。

免引起人们的疑虑。① 1956年3—4月，共产党情报局宣布解散，为了继续保持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苏共建议成立4个共产党、工人党联络局（委员会），西欧、东欧、亚洲、美洲各一个，亚洲局由中共领导。但毛泽东拒绝了这个提议，理由是建立这样的国际机构不仅会招来西方的反对，还会引起印度等中立国家的担忧。至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毛泽东提出“开会解决问题”。后来，苏共中央接受了中国的意见。到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召开时，中共代表团重新提出“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与苏共产生了分歧。此时，毛泽东考虑的已经不是亚洲革命，而是如何领导世界革命的问题了。②

上述研究告诉人们，东方情报局问题与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一样，都是战后国际格局变化的产物，是那个时代“革命”的副产品；尽管苏联的关注点在欧洲，而斯大林对西方的冷战政策是以战略防守为其重点，但是亚洲革命形势的发展却令一个东方情报局的问题呼之欲出；毛泽东的革命观和领袖欲使他在中国革命尚未完全成功之时便开始考虑亚洲革命的问题，而且把中国革命和亚洲革命看做是两个相互依赖、共同促进的历史现象；斯大林对世界革命的谨慎态度与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主动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照，并在客观上导致亚洲革命的领导权从莫斯科向北京转移；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中国出兵朝鲜，实际上让毛泽东成为了亚洲革命的真正领导者，斯大林甚至不得不舍弃苏联对朝鲜半岛问题的主导权；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中苏共同采取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东方情报局作为亚洲革命指挥中心的问题自然不便再提，但中国实际上仍然保持和控制着与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联系，一旦“革命高潮”出现，这个幽灵还会出现在东方大地。

因此，尽管目前有关中共与亚洲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史料还是非常零散的——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变，有待于中共中央联络部档案的开放——但东方情报局的问题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革命和亚洲冷战起源的新视角，则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值得人们继续关注和讨论。

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

① 图加里诺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9月5日，ЦХСД，ф.5，оп.28，д.408，р.5175，л.107-117。

②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82–109页；Shen Zhihua, Yafeng Xia，“Hidden Currents during the Honeymoon：Mao Zedong，Khrushchev and the Moscow Conference of 1957”，*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11，No.4，Fall 2009，pp.74-117。1961年7月，邓小平与马共总书记陈平会谈时，鼓动他重新拿起武器，开展军事斗争，并答应中国将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见陈平：《我方的历史》，第385–390页。

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问题

——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

对中苏同盟建立和朝鲜战争爆发的研究，以及对它们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是笔者数年来关注的重点，且小有收获。[①] 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二者与对日和约的问题又有着紧密的联系。

对日和约问题是亚洲冷战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它不仅涉及美国、苏联、中国等国家战后对日政策的变化及其与日本的关系，而且标志着东亚冷战格局的最后形成。从事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各国学者历来都很重视对日和约问题，不过，研究的角度大多是从美国、英国、日本等西方同盟国政策变化及政治思考出发的。[②] 从铁幕的另一边——社会主义阵营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原因在于缺乏相应的史料。冷战结束后，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以及部分中国档案文献的开放和公布，关于苏联、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的政策已经渐渐露出全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开始

---

① 笔者对中苏同盟和朝鲜战争的专门研究，参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年。

② 就笔者所见，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如：Michael Yoshitsu，*Japan and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Settlemen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Michael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985；Howard Schonberger，"Peacemaking in Asia：the United States，Great Britain，and the Japanese Decision to Recognize Nationalist China，1951-1952"，*Diplomatic History*，Vol.10，No.1，Winter 1986；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张淑雅：《杜勒斯与对日媾和中的台湾问题（1950–1952）》，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三届讨论会论文，1996 年 3 月；徐友珍：《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世界历史》2004 年第 2 期，以及崔丕依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撰写的论文《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感谢崔丕教授在论文发表前即提供给笔者参考。

涌现。[①]

众所周知，对日媾和从最初提出的设想到最后形成的结果，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程序上讲，原先确定的是由美、苏、英、中等国外长会议协商，并遵循大国一致的原则，后来实行的是在美国控制下的远东委员会商议，遵循的是多数通过的原则。从方式上讲，原先确定的是全面媾和，后来实现的是片面媾和。从内容上讲，原先确定的是把日本作为战败国进行管制和剥夺（解除武装、赔偿等），和约签订后撤走占领军；后来实际上是把日本作为新的盟国看待（重新武装、免除赔偿等），和约签订后美军继续留驻日本。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当然是冷战态势的形成，但具体而言，是冷战中的哪些因素和事件促成了对日媾和有违初衷的最终结局？这种结局反过来又对亚洲冷战产生了什么影响？

总之，中苏同盟的建立、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对日和约的签订，这三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构筑了 1950 年代初期亚洲复杂的政治局面，并成为东亚冷战格局最终形成的三部曲。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最近解密的俄国和中国档案文献，以对日媾和过程的变化为线索，勾勒出中苏同盟、朝鲜战争、对日和约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决定性影响。

一、中苏同盟条约与美国对日媾和的决策

以往研究者大都注意到，冷战状态的形成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改变了对日和约方针。[②] 这个结论无疑是成立的，但进一步分析还应该看到，导致美国主张对日尽早媾和，单独媾和，乃至改变东亚政策的首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

① 这方面的研究自然是从俄国学者开始的：*Славинский Б.Н.* Сан-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1951г. по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с Япон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1；*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 Россия-Япония，Обречены на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о，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ипломата и заметки историка，Москва：ПИМ，1996；*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процесс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и КНР с Японией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提交“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1997 年）论文。使用俄国档案材料参与讨论的还有：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张盛发：《50 年代初期中苏共同抵制对日媾和与苏联拒签旧金山和约》，《世界历史》2001 年第 2 期。

② 崔丕：《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与千岛群岛归属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 年第 4 期，第 197 页；刘维开：《蒋中正与中日和约的签订》，提交“1950 年代的中国”学术讨论会（上海，2004 年）论文，第 1–2 页；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 109 页。

太平洋战争以日本投降告终后，对日和约的问题便提到了交战双方面前。日本政府早在 1945 年 11 月就开始准备媾和，并经反复研究于 1946 年 5 月提出了有关文件，设定于 1947 年夏左右缔结和约。[①] 然而，媾和的方式和条件，毕竟不是以战败国的愿望为转移的。[②]

到 1947 年夏天，冷战态势在欧洲已经出现。[③] 不过，对于亚洲，美苏双方都采取了稳定局面的方针。因此，美国虽然确定了在欧洲对苏遏制政策，但在对日和约问题上，仍坚持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为宗旨。这就是美国国务院 1947 年 3 月完成的对日和约"博顿草案"的出发点。[④] 在此基础上，7 月 11 日美国向远东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召开对日媾和预备会议的建议，开会时间暂定为 8 月 19 日，关于会议的表决程序，美国倾向采取三分之二多数表决制。[⑤] 7 月 22 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反对美国的建议，认为其程序违背了以前盟国所通过的决议。莫斯科重申了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在战后日本问题上的特殊利益。[⑥] 美苏关于对日和约的分歧首先在程序问题上反映出来。不过，预备会议推迟决不仅仅是因为苏联反对。除了遭到外部的反对（包括英国和中国），更主要的是美国内部开始重新考虑对日媾和的方针了。

一方面由于冷战在欧洲的兴起，美苏关系开始进入敌对状态，另一方面，马歇尔在华调停国共内战失败，使美国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信心，特别是让中国充当亚洲警察的期望彻底落空。于是，回国出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再把分裂而动乱的中国看作美国在远东对付苏联的帮手，而开始把眼光转向日本。[⑦] 由此，博顿草案遭到美国军方和"遏制"理论创立人凯南的强烈反对。此后一段时

① 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 64 页。

② 1945 年 9 月，美国政府发表的《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提出了三大原则：日本非军事化、民主化、用发展和平经济的办法保证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进程。见崔丕：《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未刊。

③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第 172–187 页。

④ 关于博顿草案，详见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p.98-99；刘同舜、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331–333 页。

⑤ 详见刘同舜、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六分册，第 337–338 页。

⑥ *Тихвинский*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c.6. 1947 年 7 月 22 日苏联备忘录的英文本见香港大学所存缩微胶卷：XG0181，MF2527243-0526，Main Library，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中文本见人民出版社辑：《对日和约问题史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年，第 39–40 页。

⑦ 美国学者梁思文对此有专门研究，见 Steven Levine，"A New Look at American Media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Marshall Mission in Manchuria"，*Diplomatic History*，Vol.3，No.2，Fall 1979，pp.349-375。

间，在凯南的主持下，美国制定了一个全新的媾和设想，其基点已完全从“大国合作”转为“美苏对抗”。1948 年 3 月 25 日，凯南提出了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其中包括美军在和约后继续留驻日本，坚持在美国的监督下重新武装日本等新方针。[①] 在凯南的推动下，国务院倾向于认为，美国对日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将稳定的日本纳入亲美的太平洋地区经济体系中去，成为追随美国政策的值得信赖的盟国”，从而主张推迟媾和，缔结和约的性质亦非惩罚性的，且不必非有苏联和中国参加。这些内容被纳入了经杜鲁门总统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13/2 号文件（1948 年 10 月 9 日），成为美国对日媾和的基本国策。[②]

此期，苏联始终坚持在 1945 年达成的协议框架内谈论对日和约的问题。为对抗美国，斯大林不得不向中国国民党政府表示友好。在 1947 年 11 月伦敦外长会议上，苏联建议于翌年 1 月在中国召开专门的外长会议，讨论起草对日和约的问题。[③] 1948 年 6 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国民党政府透露，将与中国代表进行谈判，其目的在于以中苏条约为基础，努力改善双方关系。如中国政府对此问题有意，苏方愿采取一系列经济、政治方面的友好政策，包括“与中国共同研讨对日政策”。[④] 在 1949 年 5 月 23 日举行的巴黎外长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又提出了关于确定召开有中国参加的、讨论对日和约条款的会议日期的建议。6 月 20 日，苏联再次重复了这个建议。美国对这些建议却根本不予理睬。[⑤]

就在对日媾和问题因美苏意见对立而陷入僵局的时候，中国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到 1949 年夏天，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掌握中国政权已是大势所趋。美国的亚洲政策一时间迷失了方向，在对日和约问题上也表现出犹豫不决，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分歧、争论充斥白宫和五角大楼，1949 年 12 月形成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48 号文件反映了这种状况。所谓“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方针，以及“在西方实行战略进攻，在东方实行战略防御”的基本概念，不过是体现了华盛顿决策者

① 参见刘同舜、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六分册，第 353–361 页。

② 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13/2 号文件的形成，崔丕有专门的研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13/2 号文件形成探微》，《历史研究》1992 年第 3 期。另参见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 87–91 页。

③ 见 *Тихвинский*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с.6。

④ 国防部第二厅致外交部情报抄件（1948 年 6 月），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库，亚西司，112.1/002，改善中苏邦交，第 60–63 页。

⑤ 见 *Тихвинский*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с.6。

面对其亚洲政策的失败，既要寻找借口，又要进行补救的复杂心态。[①] 看似形成统一意见的美国亚洲新方针，并没有消除决策层内部在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方面的对立主张。

分歧主要来自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关于对华政策，五角大楼坚持认为必须保卫台湾这一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不能让共产党政权占为己有；国务院则提出核心的问题是“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如果能以台湾换取中国新政权脱离莫斯科的控制，美国在亚洲岂非取得了比直接控制台湾更为明显的战略优势？[②] 关于对日政策，军方人士认为既然美国要在远东对苏联保持战略守势，就应该把日本作为对抗苏联的缓冲国，推进日本经济复兴，减缓赔偿要求，允许日本拥有最低限度的军备，同时在和约中规定美国有权占领冲绳、琉球各岛和横须贺的海空军基地。为了约束苏联和中国的行动自由，必须由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交战国签署对日和约，实现全面媾和。在所有这些条件尚未成熟之前，应推迟媾和进程，以免“减弱美国在日本的势力”，并因此建议杜鲁门暂时不再授权讨论和约问题。外交人员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主张早日媾和，以尽快结束对日占领，从而平息“日本人与日俱增的不满和反抗”，保证日本在美苏对抗中与美国结成可靠的联盟。为了满足军方的要求，国务院工作小组在 1949 年 10 月提交的全面和约草案中，提出了美国继续对包括部分琉球群岛在内的一系列岛屿的托管权，以及通过一个预先约定的日美安全条约，以保证美军在占领终止后仍然留在日本。同时，为了引诱中国和苏联接受这个条约，准备拿台湾和南库页岛作为代价。如果苏联和中国仍然反对，美英则应该单独对日媾和。在双方激烈的争论中，杜鲁门表示倾向国务院的意见，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华盛顿的代表也极力支持国务院的方案，只是强调美国必须控制台湾。但由于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在考虑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不赞成片面媾和，更反对美国独占日本，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坚持认为对日媾和的时机尚未成熟。[③]

这里有一个逻辑的链条把对日和约问题、台湾问题和中苏关系的状况连接在一

① 关于对美国 NSC48/1 和 48/2 号文件具体内容的转述，见刘同舜、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六分册，第 371–375 页；崔丕：《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未刊。

② 笔者在这方面的详细分析见《50 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酝酿和武装侵占台湾的决策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5 期。

③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p.165-213；崔丕：《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与千岛群岛归属问题》，第 197 页；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 106–107 页。库页岛又称萨哈林岛（俄国）、桦太岛（日本）。

起。从上述争论的内容分析，如果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成功，苏联的势力就不会很快扩展到亚洲，控制台湾的问题也将继续排除在美国远东战略防御的考虑之外；新中国在美苏冷战中保持中立态度，肯定会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和承认，把中国（甚至苏联）排除在外的单独媾和的方针就更加难以推行；由于亚洲局势的相对稳定，美国独占日本和把日本纳入反共同盟的做法就会遭到包括日本在内的更多国家的反对，按照美国军方意愿实现对日和约的可能性也就相对减弱。果真如此，美国决策层内部关于对日媾和方针乃至整个亚洲政策的争论无疑还会继续下去。然而，苏联对美国的这一策略早有警惕。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苏联就得到消息说，美国曾经有一个“把中共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计划，目前美国间谍机构在华活动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此后，莫斯科又不断收到类似的情报。[①]这些消息对斯大林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刺激。特别是在中苏谈判期间，杜鲁门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台湾问题的声明及艾奇逊指责苏联欺负中国的公开讲演传到了莫斯科，斯大林更加焦急，他立即向毛泽东转交了艾奇逊讲话的全文，希望中苏共同对此做出反应，并要求中国政府首先发表声明。[②]至于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尚不得而知，但斯大林对此大为不满并指责毛泽东打乱了原定步骤，却充分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③]唯其如此，斯大林才一再对中国做出重大让步。中苏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两个月后缔结了同盟条约。[④]中苏同盟把尚未形成的美日同盟看作其在远东的未来对手，条约中还特别提到双方保证要“经过彼此同意”，“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其结果是为美国内部的和解创造了条件。[⑤]国务院在台湾问题上受到极大压力，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时，对日和约问题更加显得紧迫，也促成单独媾和及早媾和的观点占了上风。

就在中苏同盟条约公布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外交发言人宣布，“必须

①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42，п.288，д.19，л.99-102；оп.43，п.315，д.142，л.53-54，59.

②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9，л.1-7.

③ 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54–456页。

④ 谈判过程详见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⑤ 条约全文见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50–1953年）》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第9–11页。

采取果断行动与日本单独签订和约而无须俄国参加”。[①] 3月23日，陆军部副部长沃里斯也向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备忘录，主张在媾和后恢复日本在外交、内政两方面的主权，但在军事上仍保留盟军总司令部，占领军亦留驻日本，保持半占领状态，以备不时之需。[②] 此时，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关于日本媾和问题的意见正渐渐趋向一致，双方在几个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已经基本解决，特别是在占领期结束后允许日本恢复有限武装和少量武器生产，保持美国在日本的基地及驻军权利等方面，但在媾和的时机和具体条件等问题上还有分歧。[③] 在沟通和弥合双方意见的过程中，新任国务院高级顾问并负责主持对日媾和事宜的杜勒斯以及主政东京的麦克阿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共同主张是在中苏结盟的背景下，把美国对日政策与对台政策捆绑在一起。

4月7日杜勒斯提出，安全问题和基地问题可以通过美日双边协定解决，而核心问题是尽快结束占领，给日本主权，否则，如果日本反美，那么不论美国在日本有多少驻兵和基地，都将失去其作用。此外，如果美国、日本和太平洋友好国家组成某种共同防御体系，对日和约无论是否得到苏联的支持都不会有问题。[④] 5月18日杜勒斯再次提出，为了保证亚洲不落入共产党之手，当务之急就是“中立台湾”和让日本独立。[⑤] 受到杜勒斯的影响和鼓励，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在5月31日关于东亚新政策的报告中认为，中苏条约的签订证明美国1月份宣布的台湾政策已经失败，现在必须采取新政策，即美国用武力保护台湾，使台湾中立化。具体步骤是，首先让蒋介石“退休”，然后对台湾实行托管，继而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与此相配合，就要增加对韩国和东南亚的援助，并加速对日媾和。腊斯克特别强调，如果美国要把日本作为未来的盟友，现在就必须立即表明态度。[⑥] 到6月初，国务院关于对日和约的构想已经进一步深化，甚至提出了具体的日程和步骤。但军方坚持己见，他们唯一的担心是和约签订将导致美国在日本军事力量的减弱。于是，麦

---

① *Кошкин А.* Вступление СССР в войну с Японией и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2000，№12，с.57.

② 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107页。

③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p.247-249.

④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下简称FRUS)*，1950，Vol.6，*Far East and Pacific*，Washington：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p.1161-1166.

⑤ *FRUS*，1950，Vol.1，*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Foreign Economic Policy*，Washington：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7，pp.314-316。

⑥ *FRUS*，1950，Vol.1，pp.347-349；Rusk's report of May 31，1950，DOS，RG 59，in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p.261-263.

克阿瑟的意见便有了重要地位——国务院和军方同时决定访问东京。[①]

在台湾问题上以强硬立场著称的麦克阿瑟，此时对日本问题的态度也开始趋向强硬。过去他宣称任何保持基地的动作都将引发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现在则认为必须把日本同意“保留美军基地”作为结束占领的条件。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开始对日本共产党采取压制政策，6 月 6 日命令吉田茂首相整肃日共执行委员会及《赤旗报》员工，利用原为镇压极右派军国主义制定的法律，禁止共产党领袖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为了争取这位将军的支持，杜勒斯在启程访问东京之前，经艾奇逊同意，决定与国防部和麦克阿瑟做一笔交易，即以美国对台湾的防御重新作出承诺，换取他们支持加快对日媾和的步伐。[②]

6 月 17 日，杜勒斯率领的国务院代表团与由国防部长约翰逊、参联会主席布雷德利率领的国防部代表团同时到达东京。因受到华盛顿重视而颇为得意的麦克阿瑟当然知道双方的目的：一个为了日本，一个为了台湾。为此，麦克阿瑟准备了两个长篇备忘录，其核心是，如果美国要在东亚地区夺得主动，就必须缔结对日和约并保证台湾不受到侵犯，二者不可缺一并互为补充。[③] 在访问的最后几天，两个代表团与麦克阿瑟数度会谈。最后经麦克阿瑟从中斡旋，双方达成妥协。麦克阿瑟 6 月 23 日的备忘录反映了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和约签订后，美军继续留驻日本，为防卫作战之需要，整个日本领域作为潜在的基地，给予美国以无限制行使防卫权力的自由。此外，承认日本虽然在宪法中规定放弃战争，但在“受到侵略攻击时”拥有自卫权。在签订和约的同时，缔结日美安全协定，日本给美国以驻军及保留军事基地的权利。[④] 布雷德利后来回忆说：我们的会谈是富有成果的。麦克阿瑟的备忘录像一座桥梁，最终将政府各部门联结在一起，一致同意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和平条约。备忘录中最重要的是保证了美国在日本保持军队和拥有基地的权利，有了这样一种明确的前提，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反对尽早达成对日和约的气氛很快就消失了。[⑤]

此外，日本的态度对于东京谈判的结果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吉田茂政府担心美

---

① 详见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 108 页；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255。

② *FRUS*，1950，Vol.6，pp.1205-1207、1221-1223；Haruki Wada，“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1945-1953：In the Light of New Russian Archival Documents”，for Conference on the Cold War in Asia，Hong Kong，January 1996，p.11.

③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p.274-276.

④ *FRUS*，1950，Vol.6，pp.1227-1228.

⑤ 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 年，第 686 页。

国的内部争论延误媾和进程，反复表示在和约签订后日本仍将长期依赖美国的保护，并警告说，苏联有可能赶在美国之前提出令日本人感动的和约条件——放弃对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占领。日本政府6月1日发表白皮书，宣布愿意同任何承认其独立的国家签订和约。①

无论如何应该看到，在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由于受到中苏同盟条约的刺激，华盛顿决策层已经消除了在台湾问题和日本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尽管尚未形成决策，但美国对台政策及对日媾和方针的前景已经明朗化，所需要的只是实现这些新构想的机会和条件。② 这种状况表明，东亚冷战的帷幕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已经拉开。

二、朝鲜战局变化与美苏媾和方针的对抗

就在约翰逊和布雷德利返回华盛顿的途中，朝鲜战争爆发了。朝鲜人民军大举越过三八线的行动不仅促使美国全面改变了其亚洲政策，而且扫除了美国决策层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最后障碍。

战争犹如一剂强心针，催动了白宫的全身细胞。布雷德利于6月26日向杜鲁门提出："韩国、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和东南亚，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它们的地位"相互依赖"，美国"急需一个互相配合的全面的远东政策"。③ 在东亚，关于韩国问题，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海空军和陆军开始陆续参战。关于台湾问题，6月27日杜鲁门一纸宣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借机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日本问题也凸现出来。战争使日本的地位骤然上升，美国在远东军事力量不足的矛盾使得重新武装日本显得更加急迫。7月8日，麦克阿瑟授权日本政府组建7.5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并增加了8000名海上保安队成员。几天后，远东盟军总司令部的专门委员会又提出计划，要求把警察

①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257-259.

② 麦克·沙勒的研究认为，约翰逊和布雷德利没有接受麦克阿瑟的意见，他们在离开东京时仍反对和约（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274、278）。笔者很难接受这个结论。从东京谈判的结果看，军方的要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他们没有理由固执己见。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恐怕也只是对日媾和的具体程序和时机了。

③ CCS 381, Formosa (11-8-48), sec.3, JCS Records, RG 218, in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283-284.

预备队尽快编成4个步兵师，并装备美制武器。[①] 杜勒斯回国不久就催促国务院加紧和约的准备工作。他在7月19日建议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对日和约变得更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并主张从"更深远的角度"来考虑媾和问题，第二天又强调了早日媾和与重新武装日本的不可分割性。[②] 此时，美国军人同外交官的立场已经完全取得一致。8月22日，布雷德利通知约翰逊，目前的环境使得缔结对日和约有了正当理由，如果美国在日本的驻军和基地得以保留，并使日本承诺重建武装，军方不再反对批准对日和约。随后几个星期，国务院和国防部不断商谈，对和约的先决条件达成协议，随即签署了联合备忘录，并于9月7日递交总统。就程序而言，备忘录已经撇开苏联，只是通过外交途径与远东委员会中友好国家进行秘密的预备性谈判。就内容来看，备忘录强调美国应享有外国军队在日本驻留的批准权和指挥权，不否定日本拥有自卫权和保持必要规模军队的权利。该备忘录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0/1号文件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只待朝鲜战场处于有利情况便可实施媾和。[③]

9月15日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对日媾和的问题立刻在华盛顿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一番秘密的串联和准备，10月26日晚杜勒斯约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向他转交了被称为"对日和约七原则"的美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包括：缔约国为"任何或一切愿意在所建议的和可能获得协议的基础上媾和的对日作战国家"；日本承认朝鲜独立，同意联合国和美国托管琉球和小笠原群岛，接受英、苏、中、美四国将来所作关于台湾、澎湖列岛、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的地位的决定（在条约生效后一年内做出决定，否则由联合国大会决定）；日本有责任与占领军合作以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缔约各方在原则上放弃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④] 在会谈中，杜勒斯强调了三点：如果苏联参加缔结对日和约，依据和约，日本将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割让给苏联；即使远东委员会成员国中某国不参加缔结对日和约，美国也要进行对日媾和谈判；台湾地位问题暂时冻结，建议由联合国重新加以考虑。马立克对美国的媾和方案本身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表示反对冻结台湾地位，更不同意将这一问题交付联合国，而是主张恪

① 刘同舜、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六分册，第385页；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93页。

② *FRUS*, 1950, Vol.6, pp.1243、1247-1248.

③ *FRUS*, 1950, Vol.6, pp. 1278-1282、1293-1296、1297-1304.

④ *Тихвинский* Россия-Япония, c.43. 另见《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6日的报道。

守有关的战时国际协议。马立克还强调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①]

此时的朝鲜局势极其微妙，在斯大林和金日成的请求和催促下，毛泽东毅然决定派兵参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求胜心切的美国人只管埋头北进，直到10月底与中国军队交火后仍然不相信中国已经介入战争，而躲在幕后的斯大林却是心中暗喜。对于美国提出的媾和建议，莫斯科没有急于答复，一方面是等待战局出现明显的转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中国取得一致意见。毛泽东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决定派兵入朝作战，挽救朝鲜及社会主义阵营于危难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的疑虑。[②]中苏的同盟关系此时显得尤为紧密，开放不久的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保存了此期中苏双方关于对日和约问题往来的大量文件，可以证实苏联驻华使馆一秘贾丕才在回忆录中所说：作为盟国，当时中苏就与对日媾和有关的问题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合作。[③]例如，1950年3月麦克阿瑟宣布提前释放正在日本执刑的主要战犯，苏联在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前通知了中国。周恩来于5月12日指示外交部有关部门起草一份声明表示支持，并于苏联声明发表的第二天见报。[④]又如同年9月1日，中国人向莫斯科通报了关于麦克阿瑟同蒋介石在台湾谈判的可靠情报。据情报说，美蒋就台湾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应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而接受盟军司令部指挥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岛上将长期驻扎美军，由第七舰队负责封锁台湾海峡。[⑤]这次美国正式提出对日和约建议，苏联自然要与中国进行协商。美苏代表会谈后，苏联即以备忘录的形式向中国通报了美国建议的内容，同时送来苏联的答复草案。在苏联备忘录中译本文件上有周恩来的批示：“下夜罗申送来此件，系美政府交与苏联的。苏联尚未置答。请即加以研究并提出意见。”苏联的备忘录措辞委婉，口气缓和，没有直接针对美国的建议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只是提出了6个问题“希望得到解释”：美国是否有意单独签约；应如何理解重提业

① *FRUS*, 1950，Vol.6，pp.1332-1336；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p.108；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七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6–77页。

② 对于这一点，中国领导人是深有体会的。毛泽东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见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1956年3月31日，ЦХСД（现代史料保管中心），ф.5，оп.30，д.163，л.88-89。周恩来也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2页。

③ *Капица М.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Москва：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1996，с.123-124.

④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22-01，第1–8页。参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⑤ *Гончаров С.Н. и т.д. (сост.)*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январь 1949-октябрь 1950 гг.），未刊，с.49-50。

已确定其归属的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地位问题；对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进行托管的根据何在；是否考虑规定占领军撤出日本领土的确定日期；"共同责任"是否意味着在日本建立武装部队及保留美军基地；是否考虑保证日本经济发展的必要权利。备忘录最后提出，"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将采取何种方法以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问题的观点。"[①] 对于苏联的答复，中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②]

11 月 20 日，马立克就是本着上述态度去会见杜勒斯的。按照美国人的记述，马立克一开始就"谈笑风生，讲叙苏美两国间的友谊和理解"，与上次会谈公事公办的姿态不同，这次苏联人似乎是要营造一种友好气氛。让译员照本宣科地宣读了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后，马立克也只是重复地提出问题，而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主动的精神。例如当马立克问到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政府参加对日和约讨论持何立场时，杜勒斯回答说，"迄今的会谈是外交会谈，因此美国是与本国承认的政府——国民党政府举行讨论的。"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本来是很明确的，但马立克对此未作反应，而是转移了话题。以致杜勒斯在会晤后感到，在中国参加对日和约的代表权问题上，不必过于顾忌苏联。[③] 苏联并不是不了解美国的意图，也不是因为处于被动地位而没有自己的主张。按照贾丕才的说法，莫斯科是有意对媾和问题不发表具体意见。[④] 究其原因，显然与当时朝鲜战局的变化有关。斯大林不想过早地与美国摊牌，在马立克微笑的背后，莫斯科正在等待朝鲜战场传来进一步令人振奋的报告。

毛泽东此时对战争的进程显得把握十足，他在 12 月 3 日会见金日成时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⑤] 这与斯大林的主张不谋而合。12 月 4 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在与中国大使王稼祥谈话时强调，中国人必须最大限度地利

①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19-01，第 1–10 页。

② 除了翻译的措辞，后来公开发表的文件与中国当时得到的草案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参见《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26 日。

③ *FRUS*, 1950, Vol.6, pp.1352-13543。

④ *Капица*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c.124.

⑤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35 页。

用现在的机会，并建议中国军队“趁热打铁”，越过三八线，继续乘胜追击。[1] 第二天，周恩来就美苏上述两项备忘录发表了题为《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全面地阐述对日媾和问题的观点和立场。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关于台湾、澎湖列岛、萨哈林岛南部及千岛群岛的归属已经分别由《开罗宣言》和雅尔塔协定予以解决，“完全没有重新讨论的理由”。声明还谴责美国不愿从日本撤军，“并且利用日本作为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基地”，以及公开武装日本和企图使日本成为美国的殖民地。[2] 这些意见自然是反映了苏联的立场，只是莫斯科不愿直接出面而已。

中国当然也考虑到利用朝鲜战争促进台湾和对日和约问题的解决。就在国际社会要求停战的一片呼吁声中，12 月 7 日北京时间 3 时，周恩来召见罗申并告知：近来联合国及印度、英国等国不断问中国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愿处于不利地位，并意在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同时又表现出积极性，打算提出以下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周恩来表示希望立刻得到苏联政府的看法。在当天的回电中，莫斯科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停战条件，而且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又不让中国马上就宣布这些条件，而是要等到解放汉城之后，再“亮出自己的全部底牌”。[3]

看来，斯大林一定要等到完全掌握了朝鲜战场的主动权之后，才肯认真与美国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因此，对于 12 月 27 日美国国务院针对 11 月 20 日苏联备忘录给予的答复，莫斯科只是转抄了一份给北京，[4] 而没有做出任何公开的反应。1950 年 11-12 月志愿军发动的第二战役把美国人打得溃不成军，五角大楼和白宫都沉浸

①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以下简称《朝鲜战争文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48），2003 年 7 月，第 635–636 页。

②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50–195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年，第 354–357 页。

③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文件》，第 639、641 页。

④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86-02，第 13–20 页。

在日益阴郁的气氛中，甚至讨论了全面撤退的问题。[①] 随后志愿军便打过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此时，联合国关于停战谈判的呼声更加强烈，而且提出的条件也更加有利于中国。如果中国（得到苏联的同意后）接受 1 月 13 日联合国提案，进行停战谈判，不仅能够稳定住朝鲜战场的有利局面，也将对日本问题的处理产生极大影响。然而，在台前的中国和在幕后的苏联都没有抓住这次稍纵即逝的良机。当 1 月 17 日中国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不久，美军即发起全面反攻，已是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不得不败退三八线以北。[②] 朝鲜战局再次出现逆转，对日媾和问题的解决自然也就朝着与中苏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

战场上的优势地位使美国在媾和问题上的态度强硬起来。如 3 月 12 日英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指出：根据雅尔塔协定，“日本应当将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让给苏联”。华盛顿的回答是：“美国认为准确地界定千岛群岛的边界应当是日本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的双边协议的议题或者应当由国际法庭来作出法律裁定。”[③] 在 3 月 30 日美国再次递交给苏联大使馆的照书中，不仅重复了有关托管日本几个岛屿及承认日本享有单独或集体自卫权等条款，而且强调，不参加本条约的国家，将不给予任何法律基础上的权力和利益。特别是关于领土问题的条款，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对《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的规定，只提日本放弃这些领土，但未提其归属。尽管对于雅尔塔协议所规定给予苏联的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表面上仍采取承认的立场，但条件是“这一规定只有在苏联签订和批准条约的情况下才会生效”。[④] 有学者认为，这表明美国曾努力促使苏联参加对日和约的谈判进程，因为这符合西方国家在远东地区的长远利益。[⑤] 这种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还在递交照会之前，杜勒斯在 3 月 21 日国务院讨论和约时就指出：“如果苏联拒绝条约的规定，我们考虑从和约中完全删除有关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条款。”对此，4 月 24 日杜勒斯与蒋介石的驻美大使顾维钧谈话时说得更加透彻：条约草案中关于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条款“套用了雅尔塔

①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年，第 333 页；*FRUS*, 1950, Vol.7, *Korea*, Washington :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p.1324-1328。

②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 342–368 页。

③ *Кошкин* Вступление СССР，с.58.

④ *FRUS*, 1951, Vol.6, *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7，p.908；*Славинский* Сан-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84。参见人民出版社辑：《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 80–86 页。

⑤ *Славинский* Сан-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89.

协定的字句”，是因为美国“知道苏联不会参加对日媾和条约，所以不想改变雅尔塔协定的原文，给苏联以拒绝参加对日媾和条约的借口”。[①] 由此看出，美国实际上知道苏联不愿就范，并且希望如此。

苏联确实不愿意在这种状况下签署对日和约。朝鲜战局的变化使斯大林颇为失望，随即对美国的媾和方案采取了反对和阻挠的明确立场。不过，他此时指望能够支持这种立场的，只有日共和中共。

首先，斯大林要求日本共产党坚决抵制美国在日本的占领和驻军政策，并接受暴力革命的路线。1951 年 4 月，因受迫害而移居中国的德田秋一和野板参三等日共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在斯大林的帮助和催促下，德田秋一等人接受了莫斯科的主张，检讨了过去的看法，承认“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日本的解放和民主改革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并制定了新的革命纲领。[②] 6 月 13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议，为日共的新计划提供 10 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并委托苏联情报委员会转交日本共产党。[③]

同时，苏联开始与中国磋商如何抵制美国的媾和方案。1951 年 5 月 6 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明确表示了苏联对媾和问题的立场：指责美国单独准备和约草案的做法，要求条约草案中应明确中国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反对把琉球群岛及日本其他岛屿交给美国托管，必须限制日本武装力量的规模。最后，苏联政府建议在 7-8 月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起草对日和约，其内容应规定：日本不得结盟以反对曾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和约签订后所有占领军均应在一年以内撤出日本领土；任何国家均不得在日本拥有军队和军事基地等。毛泽东当天回电表示完全赞同。[④] 5 月 7 日，苏联外交部将“苏联关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意见书”交给美国驻苏大使柯克。5 月 22 日，周恩来正式向罗申递交了一份照会，表示中苏意见“完全符合”，中国政府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对日和约的具体建议。[⑤] 5 月 24 日苏联全文发表

① *FRUS*, 1951, Vol.6, pp.942-943；崔丕：《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与千岛群岛归属问题》，第 199 页。

② Haruki Wada, “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p.12。关于斯大林与日共领导人会面的情况还可参见有关的回忆录，*Адырхаев Н.* Встреча Сталина с японскими коммунистами, 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ц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0, №2, с.140-144。

③ ЦХСД（现代史料保管中心），ф.89，оп.50，д.3，л.1.

④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文件》，第 755–756、757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274 页。

⑤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 358、360、361 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19-03，第 86–87 页。

了这个措辞强硬的文件。[①]6月10日，苏联政府再次照会美国，指责美国和约草案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日本的军国主义，并重申必须于1951年7月或8月召开包括所有参加对日作战国家代表出席的和会。[②] 6月25日，朝鲜外务省也向苏联递交了照会，声称“无论是在准备条约的程序方面，还是在条约的目的和实质方面”，朝鲜“完全赞同和支持苏联政府对日和约的立场”。[③]

就在苏联明确表示抵制美国媾和方案的同时，朝鲜战场的形势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而陷入了僵局，双方都表现出和谈的意愿。[④] 6月5日，凯南与马立克讨论了停战谈判的可能性，苏联表示了急切进行停战谈判的意图。引起凯南注意的是，马立克在会面时根本没有提到诸如台湾和对日和约等远东国际事务问题。凯南判断，这也许表明苏联政府渴望停火，即使不解决这些更为广泛的远东问题。[⑤] 美国人猜测得不错，苏联确实希望先实现朝鲜停战，再解决对日和约问题，这样会对中苏一方更为有利。美国的策略则是针锋相对，先实现对日媾和，再谈朝鲜停战问题。

军事上占有优势，自然就掌握了外交上的主动权。利用1951年春夏季的军事优势，美国不仅迫使日本政府承诺不与新中国缔约，而且逼迫英国政府接受了“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参加多边和会”的立场，从而结束了英美围绕中国签约权的纷争。[⑥] 7月3日美英制定出对日和约的共同草案，但在敦促尽快召开和会的同时，美国还必须采取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拖延停战谈判。显然，如果此时朝鲜停战达成协议，远东地区出现和平局面，而中国和苏联成为“和平功臣”，美国就很难拒绝中国参加对日媾和，也无法说服其盟国同意继续在日本驻军和重新武装日本。[⑦] 于是，7月10日开城谈判开始不久，美方代表就不断为和谈制造难题。尽管中朝方面步步退让，在确定谈判程序和划分停火线等问题上都大体接受了对方提出的方

---

① 《人民日报》1951年5月25日。英文全文见XG0187，MF2527245-0990，Main Library，University of Hong Kong。

② 参见人民出版社辑：《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95、100、107页；*Славинский* Сан-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87。

③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2，оп.7，п.25，д.2，л.26-31。

④ 相关的俄国档案见沈志华编：《朝鲜战争文件》，第777–786、804–811、835–840页。

⑤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629–630页。

⑥ 详见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七分册，第78–81页；徐友珍：《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第32–35页。

⑦ 这一点，就连当时的美国报刊都看得十分清楚。见斯通：《朝鲜战争内幕》，南佐民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6页。

案，但美国仍然不断制造事端，如8月18日联合国军发动夏季攻势，8月19日停战谈判中朝方军警遭到武装袭击，8月22日美军飞机轰炸来凤庄中朝代表团驻地等等。[①] 开城谈判不得不于23日中断，而这正是美国要达到的目的。如此，当美国以近乎最后通牒的方式把美英共同草案交给苏联代表时，莫斯科已经被逼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三、旧金山和约与中苏在停战谈判中的强硬立场

1951年7月6日，美国政府向苏联大使馆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及美英共同草案。备忘录以不容商量的口气指出，这个经过修改的草案已经"体现了参加签署对日和约的盟国基本上能够接受的条件"，并将于7月20日左右分发给所有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因此，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苏联政府的意见。更使苏联感到气愤的是新草案在领土条款中所做的重要修改：3月30日草案还提到日本应该向苏联归还南库页岛及其毗邻岛屿，移交千岛群岛，而在7月3日的草案中只谈日本放弃对这些领土的权利和要求，却丝毫没有提到其归属问题。不等苏联答复，7月20日，美英两国大使同时拜访苏联外交部，递交了美英联合照会、关于参加1951年9月4日旧金山对日和约国际代表会议的邀请函、和约草案正式文本及其他一切有关文件。照会指出，这次会议是在美英共同草案的基础上召开的，美英政府请求告知，苏联政府是否接受这个邀请。尽管在照会中建议对和约草案提出意见，但同时又声称，不管有何意见，最终文本都将在8月13日予以公布。柯克还在口头声明中强调，召开国际会议不是为了制定条约，而只是为了签署美英8月13日的草案。[②]

斯大林确实为难了：参加会议无疑意味着向美国低头，拒绝出席又将处于外交上的孤立境地。面对这个难题，苏联政府显得有些不知所措。7月21日葛罗米柯向斯大林建议苏联应该出席旧金山会议，显然因遭到拒绝，他在8月1日重新起草的照会中，说明了苏联不能参加这次会议的理由。但几天以后，苏联的想法又变了。8月10日，联共（布）中央专门讨论并通过了外交部准备的决议草案。与1947年出席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的方针如出一辙，苏联的立场是：出席旧

① 参见沈志华编：《朝鲜战争文件》，第941–1007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44–155页。

② *Славинский* Сан-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c.89-91.

金山国际代表会议，同时批评和修改美英草案，特别是要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参加会议，争取通过这些修改意见，否则将拒绝签署条约。随后，苏联于8月12日向中国通报了这一立场，并解释说，“苏联很难拒绝参加上述会议，因为这种拒绝可能会使社会舆论认为苏联不愿意与日本恢复正常关系。”苏联保证将在会议上提出必须邀请中国代表的问题，并强调“没有中国的参加不可能缔结对日和约”。[①] 不久，苏联又向中国政府通报了关于日本赔偿及限制武器规模的建议。[②] 对于苏联出席会议的做法，中国显然是理解的。8月1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同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印度政府是否出席旧金山会议，当然由印度自己决定。如果印度参加会议而能始终坚持原来主张，这种做法也是合理的。[③]

旧金山会议的过程十分简单，如同人们预料的那样，苏联代表葛罗米柯首先发表了关于对日和约建议的演说，提出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就不能讨论对日和约。遭到拒绝后，苏联代表又提出了关于修改和约草案的建议，美国同样不予讨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波兰、捷克等国代表只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④] 中国人似乎早已预见到和会的结果，并事先准备了关于旧金山和约的声明。旧金山会议尚未召开，9月3日，周恩来就在一次报告中宣称，我们不能承认这个会议。[⑤] 差不多与旧金山签约仪式同时，北京时间9月7日晚，中国外交部就把拒绝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声明文本交给了苏联使馆。[⑥]

就在旧金山和约缔结5个小时后，艾奇逊和吉田茂在旧金山军人俱乐部签署了已经准备就绪的日美安全条约。1951年12月24日，吉田茂又在杜勒斯的压力下致函蒋介石，建议缔结和约。此后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双方于1952年4月28日，即《旧金山和约》生效前7个半小时，签订了“日华和约”。[⑦] 至此，美国人如愿

---

① *Славинский* Сан-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c.91-93，95.

②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86-02，第6–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7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62–364、366–367页。印度和缅甸最后因不赞成美英条约文本而拒绝参加旧金山会议。见 *Тихвинский*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c.9。

④ 详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68–386页；*Славинский* Сан-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c.98；*Тихвинский*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c.9。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第178页。

⑥ *Капица*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c.130.

⑦ 详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93–394页；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七分册，第105–110页。

以偿地完成了其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的构想，接下来便要着手解决朝鲜停战的问题了。然而，在远东外交舞台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的苏联和中国，却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表现出异常强硬的立场。

由于拒绝签署旧金山对日和约，苏联的对日政策以及在日本的地位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首先面临的就是撤销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问题。还在和约生效前，苏联外交部已经估计到这方面可能出现麻烦，但没有可以采取的积极措施，只能等待。1952 年 2 月 21 日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向斯大林报告说：鉴于对日和约已经在各国相继获得批准，美国将公开发表声明，以“停止对日本的占领”为借口，宣布撤销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事实上这两个机构“现在都已经无所事事”，而那时就只剩下苏联代表了。为此，苏联驻东京的代表基斯连科建议，不要等美国采取行动，“我方应主动声明停止对日本的占领，撤销一切与占领有关的机构”，“同时要求尽快从日本领土上撤走一切占领军队，将所有主权交还给日本人民”。但外交部认为现在发表这样一个正式声明是不适宜的，“因为难以对社会舆论说清，为什么不承认单独对日和平条约的苏联，现在却建议撤销 1945 年 12 月由盟国决定成立的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因此，苏联只能在美国采取行动后，发表一个谴责性声明。维辛斯基还提出，由于“现在尚无可能建立苏日正常的外交关系”，苏联应“力争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使苏联驻日本代表处能以贸易代表团的形式存在”。维辛斯基又建议，应事先向中国通报此事，说明这并不改变苏联政府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立场。[①] 但即使在建立贸易代表团的问题上，从策略考虑，苏联外交部也感到不能表现得过于积极，而要等待日本方面采取主动。[②]

1952 年 4 月 23 日，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在东京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停止活动。美国驻远东委员会代表也致函秘书长，提出在和约生效后解散远东委员会。无可奈何的苏联代表除了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谴责美国外，没有任何举动。[③] 同日，日本政府代表发表声明声称，“由于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解散，苏联代表处丧失了外交官的特权，目前正在研究关于如何处理的问题”。驻日美军司令部则通告苏联代表处，自和约生效时起，苏联外交使团即丧失了使用无线电台的权

① 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 年 2 月 21 日，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 10 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藏，第 175–178 页。

② 联共（布）中央决议，1952 年 2 月 23 日，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 10 卷，第 179–180 页。

③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国际事务概览（1952 年）》，吴世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年，第 485 页；《人民日报》1952 年 4 月 30 日。

利。为此，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赶快停止使用无线电台，“以避免日本当局可能的挑衅活动”。在此之前，为防止可能的意外苏联外交部和军事部已经指示代表处销毁机密文件和密码。[①] 后来苏联人发现，“日本当局并没有采取旨在驱逐苏联在东京代表处的任何措施”，日本政治界和实业界都希望“妥善地解决日本与苏联的关系”。日本政府一方面暗示，在解决日苏关系问题方面，期待着苏方的倡议，另一方面通过日本实业界进行了非正式探测。苏联外交部感到有机可乘，便提出基斯连科不应急于回国，而必须保持与日方的接触。[②] 5月20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③] 然而，苏联的意图再次受挫。或许是受到美国的压力，5月30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苏联代表团：由于和约生效，代表团已经丧失其合法地位。尽管提出了抗议，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6月27日，基斯连科及其大多数随员不得不离开东京。[④]

更令莫斯科头疼的是日本为美军生产武器的问题。随着对日和约生效，盟军总司令部将原定用于战争赔偿的850座工厂正式交还日本，其中有飞机制造厂314座、军火工厂131座、武器研究所25个。朝鲜战争期间，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的“兵工厂”为美军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价值1.1亿美元。[⑤] 这不能不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但苏联对此却无能为力。1952年3月20日苏联外交部报告，盟军司令部3月12日批准日本政府可以生产武器弹药及军舰和飞机。为此，基斯连科认为应通过远东委员会或者致函李奇微司令部，对上述行为提出抗议。但外交部认为，基于以下理由不宜提出抗议。第一，苏联曾声明日本可以拥有仅限于自我防御任务的陆、海、空军部队并生产一定数量的武器；第二，针对美国人提出的抗议，非但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还可能被利用攻击苏联企图禁止日本拥有武装力量。[⑥] 两天后，联共（布）中央按照外交部的意见批准了给基斯连科的指示。[⑦]

---

①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4月26日，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251–253页。

② 详见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5月17日，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263–265页。

③ 联共（布）中央决议，1952年5月20日，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266页。

④ 卡尔沃科雷西编：《国际事务概览（1952年）》，第486–487页。

⑤ 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100页。

⑥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3月20日，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198–199页。

⑦ 联共（布）中央的决议，1952年3月22日，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202–203页。

在对日媾和及台湾问题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苏联和中国决定奋起反击，但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主要限于朝鲜战场。对于日本问题，莫斯科手里只剩下一张牌：1952 年 9 月 8 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十票对一票支持日本要求成为会员国的申请后，马立克使用了否决权。[①] 对于台湾问题，中苏所能做的也只是延长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②] 而在朝鲜战场，中国和美国还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斯大林唯一的希望就是拖延和谈，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以便把美国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远东。

旧金山会议结束后，美国立即转而推动朝鲜的和谈，1951 年 10 月 5 日美国大使柯克约见维辛斯基，在递交的声明中华盛顿强调，“朝鲜问题是当前需要立刻解决的最尖锐和最危险的国际问题”，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改善美苏关系而言，“朝鲜停战谈判具有重大的意义”。[③]10 月 25 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开启，并且很快就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以致毛泽东和金日成乐观地给谈判代表团发出指示，“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④] 但此后不久，中方的立场便发生了明显变化。12 月 28 日，毛泽东致电坐镇板门店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技了。[⑤] 过了几天，周恩来在致李克农、乔冠华的电报中再次强调了不怕拖的思想。[⑥]1952 年 1 月 14 日和 15 日，毛泽东又指示李克农，一定要“坚持既定方针，不稍动摇犹豫”，并“主动积极反击敌人”。[⑦] 当谈判双方在第三项议程中争执不休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准备在是否允许中方修复机场的问题上作出让步，并提议李奇微与南日和彭德怀进行高层会谈。[⑧] 而中方的态度却是更加强硬。2 月 24 日，周

---

① 卡尔沃科雷西编：《国际事务概览（1952 年）》，第 487 页。

② 尽管在 9 月 15 日公开的照会中周恩来只谈到了日本的威胁，但斯大林在双方代表团会谈时则明确指出，“有关旅顺口的照会是针对美国的”，因为“美国在台湾驻有舰队并且利用台湾”，同时强调，只要日蒋和约存在，“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的和约”。沈志华编：《朝鲜战争文件》，第 1222、1227–1232 页。

③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文件》，第 1058–1061 页。

④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 181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第 207 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265–266 页。

⑦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第 49、54–55 页。

⑧ JCS 91600，From JCS to Ridgway，10 Jan. 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 Truman Library；沃尔特·赫姆斯：《美国兵在朝鲜（第一卷）：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181–182 页。邓峰为笔者提供了杜鲁门图书馆所藏有关档案，谨此致谢。

恩来致电李克农："在目前的谈判中，我方在限制机场的修建、自愿遣返和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机构三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如果对方仍坚持其不转弯的立场，我们宁可让它僵持下去。"① 此时，中国的谈判基调已经非常牢固地确立下来：在第三项和第四项议程上坚决不让步。

中国的谈判立场从急于达成协议到不怕拖延的转变，前后不到两个月，其原因很可能是看到自己的军事实力由于部队轮换及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到位而得到加强，或许完全是出于谈判策略的考虑，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待于中国档案的进一步开放。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种强硬立场得到了苏联的鼓励和支持。苏联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详细地向莫斯科报告了中方的强硬态度和拖延策略后，② 斯大林颇为赞赏，他 2 月 3 日致电毛泽东说，"您所采取的坚定立场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应能迫使敌方进一步做出让步。"③

4 月 28 日，即对日和约生效的当天，谈判双方举行了"秘密"会议。美方在会上提出：以中朝方面在战俘问题上接受美方"自愿遣返"主张和不提名苏联为中立国为条件，美方放弃对修建机场的限制。在美方做出实质性让步后，中朝方面应同意撤回提名苏联为中立国的要求。5 月 2 日，中朝方面对应地提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以全部遣返战俘和在机场修建问题上美方放弃干涉朝鲜内政为条件，同意只提双方均能接受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为中立国。至此，使第三项议程的谈判拖延不决的最后两点分歧实际上已得到解决。由于在此之前进行第五项议程谈判的小组已经就政治会议问题达成协议，所以，只要第四项议程，即战俘问题得到解决，朝鲜和谈就可以结束了。④ 然而，就在双方起初认为最容易达成协议的战俘问题上，停战谈判却进入了死胡同。

自 1951 年 12 月 11 日第四项议程的谈判开始后，中美双方的交锋逐渐展现出一幅尖锐对立、不可调和的画面，谈判多次陷入僵局，直至无限期休会。究其原因，既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文化背景的差异；既有出于心理战的考虑，也有影响国际舆论的意图。还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中苏有意在朝鲜停战问题上采取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第 220 页。

② АВПРФ, ф.0102, оп.8, п.35, д.10, л.158, *Волохова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 1951-1953гг.,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0, №2, с.104.

③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文件》，第 1151 页。

④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27–230 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 203 页。

强硬立场，以扭转在远东由于对日媾和完成而出现的被动局面。

美国倚仗其军事优势，试图通过狂轰滥炸及核讹诈逼迫中朝方面让步。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金日成倾向于接受美国的条件，因为在朝鲜看来，通过谈判争回的战俘人数，远远不及美国空军轰炸造成的伤亡人数。为此，金日成指示南日提出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了“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①] 毛泽东在回电中竭力向金日成说明，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战争也将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使其不断蒙受损失，这保证了苏联的建设和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并“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②] 毛泽东的这番话自然表达了斯大林的心声，在对日和约问题失利以后，鼓动和支持中国人在朝鲜战场坚持下去，是苏联在远东唯一可以对抗美国的手段。1952 年 8 月 20 日，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满口答应给予中国全面的经济、军事援助。在战俘问题上，斯大林支持中国的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立场，认为“可以向美国宣布，如果他们扣留一定比例的朝中战俘，朝中方面便扣留同样比例的美国和南朝鲜战俘，直到最终解决交换战俘问题”。而且，他非常赞同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看法：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他极力主张，“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③] 在 9 月 4 日与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会谈中，斯大林再次强调：不要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也不应该提出任何新的建议。[④] 在此期间，美国参联会与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之间电报来往频繁，商讨试图解决战俘问题的种种方案。[⑤] 但是，无论美国人想出什么花样，只要不放弃自愿遣返原则，全部释放战俘，特别是志愿军战俘，那么，其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⑥] 克拉克以及参

---

① АВПРФ，ф.0102，оп.8，п.35，д.10，л.157-158，*Волохова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с.104；沈志华编：《朝鲜战争文件》，第 1152–1153 页。

②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文件》，第 1187–1189 页。

③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文件》，第 1200–1204 页。

④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文件》，第 1216 页。

⑤ C 51562，From Clark to JCS，8 July 1952；CX 55003，From Clark to JCS，11 Sep. 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 Truman Library；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一卷，第 831–835 页。

⑥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第 248–249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 289–290 页。

联会和国防部都无法忍受中国僵硬的态度，决定再次采取断然措施，以表现出“联合国和美国立场的坚定性和尊严”。[1] 10月8日联合国代表团宣布，板门店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2]

中苏结成同盟的动机，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外，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对于莫斯科而言，拉拢中国这样一个亚洲大国加盟，其东方战线便有了可靠的屏障；而在北京看来，只有依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才能有所保障，漫长的海岸线也可以受到保护，从而使新生的政权得到巩固。然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以苏联盟国的角色加入冷战，其结果无疑是把美苏对抗的前沿阵地推到了太平洋的西海岸，远东地区的态势骤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不再是美苏冷战的中间地带，于是台湾和日本的战略地位便凸现出来，由此导致了美国对远东乃至整个亚洲政策的定向。朝鲜战争进一步使美国明确了在东亚的集体安全政策，并把两大阵营在亚洲的对抗推向了高潮。美国在决定介入朝鲜战争、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同时，迅速确定了对日和约的新方针——把日本作为反共同盟国及早实现单独媾和。朝鲜战局的变化决定着对日媾和的进程，而《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又反过来影响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面对远东地区的被动局面，斯大林和毛泽东决心在停战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通过拖延战争的策略，把美国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远东。于是，从中苏同盟条约开始，中经朝鲜战争爆发，到对日和约签订，冷战在远东形成的三部曲奏完了最后一个音符。苏联拉住中国和朝鲜，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而美国则把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纠集在一起，构筑了东亚地区的共同防御体系，远东冷战的格局从此定型。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略加修改

---

① CX 55003，From Clark to JCS，11 Sep. 1952；JCS 919368，From JCS to Clark，25 Sep. 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 Truman Library；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一卷，第831–835页。

② 朝鲜停战谈判的僵局直到斯大林去世才开始解冻。详见沈志华：《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世界史》2001年第2期。

附录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的俄国解密文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斯大林向西方盟国提出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即收回俄国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失去的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权益，而这些权益只有通过与中国签订的条约才能得以实现。在美国同意了这些条件，并协助苏联劝说蒋介石以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进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1945年8月9日，当中苏谈判尚处于僵持状态的时候，由于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所引起的形势变化，苏联不等中苏条约签字，便迫不及待地对日宣战了。面对苏联150万大军已经分三个方向进入中国东北的现状，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被迫接受了苏联的条件，即同意外蒙古独立，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占有，苏军租用旅顺口，大连港成为国际商港等，其交换条件是苏联同意在战胜日本后三个月内将东北政权交给国民党政府，并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赞成中国共产党加入联合政府。

然而，日本投降以后，中共军队为配合苏军作战，利用地理上的方便条件，抢先进入了东北。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也在美国的大力帮助下，积极向东北运兵，同时派接收大员与苏军进行移交政权的商洽。于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出现了三国四方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1945年底，为了解决中苏之间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政权、中苏在东北的经济关系、大连港的使用等问题，蒋介石要求派私人代表赴莫斯科谒见斯大林。1945年12月3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通知，斯大林准备于12月下半月接见蒋介石的代表。12月7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接见彼得洛夫，告诉他蒋介石决定派其儿子、东北特派员蒋经国于本月25日左右赴莫斯科。12月30日，蒋经国一行抵达莫斯科，并于当晚受到斯大林接见。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蒋经国与斯大林进行了两次谈话，双方交换了各自

的想法和倾向性意见。1946年1月5日，蒋经国离开莫斯科回国。

本专题收集了有关这次接见和谈话的四个文件以及此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关于对华政策的指示。这些俄国档案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微妙而复杂的状况，以及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

文件左上角的编号为沈志华收藏的俄国档案复印件编号，以便于读者核查原文。

（本专题文件由丁明、耿葆贞等翻译，由沈志华编辑、校对和注释）

文件 01

洛索夫斯基关于蒋经国来访给斯大林、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5年12月29日）

无论蒋介石还是蒋经国，在事先与我国大使[①]的历次谈话中均未说明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抱有何种目的。然而，根据间接得到的消息可以断定蒋经国莫斯科之行的主要政治目的。

蒋经国将就满洲的政治局势、日本在满洲企业的经营、苏联资本和技术力量参与满洲的开发、将整个满洲交还中国政府民政和军事机关等问题进行谈判。蒋经国显然还有一项任务：在谈判的开头或末尾就美国在华地位问题安抚苏联政府。据说蒋介石并不愿意向美国提供任何比苏联优先的特权。他只想利用美国对国家实行经济改造。毫无例外，蒋介石向美国人也做了针对苏联的类似声明。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蒋介石既想利用苏联，也想利用美国，尤其想利用两国之间的矛盾，以巩固国民政府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内改造中国。

我们研究了蒋经国在谈判中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

一

（一）关于中国的政治危机。蒋经国将竭力争取我国以武力或施加道义影响迫使共产党军队停止争夺满洲和华北。蒋介石并不相信他在接管满洲民政权力后能以自身的力量控制它。他同样明白，无论日军还是伪军均无法有效管束满洲和华北的

① 阿·亚·彼得罗夫（1907–1949），曾任苏联驻华（重庆）大使馆一等秘书、大使馆顾问（1943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出版局副局长（1943–1945年），1945–1948年任苏联驻华大使。

居民。因此，蒋经国不仅会提出延缓撤出我国军队的问题，而且会提出从政治道义上援助蒋介石政府，以此对付来自左面的危险。

（二）关于经营日本在满洲的企业。中国人知道，我们从满洲运走了大量设备。他们想拖延并中断就此问题的谈判。他们笼统表示原则上同意共同经营一批日本企业。根据种种情况判断，中国人同意共同经营的只是那些设备已被运走的企业，同时附带提出运回设备的问题，作为共同经营前日本企业的条件。中国人会这样提出问题：或者归还运走的设备，或者我们从美国运入设备，但这就意味着美国资本将渗入满洲。

（三）关于苏联资本和技术力量参与开发满洲。中国在与我国军人的谈判中对此已有主张。并且犹如在第一个问题——归还设备问题上一样，如果我国不参与满洲的经济开发，不向满洲的工业提供技术设备的话，中国人明确暗示美国资本将会对满洲进行渗透。蒋介石已通过其亲信表示，他不打算让美国资本进入满洲，为此他想得到一定的补偿：或者归还被运走的设备，或者从苏联输入新的设备，并得到我国的技术援助。

（四）关于内蒙古。中国人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内蒙古人民之间业已建立的联系十分不安，蒋经国可能会提出不让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内蒙古施加任何影响。众所周知，该地居民向往蒙古人民共和国。

（五）关于新疆形势。蒋经国可能会以蒋介石的名义请求苏联对起义者施加影响，使其满足于已做出的让步，因为不可能同意起义者代表力争的广泛自治。据说蒋介石准备妥协，但他无论如何不会把新疆交给穆斯林管理。[①]

（六）关于大连港。蒋经国可能会以蒋介石的名义提出中国政府不同意我国对于苏中条约中关于大连的解释。[②] 因为大连是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港口，蒋经国将会代表蒋介石暗示，中国只好请求美国帮助建设营口、葫芦岛或其他某个离大

① 1944 年 11 月，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国新疆北部地区爆发了少数民族起义，起义者消灭了当地的政府驻军，先后占领了伊宁、塔城、阿尔泰三个地区，组成了一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史称“伊宁事件”或“三区革命”。中国政府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作出让步的同时，请求苏联政府出面在新疆问题上进行调停，以期与起义者谈判，和平解决冲突。在苏联政府的调停下，1946 年 1 月 2 日，中央政府代表张治中与起义者签订了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的条款，并于 7 月 1 日正式公布。

② 1945 年 8 月 14 日关于旅顺、大连的中苏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规定，大连港为国际自由港口，但向苏联提供“优先权”。苏联方面凭借这一点，对大连港及其设施实行了全面控制，实际上未让中方以任何方式参与管理和使用。外国船只，尤其是中国船只顺道进入大连港必须经过苏联当局的特别批准。这就如同出租给苏联政府的旅顺海军基地一样，该港口对中国和外国船只是完全关闭的。对此，中国及其他国家政府多次提出抗议，但均未奏效。

连不远的太平洋港口来与大连相抗衡。

也许，中国人还会提出向日本索赔、中国长春铁路的章程和财产以及订立新的贸易条约等问题，但这是次要的，而非主要的问题。

二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应该提出哪些问题呢？我认为应该提出以下问题：

（一）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尽管已在10月20日举行全民公决，中国政府仍拖延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人这样做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想对我国施加压力，使我国尽快撤军，而且主要是由于他们指望利用苏美之间可能的麻烦，以便不执行协定中这一条款。否则，无法解释中国政府为何拖延这个问题。王世杰①对该问题的解释显然站不住脚。因此我们有必要坚决提出这个问题，并力求中国政府尽快宣布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卜道明②于12月26日转告米克拉舍夫斯基③，中国将尽快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就是说，中国人已经注意到三国外长会议上达成的协议。④

（二）中国长春铁路的守卫。我军从满洲撤退将使我方人员和整个中长铁路陷入绝境。如果说我国军队驻在满洲尚有袭击、抢劫和破坏行为发生，那么我国军队离开后将会如何？铁路将无法运行，我方人员将在那里挨打，车辆将被推翻、被抢劫。不仅土匪和原伪军士兵会这样做，国民党军队为迫使我们离开满洲和放弃中长铁路也会这样做。根据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应该保证护路。但中国政府自身难保，更不能保护长达2700公里的铁路。我们应该提出将我国铁路护卫队保留二至三年，直至中国政府根据苏中协定组成他们的护路队予以替代时再撤回。

（三）关于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满洲。如果说战前中国的主人是英国人，部分地区是日本人，那么现在中国的主人将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既想渗入华北，亦想渗入满洲。对苏联而言，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刚刚使我国的边界摆脱了邻国日本的压力，因此我们不能允许满洲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

---

① 王世杰，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

② 卜道明，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西司司长，主管中苏关系。

③ 列昂尼德·米哈伊洛维奇·米克拉舍夫斯基，时任苏联驻华大使馆顾问。

④ 指1945年12月16日至2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与美英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停止内战”。

（四）关于满洲的经济合作。只有在我国积极参与满洲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方可杜绝外国资本进入满洲，因此我国必须：

1. 力争设立一批经营前日本在满洲企业的苏中公司。

2. 把设在大连的大型船舶修理厂列入共同经营之后，要在实际上对整个大连港以苏中共同经营的方式来安排我们的工作。

3. 加速设立为全满洲服务的苏中航空公司。

4. 制定铁路税率，以便使中长铁路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等等。

三

关于蒋经国。正如蒋介石企图在美苏之间要手腕一样，蒋经国作为昔日的联共（布）党员，也想在蒋介石和我国之间要手腕，他会把自己装扮成苏联的无私朋友。蒋介石若不是对自己的儿子有百分之百的信心，那是不会派他前来的。蒋经国为了更好地、更容易地贯彻其父亲拟定的政策，甚至准备批评蒋介石。蒋介石的亲信并不喜欢蒋经国，这不仅因为后者以前是左派，而且因为他是蒋介石政治遗产的觊觎者。事实上蒋经国是一个平凡的人，因此丝毫不能和宋子文那样的生意人和政客相比。结论：蒋经国未必负有同我国签订任何协定的使命。他前往莫斯科是为了谈谈，并且可能的话，为蒋介石本人来访打下基础。

副外交人民委员索·洛索夫斯基[①]

文件 02

斯大林与蒋介石私人代表蒋经国的谈话记录

（1945 年 12 月 30 日）

1945 年 12 月 30 日 21 时

莫洛托夫、巴甫洛夫（外交人民委员部）、中国大使傅秉常在场

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递交了蒋介石的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军队是否已进驻沈阳，如果尚未进入，那么是谁妨碍他们

① 洛索夫斯基（1878–1952），原名索罗门·阿布拉莫维奇·德里佐，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曾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21 年）、国家文学出版社社长（1937 年），1939–1946 年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进驻？也许，是共产党人？

蒋经国回答，中国军队尚未进入沈阳，但很快就会进入。共产党人对此并无妨碍。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想谈什么。

蒋经国回答，蒋介石请他对苏军进入满洲粉碎日本军阀从而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以及对苏军在恢复满洲行政机关的工作中所给予的援助，向斯大林大元帅表示谢意。

蒋经国说，蒋介石向斯大林大元帅派出自己的私人代表是出于以下考虑：

1. 他认为战后苏中关系正在密切起来，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这种关系应该日益加强。如果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得到满足，即在斯大林大元帅和蒋介石之间实现全面的相互了解，苏中关系就能够并一定会得到加强。蒋介石认为，任何误会都只能使问题复杂化，同时，分清是非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2. 蒋介石认为有一些问题不应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因此蒋介石派他（蒋经国）前来会见自己的私人朋友斯大林大元帅，讨论苏中关系的各项问题。

3. 蒋介石让他（蒋经国）向自己的私人朋友斯大林大元帅表达他的敬意和信任，并向斯大林大元帅征询他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他所抱有的任何疑虑。同时请他谈谈，他对蒋介石现阶段所奉行的哪些政策有不同意见。

他（蒋经国）本人则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讨论以下问题：

第一，他想就中国的统一问题进行商谈。在同日本人做了20年的斗争之后，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防止日本施展阴谋并实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20年来，日本总是处心积虑要消灭中国人民。因此国民党和蒋介石着意解决民族问题。正如斯大林大元帅所知，中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蒋介石一方面力求集中国之力于抗日战争，另一方面也力求统一中国。现在日本已被击溃，因此可以着手国家的民主化、国家的统一并解决社会秩序问题。一旦中国统一了，所有这些问题均能顺利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取决于同中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调整。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可以共存，后者无意取消中国共产党。国共两党政治路线之间并无矛盾。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共产党与国民党并存于世，这将使国民党免于腐败并促使它更快地进步。但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共存，必须让中国共产党放弃消灭国民党的图谋。

蒋经国说，在国民大会于5月份召开之前，决定在不改变国民政府的结构和法律地位的条件下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政府。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中国政府对三国外长会议通过的有关中国的决议持何种态度。

蒋经国说，他尚未看过这些决议。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三国外长一致同意，中国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统一和民主化，广泛吸收民主人士进入国民政府所有机关，停止内战。

蒋经国回答说，正如他所认为的，这与蒋介石的意见一致，因为决议中提到在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民主化。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可以参加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防委员会。

另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军队。中国共产党建议政府允许共产党军队保留 16 至 20 个师。这个建议是毛泽东在同蒋介石谈判时提出的。蒋介石同意保留 16 至 20 个师的共军并保证其安全。但是，既然谈到中国的统一，军队就应该统一，即统一指挥。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将自己的武力用于分裂国家。另一个条件就是国家行政的统一，要求共区隶属于中央。蒋经国记得，斯大林大元帅在接见宋子文时谈到，中国的统一要在保持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但有广大民主力量参与的情况下实现。①

蒋经国表示，在蒋介石看来，苏联关心中国的稳定和统一，因此他请斯大林大元帅就此发表意见，并说出他可能会有的疑虑。另一方面，蒋介石请斯大林大元帅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与国民党合作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曾有 3 名代表驻共产党人所在地延安，② 而在美国曾有 30—32 名代表。苏联政府已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苏联政府不明白，重庆谈判为何中断了。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从属于俄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俄国共产党人很难进行调停，因为他们不想提出最终会被拒绝的建议。况且中国共产党人并未请求提供建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将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遵从他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如何。他们目前并未请求提供任何建议。以前，苏军刚刚进入满洲并且苏联政府尚有 3 名代表驻延安

---

① 宋子文，时任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院长。这里指 1945 年 7 月中苏条约谈判时斯大林与宋子文的谈话。

② 斯大林所说的这三名驻延安代表是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化名孙平）、阿洛夫（化名捷列宾）和米尔尼柯夫。弗拉基米洛夫 1942 年 5 月作为共产国际联络员和塔斯社随军记者来到延安，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夫作为医生和联络员于 1946 年 1 月飞抵延安。他们于 1945 年 11 月奉命回国。

时，中国共产党人曾经通过这些代表请求向他们提出建议，于是他们得到了答复：俄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该去重庆谈判。[①]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提出这一建议，于是在共产党人中引起大乱。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带着何种计划赴重庆的，只知道谈判已遭到失败。

斯大林同志说，当共产党人想转移到满洲时，苏军司令部并未放行，因为苏联政府并不想干涉中国的内政。[②] 一般说来，外国军队干涉中国事务于蒋介石不利，因为这将导致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

斯大林同志说，谈判失败的原因并不清楚。也许，中国共产党人去重庆是为了证明不可能同蒋介石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想要什么，是中国的苏维埃化还是两个政府并存。

斯大林同志说，他并未料到，中国中央政府同共产党人会有麻烦，共产党人会阻止中国军队调动。

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的观点已在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中以及在同中国的条约中阐明了。苏联政府在这两份文件中声明，它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如果中国国民政府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这对于政府有好处。然而，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观点。苏联政府在这方面能做什么呢？他们认为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但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

蒋经国说，蒋介石认为，倘若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在旁人看来，这个问题有损于苏中两国之间的关系。

斯大林同志答道，他明白这一点，因为许多人都说，苏联政府劝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同蒋介石达成协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能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影响。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中条约业已公布，但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并不重视这一文件。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也已公布，今后事态将会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赞同。看来是不会的。

蒋经国问，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

---

① 根据中国的有关材料，斯大林这里指的是俄共中央 1945 年 8 月 20 日和 22 日两次致电中共中央，催促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但目前尚未发现有关这些电报的俄国档案文件。

② 事实上，1945 年 8–10 月苏联在东北的驻军曾一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共将大批领导干部转移到东北，并将一部分缴获的日军武器转交给中共军队。

斯大林同志说，也许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的代表应该再次会面。

蒋经国答复说，周恩来一行30人已经抵达重庆。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到重庆是为了谈判。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回答，并说需要解决问题，目前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内蒙古，中国军队[①]与中央政府军之间确实发生了战斗，中国共产党人还宣传这样一种观点：既然宣布了外蒙古独立，他们将力争使内蒙古独立。

斯大林同志答道，这很愚蠢，并说，苏联政府不能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负责。

蒋经国说，不妨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是否想得到建议。如果他们征求建议——对此还无从知道，那么，会向他们提出建议。曾有一次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并去了重庆，但未达成协议，从那时起再未征求过建议。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他对蒋介石关于中国师的数量的建议持何种想法。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拥有多少师及什么样的师。苏联政府得到过各种各样的消息，有时是截获无线电通讯，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所有这些报道是否可信。他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个师。

至于国民党，在他（斯大林同志）看来，蒋介石是正确的。在一个国家内不能有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如果蒋介石有意让共产党人管理几个省份，在他（斯大林同志）看来，这是可行的，当然，这是蒋介石的事。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并未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建议，苏联政府对他们的行为不满意。中国共产党人未征求过建议。

蒋经国问，倘若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苏联政府将如何对待。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将按照他（斯大林同志）对蒋经国所述精神向他们提供建议。

蒋经国问，在斯大林同志看来，为中国的统一需要做些什么。

斯大林同志答道，需要同共产党人谈判并问清他们的要求。斯大林同志问，为何重庆谈判遭到失败，为何共产党军队和中国国民政府的军队之间发生了战斗？

蒋经国回答说，他对此并不知情。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对此更不知情。

蒋经国答复说，在重庆谈判中共产党人要求将位于黄河以北所有省份，即热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中国共产党军队。

河、绥远、河北以及承德划归他们领导。蒋介石认为，这等于把国家一分为二。这是谈判中的主要分歧。至于共军同国军之间发生的战斗，则有种种原因。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划分成两部分当然不妥。

蒋经国请斯大林同志考虑一下他阐述的内容。

斯大林同志答道，倘若中国共产党人不向苏联政府征求建议，他们是不会提出建议的。苏联政府不想陷入其建议被拒绝的尴尬境地。

蒋经国说，需要同中国共产党人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双方互相做出让步，才能达成协议。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苏联政府坚持与他们不同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清楚，苏联政府不同意他们的主张。

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时，提供了意见。他们去了重庆，但没有谈成。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是谁的错。他（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再也不会来征求建议了。他们知道苏联政府不同意他们的做法。

蒋经国说，由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很快便会召开了。

斯大林同志说，也许，共产党人前往重庆正是为了参加这个会议。

蒋经国回答道，当然，谈判主要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进行。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倘若中国共产党人正式向俄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是会向他们提出建议的，但中央委员会自己则不愿将其建议强加于中国共产党人。

蒋经国答道，正如他所认为的，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人抱有某种秘而不宣的想法。他（斯大林同志）认为，共产党人赴重庆是为了证明不可能同蒋介石达成协议，此外，看来毛泽东并不相信蒋介石，而后者也不相信毛泽东。

蒋经国说，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了十分友好的交谈。

斯大林同志说，是这样，但同时双方军队之间却发生了战斗。看来，中国人的习气就是这样。苏联政府对此难以理解。

蒋经国说，他想同斯大林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苏中关系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正在进行反对中国国民政府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背后有一个苏联。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们的想法不对。

蒋经国表示，苏中关系史开始于十月革命，苏中之间的关系在1923—1924年最好。当然，现在的情况与1923—1924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很难采用原有的方式，但蒋介石认为，恢复1923—1924年间存在过的苏中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

斯大林同志指出，那时并没有条约。

蒋经国说，这是发生在孙中山还在世的时候，这是在北伐前夕，当时建立了黄埔军校。蒋介石认为，虽然现在时代变了，仍应该恢复那时苏中关系的精神。形式会不一样，但蒋介石着眼于长远的未来。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同意这一点。现在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比较好，可以建立密切的联系。与 1923—1924 年情况不一样，当时锋芒针对英国，部分是针对日本的。现在苏联与英、美已经结成同盟，其实与英、美结盟的还有中国，因为中国曾与英、美一起对日本作战。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中国政府要苏联反对英国？

蒋经国笑着说，当然，这根本谈不到，但中国政府想恢复 1923—1924 年的苏中关系。中国政府力求使这种相互关系变得比现在更亲近。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政府愿意建立最亲密的关系，建立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中苏同盟条约。

蒋经国说，1923 年中国在其政策中遵循三项基本原则：(1) 联合苏联，(2) 联合工农，(3)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融合。现在第一项和第二项原则仍然有效，但第三项原则已失去意义。它已被吸收共产党人参加管理的原则所取代。

蒋经国说，要是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就好了，并问，在斯大林同志看来，是什么事妨碍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也许是领袖彼此不信任妨碍了吧。也许，朱德或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在欺骗他们。领袖之间谈判时缺乏信任。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如何重新建立这种信任。

斯大林同志提出，美国人不一定就信任俄国人，同样，俄国人也不一定就信任美国人。但当俄国人同美国人彼此达成协议时，双方之中每一方都相信，对方会履行这一协议。谈判时需要的就是这种信任。他（斯大林同志）不相信，如果签订了协议，还会撕毁它。

蒋经国说，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政府之间的分歧已经厌倦了。

斯大林同志表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所有分歧的激化都得由中国人民承担后果。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苏联政府是否同意与中国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同意这样做。

蒋经国说，蒋介石要他向斯大林大元帅转达一项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

不参与旨在反对苏联的活动。蒋介石表示，只要他掌权，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

对此，斯大林同志请向蒋介石转达谢意，并表示只要苏联政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他们对中国将同样行事。美、英情报机关散布消息说，以苏联为一方，以英、美为另一方，很快就会发生战争，这是制造假情报。美国人和英国人不会将其军队投入新的战争，因为没有目标。日本被打败了，战争使人民厌烦了。英、美任何一届试图动用其军队的政府必然要垮台。出于同样的原因，苏联政府也不能将军队投入战争。也许，美、英两国情报机关散布假情报是为了吓唬苏联和中国。但他（斯大林同志）仍感谢蒋介石作此表示。他（斯大林同志）过去任何时候和现在都相信中国不会反对苏联。同样，他（斯大林同志）也可以向蒋介石保证，苏联不会反对中国。过去苏联不止一次地说应这样做，而且苏联将坚决地继续与中国一道前进。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所说的不是现在，而是长远的未来。

斯大林同志说，那就更好了，因为经过20年、30年或40年，当然就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了。

蒋经国表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教育中国人民。蒋介石拟定了一个教育国民党党员和青年学生与苏联亲善的庞大而广泛的计划。蒋介石希望中国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应该说明，目前中国人的情绪并非都对苏联友好。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要他转告，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将事先与苏联商量，并与苏联达成协议，以便提出一致的主张。

斯大林同志说，至今中国代表总是反对苏联人。例如，在旧金山和伦敦就是如此。在旧金山关于谁主持会议的问题有很大争议，美国人决定应当由美国代表主持会议。苏联代表团提议由四大国代表轮流主持。在讨论该建议时，中国代表反对苏联代表团。

蒋经国答道，今后中国人将保持与苏联主张一致。当时蒋介石要竭力摆脱伦敦会议的困境。①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久前才得知此事，看来，还未对蒋介石的建议做出答复。

---

① 指1945年9月11日–10月2日在伦敦举行的苏、美、英、法、中五国外长会议的一次例会。外长会议是1945年根据波茨坦会议“就和约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的决议建立的机构。会上，在苏联代表团同其余与会者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引起分歧的问题之一是有关中国是否应参加对德和约并参与拟定对曾与德国结盟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和约问题。中国坚持参加这些活动，美、英、法支持中国，苏联反对，理由是中国并未参加对德作战。苏联政府担心在解决战后欧洲和约问题时中国与西方列强主张一致，从而使苏联处于更为孤立的境地。

莫洛托夫同志说，当时情况不明，苏联政府在等待结果。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虽然如此，最好还是给予答复。的确，当时情况不明。苏联政府不知道事情将如何了结。美国人和英国人为一方，苏联政府为一方，都坚持各自的立场。在莫斯科他们才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

蒋经国说，下一个问题涉及满洲。蒋介石十分感激苏军司令部在恢复满洲政权机构中提供的帮助。马利诺夫斯基元帅[①]在同一位中国代表的一次谈话中说过，满洲曾经是进攻苏联的基地，并强调满洲今后不应再成为这种基地了。因此，蒋介石委托他（蒋经国）向斯大林大元帅保证，满洲永远不会成为反对苏联的基地。中国军队开往满洲只是为了维持当地的秩序。中国政府不准备在中苏边界驻军。

蒋介石在与彼得罗夫的一次谈话中说过，他准备在苏满边界建立美国与加拿大边界那样的制度。至于满洲的政治举措，蒋介石说，满洲十分邻近苏联，那里的一切都需要重建，在那里开始实行民主化比较容易。

关于满洲经济，蒋介石提出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但依然保持苏联在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

斯大林同志说，满洲的主人、满洲主权的所有者应该是中国。苏联在满洲不谋求优势地位。

蒋经国答复说，中国政府愿意向苏联提供这种地位。

斯大林同志对此表示感谢。

蒋经国说，满洲有苏联想要得到的产品，另一方面，满洲需要苏联的经济援助。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将从满洲购买自己必需的产品，并给满洲以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再谈谈苏中合股公司。苏军司令部认为，满洲所有的企业都是战利品。

斯大林同志表示，只有为日本关东军服务的企业才算战利品。按照战争的法则，这样的企业是战利品，因此，苏联政府并不是希望得到所有的企业。

蒋经国说，为避免向苏联移交作为战利品的企业而在居民中可能产生的不良印象，蒋介石建议变换一个方式解释这些企业的移交。蒋介石建议说，考虑到苏军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并为此遭受了损失，为重视中苏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将把全部企

① 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1898–1967），时任苏联远东部队及驻满洲苏军总司令。

业的一半移交给苏联。

莫洛托夫同志说，看来蒋介石不想将这些企业作为战利品移交给苏联。蒋经国对此表示肯定。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在波兰就是这样做的，波兰同中国一样都是盟国。苏联政府在波兰并未触动波兰企业，但那里有德国人组建的企业。当德国的西部遭到轰炸时，德国人认为，他们的企业在波兰将是安全的，红军离波兰尚远。苏联政府宣布这些德国企业为战利品，但是他们并未从工厂将所有设备运走，而是将这些设备的大约一半留给了波兰人。战争的法则就是如此，一些国家不利用战争法则，另一些国家则利用战争法则。

斯大林同志答应考虑蒋介石的建议，并将做得使中国丝毫不会感到屈辱。

蒋经国说，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向中国代表提交了应由苏中合股公司管理的 140 家企业的清单。蒋经国说，斯大林大元帅知道，中国没有重工业，因此蒋介石希望这些企业的若干部分留归中国掌握。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并说他不熟悉该问题。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不想只建立一个苏中公司，最好建立分属某些工业部门，例如机器制造业、冶金业等部门的若干苏中公司。当时日本人只有一个开发东北资源和经营东北企业的公司，蒋介石建议的目的在于竭力避免给人留下仿效日本体制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答道，这可以做到。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同意组建几个苏中合股公司，但希望合同在苏军撤出以后再签订。同时蒋介石同意留下目前正在那些企业工作的苏联人员。

斯大林同志说，谈判现在可以继续进行，协定可以晚些签订，不过越快越好，因为财产可能会不断遭到盗窃。

斯大林同志说，苏军司令部接收了某些设备，但没收这些设备并不妨碍工厂恢复生产。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政府是否还要请求苏联政府延期撤军？

蒋经国回答道，延迟到 2 月 1 日撤出苏军，是中国政府的最后一次请求。

蒋经国说，还有一个问题，即关于赎回纸币的问题。[①]

莫洛托夫说，关于此事的协定业已签署。

---

① 指苏联军队驻东北期间苏军司令部在当地发行的一种专用纸币，根据中苏条约，中国政府有责任向居民赎回这些纸币。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谈谈新疆。中国政府从苏联大使那里得到消息，叛乱者代表请苏联驻伊宁领事在解决冲突问题上进行调停。叛乱者代表已经去过乌鲁木齐。中国政府极其关心尽快解决新疆问题，因为一旦停止同苏联的贸易，中国北方将在经济上处于困难境地。叛乱者提出 11 项条件，政府基本上已经认可。业已达成协议。新的新疆政府将由 25 名成员组成，其中 15 名成员由新疆居民选举产生，10 名成员通过任命。但现在叛乱者代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央政府军在一个月内撤离新疆。当然，中央政府要从新疆撤出军队，但中央政府不想在条约中指明，军队将在一个月内撤出，因为这有损于中央政府的威望。

莫洛托夫问，叛乱者代表要求撤走哪些军队？

蒋经国回答道，他们要求撤出那些派到新疆来镇压叛乱的军队。

斯大林同志问，蒋介石是否希望让苏联政府出面调停。

蒋经国答复说，蒋介石愿意让苏联政府充当调停人。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将尽力而为。叛乱者不会拒绝苏联政府的调停。斯大林同志允诺在得到苏联领事的报告后给予最后的答复。

蒋经国说，现在他要谈中国对美国的态度问题。蒋介石委托他向斯大林大元帅坦率表示，中国对中、苏、美之间的合作感兴趣，因为三国结盟不仅对远东，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凡到过中国并同蒋介石谈过话的美国代表，没有任何一位对苏联有过不友好的评论，尤其是马歇尔将军[①]。马歇尔将军说过，他完全信任斯大林大元帅。发表种种评论的不过是那些竭力为自己捞取资本的人。蒋介石表示，他希望苏、中、美三国结成同盟。

斯大林同志表示，蒋介石是对的。

蒋经国说，但是，由于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原因，中国与苏联较为亲近。中国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期待着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在政策上将坚持自主权。

斯大林同志说，这是正确的。

蒋经国表示，中国不会相信进行挑拨离间的人。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就驻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说几句话，美军在华北存在是由早在日本投降前签订的协议规定的。计划预定登陆的美军有 7 个师。被日军逼到南方的中国中央政府军在日本投降后尚未来到华北，为了解除日军武装，才让美军登陆的。

①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1880–1959），美国五星上将，1945 年 12 月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来华，负责调处国共两党关系。1946 年 8 月宣告调处失败，1947 年 1 月奉召回国，出任国务卿。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日军还未被解除武装？斯大林同志说，在长春25名苏联军人解除了日军两个军的武装。斯大林同志说，日本人不会抵抗。满洲全部日军在10天内就被苏军解除了武装。应该更大胆地行动。解除日军武装很容易。

蒋经国表示，美军一旦完成自己的任务就会撤出。

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看来，美国人也并未打算去那里。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满洲。

蒋经国答复说，美军不会进入满洲，并再次重申，他们一旦完成自己的任务将全部撤离中国。

斯大林同志表示，外国军队出现在中国将损害蒋介石的威望，反之，如果中国没有外国军队，蒋介石的威望会更高。

蒋经国表示，美国政府声明，他们将帮助中国建立武装力量。但他（蒋经国）应该声明，这仅仅是宣传而已。

斯大林同志指出，美国人已在中国南方帮助中国人组建了几个师，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蒋经国说，关于如何更好地对付日本人，蒋介石想知道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现在要在东京设立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美国人不愿意这样做，各国都反对苏联政府坚持设立该委员会的建议。

莫洛托夫指出，王世杰在伦敦对这项建议表示同情，但希望不要在伦敦讨论这个建议。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将在东京设立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蒋介石提出的问题将在委员会上解决。至于苏联政府，则主张不仅要解除日本武装，而且要销毁在日本生产军舰和武器的工业部门。这就是苏联政府的观点。苏联政府与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不俘虏日军。苏联政府则俘虏了日军。他（斯大林同志）曾对美国人说过，麦克阿瑟[①]至少应该下令逮捕8000至10000或12000名将级军官和陆海空军将领。现在美国人正在逐一审讯他们。

美国人的考虑与苏联政府不同。美国人现在对待日本就如上次世界大战后对待德国，当时德国保留了军官团和将级军官，他（斯大林同志）多次对美国人说过，要他们俘虏日军，但美国人答称，他们没有地方关押俘虏。无论如何，苏联政府坚

①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1964），美国五星上将，1945–1951年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

持不给日本人留下将级军官。苏联政府的政策就是如此。

蒋经国表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人。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人民是好样的，但领导人也应该是好样的。

蒋经国说，他记得斯大林大元帅说过，日本人可能东山再起。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当然，这是可能的，日本这个国家人口众多，而且充满复仇心理。日本希望东山再起。为了防止此事发生，应该俘虏 50—60 万军官以及大约 12000 名日本将级军官。斯大林同志说，美国人没有经历过日本的占领，因此他们不完全明白。中国经受过日本的占领，苏联则经受过德国的占领，同时还经受过日本的占领。因此中国和苏联明白，必须把敌人置于不能再打仗的境地。美国人则不明白这一点。他（斯大林同志）希望他们将来会明白这一点。

蒋经国问，目前日本的警察情况如何？

莫洛托夫同志答，在日本，有日本警察。

蒋经国说，日本人有可能把警察变成军队。

斯大林同志表示，日本人当然要竭力在警察中安排军官骨干，不过，一旦苏联代表抵达东京，他们将努力制止这种状况。

蒋经国表示，他的全部问题已经解决。在会谈结束时，他（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转达宋子文的问候。

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表示感谢。

莫洛托夫同志问，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定将在一月初中国政府迁往南京后公布。

会谈持续了 1 小时 40 分钟。

B. 巴甫洛夫记录

文件 03

斯大林与蒋介石私人代表蒋经国的谈话记录

（1946 年 1 月 3 日）

23 时

莫洛托夫、巴甫洛夫（外交人民委员部）、傅秉常（中国大使）在场

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祝贺新年，并祝愿他们在新的一年取得新的胜利。

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

莫洛托夫同志表示感谢并向蒋经国祝贺新年。

斯大林同志说，他与苏联军人进行了电话交谈，他们不同意不把服务于关东军的日本企业宣布为战利品。如果这些财产不被视为红军的战利品，苏联军人会感到屈辱。他们希望像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被红军解放的欧洲国家处理德国财产一样地处理这些财产。这样做，中国方面毫无损失。作为战利品的企业将在平等的基础上由中苏双方联合经营，并且为了经营这些企业，可以按照不同的工业部门设立几个公司。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正是这样，不过只是方式有所不同。

斯大林同志表示，中国方面提出的方式使苏联军人感到受屈。他们说，他们流了血，因此，应该把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企业视为红军的战利品。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就地具体确定，哪些企业是日本人为了替关东军服务而设立和经营的。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如何考虑为中国拨出某些重工业企业。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说过，这个问题应由专家研究。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当然专家们可以就地解决这个问题。

蒋经国表示，他的莫斯科之行的任务在于力求使斯大林大元帅和蒋介石之间取得完全谅解，蒋介石希望斯大林大元帅坦诚而友好地阐述自己对中国国民政府最近实行的政策和措施的意见。蒋介石希望斯大林大元帅谈谈自己有哪些疑虑和不赞同的地方。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对于蒋介石所领导的政府制定政策将十分有益。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熟悉中国的基本国情，他（斯大林同志）并不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苏联政府不明白，为什么迟迟不解除日军武装，为什么蒋介石和毛

泽东之间不能达成协议。毛泽东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且是个与众不同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到处活动，避开城市，对城市不感兴趣，他（斯大林同志）对此不理解。他（斯大林同志）不理解，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为什么不能达成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能对任何人表示不满，因为他不知道这是谁的过错。他（斯大林同志）不掌握实情，因此，他只是有些疑问。既然他（斯大林同志）缺少事实根据，他能提出什么建议呢?

说到苏联政府的对日政策，斯大林同志说，他已经说过，需要设法使日本不能作战。需要俘虏日本军事骨干并销毁军事工业以及有可能开工满足军需的工业。

至于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则是友好和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政策。这在发表的公报中已经公开表明了。

他（斯大林同志）认为，蒋介石打算奉行的中美友好的政策是正确的。苏联不能给中国以大量经济援助。蒋介石可以期待美援，因此他奉行对美友好的政策是正确的。

他（斯大林同志）坦率地说出他知道的事，并询问他不知道的事，即有关解除日军武装和蒋介石、毛泽东之间的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为何拖延解除日军武装。苏军司令部迅速解除了日军武装，因此，只要愿意可以迅速解除他们的武装。

蒋经国答道，起初中国政府没有掌握解除日军武装的足够兵力。

斯大林同志指出，解除日军武装几乎不需要任何兵力。

蒋经国表示，现在中国政府有了兵力，并将消灭日本人。苏中条约是针对日本的，因此斯大林大元帅可以放心，中国在其对日政策中将以防止日本东山再起为出发点。至于解除在华日军武装，这一任务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以及中国军队过去曾被日军挤到南方地区这一情况而难以完成。

斯大林同志问，美国人为何不解除日军的武装，日本人并不会反抗，因为日军已经宣布投降了。

蒋经国说，在他看来，中共与政府之间的协定未能签订是由于双方领导人互不信任。

斯大林同志表示，有些让步是必要的，但究竟是哪些，这应由双方自己决定。

蒋经国说，他从广播中听到了国民政府向中共所作的建议。

莫洛托夫同志叙述了报刊上关于国民政府建议和中国共产党人建议的报道。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对这些建议还不完全清楚，但是根据国民政府的建议可以看出，

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政府之间签订协议应当依照的程序制定出来之前，中国政府不同意停止对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

蒋经国说，中国人民对达成协议十分关切，因为内战是可怕的事。

斯大林同志表示，在苏联，人们都知道内战是怎么回事。

莫洛托夫同志说，美国魏德迈将军[①]声明：美军司令部打算增加美军4000人，以保障中国军队向满洲调动，并维持沿途秩序。

蒋经国说，魏德迈这个声明是早在杜鲁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之前，即在马歇尔将军来华之前发表的。

蒋经国说，目前的主要困难在于北平与南京之间铁路不通，因为铁路已被共产党的部队切断，甚至在北平与天津之间100公里的路段，火车也要走一两天。需要尽快达成协议，才能恢复铁路交通。

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协定将改善中国人民的处境并将促进贸易的发展。

蒋经国同意这一点，并说，中国人已经打了许多年仗，因而饱受战争之苦。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对战争已经厌倦了。

蒋经国说，中国尤其饱受贫穷之苦，他（蒋经国）认为，在这次战争中苏联和中国遭到的苦难比其他所有国家都多。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可以向他说出自己对蒋介石的政策的疑虑。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了解实情，他很难说出什么。他（斯大林同志）没有疑虑。他有过一些问题，已告诉蒋经国了。

蒋经国说，在中国所有人都持必须使中国民主化的立场。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这样很好。

蒋经国说，关于中国民主形式的意见尚未形成，因此他（蒋经国）想知道，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民主的形式有何想法。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现在是不是共和国，中国有没有帝制派。

蒋经国回答，中国是一个共和国，目前中国没有帝制派。

斯大林同志说，共和国比较接近于民主。

在苏联没有敌对的阶级，因此苏联可以存在一党制。在中国，除国民党和共产党外，其他政党亦应存在。中国有这样的政党吗？

---

① 艾伯特·科迪·魏德迈（1896–？），1944年10月来华，继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兼蒋介石的总参谋长。

蒋经国回答，其他政党很少。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将选举原则引进中国。政府应该对国会和总统负责。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哪种议会制度适用于中国：一院制还是两院制。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是否还保留各省的政府。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答复。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中国存在哪些派别，是赞成一院制还是赞成两院制。但应将法国、波兰、南斯拉夫、英国和美国那样的选举方式引进中国。议会应当由选举产生，而政府应该由议会任命并经总统批准。在美国，总统同时也是总理。在法国则是另一种情形。法国由下院和上院选举总统，虽然总统也能参加政府会议，担任主席，但他不是总理。但法国和美国的制度符合民主原则。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南斯拉夫和波兰现有的方式中国是可以接受的。

斯大林同志说，南斯拉夫和波兰像法国一样实行两院制。苏联同样有两院，两院享有平等权利。例如，联盟院可以推翻民族院通过的决议，反之亦然。在英国则有不同，英国有下院和上院，但贵族院拥有比众议院更大的权力。在美国有参议院和众议院，其中参议院有更大的权力。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中国有什么样的制度。

斯大林同志问，院是怎么回事？

蒋经国答，院类似于议院。

斯大林同志说，议院的名称可以根据民族特征随便定，但议院应该是由选举产生的机关。

蒋经国问，如果两院出现分歧，在苏联是怎样通过决议的？

莫洛托夫同志答，在这种情况下便召集两院联席会议，决议由多数票通过。

蒋经国问，在斯大林看来，在未来的中国政府中，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应成什么样的比例？

斯大林同志答，在欧洲，一个政党拥有的部长职位取决于它在议会席位的数目。在美国和英国，政府由获得多数票的政党党员组成。例如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工党获得多数，于是他们组成了只有工党党员参加的政府。但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求在其他国家，例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的政府中要有反对党代表。当他（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为什么不允许反对党代表进入自己的政府时，他们耸耸肩膀。

在法国又是另一回事，法国现行的政府组织法比较接近民主制，因为获得少数票的政党代表同样参加政府。倘若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反对党就会转向非法斗争，倘若允许他们参加政府，反对党就会遵守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有好处。

斯大林同志还举了匈牙利的例子。该国小农党得票超过半数，但该党让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及自由党代表进入政府，但为自己保留多数部长职位。

蒋经国答复说，他认为中国自己不应该采用英国现行的民主方式。他（蒋经国）认为，在现阶段，所有民主党派的代表均应参加中国政府。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目前如何估量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丘吉尔和艾登[①]曾认为，保守党将获得多数。艾德礼[②]说他对多数并不抱希望。他（斯大林同志）自己认为，保守党在选举中将得到多数，但胜利者却是工党。中国没有选举，因此难以弄清人民在想什么。想必国民党应得到多数，但是什么样的多数，他（斯大林同志）很难说。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能够共处，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共处。

斯大林同志答，若有自由选举，共产党会存在下去，国民党也会。例如，苏联在和美英资本家和睦相处，未同他们打仗。国民党同共产党尤其应该和睦相处。当然，两党之间会有竞争，但国共两党将存在下去。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对国民党有何意见。许多人不满意国民党。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也不满意国民党。在满洲还散发有国民党署名的传单。这些传单中有号召杀死俄国人的内容。当然，这会引起苏联政府的不满。

蒋经国说，这可能是日本在满洲的挑拨。

斯大林同志答道，在逮捕散发这些传单的中国人时，他们表示，他们是加入国民党的军人。国民党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合法的，另一副是非法的。在满洲从事非法活动的国民党人在长春、沈阳、大连散发的传单中号召居民将苏军从满洲赶出去。国民党的这些行动引起了苏联政府的不满。苏联政府在自己的国家内不允许有

---

① 罗伯特·安东尼·艾登（1897–1977），1940–1945 年出任英国陆军大臣和外交大臣，1945–1951 年艾德礼工党执政时期仍留在下议院。1942 年以后长期为英国保守党领袖。

② 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1883–1967），1940–1945 年先后任英国掌玺大臣、枢密院院长、副首相兼殖民事务大臣。1945–1951 年出任首相，组织工党政府。

反对蒋介石的表示，因为苏联政府同他签订了条约，因此政策方针应该只有一个。也许，国民党内存在不同派别。

蒋经国答复说，国民党内确实存在各种派别。国民党内既有资本家的代表，也有地主的代表。然而，说到满洲的国民党组织，他（蒋经国）清楚记得，蒋介石已下令给国民党在满洲的组织，解散从事反苏宣传的国民党组织，甚至逮捕这些组织的成员。

蒋经国说，应当注意到，满洲的情况十分复杂。

斯大林同志说，这一点他知道。也许，满洲还有自称国民党员的冒名者在活动。但是国民党未正式同散发反苏传单的组织及其活动划清界限。

蒋经国答道，满洲的许多国民党组织已经被解散了，并再次重申，满洲的情况十分复杂。

蒋经国问，对国民党，斯大林同志还有什么话要说。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需要建立使其他政党能够与国民党共存的宽容制度。

蒋经国答道，中国情况十分特殊，蒋介石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所以奉行的是曲线政策。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的政策很难长期执行。

蒋经国答道，蒋介石还没有足够的力量。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共产党人比蒋介石更强大。毛泽东叫嚷他有 150 万军队，而美国人认为他有 60 万。

蒋经国说，当然，这些数字被夸大了。

蒋经国说，许多人认为蒋介石亲日。实际上他做了与日本作战的准备。他（蒋经国）想让斯大林大元帅明白，蒋介石竭力追求新事物。

斯大林同志说，他知道蒋介石有困难，并问，战争期间是否提拔了年轻干部。

蒋经国答道，中国新的军令部长出自年轻干部。

蒋经国提出，他认为，斯大林同志应该关心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当时是在列宁协助下建立的。

斯大林同志答道，国民党将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自由政党而存在下去，认为共产党会吃掉国民党的人将是错误的。国民党当然是比共产党更为广泛和更有影响力的政党。

蒋经国说，他认为如果共产党存在下去，对国民党是有益的，因为共产党的存在将防止国民党腐败。

蒋经国说，需要改组国民党。

斯大林同志说，选举将使国民党趋于完善，因为在选举过程中将进行人员淘汰：优者留下，劣者走开。

蒋经国说，战争期间提拔了许多新人。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是这样就好，因为中国仍然是老人在露面。

蒋经国说，最后他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讨论八年战争期间受到严重破坏的中国经济问题。中国期望摆脱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答道，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有本国的工业，不能只热衷于贸易。假如苏联没有工业，那德国人就把苏联打垮了。由于苏联拥有工业，战争期间才能够每月生产 3000 架飞机、3000 辆坦克、5000 门大炮、40 万支步枪、20 万支冲锋枪。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工业，中国既有原料又有勤劳的人民。

蒋经国说，目前中国正在争论应该更加注重农业还是工业。他（蒋经国）认为，苏联在对德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私有制。

斯大林同志说，虽然美国存在私有制，美国工业是十分强大的。

斯大林同志说，为了发展农业，必须建立工业，修筑铁路，建立化肥厂、汽车制造厂等等。中国尚未开采石油，但在新疆有石油，在南方也应该会有。需要组织石油勘探和开采。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中国有可能借助外国资本发展自己的工业。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可以借助外国资本较快地建立工业。在苏联，由于一切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建立工业并不难。中国实现工业化比较困难，因此中国需要从海外各大国获得贷款，否则工业化将延长许多年。

蒋经国说，中国人担心再次处于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奋斗。中国是个大市场，因此外国将竭力把自己的商品打入中国。进口商品是需要解决的，但同时不应允许外国将任何条件强加于中国。例如美国人不久前曾向波兰提供两亿美元贷款，但提出这些钱要按照美国人的意愿使用的条件。波兰人认为这项条件侵犯了波兰的主权，未接受贷款，并坚持美国贷款要由他们自己酌情使用，而不是按美国人的愿望使用。当然外国会要求中国不要发展自己的重工业。为了不受奴役，需要斗争，中国有条件进行这种斗争。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如何看待门户开放政策。

斯大林同志答道，外国想要苏联打开门户，但苏联政府让他们见鬼去。但中国是一个弱国，形式上只能同意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是外国对半殖民地国家的一

贯要求。

斯大林同志说，美国人曾向苏联政府提出将门户开放政策运用于满洲。苏联政府答复美国人说，苏联政府不是满洲的主人，并说，关于此事应该去找中国。美国人对这种答复感到十分震惊，但还是容忍了。

蒋经国问，在雅尔塔会议上是否讨论过门户开放政策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做了肯定的答复，并补充说，苏联代表在雅尔塔会议上表示，这是中国的事。

蒋经国说，杜鲁门通知中国政府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斯大林同志说，倘若中国同意门户开放政策，苏联政府不表示异议。但苏联自己在中国不要求任何门户开放。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可向中国建议的？ 在现阶段中国难以拒绝门户开放政策，因为中国在战争期间遭受了沉重的苦难和破坏。但稍后中国需要关闭门户以便建立自己本国的工业。

蒋经国说，目前中国在经济上处境确实十分艰难。他（蒋经国）认为，除苏联以外，谁也不愿意中国复兴。

斯大林同志说，他理解这一点。日本人使中国一贫如洗。苏联政府知道，德国人是什么样的强盗。

蒋经国问，苏联和中国如何才能互相帮助。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将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工业并且同它进行贸易。如果中国的大豆、稻米很多，便向它购买；还有棉花、某些原料，少量钨及其他。作为交换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某些机床、机器并派专家给予援助。

满洲是拥有铁路网的十分发达的工业地区，日本人曾想把满洲变成自己在大陆上的工业基地。

蒋经国说，在满洲的中国居民中没有专业干部。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人是有能力的人民，因此他们一定能学会。

蒋经国说，许多中国青年被派到美国学习。

斯大林同志说，这并不坏，同时表示，中国需要自己的工程师、技术员、机械师、金融家、经济学家及农业专家。

蒋经国说，长春铁路的运营需要许多中国的专业人员，因此他（蒋经国）想问斯大林大元帅，他对派中国青年到苏联学校，尤其是运输学校学习有何看法。

斯大林同志说，虽然有困难，但这能做到。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苏联是否适宜。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经济代表团可以来苏联参观工厂。

蒋经国说，他想请斯大林大元帅关注新疆的局势。过去那里曾有许多苏联专家。他（蒋经国）认为，需要恢复原来的状况。

斯大林同志答道，盛世才开始逮捕苏联专家后，苏联政府将他们从新疆召回。[①] 如果好好对待苏联专家，那么可以再派他们回到那里，他（斯大林同志）最近将查明此事。

蒋经国说，现在盛世才已不在新疆。[②]

蒋经国说，中国经济是否能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样的经济基础上得到发展，因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封建残余，存在资本主义关系，与此同时还有集体农庄。

斯大林同志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集体农庄。

蒋经国说，有人告诉他，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发达的工业，那里的人民生活得很好。

斯大林同志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皮革制造厂，修筑了铁路，还采取一些措施开采矿藏。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其他工业。当然现在蒙古人不再是从前那样的野蛮人了。但是，中国不能与蒙古那样的落后国家相比。中国可以成为头等大国。至于经济形态，中国不同于蒙古，不是畜牧国家。在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十分发达。中国珍惜每一块土地。中国拥有建立自己的工业所需要的一切。在蒙古不珍惜土地。蒙古人从事畜牧业，而且他们是缺少文化的牧民。那里冬天牲畜没有饲料保障。蒙古是一个游牧国家，因此，是一个落后国家。因此，无论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都不能把中国和蒙古相提并论。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础是畜牧业，而在中国则是农业。

蒋经国问，对于中国政府在满洲的政策，斯大林同志有何意见。

斯大林同志说，希望中国政府有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满洲政策，这种政策不是针对任何人的，也不受其他国家操纵。蒋介石知道这一点。

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是否无意将香港归还中国人？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回答。

---

① 盛世才（1896–1970），1933 年任新疆省督办时，曾一度采取联苏联共政策，并申请加入联共（布），经斯大林亲自批准后被接纳为联共（布）党员。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对日采取中立政策，中苏两国关系紧张，在新疆地区的矛盾也趋向尖锐化。盛世才预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于是转而投靠蒋介石，采取了反苏反共的政策。为此，苏联政府单方面关闭了自己在新疆的工商企业，运走设备，召回专家，终止了同新疆的经济贸易联系和文化联系。

② 1944 年 9 月，为了调整与苏联的关系，蒋介石将盛世才调离新疆，让他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

斯大林同志说，罗斯福曾强烈主张将香港归还中国，并且当时曾就该问题与丘吉尔激烈争论。

蒋经国答道，英国人目前并不打算将香港交还中国人。

蒋经国说，后天他将飞返中国，并问斯大林同志是否愿意通过他向蒋介石转达什么话。

斯大林同志答道，他将转交一封信给蒋介石。

会谈持续了 1 小时 30 分钟。

（В. 巴甫洛夫记录）

文件 04

斯大林给蒋介石的感谢信

（1946 年 1 月 4 日）

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一远东司司长 Г.И. 顿金

于 1946 年 1 月 5 日交与蒋经国先生

大元帅先生：

感谢阁下的盛情来信，此信已于 1945 年 12 月 30 日由贵公子蒋经国先生面交。

我在同他的谈话中提到了苏中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以及一些中苏两国感兴趣的问题。我希望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依照苏中条约的精神发展，今后我将经常关注此事。

不久前在莫斯科结束的三国外长会议已经取得了有益的结果，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会议有助于对中苏两国有如此重大意义的战后远东问题的解决。

大元帅先生，请接受我的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良好的祝愿。

约·斯大林

致重庆

蒋中正大元帅先生

莫斯科，1946 年 1 月 4 日

发表于《近代史资料》1998 年第 3 期

关于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俄国档案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统天下的权威机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分支机构，都必须服从它的领导和指挥。从20年代直至苏德战争爆发之前，从某种程度上讲，共产国际无异于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和发展，都要视苏联对外关系的需要而定。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和初期，共产国际完全是从苏联的利益出发对各国共产党下达指示和命令，这往往使他们在国内处于被动和尴尬的地位。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安抚西方列国，以保证反法西斯国际同盟的稳固和发展，苏联在1943年解散了共产国际。

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在一些欧洲国家相继掌握了政权，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问题。于是，又有人开始谈论建立共产党国际机构的事情。就目前看到的文献，至少在1946年5月这一问题已经提上了某些共产党的议事日程（有材料说战争尚未结束时铁托就谈到这个话题）。不过，当时多数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党所强调的都是按照本国国情走各自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苏联在大国合作的总体外交路线指引下，也主张各国保持人民民主制度，不要学习苏联搞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以免加深西方大国的猜忌和对抗。194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战后，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矛盾日益显露并趋向尖锐化，特别是马歇尔计划的出现，以及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被排挤出政府，苏联感到西方的压力和进攻态势越来越强。而此时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则是一盘散沙，有些执掌或参与政权的共产党甚至各行其是，这使莫斯科颇为恼火，因此开始考虑在可能的范围内建立起统一各党行动的协商机构——如果没有遇到强烈反对，这种机构最好具有协调和指挥职能。1947年9月的九国工人党、共产党协商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联共（布）中

央为此做了充分准备。会议把法共和意共作为批判的靶子，因为他们迷恋于议会斗争而其行动方针也没有事先向莫斯科请示；会议把抵制马歇尔计划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因为有些共产党掌权的国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竟违背莫斯科的旨意表示愿意接受美国援助；会议把加强阶级斗争、加快国有化和集体化作为统一国内发展方针，以此来规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会议把两大阵营对立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危险作为观察现实世界的标准，以此来协调各共产党国家的对外政策。这次会议决定建立工人党、共产党情报局，并确定情报局的宗旨、任务和职能。

尽管各国共产党代表在会议期间表示了对苏联和斯大林的忠诚和服从，但在一些实际和具体问题上仍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就使得这一阵营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暴露出来，以至斯大林不得不拿南共和铁托开刀，并通过大清洗的残酷方式进行内部整肃。当然，这已经是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的主题了。

这里选编的若干份档案文献，反映了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大体过程。为了便于读者对这些档案文献的理解，编者做了必要的注释和技术性说明。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参加翻译的有王英杰、刘新宇、吴红、侯静娜、方琼）

文件 01

巴拉诺夫关于华沙会议议事日程和苏联代表团与会问题给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7 年 8 月 15 日）

绝密

参加共产党代表华沙会议[①]的联共（布）代表应遵循以下指示：

在会上听取所有共产党的情况报告。应当估计到这些党的报告人会提出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某些策略问题，并建议形成统一的观点。因此，与会人员显然会要求听取关于国际形势的专门报告。在这种情况下，联共（布）的代表可以就这一题目作一个专题报告，讲解当前国际形势中最重要的问题，并回答各共产党代表在其报告中提出的某些问题。

在共产党代表互相交换了信息和作了国际形势报告之后，可以就一些非常迫切

① 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于 1947 年 9 月 22–26 日期间，在波兰的什克拉尔斯卡 - 波伦巴市（西里西亚）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的问题组织交换意见。

会议拟提出讨论的主要问题是：

1. 民主组织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企图在经济上奴役欧洲国家斗争中的任务（《马歇尔计划》）。

2. 关于德国的国家制度和经济制度。

3. 关于各国共产党对苏联和联共（布）的态度。

4. 关于共产党行动的协调和相互提供情报的形式。

当然，会议上交换意见可能并不限于上述内容，显然还会提出另外一些问题，并且就它们交换意见。但是，会议的中心应当是上述问题，因为它们是当代国际形势中最重要的决定性问题。

联共（布）代表在对上述讨论结果进行总结时，可以支持成立协调委员会的想法。如果交换意见表明有这个必要，而且这个建议是由其他党的代表提出的。

联共（布）代表对关于成立出版情报刊物的机构也应持此立场。

至于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成立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危险而斗争的国际委员会的建议，目前应当反对通过。成立这一组织有可能：(1) 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国际形势复杂化，(2) 对现有的世界民主组织（工会、青年、妇女联合会）的作用产生怀疑，因为它们的使命就是为和平、民主而斗争。

如会议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通过致世界民主组织书，则可予以接受。但呼吁书必须号召世界人民与战争贩子，与反对派干涉各国人民经济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企图进行斗争。

会议应当秘密进行，结束后可以发表一个简短的公报和呼吁书。

联共（布）的代表应当拥有关于会议日程所有主要问题的详细材料，此材料必须认真准备并报经联共（布）中央批准。①

Л·巴拉诺夫

① 日丹诺夫对巴拉诺夫的这一书面报告做了重大修改，并于 1947 年 8 月底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阐述了自己对于即将举行的协商会议的计划方案的建议。日丹诺夫认为，联共（布）应该在会议日程中提议两个问题：(1) 关于国际形势；(2) 关于协调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行动。第一个问题的报告应该责成联共（布）代表来做，而第二个问题的报告委托给波兰方面。斯大林同意了日丹诺夫的计划。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是日丹诺夫起草的，报告提出了关于世界已经分成两大阵营的理论。

文件 02

第一次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开幕式会议记录

（1947 年 9 月 22 日）

绝密

会议于 18 时 15 分开始

由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哥穆尔卡同志[①]致开幕词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怀着深刻激动而喜悦的心情在自由的波兰，在曾为凶恶的德国帝国主义堡垒的土地上欢迎你们大家。

我们高兴，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变化之后，当年英勇而积极地参加了这些变化而今天代表着本国空前强大力量的各党代表们见面了。

对我们运动中那些为了本民族自由、工人阶级事业和社会主义英勇地、忘我地献出了生命的各位战士应给予应有的评价，让我们为他们默哀一分钟（与会者起立，为牺牲的战士默哀）。

在我们给各党的邀请信[②]中，我们已经陈述了倡议召开这次会议的动机。你们的到来表明，我们各党都要求对目前形势交换看法，而且这种要求不断增长。我们的会议再次证实了恩格斯大约在 70 年前就讲过的话：

“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从未间断过的密切联系证明，国际所启发的关于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一致和相互团结的觉悟，即使没有一个定型的国际联合会，仍然能够为自己开拓前进的道路。”

我们所有的党都希望从联共（布）的经验和英勇斗争中，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革命思想和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中听取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是在伟大的变化时代聚会的，这一变化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来自因苏联实力、地位和意义的巨大增长而带来的新的阶级力量对比态势（在粉碎德国帝国主义和解放被奴役的欧洲人民的斗争中，苏联承担了整个重担），来自因人民

①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1943–1948 年担任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1945–1949 年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 年因被指控“右倾民族主义倾向”而被免除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职务，1951 年被逮捕。

② 指由哥穆尔卡代表波兰工人党中央签署并寄给即将参加会议的各共产党领导人的 1947 年 7 月 25 日信件。

民主国家的诞生而给帝国主义体系所造成的新的缺口。

这些变化的普遍结果是世界资本主义战线的明显衰落，革命和反帝力量的明显增长。我们还深刻记得列宁所说的话：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本来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平衡，什么谐和，什么均匀。在每个国家的发展中，都是有时是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这一方面、这一种或这一类特点特别突出，有时是另一方面、另一种或另一类特点特别突出。发展过程从来都是不平衡的。”

我们意识到中欧和东南欧国家在发展上同西欧的主要区别。我们认为分析这些区别，即使从实践活动的观点看，对我们也是重要的和有教育意义的。

我们希望在开会期间弄清我们相互援助的办法，我们在这一阶段相互联系和实施思想影响的最佳形式。

请允许认为我们的会议已经开幕。

然后，哥穆尔卡同志宣布了参加会议的代表名单：

1. 安·亚·日丹诺夫①，来自联共（布）

2. 格·马·马林科夫②，来自联共（布）

3.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来自波兰工人党

4. 希拉里·明兹③，来自波兰工人党

5. 雅克·杜克洛④，来自法国共产党

6. 艾蒂安·法戎⑤，来自法国共产党

7. 路易吉·隆哥⑥，来自意大利共产党

8. 埃德日尼奥·雷阿勒⑦，来自意大利共产党

9. 爱德华·卡德尔⑧，来自南斯拉夫共产党

---

①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

②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

③ 希拉里·明兹，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业和贸易部部长。

④ 雅克·杜克洛，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委员。

⑤ 艾蒂安·法戎，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委员，1948–1950年期间，担任《人道报》主编。

⑥ 路易吉·隆哥，意大利共产党副总书记。

⑦ 埃德日尼奥·雷阿勒，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国际部主任。

⑧ 爱德华·卡德尔，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自1948年起担任外交部长。

10. 米洛凡·吉拉斯[①]，来自南斯拉夫共产党

11. 鲁道夫·斯兰斯基[②]，来自捷克共产党

12. 什特凡·巴什特万斯基[③]，来自斯洛伐克共产党；

13. 维尔科·契尔文科夫[④]，来自保加利亚工人党（共）；

14. 弗拉迪米尔·波普托莫夫[⑤]，来自保加利亚工人党（共）；

15. 乔治乌－德治[⑥]，来自罗马尼亚共产党

16. 安娜·波克[⑦]，来自罗马尼亚共产党

17. 米哈伊·法尔卡什[⑧]，来自匈牙利共产党

18. 约瑟夫·雷瓦伊[⑨]，来自匈牙利共产党

哥穆尔卡同志提议选举会议第一场会议主席。

一致选举哥穆尔卡同志为会议主席。

哥穆尔卡同志建议批准各共产党提交的来宾名单：

1. 雅·贝尔曼[⑩]，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2. 亚·萨瓦茨基[⑪]，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3. 斯坦·拉德凯维奇[⑫]，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

① 米洛凡·吉拉斯，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不管部部长。

② 鲁道夫·斯兰斯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政府副主席。1951年因被指控犯有“反国家阴谋”罪，被免除一切职务并被逮捕。于1952年被判刑并被处决。

③ 应为巴什特万斯基·什特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成员，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④ 维尔科·契尔文科夫，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后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书记。

⑤ 弗拉迪米尔·波普托莫夫，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担任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总书记；1949–1950年期间担任外交部长。

⑥ 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后为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总书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⑦ 安娜·波克，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后为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书记，外交部长。

⑧ 米哈伊·法尔卡什，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副总书记，后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副总书记，国防部长。

⑨ 应为雷瓦伊·约瑟夫，匈牙利共产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后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书记。

⑩ 雅库布·贝尔曼，波兰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波兰部长会议主席团副部长。

⑪ 亚历山大·萨瓦茨基，波兰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自1949年起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

⑫ 斯坦尼斯瓦夫·拉德凯维奇，波兰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波兰社会安全部长。

4. 贝·格明德尔[①]，捷共中央领导干部

5. 古·巴列什[②]，捷共中央领导干部

6. 亚·尼·库兹涅佐夫[③]，日丹诺夫同志助理

7. 德·尼·苏哈诺夫[④]，马林科夫同志助理

8. 安东·弗拉图萨[⑤]，南共中央领导干部

通过名单。

然后哥穆尔卡同志提议批准以下会议时间规定：

开会时间：11—15 时和 18—22 时。

情况报告为两小时，不含翻译时间。

通过提议的时间规定。

哥穆尔卡同志提议成立会议秘书处，成员有巴拉诺夫同志[⑥]——来自联共（布），罗曼·萨姆布罗夫斯基[⑦]——来自波兰工人党。

秘书处的职责是：

（1）进行记录；

（2）受会议委托起草提案和建议。

记录使用俄文。会议工作结束时，记录应由所有代表团签字。

通过哥穆尔卡同志的提议。

哥穆尔卡同志通知，会议日程上有各共产党代表的情况报告。哥穆尔卡同志还强调说，在总结情况报告和交换意见的基础上，产生会议要讨论的问题。

通过哥穆尔卡同志的提议。

---

① 格明德尔·贝德日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国际部主任。1952 年因被指控犯有“反国家阴谋”罪被处决。

② 巴列什·古斯塔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担任《红色权利报》主编。

③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库兹涅佐夫，联共（布）中央副书记，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④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苏哈诺夫，联共（布）中央副书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助理。

⑤ 安东·弗拉图萨，南斯拉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办公厅负责人。

⑥ 列昂尼德·谢苗诺维奇·巴拉诺夫，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自 1949 年起担任联共（布）中央情报部部长，同时担任共产党情报局秘书处办公厅主任。

⑦ 罗曼·萨姆布罗夫斯基，波兰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为政治局委员。

文件 03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情报局会议第一天情况给斯大林的通报

（1947 年 9 月 22 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①]

今天，9 月 22 日晚情报局大会开幕。参加会议的有被邀请的各国共产党的全体代表：来自波兰的哥穆尔卡和明兹、来自南斯拉夫的卡德尔和吉拉斯、来自罗马尼亚的德治和安娜·波克、来自匈牙利的法尔卡什和雷瓦伊、来自法国的杜克洛和法戎、来自意大利的隆哥和雷阿勒、来自保加利亚的契尔文科夫和波普托莫夫以及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和巴什特万斯基。哥穆尔卡做了简短的会议开幕词。大会委托哥穆尔卡主持最初的几次例会，然后每个共产党的代表将轮流主持会议。大会决定不做速记记录，而只是用俄文做简短的书面记录。在通过了会议的议程之后，开始听取各国共产党的情况报告。只有哥穆尔卡和马林科夫作了报告。其他代表没有准备在第一次会议上作报告。

哥穆尔卡的报告内容丰富。报告对波兰的政治局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通报了共产党所做过的工作。

在报告的结尾处，在分析波兰工人党的对外政策时，哥穆尔卡提出了关于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的问题。他指出，波兰工人党在工作最困难的所有关头，都有机会得到了联共（布）领导人的忠告，这些忠告给波兰工人党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因此，各国共产党之间相互交流经验和相互帮助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现在世界帝国主义打算进行反共产主义的行动时。

明天一早，保加利亚人和法国人——契尔文科夫和杜克洛将作报告。大会约定，在情况报告结束之后，将明确根据这些情况报告提出的问题，并将这些问题列入大会下一步工作的计划中。

就总体印象而言可以得出结论，大会的全体代表对会议的召开极为满意。

谢尔盖耶夫[②]
鲍里索夫[③]
1947 年 9 月 22 日

① 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② 谢尔盖耶夫是安·亚·日丹诺夫的化名。

③ 鲍里索夫是格·马·马林科夫的化名。

文件 04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契尔文科夫的报告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 年 9 月 23 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在 9 月 23 日上午的会议上，听取了契尔文科夫（保加利亚）和杜克洛的情况报告。契尔文科夫的报告从质量和政治水平来说属于中等。但是，契尔文科夫十分令人感兴趣地概述了保加利亚的政治局势，这种评述具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报告还对党的任务做了详细的论述。契尔文科夫还指出了党的最大的缺点是共产党人在农村中行政工作方面的过火行为，尤其是在进行粮食收购时，以及党务工作人员极低的思想政治水平。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保加利亚人实际上已经停止接收党员，并对党进行了清洗：仅在今年就在总数 50 万党员中开除了 30000 名党员。谈到国家机关时，契尔文科夫通报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即在保加利亚驻国外的大使中，有许多对政府心怀不满的右翼分子，以及军队中的许多指挥岗位，时至今日仍然被政治上不可靠的军官占据着。

作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契尔文科夫列举如下：主要任务——保证保加利亚的独立和主权；同苏联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友谊；提高对战争贩子的警惕性，与保加利亚的美、英帝国主义的走狗进行斗争；制定五年计划；制定严格的经济措施；准备对大型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措施（目前在 492 个最大型的企业中，有 16% 已经实行了国有化）；加强生产合作社；完成宪法的制定工作，并对其中的条款进行修改，取消总统，改为主席团；在宪法得到最终批准之后，对政府进行改组，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政府；祖国阵线委员会的组成从均等原则的基础，转为选举制，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巩固党在祖国阵线中的地位，据保加利亚人看来，这将巩固党在祖国阵线中的地位。

（待续）

文件 05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杜克洛的报告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 年 9 月 23 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接上）

关于杜克洛的报告。杜克洛的报告给我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杜克洛没有从法国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之后的处境中吸取任何教训。与此恰恰相反，杜克洛认为党在采取统一行动之前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杜克洛报告的基本内容可归纳如下：法国的政治局势正朝着有利于反动派的方向发展。法国越来越倾向于西方集团，并逐渐变成英、美帝国主义的仆从国。这种局势在法国的工人阶级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情绪。

当共产党人还在政府里任职时，法国的工业总产值一直在持续地增长，并达到了战前水平的 95%。为提高工业总产值，共产党人从不吝惜自己的力量。

排挤共产党人这一情况对生产的增长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就连工厂主也在散布对局势的不满情绪。因此工业产值下跌了。

谈到到农业，杜克洛认为是灾难性的。这种灾难性的农业导致了供应方面的尖锐危机。由于干旱，使得今年的谷物，尤其是小麦，收成不好，而不正确的物价政策更加重了这种歉收的后果。近年来，次要农作物的价格一直高出小麦价格许多，这导致小麦的播种面积由战前的 500 万公顷下降到 1947 年的 300 万公顷。其结果是法国今年供应不足，即便是他们能够从美国进口 80 万吨谷物，那么也还要欠缺 100 万吨。

形成的局面是：在谷物方面他们完全依附于美国。

除了最必需的东西，例如与俄罗斯相比质量差并且价格昂贵的美国煤炭之外，已经停止了对其他货物的进口。

法国在美国面前卑躬屈膝，它请求美国为其提供民用食品和工业原料。没有了美元，法国开始吞食最后的黄金储备，在拉马第政府执政时期这种吞食更加厉害了。

法国的对外贸易逐渐被美国人控制起来。法国的收支极不平衡。法国与苏联和

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等于零。国家预算出现赤字。庞大的军事支出成了国家的负担。印度支那战争每天要耗费1亿法郎。

随着共产党人离开政府，物价逐渐上涨。工人阶级的处境严重恶化。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跌至战前的一半。拉马第执行着“罪恶集团”厚颜无耻的政策，并直截了当地宣称，任何一次提高工资，都将会引起物价相应的提高。

资本家的收入在持续不断地增长，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资料，这个数字在1945年是170亿法郎，而在1946年是1100亿法郎。

社会党人拒绝对富人实行紧急征税的措施，同时还继续提高物价和税率。法国共产党人极为关注这种状况，并准备提供任何一种帮助，以使国家摆脱美国帝国主义的奴役（这显然是在间接地暗示希望获得苏联方面的帮助）。

此后，杜克洛对近年来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的策略进行了评述，并最终将这段历史追溯到共产党人被开除出政府。同时，杜克洛还为党的政策进行辩护，并不承认党的领导人有任何错误。党的一切策略都被他解释为，或者是由于必须保持与工人阶级的联系，或者是由于不疏远中产阶级。软弱无力和无原则地屈从于一个个的议会组合，缺乏坚定的路线和前进的目标，这些描述都给大会留下了不良的印象。

当杜克洛做结论性发言时，更加显现出了党的不利处境。将党的全部希望与即将进行的市政选举联系在一起。杜克洛声明说，如果全体兄弟党目前能够开展一场共同地反对新的战争贩子的运动并帮助法国的话，那么，法国共产党就有希望在市政选举中获胜。

其次，杜克洛对社会党人的左倾观点抱有极大的希望，他极其详细地讲述了在社会党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居伊·摩勒成功地将极左的章程列入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但是，杜克洛忧伤地说，大概，社会党人在实际工作中可能会脱离这些原则。杜克洛所看到的出路是，使法国社会党人的大多数确信与共产党人共同行动的必要性。但是，对此法国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杜克洛求助于全体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人与法国的社会党人不同，以便通过他们对法国的社会党人施加影响。

最后，杜克洛在结束报告时说，在群众中出现了为争取共产党人返回政府的运动，但是，目前党对群众说，只有在政府改变政策的条件下，党才能够返回政府。

文件 06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斯兰斯基和乔治乌－德治的报告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 年 9 月 24 日）

莫斯科

致非利波夫

在 9 月 23 日晚间召开的会议上，听取了斯兰斯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德治（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报告。

斯兰斯基确定了实行工业国有化所取得的成绩，目前，全部工业的 75% 已经被国有化了。1947 年的最初 8 个月里，两年经济计划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01%。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 1939 年相比，实际工资增长了 34%。

工人阶级的情绪很好。农民阶级也支持新的民主制度。农民的物质生活已经达到了战前的水平。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贫雇农获得了 170 万公顷的可耕地。正在制定关于将土地收归国有的立法草案，即将个人手中超过 50 公顷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这样一来，还将会有 50 万公顷的土地可分配给需要土地的人。

共产党人实行的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绩，动摇了反动派的地位，但是，他们在国内的力量仍然还很强大。尤其是在斯洛伐克局势尤为严重。在基督教教会的庇护下，斯洛伐克民主党成为反政府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该党还在斯洛伐克领导了分离主义运动。布拉格政府的指示遭到了暗中的对抗。国家的经济机关里混入了许多法西斯分子以及破坏分子。斯洛伐克是国际侦察机关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危险巢穴。

贝奈斯的党和右翼分子支持与斯洛伐克的反动势力秘密结盟。

在斯洛伐克出现的困难局面，由于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错误而更加严重了。斯洛伐克共产党的许多党员不懂得，民族问题应该服从于共同的政治任务，他们阻碍与地方的民族主义分子进行的斗争。

涉及到民族阵线问题，如果说在参加统一阵线的各政党以及共产党的同盟者的上层中，反共产党的倾向十分严重的话，那么在这些党的基层组织里却合作得十分友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联合的思想在下层十分强烈。民族阵线所依靠的不仅仅是各政党，而且还有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青年联盟以及其他的群

众性组织。

贝奈斯表现得不好，在多次讲话中攻击共产党人。即使身患疾病，贝奈斯仍然依据抵抗进步的民主措施的精神，经常干涉国家事务的解决。

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共产党提出了继续清洗国家机关，这些国家机关中有许多旧的反动官僚分子和贝奈斯分子。在外交部里共产党人的地位是极其薄弱的。必须清洗军队中的反动分子。共产党人在中等军官阶层中的力量最为薄弱。斯沃博达将军受反动分子的影响。

谈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政策，斯兰斯基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是新的民主制度这个堡垒上最西边的堡垒，并感受到来自美国帝国主义的特别压力。捷克斯洛伐克反动分子对共产党人的对外政策的攻击加强了。贝奈斯、马萨利克、国家社会党的领导人、天主教党的右翼分子——是英、美分子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支柱。英国和美国的大使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内部事务。施泰因加特大使威胁哥特瓦尔德，说美国军队将在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地区部署军队。美国的军队确实进行了一些调动，以便给散布那些引起惊慌的谣言以借口。但是，直到目前，在主要的对外政策问题上共产党人仍然占据着上风（与法国的友好条约、与波兰的条约、对“马歇尔计划”的态度，等等）。共产党人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在斯拉夫国家对苏联的态度方面他们的政策在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对苏联的好感更加增强了。

共产党目前拥有党员 1172000 人。在对全体党员实行普遍重新登记的工作结束之后，中央开始接收新的党员，并计划在 1948 年 5 月 1 日前夕使党员的人数达到 150 万人。党非常重视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工作。

斯兰斯基赞成关于必须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相互联系的建议。

对斯兰斯基报告的总印象还是很好的。

德治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是用来阐述众所周知的那些事实，即 1944 年 8 月 23 日之后罗马尼亚共产党为争取本国民主制度的胜利而进行斗争的历史事实。与此同时，他还不止一次地强调了苏联给予罗马尼亚民主力量的巨大援助。

德治是这样评价目前议会和政府中的力量对比情况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依靠自己的同盟者，在议会和政府中可以做出任何决定。

由于进行了货币改革以及今年的大好收成，德治对于国家经济状况改善的前景非常乐观，并表示坚信：一定能够完成共产党人提出的稳定经济的 6 个月计划，并拟定在今年年底使工业生产水平达到战前的 70%。

同时德治确定说与反动派的斗争在不断地尖锐化。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影响

下，国王再一次表现出企图破坏与政府的契约，重新拒绝签署政府的一系列法律草案。王宫逐渐变成反政府活动的基地。

对国家农民党的打击，以及即将进行的对该党领导人的审判，也是对国内反动分子以及盎格鲁-撒克逊反动派的打击。

在民主联盟的内部，与特特勒斯库的斗争正在日益加强，显然，只要特特勒斯库党内正在增大的反对派留在联盟内，这种斗争在近期就会导致与特特勒斯库合作的中断。

社会民主党人继续加强自己与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法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系。社会民主党内的右翼分子正在进行着反共产主义的、反苏联的活动。由于共产党开展了揭露社会民主党右翼分子的计谋，也由于社会民主党在工会组织领导机构选举中遭到了彻底失败（共产党获得了 85% 的席位，而社会民主党只获得了 10% 的席位），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被迫将一批极端的右翼分子开除出党和政府。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提出了关于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政党的问题。

共产党认为，目前应该将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政党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罗马尼亚共产党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途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的基础上，将两个党合并成一个政党。这将导致社会民主党的消失，从而不给反动派以机会，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社会民主党这个招牌，比如说，如果共产党从基层开始吸收社会民主党人加入共产党的队伍，或者是在已经没有党员群众的情况下仍然保留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如果这样就有可能被反动派利用。工人阶级统一政党的纲领草案已经制定，并将对其进行广泛的讨论。

在今后的政策中共产党将从以下几点出发：

（1）在罗马尼亚的对外政策中，坚定地执行同苏联友好的方针。罗马尼亚不能依附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广泛地宣传对苏联的热爱和友情。

（2）完成稳定国内经济状况的 6 个月计划，提高工业生产的水平，通过降低物价的途径来逐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根据 6 个月计划所取得的成绩来制定经济计划。

（3）巩固和扩大工业中的国家成分，加强国家对私营成分的监督。

（4）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以有益于劳动人民群众。

（5）通过税收和信贷制度来缩减资本家的巨额利润，实行怠工法。

（6）集中银行。

（7）确保农民的农业机械贷款。

（8）全力开展农村的消费合作社，使其逐步转化成生产合作社。

（9）继续清洗党务机关中的法西斯分子和反动派分子，其中包括在进行审判时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10）对军队进行改革，使军队的领导权转入共产党手中。

（11）制定新的宪法，这一宪法将极大地限制国王的政权，并为完全消灭国王的政权提供可能性。

尽管斗争局势极为困难和复杂，共产党认为，罗马尼亚已经加入了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这一进程，并拥有继续更快地发展这一进程的前途。

目前，罗马尼亚共产党共有党员 71 万人。

德治报告给人总的印象不太好。

今天上午南斯拉夫人卡德尔和吉拉斯、意大利人隆哥进行了发言讲话。

谢尔盖耶夫

鲍里索夫

1947 年 9 月 24 日

文件 07

马林科夫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会议日程安排的发言

（1947 年 9 月 24 日）

绝密

休息之后哥穆尔卡同志说：

同志们，我们的日程已经结束。我们听取了所有的情况报告。现在我们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确定下一步的日程。第二，选举会议主席，因为我们以前曾商量好，为了讨论议事日程首先必须选出主席。我请你们发表看法。请马林科夫同志发言 [联共（布）代表团]。

马林科夫同志：

同志们，我们大家聚精会神地听取了出席本次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代表的情况通报。这些通报引起了我们很大兴趣。其中反映了各布尔什维克党在各国具体情况下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斗争经验。所以说，我们的会议已给我们带来很大好处。

但是，如果我们只局限于情况通报，不就我们共产党关心的某些主要问题交换意见，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会议就辜负了我们对这次会晤的希望。

我们生活在美帝国主义宣布了实施反共反民主远征的形势之下。

我们是分散斗争还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一起？

充分地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弄清，就国际形势问题和当代条件下各共产党的策略问题交换意见的必要性成熟到了什么程度。

出于我向你们陈述的这些理由，联共（布）代表团建议——看来，这是代表们的共同意见——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1）关于国际形势问题；

（2）关于各共产党行动的协调问题。

我们建议分别听取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报告，并进行必要的意见交换。

如果我们的建议被接受，那么我们代表团准备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

至于第二个报告，我们觉得应由波兰代表团代表来作。波兰同志们是召开这次会议的倡导者，自然，他们可以继续充当倡导者，就共产党活动的协调问题作报告并提出建议。

这样，同志们，我建议就我们所听取的情况通报不进行辩论，而是交换意见，以便确定我们会议的下一步工作计划，确定我们应将哪些问题列入下一步工作计划，我们应就哪些问题听取报告，交换意见和做出决定。

会议主席争求与会者对马林科夫同志建议的意见。大家表示同意。日程通过了。

马林科夫：由于我们的建议被通过，联共（布）代表团根据日程的第一个问题推举日丹诺夫同志为报告人。

会议主席提出建议：选举下一步会议主席。

日丹诺夫同志提议哥穆尔卡继续担任主席。

明兹同志建议由联共（布）代表团担任主席。

哥穆尔卡同志支持明兹同志的建议并指出，波兰代表团的倡议已经通过了，因为波兰同志们信中所说的计划已经完成。现在会议的事情是决定下一步工作和会议主席问题。

会议表示同意明兹同志的建议。

委托联共（布）代表团为下一步会议的主席。

会议于 21 时 30 分结束。

文件 08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卡德尔、隆哥和雷瓦伊等人的报告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4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9月24日，会议听取了卡德尔和吉拉斯（南斯拉夫）、隆哥（意大利）和雷瓦伊（匈牙利）的情况报告。

卡德尔作了内容十分详细的报告，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共产党在这个斗争中的作用进行了短要的历史性的概述，并详细地评定了南斯拉夫当前的局势和党的政策。但是，一些新的、我们所不了解的情况，卡德尔没有谈及。卡德尔赞同大会的召开，并支持联共（布）关于必须讨论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以便交流经验和协调行动的措施的建议。吉拉斯在党和人民阵线组织工作的问题方面对卡德尔的报告进行了补充。南斯拉夫共产党约有党员45万人，人民阵线按会员证以及交纳的会员费计算约有420万名成员，而实际上大约有600万名成员。南斯拉夫共产党通过人民阵线开展工作，人民阵线是一个统一的群众性政治组织。人民阵线的纲领同共产党的纲领是一致的。人民阵线在政治和组织上的巩固，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个主要任务。党和人民阵线的全部力量被动员参加完成五年计划的斗争。正如卡德尔和吉拉斯所声明的那样，他们将在一切方面利用苏联的经验。南斯拉夫已经走上工业化的、并在新的起点上发展农业的道路，即为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在国内尤其是在农村消灭资本主义成分建立牢固的基础。卡德尔极其详尽地描绘了五年计划的任务。

卡德尔和吉拉斯的报告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接着是隆哥（意大利）发言。隆哥报告的大部分内容讲述的是，意大利法西斯制度衰落的历史，以及意大利北部出现的在共产党人庇护下的游击斗争和抵抗运动的历史。这些叙述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是枯燥地罗列了在1943年7月25日至1946年底这一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涉及到今年春天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这件事情时，隆哥只是依据报刊上发表的陶里亚蒂对这件事的解释，十分含混不清地简述了这一问题。从隆哥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目前已经拥有220多万名党员的意大

利共产党，由于其领导人的错误和惊慌失措，不知道今后将怎样做，也无法预料事件的发展。

德·加斯佩里政府在意大利的民主力量之间进行挑拨活动，企图将共产党推上冒险和暴力行动的道路上，以此为反动派扫清道路。反动派非常理解这是作为向民主力量以及工人阶级发动进攻的信号。反动派希望在对外政策领域大显身手，以便使意大利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顺从的工具。德·加斯佩里准备在1948年春天对议会进行新的选举，也可能这种选举会向后拖延。另外，开始了限制民主自由的一系列措施：搜查共产党人的住所，企图禁止各企业中工人的集会，禁止出版墙报，借口指控其犯有刑事杀人罪开始逮捕游击队员等等。同时给法西斯的报刊以自由。

从隆哥的报告中还看不出来，共产党是否考虑过对反动派进行回击的问题。

当谢尔盖耶夫向隆哥提出这样的问题时：即共产党是否计划向反动派和德·加斯佩里政府进行反攻，或者在暂时还没有对它实行全面禁止时，只是打算继续进行防御和退让，隆哥没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同时以指出开始的罢工和工人们的示威游行作为掩饰，并说党准备广泛开展这种罢工和示威游行活动。当谢尔盖耶夫反驳说，德·加斯佩里的基督教民主党实际上是进行了一场政变，反对国内最大的一个政党，恢复了议会的一切权利，它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共产党会不进行任何战斗就做了让步——隆哥开始引用国内的客观形势对这一切进行辩白。

按隆哥的话说，共产党希望开展孤立德·加斯佩里政府的群众性运动，联合一切左派力量并为除掉德·加斯佩里政府而斗争。这个政府中的绝大部分成员是不牢固和不稳定的。南尼和陶里亚蒂，他们每个人都分别向议会提出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本周应该对这些提案进行讨论。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确认，在向反对立场转变的过程中党表现得极为软弱，从而使反对派在群众集会上有了更多的说话机会。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注意到今后斗争的更加残酷以及可能会出现警察的镇压行动，“研究组织进行抵抗的可能性，并准备号召广大群众参加斗争”。隆哥是这样说的。

隆哥的报告给与会的大部分代表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

在晚间的会议上，听取了雷瓦伊（匈牙利共产党）情况的报告。雷瓦伊的报告内容十分丰富，报告对匈牙利的政治形势，以及红军解放匈牙利之后它的现实状况作了分析。

目前在国内各种势力进一步划分界线，反动派与民主制度的斗争也日趋尖锐

化。民主力量在增强和巩固，但是，在民主阵营里也出现了分化：社会民主党和国家小农党里的右翼分子形成了组织，而这些党的左翼分子同共产党人亲近。

目前尚未得到解决的是这样的问题：在匈牙利建立的将是人民民主制度，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匈牙利是加入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行列，还是将成为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柱。目前，在匈牙利是两种民主制度并存，最终确立哪种民主制度，这将取决于共产党的策略、毅力和智慧。

目前的四党联合政权不能确保人民民主制度在国内取得胜利。这个联合政权是临时的不稳定的，最近就可能被新的势力集团所取代，为此共产党应该帮助社会民主党和国家小农党内的左翼分子团结起来，将这些党内的右翼分子驱逐出去，或者是分裂这些政党。这样就有可能与这些重新复兴的政党或者是脱离了这些党的左翼分子结成牢固的联盟。共产党应该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

应该粉碎最反动的普费伊费尔半法西斯主义政党，将其赶入地下，以恐吓其他党派中的右翼分子。最终应该建立新的集团，这个集团将成为真正的民主政府的组织。

在对外政策领域应该保持与苏联以及其他斯拉夫国家牢固联盟的方针，决不允许匈牙利变成英、美帝国主义在巴尔干地区的跳板。除存在着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无权地位有关的困难之外，与斯拉夫国家结盟的前景是非常美好的。这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这个问题将会妨碍有关匈牙利族人与斯拉夫族人亲密友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

雷瓦伊表示赞同联共（布）代表团的建议，必须讨论国际形势的问题，以及巩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和协调他们的行动的问题。

总的来说，雷瓦伊的报告给大家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听取完情况报告之后，鲍里索夫提出建议：

不再就听取的报告进行实质性的讨论，而就会议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交换意见。大家对此表示同意，并根据我们的建议确定了下一步工作的日程：

（1）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谢尔盖耶夫代表联共（布）作报告；

（2）关于协调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行动——由波兰工人党代表团代表进行报告。

委托联共（布）代表团主持下一场会议。

9 月 25 日上午，谢尔盖耶夫作报告。

文件 09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将情报局驻地设在华沙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 年 9 月 24 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今天大会结束了对各国共产党情况报告的听取工作。关于南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报告情况，我们将作补充汇报。在报告工作结束之后，根据我们代表团的建议，大会决定将以下两个问题列入会议日程中：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以及关于协调各国共产党之间行动的报告。正如所约定的那样，第一个报告将由我们的代表来作，第二个报告由波兰人来作。

由于波兰人要作报告，哥穆尔卡和明兹请求会晤并阐述了以下观点：波兰人不希望在华沙建立任何一种合法的情报局。如果一定需要这样的机构，是否最好将其建立在贝尔格莱德或者是布拉格。如果莫斯科不适合作为这个合法的协调机构的驻地的话，那么，依据同样的理由，华沙也不适合成为这样的地点。当我们阐述了在华沙成立这样的情报机构将会带来益处的理由时，哥穆尔卡和明兹说，他们不想用波兰的利益进行冒险，因为在波兰建立情报局将会被看做是共产国际的复活，而这会给波兰的对外关系领域造成不良的影响，波兰将会失去在国外购买货物的权利。为什么波兰共产党应该背上这样的包袱呢？如果说到我们，波兰人，那我们非常满意现存的与联共（布）的接触。我们说，对于事情的如此变化我们没有预料到，最好是在作完国际形势报告之后，当情况以及必须协调的问题变得非常明朗的时候，我们再与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这样约定好了。但是，过半个小时之后，哥穆尔卡又再一次补充了自己的理由，并说，波兰人原则上反对情报局，并认为，在这一阶段应该限制杂志的出版，正如他们建议由自己来通知召开大会的消息那样，同时他们还认为，可以赋予这个杂志编辑部以必要的协调权利。除此而外，在他们看来，即使波兰人不同法国人讲，他们也未必能够承担责任，现在就表示赞成建立情报局。同时建立情报局可能会阻碍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党。

从所有这些声明中可以看出，波兰人很胆小，他们不想将自己与任何重大的事情联系起来，除了杂志这件事之外。

鉴于波兰人的这种立场，我们认为，在波兰人作报告之前，明确其他各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可以在对国际形势报告进行讨论过程中做这件事，向参加讨论的各位代表提出相关的问题。

应该指出，在各党的报告中，各位代表都表示了赞成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更密切的接触。

我们的意见——必须建立情报局，并且其驻地就设在华沙。

拟定执行这个方针。

请求给予指示。

谢尔盖耶夫

鲍里索夫

1947 年 9 月 24 日

文件 10

日丹诺夫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

（1947 年 9 月 25 日）

绝密

会议于 1947 年 9 月 25 日 13 时开始。

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

同志们！我们继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日程是国际形势报告。现在由日丹诺夫同志作报告。

日丹诺夫报告：

关于国际形势[1]

〈略〉

---

① 这里刊登的日丹诺夫报告即 1947 年 10 月 22 日及以后发表在《真理报》和其他共产党报刊上的文本。该报告在发表时删去了第四节对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进行批评的内容和结论中的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见本文件的附录。

附 录

日丹诺夫报告发表时删节的部分

（四）共产党在团结一切民主的、反法西斯的和爱好和平的力量以反对新战争和侵略计划中的领导作用

共产国际的解散，是适应新历史条件下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的，它的解散起了积极的作用。共产国际的解散，永远结束了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敌人的诽谤谗言，即所谓莫斯科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以及各国共产党的活动仿佛不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是按照外国的命令进行的等等。

在共产国际解散以来的四年中，几乎在所有欧洲和亚洲的国家中，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都大大地增长了。共产党的影响不但在欧洲增长了，而且实际上在所有的欧洲国家，在曾经被法西斯主义所统治的欧洲各国，甚至在那些曾经被德国法西斯占领过的国家——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芬兰等国也都增长了。在新民主主义各国家里，共产党的影响尤其强大，在那里，共产党是影响最大的政党。

但是在各国共产党目前的情况中，还存在着很多缺点。有些同志曾经这样理解这件事，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即意味着各兄弟共产党之间的一切联系和一切接触都取消了。然而，经验却表明：共产党之间的这种缺乏联系的状况是不正确的，是有害的，并且实质上也是不自然的事情。虽然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各个国家的国内发展的，但是，与此同时，各国共产党又有着共同的任务和利益。目前的情形是相当奇怪的：当那些社会党人（他们曾经拼命地证明说，共产国际是向各国共产党人传达莫斯科指令的机关）已经恢复了他们自己的“国际”的时候，而共产党人却竟然反对彼此间的会面，尤其反对在彼此有关的问题上进行相互协商，以避免敌人关于“奉莫斯科之命”的谣言。各种活动的代表——科学家、合作社经营者、工会会员、青年、大学生——都认为保持国际间的联系、交流经验、在工作问题上进行相互协商、召集国际会议是可能的，而各国（甚至彼此有密切联系的国家）共产党人却不去恢复自己相互间的国际联系。毫无疑问，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持续下去的话，对各国兄弟党事业的发展，一定会造成极其有害的后果。现在，当各国党继续隔离的状态会降低相互间的了解、有时还可能造成严重错误的时候，某些共产党之间自愿协同行动和协商的要求就完全成熟了。

缺乏联系所导致的孤立，毫无疑问地正在削弱着我们的力量。尤其是在谈到一些错误时，应该涉及到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在对待美帝国主义反对工

人阶级的新行动方面的错误。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没有在应有的程度上、在本国人民群众面前揭露杜鲁门－马歇尔计划，即美国奴役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的计划。法国共产党将共产党人离开拉马第政府看做是内部制度的一种自然现象，而当时共产党人被驱逐出拉马第政府的真正原因是应美国人的要求。目前已经完全清楚，将共产党人驱逐出政府是法国获得美国贷款的先决条件。美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即2.5亿美元使法国放弃了自己的国家主权。

对于法国统治当局出卖国家主权这样的可耻行为，法国共产党又是如何反应的呢？对于包括社会党人在内的其他党派的行为，法国共产党没有抨击他们这种对捍卫国家荣誉和独立事业的背叛，而只是抱怨出现的破坏民主制度的行为，这种行为的表现是触犯了法国议会中人数最多的党的权利，同时，在这种情况下破坏议会传统的行为只是被看作一个理由，而不是原因。这种对将共产党驱逐出政府的重要原因沉默不语的态度，无疑是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严重错误，这种态度，或者是基于没有弄清楚形势，并对这种形势很难做出判断；或者是法国共产党人被有关“国家利益”的说法吓坏了，即共产党人害怕受到指责，说他们妨碍美国给法国提供贷款，仿佛这样将给法国的利益带来损害。这样一来，法国共产党人就被“缺乏爱国主义精神”这样的指责吓倒了，如果法国共产党能够揭露美国提供贷款的内幕，也就是贷款的条件是：要求通过将共产党人排挤出政府的途径改变政府的组成，并以此来削弱法国的主权，那么，法国共产党就将成为法国惟一的爱国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共产党向反动派的猛烈进攻做了让步，尽管它也知道，这种进攻是按照敌视法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力量的旨意进行的。法国共产党员有责任行动起来，在人民面前揭露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所扮演的角色，是他们厚颜无耻地迫使法国将共产党人驱逐出政府，应该向人民解释：这不单单是又一轮的“政府危机”，也不是简单的违背了议会的传统，尽管这一点对评定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有一定的意义，而是外国干涉了法国的内政，是毁灭了法国的政治独立性，是法国社会党人出卖了国家的主权。非常遗憾的是，法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至今也没有向法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和社会舆论说明发生在法国的这些事件的内幕，以及法国社会党人在这方面所扮演的可耻角色。

法国共产党指责社会党人“逐渐地堕人右倾”。但是，难道所说的是堕落成什么样的右派的问题？难道布吕姆曾经当过左派？众所周知，布吕姆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一直是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的传播者。因此，他没有向任何方向堕落过，显然，法国的同志们还没有完全看透社会党

的首领们的计谋。

法国痛苦的经验是意大利“政府危机”的预兆。按照在法国实行的这一标准，关于美国贷款问题以及与提供贷款有关的一切，是人为地制造的政府危机的主要动机，作为提供贷款的先决条件，美国帝国主义集团提出将共产党人驱逐出政府的要求。

意大利的右翼报刊毫不拘束地袒露了这一秘密。“如果我们希望活着，我们就应该从美国得到贷款”——意大利的右翼报刊《乌安森索》[①]这样写道。由此该报刊还做出如下结论：“危机应该这样解决，使我们能够拥有必要的贷款。争吵是多余的。应该理解在法国发生的事情，在那里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断绝了关系，而没有进行任何争吵，共产党人就被从部长的职位上赶了下来。”

德·加斯佩里关于将劳动人民的代表驱逐出政府的决定的通报，激发了群众并引起了广泛的抗议。但是，很遗憾，群众的这种主动精神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和领导。

结论是：在意大利如同在法国一样，共产党人过高地估计了反动派的力量，成为帝国主义威胁和讹诈的牺牲品，他们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民主的力量以及人民群众捍卫民族的根本权利和本国利益的坚强意志。

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无论是法国共产党，还是意大利共产党，在自己困难的工作条件下，都表明了自己将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在共产主义旗帜周围的能力。

由于社会党领导机关中的大部分人（特别是英国工党分子和法国社会党人）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集团的代理人，所以领导抵抗美国奴役欧洲的计划，勇敢地揭发各国国内一切美帝国主义的帮凶的特别历史任务就落在了共产党人的身上。与此同时，共产党人还必须支持一切为防止其祖国受到侵害，为反对外国资本奴役其祖国，并为维护其国家主权而斗争的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们。在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和爱好自由的人民进行反对新的奴役欧洲的美国扩张计划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必须成为领导力量。

由于苏联站在了抵抗帝国主义新的扩张计划的最前列，兄弟共产党应该以巩固自己在本国的政治地位为出发点，同时应该关心加强作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重要支柱的苏联的实力。各国共产党应该忠诚地、公开地执行支持作为争取巩固持久和平、

① 此处系 Вуансенсо 的音译。

争取民主斗争的主导力量的苏联的这一政策。应该竭尽全力地强调指出，兄弟共产党为巩固苏联所付出的努力，是符合其国家的根本利益的。不应该认为兄弟国家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经常强调自己党不依附于莫斯科是正确的。问题并不在于依附还是不依附，因为莫斯科不能也不愿意将任何人置于依附的境地。故意强调“不依附”莫斯科、“脱离”莫斯科，实质上意味着巴结、虚与委蛇地应付和附和着那些将莫斯科视作敌人的人。各国共产党不应该害怕大声宣布，他们支持莫斯科的爱好和平和民主的政策，不应该害怕宣布，苏联的政策是符合其他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的。

结 论

在战后时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尖锐的变化。这些变化的特点是：活动在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政治力量的重新部署，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的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改变和重新组合。当战争在进行时，同盟国在反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中，团结起来并形成一个阵营。然而，就在战时，同盟国阵营内部在确定战争目的和处理战后和平问题的任务方面，已经存在着意见分歧。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认为：战争的主要目的是重建和巩固欧洲的民主秩序，根除法西斯主义和防止德国重新侵略的可能性，并建立欧洲人民间的持久的、全面的合作。而美国和与它一致的英国，却确定了他们另外的战争目的——扫除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者，并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战争结束之后，这种在确定战争目的和处理战后事务的任务方面的分歧，更加深化了。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一方面是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政策，其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和巩固民主制度；另一方面是美国和英国的政策，其目的是加强帝国主义和扼杀民主。因为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夺取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运动计划实现的障碍，于是宣布了一个反对苏联及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十字军运动，同时英、美两个国家中的最狂热的帝国主义政客，也用新战争的威胁来支持这一运动。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的反民主的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其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的残余势力。

两个完全相对立的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势力日益削弱和社会主义民主力量更为加强的情况下发生的。

因此帝国主义阵营及其主导力量美国，就开展了特别积极的侵略活动。杜鲁门－马歇尔计划，只不过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执行的全球扩张政策的总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个总计划中欧洲的一个章节。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奴役欧洲的计划，正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奴役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南美各国的计划所补充。昨日的侵略者——德国和日本的大资本家，正被美国用来扮演新的角色，作为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

帝国主义阵营所使用的策略武器是十分多样的。它有直接的暴力威胁、讹诈与勒索、各种政治和经济压力措施、贿赂、利用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等等，以便巩固这个阵营的地位，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用自由主义－和平主义的假面具伪装起来的，企图这样来欺骗和引诱政治上没有经验的人。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略武器库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利用右翼社会党人的叛变政策，如像法国的布吕姆、英国的艾德礼和贝文、德国的舒马赫、奥地利的伦纳和塞尔夫等人，这些人力图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辞藻，来掩盖帝国主义政策的真正强盗本质，而实际上，他们在一切方面都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忠诚的同谋犯，他们极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制造分裂，毒害工人阶级的思想。英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找到了贝文作为它的最坚决、最狂热的执行者，这并非偶然的。

在这种情况下，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必须团结自己的队伍，制定一个一致赞同的行动纲领，制定出自己的策略，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及英法同盟者，反对右翼社会党，首先是反对英国和法国的右翼社会党。

为了粉碎马歇尔－杜鲁门的计划，欧洲所有反帝国主义的民主力量一致努力，是非常必要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右翼社会党是这一事业的叛徒。在新民主主义国家里，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民主的政党结成的联盟，成为这些国家抵抗帝国主义计划的基础；除了新民主主义国家以外，其他国家中的社会党人，首先是法国的社会党人和英国的工党分子——拉马第、布吕姆、艾德礼和贝文——都在奴颜婢膝地帮助美国资本达到它的目的，促进美国资本的勒索，并把他们自己的国家推上仰赖于美国的附庸国的道路。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法、意、英及其他国家的兄弟共产党的肩上担负着特别的任务。他们必须将保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如果各国共产党坚定地站稳自己的立场，如果他们不为威胁与恐吓所屈服，如果他们勇敢地保卫巩固的和平与人民的民主，保卫各国的国家主权、自由与独立，如果他们善于在反对那些企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奴役他们国家的斗争中，领导一切准备保卫尊严和民

族独立事业的力量，那么，任何奴役欧洲的计划就都不可能实现。

这是我们兄弟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之一。

必须指出，在帝国主义者发动新战争的愿望与组织这一战争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距离。全世界各国人民都不愿意发生战争。拥护和平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只要这些力量在保卫和平的事业中能坚定不移，只要他们表现出沉着坚定，那么侵略者的计划就一定会遭到完全彻底的失败。大家不应该忘记，帝国主义代理人对战争危险的叫嚣，是要恐吓那些神经脆弱和不坚定的人，并用恐吓的手段迫使他们对侵略者做出让步。

目前，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就是对自己力量的过低估计和对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一如过去慕尼黑政策任希特勒自由侵略一样，现在对美国及帝国主义营垒新方针的让步可以使这一方针的鼓动者更加放肆和更富于侵略性。因此，各国共产党必须领导对帝国主义全面（军事、政治、经济、思想）侵略与扩张计划的抵抗，各国共产党必须团结起来，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纲领的基础上统一自己的力量，并将一切民主爱国的人民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文件 11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会议讨论情况和情报局驻地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 年 9 月 25 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1. 今天，9 月 25 日，在我们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之后，会议开始对报告进行讨论。今天发言的有吉拉斯和安娜·波克，他们都声明完全赞同报告的内容。吉拉斯和安娜·波克发言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法国共产党的错误的，波克在报告中还对意大利共产党进行了批评。吉拉斯十分完整地概述了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他所提出的批评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其批评理由也非常充分。明天，杜克洛将就今天展开的批评进行发言，届时他将回答我们提出的您已经知道的那个问题。

明天将继续讨论。除杜克洛之外，即将发言的还有隆哥（意大利）以及其他代表团的成员。

2. 就组织建立情报局的问题与南斯拉夫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进行了交谈。两个

代表团都认为必须建立这样的同时具有协调职能的机构。作为情报局的驻地捷克人同意设在布拉格，而南斯拉夫人则同意设在贝尔格莱德，与此同时，南斯拉夫人还声明说，他们的关于将情报局驻地设在贝尔格莱德的意见可以被看做是最终的意见，他们不需要同铁托进行商量了。捷克人说，他们需要返回布拉格与哥特瓦尔德商量此事，并于明天傍晚返回告知最后的结果。当斯兰斯基从布拉格返回后，我们将考虑全面的情况，立即报告我们关于情报局驻地问题的最终建议。

谢尔盖耶夫

鲍里索夫

1947 年 9 月 25 日

文件 12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接到斯大林指示的通报

（1947 年 9 月 25 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我们已经收到斯大林就杜克洛报告所做的指示的电报。执行情况后告。

谢尔盖耶夫

鲍里索夫

1947 年 9 月 25 日

文件 13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对日丹诺夫报告的讨论情况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 年 9 月 26 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9 月 26 日上午和下午的会议都用来进行讨论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全体代表

团的代表都进行了发言。全体发言者一致拥护报告的全部内容，并声明，他们认为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所做出的结论，是各国共产党行动的基础。各位代表根据自己本国的以及共同的发展经验，十分详细和丰富地论证了自己对报告的拥护。所有代表在自己的发言中，都用大部分篇幅评论了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错误，同时批评具有十分尖锐的性质，所有同志一致希望法国和意大利同志在最短的期限内改正自己的错误。这些党对于错误的分析是有非常高的原则性水平的。由于报告和大会上进行的辩论，对两国代表团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和思想压力。

杜克洛是从表示对报告的赞成开始的。他说，他完全同意报告对形势以及战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所做的分析。他非常清楚，法国在美国的扩张计划中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他完全同意所确定的摆在法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任务。

杜克洛说，对于我们提出了指责，说我们对杜鲁门 – 马歇尔计划揭发得不够。如果我们理解得没有错误，那么是指责我们缺乏勇气。

我们承认，对于我们离开（指被排挤出政府）的国际方面原因没有做充分的解释，尽管我们并没有沉默。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发现已经进行了很久的奴役法国的进程。我们应该做得更多些，以便将广大人民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法国政治形势的主要方面上，即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以及他们在法国的代理人布吕姆、拉马第之流。从这个角度我们理解对我们的批评。

法国被掌握在美帝国主义手中，这将给苏联以及全体民主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们有责任在这种危险面前做出一切结论。

但是，在讨论中对我们提出的某些意见，尤其是指责我们是有意识地让步，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是有缺点的，但是，不应该指责我们没有做最大的抵抗。

我们同意，布吕姆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的这种说法。我们也一直在抨击布吕姆，多列士在所有的问题上对他进行过批评。有些右倾的表述，不是用于对布吕姆和社会党人，而是用于评价拉马第政府，该政府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反动了。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美国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9月初召开的中央全体会议上，对业已形成的局势进行了分析并认识到，我们在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期间犯了错误并出现了动摇。最近我们加强了对政府的进攻。我们做得还很少，但是不应该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同意，我们有责任做得更多些这样的说法。为保卫法国的独立和主权，我们应该做出最顽强的努力。面对即将来临的市政选举，我们正在进行着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同时对布吕姆和拉马第之流展开了强烈的进攻。

在回答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时，杜克洛说，他们使用“政府党”这一表达方式并

非是说，党要对拉马第政府所做的那些丑恶行径负责，而只是希望向人民说明，法国共产党是国内惟一能够管理国家的政党。

我们驳斥杜克洛说，在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之后，法国共产党没有在任何一份文件或者是领导人发言中做出过声明，说党与政府是对立的。杜克洛说，是的，他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最初是动摇过，但是，后来他们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党确实是与政府对立的。

我们还指出，关于这一点应该在所有的通报中说明真相，而不应该对人民隐瞒自己的想法，并用“政府党”这样的表达方式将人民引入歧途。

杜克洛回答说，在来华沙之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拟定了改正错误的途径，政治局还委托形成决议，但是，在他们动身之前该决议还没有准备好。应该准确地制定出党的任务。我们一定做到这一点，并能够改变法国的政策，保卫法国的独立不受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接着，杜克洛谈到自己关于脱离莫斯科的报告的意见，他援引了多列士的讲话，并证明说，在这方面法国人没有过错。但是，他承认，应该更清楚地向人民说明真相，即在为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苏联的作用以及苏联政策的正确性。

在发言结束时，杜克洛声明说，法国共产党将从报告和对其的批评中吸取一切教训，并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是能够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的。

此后我们请杜克洛更加明确地说明：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以及杜克洛从这些错误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杜克洛回答说，我们已经认识到，没有进行充分地斗争反对政府，究其根源是没有完全理解在法国形势的发展。很清楚，话题指的不仅仅是最后几个月的实际活动。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留在政府内的性质和意义。反动派的任务是改变政府中的力量对比以有利于自己。对于前途我们没有明确的目标，不清楚如何建立一种平衡的态势以有利于工人阶级。在我们的活动中有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过于注重合法性，对议会充满了幻想。这些是我们错误的根源，随着共产党人被赶出政府之后，局势更加恶化了，这样更加重了这些错误。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应该向党和人民说明真相。我认为，党的领导人应该对自己的工作做深刻的分析，并让党和人民知道这种分析的结果并尽一切努力推翻拉马第政府。法戎和我已经共同商议过并决定，在返回法国之后，向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提出所有这些问题，以便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如果我们在全党面前勇敢地进行自我批评，我们就能发展我们的事业，鼓起战斗精神，这是斗争必不可少的。法国

共产党的总路线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应该做到，让这种思想为群众所掌握。我们党应该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我认为，我们党一定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对此你们应该信任我们。

隆哥的发言（意大利）

在自己的发言中，隆哥十分完整和充分地表示赞同报告的内容，并承认对意大利共产党提出的批评是非常正确的。关于隆哥发言的详细记录我们将利用9月27日上午的航班寄给您。在此我们只想简短地阐述一下隆哥发言的内容。

隆哥说，意大利代表团非常认真地学习了报告的内容，并完全拥护报告，认为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代表团完全同意报告对杜鲁门－马歇尔计划所做的评价，认为这是一个奴役欧洲的计划，并指明共产党在反对这一计划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代表团完全同意报告中对意大利共产党提出批评的内容。报告对于我们明确意大利共产党的任务、克服党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因此我希望，隆哥说，我的发言仅仅局限在个别理由上，这并不是为了附加什么意见，而只是为了解释一些事情以及得到一些忠告。

意大利在三个方面遭到美国的进攻，正如报告中已经指明的那样。这种进攻尤其表现在思想领域里，在这方面的进攻是借助于电影、无线电广播和报刊进行的，所有这一切完全掌握在美国代理人手中。借助于散布关于虚拟的苏联以及人民民主国家准备侵略的谣言，以极其无耻的方式，广泛地对社会舆论进行恐吓。站在这场诋毁运动前列的不仅仅有向美国出售的黄色书刊，而且还有梵蒂冈。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一些报刊外，其余的报刊都在进行着诋毁苏联的运动。对此我们应该做出明确和强烈的反应。我们的党并不是经常能做得到这一点的。对于苏联取得的伟大成果我们宣传得不够，几乎忽视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成就。我们必须更加坚决更加彻底地执行支持苏联的政策。党中央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这些缺点。此后出现了一些好转，但是，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完全接受报告人指出的，我们不应该害怕大声声明说，我们支持莫斯科的和平民主政策，苏联的政策符合其他热爱自由的国家的人民的利益，因而，这种政策也符合意大利的利益。我们应该更加广泛地宣传新民主主义国家所取得的政治和社会成就。

隆哥通报说，党准备利用即将来临的十月革命30周年之际，组织大规模的人民游行活动，以表达对苏联的热爱和感谢之情。

接着谈到美帝国主义在意大利的经济扩张政策，隆哥说，在这方面意大利共产

党的行动是正确的，其行动正是依据报告所谈的精神进行的。我们党在报刊中，以及陶里亚蒂在议会的发言中，都对"马歇尔计划"进行了谴责。我们指出"马歇尔计划"意味着：(1) 建立反对苏联的联盟；(2) 将欧洲分割成两个部分，并用"铁幕"将这两个部分永远隔开；(3) 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干涉欧洲国家的经济生活，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4) 从政治上干涉欧洲国家的内政，希腊就是一个惨痛的例子。

对于意大利来说，"马歇尔计划"的后果就是毁灭意大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中就是这样说明的。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那么这种说法是与报告相符合的。波克同志在此就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对我们提出的批评是不正确的，这种批评与报告中的这部分内容是矛盾的。

我们有一个表述是应该受到批驳的，即意大利应该处于任何一个联盟之外。这样的表述是不正确的。意大利应该脱离帝国主义的联盟，并公开支持苏联的政策。赞同处于"联盟之外"这样的地位是不应该的。

接着，隆哥提出一个问题：驳斥"马歇尔计划"，是不是应该否决任何一种贷款？我不同意波克在此表明的观点。当这种贷款不会给我们的独立带来损失的时候，我们不能拒绝这种贷款。我们不能否决与美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思想，如果这种外国经济的参与不会给我们民族独立的利益带来损失的话。波克批评我们，她说，没有美国的贷款一样可以，这样美国人就不得不后退了。在此我应该明确一下，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的一切经济计划与任何一种贷款联系起来。我们国内有能力。应该动员国内的一切潜力，并发现被投机分子隐藏起来的财富。我们还对美国建议的"这种援助"的帝国主义性质进行了揭露。

隆哥说，意大利共产党对美国人在意大利保留海军基地和机场的企图进行了揭露。

我们应该保持警惕性，以便在提交批准书 90 天期满后，美国人没有任何借口在意大利保留美国军队。

我们坚信，我们党进行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一切行动，即便这些行动还没有表现出来，都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口头宣言和声明中，而应该表现在真正去动员广大的爱国人民群众的行动中，党是能够摧毁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在意大利的代理人和走狗的一切计谋的。

当根据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指令，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的时候，我们将这个事实看作是异常严重的，并认为这个排挤的事实暴露了意大利民主制度的深刻危

机。人民群众以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对此做出了回答，但是，非常遗憾，这些活动没有得到意大利共产党的应有的支持和领导。因此报告的结论说，我们被吓坏了，这种结论是正确的，我们完全承认这种批评是公平合理的，并无条件地接受这种批评。

在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之后，我们重新审视了党的全部活动，并在给党的领导机构的通报函中揭示和指明了我们的错误。在这封信函中我们指出，不应该消极地等待议会联合后政府的辞职，而必须与其进行积极的、全面的斗争。

在这封信函之后，局势有了很大的好转，正如党的领导机关希望的那样。一系列演讲、游行示威活动、夺取土地、政治性和经济性的罢工等等一系列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并极大地鼓舞了千百万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是有机会在议会中掌握主动权并推翻德·加斯佩里政府的。所有的左派政党都会拥护这一点的。这是在与反民主的、反人民的德·加斯佩里政府，以及它的由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奴役意大利的政策进行斗争中所取得的毫无疑问的成绩。这又一次证明了报告中的批评的正确性：如果我们从前的表现是另外一种样子，那么共产党人就不会被排挤出政府了。

在此隆哥打算回到自己情况的报告中，以便更加明确地答复当时报告人向他提出的问题，即：党是否有某种反攻的计划，或者党只是打算防御和后退。隆哥说，意大利代表团不希望带着任何一种疑问和误解离开大会。

因为我担心，隆哥说，上一次我没有完全明确地阐述我们的立场，没有明白报告人指示的意义，我想谈谈我们党在近一时期的目标。其主要目标是——成立政府，参加这个政府的应该是全体人民的代表，共和国的左派力量与基督教民主党人民力量的代表一起以民主统一联盟的形式参加。这个政府应该采取符合人民需要的坚定的措施，首先应该在最短的期限内进行议会的选举。

为什么要将基督教民主党党员列入其中呢？因为在目前的六个党组成的议会中，基督教民主党占有45%的选票。仅仅由左派党的代表是不可能组成政府的：因为它得不到议会的支持。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或者是保持着对立的地位，等着反动派联合起来，或者是通过非议会的道路行动，但是，由于国家被占领这样做很困难。无论哪一条道路都不适合我们。我们选择了第三种使我们能够解决政府问题的办法：(1) 与左派力量结成联盟；(2) 粉碎美国打算彻底将共产党人驱逐出政府的计划；(3) 在最快的期限内，在不受基督教民主党控制的条件下进行新的选举。

如果在我们这里，议会是另外一种情形，或者政治条件允许我们通过非议会的道路行动的话，那么，审视整个问题时，就可以依据建立同等的更彻底的民主政府的精神了。

在发言即将结束时，隆哥声明说，党的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已经认识到党的工作中的错误和弱点。隆哥非常真诚地说，我们承认，报告有助于我们弄清自己的全部错误并改正它们。我感谢报告人，感谢在此对意大利共产党提出批评的其他同志。我们将向本党的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汇报大会的决议，并对大会的指示进行认真的研究，使党的领导人掌握和执行这些指示。我们的党还很年轻，我们并不害怕所犯的错误，我们的党是一个健康的政党，其成员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自己的领袖陶里亚蒂同志周围，并将永远忠诚于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学说和斯大林同志。我们坚信，我们将战胜一切弱点，改正一切错误，我们党将尽一切力量，为实现国际形势报告中所确定的任务而奋斗。

谢尔盖耶夫

鲍里索夫

1947年9月26日

文件 14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法共和意共已承认错误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7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给您寄出关于对国际形势报告进行讨论的重要信息。从这份显然在稍晚些时候即可收到的信息中，您将看到，杜克洛和隆哥都承认了错误，并对提出的批评表示赞成，同时，杜克洛最初的承认是带有附加条件的，而隆哥则是无条件地承认。讨论工作已经结束。今天，9月27日，在大会对报告进行一致通过之后，我们计划成立由各国共产党代表组成的制定报告决议的委员会。报告的结论部分将作为决议的基础，还要从报告中，以及讨论中摘取一些必要的内容以补充决议。现在我们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是否将对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进行批评的内容列入到决议中。正如您所记得的，在报告的结论中并没有提及这些错误。我们认为，不应该将

对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错误所进行的批评内容列入决议中。请给予指示。

谢尔盖耶夫

鲍里索夫

1947年9月27日

文件 15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各党同意协调行动和确定情报局驻地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7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您的关于赋予情报局协调行动的职能的指示已经收到。应该指出，全体代表团在自己的发言和谈话中，都一致赞同协调各党的行动。

今天，波兰人主动前来并通报说，他们已经解除了一切怀疑，并不再反对合法的情报局以及将情报局的驻地设在华沙。我们知悉了这个声明并通知说，我们将支持贝尔格莱德作为情报局驻地的建议。波兰人说，他们认为这个建议是正确的。已经就协调行动方面的问题预先与杜克洛和法戎进行了交谈，他们完全赞同我们的全部建议。今天，9月27日，将在会上对协调各国共产党行动的问题进行讨论。

谢尔盖耶夫

鲍里索夫

1947年9月27日

文件 16

日丹诺夫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辩论的总结发言

（1947年9月27日）

绝密

会议于1947年9月27日14时开始。

会议主持人马林科夫同志：现在由日丹诺夫同志做总结发言。

日丹诺夫（记录稿）：

同志们，就国际形势报告交换意见是在很高的原则水平上进行的，表明了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党完全团结一致，因为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同意报告的原则。

所以，实际上就没有必要做总结发言了，我只想谈几点意见。

我认为，对于法国和意大利同志们关于会上对法共和意共活动的批评所作的声明，我们大家都深表满意。

我想表达在场所有同志们的共同意见，即我们殷切希望法国和意大利同志们在这里所作的声明能付诸实现。

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意，由于问题涉及的是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策略，事情就不是小的纠正和重点的变化，而是政策和策略的本质变化，是方向的重大变化。

这里我不想回到对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批评的话题，但为了彻底弄清问题，我想说，我们对杜克洛同志的解释，即他对法国共产党作为政府党所下定义并不是完全满意的。想成为政府党和真正参加政府，这之间，有很大区别。不理解这一区别可能导致错误。如果法国共产党声明，它对现在的拉马第政府不负任何责任就好了。

杜克洛：请允许我打断您。对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多，并得出了深刻的认识，由于过多地考虑了使工人阶级对我们不理解的各种细节，我们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反对党的立场。[1]

日丹诺夫：对杜克洛同志的声明我完全满意。完全清楚，关于不能唆使法共“去冒险”的声明也属于法共的这类错误，因为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的策略和表明自己不想选择某种斗争形式未必合适。如果对敌人说，我没有武装，那敌人就会说——这很好，你更容易对付了。我将打击你，因为你虚弱。斗争的规律表明，受到重视的只是强大的敌人。我是这样理解的，杜克洛同志用自己的意见回答了这个问题。

从这里进行的辩论看出，所有同志们都明白，每个国家国内力量的对比都取决于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对比。因为我们正处在转折关头，所以存在着陷于死板公式的威胁。不能认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线同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战线是同一走向。这样考虑是危险的公式化主义。我们已失去几个昔日的盟友，但我们不能惋惜失去叛

---

① 在俄国档案日丹诺夫的私人全宗文件中，保存着一份标题为“隆哥在日丹诺夫进行关于国际局势报告结论性讲话时的即兴插话”的文件。其中关于杜克洛的插话是这样记载的：“对于这个问题，我反复地考虑了很多，现在我完全可以确信，出于对待群众的态度方面各种细节的考虑，我们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应该立即对拉马第政府采取反对的立场，这样我们党的整个路线才会变成另外一种，变成正确的路线。”

徒。我们将找到新的盟友。我们明确的纲领将赋予我们新的盟友。

所以我想强调指出，诸如“右倾”、“左倾”、“民主党人”、“反动分子”这些概念，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可能是绝对的概念。真理是相对的，具体的。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尤其是在现在。如果不指出这一战线经过什么点，哪些党是反动的，哪些党是民主主义的，就不能谈战线。对于转折关头，当力量重组时，这一点尤为正确。

拿左派问题为例。我们在辩论和报告中已表明，有左翼和“左倾”。众所周知，有愿同苏联合作的左翼，有愿为同苏联友好而斗争、为反对新帝国主义扩张而斗争的左翼，有愿保卫本国主权和独立的左翼。

我们有时认为，从表面上看，在我们最近的右翼永远是社会党人。但具体的形势可能把他们抛向反动的边缘。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你们清楚地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列宁在论述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文章中说过，阿富汗埃米尔[①]争取阿富汗独立的斗争比赞成帝国主义胜利的雷诺德尔[②]之流的民主党人和“革命分子”的斗争更革命。

具体的形势可能导致：社会党人不是出于恐慌，而是出于良心，在资产阶级最危急的时刻完成资产阶级的社会定货。法国的形势不就是这样吗？拉马第不就是资产阶级手中的一张王牌吗？可以找到这样的盟友，在政治力量分布图上，他们表面上还没有立即站到共产党的右边。如果一个社会党人反对同共产党合作，反对苏联，支持美帝国主义，准备出卖本国主权，此外，如果他不执行任何社会党的东西，这时他就是一个应对其直接开火（就像反对资产阶级一样）的敌人。

我们大家都想看到法国是一个繁荣的国家。但现在，在经过一切实验之后，在社会党对无产阶级完成所有出卖之后，现在清楚了，社会党作为一个爱国主义的民族党已经垮台，它已不能领导国家走上复兴之路。很清楚，统治阶级，其中包括社会党，正把法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引向色当。

还不清楚吗？法国可以成为独立的强大的和主权的国家，但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或者它永远成不了这样的国家。我觉得前途只有一个。

对隆哥同志的发言谈两点意见。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那么隆哥同志是在说，意共中央 1947 年 8 月 16 日内部信件的意义就相当于这里，在报告中和辩论中，对

① 埃米尔，某些伊斯兰国家酋长的称号。

② 皮埃尔·雷诺德尔，法国社会党领袖。

意共活动的批评，该信已包含了这里所说的那些教训。如果我说得不对，我准备收回我的话。

隆哥：我之所以引用中央的信是想表明，我们已开始明白我们的错误。在同雷阿勒同志谈话之后和在辩论中我明白了，问题不在于我们工作的个别缺点，而是党的整个政策的深刻变化。我们要把这些意见带回去。我们要把这个意见向中央汇报，我相信我党领导将会同意我们的意见。

日丹诺夫：我想谈一下意大利政府问题解决的三种选择，隆哥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和中央信里都提到了这些问题。我认为，中央不应急忙答应基督教民主党在政府里与共产党员共事。不值得对他们作这种预先许诺，我个人的意见是，在党的行动还未使国家新的力量对比形成之前不应急忙确定由哪些党参加政府。

当广泛的群众工作斗争中涌现出准备拥护共产党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的新的同盟者时，那时就会清楚，应该同哪些党或它们的哪些部分分享在政府的位子，分享将要杀死的熊的熊皮。(笑声)

我认为，对共产党进入政府还未表示出“基本热情”的基督教民主党应该得到一份批评。如果按照福音书说的行事，即为诅咒您的人祝福，爱憎恨您的人，当他打您右脸时也应把左脸给他，那么应该给基督教民主党一份“基督教共产主义”，但它并不配这一礼物。也许我错了……

这就是我在自己的结束语里想说的几点意见。

在这里辩论中所表现出的意见一致意味着，尽管我们各国共产党之间相互联系已中断很久，在对形势理解上我们又形成统一的意见，又恢复了我们对任务和目的的理解。这证明了我们运动的强大力量。我们确定，我们各国不管以什么道路通向共产主义，但在任何地方，历史发展的动力都是无产阶级及其先进的有觉悟的先锋队——用先进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即真正人类文明的代表者的先锋队的积极斗争。

这里表现出来的和把代表着1500万优秀的共产党员的各党代表团联系在一起的战斗精神和团结精神使我们充满信心，在未来的战斗中，无论是局部的还是全面的，工人阶级都将以胜利者的面目出现。

马林科夫：鉴于辩论的结果，我可以明确地说，所有代表团的共同意见是这样的，我们的会议同意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我提请会议批准的正是这一建议。另一方面，联共（布）代表团建议现在由会议成员组成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今天可根据我们同意的报告和辩论草拟国际形势问题决议。如果同意我们的建议，我们可按

下述形式组成委员会：显然，报告人日丹诺夫同志应作为主席进入委员会，每个代表团推荐一名代表进入委员会。我们的建议就这样。请同志们对此发表意见。

反对意见没有。现在提出进入委员会的代表名单行吗，还是同志们商量以后等会议结束时再提出？

大家表示愿意立即任命委员会成员。被推出参加委员会的是：日丹诺夫、隆哥、法戎、明兹、马林科夫、哥穆尔卡、斯兰斯基、雷瓦伊、契尔文科夫、德治。

马林科夫：这样，我们结束了国际形势问题的讨论。首先我们转入下一个问题，联共（布）代表团请求由其他某个代表团的同志继续主持我们的会议，我们在第一场会议上已约定好了这个条件……（笑声）

在座的有人提：卡德尔同志！

马林科夫：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建议委托杜克洛同志主持会议。

一致赞成杜克洛同志担任会议主席。

文件 17

哥穆尔卡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发言

（1947年9月27日）

绝密

会议主持人杜克洛同志：

按照议事日程，下一个由哥穆尔卡同志发言。

哥穆尔卡：会议期间，各代表团在自己的情况报告和就日丹诺夫同志报告所作的发言中都强调指出，各共产党之间必须交流经验和协调行动。会议期间已完全表明，战后各兄弟的共产党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交换这些经验是可能的，并能够相互丰富各党的工作，改进各党工作。另一方面，也表明，各党工作不一致也带来了消极后果，而各党之间不定期的偶然的接触形式是远远不够的。解散共产国际带来了积极的结果。但共产国际解散后的4年实践表明，各共产党之间没有定期接触也给它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不正确的估计和政治错误。同时也清楚了，虽说各共产党是在本民族土壤上发展的，它们也有共同的利益和任务。很清楚，某个党的不正确估计和错误，不仅给该党带来危害和损失，同时也给其他党带来损失，所以所有党都关心相互之间的影响和接触。缺乏接触已成为不可忍受的，

尤其是现在，当美帝国主义的公开扩张政策使国际形势日趋紧张的时候；美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首先是针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其目的是消灭全世界的民主运动和奴役所有独立的国家。

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共产主义者应努力做到团结所有的民主力量、领导广泛的斗争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占领计划和不给它奴役欧洲的可能性，这一历史责任落到了各国共产主义者的肩上。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我们的会议应该解决各共产党，首先是参加本次会议的九国共产党交换经验和协调行动的组织形式问题。

我们建议解决出席本次会议的九国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问题。除交换经验的职能外，这一情报局还应赋予在必要情况下按照自愿原则协调各共产党行动的职能。本次会议就是可以交换经验和协调行动的范例。在此次会议上，我们听取了情况报告，对国际形势问题和各共产党的策略达成了共识。很清楚，我们会议的结果将成为各党工作的指导原则。

我们建议，情报局由出席本次会议的每个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派两名代表组成。各中央委员会可更换自己的代表。我们不建议立即解决代表人选问题。这应由各共产党中央在听取了本党代表团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之后再做出决定。情报局，正如我们建议的，应3—4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在需要解决重要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时，可随时召开，就像这次会议一样，主要工作是在定期的情报局会议，即各共产党中央代表会议上进行。但显而易见，为组织各共产党之间交换情报材料和为保障情报局会议的准备工作，需要有一个不大的辅助机构。

情报局要建立自己的机关刊物（半月刊，随着可能，出周刊）。这一刊物应成为相互交流经验和协调行动的工具。在挑选杂志材料时，应确立这样的原则：涉及某一国和由该国党中央批准的材料，基本上不加改动照样刊登，而论述国际形势和个别国际形势问题的材料，由杂志编辑部按照情报局的指示解决。机关刊物用俄文和法文出版，随着可能也用其他文字出版。为完成自己的任务，机关刊物应得到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积极而认真的配合。很清楚，如果我们只是指望编辑部，那么机关刊物便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所以，各中央委员会都有义务给编辑部提供系统的材料。杂志头几期主要内容是本次会议的材料。我们建议，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尽快整理自己的发言和报告，以便刊登之。[①]

① 会议之后，经过整理的各国党代表报告的文本和经过删节的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文本，发表在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第1期。

情报局应有日常驻地，日常驻地设在何处，我请同志们发表看法。按照我们的意见，这一日常驻地不宜设在莫斯科，以便不给所谓的莫斯科的压力等类似的诬蔑提供口实。应确定召开情报局第一次会议的期限在11月底，最晚不迟于1947年12月15日。[①]

我们建议把成立情报局辅助机构和情报局机关刊物编辑部的任务委托给联共（布）中央和情报局日常驻地所在国的共产党中央。情报局在其第一次会议上批准编辑部的最后组成。

我认为，情报局和出版机关的建立将大大帮助各兄弟的共产党实现它们所承担的责任。

杜克洛：我们听了哥穆尔卡同志的报告。还有辩论发言的吗?

吉拉斯：南斯拉夫代表团同意哥穆尔卡同志的所有建议。因此，南斯拉夫代表团以南共中央的名义认为，贝尔格莱德可作为日常驻地，那里可保障情报局的工作。

日丹诺夫：好主意!

杜克洛：还有其他建议吗?

契尔文科夫：我们同意南斯拉夫同志们的意见。

一致通过吉拉斯同志的意见。

马林科夫：我觉得，可以同意哥穆尔卡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即承认建立情报局是适宜的，赋予它交流各共产党工作经验和在必要时实施协调的职能。

如果同志们不反对，可以委托匈牙利、南斯拉夫、法国和联共（布）代表团的代表在下一场，可能是我们本次会议的最后一场会议之前，参考已通过的建议准备这一报告的必要决定草案。

杜克洛：各代表团同意马林科夫同志的建议吗?

马林科夫的建议被一致通过。

杜克洛：还有什么建议吗?

马林科夫：显然，我们目前的事是出版本次会议工作情况的公报。从我们方面讲，我们认为，公报不应立即发表，而是在各代表回到祖国之后再发表。

如果我们的建议被通过，那么在明天会议之前可拟定公报草案，这一工作可委

① 这次工作会议于1948年1月18日召开。会上研究审查了关于组建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辑部及其拨款的问题。确定由苏联的哲学家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担任刊物主编。

托我刚才说过的代表团完成，草案在明天会议上批准。

杜克洛：对马林科夫同志的建议有反对意见没有？

马林科夫同志的建议被一致通过。

隆哥：众所周知，本次会议文件在某种程度上要在情报局机关刊物上发表。

但现在能否得到这些文件呢，以便我们按照这些文件向中央汇报此次会议的工作？

日丹诺夫：我建议秘书处拿出自己的意见，在明天的下一场会议上提交给我们。

关于下一场会议的时间，我觉得，这应委托杜克洛同志决定，以便他有权根据相应文件草案的准备情况决定下场会议的开始时间。无论如何，这里说的是明天的会议。（笑声）

会议于15时结束。

文件 18

情报局会议关于国际形势决议草案制定委员会的讨论记录

（1947年9月27日）

绝密

会议于1947年9月27日23时开始。

会议由日丹诺夫同志主持。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马林科夫同志、明兹同志、斯兰斯基同志、卡德尔同志、法戎同志、隆哥同志、契尔文科夫同志、德治同志、雷瓦伊同志。

日丹诺夫：让我们开始委员会的工作吧。首先，我们必须就委员会工作的方法和程序问题交换一下意见。

工作方法已经由大会确定了。大会所确定的工作方法是：我们应该以报告内容和对报告的讨论为基础着手工作。我个人想提出以下的建议：将经过相应修改和补充的报告的结论部分，作为我们的草案的基础可能是合适的。很想听一听同志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法戎：我提议接受日丹诺夫同志的建议，况且，这些结论是对整个报告的总结，是可以将它们作为基础的。

日丹诺夫：这里还有一个难题。报告只是大体上包括了结论部分的论据。如果以某种形式并做一些相应的删减，我们就能够顺利地公布报告本身的内容，那么，这个难题就可以解决了。我认为，如果大会认为可以公布报告本身的内容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充分完成我们的任务，因为报告与结论是相互对应的，仅仅结论一部分内容是不够的。

法戎：整个报告还是报告摘录？

日丹诺夫：看来，我们不得不做摘录。

法戎：如果我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报告的一部分内容比另一部分内容重要。在与杜克洛同志交换意见之后，我们俩人都认为，报告对我们党进行批评的那一部分内容，是不完全适合发表的。

涉及到报告对我们党的活动进行批评的那部分内容，是可以发表的，但不是作为日丹诺夫同志报告的内容或者是会议决议的内容，而是作为我们党本身进行的自我批评。我认为有这个补充说明，报告是可以发表的。

日丹诺夫：显然，法戎同志没有理解我。我建议发表的正是报告的某些内容。涉及到报告中的批评内容，尤其是对法国共产党的批评，考虑到所叙述的内容，可以把这部分内容看做是我们的内部事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在我们已经决定作为决议基础的结论中，这些批评意见是不会出现的。

卡德尔：我也打算说出法戎同志所说的意见，但他抢在了我的前头。如果对法国同志的工作所作的批评意见进行公布，这可能会给法国共产党的活动增加困难……

日丹诺夫：自然，在没有附加文件的情况下，公布这些批评意见可能会造成一个片面的印象……

卡德尔：……所形成的结论是完全符合决议的。

日丹诺夫：因为从交流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因而也可能，应该转入讨论我们工作的程序问题。是否有反对意见？没有。我们是否应该宣读一下文本，然后对每页进行讨论？同志们希望怎么做？

马林科夫：我觉得，可以有两种方法：或者是，如果我们一切都准备好的话，可以一边读报告的内容，一边进行修改；或者是，现在我们只是明确一下决议的基础，然后，我们大家都考虑一下自己的建议，明天，大约12点钟我们重新开会，到时再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现在大家还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建议的话，那么我们也无法更有成效地工作。

日丹诺夫：同志们是如何考虑的？马林科夫同志提议，准备好修改的内容并在明天的会议上提出来。

马林科夫同志的建议被接受了。

日丹诺夫：我们必须指定下一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显然，我们需要大约两个钟头。请秘书处通知我们，在准备好决议草案之后，如果决议文本可能不超过5—6页，那么打字和将其发给会议各位代表，需要多长时间？

巴拉诺夫：5—6页，并不是很大的文件。可能只是翻译时会耽搁一些时间。总共需要大约两个小时。

日丹诺夫：那么，我们可以在11点钟开会。

建议被接受。

日丹诺夫：请同志们准备好对决议草案的修改内容。

会议于23点15分结束。

文件 19

情报局会议关于国际形势决议草案制定委员会第二次讨论的记录

（1947年9月28日）

绝密

会议于1947年9月28日11时开始。

会议由日丹诺夫同志主持。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马林科夫同志、卡德尔同志、斯兰斯基同志、明兹同志、法戎同志、隆哥同志、契尔文科夫同志、德治同志、雷瓦伊同志。

日丹诺夫：请允许我宣布会议开始。我们是否对决议草案进行逐页的修改？首先作为“结论”，应该说，“南斯拉夫共产党、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波兰工人党、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代表会议就国际局势问题的决议”，这是标题。

请对第45页进行修改。

法戎：我发现法语文本里的第一句话没有决议的性质，建议用日丹诺夫同志报告里的第一句话代替这句话。

斯兰斯基：内容是相同的。

日丹诺夫：有细微的差别。在结论中谈的是，战后国际形势中发生的变化，而在报告中，对于因为战争的结果而发生的这些变化进行了分析。

也可能我们可以这样进行表述：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战后的发展，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样一来我们就顾全了两种含义。

法戎请求明确法文的表达方法。首先将文本译成法文，然后由委员会进行审批。

隆哥：也可能应该写一个小小的引言。这样是很有意义的。例如：“各国共产党（所列出的）代表在就国际形势问题交换意见之后，一致赞成如下结论。”

这样的引言可以赋予各国共产党的协议以一种自愿的色彩。

日丹诺夫：我想，这是可以接受的。

法戎：我提议：“……一致达成如下决议。”

日丹诺夫：这也很好。

批准这些句子。

隆哥：提议将“决议”这个词换成“宣言”。

法戎：赞成这种修改。

日丹诺夫：那么就用“宣言”代替“决议”。

对于这页还有其他意见吗？

法戎：应该对译文做相应的修改。

日丹诺夫：关于译文的问题可以在会下解决。

隆哥：我理解，关于译文的问题不是本次会议的内容。我建议委托法戎同志和一位俄罗斯同志对两种文本进行协商，因为对于法国同志和我们来说，法语文本更重要些。

日丹诺夫：我们委托秘书处在会议结束之前准备好两种文本，我们将在会上对其进行批准，使两种文本都成为正式的文件。

这样我们就结束了对45页的修改。请对第46页进行修改。

契尔文科夫：提议在“……反对马歇尔计划”一词之后，指出希腊，例如：“……厚颜无耻地干涉希腊内政。”

日丹诺夫：对这样的修改我有些疑义。如果我们将希腊列入其中，那么我们的决议就将拥有超出欧洲范畴的性质。如果我们将希腊列入其中，那么根据这一点，

我们就应该将中国以及美帝国主义正在肆虐的那些国家列入其中。总之，我认为，我们的决议应该适合对国际形势所做的判断。

德治：罗马尼亚已经采取了帮助希腊人民的具体措施。我们已经成立了有著名大学教授参加的全国援助委员会。我认为指出帮助希腊共产党是其他各国共产党的义务，但不将这一点写入决议中是适宜的。

卡德尔：建议对第 47 页做修改，在括号中指出：希腊、中国等。

日丹诺夫：我们的决议不仅仅是策略性的文件，因此这个决议不应该只包含今天的情况。我们决议的出发点是，对希腊、中国的侵略仅仅是总侵略的一部分，这种侵略很快就可能波及到苏联、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等国。我们不应该给美国帝国主义以借口，让他们认为我们没有考虑到他们的侵略计划，没有认识到他们所准备的更广泛的侵略。

法戎和卡德尔与日丹诺夫同志进行协商。

日丹诺夫：在希腊问题上我们已经拥有明确的立场，我们一直遵循这种立场。与过去所做过的相比，我们还没有想出什么新的办法。

法戎：建议向各国共产党作详细的解释，帝国主义阵营正在哪些方面进行活动。

日丹诺夫：我们应该写道："这种侵略活动正在各个方面同时展开——在军事战略措施方面、在经济扩张方面和思想斗争方面。"

隆哥：建议在句子中列入右翼社会党人，增补句子："……意大利的萨拉盖特。"

建议被接受。

日丹诺夫：我应该通知委员会，匈牙利同志建议在布吕姆之后补充上拉马第。但是，要知道拉马第并不是社会党的首领，而是一个傀儡。我们已经提到过他，这样就足够了。我认为，法戎同志应该在我们中间起到仲裁人的作用。

法戎：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提到拉马第，因为在下一页还要提到他。

日丹诺夫：对第 48 页的内容做如下的修改。第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句话应该删掉，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笑声）

接着明兹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建议回避"除……国家外"这句话，因为"除去"这一词包括很大数量的国家，我同意他们的修改意见。

雷瓦伊：建议用"应该结成"替代"结成"一词。否则，可能会理解为：在这些国家里已经不存在右派社会党人了。

日丹诺夫：我不同意。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尽管或多或少有些艰难，但社会党

人仍然处于与共产党结盟的状态。这样一来，在新民主主义国家里的社会党人和在西方国家里的社会党人，在行为上总是有差别的。阻止某种倾向性更加重要些。我们有办法阻止社会党人滑落到右倾一边。为了使匈牙利同志心安理得，我们也可以在前一个句子里加上“所有”一词。

卡德尔：无论哪一种表述都不合适。第一种表述不合适是因为，这种表述只适合于波兰或者是捷克斯洛伐克。对于保加利亚来说这种表述完全不适合，在罗马尼亚社会党人也没有起很大的作用。建议说：“可以建立……基础。”

日丹诺夫：这样就取消了整个句子！我反对这一点。我们的决议的重要因素是反映出各个国家的特点。如果接受了匈牙利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见，那么就是说，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英国与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情况也没有任何差别。但这完全是不正确的！我们有责任考虑各个国家的发展特点。

“应该”或者是“有可能”这样的表述意味着，在任何地方还没有出现联盟，而这是不正确的！

也可以说“在那时，正如在新民主主义国家里”。

还有一种修改是可以接受的：用“在所有的国家里”取代“在这些国家里”。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最大限度的让步。（笑声）

明兹：建议保留“在这些国家里”。

日丹诺夫：那么取消我的修改意见。在存在着离心力的社会党人那里，与他们保持联系对我们更有利些，不但如此，整个决议还声明，右翼社会党人是多么的危险。

斯兰斯基：支持明兹同志的建议。

雷瓦伊：我不否认，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社会党人和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的社会党人之间是有区别的。

恐怕明兹同志是以波兰的情况为出发点的。在波兰，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事情进行得基本不坏，而在匈牙利，我们与社会民主党人正在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日丹诺夫：将出现动摇现象。这对我们有益。我坚决反对你们的修改意见。我们的全部策略的出发点应该是：考虑社会主义政党的阵营里的立场的差别，我们不应该笼统地对待它们，无论是在新的、旧的，还是在最新的民主主义国家里。

交换意见的最后结果是批准了该段落的最终表述。

法戎还谈到，在法国很难将左翼社会党人与右翼社会党人区别开。

日丹诺夫：对于居伊·摩勒我们在此没做任何说明。应该将他归入哪一类，你

们自己会清楚的。

法戎：当法国工人看到这个决议时，他们会想，我们反对的只是那些被他们自己看做是右翼分子的社会活动家。

我提议指出："……首先是法国的社会党、英国的工党等等。"

明兹请求法戎不要坚持这种修改。当我们谈论右翼社会党人时，我们可以把南尼的党作为一个例外，而对于居伊·摩勒，应该由法国共产党人自己指明他是右翼分子。

隆哥就这个问题建议将"法国社会党人"改为"法国社会党"。这样就能够使人明白，所指的还有居伊·摩勒和其他一些人。

马林科夫反对这个建议。

日丹诺夫还提到由于持有左倾观点而被开除出社会党的法国社会青年。

法戎建议只提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这样，就可以解除普通社会党人的责任。

日丹诺夫：我们不能局限于指责一些领导人的行为。我觉得，给党推卸责任是不正确的。

委员会批准了最后的文本。

日丹诺夫建议将"兄弟"这个词全部取消，以便不使人理解为：宣言的基础是一个"兄弟"共产党的代表给其他一些"兄弟"党的代表的报告。

该建议被接受。

明兹建议找一个词来代替"共产党"这个词，否则波兰党就得换章程了。

日丹诺夫：这是毫无办法的！

日丹诺夫提出对文本的第 49 页做如下修改：用"一致赞同"这个词代替"共同的"，以便使决议不被理解为，是某个惩戒机构强加的。

该修改意见被采纳了。

隆哥：建议对文本的第 50 页做如下修改：用"政府的"这个词取代"国家的"一词。

根据日丹诺夫同志的建议，最终被批准的文本做了如下的修改："在国家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等方面。"

日丹诺夫：关于文件的签名问题，建议在大会上达成一致意见。

法戎：至少有一份文件应该是签名的。

马林科夫：这句话是不是说，应该公布带有签名的这份文件。这将取决于其他文件。

卡德尔和契尔文科夫表示赞成发表带有签名的文件。

日丹诺夫建议这个问题应视公布其他文件的情况而定。

委员会决定，宣言文本应该签名。

斯兰斯基：什么人可以看这份文件?

日丹诺夫：您说的是报告还是决议?谈到报告，那么，这个问题应该由相关的各党中央委员会来决定。但无论如何，还是小范围内的人。例如：能够了解日丹诺夫报告内容的是政治局委员。至于说到决议，那么，在发表之前，相关各党中央委员会可以将决议给它认为需要的那些人看。

卡德尔：最好是将公报、宣言和报告同时发表。

日丹诺夫：如果同志们希望这样，我可以采取措施，准备将报告与公报和宣言同时发表。尤其是我们还要在自己的通报上发表这个报告。

斯兰斯基：最好是在一周之内发表。否则材料将会“过时”。

日丹诺夫：也许我们现在可以约定，等报告一准备好，我们立即将它与公报和宣言一起交付发表。

卡德尔支持这个建议。

日丹诺夫：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使每个党尽可能快地得到这三份文件。我希望在三天之内将报告整理好以便发表。

法戎：建议确定一个统一的日期，在所有国家发表这些文件。

日丹诺夫：同志们的意见可归结为：这三份文件应该同时发表。我们应该将这个意见向大会报告。

隆哥：建议将发表文件的日期定为星期日——10 月 5 日。

日丹诺夫：如果没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就在下个星期日发表。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马林科夫：也许我们可以约定如下：散会之后，大家分头去准备报告。然后，由三个代表团：大会的倡议者波兰代表团、情报局驻地设在其境内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和联共（布）代表团，将这些文件分发给各国共产党，使他们能够在 10 月 5 日星期日发表这些文件。

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是可以保证从莫斯科发送出这些文件的。

马林科夫同志的建议被接受了。

卡德尔：我们请求联共（布），在出现困难而被耽搁的情况下，通知我们。

马林科夫：应该赋予三个代表团进行个别修改的权利。自然，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定与各国共产党联络。

法戎：在下个星期日发表，可能指的只是两个文件，而并不包括报告。同时公布三份文件，对于报刊可能会很困难。最重要的是，公报和宣言能够在同一天发表。

日丹诺夫：我们将同时分发所有的文件，而关于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样的顺序进行发表的问题，可由同志们自己决定。

马林科夫：如果我们保证在星期五将文件送达目的地，那么是可以在星期日发表的。如果出现某些没有预料到的困难的话，那么就不得不拖延一些时间发表了。

委员会决定，各国共产党都将得到报告的俄文文本和法文文本，发表的时间不能晚于两个星期。[1]

会议于13点50分结束。

文件 20

各国党代表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会议宣言、决议和公报草案的讨论

（1947年9月28日）

绝密

会议于1947年9月28日17时15分开始。

杜克洛同志主持会议：

我宣布会议开始。根据会议日程，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会议的宣言草案，由日丹诺夫同志讲话。

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的会议决议草案，委员会决定以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报告的总结作为基础。

我将直接转入委员会所作的并通过的修改内容。

第一，委员会给出了新的标题，用“宣言”这个词来替代“决议”。这样一来，文件就具有了如下标题：

“……会议宣言”。

① 事实上，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直到10月25日都没有刊登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苏斯洛夫在当天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非常气愤地通报了这件事，并建议“询问多列士和杜克洛关于没有发表日丹诺夫报告的原因”。

接着委员会又补充了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将是宣言的第一段，并以如下形式表述：

日丹诺夫同志开始宣读宣言第一段落的内容。

委员会还对下一个段落的第一句话进行了修改，在最后定稿时我将宣读修改的内容：

（日丹诺夫同志开始读这句话）

对结论的第一页做了修辞方面的修改：将以下句子划分为独立的一个段落：（开始读这个段落的内容）

在第二页的第三段里，补充了一句话："这种侵略活动正在……展开。"

对结论部分第三页的最后一段做了修改：由"占有特殊地位……"一词开头的那句话，划分为单独的一个段落。在同一页的这个段落之后补充："在'……奥地利的塞尔夫[①]'后面补充'……意大利的萨拉盖特'等等"。

在第四页的第一段，"共同的"一词用"一致赞同"一词代替。

在第四页的最后一个段落，同宣言的整个文本中的内容一样，删掉"兄弟般的"这个词。

在第六页在"……国家的"一词后面补充"……政治的"一词。

以上这些就是委员会做出并通过的修改内容。

杜克洛：是否还有同志希望就委员会的报告谈谈自己的看法？

委员会的建议被一致通过。

日丹诺夫：委员会得出结论，应该签署这个文件。如果会议同意这个建议的话，那么，出席本次会议的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应该按照标题上所列出的顺序签署宣言，具体的是：

南斯拉夫共产党——爱·卡德尔同志和米·吉拉斯同志；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维·契尔文科夫同志和弗·波普托莫夫同志，等等。

杜克洛：对于签署宣言的建议是否还有反对意见？

建议被一致通过。

杜克洛：根据会议日程，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协调各国共产党行动的决议草案。由哥穆尔卡同志讲话。

哥穆尔卡同志开始宣读决议草案。

---

① 阿道夫·塞尔夫，奥地利社会主义党主席，联邦政府副首相。

哥穆尔卡同志通报说，委员会讨论了关于情报局机关刊物的名称问题，但是，就这一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将下列名称提交会议审批：

《人民道路报》；

《人民战斗报》。

斯兰斯基对决议的第一句话提出了修改的建议。

隆哥：对于草案我有两个意见：第一，并不是参加会议的所有的党都称为“共产党”，而决议中都谈的是共产党。第二，在决议草案中说，情报局是由参加会议的各国党的代表组成。应该去掉这个建议或者是在决议草案中指出，其他共产党也可以参加情报局。

日丹诺夫：在我看来，可以接受斯兰斯基同志的这个建议。涉及到情报局的组成问题，那么在决议中是说，情报局是由参加本次会议的各国党的代表组成。我不怀疑，会议的结果将会引起其他共产党的兴趣，他们就会提出询问，到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自己本身应该组成情报局，而不急于考虑其他共产党。我们是情报局的创立者，当我们自己还没有形成情报局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说，应该吸收所有其他的共产党参加，尽管我个人认为，稍后会有许多共产党加入我们之中。

杜克洛：日丹诺夫同志建议接受斯兰斯基同志的修改意见。谁还希望谈谈？

吉拉斯：我同意这个修改意见。

斯兰斯基同志建议的表达方式，在最后校订时被确定下来：

“会议宣布，在目前的情况下，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之间缺乏联系，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

明兹：建议在决议的标题中删掉“共产主义的”一词，而只保留“党”这个词。

日丹诺夫：抛弃共产党员，而留下党……（笑声）

明兹同志的建议被接受了。

马林科夫：建议把第四条中“下设”一词换成“下设”一词。[①]

杜克洛：我建议把决议案提交表决。一致通过。

日丹诺夫：请求进行一个不大的修改。

在文件中，与同志们的姓并列的还有名字的第一个大写字母，在第二页上就没有这个字母了，而我和哥穆尔卡同志都失去了名字。请求将名字还给我们。（笑声）

① 马林科夫这里的建议只是一个修辞问题，即将俄文反身动词 иметься 换成及物动词 иметь。

杜克洛：是否还有什么意见？

一致确定文件的文本。

杜克洛：第三个问题——秘书处的通报——由萨姆布罗夫斯基同志发言。

萨姆布罗夫斯基：会议记录是由秘书处起草的，包括所有会议的按日期的记录，会议听取的各个报告和发言稿的完整记录，根据报告所做出的相关的决议和公报。对于杜克洛同志和隆哥同志的报告和发言稿，以及日丹诺夫同志的关于“国际形势报告”的结论性的发言，都做了详细的记录。

提请批准会议记录。

根据秘书处的意见，必须建立以下保存和使用会议文件资料的制度：

1. 在成立情报局工作机关之前，将会议记录保存在联共（布）中央，并委托联共（布）中央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建立情报局的辅助机关。

2. 考虑到关于各国共产党活动情况的报告，可能暴露出本国党的一些战略计划和意图，认为将这些报告文本分发给出席会议的各位代表是不适宜的。

只有经过协商或者是经相应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才能够交换关于该党的活动情况的情报资料。

如果会议同意这些建议，那么，秘书处请求会议做出决定：全体代表将会议的文件交回到秘书处以便进行销毁。

自然，这个决议将不用于以下文件：各位代表以自己党的名义所作的、关于该党的活动情况的报告和讲话文本，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文本，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文本，关于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之间交换经验和协同行动的决议文本，以及发给各位代表的公报文本。

杜克洛：关于秘书处的报告谁还希望谈谈自己的看法？

日丹诺夫：我想建议在秘书处建议的第二条第二句话里，在“交换”一词的后面补充上“……和发表”[①]一词。我觉得，在与相关的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协商之后，除那些如我们一致同意的属于我们内部的敏感问题之外，报告能够予以发表。

至于联共（布）中央的报告，我们准备立即发表。

杜克洛：是否还有什么建议？

我建议将经过日丹诺夫同志修改的秘书处的建议提交表决。一致通过。现在由马林科夫同志讲话。

① 在最后确定的文本中，这句话的表述是：“交换或发表。”

马林科夫：我们大家也是这样理解的，所有这三份文件，即公报、宣言和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是应该在报刊上发表的。有鉴于此，我们建议委托三个代表团：波兰工人党、南斯拉夫共产党和联共（布）整理和发表这套文件。

关于刊登文件的日期，初步意见是：文件应该同时进行发表，具体是：在下个星期天，如果没有出现某些我们现在还无法预料到的困难的话。自然，同志们在会后随身携带的那些文件，在没有相关的党的专门通知是不应该公布的。

杜克洛：提出关于三国共产党在指示的期限之后公布材料的建议。建议提交表决。一致通过。

波克：我们忘记了讨论关于机关刊物名称的问题。

杜克洛：您有什么建议吗?

波克：没有，我只是提醒一下这个问题。

隆哥：关于机关刊物的名称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想说一下关于公布文件的问题。公布的文件是否应该签字，或者是没有签字?

日丹诺夫：委员会已经决定，如果在会议上将出现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委员会即将表达的意见是：发表的文件将不署名字。

关于机关刊物的名称问题，我想建议对这个问题不作最后决定，而约定稍晚些时候，委托情报局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

我还有一个关于形式方面的意见。因为法语同俄语一样，都是会议正式使用的语言，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对于宣言的法文文本应该签字。

接受这个建议。与会者签署了宣言文本。

杜克洛：谁还想发言？没有。会议日程的问题已经结束。

好了，同志们，在会议结束之前，我想对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感谢我们这次所交换的情况。

我们大家都感到无比喜悦和自豪，因为我们的党是一支不可估量的力量，它能够经得住任何战斗，并确保在这些战斗中获得胜利。

在这些年里，我们身居各处，并在各个地区和各种条件下战斗着，此后，当我们再次聚首时，发现我们仍然拥有共同的意愿，进行共同的斗争。

这使我们十分坚信，我们的战斗团结将确保我们取得新的胜利。

我还想对波兰同志表示感谢，是他们担负起国际主义义务，将各兄弟共产党邀请到本次会议上。毫无疑问，本次会议将对今后事件的进程产生影响。

我还想特别感谢联共（布）中央的代表马林科夫同志，感谢他向我们通报了联

共（布）中央的工作情况，并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尤其是它在思想战线斗争方面的活动的宝贵情况。对于在我们国内出现的美国人想奴役和使我们屈从的想法，我们应该做出强烈的反应。

最终，我要特别热烈地感谢日丹诺夫同志，感谢他的精彩的和光彩照人的报告，以及结论性的讲话，这将有助于我们找到正确的道路。我还要代表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向日丹诺夫同志致谢，感谢他所给予的宝贵的指示，借助于这些指示我们将确定我们道路的正确方向。同时感谢他帮助我们及时调整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指南针的方向，这个指针已经开始出现了偏差并有可能导致巨大的危险。

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将更加坚强有力并充分相信，其他国家里的共产党对我们也是信任的。在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已经认识到我们是无愧于其他国家的同志们给予我们的信任，并用这种对我们的信任来教育我们的人民。但是，令我们特别感到欢欣鼓舞的是那样一种力量，即来自于联共（布）中央——我们的榜样和领袖的力量。

我们在此所作的决议，将能够赋予我们更加坚定的目的性，使得我们对于自己的胜利更加充满信心。

目前正值伟大的俄国革命30周年之际，这使我们有机会大声地宣布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使我们有机会向我们的人民表明那条光明的道路，即伟大的巨人列宁和斯大林所坚信不移的那条道路。

斗争在继续着，但是，有苏联、新民主主义国家和联共（布）的存在，我们将更加充满信心地投入到未来的战斗中。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线中，我们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当之无愧的学生去参加战斗。在这个巨大的战线上，法兰西这块阵地，尤其令人感到不安。

但是，同志们，你们是可以满怀信心地离开此地的，这块阵地将会得到很好的守卫。它将获得法国共产党人的很好的守卫。法国共产党人将会在生活中再次学习我们的这些决议，并将它们变成进行斗争和获取胜利的工具。

出席我们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万岁；全体兄弟共产党万岁！

联共（布）以及我们爱戴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力量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我们将获得胜利！

请允许我就此宣布会议闭幕。（掌声）

会议于18时40分结束。

附 录

作为记录员和翻译员出席全部会议的同志的名单

1. 奥斯塔普·德乌斯基[①]，会议记录员。
2. 特皮赫特·耶日[②]，翻译人员。
3. 斯特凡·维尔勃沃夫斯基[③]，会议记录员。
4. 什莱因·米奇斯拉夫[④]，翻译人员。
5. 捷列什金·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⑤]，会议记录员。
6. 叶菲莫夫·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⑥]，翻译人员。
7. 舍夫利亚金·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⑦]，会议记录员。
8. 列昂特·拉乌图[⑧]，翻译人员。
9. 拉利奇·拉多万[⑨]，翻译人员。

文件 21

共产党情报局 9 月 28 日会议通过宣言、决议等有关文件的记录

（1947 年 9 月 28 日）

绝密

1947 年 9 月 28 日全体会议会议记录

1. 听取了：

---

① 奥斯塔普·德乌斯基，波兰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

② 特皮赫特·耶日，波兰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③ 斯特凡·维尔勃沃夫斯基，波兰外交部机要秘书。

④ 什莱因·米奇斯拉夫，波兰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副院长。

⑤ 捷列什金·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联共（布）中央副书记，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⑥ 叶菲莫夫·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工作人员，《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辑部负责人。

⑦ 舍夫利亚金·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工作人员，《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辑部负责人。

⑧ 列昂特·拉乌图，罗马尼亚共产党（罗马尼亚工人党）宣传鼓动部部长。

⑨ 拉利奇·拉多万，南斯拉夫民族委员会活动家，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教授。

关于国际形势决议草案制定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人——委员会主席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决定：

批准宣言草案（宣言文本附后）。

2. 听取了：

关于交流经验和协调各国共产党活动的决议案草案制定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人——委员会主席瓦·哥穆尔卡。

决定：

批准决议案草案（决议案文本附后）。

3. 听取了：

关于制定公报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人——米·吉拉斯同志。

决定：

批准公报草案（公报文本附后）。

4. 听取了：

秘书处的建议。报告人——萨姆布罗夫斯基同志。

决定：

批准秘书处的建议（秘书处建议文本附后）。

（签字）

附 录

关于九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的公报

9月底，在波兰举行了一次情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以下共产党的代表：南斯拉夫共产党——爱·卡德尔同志和米·吉拉斯同志；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维·契尔文科夫同志和弗·波普托莫夫同志；罗马尼亚共产党——格·德治同志和安·波克同志；匈牙利共产党——米·法尔卡什同志和约·雷瓦伊同志；波兰工人党——瓦·哥穆尔卡同志和希·明兹同志；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安·日丹诺夫同志和格·马林科夫同志；法国共产党——雅·杜克洛同志和艾·法戎同志；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鲁·斯兰斯基同志和什·巴什特万斯基同志；意大利共产党——路·隆哥同志和埃·雷阿勒同志。与会者听取了参加会议的共产党代表关于他们党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代表南斯拉夫共产党——爱·卡德尔同志和米·吉

拉斯同志；代表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维·契尔文科夫同志；代表罗马尼亚共产党——格·德治同志；代表匈牙利共产党——约·雷瓦伊同志；代表波兰工人党——瓦·哥穆尔卡同志；代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马林科夫同志；代表法国共产党——雅·杜克洛同志；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鲁·斯兰斯基同志和代表意大利共产党——路·隆哥同志。

在对这些报告交换意见之后，与会者决定讨论国际形势问题和参加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之间交换经验和协同行动的问题。

安·日丹诺夫同志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与会者对报告交换了意见，并对目前国际形势和在目前国际形势下的任务，达到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

关于各国共产党交换意见和协同行动的报告是由瓦·哥穆尔卡同志作的。关于这个问题，会议鉴于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之间缺乏联系而引起的不利影响，并注意到相互交换意见的必要性，决定建立情报局。

情报局将由上述各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组成。

情报局的任务是组织各国共产党之间的经验交流，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协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

会议还决定，情报局将出版机关刊物。

指定贝尔格莱德市为情报局及其机关刊物的编辑部所在地。

南斯拉夫共产党、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
罗马尼亚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波兰工人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法国共产党、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
代表会议《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

南斯拉夫共产党、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波兰工人党、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就国际形势问题交换意见之后，一致通过了如下宣言。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战后的发展，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些变化的特点是：活动在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的各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改变和重新组合。

当战争在进行时，同盟国在反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中，团结起来并形成一个阵营。然而，就在战时，同盟国阵营内部在确定战争目的和处理战后和平问题的任务方面，已经存在着意见分歧。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认为：战争的主要目的是重建和巩固欧洲的民主秩序，根除法西斯主义和防止德国重新侵略的可能性，并建立欧洲人民间的持久的、全面的合作。而美国和与它一致的英国，却确定了他们另外的战争目的——扫除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者（德国和日本），并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战争结束之后，这种在确定战争目的和处理战后事务的任务方面的分歧，更加深化了。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一方面是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政策，其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和巩固民主制度；另一方面是美国和英国的政策，其目的是加强帝国主义和扼杀民主。因为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夺取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运动计划实现的障碍，于是宣布了一个反对苏联及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十字军运动，英、美两个国家中的最狂热的帝国主义政客，同时也用新战争的威胁来支持这一运动。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的反民主的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其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的残余势力。

两个完全相对立的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势力日益削弱和社会主义民主力量更为加强的情况下发生的。

因此，帝国主义阵营及其主导力量美国，就开展了特别积极的侵略活动。这种侵略活动正在各个方面同时展开——在军事战略措施方面、在经济扩张方面和思想斗争方面。杜鲁门 - 马歇尔计划，只不过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执行的全球扩张政策的总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个总计划中欧洲的一个章节。美国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奴役欧洲的计划，正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奴役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南美各国的计划所补充。昨日的侵略者——德国和日本的大资本家，正被美国用来扮演新的角色，作为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

帝国主义阵营所使用的策略武器，是十分多样的。它有直接的暴力威胁、讹诈与勒索、各种政治和经济压力措施、贿赂、利用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等等，以便巩固这个阵营的地位，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用自由主义 - 和平主义的假面具伪装起来的，企图这样来欺骗和引诱政治上没有经验的人。

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略武器库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利用右翼社会党人的叛变

政策，如像法国的布吕姆、英国的艾德礼和贝文、德国的舒马赫、奥地利的伦纳[①]和塞尔夫、意大利的萨拉盖特等人，这些人力图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辞藻，来掩盖帝国主义政策的真正强盗的本质，而实际上，他们在一切方面都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忠诚的同谋犯，他们极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制造分裂，毒害工人阶级的思想。英国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找到了贝文作为它的最坚决、最狂热的执行者，这并非是偶然的。

在这种情况下，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必须团结自己的队伍，制定一个一致赞同的行动纲领，制定出自己的策略，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及英法同盟者，反对右翼社会党，首先是反对英国和法国的右翼社会党。

为了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欧洲所有反帝国主义的民主力量一致努力，是非常必要的。右翼社会党是这一事业的叛徒。在新民主主义国家里，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民主的进步政党结成的联盟，成为这些国家抵抗帝国主义计划的基础；除了新民主主义国家以外，其他大部分国家中的社会党人，首先是法国的社会党人和英国的工党分子——拉马第、布吕姆、艾德礼和贝文——都在奴颜婢膝地帮助美国资本达到它的目的，促进美国资本的勒索，并把他们自己的国家推上仰赖于美国的附庸国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特殊的任务。它们必须举起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如果各国共产党坚守他们的阵地，不受恫吓和讹诈；如果他们勇敢地保卫民主和他们本国的国家主权、自由和独立；如果他们在反对经济上和政治上奴役他们国家的一切企图的斗争中，能够领导一切愿意为荣誉和民族独立而战斗的力量，那么，任何奴役欧洲与亚洲国家的计划，都不可能实现。

这是各国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之一。

必须记住，在帝国主义力图发动新战争的愿望与组织这种战争的可能性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世界各国人民都不愿意发生战争。维护和平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只要他们坚决地保卫和平，只要他们拿出力量和决心，侵略者的计划必将遭到彻底的失败。不应忘记，帝国主义代理人掀起的关于战争危险的叫嚣，目的是恐吓神经脆弱的人和不坚定分子，并用讹诈的手段来达到对侵略者的让步。

今天，工人阶级的主要危险，是过于低估它自己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如以前的慕尼黑政策放纵了希特勒侵略者一样，现在对美国和帝

① 卡尔·伦纳，奥地利社会党领导人之一，奥地利首相。

国主义阵营新政策方针的让步，必然会使这种政策方针的制定者更加嚣张，更富侵略性。因此，各国共产党必须在各个方面，在国家、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领导对帝国主义扩张侵略计划的抵抗；他们必须巩固自己的队伍，在共同的反帝国主义和民主的纲领的基础上，统一他们的努力，并把一切民主的爱国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签字）

关于出席会议的各国党之间交换经验和协调行动的决议

会议宣布，在目前的情况下，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之间缺乏联系，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经验表明，共产党之间的这种缺乏联系是错误的和十分有害的。现在，由于战后的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化，各国共产党之间交换经验和自动地协调行动的必要性，已甚为迫切；共产党之间在这种情况下的缺乏联系，对于工人阶级将是有害的。

有鉴于此，与会者一致达成协议如下：

1. 建立情报局，由南斯拉夫共产党、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波兰工人党、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组成。

2. 情报局的任务是组织交换经验，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在互相协商的基础上，协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

3. 情报局由各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名代表组成，各党的代表由各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和调换。

4. 情报局将下设一个机关刊物，最初为半月刊，然后再改为周刊。机关刊物将

以法文和俄文出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将以其他语种出版。

5. 确定贝尔格莱德市为共产党情报局驻地。

秘书处的建议

由秘书处编制的会议记录，包括了全部会议的逐日的记录，会议听取的所有报告和讲话，以及根据报告所做出的有关决议和公报。对于杜克洛同志和隆哥同志的报告和发言，以及日丹诺夫同志就《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所作的结论性的发言，都进行了详细的书面记录。

提请批准会议记录。[①]

根据秘书处的意见，必须建立以下保存和使用会议文件资料的制度：

1. 在成立情报局工作机关之前，将会议记录保存在联共（布）中央，并委托联共（布）中央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建立情报局的辅助机关。

2. 考虑到关于各国共产党活动情况的报告，可能暴露出本国党的一些战略计划和意图，认为将这些报告文本分发给出席会议的各位代表是不适宜的。

只有经过协商或者是经相应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才能够交换或发表关于该党的活动情况的情报资料。

如果会议同意这些建议，那么，秘书处请求会议做出决定：全体代表将会议的文件交回到秘书处以便进行销毁。

自然，这个决议将不用于以下文件：各位代表以自己党的名义所作的、关于该党的活动情况的报告和讲话文本，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文本，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文本，关于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之间交换经验和协同行动的决议文本，以及发给各位代表的公报文本。

---

① 原文如此。这句话是萨姆布罗夫斯基在 9 月 28 日会议上提出秘书处建议时讲的（见文件 20），因该建议被通过，决议中错误地保留了这句话。似应改为“批准了会议记录”。

文件 22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宣言、决议和公报已获通过的情况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 年 9 月 28 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今天，9 月 28 日，在委员会的工作完成之后，大会已通过决议闭会。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宣言，宣言的基础是我们报告的结论部分，其中有一些不大的修改和补充。接着，大会批准了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交流经验和协调行动”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对于各国共产党必须交流经验以及协调行动的理由进行了简短的阐述，并规定成立具有协调职能的共产党情报局。情报局由各国共产党的代表组成，每个共产党出 2 名代表，分别代表参加会议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情报局将有自己的机关刊物。情报局的驻地设在贝尔格莱德市。

通过上述决议之后，大会还批准了公报的文本。大会认为理想的是，在星期天，即 10 月 5 日，在九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上同时发表会议的文件，用于发表的文本的最终整理工作委托给联共（布）、波兰和南斯拉夫代表共同完成。

会议是在极其热烈和与会代表对工作结果非常满意的气氛中结束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对联共（布）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并保证一定改正错误，修正本党的方针路线。

明天，9 月 29 日的上午，我们将飞抵莫斯科。届时将当面提交会议的一切文件。

谢尔盖耶夫

鲍里索夫

1947 年 9 月 28 日

文件 2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党情报局波兰会议结果的决议

（1947 年 10 月 27 日）

机密

中央委员会在听取了日丹诺夫同志和马林科夫同志关于九国共产党在波兰举行的情报会议结果的报告之后，支持本次会议的结果并赞同会议所做的各项决议。

在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局势的声明对当代国际形势和基本政治力量新的对比关系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分析。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转而奉行来源于美国攫取世界霸权的企图的公开扩张主义政策，奉行造成新战争和侵略的威胁的政策，奉行旨在破坏民主制度的政策的情况下，一系列欧洲国家的最大的共产党举行的本次会议反映了渴望持久和平和自由民主发展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表明了与会各国共产党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反对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残余，为团结各国一切民主和爱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任何国家的世界霸权、反对新战争威胁而斗争的意志和决心。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相信，声明所提出的任务和目标符合全体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也定将得到苏联人民的全力支持。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也赞同九国共产党会议通过的关于为了交流经验和在必要时在相互同意的基础上协调各自的活动而建立由这些共产党参加的情报局的决议。这样一种联系形式在共产党发展的新的条件下是必要的，而且毫无疑问，将会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

为了阐释本次会议所做出的各项决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各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的首府召开党的骨干分子会议，并作关于这次会议结果的报告。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建议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各州委会、边疆区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也在工人、知识分子和集体农庄庄员中就本次会议的结果进行必要的阐释工作。

节选自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4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关于苏南冲突的档案文献选编

这里刊登的档案文献，大部分是近年来俄国和南斯拉夫档案馆解密的历史档案。其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1992—1998年俄国的《历史问题》、《历史档案》等专业杂志刊载的档案文献；二是在俄国出版的有关档案专集（*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1947/1948/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1998）发表的档案文献；三是沈志华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俄国档案馆原始档案的复印件。此外，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也补充了少量苏联和南斯拉夫政府当时公布的文件（这里除南斯拉夫自己保存的档案外，还有50年代苏联归还南斯拉夫的档案），这些材料主要取自斯蒂芬·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1939—1972）：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文版）。这94份档案文献包括从苏南两党领导人的战时接触直至斯大林去世前苏南两党和两国领导人以及有关部门之间的往来电函、照会和会谈记录，以及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有关批判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会议记录和报告，比较清楚地勾勒出这一时期苏南关系的发展脉络。尽管还有许多档案和文件尚未披露，譬如，关于1944年9月和1945年4月铁托与斯大林会谈的文件，关于冲突期间苏南双方各自内部讨论的文件，等等，但通过这里刊登的文献，已经可以为重新认识苏南冲突的历史真相，重新评价苏南冲突的真正原因、性质和结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本组文件由张木生、陈新华、吕允连、高增训、孙士明、陈玺、王英杰、刘新宇、吴红、侯静娜等翻译，沈志华、方琼校对，沈志华编辑和注释（对档案文件的说明多为原档俄文整理者所加）。

文件 01

斯大林与赫布朗关于南斯拉夫军队和外交问题的会谈记录（节录）

（1945 年 1 月 9 日）

绝密

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维·米·莫洛托夫、A.Ф. 基谢廖夫和 B.M. 萨哈罗夫。

南斯拉夫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南斯拉夫军队最高司令部参谋长阿·约万诺维奇。

…………

然后，赫布朗说，他想向斯大林同志通报与保加利亚的关系。赫布朗称，事情进展非常艰难，过错在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人不接受南斯拉夫关于联邦的条约草案。

斯大林同志说，他看过条约草案，这个草案不合适，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是可以加入联邦的两个国家，而这个联邦的前景是在二元制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全联合这两个国家。根据南斯拉夫人现在建议的联邦条约，保加利亚人将获得与南斯拉夫各民族诸如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平等的权利，保加利亚人认为，这个条约草案有吞并他们的意图。必须向完全联合努力，这将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但是必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朝这一目标走，先从联盟，从互相援助开始，然后逐步走向联合。这不是权宜的联盟，而是永久的联盟。这是自由的联盟，是自由结成联邦的两个国家的有机联盟。不能造成想吞并保加利亚人的印象。

…………

斯大林同志再次强调，必须逐步走向联合，保加利亚人要联盟，他们要建立两位一体的国家，这很好。最好签署 10 年或者 20 年的友好互助条约。现在应当把二元制原则作为联合的基础，按奥匈帝国模式建立两位一体的国家，但是又避免了旧奥匈帝国存在的许多弊端。

如果形势急剧转变，保加利亚人可能会倒向美国和英国，甚至倒向土耳其。必须准备基于二元制原则上的联邦制联合。

…………

斯大林同志谈了他的推测：丘吉尔由于在希腊得手非常得意，正在寻找借口在南斯拉夫故伎重演。不应在这件事上给丘吉尔帮忙。当然，希腊人民解放军被打败对南斯拉夫也是坏事。希腊反对派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武装进攻抗衡。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代表退出了帕潘德里欧政府，他们做得不对。他们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让丘

吉尔轻易得手了。在南斯拉夫不要发生争斗，不要让丘吉尔轻易得手。不能给他借口，而丘吉尔正在寻找这样的借口。丘吉尔在希腊很多方面已被搞得焦头烂额，故伎重演不会那么容易，何况还怕我们。

接着，斯大林同志对挑起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战事是否合适表示了怀疑。他又说，首先应当力求把政府的组成明确下来。丘吉尔认为，铁托－舒巴希奇政府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因为不论是铁托还是舒巴希奇，都是克罗地亚人。但是英国人失算了，这一点现在看得出来。

斯大林同志说，希望南斯拉夫方面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最好征求我们的意见，否则，我们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

会谈持续了 3 小时 15 分钟。

（记录：基谢廖夫少将，萨哈罗夫少校）

文件 02

拉夫连季耶夫与卡德尔关于参加马歇尔计划问题的电话记录

（1947 年 7 月 4 日）

秘密

摘自 A.И. 拉夫连季耶夫日记

分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A. 拉夫里舍夫，归档。

卡德尔给我打来电话说，鉴于各方面的新闻记者和外交官纷纷询问南斯拉夫在详细拟定美国向西欧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措施方面今后的立场，南斯拉夫政府打算发表一项声明。在此项声明中南斯拉夫政府打算指出：南斯拉夫不能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参加拟定这样的计划，因为英国和法国政府的建议是试图建立一种允许某些大国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并使小国的经济依附于这些大国，进而使小国丧失其民族独立。卡德尔请求把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政府准备发表的上述声明的意见告知他。卡德尔同时指出，最好能在今天晚上就得到答复，因为南斯拉夫政府打算在明天发表这一声明。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A. 拉夫连季耶夫

文件 03

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关于阿 - 南争论问题的谈话记录（节录）

（1947 年 8 月 14—15 日）

秘密

摘自 A.И. 拉夫连季耶夫日记

分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A. 拉夫里舍夫，归档。

（一）在我同铁托在布尔多进行的交谈中，铁托对我说，在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之后，某些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对南斯拉夫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并且错误地评价南斯拉夫对阿奉行的友好政策。某些人在说，南斯拉夫企图以低廉的代价染指阿尔巴尼亚，说南斯拉夫许诺的非常多，但是实际上却任何东西都不给。其实南斯拉夫之所以对阿尔巴尼亚表现出关注之情，也是从阿尔巴尼亚人民本身的利益出发，力求维护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南斯拉夫视阿尔巴尼亚为地理上和军事战略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地方。曾经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其中有货物，也有粮食，尽管南斯拉夫的反动势力积极利用这些措施来反对南斯拉夫政府。

铁托对纳科·斯皮鲁的立场表示特别不满，他认为此人在奉行使阿尔巴尼亚疏远南斯拉夫的政策。去年，纳科·斯皮鲁在南斯拉夫逗留期间曾经诋毁过恩维尔·霍查。可是现在他却又同恩维尔·霍查紧紧地搞在一起。在去年，铁托曾对阿尔巴尼亚人说，恩维尔·霍查作为党的总书记，应当有与之相应的地位，也就是说，铁托曾帮助加强他的地位。铁托并不认为恩维尔·霍查是个耍两面手腕的人，但是据他的印象，霍查很容易受他人的各种影响。铁托认为最坚定的和始终如一的领导人是佐泽。据铁托掌握的情报，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之间，工作中缺乏必要的步调一致。

铁托认为不可以让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国之间产生不和。因此他认为非正式地邀请恩维尔·霍查和佐泽来南斯拉夫并同他们就此事进行交谈是适宜的。依照铁托的意见，应当向恩维尔·霍查和佐泽指出，不能把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看成是苏联希望阿尔巴尼亚疏远南斯拉夫的表现，而是恰恰相反，应当将其视为是对两个邻国之间亲密关系的促进。在这次会晤期间，铁托打算向阿尔巴尼亚人建议解除斯皮鲁的职务。毫无疑问，由于一些领导人对南斯拉夫采取的不友善政策，对南

斯拉夫的不满情绪也将在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某些阶层中表现出来。关于这一点，铁托那里有一份由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代表提供的书面报告。

铁托请求告知他，苏联政府对拟议中的他同恩维尔·霍查和佐泽的非正式会晤一事的意见。

我答应将这一请求转告莫斯科。

…………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A. 拉夫连季耶夫

文件 04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整理的关于南斯拉夫现状的备忘录（摘录）①

（1947 年 9 月）

…………

在谈到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巩固国家民主制度方面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不能不指出，共产党领导人的某些过高评价自己成就的倾向和把南斯拉夫共产党摆在巴尔干地区某种“领导”党地位的意向。

在解决涉及对外政策执行方面的一些问题时，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有时不顾及其他国家和兄弟党的利益，表现出民族的狭隘性。

为了证明这些结论，可以指出如下一些事实：

例如，南斯拉夫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采取错误的立场，而无视民主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同英美两国进行斗争的共同利益。在这方面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南斯拉夫报刊上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活动及其领导人陶里亚蒂同志的令人不能容忍的尖刻批评。

1946 年 11 月保加利亚宪法草案公布之后，南斯拉夫报纸（有理由认为这是按照共产党的指示进行的）对保加利亚的宪法草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南斯拉夫共

① 该报告是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为日丹诺夫在九国共产党波兰会议（即第一次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发言而准备的备忘录的一部分，标题为：《南斯拉夫经济与政治现状》。类似的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材料还有一些。在这些材料中，对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提出了批评意见，但是日丹诺夫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没有出现对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批评。

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卡德尔的助手、共产党人格尔什科维奇在1946年11月14日《战斗报》上指责保加利亚政府侵害了马其顿民族的民族权利，他写道：

“很明显，这样一种安排……与真正以民主方式解决民族问题、与任何民族都享有的自决权和民族统一的权利毫无共同之处。”

南斯拉夫报刊的这一批评被保加利亚社会舆论看作是企图干涉保加利亚的内政。

去年12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谈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卡德尔同志和兰科维奇同志曾对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契尔文科夫说，他们不相信保加利亚工人党（共）并且认为该党在马其顿问题上的方针是错误的。他们（南斯拉夫领导人）把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中央委员会的这种行为看作是追求在巴尔干地区发挥领导作用。

南斯拉夫政府尽管已经同阿尔巴尼亚签署了友好互助条约，但是在整整一年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履行该条约的条款，没有向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提供经济援助。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对阿尔巴尼亚渴求同苏联建立直接联系十分妒忌，他们认为，阿尔巴尼亚只能通过南斯拉夫政府同苏联保持联系。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对待苏联的不友善态度的实例是：南斯拉夫政府拒绝在1946年12月接待苏联军队歌舞团——尽管派歌舞团去南斯拉夫当初是应他们邀请的。

上述这些以及其他一些事实证明南斯拉夫共产党某些领导人存在着不健康的倾向。

文件 0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同东欧各国签订互助条约问题给外交部的指示

（1947年10月14日）

秘密

批准关于同东欧各国签订互助条约问题给外交部的如下指示：

（一）首先应确保在东欧小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之间签订互助条约，在此之后再签订苏联与上述国家中那些尚未与苏联签订此类条约的国家之间的互助条约。

（二）支持这样的建议，即拟议中的东欧小国之间的互助条约出发点应当是互相支援，以反对来自任何国家的侵略的义务，而不仅仅是反对来自德国及与之共同推行侵略政策的国家的侵略。

（三）如果在上述国家中的这些或者那些国家之间不能就签订符合第二项内容的互助条约达成一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则应另行研究签订互相支援条约的问题，该条约旨在反对德国及其他直接或以任何别的形式与之共同推行侵略政策的国家的侵略。

文件 06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情报局会议后南斯拉夫反应的调查报告（节选）

（1948 年 1 月 28 日）

秘密

1948 年 1 月 28 日 19 时 30 分收到

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决议对

南斯拉夫加强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影响

莫斯科

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的文件在中央的各刊物，首先在共产党机关报《战斗报》发表（1947 年 10 月 5 日）了，从 10 月 6 日到 11 日又发表在所有南斯拉夫的刊物上。

这个时期所有南斯拉夫的刊物都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之下，广泛阐述国外刊物对协商会议决议的反应。

…………

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完全符合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宣言的原则。为补充以前签订的协议，南斯拉夫政府最近又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签订了友好相互条约。由于签署这些协议，南斯拉夫现在已与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的所有新民主国家正式确定了人民之间紧密的友好关系。

南斯拉夫这些民主的对外政策引起美国和英国方面的极端仇视。他们采取一切措施对南斯拉夫的政治和经济施加影响。在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和贝尔格莱德成立情报局以后，英美在对南关系政策上非常无礼和敌视。

政治上没有可能影响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英美分子便极力给南斯拉夫造成经济上的损害。为此，美国政府至今未取消对存放在美国的价值5600万美元南斯拉夫黄金的管制。

英美统治集团向地中海派出了海军陆战队和战舰，企图恐吓南斯拉夫政府。

为了不让南斯拉夫承认马科斯将军的政府[①]，英美政府愚蠢地警告南斯拉夫，说“承认马科斯政府将引起严重的后果”。

英美分子力图进一步控制的里雅斯特，保存自己在那里的驻军，以便以此影响南斯拉夫政府。

为此他们拖延委派的里雅斯特的省长，因为委派了省长就意味着的里雅斯特作为自由区政府委员会的成立，英美部队就将从与南斯拉夫接壤的里雅斯特地区撤出。

对于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干预他国对外政策的企图，南斯拉夫政府做出了勇敢而自信的反应。

运用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资料，南斯拉夫政府坚决地揭露了“马歇尔计划”的卑鄙企图，集中力量带领南斯拉夫人民完成五年计划，尽可能地增强国防力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

B. 列萨科夫[②]

① 1946年初，希腊共产党决定组织新的武装斗争。1947年12月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军宣布正式成立希腊临时民主政府，民主军总司令马科斯任总理兼军事部长。

② В.И. 列萨科夫（1909-？），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工作人员。

文件 07

科拉罗夫[①]关于苏、保、南领导人会谈的笔记（摘录）[②]

（1948年2月10日）

莫洛托夫：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分歧：

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条约；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同记者的谈话；

南斯拉夫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

（1）错误在于同保加利亚的和平条约生效之前签订了保－南条约，而且是无期限的。

保、南两国政府以自己的匆忙行动加强了英、美国内的反动分子，给他们提供了为反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而加紧入侵希腊的借口。苏联政府应该提出警告的是，苏联不可能对没有同苏联协商就签订如此重大的条约承担责任。

你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而行动却相反，没有预先告知我们。这样的态度是错误的和不能允许的。

（2）我们觉得，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同志迷恋于记者招待会和发表谈话，这样就为记者关于某些不该谈论的问题向他挑衅提供了借口。谈话中阐述了走得太远并没有打算同任何人协商的计划，还提出联邦或邦联的问题，关税同盟问题，而且把波兰和希腊也包括进去了。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同志在没有任何人授权的情况下谈论了上述各种问题。这在实质上是不正确的，在策略上也是错误的。这就使得西方集团建立者的事情变得容易了。所以，根据党的政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应该受到警告处分。

您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建立联邦或邦联的讲话看来是有害的，给新的民主国家造成了损害，而使英国人和美国人感到轻松。最有害的和不能容忍的是关于关税同盟的讲话，因为这可以理解为它包括了很快就将同这些国家签订互助条约的苏联。[③]

---

① 瓦西尔·彼得罗夫·科拉罗夫（1877–1950），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自1945年历任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临时总统、部长会议主席等职。

② 该文件是科拉罗夫用俄文记录的，保存在保加利亚中央档案馆。根据记录，会议时间为1948年2月10日21时10分至21日0时10分。

③ 1948年2月4日、2月18日、3月18日，苏联分别同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签订了同盟条约。

很难理解的是，什么东西促使您在记者招待会上作如此不加考虑的声明。

我们和波兰的同志谈话时，他们说："我们想，这是莫斯科的意见。"大家都这样认为，既然季米特洛夫和铁托提到了一系列国家，这肯定是根据苏联的意见谈的。实际上，波兰的同志说，他们反对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观点，并认为他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因为大家都认为——无论朋友，还是敌人——这是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这绝对是不正确的，以后也是不能允许的。

季米特洛夫的解释无济于事，甚至会使问题更加混乱。[①] 从他那里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从前干涉同塞尔维亚的关税统一的是德国，而现在是苏联。

季米特洛夫：我们不是这么想的。

斯大林：您作为政治活动家，不应该只考虑自己的想法，而应该想到别人会从您的讲话中得到什么（科拉罗夫：我们想，您甚至反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税同盟）。我们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关税同盟不仅不会反对，而且恰恰相反。

莫洛托夫：贝奈斯的报纸迫不及待地写道："季米特洛夫提出了共产主义计划，现在就让捷克共产党人来回答。"另一方面，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这种立场是与九国共产党宣言相矛盾的。

斯大林：您对记者的谈话使注意力离开了内部问题，谈的不是九国共产党会议上所谈的内容。

莫洛托夫：我们认为所有这一切以后都是不可允许的。

（3）我们意外地得知，你们想在 1 月底将一个南斯拉夫师开往阿尔巴尼亚，以共同保卫边界。阿尔巴尼亚人说，他们确信，这件事是征得我们的同意后才干的。

据此应该得出结论，我们对阿尔巴尼亚局势的评价是不同的。不应该对这类分歧保持沉默。我们应该就此问题公开商谈，以便让人看出你们是如何评价局势的。我们认为，将来对此类问题也不应该忽视。有分歧就需要搞清楚，如果有不同的观点，就应该说出来并加以讨论。如果对这类问题没有进行协商，就不应该采取行动。这是为了事业和我们相互间的协议。

---

① 1 月 28 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述评，表示绝不赞同季米特洛夫在联邦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并认为这种联邦是"不可靠的和凭空虚构的"。对此，季米特洛夫首先以保通社 1 月 29 日声明的形式，然后又在 2 月 2 日祖国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公开表示接受批评。他还把保通社的声明寄给了苏斯洛夫，让他转告斯大林，相信他与苏联立场将保持完全一致。

将来，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应该使自己和我们避免这类声明的危险。

季米特洛夫：我承认自己对布莱德谈判[1]所犯的错误，对记者的谈话也同样是错误的。为了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和防御能力，我们必须同其他新的和民主的友好国家合作。

斯大林：您是想标新立异。波兰人和捷克人在嘲笑您的联邦。请您问问他们，他们是否喜欢这个联邦？

季米特洛夫：这是有害的，实质上是错误的。这种说法是旨在反对想利用声明来反对我们和苏联的那些人。这是一种情绪。这样的宣言将来不会再有了。

斯大林：我们相互之间不理解，而你们竭力在隐瞒这一点。

莫洛托夫：这是严重的分歧，不是小事情。

斯大林：您是一位老政治家，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也可能您有另外的看法，但您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需要如此频繁地与记者谈话。您总是想标新立异，想惊动全世界。您之所以这样做，好像您还是共产国际总书记，能向共产党的报纸发表谈话。您助长了美国的反动派，目的是使社会舆论相信，如果成立西方集团，美国也不会有什么作为，因为在巴尔干存在的不只是那一个集团，还有一个关税联盟。当前美国正在进行大选前的斗争。对我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那里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因为，美国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强国。美国政府的首脑不是一些知识分子，而是一些真正的金融寡头，他们仇恨我们到了可怕的程度，一直在寻找对我们进行破坏的借口。如果我们以自己的行动为进步势力提供论据的话，那些大财团就会在大选中失败。如果我们为反动派提供精神食粮，那我们就帮助了大财团。美国政府处在大选前夕，正在担心选举结果。而如果这些大财团重新进入政府，那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和我们的行动过错造成的。他们将会说："你们建立的不仅是一个集团，而且是将许多国家联合在一起——反对谁？"您为什么需要这么一个集团？最后，如果是你们自己想联合在一起，那何必就此问题掀起这样一场喧嚷？您或者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是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那样被蒙蔽了。您这样干究竟为了什么？您为什么要减轻您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敌人的负担呢？

再来谈谈阿尔巴尼亚问题。南斯拉夫同志多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战争期

① 1947年7月底季米特洛夫访问南斯拉夫，8月1日南保在布莱德签订了包括边界、贸易、战争赔款等一系列问题的条约。会谈后季米特洛夫声称，建立南部斯拉夫人联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间，三个同盟大国宣布阿尔巴尼亚独立，并说它们将支持独立。[1] 在反动派和民主力量斗争的所有环节中，阿尔巴尼亚这个环节是我们最薄弱的地方。阿尔巴尼亚还没有被接纳加入联合国，英国人和美国人不承认它。[2] 那里的问题是明摆着的。再没有像这样薄弱的地方了。只有阿尔巴尼亚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法律保护。如果铁托向那里派去一个师，或仅仅一个团的话，这不可能瞒住美国和英国。它们就会开始喊叫说，阿尔巴尼亚被占领了。难道阿尔巴尼亚公开请求南斯拉夫予以帮助？那时，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坏蛋就会充当阿尔巴尼亚独立的保护者的角色。除了无知的人以外，还有谁能够坐视形成一个明显靠不住的阵线呢？现在需要的是加强组织阿尔巴尼亚的军队，为其派去教官，提供武器装备。在此之后，如果阿尔巴尼遭到进攻，它应该向南斯拉夫请求援助。否则，南斯拉夫就像是占领另一个独立国家的国家。那时完全可能出现武装干涉，也会出现美国的舰艇和基地。这对美国来说将是最方便和最有利的借口。当投入战斗的时候，应该建立对于自己有利的战线，而在这里简直就是亮出自己的后背让美国人打击。

看看在中国发生的战争吧。那里没有我们的一卒一兵。难道阿尔巴尼亚人不如中国人？训练他们吧，武装他们吧，他们自己会保护自己的。最好是让他们自己保卫自己的独立。这样，美国人自己很难发动进攻，否则他们的事情就容易办了。你们这样解决问题过于简单了，而实际上问题是复杂的。

如果希腊游击队将被消灭的话，你们能否发动战争？

卡德尔（当时的南共政治局委员）：不能。

斯大林：我是以对游击队现有兵力和他们的敌人进行分析为出发点的。近来我开始怀疑游击队是否能取得胜利。如果你不相信游击队会取得胜利的话，就需要收缩游击运动。美国人和英国人对地中海并不十分感兴趣。他们想在希腊建立基地，而不吝啬资金，目的是在那里保住一个听话的政府。这是一个国际大问题。

如果收缩游击运动，他们就没有理由进攻你们。如今不是那么容易发动战争的。如果你们坚信游击队有可能取得胜利，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我对此多少有点怀疑。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我们很少得到那里的信息。

---

① 1942年12月17-18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达成协议，宣布不承认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的占领，并支持阿尔巴尼亚恢复独立。

② 尽管美国和英国在1945年11月10日与苏联同时发表声明，承认了在阿尔巴尼亚建立的新政权，但是他们不同意接纳阿进入联合国，也没有与阿建立外交关系。

斯大林：您有权向我们要，我们向你们通报。让我们签订一个我们之间就所有重要问题必须进行协商的议定书。

季米特洛夫：我们将遵守它。

斯大林：同保加利亚的条约无须拖延。

本月 15 日匈牙利人来这里。在这之后，我们要请芬兰人，此后再请你们。

莫洛托夫：在某个条约中谈到关于消灭所有的侵略策源地的问题。[①] 这只是些漂亮的词句。这些词句只能为我们的敌人提供额外的武器。你们为什么要说得比其他条约多？你们将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吗？

斯大林：这是“左”派的热情。

莫洛托夫：任何倡议都可能得不到支持，联合国反对侵略，他们可能使联合国走到反对我们的地步。难道国联没有借口我们同芬兰的争执[②]宣布我们为侵略者吗？

南斯拉夫的同志们不允许阿尔巴尼亚购买我们的 5000 吨燕麦，而是要它去阿根廷购买燕麦。[③]

斯大林：看来，南斯拉夫人害怕我们向他们夺取阿尔巴尼亚。你们应该吞并阿尔巴尼亚，但要聪明一点。

科拉罗夫提请注意，同罗马尼亚的条约已经同莫斯科协商过了。[④]

你们关于统一经济计划的决定限制了你们自己的主权和罗马尼亚的主权。

只有三个联邦是可能的和自然的：(1) 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2)、罗马尼亚和匈牙利；(3) 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联邦是可能的和现实的。它们之间的邦联则是……[⑤]

特赖乔·科斯托夫[⑥]：是否可以认为，我们可以采取加速实现保加利亚和南斯拉

① 指 1947 年 11 月 27 日签署的南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 7 款中的内容。

② 1939 年 10 月和 11 月，苏联为了保证其西北边界和列宁格勒的安全，要求与芬兰缔结交换领土的条约，遭到拒绝后，苏联对芬兰发动了战争。

③ 1947 年 12 月 13 日，拉夫连季耶夫根据莫斯科的委托，通知铁托，阿尔巴尼亚要求苏联政府提供 5000 吨燕麦，并询问南斯拉夫的意见。两天后铁托答复，不需要从苏联运货，因为阿尔巴尼亚将收到南斯拉夫运去的燕麦。但南斯拉夫的燕麦一直没有到货，当阿尔巴尼亚人询问此事时，南斯拉夫人劝告他们到阿根廷去购买。后来卡德尔解释说，这是因为南斯拉夫主管部门之间的误会造成的。

④ 指 1948 年 1 月 16 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签署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其内容表明两国准备实现关税统一。苏联对此表示反对。

⑤ 此处复印件字迹不清。

⑥ 特赖乔·科斯托夫（1897–1949），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

夫之间的联邦的方针？

斯大林：建立联邦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明天就可以建立。这很自然，我们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我们只反对共青团式的联合方法。联邦应该是经过筹备的，以便它能够被两国内部社会舆论和外部世界所接受。

卡德尔：我们认为，就是同保加利亚的联邦，也无须匆忙行事，基本上按国际原则进行，因为匆忙可能使我们处于困境。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你错了。你们不应该拖延三国——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联合。但必须由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并授权政府开始就联合问题进行谈判。最好从政治联合开始，这样就可以向阿尔巴尼亚派出军队，这样做不会成为外国进攻的借口。

在同保加利亚签订和约之前，建立联邦为时过早。但现在保加利亚已经是一个正式的主权国家了。现在，依我看，你们不应该拖延这个问题，最好尽快解决。如果你们通过各自国家的国民议会进行联合的话，那一切将很顺利。联邦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在种族关系上很接近，在生活习惯和风俗习惯上更接近，每一个人都会理解这种联合。阿尔巴尼亚人在联邦条件下也会得到好处，因为将建立一个几乎多一倍人口的统一的阿尔巴尼亚。

需要做的是，将所有的力量团结在这个自然的联邦周围，以发展联邦的经济和民族文化，加强其军队。否则，波兰将对你们抱以希望，而你们对波兰也会寄予希望，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好处。你们没有任何必要偏离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决议。

莫洛托夫：如果需要消除季米特洛夫所说的那种侵略的策源地，就这样去做吧，有什么必要大声呼喊，故意声张呢。现在每一句话都被他们揪住不放了。

特赖乔·科斯托夫：我们认为，希腊的游击运动的失败将会给其他巴尔干国家造成非常困难的局面。

斯大林：自然，游击队应该予以支持。但如果游击运动的前景无望的话，最好将斗争推移至最佳时间。即使在力量对比上有什么差距，那也不能喊叫。必须理智地计算力量。如果计算表明，当时工作不可能有进展，那也无须羞于承认这一点。如果局势不利的话，可以收缩游击运动。即使今天不可能，明天也会是可能的。你们害怕提出尖锐的问题。你们总是处于“道义责任”的影响下。如果你们对所承担的责任力不胜任的话，那就应该承认这一点。你们不应该担心在“道义责任”方面的绝对命令。我们这里没有这种绝对命令。整个问题在于力量的权衡。如果你们能够打的话就打，如果不能够打的话，就别去战斗。我们不能在敌人想战斗的时候去

战斗，而是当我们的利益需要战斗时再去战斗。

卡德尔：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即游击队在数个月内成功的希望如何。

斯大林：好，请稍等。或许，你是正确的。我也曾怀疑中国人是否能够胜利，我建议他们同蒋介石达成临时协议。他们形式上同意我们的建议，而实际上继续干自己的——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之后，他们公开提出问题：我们将继续战斗，人民支持我们。我们对他们讲：好吧，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显然，他们那里基础非常好。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或许，在这里，我们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我们认为，你们一定要有把握再行动。

科拉罗夫：那么美国人能允许游击队胜利吗？

斯大林：不要问他们。如果有能够取得胜利的力量，如果有能够利用人民力量的人，就应该继续斗争。但也不应该这么想，以为在希腊没有成功的希望，其他一切就都完了。

与希腊相距较远的国家应首先承认马科斯政府[①]，而周边国家应该最后承认。

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同志反对鲁尔切夫的讲话也是错误的，如今被敌人广泛利用了。[②]有什么必要这样干。

季米特洛夫：这主要是迫于国内的需要，目的是不让他们再抬起头来。

斯大林：让尤戈夫[③]去同反对派交谈吧，他最善于做这项工作。

卡德尔：我们认为，在实质上，我们之间是没有分歧的，只是存在着个别错误。

斯大林：这不是错误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

① 1947年12月25日，以希腊游击队领导人马科斯为首的希腊临时民主政府宣布成立。

② 鲁尔切夫·科斯塔（1882–1965），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人党总书记。该党反对共产主义制度。1948年1月10日，在保加利亚召开的国民大会上，在回答社会民主工人党代表对政府预算草案的批评时，季米特洛夫指责他们是阴谋者，是祖国的敌人。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认为这是要镇压反对派，挑起反对西方的行动。

③ 安东·尤戈夫（1904–1991），保加利亚内务部长，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件 08

卡德尔等人关于2月10日会谈情况的电报

（1948年2月11日）①

昨天晚上21时，我们应邀到了克里姆林宫。出席会见的除我们三人外，有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和莫洛托夫的一位副手；保加利亚方面有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科斯托夫。会见持续了3个小时。莫洛托夫提出了他们同保加利亚以及同南斯拉夫之间分歧的三个问题。

1. 签订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无限期条约没有预先同他们协商。

2. 季米特洛夫对记者的谈话。

3. 向科尔察派一个师。

他们的主要结论是，就对外政策的所有主要问题经常协商的必要性。他们建议就这个方针签订一项负有协商义务的议定书。我们同意了这一点。关于会谈提出的所有问题和讨论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将口头报告。我们注意到，季米特洛夫因保加利亚分别与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之间需要建立关税同盟和协调计划而受到批评。俄国人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涉及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讨论的结果是，我们没能提出任何一个我们的经济问题。为此，卡德尔想拜会莫洛托夫。我们将尽快回国。

卡德尔、巴卡里奇、吉拉斯

文件 09

关于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的议定书

（1948年2月11日）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南斯拉夫按照它们之间于1945年4月11日签订的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所承担的义务，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商定，它们有义务就涉及两国利益的所有重要国际问题进行相互协商。

① 原档表明的日期是2月12日，但根据电报内容判断，发出电报的时间应为2月11日。

本议定书从签字之日起生效，并将在上述条约的整个期限内有效。

本议定书一式两份，每份文本均以俄文和塞尔维亚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1948 年 2 月 11 日于莫斯科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　莫洛托夫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　卡德尔

文件 10

莫洛托夫召见卡德尔会谈备忘录

（1948 年 2 月 13 日）

绝密

摘自莫洛托夫日记

1948 年 2 月 13 日 18 时 05 分

今天我召见了卡德尔同志，对他同我 2 月 11 日会谈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回答。

1. 关于铁托同志来莫斯科的问题。

我通知说，斯大林同志和其他同志当然高兴同铁托同志会见，时间如卡德尔所说，在 3 月或 4 月。

我们商定，来访日期待日后确定。

2. 关于南斯拉夫申请军事援助和为南斯拉夫军事工业供应设备的问题。

我通知说，苏联政府将于最近研究这一问题，并对南斯拉夫政府作出相应的回答。

3. 关于为南斯拉夫提供价值金币 6000 万美元的借款问题。

我通知说，苏联政府仔细研究了南斯拉夫的请求并一致表示，这一请求不可能得到满足。这时我向卡德尔指出，1948 年是我国财政困难的一年，由于财政改革，国家预算仅降低国家物价一项就每年少收入 570 亿卢布，其他收入也会减少。我还指出，今年我们限制了资本投入，采取了限制国家开支的严厉措施。我补充说，两年前，我们还有较大的能力为南斯拉夫提供以金币计算的贷款，但今年由于国家预算紧张，我们没有这种能力。

卡德尔同志对我的说明没作任何评论，但总的看对我的说明反应平静，表示理解苏联的财政状况。

莫洛托夫

1948 年 2 月 13 日

文本确认：(波德采罗布签字)

分送：斯大林、贝利亚、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维辛斯基、佐林

文件 11

铁托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给吉拉斯和卡德尔的电报

（1948 年 2 月 13 日）

吉拉斯和卡德尔：

从你们的紧急报告中看出，你们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结果。现告知你们下述情况，以供在可能的谈判中使用：我们的军事代表团团长库普列沙宁将军昨天从阿尔巴尼亚回来，他说阿尔巴尼亚军队各方面的状况都很糟糕。这支军队毫无一点战斗准备。没有粮食。阿尔巴尼亚北方与南方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通信联络。供给因只有一条道路和桥梁损坏而处于困境。各级司令部都很差劲。没有动员计划，可以说连最低程度的战役计划也没有。总之，一切重担都落在我们肩上，如果我们想从战斗准备的观点使这支军队多少有点用处的话。我们认为，苏联的军事教官应该处于贝尔格莱德军事教官的领导之下，并应该将他们看作是我国军队的教官。总的来说，他们对于阿尔巴尼亚军队的这种处境应负有责任。我们认为，你们应该在如果阿尔巴尼亚遭到进攻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上得到具体的答复。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种进攻一旦得逞，我们的南马其顿就将处于艰难的战略态势。如果他们那里不同意让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放开手脚的话，那么，无论是解决这支军队的供应问题，还是解决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我们都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决定。由于当前这种状况，在为我们的边境防御采取有效措施方面，我们的双手被束缚住了。

文件 12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南斯拉夫意识形态问题给苏斯洛夫的报告（节选）

（1948年3月18日）

绝密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莫斯科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安·苏斯洛夫同志

南斯拉夫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观察在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和研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物的言论，可以得到这一结论的根据。主要的错误如下所述：

（一）在制定国家实际的工作任务和确定今后的发展前景上，南斯拉夫领导人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用其来指导自己的实践。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主要原理，而“实践家企图抛弃理论就违背了列宁主义的全部精神，是对事业的最大危害”（斯大林语）。

（二）南斯拉夫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及联共（布）这个久经考验的和全世界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步力量都承认的领导力量，采取了不友好和不正确的态度。

（三）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陶醉于巩固人民民主国家和创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先决条件等方面的成绩，过高地评价自己的功劳，在估计自己今后的前途和实行的对外政策中，妄想作为巴尔干地区和多瑙河流域国家的领导力量，已成为冒险主义的人物。对于一些兄弟党表现出不能容许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四）南斯拉夫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困难估计不足。忽视富农作为阶级产生的可能性及其作用，在对待富农的政策上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态度。

（五）在确定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中实行有害的、实质上是取消主

义的政策，把党与民族阵线混为一体。

…………

Л. 巴拉诺夫

В. 莫申托夫

В. 列萨科夫

文件 13

铁托就苏南关系一些问题给莫洛托夫的信[①]

（1948年3月18日）

就您3月13日的来电，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现答复如下：

（一）有关加加里诺夫的表现，我国政府注意到您来电中所作的解释，至于向我国政府提供信息的南斯拉夫代表，我国政府认为根本不存在诽谤的问题。

（二）关于贸易条约，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政府拒绝签订1948年5月至年底的贸易议定书，事实如下：

2月26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贸部副部长茨尔诺布尔尼亚同志[②]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商务代表日贝尔纳拜会了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克鲁季科夫。当时他向他们通报说，苏联外贸部改变了自己原先的观点，不能签订5月至年底的贸易议定书。他宣布，现在没有必要派遣南斯拉夫贸易代表团来莫斯科，关于（签订）1949年（贸易议定书）的谈判只能在今年底举行。茨尔诺布尔尼亚随即询问，这是克鲁季科夫的个人意见，还是他可以报告本国政府的苏联政府的观点。他得到的回答是，这是苏联政府的观点，他可以将此观点报告本国政府。尔后，经认为（签订）1949年（贸易议定书）的谈判只能在年底举行的克鲁季科夫的明确同意，茨尔诺布尔尼亚立即返回了贝尔格莱德。

根据茨尔诺布尔尼亚的这一报告，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自然得出结

① 苏联驻南大使馆代办阿尔米亚尼诺夫3月19日向苏联外交部报告，铁托与他会谈时告知，对莫洛托夫电报的答复“是以信件的形式并派信使送往莫斯科的，以便通过自己的使馆转交”。

② 波格丹·茨尔诺布尔尼亚（1916–？），历任南斯拉夫外贸部副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共和国总统秘书长等职。

论：苏联政府不准备签订 1948 年 5 月至年底及至 1949 年 5 月的贸易议定书，虽然这一议定书是由期限为两年的南苏条约所规定的。[①] 然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满意地注意到您来电中所作的表示，即苏联政府愿意签订 1948—1949 年贸易议定书。但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提到上述信息的同时认为，因此就存在某种形式的诽谤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三）至于第纳尔与卢布的汇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未提出过全面变动汇率的问题，因为它知道这一汇率是以卢布与美元的比价为根据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只是请求在某些部门采取一些特殊做法，因为在那些部门卢布与第纳尔的官方比价极大地加重了南斯拉夫对苏联的财政义务，例如对于文职顾问、军事顾问和教官，以及在苏联学习的我国干部，等等。

（四）南斯拉夫关于军火供应的建议是以过去与苏联代表举行的几次会谈为基础的，这些苏联代表并不认为南斯拉夫的计划过分。斯大林同志曾亲自赞同南斯拉夫应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苏联将援建军火工业。[②] 但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已注意到苏联代表的最新意见，虽然它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南斯拉夫的物质能力，而且它的专家们也正在制定新的、将大大压缩的建议。十分清楚，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考虑到苏联战后恢复和建设向苏联生产部门提出的大量需求，所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只是期待苏联在其能力范围内提供援助。以后的计划规模取决于我国自身的能力，这种能力也是相当可观的。南斯拉夫政府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一计划，原因在于它认为南斯拉夫——鉴于其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当然是在其能力的范围内。

由于这一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尽快继续进行关于 1948 年贸易交换及军火供应的谈判。

1948 年 3 月 18 日

① 这里指的就是 1947 年 7 月 5 日苏南签订的“换货和支付协定”。

② 指斯大林在 1946 年 5 月 27 日与铁托会谈时的讲话。

文件 14

莫洛托夫关于撤回苏联专家致铁托或卡德尔的电报

（1948 年 3 月 18 日）

兹获悉，基德里奇的助手斯尔曾蒂奇[①]向苏联商务代表列别杰夫声明：根据南斯拉夫政府的决定，不准向苏联机构提供经济情报。这一消息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曾有一个苏联政府机构可以自由地获得这类情报的协议。[②]更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南斯拉夫政府机构没有预先通知、也未解释原因而单方面地采取了这一措施。苏联政府把南斯拉夫政府的这种举动看作是对苏联驻南斯拉夫工作人员的不信任行为和对苏联不友好的表现。

显然，在对苏联驻南斯拉夫工作人员如此不信任的情况下，他们认为不能保证自己不受到来自南斯拉夫机构的类似的不友好对待。

有鉴于此，苏联政府已指示黑色金属冶金部、有色金属冶金部、化学工业部、电力部、邮电部和卫生部，立即把他们各自的所有专家和其他工作人员撤回苏联。

文件 15

铁托关于苏联撤回专家致莫洛托夫的信

（1948 年 3 月 20 日）

致苏联外交部长维·米·莫洛托夫

3 月 18 日，巴尔斯科夫将军[③]向我们通报说，他收到了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

---

① 斯尔曾蒂奇，时任南斯拉夫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② 1948 年 3 月 9 日拉夫连季耶夫致电莫斯科通报说：斯尔曾蒂奇向商务代表列别杰夫声明，南政府有一个决定，禁止国家机构和机关向任何人提供任何经济情报。因此，尽管从前有一个协议，他也不能向列别杰夫提供有关的资料。该决定还责成国家安全机构对这件事情进行监督。斯尔曾蒂奇还说，基德里奇打算亲自同列别杰夫谈这件事。有必要提醒的是，南斯拉夫政府在去年的夏天就已做出了这个决定。当时，我就同卡德尔谈过，于是他便指示基德里奇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资料。在这个协议的基础上，列别杰夫从经济委员会处得到了一些有关经济问题的情报。显然，斯尔曾蒂奇的声明反映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对苏联态度的改变。关于这一通报，可参见 1948 年 3 月 27 日斯大林致铁托的信（文件 16）。

③ A.H. 巴尔斯科夫少将，时任驻南斯拉夫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

元帅[1]的一份电报，电报通知我们，苏联政府已决定立即撤回其全部军事顾问和教官[2]，理由是他们“处于不友好行为的包围之中”，这就是说，他们在南斯拉夫没有受到友好的待遇。

苏联政府如果愿意的话，当然可以随时撤回自己的军事专家，但是我们对苏联政府为做出这一决定所提出的理由感到震惊。根据这一指责，我们调查了我国基层的领导人对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的态度，深信撤走他们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在他们驻南斯拉夫的整个期间，对他们的态度不仅是友好的，而且确切地说，是兄弟般的和最殷勤的。在新南斯拉夫，对所有的苏联人一贯都是如此。因此，苏联政府没有把做出这一决定的真实原因告诉我们，这确实使我们感到惊讶，使我们不能理解，使我们十分痛心。

其次，1948 年 3 月 19 日，阿尔米亚尼诺夫代办拜会了我，并通报了一份电报的内容，即苏联政府还下令从南斯拉夫撤回全部文职专家。这一决定的理由也使我们感到费解和惊讶。基德里奇的助手斯尔曾蒂奇确实曾向贵国商务代表列别杰夫说过，根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项决定，他无权向任何人提供重要的经济情报，如果苏联人想得到这种情报的话，应当到更高一级领导机关，即南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去索取。同时，斯尔曾蒂奇对列别杰夫说，他可以向基德里奇主席索取他感兴趣的情报。你们的人早已被告知，苏联政府的官方代表可以直接从我国领导人那里获得一切必需的和重要的情报。

我方作出这一决定的根据是，过去我们各部的公务人员不管需要与否，都对任何人提供情报。这就意味着他们向各种各样的人泄露国家经济机密，而这些机密可能有时确实已落到我们共同的敌人的手里。

我们从未签署过任何如来电中所说的专门协定，规定我们的人不经过政府或中央的同意，就有权向苏联经济工作人员提供与其本职工作无关的经济情报。每当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同志向我本人索取必要的情报时，我都毫无保留地予以提供，我们其他主要领导人也是这样做的。如果苏联政府不赞同我们这一从国家观点出发的立场，我们将感到非常惊讶。

同时，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拒绝所谓对苏联驻南斯拉夫专家和代表“不

---

①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1895–1975），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武装力量部（即国防部）部长。

② 根据铁托的请求，第一批苏联军事教官于战时，即 1944 年秋天被派往南斯拉夫军队。苏南之间的这种合作形式一直持续到战后。苏联的顾问和教官被派往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部和各级参谋部，以及一系列军事机关和部门工作。

友好和不信任”之类的理由。迄今为止，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抱怨过这类事情，虽然他们每人都有机会向我本人诉说，而我从来没有拒绝过接见任何苏联人。我们所有主要领导人也都是这样。

由此可见，上述理由不是苏联政府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我们希望苏联政府坦诚相告这是怎么回事，并向我们指出一切在你们看来有碍我们两国之间良好关系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一事态的发展对两国都是有害的，而迟早一切有碍我们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东西都必须消除。

苏联政府正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获取情报，我们认为对待这种情报应当慎重，因为这种情报不一定都是客观的、准确的和出自善意提供的。

请再次接受我的敬意。

部长会议主席约·布·铁托

1948 年 3 月 20 日

文件 16

斯大林、莫洛托夫关于苏南关系诸问题致铁托的信

（1948 年 3 月 27 日）

致铁托同志并南斯拉夫共产党其他中央委员

你们 3 月 18 日和 20 日的回信均已收到。

我们认为你们的答复是不真实的，因而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

（一）关于加加里诺夫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了结，因为你们否认了对他的指控，尽管我们依然认为有过对加加里诺夫的诽谤性指控。

所谓克鲁季科夫同志讲的苏联政府曾拒绝在今年举行贸易谈判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克鲁季科夫同志断然否认强加于他的那种事情。

（二）关于撤回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的消息来源于武装力量部代表的反映和顾问们自己的报告。众所周知，我国的军事顾问是应南斯拉夫政府的迫切要求而派往南斯拉夫的，况且派往南斯拉夫的苏联军事顾问比南斯拉夫政府所要求的数量少得多，因此很明显，苏联政府无意强迫南斯拉夫接受自己的顾问。

但是，后来包括科切·波波维奇[①] 在内的南斯拉夫军方领导人认为，可以声明必

① 原文如此，应为科查·波波维奇。

须把苏联军事顾问的人数减少到60%。他们为此摆出了种种理由。有人认为，南斯拉夫花在苏联军事顾问身上的费用太高；有人认为，南斯拉夫军队根本不需要苏军的经验；有人声称，苏军的条令是刻板公式，陈规旧俗，对南斯拉夫军队没有价值；还有人毫不掩饰地暗示，苏联军事顾问白拿薪饷，因为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好处。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理解吉拉斯在一次南共中央会议上所发表的侮辱苏联军队的尽人皆知的言论了，说什么苏联军官在道德方面还不如英军军官。但是，众所周知，吉拉斯的这一反苏言论没有遭到南共中央其他成员的反对。

因此，南斯拉夫军方领导人不是与苏联政府友好地进行磋商和解决关于苏联军事顾问的问题，而是污辱苏联军事顾问，败坏苏联军队的声誉。

显然，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在苏联军事顾问周围造成不友好的气氛。

如果认为苏联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同意把自己的军事顾问留在南斯拉夫，那是可笑的。

既然南斯拉夫政府对这种败坏苏军声誉的行为没有采取措施进行抵制，它就应对业已形成的局面承担责任。

（三）导致我们撤回苏联文职专家的情报，主要来源于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拉夫连季耶夫的报告，还有专家们自己的报告。

你们的声明，即似乎斯尔曾蒂奇对商务代表列别杰夫说过，苏联专家如要索取经济情报的话，应向上级当局即南共中央和南斯拉夫政府提出要求，完全不符合事实。[①] 请看3月9日拉夫连季耶夫的报告：

"基德里奇在经济委员会中的助手斯尔曾蒂奇把一项禁止国家机关向任何人提供经济情报的政府决定通知商务代表列别杰夫。所以，不论过去有过什么许诺，他也不能向列别杰夫提供所需的有关资料。国家安全机构受命监督此事。斯尔曾蒂奇还说，基德里奇想亲自与列别杰夫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从拉夫连季耶夫的报告可以看出，斯尔曾蒂奇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从南斯拉夫中央或政府那里获得经济情报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在苏联专家以前直接获取

① 3月24日，莫洛托夫致电贝尔格莱德的拉夫连季耶夫，援引铁托3月20日信中关于对斯尔曾蒂奇向列别杰夫所作的声明的解释内容，指出："信中是这样说的，斯尔曾蒂奇似乎说过，苏联人应该向上级机关，即南共中央和政府索取需要的情报。"对此，莫洛托夫命令苏联大使再确认一下这一说法的准确性，因为有关斯尔曾蒂奇声明的情报是3月9日拉夫连季耶夫电告莫斯科的，其中没有类似的内容。拉夫连季耶夫在回信中坚持认为自己的报告是准确的，并说明贸易副代表瓦西里耶夫也出席了斯尔曾蒂奇同列别杰夫的谈话，他可以作为证人。拉夫连季耶夫还说："根据维辛斯基同志的指示，在与卡德尔正式协商后，列别杰夫开始得到了需要的一些情报，不过，拖延了很长时间，而且得到的也不是所有我们感兴趣的资料。"

必要的经济情报的一些经济机构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认为索取一切经济情报都必须向中央和政府交涉，那是可笑的。

其次，真实情况显然与你们在来信中所述的完全相反，从拉夫连季耶夫的报告看，苏联驻南斯拉夫的代表确实受到了南斯拉夫安全机构的控制和监视。

不妨指出，这种监视苏联代表的做法我们只有在资产阶级国家才会遇到，而且那也不是在所有的资产阶级国家。

同时应当指出，南斯拉夫安全机构不仅监视苏联政府的代表，而且还监视联共（布）驻共产党情报局的代表尤金同志。[①]

如果认为苏联政府会同意在这种条件下把自己的文职专家留在南斯拉夫，那是可笑的。

显然，对业已造成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也要由南斯拉夫政府承担。

这就是苏联政府不得不从南斯拉夫撤回其军事和文职专家的原因。

（四）你们在来信中还希望向你们通报引起苏联不满和导致苏南关系恶化的其他事实。这种事实的确存在，虽然它们与撤回文职和军事专家没有联系，但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向你们通报这些事实。

第一，我们知道，南斯拉夫领导同志中间流传着种种反苏言论，诸如："联共（布）正在蜕化变质"，"苏联盛行大国沙文主义"，"苏联正企图从经济上支配南斯拉夫"，"共产党情报局是联共（布）控制其他党的工具"，等等。这些反苏言论通常是以左的词藻掩盖起来的，即"社会主义在苏联已不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只有南斯拉夫才真正代表着"革命的社会主义"。[②]从吉拉斯、伏克曼诺维奇[③]、基德里奇和兰科维奇等令人怀疑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听到这些关于苏联的言论，当然让人觉得好笑。但问题在于，这些言论在南斯拉夫的许多高级领导人中久已流传，如今还在流传，这自然正在造成一种恶化联共（布）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反苏气氛。

我们当然承认，任何一个共产党，其中包括南斯拉夫共产党，有权批评联共（布），如同联共（布）也有权批评其他任何一个共产党一样。但马克思主义要求批评应该是公开的，真诚的，而不能是背地里的，诽谤性的，从而剥夺被批评者对批

① 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1899–1968），苏联哲学家，当时还兼任设在贝尔格莱德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主编。

② 这些言论出自拉夫连季耶夫的汇报。1948 年 3 月 1 日，南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审查关于 1948 年 2 月 10 日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三国莫斯科会晤情况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工作报告。拉夫连季耶夫得到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言的情报，并向莫斯科作了汇报。

③ 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 - 泰波，时任南斯拉夫人民军政治部主任。

评进行答辩的机会。然而，南斯拉夫活动家们的批评不是公开的和真诚的，而是背地里的和没有诚意的，同时还具有两面派性质，因为他们一面背地里以其“批评”来败坏联共（布）的声誉，一面却在公开场合伪善地颂扬它，把它说得天花乱坠。正因为如此，这种批评就变成了诽谤，变成了企图损害联共（布）声誉、丑化苏维埃制度的手段。

我们相信，如果南斯拉夫的党员群众知道这种反苏批评是异己的、怀有敌意的，他们一定会愤怒地驳斥它。我们认为，这就是南斯拉夫活动家们背着群众暗地里进行这些批评的原因。

这里不妨回忆一下，当托洛茨基打算向联共（布）宣战时，他也是从指责联共（布）蜕化变质、犯有狭隘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开始的。当然，他以左的关于世界革命的词藻掩盖了所有这一切。然而，众所周知，托洛茨基本人就是蜕化变质分子，而当他被揭露后，他便公开转到联共（布）和苏联不共戴天的敌人的营垒中去了。

我们认为，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足以发人深省。

第二，目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令我们感到不安。作为执政党，南斯拉夫共产党迄今尚未完全合法化，仍然处于半合法的状态，这使我们感到惊奇。党的机构的决定通常不在报刊上发表。党的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也从不公布。

在南共党内生活中看不到有充分的民主。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不是选举的，而是指派的。党内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值得注意的是，党中央主管干部的书记是国家安全部长。换句话说，党的干部实际上受国家安全部长的监督。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应该控制一个国家的所有国家机关，包括国家安全部在内，而在南斯拉夫恰恰相反，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在控制着党。这大概是南斯拉夫党员群众的独立自主性尚未达到应有程度的原因。

显然，我们不能认为这样一个共产党组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是布尔什维克组织。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看不到有阶级斗争政策的精神。资本主义成分正在农村中迅速增长，在城市中也很活跃，而党的领导并未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南斯拉夫共产党被资本主义成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种腐朽的机会主义理论搞得昏昏沉沉，而这个理论是从伯恩施坦、福尔马[①]和布哈林那里沿袭来的。

---

① 格奥尔格·福尔马（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主要领导力量，它有自己特定的纲领，不能混同于非党群众。在南斯拉夫则恰恰相反，人民阵线被认为是主要的实际领导力量，而且有人企图把党融入人民阵线。铁托同志在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说：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有没有什么不同于人民阵线纲领的另外的纲领呢？没有。共产党没有另外的纲领。人民阵线的纲领就是党的纲领。"

在南斯拉夫，这个关于党组织的奇怪理论似乎被认为是一种新理论。其实这里毫无新东西。早在40年前，俄国一部分孟什维克就提议把马克思主义政党融入非党工人群众组织，并以后者代替前者；而另一部分孟什维克则提议把马克思主义政党融入非党工农劳动群众组织，并以后者代替前者。众所周知，列宁当时认为这些孟什维克是用心险恶的机会主义者和党的取消派。

第三，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间谍韦莱比特还留在南斯拉夫外交部担任第一副部长。[①] 南斯拉夫的同志们都知道，韦莱比特是英国间谍。他们甚至还知道，苏联政府的代表也认为韦莱比特是间谍。尽管如此，韦莱比特依然是南斯拉夫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南斯拉夫政府也许正是想把韦莱比特作为英国的间谍加以利用。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政府认为，为了保证博得帝国主义大国的好感而把它们的间谍作为自己的工作人员，是完全容许的。为此目的，甚至可以同意把自己置于这些大国的控制之下。我们认为，这种政策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苏联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同南斯拉夫政府的通信往来置于英国间谍的监督之下。显然，由于韦莱比特依然留在南斯拉夫外交部领导层，苏联政府认为自己被置于困难的境地，不可能通过南斯拉夫外交部系统与南斯拉夫政府进行开诚布公的通信往来。

这就是引起苏联政府和联共（布）中央不满并导致苏南关系恶化的事实。

如上所述，这些事实与撤回军事和文职专家的问题没有联系，但它们是恶化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受联共（布）中央委托

维·莫洛托夫（签名） 约·斯大林（签名）

1948年3月27日于莫斯科[②]

① 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1907–？），1943年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派驻开罗的军事使团团长，后任最高统帅部驻伦敦军事使团团长。回国后历任外贸部副部长、外交部副部长。

② 这封引起苏南全面论战的信是由莫洛托夫的助手拉夫洛夫专程送到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随后，拉夫连季耶夫在阿尔米亚尼诺夫的陪同下来到了萨格勒布，将这封信交给了当时正在那里的铁托。

文件 17

南共中央关于中央全会决定给联共（布）中央的通报

（1948 年 4 月 13 日）

致联共（布）中央

本月 12 日和 13 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南共中央全会，除两人外全体到会，两人中一人（巴卡里奇）因病，即因正当理由缺席，另一人（赫布朗）正在接受审讯。共有 25 名中央委员出席。全会详细研究了联共（布）中央 3 月 27 日的来信以及写这封信的背景，除茹约维奇外，一致得出如下结论：

（一）全会对联共（布）与南共之间终于出现的种种分歧深表遗憾，因为这些分歧有可能使我们两党的共同事业受到严重损害。

（二）全会确认，南共工作中存在着错误和缺点，但并不是那种据此就可以做出联共（布）中央来信中所述那些结论的错误和缺点。

（三）全会确认，那些结论只有在情报不充足和不正确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出，而这首先是我国某些反党不良分子向苏联机构提供了虚假的、诽谤性的或带有偏见的情报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

（四）全会确认，对苏联机构提供那种情报负主要责任的是南共中央委员斯雷腾·茹约维奇和安德里亚·赫布朗。这个多次因错误而受到处分的反党集团企图用诽谤来掩盖其旨在破坏领导人与党之间集中统一的反党活动，说什么我党领导人发表反苏言论，而（他们）想显示自己是苏联的保卫者，并且是反对我们领导人和我们党的（保卫者），但我们党却以多年的工作证明自己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忠于和热爱联共（布）和苏联的。

（五）全会确认，茹约维奇－赫布朗集团反党活动的目的是破坏南共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团结，挑拨和削弱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最密切合作、相互帮助和兄弟般可靠的关系，因此这表明他们既敌视南斯拉夫，也敌视苏联。

根据这一切并鉴于其过去的反党活动，全会决定把茹约维奇开除出南共中央，并对他以及赫布朗在党内进行进一步审查。

（六）全会坚信，一切妨碍南共与联共（布）以及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继续发展并巩固兄弟般和同盟者关系的因素必将消除。

（七）全会责成中央政治局采取一切措施，以根除党内和人民阵线内所有可能破坏南共与联共（布）之间以及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兄弟般关系的现象。

全会赞成中央政治局为消灭国内资本主义残余而提出的措施。

全会赞成中央政治局为加快筹备应于今秋举行的南共代表大会而提出的措施。

（八）全会赞同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附上的信并希望和深信，南共中央与联共（布）中央代表之间将尽快进行必要的个人接触，这种接触尽可能在这里即在实际上可以核查所有事实的南斯拉夫进行，以彻底消除目前误会的一切根源。

文件 18

南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苏联公开苏南分歧致日丹诺夫的信

（1948 年 4 月 16 日）①

致联共（布）中央日丹诺夫同志

4 月 16 日，尤金同志向南共中央总书记铁托同志转交了日丹诺夫同志的信件，并附有今年 4 月 8 日匈牙利共产党中央的决议。从这些文件可以得出结论，联共（布）中央已将其 3 月 27 日致南共中央的信件转发给了其他党的领导机构。我们对联共（布）中央的这一举动感到非常惊讶，理由如下：

第一，联共（布）中央采取这样的举动，没有征得南共中央的同意，没有等待南共中央的答复，而且根本没有同南共中央一起对 3 月 27 日来信中所陈述的论据进行核实。

第二，兄弟共产党因而得到的通报是片面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南共中央的意见，所以南共中央受到如此广泛的批评，以致根本无法对这种批评的错误论据进行申辩。②

据此，南共中央政治局不能同意联共（布）中央的这种举动，认为这种举动无助于消除和澄清导致联共（布）中央与南共中央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

---

① 档案原件未注明发信日期，此处所标为起草该信的日期。

② 4 月 16 日接到匈牙利党的信件后，南共立即举行了政治局会议，一方面起草了这封给日丹诺夫的回信，一方面决定将南共中央对联共（布）中央 3 月 27 日信件的复函转发给共产党情报局各成员国，希望他们在做出判断之前听取双方的意见。然而，除了季米特洛夫私下对吉拉斯说“要坚持下去”外，各党都一律表示支持苏联党的意见，尽管或多或少有些勉强。当时，法共和意共对此保持沉默。

文件 19

拉夫连季耶夫与贝勃勒关于苏南关系恶化问题的谈话记录（摘录）

（1948 年 4 月 21 日）

秘密

摘自 A.И. 拉夫连季耶夫日记

发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瓦·佐林，归档。

今天贝勃勒[①]打电话给我说，他想见我，以个人的方式交换一下某些问题的意见。他表示希望来我这儿。……

（二）贝勃勒声明他没有受任何人委托，来我这儿是出于个人的意愿。他希望在私下和我谈一谈一些使他特别激动的问题。他指的是苏南关系问题。他不理解，是什么原因引起了我们两国关系的恶化。……

按贝勃勒的说法，南斯拉夫占有特别的地理位置，因此，他们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具有特殊的改革任务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南斯拉夫是苏联的一部分，那么南斯拉夫面临的这些特殊性和特别的困难就不成立了，南斯拉夫也就没有独立地与资本主义斗争的任务了。就因为现在的这种情况——南斯拉夫须独立地克服自己内部的困难和独立解决对外政策的问题，所以要求南斯拉夫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应有必不可少的效率和那种区别于苏联的政策。可能会出现双方利益不一致的问题。照贝勃勒的说法，因此，苏联方面有可能不满意南斯拉夫奉行的路线，因为没有在所有的对外政策问题上与苏联进行咨询协商。贝勃勒不止一次地重复，他不清楚导致我们两国关系现在这种状况的原因。

我回答，关于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的改变及他向我提出的那些问题，贝勃勒应该去找自己的领导解释。但我也说明，我个人不同意贝勃勒所说，南斯拉夫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它应该有另外的和特殊的对外政策。我说，按照各自的倾向，对外政策只能有两种思想体系——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体系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国家的思想体系。在实行对外政策时可能出现个别的问题，需要用不同的策略处理，但所有基本的对外政策问题无疑应该出于一个坚定的目的，那就是符合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利益。所以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之间在对外事务方面存在一致的立场是很重要

---

① 阿勒什·贝勃勒，时任南斯拉夫副外长。

的。我指的不是在一些小问题上进行协商，而是指在那些重要的政策问题上要有协商和一致的立场。有些问题，看上去只是地方上的问题，但它们可能引起严重的复杂的国际事端，是很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区的发展局势，它是与全世界的政治相联系的，任何不小心的一步都可能加深事情的复杂化，况且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想使欧洲这部分地区局势复杂化，以此在世界舆论和自己国家的舆论面前，为他们在此地区的帝国主义行径开脱。

贝勃勒承认一些事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地方性问题会给世界局势以重大影响。

贝勃勒接着说，以他的理解，看来苏联方面认为南斯拉夫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太尖锐了。在布拉格三国外交部长协商会议前，铁托元帅接见了南斯拉夫代表团，并指出他们在国际会议上提出的问题过于尖锐，所以铁托建议代表团发言再温和一些。

我回答，我不是讲这些与铁托元帅有关的事，也不是想用某种形式和通过其他渠道说出莫斯科方面的不满。相反，我清楚，南斯拉夫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比其他东欧代表团积极，总是与苏联代表团联系。因此可以认为，铁托在贝勃勒和西米奇去布拉格前对他们所谈的意见，并不是由于苏联对南斯拉夫代表团在前次国际会议上执行的路线表现出了什么不满引起的，而是铁托本人提出的。

（三）在谈话中贝勃勒通知我，由于把一些南斯拉夫军队集中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边界，并向阿尔巴尼亚派遣了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两三个星期前美国大使凯诺拜访了他。他以个人名义向贝勃勒说明：按他的推想，美国政府不会支持希腊政府在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边界采取任何调整军事力量的措施。然后过了五天，凯诺重新拜访了贝勃勒向他说明，他曾以自己名义向贝勃勒说明的事，现在可以看作是美国政府的正式声明。南斯拉夫外交部将此事通报了自己在所有重要国家的大使馆。贝勃勒推想，波波维奇大使一定将此事通报了苏联外交部。

我说，关于此事一点儿也不知道。

（四）关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关系，贝勃勒说，季米特洛夫从捷克斯洛伐克回来时在贝尔格莱德将停留一两天，讨论保南联盟问题。按贝勃勒的说法，科斯托夫[①]向驻索非亚的南斯拉夫大使齐齐默尔说，莫斯科表示支持在近期建立这种联盟。齐齐默尔为此回到贝尔格莱德，现在南斯拉夫政府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但贝勃

① 特赖乔·科斯托夫（1897–1949），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战时在国内领导抵抗运动，季米特洛夫回国前任保共总书记，1946 年 3 月起任政府副总理。1949 年作为铁托分子被处决。

勒想，在研究这个联盟问题时，将有许多经济方面的困难，因为保加利亚在这方面准备甚少。所以贝勃勒不排除，开始时提出的是政治联盟问题，而后将解决的还有经济联盟问题。

（五）临走时，贝勃勒又回到他所关心的南苏关系现状问题。因为改善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使的工作，贝勃勒希望波波维奇能够在这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回答说，苏联大使馆永远采取客观的立场评价南斯拉夫的情况，不可能有其他的态度。对于贝勃勒的意见，所谓需要改善我们国家之间关系的说法，我回答说，按我个人的意见，需要纠正南斯拉夫所犯下的错误，听取莫斯科对此提出的意见。贝勃勒提出，莫斯科采用了各种情报，可能有些情报不符合真实情况。我回答贝勃勒，莫斯科只采用客观和准确的情报。

我的印象是，贝勃勒是受委托而来的，以不清楚情况为掩饰，来查明大使馆如何解释苏南关系的恶化。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A. 拉夫连季耶夫

文件 20

莫洛托夫致拉夫连季耶夫转贝勃勒的电报（摘录）

（1948 年 4 月 23 日）

……南斯拉夫政府从它不与苏联协商即向美国人和英国人陈述其对的里雅斯特问题的立场时起，[①] 就违反了不久前签订的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相互协商的协定。[②] 因此，苏联政府认为自己不受上述协商协定的约束，不能把自己关于南斯拉夫与奥地利边界问题的观点通知南斯拉夫政府，而将就此问题在伦敦举行的四国政府代表会

① 1947 年 2 月根据法国方案通过的对意和约确定，的里雅斯特及其周围有争议的地区作为自由区分为两部分，分别由英美军队和南斯拉夫军队占领，并在联大安理会与南、意两国协商的基础上选派一名总督进行管理。由于长期协商没有结果，1948 年 3 月 20 日，美英法三国发表宣言，支持意大利对自由区的主权要求。3 月 22 日，南斯拉夫政府向美英法三国发出抗议照会，同时建议南意直接谈判解决自由区的问题。苏方的指责就是针对这一举动的。4 月 13 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认为西方的建议不能接受。的里雅斯特问题的最终解决是 1975 年 10 月通过南意双方签约完成的。

② 指 1948 年 2 月 11 日莫洛托夫强迫卡德尔签订的一份备忘录，文件规定，苏联和南斯拉夫应在关系到两国的重大国际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

议上陈述自己的立场。[①]

……同时还请通知南斯拉夫政府，波波维奇大使没有通知苏联政府，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几周前向南斯拉夫政府声明美国不会支持希腊政府用武力改变阿尔巴尼亚－希腊边界的措施……

文件 21

联共（布）中央关于南共问题致南共中央的信（节录）

（1948 年 5 月 4 日）

机密

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你们的答复及由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签署的关于 1948 年 4 月 13 日南共中央全会决议的通告均已收到。

很遗憾，这两个文件，特别是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签署的文件，与南斯拉夫人的前几个文件相比不仅没有任何进步，反而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使冲突更加尖锐。

该文件使用的语气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种语气只能被认为是太傲慢。文件中看不到有弄清真相、老实承认其错误和承认必须改正这些错误的愿望。南斯拉夫同志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批评，而是采取了庸俗化的态度，即把批评看作是对南共中央威信的侮辱，是对南斯拉夫领导人自尊心的伤害。

南斯拉夫领导人为了摆脱他们自己造成的困境，采用了一种“新”方法，即矢口否认自己的错误的方法，尽管这些错误是十分明显的。他们否认 1948 年 3 月 27 日联共（布）中央信中所叙述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和文件。看来，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不懂得，这种矢口否认事实和文件的幼稚做法决不能使人信服，而只能引人发笑。

…………

众所周知，苏南分歧问题已转达给九国共产党中央，他们有自己的情报局。不

① 1948 年 4 月 17 日，南斯拉夫副外长阿勒什·贝勃勒向拉夫连季耶夫通报说，南斯拉夫与奥地利在卡林西亚（克恩滕）地区存在着边界划分问题，南斯拉夫方面希望得到该地区一块居住着大量斯洛文居民的土地。上述建议将提交苏、美、英、法四国副外长例行会议解决。贝勃勒表示希望在会前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让其他共产党参与这件事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建议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上研究这个问题。

受联共（布）中央委托
维·莫洛托夫　约·斯大林
1948年5月4日于莫斯科

文件 22

铁托、卡德尔关于处理分歧问题的意见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

（1948年5月17日）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我们收到了你们1948年5月4日的来信。在此无需赘述这封来信对我们产生了何等恶劣的影响。它已经使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解释都无济于事，尽管我们的解释有许多事实作为根据，说明对我们的一切指责都是提供错误情报的结果。

我们并不回避对于原则问题提出的批评，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感觉受到如此不平等的待遇，因而我们不能同意现在由共产党情报局来处理这件事。九个党在我们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已经收到了你们的第一封信，并做出了表示他们各自立场的决议。[①] 你们这封来信的内容已经不是个别党的内部事务，而是超出了许可的范围，其后果是目前在有些国家，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不仅我们的党，而且我们的整个国家，都在遭受侮辱，我们的国会代表团在布拉格就感到受了侮辱。

所有这一切的后果，对我们国家来说是极其严重的。

我们想这样来处理这件事，即我们将在实践中证明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公正的，这就是说，我们将百折不挠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仍将忠于苏联，仍将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未来将会像过去一样表明，我们一定履行对你们做出的全部诺言。

受南共中央委托
约·布·铁托　爱·卡德尔
1948年5月17日于贝尔格莱德

① 这里说的九个党是指组成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九个成员。但实际上应是七个党。联共（布）中央1948年3月27日的信在南共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给了情报局除联共（布）和南共以外的七个党。

文件 23

苏斯洛夫关于召开情报局会议致铁托的信

（1948 年 5 月 18 日）

致铁托同志

亲爱的同志：

联共（布）中央建议 6 月上半月，大约 6 月 8—10 日，召开九国共产党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以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现状问题。

关于召开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联共（布）中央建议这次会议在乌克兰南部的一个州召开，联共（布）中央认为这对大多数共产党来说是合适的。一旦得到您的同意，联共（布）中央即确定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的具体地点并就此作进一步通知。

请尽可能地在最短时间内将您对我们关于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的议程、时间和地点建议的意见通知联共（布）中央。

此致

同志式的敬礼

联共（布）中央书记

米·苏斯洛夫

1948 年 5 月 18 日

文件 24

铁托关于南共不出席情报局会议致苏斯洛夫的信

（1948 年 5 月 20 日）

致联共（布）中央苏斯洛夫同志

亲爱的同志：

您的来信我于今年 5 月 19 日收到。这封信是莫舍托夫同志[1]交给我的。我们

① 莫舍托夫，时任联共（布）中央国际部副部长。

对邀请南共中央派代表出席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的观点，我们已在收到您来信的前两天通过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通知了联共（布）中央。

我们于5月20日在南共中央全会上讨论了您的来信。全会一致做出决定，由于致联共（布）中央的信里所指出的原因，我们不接受出席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的邀请。

此致

同志式的敬礼

受南共中央委托

铁托（签名）

文件 25

日丹诺夫等关于会议讨论程序问题致斯大林电

（1948年6月21日）

莫斯科

菲利波夫

今天，在情报局全体代表团会议上，宣读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的复函。宣读完南斯拉夫人的复函之后，马克西莫夫建议对于南斯拉夫人的这份复函不再单独进行讨论，也不再就这一复函做专门的决议，原因是：情报局会议程序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状况”问题，南斯拉夫人的这份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的复函就是一个实例，说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状况不良，而正是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才在此集会的。自然，在讨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状况问题时，全体代表都有机会表达自己对这份文件的态度。

会议一致同意我们代表团的意见。在讨论了组织情报局会议工作的问题之后，决定按照会议日程开始情报局的工作。

在下午3时情报局会议开幕。在德治同志做简短的开幕词之后，情报局批准了以下会议日程：

1.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状况。

2. 例行问题：

（1）关于情报局的所在地；

（2）关于情报局的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编辑部所在地；

（3）关于情报局的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编辑部成员；

（4）关于贝尔格莱德工会公约和巴尔干青年理事会（罗马尼亚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议）；

（5）一些共产党关于参加情报局的请求；

（6）关于情报局的章程；

（7）关于情报局的机构。

为了对各位代表的发言以及会议进行记录，成立了由尤金同志、巴拉诺夫同志和基辛涅夫斯基同志（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的秘书处。像在波兰召开的第一次情报局会议那样，决定使用俄文进行会议记录。

接着茹拉夫廖夫作了报告。在晚间的会议上，将讨论茹拉夫廖夫同志的报告。

今天上午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同志进行了会晤。与捷克人（斯兰斯基）和波兰人（贝尔曼、萨瓦茨基、斯彼哈尔斯基）的会谈没有什么新的重要的内容。捷克人和波兰人表示拥护联共（布）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

茹拉夫廖夫

马克西莫夫

索罗金

1948年6月21日[1]

---

① 这里删掉了电报草稿中的如下段落："对于情报局所在地设在何处的问题，罗马尼亚人坚持在布加勒斯特，而波兰人主张在华沙。拉科西认为，情报局所在地应该设在距西部较近的地方，他建议设在布达佩斯或者是布拉格。捷克人暂时还没有同我们谈论这个问题。稍晚些时候，当我们更加确认这个问题之后，再通报我们的意见并希望告知对于这个问题您的指示"。电报草稿中增加了下面一段话，但后来也删掉了："今天，贝尔曼以波兰代表团的名义建议将华沙作为情报局及其机关刊物的所在地"。

文件 26

日丹诺夫等关于波、匈、法、保代表团发言致斯大林电（节选）

（1948 年 6 月 21 日）

莫斯科

菲利波夫

在晚间的会议上开始讨论茹拉夫廖夫同志的报告。在讨论时发言的有：贝尔曼同志、拉科西同志、杜克洛同志和科斯托夫同志。他们所有的人声明，完全拥护茹拉夫廖夫同志在报告中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所做的评价和结论。全体一致认定，南斯拉夫人以其自身的行为已将自己置于情报局的队伍之外。下面我们简要转述一下代表们的发言内容。

…………

茹拉夫廖夫

马克西莫夫

索罗金

1948 年 6 月 21 日

文件 27

布加勒斯特会议通过的《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

（1948 年 6 月 23 日）

由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主义者）、罗马尼亚工人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波兰工人党、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组成的情报局，在讨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并确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代表已经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之后，一致赞同如下结论：

1. 情报局指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最近在内政、外交等主要问题上，执行了一种不正确的路线，一种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因此，情报局批准了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行动，即倡议揭露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不正确的方针政策，尤其是铁托、卡德尔、吉拉斯和兰科维奇的不正确

的方针政策。

2. 情报局确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执行着一种不友好的政策。在南斯拉夫执行了一种诬蔑苏联军事专家和诽谤苏联的可耻的政策。南斯拉夫对苏联的文职专家们设立了一种专门的机构，使他们处于南斯拉夫国家保安机关的监视之下，并不断地受到跟踪。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驻情报局的代表尤金同志和苏联驻南斯拉夫的一些官方代表，都受到了南斯拉夫国家保安机关的这种跟踪和监视。[①]

所有这些事实，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实证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采取了不是共产党人所应有的立场，开始把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混为一谈，并以对付资产阶级国家的同样态度来对付苏联。正是由于这种反苏的立场，从反革命分子托洛茨基的武器库中借来的所谓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蜕化"、苏联"蜕化"的诽谤宣传，才得以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散布。[②]

情报局斥责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这种反苏立场，认为这种立场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它只是适合于民族主义分子的立场。

3. 在对内政策上，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脱离了工人阶级的立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否认资本主义成分在他们国内的增长，从而否认了阶级斗争在农村中的加剧。这种否认是从机会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即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如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教导的那样，而是阶级斗争的熄灭，如像布哈林式的机会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后者曾鼓吹资本主义和平生长为社会主义的理论。

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农村中执行着一种不正确的政策，忽视了农村中的阶级分

① 在另一份决议草案文本中，代替"苏联驻南斯拉夫的一系列官方代表"这句话的是日丹诺夫手书添写的如下内容："南斯拉夫政府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对待苏联大使的态度方面持有敌对的立场，执行的是一条对其进行政治孤立的路线，对于苏联大使的态度，如同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员的态度"。

② 在另一份决议草案文本中，此处的内容如下："南斯拉夫领导人提出了无知的和敌对的观点，仿佛南斯拉夫不用以苏联为首的整个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就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对将南斯拉夫从德国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并站在世界整个进步的民主力量的前列的苏联，持有类似的敌意态度，这意味着，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首领们已经走上了背叛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统一的社会主义阵线的道路，走上了孕育着首先是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人民来说是严重后果的道路。多亏有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以及它所给予的支持，人民民主制度才得以取得胜利并得到巩固，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才得以发展。苏联是整个民主和反帝阵营的主要和领导力量，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堡垒，是和平和民主的最可靠的支柱。企图离间南斯拉夫与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南斯拉夫领导人破坏了南斯拉夫本身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给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造成了危害。任何企图削弱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统一阵线的尝试，都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

化，把个体农民看作是一个整体，而这就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反了列宁的著名论点——小生产的个体农民经济每日每时地、不断地、自发地、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仅如此，南斯拉夫农村中的政治情况，并没有令人沾沾自喜和引以自满的根据。在南斯拉夫，个体农民的经济还占着优势，土地还没有收归国有，土地私有的制度还存在着，土地还可以买卖，大量的土地还集中在富农的手里，并可以使用雇佣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阶级斗争熄灭和阶级矛盾缓和的精神来教育党，就一定会使党在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时解除自己的武装。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的问题上，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走上了民粹主义的富农党的道路，认为农民是“南斯拉夫国家的最稳固的基础”。列宁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革命到底的阶级……在全体人民争取彻底的民主变革的斗争中，在一切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中，必然是领导者”。

南斯拉夫领导人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论点。

就农民而言，农民中的大多数人，也就是说，贫农和中农，是可以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在这个联盟中，工人阶级起着领导的作用。

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些态度，无视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

不难看出，这种态度反映了适合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4. 情报局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修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是国家的主要的指导和领导力量，它有自己专门的政治纲领，并且不把它自己溶解在非党的群众之中。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和最重要的武器。然而，在南斯拉夫，认为国内的主要领导力量不是共产党，而是人民阵线。南斯拉夫领导人降低了共产党的作用，实际上把党溶解在非党的人民阵线之中，而这个人民阵线包含着极复杂的阶级成分（工人、个体农民、富农、商人、小企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包括某些资产阶级的政党在内。南斯拉夫领导人固执地拒绝承认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硬说南斯拉夫共产党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有自己专门的政治纲领，而应以人民阵线的政治纲领为满足。

在南斯拉夫，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只有人民阵线，而党及其组织并不用它自己的名义在人民面前公开出现，这一事实不仅降低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且

使党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党是负有通过公开的政治活动，通过公开宣传它的观点和纲领，以取得人民日益增长的信任并扩大自己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影响的使命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正重复着俄国孟什维克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的党溶解在非党的群众组织中。所有这一切，说明南斯拉夫共产党存在着取消派的倾向。

情报局深信：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这种政策，威胁着共产党本身的生存，并包含着最终使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蜕化的危险。

5. 情报局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在党内造成的官僚主义的统治，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是致命的危险。党内没有民主，没有选举，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与铁托和卡德尔的没有根据的保证相反，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都是指定的，而不是选举出来的。共产党实际上处于半合法的状态。党的会议或者是不举行，或者是秘密举行，这种情况只会破坏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这种组织形式，只能称之为宗派－官僚主义的组织。它导向取消党，使之不能成为一个积极的、独立活动的组织，并助长党内军事领导的方法，如同托洛茨基从前所主张的方法一样。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党员最基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党内对错误措施的最轻微的批评，都会受到野蛮的压制，这种情况是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

情报局认为：南共中央委员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同志因为敢于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反苏立场和赞成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友好，而被开除出党并遭到逮捕，这一事实是可耻的。

情报局认为：共产党内不能允许这种可耻的、完全是土耳其式的恐怖统治。南斯拉夫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利益，要求彻底结束这种统治。

6. 情报局认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所作的批评，和它们用这种方式给予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兄弟般的帮助，为南斯拉夫共产党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条件以迅速改正它所犯的错误。但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不但不诚恳地接受这些批评，采取布尔什维克式的改正错误的道路，反而由于害上了极端野心、骄横和自大的毛病，以挑战和敌视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批评。他们走上了一概否认自己的错误的反党道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一个政党对待自己的错误所应持的态度的学说，从而加重了他们的反党错误。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由于不能面对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兄弟党中央委员会的批评，而走上了公然欺骗他们自己的党和人民的道路，向

南斯拉夫共产党隐瞒了中央委员会因其不正确的政策所受到的批评，同时向党和人民隐瞒对茹约维奇同志和赫布朗同志采取野蛮措施的真正原因。

最近，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兄弟党批评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错误之后，南斯拉夫领导人仍然企图颁布若干新的左倾的法令。他们急匆匆地颁布了一个把小工业与贸易企业收归国有的法令，然而，实行这一法令的基础却完全没有准备好。由于如此匆忙，这一决议只会妨碍对南斯拉夫居民的商品供应。他们还以同样匆忙的方式，颁布了一个对农民征收粮食税的新法令，这个法令也是没有准备好的，因此，它只会使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脱节。最后，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不久以前，还大喊大叫地宣称他们对苏联的爱戴和忠诚，然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们正在执行着一种对苏联不友好的政策。

而这还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最近以完全自信的态度，宣布了一个在南斯拉夫消灭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铁托和卡德尔在 4 月 13 日给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提出的在国内肃清资本主义残余的措施。"

根据这个方针，卡德尔 4 月 25 日在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中发表演说时宣称："在我们的国家里，所有人剥削人制度的残余存在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在南斯拉夫现存的条件下，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关于消灭资本主义成分，从而消灭富农作为阶级的态度，只能是冒险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因为，只要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资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占优势的话，只要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的条件还未具备，只要劳动农民的大多数还未相信集体耕作方法的好处，这个任务就不可能完成。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经验证明，要消灭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剥削阶级——富农阶级，只有在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而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乃是农业集体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为了顺利地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从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党必须进行细致的准备工作，以限制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加强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使社会主义工业能够制造集体农业机构所需要的机器。在这个问题上的急躁冒进，只能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只有在周密准备和坚持实行这些措施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成分，过渡到最终消灭它们。

南斯拉夫领导人匆忙地或者是以一纸命令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切企图，意味着这种冒险行为早已注定是要归于失败的，意味着这种冒险行为只是夸张的、

空洞的和蛊惑人心的宣言。

情报局认为：南斯拉夫领导人力图用这些虚伪的和蛊惑人心的手段，来表明他们不但赞成阶级斗争，而且甚至走得更远，并超过了根据现实可能性在限制资本主义成分方面向南斯拉夫共产党提出的要求。

情报局认为：由于南斯拉夫领导机关这些左的法令和宣言都是蛊惑人心的，在目前条件下是不能实行的，因此，它们只能玷污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的旗帜。

这就是情报局为什么把这类冒险主义的手段，看作是卑鄙的手段和一种不能允许的政治赌博的原因。

由此可见，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些左的、蛊惑人心的措施和宣言，目的就在于掩盖他们拒绝承认错误和拒绝老老实实地改正错误的做法。

7.[①] 考虑到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并为了向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指出脱离这种状况的道路，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兄弟党的中央委员会曾经建议，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问题应当根据在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其他各国共产党的活动那样的正常的党的原则，在一次情报会议上来加以讨论。可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拒绝了各兄弟党关于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历次建议。

南斯拉夫领导人为了逃避兄弟党在情报局会议上的正当的批评，杜撰了他们似乎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的谎言。这种谎言没有一丝一毫是真实的。大家都知道，在情报局成立的时候，各国共产党是基于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原则进行工作的，即任何一个党可以向情报局提出报告，如同任何一个党有权批评其他的党一样。在九国共产党第一次会议上，南斯拉夫共产党曾经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权利。南斯拉夫共产党拒绝向情报局报告它的活动，拒绝听取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批评，实际上就意味着破坏了各国共产党间平等的原则，事实上等于要求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情报局中享有特权的地位。

8. 鉴于上述事实，情报局表示完全同意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曾于 1948 年 3 月至 5 月给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些信件中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评价，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犯错误的批评以及对这些错误所进行的政治分析。

情报局一致得出结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由于他们的违反马克思 – 列宁

① 此处删掉了决议草案最初文本中的部分内容。

主义的反党、反苏的观点，由于他们的整个态度和他们的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已使他们自己处于和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相对立的地位，走上了脱离反帝国主义的统一的社会主义阵线的道路，走上了背叛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事业的道路，采取了民族主义的立场。

情报局斥责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种反党的政策和态度。

情报局认为：鉴于上述一切，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使它本身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处于兄弟的共产党的大家庭之外，处于统一的共产主义阵线之外，从而处于情报局的队伍之外。

情报局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机关所犯的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下列无可置疑的事实：从前用伪装形式存在的民族主义分子，在过去五六个月中，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因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就背离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传统，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

南斯拉夫领导人大大地过高估计了南斯拉夫内部的民族力量和南斯拉夫的能力，认为他们不要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持，不要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持，不要苏联的支持，也可以保持南斯拉夫的独立，并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新南斯拉夫没有这些革命力量的支持也能生存下去。

南斯拉夫领导人不了解国际形势和帝国主义分子的讹诈与恐吓，认为他们可以用让步的办法来博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欢心。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同帝国主义国家就南斯拉夫的独立问题进行商议，并逐步地使南斯拉夫人民倒向这些国家，也就是说倒向于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心照不宣地从某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论点出发的，即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对南斯拉夫独立的危险，比苏联对南斯拉夫独立的危险还要小些”。

南斯拉夫领导人显然是不了解，或者可能是装作不了解：这种民族主义的路线只能致使南斯拉夫蜕化成为一个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丧失它的独立，并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情报局并不怀疑，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存在着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传统的、忠于统一的社会主义阵线的足够健康的力量。

这些健康力量的任务在于迫使他们目前的领导人公开地、诚实地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脱离民族主义并回到国际主义方面来，并且用一切办法来巩固统一的反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阵线。如果南斯拉夫共产党目前的领导人证明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

这些健康的任务就是要撤换他们，并选举出一个新的国际主义政党的领导机构。

情报局不怀疑南斯拉夫共产党将会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

文件 28

南共中央关于情报局决议的声明（摘录）

（1948 年 6 月 29 日）

从内容来看，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情况”的决议显然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它是以联共（布）中央发给南共中央的一些信件为基础的。在今年 3 月 27 日的第一封信中，联共（布）中央对南共中央提出了谴责，这封信同时也发给了共产党情报局的其他成员党，但却未将此事通知南共中央。另外，联共（布）中央转来了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支持联共（布）中央的看法的一封信。匈共中央的这封信也发给了其他各党。南共中央还收到了除法国和意大利之外的情报局其他成员党写来的类似的信件。南共中央指出，上述各党在未曾听到南共中央的意见，也没有听取其反驳的情况下，就接受了联共（布）中央的观点，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根据。在联共（布）中央的这封信和其他各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之后，以及在南共中央 4 月 13 日给联共（布）中央的回信发出之后，南共中央分别于 5 月 4 日和 22 日收到了联共（布）中央的信件。这些信件都或多或少地坚持了第一封信中的路线。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情况”的决议，基本上是联共（布）中央这些信件的复制品。

在这些信件中，联共（布）中央指控南共中央，并要求它承认自己的错误，例如：第一，南共领导人对苏联口头上说的好听，而背地里却诋毁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第二，南斯拉夫领导人一直诽谤苏联军队，苏联专家受到敌视，苏联公民和尤金同志受到公安机关特务的跟踪；第三，党的干部受国家安全部长的控制，党内没有民主和批评，而是以军事领导方法进行统治；第四，南斯拉夫政府希望通过间谍讨好帝国主义，并将自己置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之下；第五，党把自己溶解于人民阵线之中，因而不能再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它已渗透了伯恩斯坦主义、布哈林主义和福尔马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因素和平消亡而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第六，某一帝国主义强国的大使在南斯拉夫俨然以主人自居，南斯拉夫人民的刽子

手奈迪奇的亲友们轻而易举地在南斯拉夫政府和党的机关里谋得舒适的职位；第七，南斯拉夫领导人把苏联的对外政策与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混为一谈；第八，南共领导成员在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问题上已经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第九，德国伞兵摧毁了南斯拉夫“游击队”司令部，结果人民解放运动发生了严重危机，此后苏军前来进行帮助，解放了南斯拉夫，为南共掌权创造了条件；第十，南共过分吹嘘自己战争时期的成就，虽然它的功劳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共产党比起来并不突出。除上述谴责外，还有情报局决议中所提出的谴责，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南共中央政治局向情报局提交的一份声明（该声明将作为附件发出）中已经表明，只有把事情的真实情况弄清楚，只有把谎言和联共（布）中央方面或情报局其他成员国党中央委员会方面在原则问题上的真正不满区分开来，南共中央才能同意讨论联共（布）中央出于诽谤、杜撰以及对南斯拉夫情况的无知而做出的指控。

对于情报局决议的发表，南共中央声明如下：

（1）决议中包含的批评是以不确切的和无根据的断言为依据的，它企图破坏南共在国内外的威望，企图在国内群众中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引起混乱，并削弱南共党内的团结和党的领导作用。因此，南共中央在 4 月 13 日的信中建议联共（布）中央到现场核对它的说法，但却遭到了联共（布）中央的拒绝，这是令人吃惊的。

（2）决议在未举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坚持说南共领导对苏联执行了一项敌对政策。关于苏联军事专家在南斯拉夫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和苏联公民受到国家公安机关特务的监视的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直到他们被撤回，没有一个苏联代表曾提请南斯拉夫代表注意这件事。苏联公民，尤其是尤金同志在南斯拉夫曾受到监视的说法，完全是虚假的。这项声明，特别是与尤金同志有关的声明，不过是为了让南共及其领导在其他共产党的心目中威信扫地而已。

与此相反，正如 4 月 13 日致联共（布）中央的信中所说的，根据南共党员给自己党组织写的大量报告及我国其他公民的陈述，从解放起直到最近，苏联情报机关一直设法要吸收他们，则确有其事。南共中央过去和现在都认为，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一个共产党人执政的、正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国家，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这种作法将导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民道德败坏，并将削弱和破坏我国政府和我党的领导。南共中央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关系只能以信任和真诚为基础，并且为了坚持这个原则，南斯拉夫国家机关甚至从未梦想过要跟踪住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公民，或对他们实行任何控制。

（3）决议批评了南共关于处理阶级斗争的政策，特别是南共在农村的政策。关于这一点，还援引了人们熟知的列宁的论述。南共中央指出：在南共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的政策中，它正是以上述的和类似的列宁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作指导的，这一点，决议的作者们——如果他们不辞劳苦的话——或许在我党已发表的文件和文章中读到过，或许了解关于这一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因此，决议中提出的指控以及联共（布）中央对我们的指控，实际上不过是徒劳罢了；客观上，它们不可避免地有助于鼓励和支持城乡反动的资本主义因素，并在居民中引起混乱，似乎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客观上的困难，特别是在供应方面的困难，都应归咎于南共中央及其政策。南共中央认为，作为一种方法来说，根据引自各个斗争时期的只言片语，或是根据个别的、孤立的和歪曲了的事实，来评价其活动，这是不能允许的。南共中央认为，在估价南共的政策时，像估价其他党的政策一样，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党的实践——党在使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斗争中是取得了胜利，还是没有取得胜利，整个资本主义因素是削弱了还是增强了，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是减弱了还是加强了。

（4）南共中央不能不以极大的愤慨否认以下的断言：什么南共领导阶层正滑入富农党的道路，滑入对党的取消主义歧途；什么党内没有民主，党内滋长着军事领导的方法；什么党员最基本的权利在党内受到践踏，对党内的不正当行为的最温和的批评也会招来最剧烈的报复，等等。难道身经百战、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们能够容忍党内这种为男子汉和共产党员所不齿的事态的存在吗？断言我们党内不准批评以及类似的说法，对我们党的每一个党员都是极大的侮辱，它贬低我党昔日英勇的、光荣的业绩和我党当前为重建并发展南斯拉夫国家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南共中央强调指出，不能因为一些党组织尚未进行选举，就断言我们党内没有民主。这些都是战争时期和我党经历过的战后的急剧发展所遗留的问题。当时，在其他共产党内，而且在苏联党内，也存在这些问题。

至于我们党正消失在人民阵线之中，以及领导阶层正走上富农党的道路的说法，它在客观上对于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在联合组织（即人民阵线）中实现劳动群众的大团结起到了破坏作用，并使党脱离劳动群众。这一断言的根源，除以上所述之外，在于对南斯拉夫党和人民阵线之间的关系的误解，在于对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的实质以及工人阶级在该阵线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方式缺乏了解。在这个问题上，这一断言的出发点也不是事实，而是一些凭空捏造的说法，继之以引用列宁著作中的著名论述进行论战，而对于列宁著作中的那些论述，南共负责人中谁也没有提出过争

论。客观事实，以及在整个战争期间和战后不仅由共产党人而且由阵线非党人士发表的许多宣言表明：一、共产党在阵线中是领导力量；二、共产党并非消失在阵线之中，恰恰相反，党正在以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的精神教育阵线的广大成员，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提高他们；三、南斯拉夫人民阵线实际上正在为社会主义而战斗，如果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像决议中所说有资产阶级政党、富农、商人、小业主等等——在人民阵线中起重要作用的话，或者，如果人民阵线是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联合组织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协议形式的话，那么，为社会主义而战斗必然是不可能的；四、党并未接受人民阵线的纲领，而人民阵线的基本方向和纲领却来自共产党，由于党在人民阵线中的领导作用，事情自然是如此的。

因此，南共中央强调指出，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使人民阵线的群众队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进一步接近，把党的政治活动与人民阵线的活动以及人民阵线的全部行动联系起来。

最后，南共中央指出，本党大多数的中央委员都不是指派的，而是选举的。联共（布）中央在计算时，并未把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单独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们计算在内。因此，联共（布）中央在它的一封信中提到的南共中央全体会议的 22 名委员应加上这 7 名政治局委员。南共中央在战争中失去了 10 名委员，因而主要从南共中央候补委员中指定 7 名填补空缺，南共中央为此而受到责备，这是很奇怪的。

南共中央否认关于南共处于非法状态的断言，认为这个断言是荒谬的和不真实的，并且认为这也是对南共在特定条件下和特定时间内的工作方式缺乏了解的证明。南共的工作方式产生于我党长期革命实践的具体条件；这些工作方式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并且是党取得群众信任的一重要因素。

（5）南共中央否认如下不着边际的谴责：什么土耳其式的统治方式在南共党内盛行；什么南斯拉夫领导人“向全党隐瞒对中央委员会错误政策的批评”；“向党和人民隐瞒对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同志采取残暴措施的真正理由”。在联共（布）中央公布自己的信件之前，南共中央是不能公布这些信件的。然而，南共现有全部机构都知道联共（布）中央信件的内容，并且所有党员都得到了关于赫布朗与茹约维奇案件的通报。

情报局成员党的代表们，不向南共中央询问详细情况，竟然将赫布朗和茹约维奇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对此，南共中央不能不表示惊奇。南共中央很想知道为什么像茹约维奇之类的人竟受到保护，例如，根据共产国际决定，茹约维奇在 1937

年同高尔基奇一起被开除出南共；又如，赫布朗曾在乌斯塔什警察面前有过背叛行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欺骗了党，这些人在南共党内进行分裂活动，并干着毁灭党和破坏南斯拉夫发展和工业化进度的勾当。这难道不是对分裂活动、对叛徒、对瓦解南共的活动进行鼓励吗？因此，我中央委员会作为附件公布了有关赫布朗和茹约维奇的材料。

（6）南共中央否认如下的荒谬断言：什么近来南斯拉夫领导人为了匆忙把小型工业和小商店国有化，为了蛊惑人心，采取了一些措施。事实上这些措施在联共（布）中央向南共中央提出指责的六个月之前就准备好了，这是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和发展的结果。

从卡德尔同志演讲中断章取义摘出的引语，只是在一般意义的说法，而他演讲的全文，事实上提出了党在目前阶段逐步摈除资本主义因素的路线。

联系上述这些事实，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近来在情报局的刊物、苏联的报纸以及其他一些党的报纸上刊登的新闻中，一直没有关于南斯拉夫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例如进一步削弱资本主义因素的措施，实现计划取得的成就，工人阶级和团结在人民阵线里的劳动人民在代表大会前进行的群众性竞赛，等等。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对有关上述成就的事实保持缄默的人，无法掩盖其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南共中央经济路线的批评纯属是专横的和完全没有根据的。

（7）南共中央声明，南共领导人中没有任何人认为在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独立的斗争中不需要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帮助。只有那些完全脱离实际的人才会有这类的主张。因此，南共中央必须强调指出，扩大这种帮助与合作不仅依靠南共本身，而且依靠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南共中央认为，这种帮助必须与南斯拉夫的内外政策联系起来，但决不能与南共所不能接受的那种毫无根据的、不符合事实的指责联系在一起。

关于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准备向帝国主义做出让步，并在有关南斯拉夫的问题上与他们做交易的断言，完全是捏造的，是对新南斯拉夫最恶毒的诽谤。

然而，南共中央必须强调指出，在一些人民民主国家里，党和国家机关搞了一连串的无缘无故的行动，这种行动对南斯拉夫人民、对他们的国家、对国家的代表人物是一种侮辱，这种行动将削弱上述的合作，恶化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南共中央认为，它不能保证对于未来的类似行动保持缄默。

（8）南共中央认为，南共中央决不会由于拒绝讨论它实际上未曾犯过的错误，

就损害了共产主义阵线的团结。这个阵线的团结不是以承认捏造或虚构的错误和诽谤为基础，而是以一个党的政策实际上是否符合国际主义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的。不过，人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情报局已经背离了作为它自己的基础的各项原则，这些原则为每个党提供了根据自己的愿望做出决定的权利。然而，情报局不仅强迫南共领导人承认他们不曾犯过的错误，而且号召南共党员在党内造反，破坏党的团结。南共中央永远不能同意在凭空捏造和缺乏相互信任的非同志式的态度的基础上讨论它的政策。这样的基础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而且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南共中央认为，在讨论中它没有平等的地位，因此它决不能接受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讨论。再者，联系到上述种种情况，南共中央坚决拒绝关于南共已滑到民族主义立场上的指控。从南共的全部内外政策来看，特别是从南共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以及事实求是地解决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方式来看，证明南共的实际情况与对它指控的情况恰恰相反。

上述不公正的指责，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使南斯拉夫全体人员以及他们无私的和英勇的斗争，都蒙受了历史上最大的冤屈。

南共中央清楚地知道，联共（布）中央对南共中央指责，将被敌人的宣传机关用来诽谤苏联、南斯拉夫及其他民主主义国家。但是，南共中央宣布：它对这一切现象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它不曾有过引起这些诽谤的任何行动。

南共中央号召全体党员紧密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路线和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同时号召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聚集在人民阵线之中，为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这就是用行动充分证明上述指责不公正的唯一途径和唯一方法。

文件 29

南共中央关于召开南共五大致联共（布）中央的信

（1948 年 7 月 1 日）

致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定于 7 月 21 日开幕。代表大会要开若干天。请你们派贵党代表与会，并请不晚于 7 月 15 日告知我们能否期待你们的代表团出

席和贵党代表是谁。[①]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8年7月1日

文件 30

苏联政府关于废除苏南友好条约的照会（摘录）

（1949年9月28日）

今年9月24日在布达佩斯结束了对国家罪犯和间谍拉伊克[②]及其同伙（他们也是南斯拉夫政府的特务）的审判，现已查明，长期以来南斯拉夫政府在虚伪地宣称对苏友好的伪装下，一直执行着极端敌视苏联的政策，进行着颠覆苏联的活动。

布达佩斯的审判还揭露出，南斯拉夫政府领导人不仅是根据自己的意图，而且也是根据外国帝国主义集团所直接下达的任务，一直进行并仍在进行着反苏的敌对活动和颠覆活动。

审判会所揭露的事实，进一步说明南斯拉夫现政府完全是外国帝国主义集团的附庸，已经沦为这些集团侵略政策的工具，这必将导致、而且已经导致南斯拉夫共和国丧失其独立自主。

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南斯拉夫现政府已经粗暴地践踏并彻底地撕毁了1945年4月11日缔结的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

根据上述理由，苏联政府声明，从现在起苏联不再承担上述条约规定的一切义务。

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委托，外交部副部长　A. 葛罗米柯

---

① 这封信是1948年6月29日发给南共中央驻联共（布）中央的代表 П. 别洛维奇的，委托他转交联共（布）中央。但是，联共（布）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没有派代表参加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因为在情报局的6月会议上，根据联共（布）的倡议，通过了一项建议：劝告所有的党同南共断绝任何关系。7月3日，别洛维奇从莫斯科致电贝尔格莱德："今天我被召唤到中央，莫舍托夫通知我，鉴于已经出现的情况，从今天起停止我的工作。……明天我必须搬出办公室。"

② 拉伊克·拉斯洛（1909–1949），时任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副总书记，并先后出任政府内务部长和外交部长。1949年5月30日被捕，9月22日以间谍和铁托分子代理人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文件 31

南斯拉夫关于苏联敌对活动提交联合国的控诉（摘录）

（1951 年 11 月 9 日）

……为了达到侵犯南斯拉夫的主权，威胁它的领土完整及民族独立的目的，三年多以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一直在直接地或通过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政府，进行煽动，组织反对南斯拉夫的活动，并对它施加挑衅性的压力。这些敌对行动表现在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同时他们破坏了两国之间基本的传统的关系，以致现有的外交关系名存实亡。显然，这种活动正在造成一种危及国际和平的局势。

（2）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尽了最大努力避免两国关系的恶化并竭力克制自己。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不顾极其严重的攻击依然局限于采取通常的及直接的外交步骤，但不幸的是这些步骤都没有成功。这些敌对行动实际上等于一整套的挑衅性压力，而且这种压力还在有计划地加强，只是在这一事实真相大白时，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辩论维护和平问题的过程中，对这种形势才开始加以注意。在所有这一切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时，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了自己的“白皮书”。没有一个被指控的政府曾试图否认或反驳“白皮书”中所讲的事实，但是，所有这些政府反而从各个方面继续加强这种挑衅性压力。

（3）因此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正式提请联合国大会注意目前和平受到严重威胁的局势；苏联政府及其唆使下的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政府已经造成、并且正在蓄意恶化这种局势。

…………

（5）苏联与上述六国政府一起，组织了并全面实行了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封锁。上述的一些国家甚至已经中断了与南斯拉夫的所有邮政和铁路交通，从而不仅违背了他们与南斯拉夫之间的条约，而且违背了国际惯例。

（6）三年多以来，苏联政府与上述六国政府一起，一直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发动粗暴的煽动性的运动，其范围之广泛、形式之多样，在国际关系中是空前的。这个宣传的直接意图，在于制造战争的变态心理。这种宣传旨在煽动上述各国

人民对南斯拉夫的仇恨，在南斯拉夫人民中间引起焦虑、激动和不安。为了扩大正在广播和报刊上进行的宣传效果，苏联和其他六国的军政最高代表不仅在其公开和正式的演说中侮辱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而且直接鼓动南斯拉夫人民反抗并推翻他们的合法政府。

（7）为了同一个目的，他们在组织对南斯拉夫的侦察、颠覆和恐怖活动。他们建立了特别中心，训练恐怖活动的小组。为了进行牵制和破坏活动，削弱南斯拉夫的防御能力，这些恐怖小组在政府机关的直接帮助下正从保加利亚、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派往南斯拉夫。

（8）为了同一目的，南斯拉夫少数民族人民正在大规模地从他们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居住的地方被迁往别地。这不仅是灭绝人性的行为，而且也违反了停战协定及和平条约，根据这些协定和条约，各有关国家和政府保证尊重人权，禁止种族歧视。

（9）在战争期间，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作为希特勒的同盟国，曾占领南斯拉夫的部分地区。现在保加利亚、匈牙利两国政府违背和平条约的规定，正在强迫出生于这些地区的南斯拉夫公民接受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国籍。

（10）上述政府从贝尔格莱德撤走大使和领事，违背国际法和已经建立的国际惯例，对南斯拉夫外交人员肆意进行歧视：毫无道理地退回外交照会，并且不予答复，滥用外交通信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进行诽谤和侮辱性的攻击；上述政府不仅使人民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甚至最微小的争论，而且不利于维持正常的外交关系。

（11）苏联和其他六国政府单方面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缔结的46项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方面的协定和条约。

（12）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政府悍然违反和平条约的军事条款，增加了武装部队的人数，增加军备数量，并且提高其质量。在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交界的边境地区，一直在进行示威性的部队调动并举行军事演习。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苏联军队的人数及其部署，使这些炫耀性的挑衅行为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并且显然鼓励了这些行动，因为这种挑衅无论在数量上和剧烈程度上都有增无减，以致许多南斯拉夫边防战士和公民，在和上述国家交界的边境线发生的事件中被打死或打伤。不仅事件的数量，而且事件所进行的方式，都证明了加剧现有紧张局势的意图。

（13）所有这些，以及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

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政府的类似行动，破坏了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普遍接受的国家关系的准则。

（14）为了和平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努力，以及外交部长爱德华·卡德尔先生 1950 年 9 月 25 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南斯拉夫政府与每个邻国缔结永久和平、互不侵犯协定的建议，都未能取得成就。相反，应对这种事态负责的各国政府仍在不断恶化这种关系，以致在 1951 年 10 月联合国大会的前夕，他们甚至仍然拒绝接受有关这些重大事件的备忘录，在这些事件中，南斯拉夫公民在南斯拉夫的国土上被上述国家的特务杀害。

（15）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消除充满危险的国际形势以利于国际和平，用尽了所有的正式外交手段，同时它牢记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条，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荣幸地要求联合国大会将如下条款："苏联政府、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政府反对南斯拉夫的敌对活动"，列入大会的议事日程，以便大会加以讨论，并提出它认为适当的劝告。

文件 32

铁托在南共六大指责苏联帝国主义的发言（摘录）

（1952 年 11 月 3 日）

苏联帝国主义者因为他们丢掉了南斯拉夫的自然财富这样一块肥肉而恼怒不已，苏联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卖身投靠西方。……在马林科夫的报告[①]——欣喜若狂的征服者们的一篇名副其实的杰作——里，他称我们为反苏的美国代理人。……但是，这只狼披上了羊皮也是枉费心机的，因为它决骗不了任何人。我们太熟悉他的声音了。他一直唱着他热爱和平的老调，不过是为了欺骗人民，掩盖他那货真价实的帝国主义面目，并以此哄骗世人安然入睡。但是苏联领导人灵魂过于污浊，劣迹异常显著，以致任何人也不会相信他们了。……

在德黑兰会议[②]之前，我们一向很信任他们，但是他们渐渐地彻底破坏了我们

① 指马林科夫 1952 年 10 月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指 1943 年 11 月在德黑兰召开的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会议研究了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并讨论了分割德国、波兰疆界以及巴尔干等战后安排问题。

对他们的信任，所以当他们利用我们的信任以达到他们不正当的目的时，我们才认识了他们，认识了他们的真面目，认识了他们的罪恶目的，认识了他们的虚伪和残酷。……对所有那些相信苏联大公无私、相信它是小国的保护者的人来说，这是第一次精神上的打击，是第一次对苏联和苏联政府政策的正确性发生怀疑的强烈感情。从德黑兰会议到今天，苏联已向全世界暴露了它全部的帝国主义大国的淫威。今天，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尽管苏联大要廉价宣传的骗局（例如它宣称为和平而斗争等等），但整个苏联的国际政策使苏联成为目前国际紧张局势的最重要的制造者。

难道不是它把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等曾经是独立的东部国家变成欧洲中心纯粹的殖民地了吗？至于早在战前奴役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事，就更不用说了。……

斯大林在德黑兰同他过去一直攻击现在仍然攻击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起，把南斯拉夫平分成利益范围。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完全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走上了沙皇俄国的道路，即大俄罗斯国家利益的道路，亦即用帝国主义方法以促进他们国家利益的道路，同时力图用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来掩盖这一点。

1948 年我们和苏联之间发生的冲突并不是偶然的。……当我们清楚地看到苏联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外交政策上也正在抛弃社会主义原则，公开走上帝国主义扩张主义道路时，这种冲突就发生了。……

就苏联而言，这种非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可以在苏联的现实中，在那个国家的整个国内结构中——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结构中找到这些原因。在国内的发展方面，苏联很早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转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史无前例的官僚制度了。……

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正确地估计了苏联对我国的攻击，虽然当时这种攻击的原因尚不清楚。……那次代表大会之后立即发现，苏共领导人在我党的队伍中有一些代理人，……他们已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其中一些人奉命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攻击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但是代表大会的代表一致谴责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件，以及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给这些叛徒们浇了冷水，因而他们不敢在大会上进行分裂活动。这是苏联领导人继赫布朗和茹约维奇事件之后，在分裂我党和我国人民团结的活动中的一次新的和巨大的失败。第五次代表大会一致批准中央委员会对斯大林、莫洛托夫信件的复信，以及关于我党不参加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的决定。但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个争论的决议中，表达了我们希望并愿意尽一切努力改善我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并且

以友好的方式解决争端。

第五次代表大会采取这种立场是有几个原因的。首先，我党的普通党员——尤其是一般人民群众——对冲突的全部背景一无所知。第二，当时的形势——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就是说，不仅是我国广大工人群众，而且是许多党员的认识程度问题，因为多年来我党一直在它的党员中培养对苏联的信任和热爱，把苏联作为一个真正的在困难时期能够依赖的伙伴。所以，当所有这些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时，当我们这些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已经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苏联想让我国做些什么以及总的说来它的政策想要干些什么的时候，许多党员和人民群众仍然是一无所知的。我们发现，很难相信苏联竟然会像后来实践证明的那样，对我们抱着如此不光彩的企图。

对苏联的幻想慢慢地破灭了，但苏联共产党情报局在我国人民最感自豪的每一件事情上对我们的诽谤和污蔑，却加快了这个幻想的破灭进程。苏联通过经济封锁对我国施加的压力，通过边境挑衅，杀害我边防战士，进行军事威胁，扣留在两国间发生争论之前派往苏联学习的青少年使其不能与父母团聚以及其他许多针对我国的敌对行动，加快了我们对苏联的幻想的破灭进程。这些事件使南斯拉夫每个正直的人都看清楚了苏联的本质。

在我国边境上的挑衅逐年迅速增加。同时苏联特务在 1949 年进行了 936 起挑衅，在 1951 年挑衅次数上升到 1517 起，而今年的前 10 个月已达 1530 起，致使到目前为止我边防战士及公民 40 人在这些事件中死亡。所有这一切，加上他们散发的大量诽谤性宣传材料，已经暴露出他们对我们国家抱着敌对的意图，却并非像他们最初宣传的那样，仅是反对我们党的领导人。

虽然苏联和其他东部国家对我党和我国人民的攻击自始就是异常激烈的，而且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加强这种攻击，但它并没有像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以及共产党情报局所希望的那样使我们党的队伍发生动摇。

节选自沈志华:《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文件号重编

关于1949年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

1949年6月26日至8月14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秘密访问。访苏期间，中共中央代表团与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在苏联各地、各部门进行参观学习。这是在中国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的背景下，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之间一次非常重要的接触，其结果加深了双方的理解和信任，对于中苏同盟关系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本组文件收集了有关这次中苏领导人会谈的六件俄国档案。

据我们所知，关于这次访问，还有一些目前尚未公布的重要档案文献，如7月11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列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中共提出的各项问题的文件；7月27日斯大林与刘少奇、高岗关于中国革命评价谈话的文件；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贷款协定的文件；8月13日刘少奇、王稼祥、刘亚楼与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关于帮助中国组建空军问题会谈的文件，等等。不过，从下列文件中仍然可以看出中苏两党领导人在中苏结成同盟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方针。

（本组文件由闻一、丁明翻译，沈志华编注）

文件 01

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纪要

（1949年6月27日）

绝密

会议于6月27日23时至24时进行。

参加会议人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同志；刘少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王稼祥（中共中央委员），卡尔斯基（即师哲，翻译）和伊·弗·科瓦廖夫①。

在与代表团成员握手和互致问候之后，斯大林要他们转达对毛泽东身体健康的问候。

刘少奇同志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关心，并递交了毛泽东给他的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对苏联给予中国的巨大帮助，向斯大林表示感谢，并请斯大林接待代表团。

在此之后，斯大林转入讨论代表团提出的问题。②

（一）关于贷款。斯大林说，苏共中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贷款。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注意到，两党之间类似这样的协议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3亿美元贷款按照1%的年利率，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平均每年6000万美元，为期5年。

中国将在贷款完全生效后的10年之内清偿贷款。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以他个人的名义表示，对于这样的贷款，1%的年利率少了，应当增加。

斯大林对此向代表团解释说，苏联向西方民主国家提供贷款的年利率为2%，而提供给中国的贷款减少了一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中国的情况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在西方民主国家那里没有战争，经济也比较稳固；而中国还在进行战争，经济持续恶化。因此，对中国应当按照更优惠的条件提供大量援助。

然后，斯大林笑着说，当然，如果你们坚持高一些的年利率，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我们可以接受。

关于<u>签订贷款协议</u>问题，斯大林说，有两个方案。第一，由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代表签订协议；第二，授权苏联政府和现已建立的中国东北政府签订协议。等到

① 科瓦廖夫（1901–1993），苏联铁道部副部长，1948–1949年任驻华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

② 以下纪要是经斯大林审阅过的，并按照他的指示，由科瓦廖夫进行了补充和修改。问题的序号是斯大林加的，正文中的着重线也是斯大林划的。

今后建立了全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再通过苏中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来签订协议。[①]

（二）关于专家。斯大林说，我们将提供专家。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但我们应当谈妥关于专家的报酬。我们认为，如果你们是按照粮食向你们的专家提供报酬的话，对苏联专家也可照此办理。但是应当按照你们的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给苏联专家。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我国的专家享有高工资，因此，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

斯大林说，如果发现我国专家中的个别人有不良行为，请你们通知我们。正像人们所讲的，家中难免有丑陋之人，在好人当中也可能会发现坏人。

不良行为将会败坏苏联国家的荣誉。因此，我们对此将进行警告、教育。必要的话，将进行惩罚。

我们不容许苏联专家对待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

在回答斯大林的这些话时，刘少奇说，在中国有一些与帝国主义活动没有联系的外国专家，他们得到的报酬大大高于中国专家。斯大林对此回答说，在我们苏联国家中，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己的看法和制度。我们想按照我们自己的看法和制度办。

（三）关于派遣专家去上海。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挑选了15名专家，可以按照你们的要求，在任何时候派过去。请你们研究并通知我们。但是，一般来讲，你们应当注意到，在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有许多你们自己的专家和具有高度技能的工人，他们能够提供的帮助，会大于而不是小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因此你们必须吸引他们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四）斯大林同志说，我们还准备帮助你们清除上海的水雷。既可以派专家，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也可以提供扫雷艇。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比如，卖给东北政府几艘扫雷艇。然后在大连、旅顺或者符拉迪沃斯托克教会中国海员如何清除水雷。斯大林接着笑着说，东北政府可以把它们再“卖给”中央政府。

（五）关于新疆。斯大林同志说，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

① 根据中国方面的有关材料，7月11日，中苏双方商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米高扬、科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参加。7月30日，刘少奇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了贷款协定（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18–219页）。

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以使穆斯林、包括印度的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在新疆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和棉花，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

汉族在新疆所占的人口比例现在没有超过5%。占领新疆以后，应当把这一比例提高到30%。通过迁移汉族人的方式，全面开发这一广阔而富饶的地区，并加强对中国边境的防卫。

总之，为了巩固中国的国防，应当让汉族住进所有的边境地区。斯大林同志说，你们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①]的力量。马步芳的部队主要是骑兵，在有大炮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将其摧毁。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

（六）关于舰队。斯大林同志说，中国没有自己的舰队。然后又补充道，你们好像已经从国民党那里缴获了一些舰只？

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舰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舰队。例如，现在我们就可以打捞那些军用和商用的沉船，并帮助把它们修理好。

至于你们请求帮助巩固青岛的海防，我们可以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但要在建立全中国的政府以后，以拜访的形式去。

（七）刘少奇同志感谢斯大林同志给予的巨大帮助。这些帮助体现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并感谢向中国提供的异常优惠的条件，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他强调，中共中央已经拟定了一个条例，并将分送给党的各级组织，以便给苏联专家创造一个使他们任何人都不会抱怨的工作条件。

（八）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也给苏联专家拟定了一个类似的条例，使他们不致得罪中国专家。

（九）在回答中国同志关于建立莫斯科和北平之间的空中航线的请求时，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就可以着手组建这条航线。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可以向你们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②]你们想要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或者是俄罗斯生产的歼击机都行。这样你们就可以培养自己的飞行人员了。

（十）斯大林同志同意代表团提出的这一请求，即在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他们关

① 马步芳（1903–1975），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② 档案原件显示，斯大林在这里划了一个问号，并划掉了“最”字。

于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报告，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看法。并同意过三四天，以便代表团做好准备。[①]

（十一）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准备在国家机构、工业和你们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全面帮助你们。但为此目的，应当称你们是来自东北的贸易代表团，以便你们能够公开进行访问。

（十二）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做是适宜的，我们将在报纸上发表一条消息，报道以高岗同志为首的贸易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样你们就有可能性广泛地进行参观，包括参观各种游艺娱乐企业。

中国同志请求，等他们请示毛泽东后再对此做出回答。

文件 02

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

（1949 年 7 月 4 日）

联共（布）中央、斯大林同志：

我们谨向你们提出下列报告。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刘少奇

1949 年 7 月 4 日

一、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将取得完全的胜利。

载至 1949 年 5 月底，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的中国富庶地区已有 290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30%（因新疆、青海、西藏的面积很大），人口 2.75 亿[②]，占全国总人口的 57%，县城以上的城市，包括最大的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在内，有 1043 个，占全国 2000 个县以上城市的 51%。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年来的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 559 万人，[③] 国民党军

① 7 月 2 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次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以书面方式向斯大林通报国内情况、提出问题和征询意见（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220–221 页）。

② 文中着重线为斯大林阅读报告时所划，下同。

③ 根据中国的有关材料，此处应为 550 万人。

队包括其后方机关在内，现在只剩下150万人左右。其中有些战斗力的只有20万人左右，而人民解放军，据最后统计，则已发展到390万人，其中四个野战军240万人，其余为各军区地方部队及总部直属兵团和机关学校。有空军7500人，海军7700人。（1／有飞行员吗？有水兵吗？）[①]

人民解放军在今年夏秋两季可占领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可占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基本上结束了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的有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其中西藏问题只能用政治方式而不能用战争方式解决。台湾、海南岛和新疆，要等待明年才能占领。台湾因有部分国民党军队做内应，可能提早占领。我们完全赞成尽可能早地占领新疆，而占领新疆的最大困难，是如何肃清和保证向新疆前进的道路，以及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由甘肃到新疆需经过漫长的没有粮食和饮水的沙漠地带），如果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占领新疆的时间，将可以大为提前。

除了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在政治上也已经取得了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已经陷入完全的孤立。所有中国的民主党派都站在我们一方面，人民群众轰轰烈烈地起来，欢迎人民解放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我们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毫无疑问了。但由于我军的行动受到交通条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因而要取得完全的胜利，还需要一些时间。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直接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我们从来就有充分的估计，联共（布）方面关于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指示，更加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完全同意这些指示。我们没有松懈对这种可能性的警惕。但依照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似乎没有帝国主义者派遣上百万军队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况且，这也只能推迟中国革命胜利的时间，而不能消灭和阻止中国革命，同时还将使帝国主义陷入极大的困境。但帝国主义派遣一二十万军队占领中国三四个海港，或作一种扰乱性的武装袭击，仍然是可能的。我们对此已做了准备。因为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海岸没有设防，帝国主义的这种武装袭击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困难和损失。但我们的军事力量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这将激励全国人民及军队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并驱逐这些进行干涉的军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帝国主义有可能不敢来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我们应当注意不给帝国主义以进行武装干涉的借口。与此同时，迅速肃清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使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更加困难。

① 括弧中的话及序号为斯大林阅读报告时所加，下同。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与人民民主力量，特别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利用了这些条件。在中国革命中，有成功地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乡村中长期进行武装斗争，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在城市中进行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以配合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内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可能是很有用的。

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

中国革命战争已基本胜利，很快就会完全胜利。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管理和建设这个国家。

我们决定在今年8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正在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和召集的，而是由中国所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共23个组织共同筹备和召集的。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①

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34人，其中党员43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的只有12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委会中另外还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有委员21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

筹委会已决定将来参加新的政协会议的党派14个，代表142人。地区代表102人，军队代表60人，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代表206人，总共45个组织，510个代表。代表中党员将占多数。

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为群众所熟悉的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适当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性的组织，并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协会议。

政协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并决定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2／各省政府是否也要成立？）

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成分尚未决定。在新的政府中除军事委员会外，在内阁之

①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下，将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法委员会（管理公安、内务、司法等），并设立各部。在各部中，准备设立铁道、农业、林业、商业、冶金、纺织、燃料、交通、邮电等部。中央政府准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周恩来同志为内阁总理，（3 ／这是事实上的总统吗？）刘少奇和任弼时不参加政府。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我们的理解是：

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它是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实行专政的。（4 ／什么是“官僚资本”）

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本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与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这就是这个专政的组成成分。

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需解释的。（对！）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 1905—1907 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共同点，但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势力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5 ／对！）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我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以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正如斯大林同志 1926 年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的演说中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相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对！）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与内部斗争。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

所谓内部矛盾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与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强，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

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或者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成为或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对！）今年2月安得列耶夫同志[1]与毛泽东同志谈话时，曾同意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拉拢的政策，后来，联共（布）中央也指示我们必须吸引民族资产阶级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是完全同意这些指示的。

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加强。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签订取消罢工的集体合同），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2]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民族资本完全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要由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可能需要10年到15年。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实现中国的统一，这是中国的一个伟大进步，这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实现的。但是由于中国的落后，交通不便，过去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与封建势力的割据，中国统一的经济体系尚未形成，所以目前还不能不给地方政府以较大的自治权，以便发挥地方的积极性。（7／将要成立省级地方政府吗？）[3]在目前，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制，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和有害的。（对！）

我们以上的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绝大多数已来到北平。中国共有十多个民主党派，他们都是一些进行政治活动的小团体，成员总数不到3万人，其中民主同盟有2万人，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比较有影响。他们都不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进行活动。他们的组织松散，内部很不团结。例如所有各党派都无法提出自己的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因为他们内部有争吵。他们的代表名单，都必须由共产党发表意见才

① 安得列耶夫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阿·伊·米高扬于1949年1–2月秘密访问西柏坡时使用的化名。

② 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③ 注：缺少序号6，原文如此。

能提出。但各民主党派都有几个领导人物，这些人物因为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政治活动，在人民中是有些影响的，他们的组织就靠这些领导人物来维持。在每一个党派中都有左、中、右三种人，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及帝国主义走狗，都极力想钻进这些民主党派中，争取他们的合法地位，我们为此已向这些党派提出了严重警告。所有各党派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但有少数人在不久以前仍与帝国主义分子有些联系，直到最近才断绝了这种联系。在土地改革这一点上，则有一部分人是勉强地和共产党一致的。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有少数人还提出了一些民族主义的意见。

所有各民主党派，在公开的政治场合中，都能接受共产党提出的一般纲领，他们都公开地宣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除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外，中国还没有最后形成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8 ／有没有买办集团？ ）

在中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参加政协会议的那些人民团体将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团体，有的已拥有广大的会员，并且都在迅速地发展会员。他们在过去的反对美蒋的斗争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后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他们都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或者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除全国总工会早已成立外，最近还召开了妇女、学生、青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因中国青年过去已有很多组织，为了统一这些组织，还成立了全国及各地的青年联合会，暂时作为统一青年运动的组织。

国民党的工会、妇女团体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失败后，已处于非法地位，并迅速瓦解，其领导人早已逃跑或停止活动了，其中的进步人士，则在国民党失败以前就靠近我们了。由朱学范所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是有一些群众的，但已与全国总工会合并了。

安得列耶夫同志今年 2 月在中国提出要注意组织工人、职工和青年、妇女的工作。我们同意这些意见。现已在所有城市展开了这些工作。但由于这些工作过去长期间断，目前还需要重新训练这些工作的干部（现在每个团体都有几百个到几千个学生的干部训练学校），所以这些工作暂时还无法取得很快进展。我们希望能有几个有经验的苏联同志来中国帮助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文化教育工作者及科学工作者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即将在北平召集，并将成立他们的全国组织。他们是能接受共产党领导的。

三、关于外交问题

联共（布）方面最近关于外交及对外通商借款等问题给我们的指示，我们完全同意。

帝国主义全力帮助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失败以后，现在又以下面的方法继续反对中国革命。

继续援助国民党及其他可能的力量抵抗中国革命；

用一切方法钻进革命阵营的内部来分化和破坏中国革命；

用一切方法挑拨中国革命与苏联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

用许多方法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接近，企图拉拢中共与帝国主义国家接近。

对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阴谋，我们是看得清楚的，并且有经验绝不会让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关于这些，我们已在各民主党派中提出警告，并号召人民提高警惕性。

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论是在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中国革命均要彻底地加以摧毁。这是已写入我们二中全会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现在我们的军队所到之处，帝国主义在军事上、政治上的控制权，已经随着国民党的覆灭而被摧毁，其在经济上、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大大削弱。但是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和文化组织依然存在，他们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采用什么步骤和方法进行处理，是值得考虑的。

今后我们的外交活动，我们认为应根据以下几项原则进行：

（1）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

（2）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

（3）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9 ／对。）①

（4）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

我们没有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情况的最新资料。据日本在1936年的调查：英、美、法、德、意、比六国在华投资总额为18.28亿美元。其中英国占10亿多，美国占2.2亿，德国和意大利占2.1亿多。铁路借款和政治借款占5亿多，各国在

① 斯大林在这三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中国所设银行的金融投资4.5亿多，经营进出口的贸易投资3.8亿多，经营工矿及其他工业部门的投资3.6亿多。但在日本失败以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华投资均被没收。（10／被谁没收了？）英、法、比在华投资受到一些损失，美国增加投资亦不多。现在各国在华的企业是：银行保险、出进口贸易、航行外洋的轮船及码头仓库。此外，有英国占有一半资本的开滦煤矿（年产400万吨）、上海和天津的英国烟厂及上海的美国电力公司及其他若干市政企业，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其他企业均不重要。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工业与矿业，已经没有很重要的地位。目前，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企业，除在若干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外，一般还是让其继续活动。（11／什么样的限制？）但有些帝国主义者的流动资金已经抽逃，或采取消极的观望态度。在将来什么时机和采取什么方法解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问题，是没收还是采取其他方式，我们还没有决定。目前，我们正忙于军事和其他工作，但应该做处理这个问题的某些准备。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有自己的宣传机关和文化机构。据以前的调查材料，除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外，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就有31所大学和专业学校，32个教会学校，29个图书馆，26个文化团体，324所中学，2364所小学，3729个教会，93个宗教团体，147所医院，53个慈善机构。对外国原有的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及新闻记者，中共中央已决定停止他们的活动和出版，各地均已执行。但在上海，因为帝国主义掌握了上海的若干经济命脉，中央批准了上海同志的提议，暂缓实行此项决定，但以后仍准备加以执行。[①] 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办下去。但不许再设新的，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对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活动，另一方面，进行一些反宗教的宣传，对教会和教堂的土地经教民同意予以没收和分配。（12／对。）[②] 其他外国机关团体的土地亦予以没收和分配。

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都没有加以承认。只当作侨民对待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使人民感觉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共是不怕帝国主义的，并使我们免去了许多麻烦，使各民主党派不敢与帝国主义的外交人员接触，甚至普通人亦不敢接触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外交人员利用各种场合请求并设法与我们保持联系，企图取得我们的正式承认。我们现在实行的对外国人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敢实行的。但这样做，各国侨民感到有诸多不便，许多人请求出

①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②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境，同时，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不方便。

各国在中国已解放的地区约有侨民 12 万人，其中上海有 65000 多人，东北有 54000 人，在东北的外侨，主要是苏联人，其次是日本人。

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就会发生与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承认我们，或提出若干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取何种政策？［13 ／区别对待。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美国的经济危机迫使它不得不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为此要利用中国的商人。］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我们当然是不能答应的，但我们是否应采取积极的办法，以便保证取得这些国家的承认，使我们能够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占有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要再等一等，不急于得到这些国家的承认，（14 ／是的！最好不急。）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事情？（对！）在中国新政府成立后，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是否能尽快承认我们，即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无视我们的政策。（15 ／对。）

如果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中国新政府，我们就准备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我们希望苏联能够率先承认我们。

对于国民党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议，我们准备分别处理，其原则就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进行修改后加以承认。（对。）①

在各国承认新中国后，我们准备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涉及日本的各种国际组织。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做了一些解释。（16 ／对！）一些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在经过这些解释后，各民主党派便与中共联合签署并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

在以上各种外交问题上，我们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好。）②

---

①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双着重线。

②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四、关于苏中关系问题

苏联和中国之间牢固的民族友谊，对于两国和全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特别对于中国的独立和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共中央是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为增进和巩固这种民族友谊而不懈地努力。《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今后，新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需要加以处理，其处理方式大概有以下三种：

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

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和内容上有所增减。

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

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17／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运走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从东北运走的日本资产只是一部分，远不是全部。）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18／对。）关于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做胜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以此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以上这些说法，不知是否正确？关于与苏联通邮、通电、通车、通航等问题，我们希望迅速办理，并愿由苏中两国合办一个航空公司。这些事情，应当如何进行？（19／我们来帮助进行。）[①]

关于与东欧各民主国家建立关系及通商问题，应当如何办理？（通过与他们的直接谈判。）

---

①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除苏联派专家来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苏联教授到中国来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和学习，除此之外，派一些大学生去苏联学习。（20 ／好。）

关于联共（布）与中共的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21 ／不！）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不！）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理解。（22 ／对！）

毛泽东同志希望访问莫斯科，但他现在已不可能秘密地去莫斯科，只有等候苏中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地进行访问。他到莫斯科的时机和方式，希望予以考虑。（23 ／对。在 1949 年底，建立外交关系以后。）

以上所提各项问题，希望给以指示。

关于苏联给中国的 3 亿美元的贷款，我们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各种条件，并感谢苏联对于中国的帮助。（24 ／还有白银呢？）[①]

希望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对中共的工作和政策，能够经常地不客气地给予指示和批评。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刘少奇

1949 年 7 月 4 日

① 斯大林指的是在贷款协定中所包括的用于制造中国硬币的白银。

文件 03

刘少奇关于访苏安排致斯大林的信

（1949 年 7 月 6 日）

绝密，译自中文

联共（布）中央

约·维·斯大林同志

（一）我们在报告中已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请求给予详尽的指示。有关贷款和专家的问题，我们已经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当我们启程来苏联时，毛泽东同志要我们请求斯大林同志在对国际形势、新战争的危险性和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的相互关系的评价与分析的问题上给予指示，它们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评价国际局势的指导性材料。[①]

（二）我们希望利用在莫斯科的短暂停留来了解苏联，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想了解下述问题。

（1）苏联的国家结构，包括下述问题：

各级政府机构的结构

政府活动的各个部门

中央政府和地方权力机构的相互关系

政府管理基层机构的结构

党、政府和群众组织间的相互关系

武装部队、人民法院、安全机构、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

文化和教育机构的结构

外交部的结构和外交斗争

（2）经济政策及在苏联的管理，包括下述问题：

工业、农业和贸易发展的结合

国家预算、地方预算、工厂的预算，学校、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财务计划

国家企业、地方企业、各个工厂、教学机构的副业和合作社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

① 斯大林在这两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银行的组织和作用

合作社的组织和作用

海关和外贸部的组织和作用

税制和税务机构的结构

运输业的机构

（3）苏联的文化和教育，包括：

各级学校组织和体制

学校和生产部门间的联系

大学生的招生和大学生的物质保证

中学的课程选题

文化和艺术领域中的其他工作

科研机构

（4）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结构，包括下述问题：

党组织的形式

党的工作范围

党的教育的组织

党委会的体制

党的干部的管理

工会组织的形式

青年组织的形式

我们要求苏联的负责同志就这些问题和我们进行交谈。我们想请下述机构的负责同志来和我们交谈：[①]

部长会议

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

教育部和高级文化机构

外交部

国家计划委员会

银行

合作社

①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国内贸易部

外贸部

财政部

党中央组织部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全苏共青团中央

1—2 位工厂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基层委员会主席

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员会

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

莫斯科市苏维埃

此外，我们还想访问 1—2 个工厂、1—2 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及 1—2 所学校。

（三）我们想请苏联政府建立一所专门的学校，它类似于过去的中国劳动大学，来为新中国培养建设和管理国家与企业所必需的干部。一开始，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可达 1000 名。在这个学校中可设置下列各系：[①] 工业、贸易、银行业务、法学和教育等。这个学校中的学习可分为为期一年的短期训练班学制，两年的普通学制和三四年的正常学制。这就有可能极其迅速地培养干部，派现在在中国担任各种职务的工作人员去学习，而且由于将通过翻译来进行讲课，所以可以避免因语言不通而产生的困难。目前中国学生在苏联各个中等学校的学习保持不变。

此外，我们还想把各类负责干部派往苏联了解情况，为期 3—4 个月。[②] 他们一方面可以了解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一方面可以听课和交谈。这一措施将是使我们的干部提高管理国家和经济方面的知识的工作形式之一。

再次，我们希望苏联派各个科目的教师到中国来工作，帮助我们在中国培养管理国务活动各部门所需要的干部。

（四）关于中苏间的通讯问题。我们想具体谈谈和具体解决有关建立苏中间的邮政、电报联系，[③] 苏中间的海上交通，空中联系，开辟自苏联经哈尔滨和沈阳至远东、自沈阳至北平、自北平经乌兰巴托至苏联的航线，组织中苏航空公司，帮助中国建设飞机修理厂和培训航空军事干部的问题。

---

①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②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③ 文中的着重线是斯大林阅读文件时划的。下同。

（五）我们想使有关苏联帮助我们培训海军舰队干部、援助我们扫雷艇和舰船以打捞沉没的船只和创建海岸防御体系的问题具体化。

（六）关于苏联帮助我们解放新疆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已发来电报，其中同意尽快占领新疆并建议我们具体地解决提供苏联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我们想获得有关新疆局势的材料和具体解决空军援助的问题。①

（七）涉及东北的一些问题：

（1）关于贸易问题。今年冬天东北可以向苏联运去 80 万至 100 万吨粮食来交换机器设备。

（2）关于在远东和东北确定统一的货币，为了促进远东和东北的经济关系，减少我们的外汇负担，最好还是恢复远东的工业。

（3）关于开放远东的港口以便向香港和日本输出煤炭和盐等。②

如果上海和天津被封锁，我们能否利用大连港进出口货物？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允许美国和英国的商船进出远东？

（4）关于利用鸭绿江水电站电力的问题，东北要求上述电站应将一半的电力输送给东北。为建设这一电站中国投资了 7500 万日元，而朝鲜为 5000 万日元。东北请求苏联在解决这一问题时给予协助。

（八）关于中苏文化联系。中苏文化联系是我们两国人民紧密接近的重要工作。我们想和苏联的负责同志谈一谈有关通讯社、电影、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有关相互派遣工农和学者参观团，有关在中国培养掌握俄语的干部，有关翻译政治、科学和文学作品，有关在中国建立俄语图书馆，有关开办书店，有关在苏联和新民主国家里出版的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发行。③

请您就这些问题给予指示或指派专门人员讨论这些问题。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刘少奇（签名）

1949 年 7 月 6 日

---

① 斯大林在以上三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② 斯大林在以上三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③ 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文件 04

毛泽东给刘少奇并转交斯大林的电报

（1949 年 7 月 25 日）

约·维·斯大林同志：

我们收到了毛泽东同志 7 月 25 日的电报，他建议我们将这份电报转交给您。现附这份电报如下，请您过目并给予指示。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刘少奇

1949 年 7 月 25 日

电报全文：[①]

“（一）我们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中国学校，并同意系的划分和要讲授的课程。我们正好也需要向苏联学习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原理、各工作部门的体制，所以创建这样的学校是极为必需的。对这件事需要投入精力和一些费用，但是应当谈妥，这些费用要由中国来支付。

（二）我们同意派一些同志到苏联去参观，以便在那里看一看和进行学习，并获取经验。参观可以现在就开始进行。这一工作的具体计划等你回来后再进行。

（三）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②] 目前，胡宗南[③] 部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其残部 70000 人已退至陕西的南部。我军已经占领了宝鸡和凤翔。本月 26 日我们由 10 个军组成的军队将开始进攻平凉、镇原、陇县，与马步芳和马鸿逵[④] 指挥的 10 多万人的 6 个军作战。如果这些行动取得重大胜利，我军将转入短期休整，随后就进攻兰州、西宁、甘州[⑤]、凉州[⑥]、肃州[⑦]。因

---

① 根据中国的有关材料，毛泽东这封电报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贷款协定的。电报说：借款协定，你们表示原则上同意，具体文字待译好后再谈的态度是对的。我们亦正在研究协定的文字，明天或后天即有电报给你们（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219 页）。

② 邓力群当时是随同刘少奇访苏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政治秘书，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邓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于 1949 年 8 月 14 日由莫斯科到达新疆伊宁。

③ 胡宗南（1896–1862），在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47 年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④ 马鸿逵（1892–1970），在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1947 年自行组织宁夏兵团并兼任总指挥，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

⑤ 今张掖。

⑥ 今武威。

⑦ 今嘉峪关。

此，这些据点将在今年秋天被我们占领。如果是这样，我军就有可能在今冬占领乌鲁木齐。8月中旬，即在完成平凉地区的军事行动后可以开始和彭德怀、张宗逊和赵寿山[①]计划这件事。据彭德怀同志的通报，他们极感汽车的不足，他们询问能否在苏联购买用于调运部队的1000—2000辆汽车。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等待从苏联购买汽车并将他们运至甘肃省，然后我军再向新疆推进，这就至少要把我军的军事行动推迟至明春或明夏。我已经问过彭德怀我军有无可能在今冬步行进入新疆，然后乘苏联提供的汽车穿越伊犁、伊宁地区。我尚未得到答复。一有回音，当即奉告。

（四）我们同意派苏联摄影师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将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一起工作。如果这事已经议决，那就需要加快进行。建议这件事在最近的1—2个月内办好。他们应该先到达北平，在这里待1—2个月，然后上前线。这样的话，从今年10月起他们就可以开始自己的工作了。这将使他们能够摄制有关占领广州、南宁、昆明、重庆、兰州和乌鲁木齐的军事行动的影片。否则，他们就来不及摄制攻打广州和兰州的军事行动的影片。攻占广州的行动计划在今年10月，攻占南宁的行动在11—12月，重庆和贵阳在12月，兰州在10月，而攻占昆明和乌鲁木齐在明年的1月或2月。如果联共（布）中央认为有必要，可派3—4个摄影师小组到我们这里来。每个摄影师小组可指派1—2名有较高的政治和文化素养的记者或作家随行。他们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一起行动，这样他们就可以了解我们部队的生活和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摄影师小组可每个野战军派一组（我们有4个野战军）。先把他们送至北平，在这里集中，然后责成科瓦廖夫同志和我们的一位同志（中共中央委员）给他们作报告，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在前线工作。

第三野战军将只在两个地方，即在福建省和台湾开展军事行动。福建省的军事行动将于今年10月结束，而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要在我们建立了空军部队后才能进行，这也许要在明年的下半年才有可能。然而，摄影师小组可以和这支部队一起工作，拍摄该部队的生活、部队和居民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前的摄影师小组的准备工作双方都进行得不充分，所以事情进展得不好。如果这次我们做好全面的准备工作，我想，事情是可以办好的。

（五）在上海，自封锁之日起，严重的困难日益增加。但是，为了粉碎这种封锁，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它的。我们希望你和斯大林同志就

①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和赵寿山均任副司令员。

这一问题交换意见，苏联能否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即在 6 个月至 1 年的期限内，在莫斯科为我们培养 1000 名飞行员和 300 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 100—200 架歼击机、40—80 架轰炸机，这些飞机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军进攻台湾期间，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土除西藏外都将被我们占领。

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帝运动有可能大踏步向前，在美国和英国也有可能会爆发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利用苏联的援助（即除了我们请求苏联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和卖给我们飞机，也许还不得不请求苏联给我们派苏联空军和海军的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来攻占台湾，这样会不会给美苏关系带来损害？

请你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这一切，以便他来斟酌我们的计划，是否可以将它们付诸实施？如果这些计划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打算现在就派学员去苏联。关于培训飞行员的具体计划正在制订。容后奉告。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后，你就可以回国了。

请将上述一切转告斯大林同志。

毛泽东

1949 年 7 月 25 日

文件 05

维辛斯基与刘少奇关于外交问题的会谈纪要

（1949 年 7 月 30 日）

摘自安·扬·维辛斯基的日记 秘密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关于会谈的请求，于 16 时接见了他。在互致问候和一般性的简短谈话后，刘向我提出 4 个问题要求加以阐述：

（一）关于外交部的组织结构、工作形式和工作方法，关于培养、利用和配置干部。

（二）关于在其他国家中的全权代表机构和领事馆的组织、状况以及工作内容。

（三）外交舞台上斗争的基本原则和这一领域中最主要的经验。

（四）我们对新中国中央政府在外交工作方面的建议。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指出，苏联外交部的建制和美国国务院、英国外交部或法国外交部略有不同。苏联外交部的主要特点是：它的结构的基础是包括相应国家在

内的各政治业务司。此外，尚有一些职能局以及辅助机构。我指出了主要的司和局。我还指出了一些辅助机构：事务管理局、财政货币管理局、中央会计局。我说，在外交部里还有外交使团物品服务局和两所学校：为外交部系统培养干部的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

一长制原则是外交部工作的基础。部长的指示是外交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遵守的。部务委员会是顾问机构。部务委员会的决定应由部长批准。外交政策性的问题由部长提交政府审议。

刘对外交部党组织系统的问题感兴趣。我指出，在外交部工作的所有联共（布）党员，包括部长和副部长都在一个党组织内，属于一个党委会，它拥有区一级委员会的权力。所有党的机构都是选举的。党委会由党代表会议选举。党组织不干预外交部的事务，它没有被赋予监督职能。它从事党组织的政治教育工作并解决党的组织问题。

外交部的党组织受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的领导，而外交部党的领导成员则受联共（布）中央的领导。

对刘提出的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有多少和党员所占的百分比是多少的问题，我回答说，在外交部约有 1500 名工作人员，其中约 95% 是联共（布）党员。

刘想知道在我们的国外机构中（大使馆、外交使团和领事馆）有无党组织。我回答说，那里有“工会组织”。对刘提出的在人民民主国家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和外交使团里有无党组织的问题，我说，关于这一点我还没有听说过。

然后，刘请求讲述有关我们的大使馆和外交使团的组织情况。我就此问题做出解释，并按刘的请求着重讲了领事馆的职能。

刘接着提出了我们外交干部的培养和他们的党派身份问题，以及在外交部和其他苏联机构的服务中利用旧专家的问题。在对此问题作答时，我强调，在外交干部的培养和学习上，我们依靠我们的党。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是我们干部的来源。我们外交工作人员的绝大部分是联共（布）党员并出身于工人和劳动农民阶层。我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我们就更新了外交部中央机关和驻国外机构的外交工作人员的成分。与此同时我还指出，我们吸收过旧专家，尤其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即使现在我们也不拒绝利用非党的旧专家（国际法问题的专家、顾问和法学家等）。在利用旧专家的问题上，我们遵循的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在必须勇敢地提拔新干部的同时利用旧专家的著名论断。我们现有的经验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依据是，真正的学者和专家，如果给他们提供了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条

件，是不可能在建立新社会的过程中成为消极的旁观者的，尤其是在苏维埃政权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条件下。

刘又问，我们方面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有什么建议或愿望他可以转告毛泽东的。对此我说，妥善解决对日和约是重要的国际问题之一。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我们应当力求这一问题的筹备工作由外长会议，而不是如美英所建议的那样在 11 或 12 国会议上来进行。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像解决其他重要国际问题那样，重要的是要做到：在此之前，中国新的民主政府应得到外国政府的承认。

我接着指出，我们应当密切关注美国的政策，这就是说要采取措施，及时使美国当权集团为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而利用局势的企图不能得逞。我指出，在这方面，对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应有特别的警觉和警惕性。

我还指出，在国际事务中还需要保持随机应变的自由。外交与军事战略密切相关。希望我们的中国朋友能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应当经常利用我们敌人阵营中的矛盾。及时了解并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这就意味着拥有重要的战略潜力。在这方面，斯大林同志对我们有英明的教导，所以我们说，这是斯大林的外交。

刘随后说，毛泽东非常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访问苏联并亲自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刘说，我们也邀请您访问中国。我对邀请表示感谢。

在谈话结束时刘问，外交部是否有可能接受一批中国民主主义者参加短期训练班，为中国未来的外交部及其驻外机构培养外交工作人员，或者，如果方便的话，派遣苏联专家到中国来就地培训中国干部。我指出，我觉得这在原则上是可行的。但是，这一问题应通过最高级机构的协商。刘说，这当然要反映在给斯大林同志的有关信件之中。

会谈时了解到，中国朋友没有足够的有关国际关系问题的参考资料，尤其是外交词典等。我答应寄赠给他们几本已经出版的外交词典第一卷和即将出版的第二卷。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和师哲（卡尔斯基），以及伊·弗·科瓦廖夫和尼·特·费德林。

会谈持续了 3 小时。

安·维辛斯基（签名）

分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柯西金等同志。

文件 06

刘少奇关于带专家回国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1949年8月2日）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①]

我接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电报。他要我回国，把王稼祥同志留下协助近日即将来莫斯科的刘亚楼和张学思同志处理创建空军和海军学校的事宜。这一工作在8月中旬或下旬结束后，王稼祥同志应回北平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会后他将返回莫斯科。

因此我非常希望，如有可能，伊·弗·科瓦廖夫同志，还有部分选派到中国去工作的苏联专家和我一起走。[②]其他的苏联专家可以和王稼祥同志一起走。[③]

为了给伊·弗·科瓦廖夫同志和苏联专家们以准备行程的必要时间，我打算8月10日离开莫斯科。恳请您指示加快前往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

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除了和一些苏联同志会谈外，我愿意完成您所交办的任何任务。

请予指示。[④]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刘少奇（签名）

1949年8月2日

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2期

---

① 此信是科瓦廖夫转交的。信中附笔："致约·维·斯大林同志。向您呈上刘少奇转交给您的信。伊·科瓦廖夫，1949年8月3日。"

② 8月14日，科瓦廖夫与220名苏联专家与刘少奇同车离开莫斯科，8月25日到达沈阳。

③ 斯大林阅读文件时在以上两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④ 斯大林阅读文件时在这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人名译名对照表

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
埃瓦特，Evatt
艾奇逊，Dean Acheson
奥里奥尔，Vincent Auriol
巴多利奥，P. Badolio
巴甫洛夫，Павлов
贝利亚，Л. П. Берия
贝鲁特，Boleslaw Bierut
贝奈斯，Eduard Benes
彼得罗夫，А. А. Петров
伯恩斯，James H. Bums
布尔加宁，Н. А. Бурганин
布莱德雷，Omar N. Bradley
布吕姆，Leon Blum
茨尔诺布尔尼亚，Crnobrnja
邓恩，Dunn
杜勒斯，Allen W. Dulles
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杜鲁门，Harry S. Truman
多列士，Maurice Thorez
范阿克尔，Achille Van Acker
菲利波夫，Филиппов
伏罗希洛夫，К. Е. Ворошилов
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

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
格里菲斯，Griffis
葛罗米柯，A. A. Громыко
哈里曼，W.Averell Harriman
赫布朗，Andrija Hebrang
赫尔利，Patrick Hurley
华德，Angus I. Ward
霍查，Enver Hoxha
霍夫曼，Paul Hoffman
基尔萨诺夫 С. П. Кирсанов
吉拉斯，Milovan Djilas
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
季诺维也夫，Г. Е. Зиновьев
加米涅夫，Л. Б. Каменев
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п
贾丕才，М. С. Капица
金日成，Kim Il-sung
卡德尔，Edvard Kardelj
卡尔斯基（师哲），Карский
卡夫塔拉泽，С. И. Кавтарадзе
柯克，Alan G. Kirk
柯乐布，O. Edmond Clubb
科斯托夫，Traicho Kostov
科瓦廖夫，И. В. Ковалев
克拉克，Mark W. Clark
库西宁，О. В. Куусинен
拉德凯维奇，Stanislaw Radkiewicz
拉夫利谢夫，А. А. Лаврищев
拉夫连季耶夫，А. Лаврентьев
拉科西· 马加什，Matyas Rakosi
拉马迪埃，Paul Ramadier

拉伊克· 拉斯洛，Rajk László
拉祖瓦耶夫，B. H. Разуваев
腊斯克，Dean Rusk
莱姆尼策，Lyman L. Lemnitzer
兰科维奇，Alexander Rankovic
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
李维诺夫，M. M. Литвинов
列别杰夫，H. Г. Лебедев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洛佐夫斯基，C. A. Лозовски
马立克，Я. A. Малик
马林科夫，Г. M. Маленков
马利诺夫斯基，R. Я. Малиновский
马努伊尔斯基，Д. З. Мануильский
马歇尔，George Marshall
迈斯基，И. M. Майский
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米高扬，A. И. Микоян，A. I. Mikoyan
米科拉伊奇克，Stanislay Mikolajczyk
莫洛托夫，B. M. Молотов
莫洛佐夫，И. Морозов
莫泽莱夫斯基，Zygmunt Modzelewski
诺塞克，V. Nosek
诺维科夫，И. И. Новиков
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
潘尼迦，K. M. Panikkar
皮克，Wilhelm Pieck
普希金，Г. M. Пушкин
切乔特金娜，Орга Чечёткина
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日丹诺夫，A. A. Жданов

茹约维奇，Zhuyevich

萨德奇科夫，И.В.Садчиков

赛扬，Louis Seilhan

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

斯兰斯基，Rudolf Slánsky

斯特拉科夫斯基，Строковский

苏斯洛夫，М. А. Суслов

索洛维约夫，Соловьев

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化名埃尔科利（Erkoli）

铁托，Josip Broz Tito

托洛茨基，Л. Д. Троцкий

维涅维奇，Winiewicz

维辛斯基，А. Я. Вышинский

沃里斯，Tracy S. Voorhees

希特勒，Adolf Hitler

尤金，П. Ф. Юдин